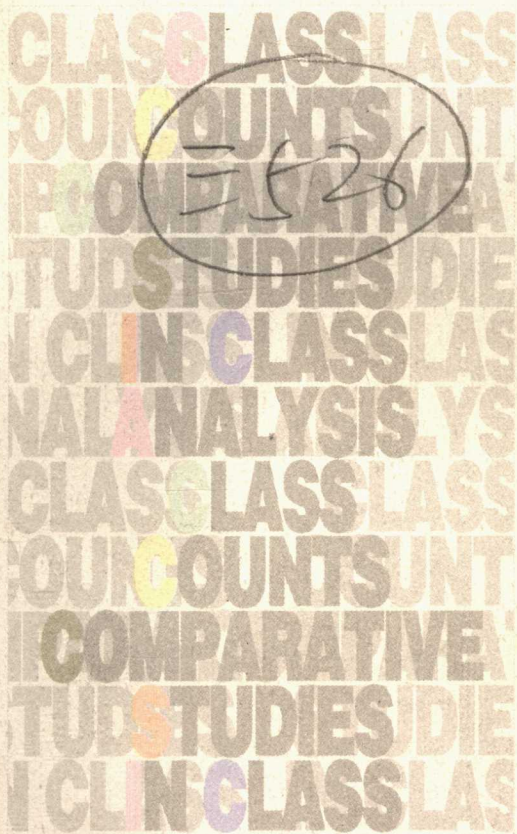


#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



[美] 埃里克·奥林·赖特 著  
陈心想 皮小林 杨玉明 陈 阳 译  
裴晓梅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

[美]埃里克·奥林·赖特 著

陈心想 皮小林 译

杨玉明 陈 阳

裴晓梅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 图字 06-2000-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 (美) 赖特 (Wright, E.O.) 著; 陈心想等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6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Class Counts

ISBN 7-5382-6737-9

I. 后… II. ①赖… ②陈… III. 后工业社会 (经常学) 阶级 - 研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698 号

Class Counts

Copyright©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	埃里克·奥林·赖特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译者	陈心想 皮小林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杨玉明 陈阳
印刷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	审校	裴晓梅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特约编辑	谢翰如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技术编辑	代剑萍
印张	21	责任校对	张华
字数	464 千字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印数	1-3000 册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定价	45.00 元		

## 内容提要

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开展这一研究，既需要立足国内，加强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的调研，也需要拓宽视野，了解国外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及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为我国学者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资料。

本书系作者和众多研究人员历时20年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的成果，它把阶级概念的理论讨论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及其衍生物的经验性调查、比较结合起来，主要探讨了阶级结构及其变化、阶级边界的渗透性、阶级与性别和阶级意识四个问题，并对它们作了特别的经验性研究——研究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管理权力方面的性别差异、阶级结构中的友谊网络、美国过去20年中自我雇佣的发展、国家雇员和私营部门雇员的阶级意识等问题。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本书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研究内容深入到工作、家庭、性别、交往及观念等一些微观领域，比较具体、细致。这在研究方法上为我国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二，正因为是实证的，所以本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特别是提供了很多调查的数据，同时还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我国学者研究当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难



得的参考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国外阶级、阶层结构的新情况、新现象很有帮助。

第三，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阶级、阶层观点与新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分析比较，确认现实状况不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吻合的，有的则已经不一致了。这种比较，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多数分析来自实际。尽管有些观点我们不一定接受，但通过本书了解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还是有用的。

从总体上看，本书有较大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国外阶级、阶层状况很有帮助。



埃尔西：“爸爸，那是什么？”

父亲：“一头奶牛。”

埃尔西：“为什么？”

——英国《笨拙》画报(1906)

## 序 言

正像埃尔西惊异于为什么一头奶牛是一头“奶牛”一样，是什么使一个阶级成为一个“阶级”这一问题长期令人困扰。这是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植根于对抗阶级关系的两极化思想：奴隶主剥削奴隶，地主剥削农奴，资本家剥削工人。然而，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许多人似乎不那么完全符合这个两极化概念。在日常用语中，许多人处于“中产阶级”，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不喜欢这个术语，然而多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对把经理、医生和教授称为“无产者”仍会感到别扭。因此，问题是：通常被称做“中产”阶级的社会类别怎么样能够被置于围绕两极化的阶级概念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中？处于“关系”的“中间”意味着什么？本书汇集了直接或间接向这个核心概念发难的各家各派的所有研究成果。

我对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是以我完成于1976年关于阶级和收入的学位论文开始的。在那个项目中，我使用了密执安收入动态研究小组完成的雇佣质量调查和其他一些数据资料。这些资料都不是根据头脑中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收集的。当数据资料分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时，我总是说：“当然，数据是在资产阶级类别中收集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假设没有被证实。”所以下一步自然是收集新数据资料，这些数据将直接被裁剪成能从数量上“验证”关于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传统结论的假设，这些数据资料能使我毫无借口反驳批评。这就是我1977

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这个项目建议背后的主要思想。这个建议也是我第一个获得批准的建议。

最初制定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是试图收集一组数据资料，其中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能直接相互接合。在建议中我认为，在阶级分析中**理论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的对话）和**量化研究**（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裂隙。为了弥合这个裂隙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概念框架下收集系统的数据资料；第二，收集用于比较的数据资料。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首先是根植在阶级结构（而不仅仅在个人阶级属性）的概念里，为了严肃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我们需要一些结构上有某种差异的国家的样本。

与研究建议中常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因为需要那些为激发起建议的评审者兴趣而设计的问题，所以我提出的这种研究议程并不能真正反映我想做这项研究的主要原因。社会理论的一般框架之间很少能用一一对应的量化比较来裁定，因为不同的理论框架一般询问不同的问题。另外，就敌对框架之间的直接裁定而言，概念、问题和度量之间的裂隙几乎总是大得无法产生牢固的使人信服的结果。所以马克思/韦伯的争论往往是一个为研究项目辩护的有点人为的方式，并且它肯定没有（照我看来）被证明是最有意义的经验分析线路。我的理论动机与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领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向前推进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个领域探讨的问题有：阶级边界渗透性的跨国变化，阶级位置和阶级个人经历对阶级意识的影响，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跨不同国家的变化，等等。

不过，从一开始，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中把极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裁定概念问题**，而不是从**经验上**

**调查研究理论问题。**我无休止地担心如何能以最理想的方式把“中产阶级”概念化，使“中产阶级”概念既内在连贯一致(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较抽象的原则一致)又在经验上有效。对这个问题的全神贯注有时转移了对本质性理论问题的注意，容易忽视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我常常更多操心如何完美地界定在这一研究中所用的“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不是深入钻研，以期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工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这个问题。好像我觉得只要我能使**概念**正确了，那么理论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或至少变得更易处理)。现在好像对我来说，通过使用一些不太确定的概念不停地努力前进并好歹达到目的地，比投入极多的时间以重构概念本身好。为了释义曾经写了一篇关于塔尔克特·帕森斯的评论，为一个永远不会做的旅行而不断准备行装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即使你忘了带重要的东西，走出门来还是比不出门好。

当我开始比较阶级分析项目时，最初的计划是同母校的一位亲密朋友卢卡·佩龙合作，在美国和意大利做一次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调查。实际上，这个项目原来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共同进行一项使我们容易经常见面的研究项目。到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批准拨款时，作为我1978年在乌普萨拉做的一系列演讲的结果，瑞典加进了这个项目。不久，其他国家的学者获知了这个项目，通过曲折的过程，询问他们能否同样参加这项调查。到1982年，在英国、加拿大和挪威的调查已经完成或在进行中，此后不久又增加了在澳大利亚、丹麦、日本、新西兰和原联邦德国的调查。不幸的是，卢卡在1981年死于一次潜游运动事故，因此，意大利的项目从未完成。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俄罗斯、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最近在葡萄牙又组织进行了一连串追加项目。1991年在美国进行了第二次调查，1995年在瑞典又

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

虽然实际没有打算这样做，但美国的项目变成了全世界迅速扩展的阶级分析项目网络的协调中心点。本来打算做一个集中的短期项目。在1977年我绝对没有打算进行一次特大项目，最终涉及超过15个国家和花费数百万美元。我原来以为该项目只需要几年时间，至多四五年，然后我转向其他问题。现在17年过去了，收工就在眼前。

这项研究事业真的值得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资金吗？如果20年前，当我完成我的学位论文和反复思考是否着手阶级分析项目时，我得知我在1995年还在从事这项工作，那么我会吓得立即取消这个项目。在从事这个项目的岁月里，我有时对它极其厌倦，有时会为无尽的操心度量的细节和仅询问能用系数回答的问题而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最后，我确实认为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值得的。这主要不是因为研究带来的不容怀疑的“事实”。如果你仅列出一份这项研究所有有力的经验性发现的清单，那将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结果不值得如此努力。尽管我希望在本书中展示许多研究发现是引人入胜的，但我不能肯定它们自身能证明这近20年的工作是值得的。

我认为，从这个项目中获得的真正报偿来自于思考相同的思想、概念和迷惑问题如此之久所得的结果。我已把难以计数的时间还给了以下问题：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关于阶级的思想的差异；在阶级分析中，剥削和统治作为分析问题和标准问题的意义；在关系的阶级框架中“中产”阶级的概念地位，等等。不是回归方程所形成的简单“事实”直接报告这些问题，而是反复撷取数据资料迫使我反复地解决这些观念。这个又长又曲折的阶级分析项目把我拴在单独一组观念上，其持续时间大

大超过我在其他方面用的时间，从而使我达到我希望达到的一个洞察力水平——那是我用其他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应该提到本书在分析中存在的几点局限性。首先，尽管这是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写的关于阶级的书，但对阶级结构的两个重要成分没有进行经验分析：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和人口中较边缘的贫穷的常常被漠然地列为“低层阶级”的部分。当我在经验分析中提到“资本家阶级”时，我基本上是指相对较小的雇主，而不是指投资有价证券的财富所有者。对接近“统治阶级”的任何东西当然都没有进行分析。类似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基本上排除了失业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灰心丧气的工人，靠福利生活的人们，等等）。当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是直接对准资本家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使贫穷永久存在。抽样调查的局限性完全使人根本不可能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来严格探讨阶级结构内的两个极端。

第二，除了第二章和第十四章相当简短的几节以外，在本书中几乎没有讨论种族与阶级的问题。考虑到美国种族问题对阶级分析是如此突出，这一点是一个显著的和令人遗憾的缺失。然而，相对小的样本规模意味着样本中非洲裔美国人太少，以致不能对种族和阶级交互影响做复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样本，但美国的样本限制在劳动力和家庭主妇，这也将妨碍对“低层阶级”的决定性的种族/阶级问题的调查研究。考虑到这些局限性，我感到我不可能用来自阶级分析比较项目的数据资料来推进种族与阶级的经验分析。

第三，有一个方法问题影响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本书。本书中报告的大多数数据资料分析原来是为杂志文章准备的。其中最早的出现于1987年，最晚的出现于1995年。像常常发生的情

况那样，当一系列非常不同的分析是由时间跨度的同样的数据资料做出时，就发生了变量构造和操作选择方面一些小变化。所以，在准备书稿过程中，我必须决定：我是应该重做大多数先前已完成的分析，以使所有章节严格一致呢，还是仅仅以它们原始的形式报告研究结果并把操作化中的变化记录下来呢。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限制，那么前者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估计这可能会使本书的完成至少推迟6个月，可能还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到在研究的观念和洞察力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这看来实在没有价值。因此，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心态，即“坚持把蠢事干到底，是心胸狭窄的人的通病”，我几乎保留了所有的原始分析(除了几个我在个案中发现的某种实际错误)。

最后，在修改、扩展和综合不同的经验研究中，我必须决定是否使相关著作的讨论反映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分析涉及诸多方面——从友谊，到家务劳动，到阶级意识，到阶级结构的转变。由于对其中的某些论题，我即使在写原来的论文时，也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再次回顾所有这些个论题的著作的想法真是令我胆战心惊。无论如何，我不准备根据我所可能发现的任何新作而重做分析，我决定完全放弃这项任务。因此，在大量个案中，对较宽泛的社会学著作的讨论可能稍微有些过时。

没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支持，本项目是不可能进行的。它为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资料的公共档案保存以及许多的数据资料分析提供了资金。在整个研究中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也为数据资料分析提供了慷慨的研究支持。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斯宾塞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拨款，使进行第二次美国调查连同俄国阶级分析项目一起成为可能。



有无数的人们，我为他们的研究被收录在本书中而深深感激他们。首先，没有卢卡·佩龙的爱和友谊，本项目决不会发起。他奇特的精神贯穿全书。

迈克尔·劳沃伊布一直是我多年来最坚定的和最有支持力的批评家，鼓励我既做一个精明而又讲实际的人，又一直谨记计划和政治目的。在阅读本书各部分的草稿中，他极力让我把过时的概念叫卖调门降到最低点。他警告说，高谈阔谈会使读者不能专心于研究的经验性信息。我恐怕我仅仅部分地按他的建议做了：我没有从本书中删去理论的和概念的讨论，但它们一般局限在特定章节里。

在阶级分析比较项目中，参加各个国家项目的同仁都对本项目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瑞典项目20世纪80年代的总指挥约兰·阿尔内从一开始就特别参与本项目的问题描述和合理议程的设计，并经常对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冲动表示理智的怀疑。霍华德·纽拜、戈登·马歇尔、大卫·罗斯、约翰·迈尔斯、瓦拉斯·克莱门特、马尔库·基文宁、拉伊莫·布洛姆、托马斯·科尔比约恩森、哈康·莱利斯福拉德、詹斯·霍夫、约翰·韦斯特恩、朱利奥·卡拉巴那、冈恩·伊丽莎白·比克隆德和克里斯·威尔克斯都参加了设计这个项目框架和讨论种种分析的各种国际会议。

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生——研究助理直接参加了许多专题资料分析。我要特别感谢辛西娅·科斯特洛、乔伊·斯普雷格、大卫·哈肯、比尔·马丁、乔治·斯坦梅特兹、唐莫·乔、申光莨（译音）、卡伦·希雷、克雷西达·吕、李承坚（译音）。正当我的热情开始减退之际，参加澳大利亚项目的两位博士后——马克·韦斯特恩和贾宁·巴克斯特在麦迪逊花了两年的时间，为数据资料分析倾注了大量精力和想像力。

许多同事对某个专题分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反馈。当我在统计技术上险些翻船时，罗伯特·霍瑟、罗伯特·梅尔、迈克尔·霍特和查尔斯·哈拉比总是慷慨相助，竭力营救。乔尔·罗杰斯常以怀疑的态度问我：“那么，要点是什么呢？”他成为验证本书许多警句的反应灵敏的人，从而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玛霞，因为她不让本书的工作和其他项目占据我的全部生活。她非常巧妙周到地安排调节活动以支持我的学术工作，又不使它干扰其他事情。

## 鸣 谢

本书部分章节取自《阶级分析比较研究项目》先前发表的论文。在大多数情况下，为适合本书需要对这些早期论文都做了实质性修改：第三章：“当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乔基姆·辛格尔曼《美国社会学杂志》，1982，83卷增补本）和“1960～1980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变”（比尔·马丁，《美国社会学杂志》，1987年7月）。第四章：“小资产阶级的兴衰”（乔治·斯坦梅特兹，《美国社会学杂志》，1989年3月）。第六章：“代际流动阶级边界的渗透性：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比较研究”（马克·韦斯特恩，《美国社会学评论》，1994年6月）。第七章：“跨阶级友谊的阶级边界相对渗透性：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比较分析”（唐莫·乔，《美国社会学评论》，1992年2月）。第十章：“阶级结构中的女性”（《政治与社会》，1989年3月）。第十一章：“阶级对家庭内性别劳动分工影响有限：瑞典和美国的比较分析”（卡伦·希雷，黄淑琳（音译），莫琳·多兰和贾宁·巴克斯特，《性别与社会》，1992年6月）。第十二章：“权威方面的性别差异：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瑞典、挪威和日本的比较分析”（唐莫·乔，《美国社会学评论》，1995年6月）。第十四章：“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卡罗琳·豪和唐莫·乔）《比较社会学》梅尔文·科恩主编（贝弗利·希尔斯著：明智的美国标准社会总统卷，1989）。第十五章：“意识形态和政府雇佣：美国和瑞典的比较分析”（唐莫·乔，《政治与社会》，1992年6月）。第十六章：“时间性和

阶级分析：瑞典和美国阶级结构、阶级轨迹和阶级意识的比较分析”(匡永申，《社会学理论》，1988年春季刊)。

# 目 录

## 图表目录

## 序言

## 鸣谢

第一章 阶级分析	1
1.1 西木的故事	4
1.2 剥削的概念	11
1.3 对把剥削作为剩余占有的注释	15
1.4 阶级和剥削	18
1.5 雇员中的“中产阶级”	20
权力	
技术和专长	
中产阶级的阶级位置分布图	
1.6 不属于有酬劳动力的人	27
1.7 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比较	30
1.8 本书经验研究的议程	38
阶级结构	
阶级和性别	
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b>第一编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及其转变</b>	
第二章 阶级结构的比较分析	47
2.1 阶级结构的基本轮廓	48
财产维度	

雇员	
2.2 阶级和性别	59
2.3 阶级和种族	68
2.4 就业组织的类型	70
2.5 总结	74
方法附录	76
样本	
阶级结构变量的操作	
与官方统计相比, 分布评估的可靠性	
各国间衡量标准的可比性	
操作任意性问题	
如何用较少的问卷项目来衡量阶级结构	
第三章 1960 ~ 1990 年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变	93
3.1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预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测之比较	96
3.2 方法策略	98
3.3 结果	99
20 世纪 6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	
这些结果有可能不符合逻辑吗?	
细化了的部门分析	
3.4 解释和意义	113
方法附录	116
经济部门变量的操作	
阶级结构的衡量	
第四章 美国小资产阶级的下降和上升	120
4.1 自我雇佣的理论地位	126
4.2 对美国自我雇佣的时间序列分析	132
基本的时间序列结果	
失业效应	

---

4.3	自我雇佣变化的部门分解	137
4.4	结论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146
	方法附录	149
	对美国自我雇佣年度时间序列的分析	
	自我雇佣变化的变化分担分解	
<b>第二编</b>	<b>阶级边界的渗透性</b>	
第五章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概念和方法问题	157
5.1	理论问题	158
	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中的渗透性	
	静态的和动态的渗透性	
5.2	阶级结构变量	161
	运用阶级结构	
	渗透性事件矩阵	
5.3	渗透性变量	165
	分析渗透性可供选择的方法	
	维度渗透性变量: 财产、权力和技能	
	位置渗透性变量: 工人	
	对角线单元: 准独立矩阵	
	对称问题	
5.4	模型	172
	方法附录	174
	对数线性模型的简单介绍	
第六章	阶级边界代际流动的渗透性	178
6.1	理论期望	180
	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跨国变化	
	假设	
	性别与代际流动的阶级边界渗透性	
6.2	与以往流动研究的关系	187
	分析策略	

阶级结构的概念化	
比较设计	
6.3 结果	192
男性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男性跨工人阶级边界的流动	
男性跨国变化	
农民问题	
性别与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6.4 流动研究结果的含义	205
6.5 结论	209
方法附录	210
变量	
测量问题	
第七章 跨阶级友谊	213
7.1 定向假设	214
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变式)	
阶级利益(达伦多夫变式)	
阶级习性(布迪厄)	
互动机会	
韦伯主义传统	
与以往研究的关系	
7.2 结果	219
三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位置间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国家相互作用	
7.3 结论	226
方法附录	228
友谊纽带矩阵	
对数据结构的异议	
不对称友谊问题	
样本规模问题	



朋友阶级位置中管理者与监督者的区分	
第八章 跨阶级家庭	233
8.1 理论问题	234
8.2 结果	235
跨阶级家庭模式	
三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位置间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国家相互作用	
8.3 阶级边界渗透性三种形式的比较	240
方法附录	245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	
主妇	
<b>第三编 阶级和性别</b>	
第九章 阶级和性别互动的概念化	249
9.1 关于阶级第一重要的争论	249
9.2 阶级和性别相互联系的形式	252
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	
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性别作为进入阶级位置的一种分类机制	
性别作为与阶级位置的间接联系	
性别在决定结果过程中作为与阶级的因果互动	
第十章 个人、家庭和阶级分析	258
10.1 关于妇女和阶级的讨论	261
10.2 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直接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266
10.3 研究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影响之方法	268
假设	
戈德西尔帕假设	
间接和直接阶级位置假设	
10.4 结论	272
阶级构成对阶级身份的影响	

多变量结果	
10.5 含义	277
10.6 结论	282
方法附录	284
变量	
作为经验策略基础的假设	
第十一章 阶级对家务劳动性别化分工的有限影响	289
11.1 理论设想	291
无产阶级化和性别平等	
性别歧视和阶级文化	
家庭中的阶级和权力	
性别关系的自主性	
11.2 结果	295
总体分布	
不同阶级位置之间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不同	
多变量方程	
11.3 含义	308
方法附录	313
变量	
数据、方法和分析策略	
分析策略	
第十二章 工作场所权力方面的性别差距	325
12.1 研究“性别差距”的分析策略	326
12.2 经验性议程	329
性别—权力差异的范围与跨国模式	
解释不同国家里权力拥有方面的性别差距	
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	
解释跨国变化	
12.3 结果	340
拥有权力的总体性别差异	
带有构成控制因素的权力的净性别差异	

---

自我选择模型	
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	
解释跨国变化	
12.4 结论	363
方法附录	366
对数模型中所用的变量	
权力量度的跨国可比性的问题	
样本限制	
权力总量量表的分析方法	
<b>第四编 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b>	
第十三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一般研究框架	379
13.1 微观与宏观分析层次	380
13.2 基本概念	385
阶级结构和阶级位置	
阶级形成	
阶级实践	
阶级斗争	
阶级意识	
限制、选择和转变	
13.3 微观模型	395
13.4 宏观模型	400
13.5 微观模型与宏观模型的结合	407
13.6 模型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	411
第十四章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413
14.1 测量阶级意识	413
14.2 经验性议程	417
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	
阶级形成	
阶级意识	
14.3 结果：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总体关系	423

14.4	研究结果: 阶级形成的宏观分析	425
	瑞典	
	美国	
	日本	
	三国比较概要	
14.5	对阶级形成中差别的解释	435
	国家雇佣	
	工会组织	
	日本	
14.6	阶级意识的微观分析	447
	附加的国家影响	
	微观方程的跨国比较	
14.7	关于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的简短注解	453
14.8	结论	456
	方法附录	457
	创建阶级意识尺度的方法问题	
	测量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策略	
	多变量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	
	变量群的单独系数的产生	
第十五章	阶级、国家雇佣和意识	466
15.1	国家雇佣概念化	468
15.2	定向假设	470
15.3	结果	476
	部门内的阶级差异	
	阶级内的部门差异	
	控制个人属性的阶级内的部门差异	
15.4	含义	490
	方法附录	493
	因变量: 赞成国家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	
	自变量	
	统计检验	

---

第十六章 时间性、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497
16.1 对阶级和意识的结构和程序探讨	498
16.2 轨迹、结构和意识的模型	501
16.3 阶级轨迹的概念化和测量	504
16.4 结果	510
阶级利益意识	
阶级认同	
阶级认同对阶级利益的影响	
瑞典和美国的比较	
意识方面国家差异中的阶级和性别	
16.5 结论	519
<b>第五编 结论</b>	
第十七章 验证: 意外的发现和理论重建	525
17.1 阶级结构中“位置”的概念化	528
传统的理解	
最初的重建	
经验性验证	
意外的发现	
进一步理论重建的可能	
17.2 阶级结构及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	534
传统理解	
验证	
意外的发现	
理论重建	
17.3 个人生活和阶级结构	538
传统理解	
验证	
意外的发现	
理论重建	
17.4 阶级结构的影响: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542
传统理解	

验证	
意外的发现: 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意外的发现: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理论重建: 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理论重建: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17.5 阶级和其他压迫形式: 阶级和性别	547
传统理解	
验证	
意外的发现	
理论重建	
<b>注释</b>	552
<b>参考文献</b>	591
<b>人名对照表</b>	611
<b>主题对照表</b>	619

# 图表目录

## 图

图 1.1	不同能力的西木是怎样影响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	8
图 1.2	基本的阶级分类	25
图 1.3	细化了的阶级分类	26
图 1.4	不同经济阶级中的人所面对的闲暇—消费的权衡图	33
图 1.5	阶级分析三模式	35
图 2.1	六个国家的阶级分布图	49
图 2.2	六国调整过的雇员阶级分布图	56
附录图 2.1	可供选择的管理权的操作	86
附录图 2.2	不同的操作下美国和瑞典的阶级分布图	88
附录图 2.3	只用三个项目的权利维度操作	91
图 3.1	阶级结构转变分析所用的阶级类别	100
图 3.2	一些特定阶级位置上阶级分布的各个十年变化率的阶级变化成分	103
图 4.1	美国自我雇佣率的时间序列, 1948~1992	125
图 4.2	自我雇佣十年变化率的分解, 1940~1990	139
图 5.1	在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中所使用的阶级分类	164
图 5.2	渗透事件的矩阵	165
图 5.3	阶级—边界—跨越变量的策划矩阵	168
附录图 5.1	用于对数线性分析中的流动性矩阵	176
图 8.1	双收入家庭的阶级构成	236

图 8.2	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流动、友谊和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机会	244
图 10.1	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阶级认同影响的一个常用模型	270
图 10.2	不同阶级构成的双收入家庭中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妇女的百分比	274
图 12.1	七个国家内权力的性别差距	343
图 13.1	阶级分析的简要核心模型	380
图 13.2	微观、中观与宏观分析层次	383
图 13.3	结构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394
图 13.4	决定的形式: 限制, 选择, 转换	395
图 13.5	阶级位置、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关系的微观模型	396
图 13.6	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宏观模型	401
图 13.7	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阶级形成	404
图 13.8	阶级分析中宏观与微观的联系	408
图 14.1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424
图 14.2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系谱	426
图 14.3	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模式	427
图 14.4	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的三维表示	428
图 14.5	美国在阶级意识方面的种族和性别差异	455
附录图 14.1	意识形态阶级联盟构成的图像图解方法范例	461
图 16.1	阶级认同和主观利益的基本因果模型	504

### 表

表 1.1	不同阶级对西木命运的选择序列排列	10
表 2.1	不同部门中雇主和小资产阶级的百分数	52
表 2.2	各职业类别中的监督权分布	57



表 2.3	按个人的工作—阶级和家庭—阶级标准界定的美国、瑞典男子和妇女的阶级分布	61
表 2.4	阶级—性别分布列联表	64
表 2.5	处于不同家庭阶级状况的自我雇佣者的分布	66
表 2.6	美国阶级—种族—性别分布列联表	69
表 2.7	不同阶级位置上雇员的就业组织类型分布	72
附录表 2.1	样本特征	76
附录表 2.2	阶级结构的操作	78
附录表 2.3	比较项目和公共数据对自我雇佣的评估的比较	79
附录表 2.4	技术维度可供选择的操作	84
附录表 2.5	按不同标准区分的受访者分布	87
附录表 2.6	简单的和复杂的权力操作对比	92
表 3.1	美国阶级结构转变的假说	98
表 3.2	1960~1990年美国的阶级分布	101
表 3.3	阶级结构变化率的分解	102
表 3.4	美国阶级分布变化的阶级变化—部门变化成分的分解列联表, 1960~1990	108
附录表 3.1	经济部门分类	117
表 4.1	目前阶级位置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列联表	123
表 4.2	自我雇佣的理论标准	127
表 4.3	美国、法国和德国自我雇佣的长期趋势	131
表 4.4	西欧自我雇佣的走势, 1970~1982	133
表 4.5	对自我雇佣的时间序列回归	135
表 4.6	失业对自我雇佣效应的的时间序列回归	136
表 4.7	就业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比例, 1940~1990	138
表 4.8	自我雇佣变化率的分解	138
表 4.9	自我雇佣的部门效应和阶级效应分解	140

表 4.10	不同部门对自我雇佣率变化的总贡献率的排列, 1970~1980和1980~1990	142
表 4.11	后工业部门对自我雇佣增长的贡献	145
附录表 4.1	用于变化分担分析的部门分类	153
表 5.1	渗透性分析中阶级结构的操作	162
表 6.1	阶级边界流动的渗透性参数估计: 美国、加拿大、 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193
表 6.2	与跨越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 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195
表 6.3	跨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边界非渗透性排序: 美国、 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196
表 6.4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中跨国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 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198
表 6.5	对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参数估计, 排除农民或 农民出身的人	200
表 6.6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参数估计: 美国、加拿大、 瑞典和挪威的男性与女性劳动力比较	202
表 6.7	与跨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大、 瑞典和挪威的女性与男性劳动力的比较	204
表 6.8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跨国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 大、瑞典、挪威的男性女性比较	206
表 7.1	不同理论观点中的友谊纽带的阶级边界相对不易 渗透性的排序	214
表 7.2	三个剥削边界渗透性系数: 四国成年劳动力	219
表 7.3	工人 非工人边界渗透性系数: 四国成年劳动力	221
表 7.4	工人与其他阶级位置间友谊纽带的边界非渗透性 的排序	223

表 7.5	友谊阶级边界渗透性的跨国相互作用	225
表 8.1	双收入家庭中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	238
表 8.2	跨越工人阶级边界的双收入家庭中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239
表 8.3	双收入家庭中工人阶级边界的边界非渗透性排序	241
表 8.4	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中的跨国相互作用	242
表 10.1	不同阶级构成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数的百分比(仅限双收入家庭)	273
表 10.2	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认同的影响(对数回归)	275
表 10.3	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认同的影响(对数回归)	278
表 11.1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	292
表 11.2	在美国和瑞典, 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分布情况	297
表 11.3	根据不同家庭—阶级构成划分的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占全部家务劳动的平均比例程度(仅限双收入家庭)	302
表 11.4	家庭—阶级构成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	304
表 11.5	家庭—阶级构成和所选其他变量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	305
表 11.6	控制其他变量时教育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系数(仅限于瑞典女性)	307
表 11.7	由丈夫的阶级所决定的妻子劳动力参与率和丈夫对家务劳动的贡献	310
附录表 11.1	构建家庭—性别态度变量和权力—性别态度变量	318
附录表 11.2	构建性别观念量表	319
附录表 11.3	不同家庭—阶级构成的双收入家庭中, 丈夫	

	所做家务占全部家务的平均比例：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322
附录表 11.4	家庭—阶级构成对丈夫所做家务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323
附录表 11.5	家庭—阶级构成和其他变量对丈夫所做家务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324
表 12.1	女性高级经理很少的情况和没有“玻璃天花板”的性别歧视情况	335
表 12.2	性别分类中的权力分布：七个国家	342
表 12.3	七个国家里女性相对男性拥有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的性别系数：不加控制的模型	344
表 12.4	七个国家内女性相对男性拥有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加入控制的模型	348
表 12.5	验证“自我选择”假设：在包括婚姻状况和丈夫所做家务之间的互动模型里，对女性较之男性获得权力机会的分析	352
表 12.6	检验玻璃天花板假设：在七个国家里，女性相对男性拥有不同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样本限制在正式权力等级中)	354
表 12.7	按照权力的性别差距和其他相关变量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国家排列顺序	356
表 12.8	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机构从自由/商品化到社会主义的/非商品化制度的排列顺序	363
附录表 12.1	分析中所使用的变量	368
附录表 12.2	七个国家里的男性与女性中，权力等级中的正式位置，施加约束的能力和参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370

表 13.1	社会分析微观与宏观层次的逻辑	382
表 14.1	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中各阶级类型在反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	438
表 14.2	阶级类别中工会成员和非成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	441
表 14.3	美国和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分解	445
表 14.4	阶级意识的阶级决定因素：三个国家的结合	448
表 14.5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	452
表 15.1	阶级和国家分析中使用的社会结构位置	471
表 15.2	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定向假设	474
表 15.3	美国和瑞典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的意识形态方向列联表	479
表 15.4	部门内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门之间的差异检验	481
表 15.5	跨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比较中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检验	483
表 15.6	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内女性的百分比	486
表 15.7	控制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的条件下阶级内部门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488
表 15.8	美国和瑞典的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内意识形态方向的等级排序	492
表 16.1	阶级分析可选择的两类一般方法	498
表 16.2	阶级流动矩阵中可能的个人经历轨迹	506
表 16.3	全部个人经历轨迹类型的聚集模型的范例	507
表 16.4	预测阶级利益意识的轨迹模型的解释变量（调整过的 $R^2$ ）	511
表 16.5	美国和瑞典由于阶级出身和当前阶级位置而拥有工人阶级身份的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	513

---

表 16.6	预测工人阶级认同的轨迹模型的解释变量 (调整过的 $R^2$ )	514
表 16.7	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对阶级利益意识的影响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516
表 16.8	跨国家性别对比概要: 预测利益和认同的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调整过的 $R^2$ )	518

# 第一章

## 阶级分析

本书的经验性研究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实质性论题：从友情形式和阶级流动到家务和阶级意识。把这些论题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是对某一共同解释对象的关注，而是对一个共同的解释要素——阶级的关注。阶级分析试图做的就是探索阶级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每一件事，阶级都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的确，正如我们将要发现的那样，阶级在本书中的一些分析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别有力的要素出现的。阶级分析并不意味着信奉这样一种论点，即所有社会现象基本上都能用阶级来解释或者甚至说阶级永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阶级分析是基于深信阶级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原因，因此探讨它的细节对许多社会现象来说是有解释价值的。这意味着加深我们对阶级所能解释的限度以及对阶级协助决定它所解释的事物过程的理解。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阶级分析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自变量”的专门研究领域。它是一门类似医学中的内分泌学的学科。如果你是一个内分泌学家，只要你探索内分泌系统和那些解释项之间的关系，你就要研究除了内分泌系统内部功能活动之外

的大量问题——性，个性，成长，疾病过程，等等。内分泌学从其自身解释变量——激素系统——上看是单配的，但是从它的因变量上看则是混杂的。而且，在对某些问题的调查中发现激素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内分泌学中并不令人尴尬。和知道激素能解释什么一样，知道它们不能解释什么也是我们在内分泌学科知识方面的一个进步。相反，肿瘤学是一个因变量学科。作为一个肿瘤学家，你可以研究任何想象得到的致癌原因——毒素，遗传因素，病毒，甚至于心理状态。肿瘤学在其因变量上是单配的，但在其自变量上则是混杂的。而且，如果调查结果发现某种潜在的致癌原因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致癌因素，这在肿瘤学研究中也并不是令人尴尬的事情。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着对阶级分析最精细和最系统的理论框架。不论人们对它的科学适度作何评判，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雄心勃勃、一流水平的理论工程，其中阶级分析被认为是称之为对人类历史划时代的轨迹提供了最基本的解释。“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句格言表达了这个思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或是通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像一个医学理论，这个理论通过论证激素机制为癌症的动态发展（“历史”）提供了主要的解释（“动力”）而把内分泌学和肿瘤学结合了起来。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从不曾认为历史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可以用阶级分析来解释的，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单因论。这个主张其实受到较多的制约，然而它仍是雄心勃勃的：即整个历史发展的轨道可以用经过恰当构建的阶级分析来给予解释。<sup>1</sup>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从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宏大主张中撤退。虽然历史具有一个综合结构的思想 and 资本主义原动力充满着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矛盾的思想



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部分知识背景，大多数实际研究不仅包括了这些思想，并且替而代之地把焦点放在了阶级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方式上。阶级分析于是变成了一系列广泛的有关阶级关系的因果研究议程的核心。

当然，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并不是惟一研究阶级的方法。还有源自于韦伯学说的阶级分析，源自于分层理论的阶级分析，折中主义的常识性阶级分析。因而，在着手安排本书的具体经验性研究日程之前，我们需要阐明分析中将要用到的阶级概念的基本轮廓。我们特别需要弄清“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因为它在阶级分析中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这是本章的基本目标。

“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只是阶级分析中的一个要素。其他概念性要素包括阶级形成（阶级成为集体组织下行动者的形式），阶级斗争（行动者为了阶级利益的实现而进行的实践）和阶级意识（行动者对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理解）。阶级分析的任务不仅仅是要理解阶级结构和它的作用，而且还要理解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给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将在第十三章探讨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模式。本章的讨论将限于阶级结构这个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我相信阶级结构永远是阶级分析中最重要解释要素。它确实可以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时间和空间里阶级形成的变动，较之于同这些阶级形成相关联的阶级结构的变动，在国家政策中是更加重要的变动决定因素。确切地说，我首先关注阶级结构是因为它对于阐明阶级分析的整个逻辑仍具有概念性的关键作用。我们说阶级形成或阶级斗争而不是简单的群体形成或斗争，意味着我们对“阶级”有一个定义并且知道把一个集体行动者作为阶级形成的一个例子来描述，或把一个冲

突作为一个阶级冲突而不是其他类别的冲突来描述时，它的含义是什么。这里的假设是当阶级这个词被附加在“形成”、“意识”及“斗争”之前时，阶级结构这个概念传递了形容词“阶级”的本质内涵。阶级形成是阶级结构里集体行动者们围绕着阶级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形式；阶级斗争是这种集体组织起来的行动者之间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里的人们对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理解。在每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在已经有了对阶级结构的定义之后，才能充分说明其他概念。因此，详尽阐述阶级结构的相关概念是发展关于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令人满意的理论的重要概念性前提。

### 1.1 西木(Shmoo)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末的连环漫画《里尔·阿贝纳》的一个故事有助于为阶级结构概念的讨论提供一个舞台。<sup>2</sup> 故事情节的场面是这样的：里尔·阿贝纳是多哥帕湖的希尔——比利社区的一个居民，他发现了一种陌生而神奇的生物“西木”，并把一群西木带回了多哥帕湖。西木生活的惟一愿望就是把它们自己变成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以使人类快乐。它们不向人类提供奢侈品，而仅提供生活中基本的必需品。如果你饿了，它们便能变成火腿和蛋，但不会是鱼子酱。而且，它们繁殖得很快，你永远也不会把它们用完。于是它们对于富人而言价值甚微，但对穷人却有着很高的价值。实际上，西木把人们带回到了伊甸园。当上帝由于亚当和夏娃犯罪而把他们从天堂中驱逐出来时，最严厉的惩罚之一便是，从那时候起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必须“用他们额上的汗水来挣得他们的面包”。西木把人们从这种必须中解放出来并且因此打开了西方文化中深玄的幻想之源。







在以上从《里尔·阿贝纳》中复制的情节里，一个为富有的资本家P.U.工作的经理在做一项研究来确定全美最贫困的地区，其目的是为新工厂雇佣最廉价的劳动力。这个地方结果是多哥帕湖。P.U.和经理来到多哥帕湖为新工厂招募员工。故事以1948年的一组漫画形式展开(艾尔·卡帕 1992: 134-136)：

于是西木的存在不论是对阶级关系还是两性关系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招募从事苦活的工人更加困难，而且这些工人无须再受他们老板的“责骂”和侮辱。妇女无须再在经济上依赖男子，因而也就无须忍受歧视妇女的待遇了。<sup>3</sup>

在随后的情节里，P.U.和他的亲信组织了一个毁灭西木的运动。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西木的坏影响被阻止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能够继续下去，不曾受到伊甸园的幽灵威胁。

西木的传说有助于说明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深蒂固地对立的这层意思，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思想之一。西木是怎样影响着这两个阶级中人们的物质利益的？<sup>4</sup>如图1.1所示，这将取决于西木大方的程度。如果西木提供的东西比仅能维持生理需要的东西还要少，它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二者的物质利益可能都具有正面的影响。对工人来说，它使得他们的生活稍微稳定一些；对资本家来说这种低于维持生计的西木，可以被认为是工资单中的补助金。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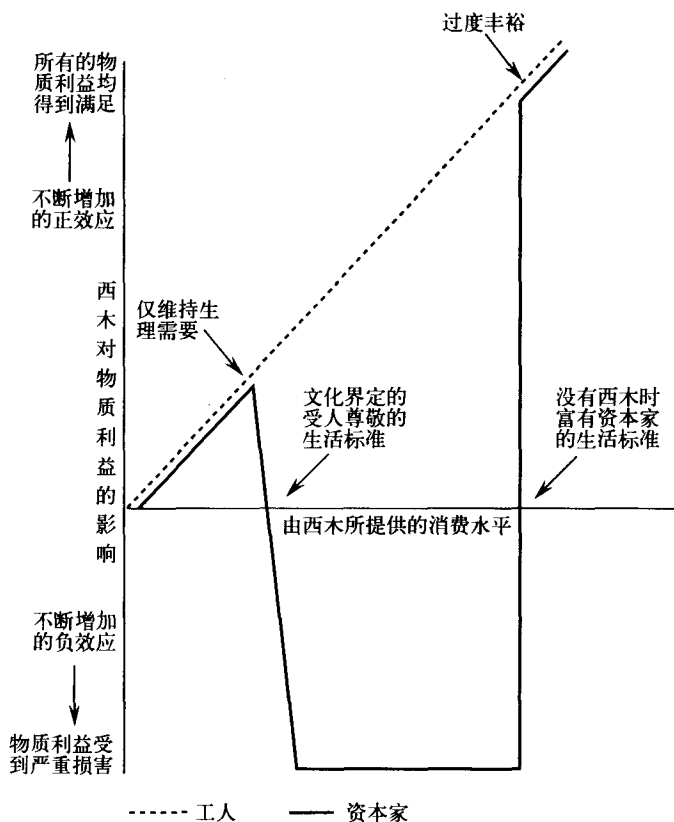


图1.1 不同能力的西木是怎样影响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

果工人生计的一部分来自市场之外，资本家就可付更低的工资。<sup>5</sup> 另一个极端是，如果西木提供过度丰裕的东西，满足着人类从最基本必需品到最昂贵的奢侈品每一种物质欲望，那么它们对资本家的物质利益也有正面的影响。然而，在这两极之间，西木对两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工人的福利随着西

木的大方程度的增长而不断地得到改善，而对于资本家，在超过了某一点后，他们的物质利益就会受到反面影响。一旦西木给人提供一个受人尊敬的生活标准，工人就不必为了能在可接受的标准上生活而去工作了。就像P.U.的经理惶恐地说道：“你意识到西木意味着什么吗？再也没有人需要努力工作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工人愿意为雇主去工作。工作除了简单地提供收入以外还满足着人们的多方需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西木提供的东西不过剩，许多人就会有超过西木所提供的水平的消费欲望。但是，家里拥有适度大方的西木的工人在讨价还价中将会处于有利得多的位置，想让他们，用P.U.的话来说，“去干我们罐头厂那长时间的、枯燥的、累断腰的活”将会更困难。<sup>6</sup>

由于西木对工人和资本家的物质利益的不同影响，这两个阶级中的人在有关西木命运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选择。考虑一下对适度大方的西木的四种可能分配：每个人得到一个西木；只有资本家得到西木；只有工人得到西木；西木被毁坏以至于没人得到它们。在假定工人和资本家都是理性的，并且只对他们自身的物质福利感兴趣的前提下，表1.1给出了对适度大方的西木的命运的选择次序。<sup>7</sup>他们因此既不是利他的也不是恶意的。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最先选择的是他们独自获得西木，因为显然，较之于没有西木，有西木将会使他们过得稍好些。他们的第二选择是没有人得到它们。他们宁愿西木被毁坏也不愿意让每个人得到一个。相反，对于工人而言，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每个人都得到西木。如果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有西木，工人的生活会稍微好一些，因为这意味着资本家将会有稍微多一些的资金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无须购买他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工人的第二选择是工人独自获得西木，他们的第三选择是只有

资本家获得西木，他们最不愿意的选择是西木被毁坏。

工人的选择序列符合公认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共同的阶级”思想的一个方法，如此而言，这个阶级的特定物质利益就等同于人类的利益。这个选择序列还与所谓的罗尔斯选择一致——即给予社会中生活境况最糟的人以最大福利。关于西木问题，至少工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符合罗尔斯公正原则的要求的。

表 1.1 不同阶级对西木命运的选择序列排列

序列	资本家阶级	工人阶级
1	只有资本家获得西木	每个人获得西木
2	破坏西木	只有工人获得西木
3	每个人得到西木	只有资本家获得西木
4	只有工人获得西木	毁坏西木

西木的故事所说明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对无产者的剥夺不只是简单的资本家追逐利润的一种不幸的副产品，而且是追逐利润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这就是所谓资本家的利润靠的是“剥削”这个宣言的意思。<sup>8</sup> 剥削阶级致力于阻止被剥削者获取维持生计的手段，像西木的故事中所说的那种情况，即使这种获得不是以从资本家那儿把财富和收入重新配置给工人的形式来进行的。说得直截了当些，资本主义产生了一套激励机制，这套激励机制使得资产阶级对破坏伊甸园很有兴趣。

虽然，现实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家不曾碰到来自西木的威胁这样的难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存在着一些事件，其中资本家面临的障碍就很像西木。自给自足的农民通过他们拥有肥沃土地的所有权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西木。虽然他们必须为生活去劳作，但他们无须为资本家工作。在有些地方，有些时



候，资本家运用审慎的策略以减少这些自给农民专门靠土地生活的能力，目的在于使他们加入劳动力大军。有这样一个鲜明例子，19世纪的南非利用货币化房屋税迫使自给自足的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在矿上工作以获得现金缴纳税款。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家的利益和那些甚至具有部分类似西木特征的社会制度安排是相对立的。于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这样一些事情形成对立，如普遍的有保证的基本收入，或是长时间非常低的失业率，甚至为这些提供支持税收，虽然这些税收的交纳完全来自工资以外资金，而不是直接从他们的口袋中掏出来的。<sup>9</sup>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产生了根本对立的思想。

## 1.2 剥削的概念

西木的故事是围绕着阶级分类、阶级利益和剥削之间的联系展开的。故事中有两个主要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不具备生产资料的工人。在如何通过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性资产(资本和劳动力)最有效地追求他们的物质利益方面，他们各自都面临着一套制约。西木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制约并对资本家的物质利益构成了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它损害了他们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能力。“剥削”于是便成为理解由阶级关系所导致的利益的特征的关键概念。

剥削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术语，因为它隐含着对特定的关系和实践活动的道德谴责，而不是简单的分析性描述。把一种社会关系描述为剥削性质的就是谴责它对被剥削者是有害和不公正的。虽然剥削的这道德性很重要，但是这个概念的核心仍是围绕着经济关系中行动者的一种特定类型的物质利益的

立性相互依赖，而不是如前面所阐述的这些关系的不公平。我将使用的这个术语——阶级剥削，是根据三个原则性标准所界定的：

- (1) 一群人的物质利益决定性地依赖于对另一群人的物质剥夺。
- (2) (1)中的因果关系含有不对称地排除被剥削者获得某些生产性资源之意。典型的情况是这种排除得到财产权力形式的强迫性支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也许不会得到强迫性支持。<sup>10</sup>
- (3) 这种把排除(2)转化成不同福利(1)的因果机制包括了那些控制了相关生产性资源的人们对被剥削者的劳动果实的占有。<sup>11</sup>

这是一套相当复杂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1)设立了物质利益的对立关系。前提条件(2)设定这种对立关系是根植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所处的方式。这条标准中“不对称的”这个表述意味着从可能的剥削领域中排除了“公平竞争”。前提条件(3)设立了相互依赖的、对立的物质利益得以产生的特殊机制。剥削者的福利依赖于被剥削者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对被剥削者的剥夺。<sup>12</sup>

如果只满足这些条件中的前两个，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可以称为“非剥削性经济压迫”，而不是“剥削”。在非剥削性经济压迫中不存在把被压迫者的劳动果实转移给压迫者的情况；压迫者的福利简单地依赖于对被压迫者获得某些资源的排除，而不依赖于他们的努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讨论的不平等问题都根植于所有权和对生产性资源的控制。

剥削和非剥削性压迫之间的关键不同之处是，在剥削关系中，剥削者需要被剥削者，因为剥削者依赖于被剥削者的努力。

在非剥削性压迫的情况下，如果被压迫者简单地消失了，那压迫者会因此而高兴。对于北美洲的欧洲殖民者而言，如果这个大陆不曾为人居住，生活会容易得多。<sup>13</sup>因而种族大屠杀对于非剥削性压迫者而言永远是一个潜在的策略。而这不是经济剥削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因为剥削者需要被剥削者的劳动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在文化上我们有种可憎的说法，即“惟一的好印第安人是死去的印第安人”，而不是“惟一的好工人是死去的工人”或者“惟一的好奴隶是死去的奴隶”。这种说法绝非偶然。说“惟一的好工人是顺从并且认真的工人”而不说“惟一的好工人是一个死了的工人”，这当中是有道理的。北美和南非的殖民者在对待本地人所使用的不同方式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差别：在北美，那里的本地人是被压迫（通过从所在土地上被强制性地驱逐出去）而不是被剥削，当出现抵抗时，种族灭绝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政策；在南非，那里的欧洲殖民人口严重依赖于非洲劳动力以获取繁荣，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灭绝就不会成为殖民者的一项选择。

因而，剥削不只是确定社会行动者的一套身份地位，而且是确定由一套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相互约束在一起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一种正在进行的互相作用的方式。这种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依赖赋予被剥削者一定形式的力量，因为人类至少总是保留着对他们自身努力支出的某种最低限度的控制。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以完全依靠镇压的方式对劳动力进行社会控制代价极高，并且经常无法让被剥削的一方发挥出最理想的勤劳和努力水平。结果是，剥削者迫于通常系统性的压力而不得不缓和他们的统治并且试图用某种方式引发被剥削者某种程度的满意，至少在争取他们最低程度的合作方面是这样的。也许有点矛盾，剥削于是就成了针对剥削者实践的一个约束力量。而

这种约束则构成了被剥削者力量的基础。

那些受压迫但不被剥削的人也有一些力量，但是这些力量一般是比较不稳定的。在最低程度上，被压迫的人们有来自人类身体抵制能力的力量。然而，由于他们的压迫者不因受到经济约束而寻求与他们的某种合作，这种抵制可能会很快升级为流血和暴力冲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土美洲人抵制把他们从领土上驱逐出去的行动导致了白种殖民者对本地美洲人的屠杀。非剥削性压迫者寻求和解的压力是非常弱的；于是冲突的结果便趋向于变成简单的敌对之间的暴力均衡。当被压迫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时，即使剥削者不会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他们对被剥削者的行为也会受到经济上的约束。

把剥削所产生的行动者的物质利益描述为对抗性的并不是预先判断这些对抗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公正或不公正的道德问题。例如，一个人会相信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自由进入美国在道义上是正当的，并且同时也承认在美国公民和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想成为第三世界移民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物质利益上的对抗性。同样，承认劳资冲突是包括根植于对劳动成果占有的对抗性物质利益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就是不公正的；它仅仅说明这些利润是在固有的冲突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宣称使用“剥削”这个词来表示物质利益的这个对抗性的相互依赖的形式是一个真正科学的、技术的选择是虚伪的。把对劳动成果的占有描述为“剥削”而不是简单的“转移”，因而对分析性需要，添加了尖锐的道德判断。例如，如果没有至少是些微的关于占有的道德地位的意思，要区分像合法税收和剥削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税收含有强制占有的意思，在许多情况下，税收权威机构和私人纳税者之间存在着有争议的物质利益冲突。即使是在高度的民主、平等的情况下，仍然有

许多人不自愿交税，而愿通过免费搭车来增加他们个人的物质利益。右翼自由派人士事实上确实把税收看做一种剥削形式，因为它是对私人财产权神圣性的一种侵犯，因而是一种不公正的、强制的占有。“税收是小偷”的格言就等于说“税收是剥削”。因此声称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成果的占有是剥削，意味着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仅仅只是存在着物质利益上的对抗，它还意味着这种占有是不公正的。

虽然我觉得那种给关于资本主义占有是不公正的观点提供基础的激进平等主义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道德案例，但是探讨这个观点的哲学论点会使我们远离此处的论题。<sup>14</sup> 不管怎样，为了达到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分析目的，关键的问题是承认依靠对劳动成果的占有而把阶级关系连在一起的物质利益的对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把它称之为“剥削”。

### 1.3 对把剥削作为剩余占有的注释

讨论至此，还丝毫未提到把剥削作为对“剩余”的占有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详尽阐述“剥削”这一概念的传统方式。这个思想有时专门指剩余劳动这个方面，有时指剩余价值，而有时只是简单地指剩余产品。不管采用这些表述中的哪一种，其思想都似乎相当简单。社会总产品可以被分成两大类：需要一部分用于重新生产那些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如工作的能力)、原材料、机器等等。另一部分就是“剩余”——超过生产成本以外的那部分社会产品总量。如果占有这个剩余的并非生产它的人，而是其他一群人，并且这种占有并非出自生产者的要求，那么这些生产者则一般被认为是“被剥削者”。

有关剩余生产和占有的辩论是讨论剥削的一个吸引人的话题。社会剩余的存在是与资本的积累紧密相连的，因而用剩余来描述剥削便把剥削和资本主义原动力的一个中心方面联结起来了。剩余的思想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物质特性，即对剩余的占有较之于对劳动成果的占有显得更加具体。

但是，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剩余”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么简单。基本的问题是弄清楚“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这个表述的含意，因为除非这个思想清楚了，否则“剩余”的概念就是模糊不清的。<sup>15</sup>应如何来界定这后一个概念呢？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简单地把劳动力的价值等同于人们经验性消费的任意价值（如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收入减去他们的存款）。然后“剩余”便是扣除了个人消费和劳动资料置换后所剩产品的价值。<sup>16</sup>然而这种方法排除了一些挣工资者会以高薪形式占有剩余并把所有的收入用于奢侈的生活方式上的可能性。凭直觉似乎有理由把一个年薪100万美元的首席执行官描述为一个剥削者，描述为占有那些工资中的剩余，不管这收入的一部分是否是从个人消费中省下来的。

可以选择把生产/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当做仅仅是“基本生存需要”的费用来对待，以某种文化上特有的标准来设定，而不是以所有经验性消费的费用来设定。这可能会因不同类型的人而异，因为有些类型的劳动力会需要较高的消费以便能被更有效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但是这个概念还是与经验性收入有区别。这第二个策略的优点在于没有消除在界定准许下高工资可以成为剥削来源的可能性。但是它的缺点是不再提供一个把“剩余”从劳动力的“成本”中区分出来的清楚的操作方法。如果把生存需要定义在仅是生物生存的水平上，那么它也许会有一个明确的意思，但是一旦生存需要被理解为“根据文化上特

有的标准而设定的基本生存需要”，那么这个概念似乎变成可以随意加以解释和专断的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反现实地界定“基本生存需要”。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出卖劳动力的人恰好都具有相同的、遗传的和社会—经济的禀赋。<sup>17</sup>就是说，他们都具有相同的学习和获得技术的能力，他们都拥有相同的经济资源，并且他们都面临着相同的社会条件。没有任何工人相对于其他工人从文化意义上或社会意义上缺少什么，他们都有平等的信用机会获得贷款来接受更高级的培训，并且在获得培训时不受任何制度限制。比如说，医学院将接收每一个合格的申请者(而反过来说，在假设人们禀赋相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取得这种资格)。在这些前提下，已知借贷的成本和从培训中所能希望获得的收入，人们会以他们想要付出的努力的总量为基础去选择要获取多少培训。结果是，劳动市场上职业间收入的不同只是简单地反映了获取技术和进行某一职业活动所支付的不同成本(包括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职业间收入的不同就不再具有任何在道德意义上令人反感的東西了。如果由于某类的劳动力供应短缺而发生某一职业的工资水平高出这些成本，那么更多的人会寻求相关的培训并且工资也会相应地下降。在这个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并且工人具有不受拘束的获得技能的能力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把“基本生存需要”定义为竞争性均衡工资率。<sup>18</sup>

当然，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而且正是由于这点，那些把所有职业的工资降到这样一个反现实水平的压力受到各种不同方式的阻碍。在有些情况中，就像美国的医疗职业，周密的制度机制限制着医生的供应。更为广泛的是，不平等的禀赋(社会的、经济的以及遗传上的)和信用获得上的限制意味着许

多工作的收入将不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成本相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剩余的一部分以较高的收入形式分配给了人们。<sup>19</sup>

由于以竞争决定生产成本的反现实概念来理解“剩余”思想的复杂性，我将一般地使用榨取和占有努力的词语来讨论剥削。这种构建概念的方式也突出了在剥削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生产和交换之间的联系。然而，就像讨论“技术剥削”一样，在许多地方使用剩余占有这一较为传统的用语更便利。因此，当我用这些用语来谈论剥削时，应以这种反现实的方式来理解剩余。

#### 1.4 阶级和剥削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分析中，阶级分类基本上是以财产关系和剥削之间的联系来界定的。奴隶主和奴隶构成阶级关系，因为他们特殊的财产关系(对人的财产权)导致了剥削(奴隶主对奴隶劳动果实的占有)。有房者与无家可归者虽然他们在住房财产权上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构成“阶级”，这是因为这种分类没有构成无家可归者被有房者剥削的根据。<sup>20</sup>

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在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权上的。这些财产权产生出三个基本阶级：资本家(剥削者)，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且雇佣工人；工人(被剥削者)，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并向资本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及小资产者(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并使用它们但不雇佣他人。<sup>21</sup> 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劳资关系如何导致剥削的阐述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无所有的工人为了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向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出卖他们的劳动力。<sup>22</sup> 在这一交换关系中，工人为了挣得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工资同意工作一定长



度的时间。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资本家能够强迫工人生产比他们向工人提供维持生计所需要的物品更多的产品。结果是，工人生产出了剩余，而这些剩余归资本家所有并以利润形式出现。利润，即扣除了生产和再生产所有的投入(包括劳动力投入和物质投入)的成本之后所剩下来的社会产品的价值，构成对工人劳动果实的一种占有。

说这种关系是剥削指出了在雇佣关系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固有冲突的根据。它指出这么一个关键事实，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不是简单地存在于工资水平上，而且存在于为了获得这些工资所达到的工作努力程度。资本家总是要工人付出比工人所愿意提供的更多的努力。就像鲍尔斯和金蒂斯所论的那样，工人“在工作时轻快地吹着口哨”这种努力程度永远不会让资本家满意，于是资本家必须采用各种不同的监督和控制策略来提高工人的劳动努力水平。虽然由这些关系所导致的公开冲突程度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上会有所不同，并且在劳动者和经理间发生高水平合作的地方存在着阶级妥协，但是，只要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剥削的，那么这种基本的物质利益对抗就仍将存在。

对于有些理论和经验目的而言，这个简单的阶级结构的印象就足够了。比如说，如果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封建制度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结构之间的基本不同点，那么完全围绕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就够了。但是，对于我们要用阶级分析进行研究的大量事情而言，我们需要一套更为精细的分类。特别是，我们需要允许我们进行下面两类分析的概念：第一类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上的差异分析，第二类是对个人生活受他们在阶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的方式的分析。如果我们想用一种精雕

细刻的方式来探索宏观的差异，那么我们需要第一类分析；如果我们想在微观分析中有效利用阶级的概念，那么我们需要第二类分析。<sup>23</sup>

这两项任务都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概念细化的问题，而这就超出了资本家和工人两极化的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讲，这涉及对阶级结构分析中两个一般问题的解决：第一个是如何在阶级结构中给“中产阶级”定位的问题，第二个是如何在阶级结构中给那些不属于有酬劳动力的人定位的问题。<sup>24</sup>

### 1.5 雇员中的“中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结构分析局限于拥有生产资料和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来结束分析。在这种阶级结构中只有三个位置：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资料但不雇佣工人的人)，并且在这种阶级结构中，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85%~95%的人口属于一个单独的阶级。虽然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深刻真理：即绝大多数人口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劳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是这个真理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概念性框架以解释我们需要用阶级来帮助解释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如果我们需要用阶级结构帮助解释阶级意识、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这些概念时，我们就需要理解雇员人口中与阶级相关的分类的某些方法。

通俗地说，这是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问题。“中产阶级”是指那些自己不拥有生产资料，在劳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看起来却不像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人。这样，问题便成

了我们根据什么才可以把那些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处于共同的普通非所有者位置的人在阶级位置上加以区分。在本书的分析中，我将沿着两种维度对雇员阶级进行分类：第一是他们在生产中与权力的关系，第二是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专长。<sup>25</sup>

## 权 力

把权力看做是雇员中阶级关系的一个维度有两个理论基础。第一个理论基础涉及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的统治职能。为了确保工人能足够努力地工作，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包含一套统治机构，其中有监督、正面或反面的规则以及不同形式的等级制度。资本家并非只是简单地拥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他们还在生产中统治着工人。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只要经理和监督者参与了生产中统治的实践活动，他们就可以被看做是在代理行使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被看做是同时处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从他们统治着工人这点来看，他们像资本家；从他们受资本家控制并且在生产中受剥削这点来看，他们像工人。因而他们处于我称之为阶级关系中的矛盾位置上。在表达中之所以用“矛盾”这个词而不是简单地用“双重”是因为经理工作所包含的阶级利益兼备资本和劳动力二者的固有的对抗性利益。一个人在权力等级制度中所达到的位置越高，在这个阶级位置中资本家利益的分量就越大。因而，较高层经理、特别是大公司的总经理是非常紧密地和资产阶级相连的，而较低层的监督工作的阶级特征就更接近于工人阶级的特征。

把权力维度当做在员工中区分阶级定位的标准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是集中在他们的收入和对剩余占有之间的关系上。经理

在生产组织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得他们能够以相对高的收入这种形式大量占有有一部分社会剩余（在前面所讨论的反事实方式中已经界定过）。<sup>26</sup>事实上，这意味着管理性劳动力的工资或薪金是高于生产或再生产出这种劳动力的成本的（包括他们可能具有的任何技术）。

这种赖以实现占有的特殊机制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忠诚租金”。经理以一种有效、负责的方式行使他们的权力是资本家的公司盈利的重要因素。困难之处是，一般来说对于诱导这种行为，高度的监督和威胁并不是一种有效策略，这既是因为一般来说管理行为难以被监督，又因为压制性控制倾向于导致削弱创造精神而不是刺激创造性活动的出现。这样，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方法，它能激发出经理方对组织目标某种程度的真正的承诺。这可以通过与权力等级制度里的职业和升迁阶梯相联系的相对高的收入来达到。这较高的工资中包含了为了培养经理对组织的忠诚而再分配给他们的一部分社会剩余。当然这背后还存在反面的规则：有时候经理会被解雇，他们会因不良的表现受到不能升迁或加薪这样的惩罚，等等。但是这些强制形式的控制之所以能生效是由于它们是与获取明显高于培训这些经理，特别是较高层经理的技能成本的收入的强烈引诱相联系的。<sup>27</sup>因而经理不仅通过统治方式占据着阶级关系里的矛盾位置，他们还占据着可被称之为剥削关系里的特权占有位置。而正是这两方面把他们从工人阶级中区分出来了。

### 技术和专长

区分雇员阶级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技术和专长的拥有。像经理一样，那些拥有高水平技术 / 专长的雇员在剥削关系中

潜在地处于一特权占有位置上。这种情况出现在下面两个基础机制的作用中。第一，在劳动市场中技术和专长经常是稀有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供应短缺，而且还因为在增加这些技术供给以满足雇佣组织需求方面存在着系统障碍。这些障碍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证书，但是罕见的才能也是构成某一特别形式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受限的一个因素。<sup>28</sup>这种供给限制所产生的结果是，这些稀有技术的所有者能获得高于生产或再生产他们劳动力成本的工资。这种“技术租金”是雇员能够占有部分社会剩余的一种方式。

第二，对知识和技术的控制也经常造成监督和控制技术工人劳动努力程度的困难。这些雇员对知识的有效控制意味着，为了取得高水平技术和专长的雇员的合作和努力，在某种范围里雇主必须依赖忠诚推进机制，就像他们在对待经理的情况中所做的那样。因此，由于他们在生产组织中的战略地位(作为知识的控制者)和他们在劳动市场组织中的战略地位(作为一稀缺劳动力的控制者)，那些拥有高水平专长的雇员能够占有剩余。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拥有技术和专长在阶级关系中界定出了一块与众不同的位置，因为其中拥有授予雇员一种特殊类型的力量。还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像布迪厄(1984)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把专长、技术和知识与不同形式的“象征性资本”及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虽然这些阶级的文化关联物对种种社会学问题可能具有相当重要的解释力，但是在唯物主义阶级分析中它们不构成把技术和专长看做阶级定位的一个维度的实质性理论基础(除非象征性资本在获得技术和证书中发挥作用)。这个理论基础依赖于专家像经理那样在剥削关系中占据一个把他们从普通工人中区分出来的特权占有位置这一前提主张。

在这本书中，我将频繁地成对使用“技术和专长”。“技术”这个词本身有时只是简单地指手工技术，而不是指那些相对于“无经验”或未开发的劳动力而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增值了的或复杂的劳动力。这种增值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认识上的。它有可能为参与各种环境的工作提供极大的灵活性，它也有可能是高度专业化且容易过时的。增值了的劳动力常常用某种官方证书形式从法律上给予证明，但在有些环境下，没有这类证书，技术和专长也能有效发挥作用。重要的理论观念是技术和专长标志着包含在人们劳动力中的资产，而这种资产提高了他们在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中的力量。

### 中产阶级的阶级位置分布图

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这一根本维度中加入权力等级制中的地位及所拥有的稀缺技术和专长，便产生了图1.2所示的阶级位置分布图。根据我们特定的经验性目标进行适当的修正，我们就有了构成本书调查研究基础的基本图解。要着重强调的是，这是一幅阶级位置分布图。分类中的单元不是“阶级”本身，而是阶级关系里的位置。其中有些在阶级关系中处于矛盾的位置，另外一些在剥削关系中处于特权占有位置，还有一些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处于两极的位置。为了方便起见，两极位置——在资本主义中的“资本家”和“工人”——经常被叫做“阶级”，但是更为精确的术语是把它们描述为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基本位置。因而这种分类并不是要提出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六阶级模式，而是一个在阶级关系中区分出六个位置的阶级结构矩阵。

在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些经验分析中，我们将把这种分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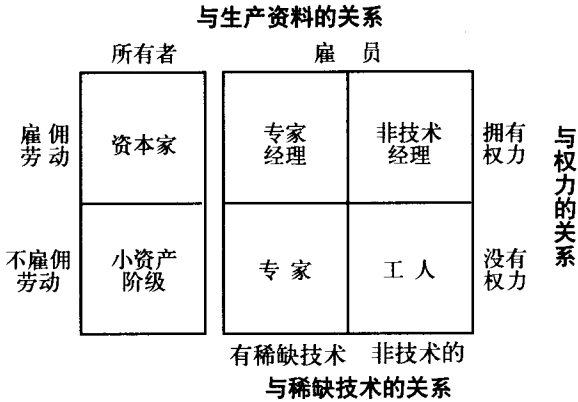


图1.2 基本的阶级分类

的一些位置合并，以便有代表性地产生一种四大类的分法，包括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雇员中的矛盾位置和特权占有位置)位置和工人。在其他分析中，我们将通过在每一维度上添加中间类型来修正这种分类。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一维度上，要对大资本家、只拥有少量雇员的小雇主以及小资产阶级(那些没有任何雇员的自我雇佣者)做出区别。权力维度要区分正规的管理者(那些参与公司决策的人)和纯粹的监督者(那些只对下级拥有权力但不参与决策的人)。最后，技术这一维度要对那些典型地要求具有高等院校学位的职业和其他只要求有较低的专门训练的技术职业作出区分。其结果就是图 1.3 所示的 12 个位置的阶级结构矩阵。

在某些方面，这种对经理和专家的阶级位置的区分进行详细说明的方式在某些方面很像戈德西尔帕(1982)对“服务阶级”这个概念的处理。戈德西尔帕勾画出了以下两类雇佣关系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特征；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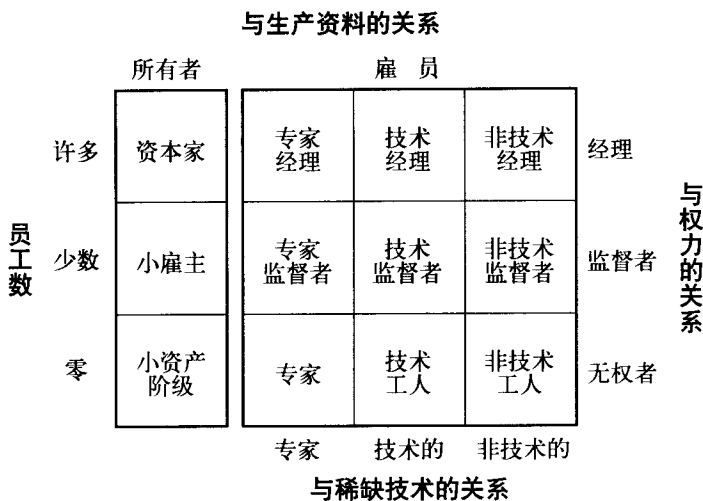


图1.3 细化了的阶级分类

是以他所谓的“服务关系”为基础，以经理和专家为特征。在后者，雇员进入到职业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投入工作，并且他们可期望以一些有意义的方式获得回报，而不是简单地获得所付出的劳动的酬金。戈德西尔帕认为：这种服务关系“有可能出现在那种要求雇员代表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行使代理权力或专门知识、专长的地方。这种情况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表现与其说是取决于外部规则的有效性，还不如说是取决于他们对公司道德的认同程度”（戈德西尔帕和埃里克逊 1993： 42）。由于他们在组织中所具有的战略力量，这个特征是与部分通过含在中产阶级雇员收入中的忠诚租金的支付来换取他们的合作这一观念紧密联系的。戈德西尔帕的概念分析和这里所采用的分析之间的主要不同点是：第一，戈德西尔帕没有把他的服务阶级工作的分析与剥削及对抗性利益问题联系起来；第二，



他只是简单地用责任的提高而不是用统治这种方式来处理经理职位的权力维度。尽管如此，戈德西尔帕对阶级结构的概念处理与本书采用的经理和专家位置这种概念处理在许多共同的相互联系的特征上仍是相通的。

## 1.6 不属于有酬劳动力的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并不进行有酬劳动工作。最明显的例子是孩子。应如何在阶级结构里给孩子们定位？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种类：退休人员、永久性的残疾人员、学生、靠福利为生的人、失业者和全职家庭主妇。<sup>29</sup> 这当中的每一类人都构成阶级结构分析的专门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近似地把这一系列不同情况分成两大类：那些通过家庭关系与阶级结构联在一起的人们，和那些不是通过家庭关系和阶级结构联在一起的人们。一个人要在阶级结构中处于某一“位置”就意味着通过他与剥削过程关系来形成他的物质利益。阶级结构产生这类与剥削相联系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工作，就是那种我们已做了诸多探索的阶级位置。我将把这些归为直接的阶级位置。但是还存在着把人们的生活与剥削过程相联系的其他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家庭结构和亲戚关系把一个人的物质利益与剥削过程联系起来的方式。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本家家庭则通过家庭关系把孩子与资本家阶级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那么，说这个孩子是“属于”资产阶级便有其意义。如果这个孩子，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但是注定能继承资本家的百万财产且能依靠家庭资源满足种种需要，那么这个人将同时处在两个阶级位置上：从他与家庭的联系方面看，他属于资产阶级；而从他的工作方面看，他属于

工人阶级。

我将称这些情况为间接的阶级位置。家庭纽带也许是间接的阶级位置最重要的依据，但是某类社团的会员资格或与国家的关系也能提供这种联系。每一种情节中所要问的却是“一个人生活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把他(或她)与各种剥削机制联系起来并因此而形成他(或她)的物质利益?”当然，许多人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阶级位置。这点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夫妻都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家庭尤为重要，因为这产生了丈夫和妻子将拥有不同的直接阶级位置的可能性，并且因此他们各自都将有不同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对这类“阶级交叉的家庭”的理解是第十章的核心问题。

然而，对有些人，家庭纽带最多只提供了与阶级结构极其脆弱的联系。最显著地就是许多处于所谓的“底层阶级”的人的情况。这种表述在当代政策讨论中以各种方式被使用。有时候，它表示的是一个颇有点儿像马克思主义的“流氓无产者”这个老概念的有轻蔑含义的词。另外一些时候，它被更具描述性地用来表示这么一部分穷人，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格外恶劣并且他们的前景尤其黯淡。根据本章分析的思想方法，赋予这个概念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地位的方法是把它与剥削和压迫这些概念联系起来：一个“底层阶级”可以定义为一类社会力量，这类人在经济上被压迫，但他们在一给定的阶级系统中并不是持续被剥削的。<sup>30</sup>

不同类型的阶级结构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底层阶级”。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和人类历史的许多时候，界定下层阶级的关键资源是土地。地主、农业资本家、农民和被剥削的农业生产者都能接触到土地；那些被排除在这种接触之外的人们便构成了农业社会的底层阶级。从这个意义上看，19世纪当许多本土

美国人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到保留地时，便转变成了底层阶级。

在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中，界定底层阶级这个范畴的关键方法是劳动力本身。可能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奇怪的提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至少从废除奴隶制以来，每个人按理都应拥有一“单位”的劳动力——他或她自己。要点是有些人事实上并不拥有生产性的可售劳动力。这一境况类似于一个拥有过时机器的资本家。虽然资本家从物质上控制着这些机器设备，但是，如果它们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以有利可图的方式被调度使用，那么它们就不再成为“资本”——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性资产了。就生产力而言，一个人可能在身体上控制着他或她自身的劳动能力，但是，如果这不能被生产性地调度使用，那么这种能力在资本主义中就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了。这是“底层阶级”中的人的实质情况。他们之所以被压迫是由于他们不能获得各种类型的生产资源，首先是不能获取技术所必需的手段，而这些技术又是让他们的劳动力变得可出售所需要的。结果是，他们并不是一直被剥削的。<sup>31</sup>

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底层阶级就是由那些从资本主义逻辑观的角度看大可以牺牲的人构成的。就像对待那些19世纪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底层阶级的本土美国人那样，镇压而非合作是直接针对他们的主要社会控制模式。资本主义不需要城市里失业青年这些劳动力。如果这些人简单地消失不见了，美国社会中那部分富人和那些特权人员的物质利益将会变得更好。然而，和19世纪不同的是，现有的道德和政治力量使得直接的种族灭绝不再是一个可行策略了。那么，剩下的选择便是建立起监狱并用警戒线围住下层阶级生活的城区。

## 1.7 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比较

作为一套经验性分类，我们也能在韦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找出图 1.2 和图 1.3 所示的阶级结构矩阵。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韦伯学说的阶级分析的中心，并且两个框架经适当调整都可包容着我所使用的分类排列。确实，提议中心的阶级结构概念与大量韦伯的元素相结合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论点，因为，明确地把技术归为阶级划分的一个标准及赋予经理和拥有资格证书的专家的收入特权以重要意义，是韦伯主义阶级分析的标志。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讲，本书中经验分类可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阶级分析中传统分类的一种杂交。<sup>32</sup>那么，从何种意义上看这个阶级结构分析保留着“马克思主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传统学说中有关阶级概念的理论基础作一比较。<sup>33</sup>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的对比曾是社会学理论历史中可作为一门学科的一个宏大主题。大多数研究生院的课程中有一门社会学理论课，在这课中马克思和韦伯的对比是一个中心主题。然而，在阶级分析中，把马克思和韦伯放在对立的两极上的做法有点误导，因为当韦伯谈论阶级时，他以许多方式发表他那极其马克思的论调。这两条思想河流中的阶级概念共享着大量重要特征：

● 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探讨都不同于称作简单分层的阶级概念，在简单分层的阶级概念中阶级根据生活物质条件的不平等加以严格区分。<sup>34</sup>阶级的这种概念处理赞同流行论文和大众媒体中出现的大路货：上层阶级、中上层阶级、中层阶级、

中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底层阶级。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都理性地定义了阶级，即一定的阶级位置是依据那些使它与其他阶级位置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而界定的。

● 两种传统都认为阶级概念是符合人和经济资产或资源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关系称为生产资料；韦伯主义者把它叫做“市场能力”。但他们俩所谈论的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经验现象。

● 两种传统都认为阶级的因果关联运作是通过(至少部分地)影响行动者的物质利益而奏效。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解释了社会行动，因为这些财产权影响了人们在追求他们的物质福利时所面对的战略选择。人们的所有制约着他们能做什么以获得他们的欲求。的确，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通过最显著地施于个人之上的约束这个事实而更加强调这些“物质利益”的客观特征，而韦伯主义者倾向于通过强调在人之所欲的相对偶然性而关注主观条件。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的核心思想上，两个阶级概念都包含着(1)相对资源的社会关系和(2)物质利益之间通过(3)资源影响取得收入策略的方式形成的因果联系。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何处呢？把两个理论传统中的每一个所喜欢使用的常用语拿来作比较就能捕捉住关键的不同点：韦伯主义者的常用语是生活机会，而马克思主义者的常用语是剥削。生产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比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中更重要，是因为它对剥削问题有显著意义；而韦伯主义者之所以更强调市场是因为它是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生活机会。

生活机会理念背后的直觉是简单明了的。“在我们的术语中”，韦伯(见葛斯和米尔斯 1985: 181 ~ 182)写道：

“阶级”不是社团；它们仅仅代表着社会活动可能的，并且是经常的基础。当出现下面情况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阶级”：(1)若干人共同拥有一个特殊的生活机会决定成分，只要(2)这个成分由于拥有那些取得收入的物品和机会带来的经济利益才会出现，并且(3)是在商品或劳动市场条件下才会出现。[这几点都指的是“阶级处境”，我们可以更简洁地把它表述为获取供应物品、外部生存条件和生活经历的典型机会，只要这机会是取决于所拥有（或是缺乏）的特定经济秩序下为了取得收入而处置物品和技术的权力种类和数量。“阶级”这个词是指任意一群有着相同阶级处境的人]……但这永远是阶级概念的一般内涵：市场机会是一个向个人命运呈现共同条件的决定时刻。“阶级处境”从这个含义上看，其实是“市场处境”。

简而言之，你所拥有的资源种类和数量影响你在市场交换中取得收入的机会。“机会”描述的是个人面临的可行性方向，即采取行动时面对的选择。拥有生产资料的人的选择是不同于拥有资格证书的人的选择，而这二者都不同于简单的非技术劳动力的选择。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能否获取市场衍生出的收入影响着一个人及其子女的生活经历及机会。因而以父母市场能力为基础的孩子生活机会的研究便构成了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日程统一的组成部分。

因此，用韦伯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与不同经济资源的联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这种联系赋予他们不同的经济机会和劣势并因而决定着他们物质利益的方式。表示这一理论的简单方法是检验不同阶级的人们所面对的收入—闲暇选择，如图1.4所示的那样。在这个图中，每个人都面对一些闲暇和收入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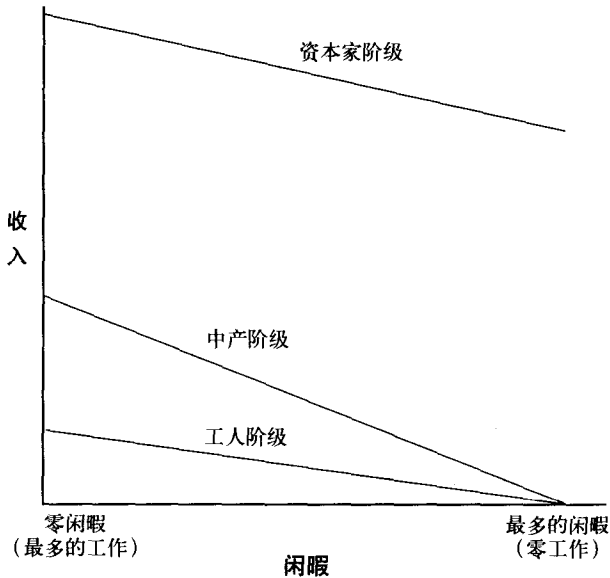


图1.4 不同经济阶级中的人所面对的闲暇—消费的权衡图

选择：闲暇越少，收入越多。<sup>35</sup> 然而，那些有产阶级，无须工作却拥有高收入是有可能的(因而有着“闲暇阶级”或“无所事事的富人”这种表述)，但是在这个典型描绘中，对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零工作对应着零收入。中产阶级在市场上比工人有“更多”的机会(生活机会)，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曲线斜度更陡些(如工资率)。事实上有些工人真的比一些中产者有着更高的生活标准，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仍较无吸引力。这样，这些共有的选择便是某一个阶级成员中潜在利益共有的根据，因而也就构成了潜在的共同行动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人们与经济资源的关系的特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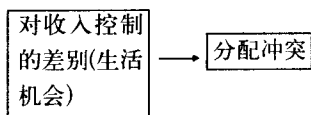
“剥削”，而这一特征是阶级分析的核心。“剥削”和“生活机会”都确认由于获得各种资源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因而，这两个概念都指出了资产自身分配的利益冲突。剥削在这点上增添的是这样一个断言，即宣称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不只是简单地由人们所拥有的东西导致的，而且是由人们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所做的事导致的。<sup>36</sup> 因此，剥削这个概念，把我们注意力指向了生产内部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市场上的冲突。

图 1.5 归纳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的对比。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围绕着通过市场交换而起作用的单一因果关系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包含了韦伯主义的因果过程，但是在这之上加入了生产本身的因果结构和对解释生产和交换相互作用的描述。比如，我们对经理阶级位置的部分分析关注的便是经理通过他们在生产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而获得的“忠诚租金”。这反映了生产关系中，而不是简单市场关系中的位置影响经理的“生活机会”这种方式。我们对西木的分析——并且更广义地说，对福利国家转移支付影响工人市场能力的方式这类事的分析——说明了市场能力是如何影响生产中劳动努力的压榨？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些相互作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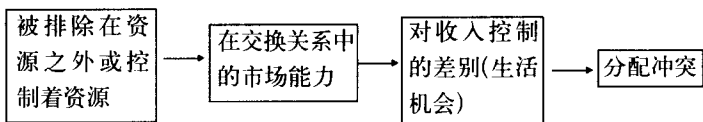
韦伯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韦伯主义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生活机会的理念丝毫不妨碍对生产中存在的劳动努力的压榨这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个好的、精细的韦伯主义阶级分析者一定会把对交换关系中市场能力的分析与劳动过程中力量对比关系联系起来，并由此去探讨处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心部分的因果结构。然而，在以这种方式把生产和交换系统联系起来的情况下，韦伯主义的概念实际上已马克思主义化了。弗兰克·帕金(1979: 25)以其出名的嘲讽口气说道：“在每一个新马克思



I. 简单分层阶级分析



II. 韦伯主义阶级分析



III.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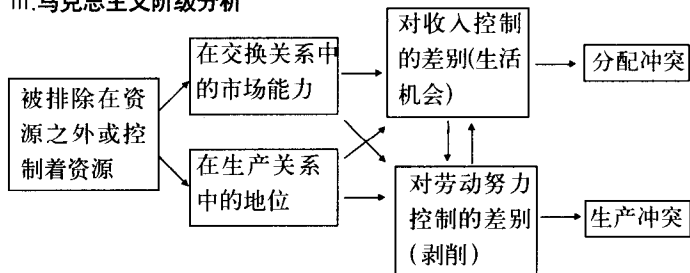


图 1.5 阶级分析三模式

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呼之欲出的韦伯主义者。”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在每一个左派韦伯主义者那里似乎都有一个躲躲藏藏的马克思主义者。

之所以要明确地把阶级概念建立在剥削而不是那仅以市场为基础的生活机会的基础上，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概念证实了生产和交换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偶然相关这个事实。资本家和工人的物质利益是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本质决定的。这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理解方法，即经理的阶级位置不仅由他们在经理类劳动力市场上的位置而且由他们也是在生产统治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更为广义地讲，以剥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这么一个事实，即阶级关系是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特权。

第二，把与阶级相连的利益在固有对抗性和相互依赖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化促进了对社会冲突的分析。对冲突进行解释要求至少具备下列两个元素：对冲突中对方利益危若累卵的解释说明，以及对行动者追逐这些利益的能力的解释说明。简单的利益对立不足以解释群体间能动的冲突。剥削之所以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恰恰是因为它把关于对方利益的解释说明与存在着基本抵制能力的解释说明结合在一起了。剥削者对限制被剥削者的生活机会，不仅有绝对的兴趣，而且为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对被剥削者是依赖的。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这种依赖性赋予被剥削者一种固有的抵制能力。因此，剥削不只预示着利益对立，而且预示着在两个阶级间明显冲突的利益对抗趋势。当阶级被严格地以市场关系来定义时，对被剥削者固有力量的理解便成为次要的了。

最后，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分析表示阶级可以存在于无市场社会中，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却明确地把阶级关联限定于市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言，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或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因为它们都含有与生产力中财产权相联系的剥削。<sup>37</sup> 统制经济中的官僚剥削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做是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因为，国家官僚精英占有剩余的能力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生产性资源的有效控制的基础上(赖特1994: 第六章)。对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而言，这些都不是阶级关系，而只是社会等级、社会阶层或一些其他形

式的权力不平等例子，因为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奴、官僚占有者和生产者在“生活机会”上的不同并不是他们在市场上相遇的结果。因此，韦伯主义的把阶级概念局限于市场社会的做法，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不同形态的社会系统中这些关系的基础性共同点上转移开了。

当然，不存在什么社会学的超理论原则要求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在这构成阶级分析基础的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把剥削看做是对阶级结构主要划分的界定，以及把有区别的市场能力看做是对阶级中显著阶层的界定，就完全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之间构筑一个折中的混合物。资产阶级里的阶层可以通过有差别性的占有剩余能力来界定；工人阶级里的阶层可以由不同市场能力所导致收入和工作条件的不同来决定。在这样一个混合的阶级分析中，把我曾称作为“中产阶级”的这些人描述为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会恰当些。

我还将在本书中阐述我们要在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内所要使用的阶级结构模式。最后，做出这个决定而不是采取一个较为折中的立场的原因至少部分是由于政治上的认同，而不只是无偏见的科学原则。这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一纯粹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是严格受激进的平等主义价值观支配的。我对研究框架的选择也是基于我对本探讨的理论连贯性信念——这点我在本书中已做过辩论——以及我对这个框架阐明经验问题的能力的信念，这点我希望在本书的剩下部分中加以说明。但是这种选择还与信奉社会主义传统以及希望以一个解放的、平等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抱负有决定性的联系。

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持高度怀疑的读者将会觉得努力弄清本书剩下部分的一大堆数字、图表以及方

程式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用于分类的概念的公正性存在着无可挽回的缺陷，人们就会认为用这些分类得出的经验结果也就毫无价值。我想这是个错误。这些经验分类其本身是可以韦伯式或混合的形式来阐明的。实际上，作为一套实践性操作分类，本书所用的阶级结构模式与戈德西尔帕(1980)、艾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93)所用的阶级分类法并无太大差别。经验的分析分类并非完全取决于产生或解释这种分类的理论框架，这种情况在社会学中是很常见的。这意味着那些坚决不信通过剥削可以理解阶级的方法的读者仍可以把本书的经验研究当做那种在市场上生活机会处境有差别的阶级的调查研究来读。

## 1.8 本书经验研究的议程

广义地说，本书的经验研究探讨三个阶级分析中互相联系的问题：(1)阶级结构本身的特征和变化；(2)阶级和作为社会结构方面的性别之间的关系；(3)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各方面之间的联系。

### 阶级结构

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研究关注的都是阶级结构分析自身不同问题。通过展示若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总体面貌的基本描述性数据，第二章为本书剩下部分设立了一个舞台背景。在这里我们对有关这些不同国家间差异的特定假设检验没有太大兴趣，而对详细描述国家间差异的不同方面更感兴趣。结果是，本章在理论上不如后面的那些经验性研究的章节令人感兴趣。

第三章考察1960年到1990年之间美国阶级结构分布变化，并把这些变化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归因于经济部门之内的阶级分布变化，一部分归因于经济部门之间的人们分布变化。基本结果是相当惊人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有轻微的扩大，但从那以后一直在加速下降，尤其因为各部门内部的工人阶级人数在下降。监督者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增多，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缓和，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下降了。反之，经理、专家以及专家经理人数在这整个时期都增多了。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阶级的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不论是在各部门内还是在各部门之间都下降了，但是那以后的变化轨迹就更复杂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小资产阶级有相当规模的扩大而小雇主阶级却几乎是一点儿也不变。虽然我们的数据资料无法让我们检验对这些变化可供选择的解释，但我把技术变化和竞争加剧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长期经济停滞这种结果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尝试性解释。

第四章比较详细具体地考察第三章的一个趋势，即自我雇佣人员先下降后稳定扩大的趋势。对此我提供两个不同的数据分析策略：第一，自我雇佣率年度变化的时间序列分析，在这当中我们检验自我雇佣的变化是否能归因于失业率的变化；第二，对自我雇佣不同部门变化方式的考察，其中我们用资料证明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自我雇佣高潮是整个经济的一大趋势，而不仅仅只在服务部门中出现。

第二编探讨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4个国家阶级边界渗透的程度。阶级结构不仅在各阶级位置上人们的分布方面不同，而且在人们生活狭窄地局限于某一特定阶级位置还是有着跨越阶级边界的社会联系和经历程度方面也是不同的。第五章展示了研究这些边界渗透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接着的章节考

察三种渗透：代与代之间流动性的阶级边界渗透(第六章)，友谊的边界渗透(第七章)，以及阶级之间联姻的边界渗透(第八章)。这项研究的主要精华在于，对所有4个国家的这些渗透形式的每一种而言，权力边界是最具渗透性的，并且一般来说，财产边界的渗透性是最小的。可能稍微过于简单了点。

### 阶级和性别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阶级分析的主要挑战之一来自女性主义学者，她们一直认为性别是社会理论和研究中一个主要解释原则。许多女性主义者一直对“阶级首位”这个经常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提法感到特别不满(虽然事实上极少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地把阶级首位作为一个普遍原则来捍卫)。

在较近的几年里，随着大多数人认识到支持那些关于“首位”是社会解释中特别决定要素的包罗万象的抽象主张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在关于阶级和性别这个问题上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中止。首位性只有在作为特定解释项时才是一个可控问题。既然这样，去探讨不同因果过程的相互作用形式比去关注哪一个“更重要”经常会有更多收获。<sup>38</sup>较之于寻求阶级分析比性别分析(或者相反)具有任何超理论的优越性，去理解阶级和性别在特定解释问题中的相互联系才是更为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某些流派之间的对话构成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的阶级和性别的分析背景。第九章为阶级和性别的概念处理进行了辩护，其中二者都被当做分析过程中有区别的两种关系来对待的，这两种关系在社会的不同场合中相互作用。接着，这一章通过对相互作用而发生的五种不同形式这一范围的讨论而架构经验性研究议程。

第十章考察已婚妇女阶级位置的概念性和经验性问题。在第八章，我们探讨了阶级之间联姻的阶级边界渗透问题，家庭的阶级特征是以丈夫和妻子双方的个人工作阶级来确定的。一些学者曾对这种理解劳动力中已婚妇女的阶级位置的方式提出挑战。他们认为，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占据着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因而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必须处在同一个阶级位置上。由于丈夫工作的阶级特征几乎是决定性地左右着家庭的阶级利益，那么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有着有酬工作的已婚妇女在内，都应被看做是处于丈夫所在的阶级中。这一章探讨了这种辩论的概念基础以及其他不同的概念处理，然后提出对这些备选项进行经验比较的策略。

第十一章考察一个在性别研究中相当重要的解释问题：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许多女权主义者辩论道，家庭里的劳动的性别分工在生产或再生产出整个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处于十分核心的地位。在这章我们考察瑞典和美国的家庭阶级构成与丈夫所做的家务数量之间的关系。结果相当简单：在两个国家中，阶级几乎不影响丈夫干家务的表现。

第十二章探讨阶级结构中性别分布的一个特定方面——男子和妇女在工作场所中拥有权力的机会差别。男子在工作场所中更有可能拥有权力，这几乎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本章我们所要探讨的是，第一，权力上的这种“性别缺口”在国家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第二，这种性别缺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男子和妇女的一系列个人特征（即工作经验、年龄、教育、非全日制就业、部门、职业，以及其他一些变量）加以解释说明；第三，在多大程度上可证明在权力等级制度中存在“玻璃天花板”（如权力的性别缺口随着一个人在等级制度的位置上升而增大）。第一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实

质性的差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性别缺口最小，其次是加拿大和英国，然后是分析中的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和瑞典，最后是日本，日本是所有这些国家中有着最大的权力性别缺口的国家。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权力的性别缺口或不同国家在缺口上的不同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可由男子和妇女个人特征的分布加以解释。因而缺口看来主要是由于在雇佣中的直接歧视而造成的。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玻璃天花板，至少在进入中层权力层时是这样的。

### 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研究阶级结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在解释阶级分析其他元素中的重要性，特别是阶级形成、阶级意识以及阶级斗争。第十三章列出这些阶级分析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模式。比较具体地说，这章试图澄清阶级分析微观和宏观层次之间的关系。这包括首先用一般的超理论的方式讨论微观和宏观分析之间的区别，然后详尽阐述了一个关于阶级位置、个人阶级实践和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微观模型，以及一个关于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成之间关系的宏观模型。

第十四章运用第十三章的框架研究美国、瑞典和日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这三个国家在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构成”的方式方面形成强烈的对比。瑞典拥有一个相对庞大的、与众不同的处于工人阶级联盟和资产阶级联盟之间的中产阶级联盟，从而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状态处在这两者之间。意识形态差别在阶级结构矩阵的财产维度上是最明显的，但在权力和技术维度上也是系统的并且明显的。在美国资产阶级联



盟更广泛得多地渗入到雇员阶级位置，并且较之于瑞典总的阶级构成方式在意识形态上较少分极化，但是这两个国家阶级结构矩阵中的意识形态差别还是较小的。日本的型式就大不相同：分极程度不论比美国还是瑞典都要弱得多，并且在雇员中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主要是发生在技术——专长这一维度上，而不是权力维度。

第十五章考察国家部门的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问题。国家部门给阶级分析带来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因为国家部门内部的阶级关系不是直接建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部门应分两个亚部门：第一，刚刚开始的后资本主义的、统制的生产模式；第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超结构机构。接着，这章探讨瑞典和美国私有部门和这两个国家亚部门中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

最后，第十六章考察瑞典和美国阶级位置、阶级记录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下面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阶级身份和我称之为阶级利益意识的东西。前者我描述为意识的后顾方面，因为身份根源于一个人的全部记录。而利益意识，则是前瞻方面，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未来的期望。这导致了特殊的论断，即较之于跟他当前的阶级位置的关系，阶级身份是跟一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全部的去记录的生活轨迹有着更紧密的经验性联系，而阶级利益意识应是更紧密地与阶级位置相联系的。

这是一组高度异质经验问题。从研究中渐渐累积显现出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探讨优于它的对手的简单妙论，或相对于其他社会因素阶级有着广泛普遍的解释力这么一点。更确切地说，研究提供的信息最少有两层意思：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中不论是在阶级关系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上还是在

阶级影响上都有相当大的变化；第二，尽管有这些变化，但以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为基础的基本的阶级划分在本书几乎所有的分析中仍是一个持续重要部分。

# 第一编

##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及其转变



## 第二章

### 阶级结构的比较分析

阶级分析的起点是阶级结构问题，对阶级结构的调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方法，它既适合于对个人生活进行微观的阶级分析，又可通过描述不同时期、地点的社会差异进行宏观的阶级分析。第一章我们探讨了这个概念的理论基础。在本章我们将绘制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大体轮廓。

实际上，这个任务就是要根据人们的工作调查问卷的回答把他们归入某一特定类别中。直接去观察“阶级结构”本身是不可能的。所能观察到的只能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特定位置上的人。通过向他们提出恰当的问题并把他们的回答收集起来，我们便得到了对阶级结构的整体描述。对有些读者而言，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相当枯燥无味的学校练习。分类、分级、归类——这些确实就是那些精细的学院专家们乏味冗长的工作。更糟的是，把个体塞进简单类别似乎是抹去了他们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阶级便成了一组静态的、简单的盒子，而不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用一些相对宽松、灵活、能适应这种复杂情况的概念进行定性的实地调查，不是更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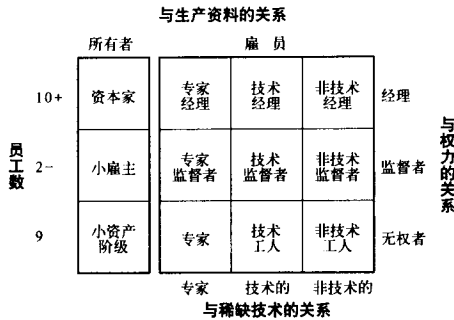
这些批评的确有些道理。我们要用的分类高度简化了阶级

关系的复杂性。一旦采用一套标准分类，它们的确马上就变成“固定了的”，只要这种分类是以同一种方式运用于不同国家中的所有的人。结果，不免存在许多这样的情况，即个体被不舒服地塞进到一些位置里。然而，恰当的问题不是“我们提出的分类忠实地反映世界的复杂性了吗？”而是“这些分类能促进我们关于阶级分析中某一特定问题的知识的提高吗？”。这些分类能统一我们对一些有趣的难题的认识，而不管它们如何粗糙吗？它们不是帮助我们发现那些理论困境，并且至少提供一些中肯的证据以重建这些理论了吗？最后，就像恩格斯曾说过的那样，“对布丁的证明在于吃。”

这一章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描绘出布丁的整个外貌。在书的其余部分我们要吃这个布丁并且看它到底味道如何。

## 2.1 阶级结构的基本轮廓

图2.1显示了下列6个国家的雇佣劳动力在第一章所描述的12个阶级位置中的分布，这6国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挪威和日本。<sup>1</sup> 这些分类的具体操作以及一系列评估中遇到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见本章方法附录。我们首先要看一下阶级结构财产维度的型式问题，然后转向雇员中阶级分布的问题。



**美国 (样本数=1493)**

1.8	5.5	3.7	2.8	12.0
6.0	3.1	6.3	7.2	16.6
6.8	2.9	13.1	40.6	56.7
14.7	11.6	23.3	50.6	100.0

**瑞典 (样本数=1074)**

0.7	3.2	4.1	2.3	9.6
4.7	1.3	5.0	4.2	10.5
5.4	2.7	17.4	49.1	69.2
10.7	7.2	26.5	55.6	100.0

**挪威 (样本数=1522)**

0.8	4.8	4.1	3.5	12.4
2.9	3.7	3.8	3.4	10.9
10.3	4.2	21.0	37.4	72.6
14.0	12.7	28.9	44.3	100.0

**加拿大 (样本数=1779)**

1.0	5.3	3.9	2.5	11.7
3.2	2.2	4.9	3.7	10.8
13.5	2.8	21.7	35.4	59.9
17.7	10.3	30.5	41.5	100.0

**英国 (样本数=1146)**

2.1	2.4	6.9	2.6	11.9
5.1	2.1	6.8	4.5	11.9
6.7	1.5	16.6	42.7	60.8
14.0	5.9	30.3	49.8	100.0

**日本 (样本数=612)**

1.6	4.9	2.0	4.6	11.5
6.2	3.3	2.3	4.1	9.7
23.2	1.3	10.5	38.1	47.9
31.0	9.5	14.7	44.8	100.0

注：每一个表右边的数字只表示雇员。因为这些数字不包含所有者，所以这些数字相加不等于100%。

图 2.1 六个国家的阶级分布图

## 财产维度

资产阶级的定义是雇有10个或更多员工的自我雇佣者，他们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超过2%，并且其中两国(瑞典和挪威)少于1%。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不是专门的“雇主”的资本家。许多拥有巨额资产的人可能受聘担任公司高级经理，其他一些人从事的工作是与他们的资本家财富毫无关系的，还有一些人是正式处于劳动力之外，靠他们的财富收入而像完全领年金生活的人那样生活。有些人甚至是教授。不幸的是，凭借这个项目比较数据无法估计那些非自我雇佣但属于资产阶级的人的比例。无论哪种情况，这可能只是在这些数字之上增加至多几个百分点。<sup>2</sup>

不出所料，用这里的雇有2~9个员工的自我雇佣者的方式来定义的小雇主较之于大资本家就相当多了。其变化范围大约是在加拿大、挪威劳动力的3%和美国、日本的6%之间。把这两个阶级地位合在一起，这6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致有4%到8%的劳动人口处于或多或少与资产阶级有直接联系的阶级位置。

在考虑了这些国家那些被认为可能与它们的资产阶级规模大小有关的其他方面——国内市场规模、工业化的现状、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国家的职能——的差异之后，这个差别范围就相对小了。虽有争议，但一般认为这6国中瑞典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最少的，仍有5.4%的劳动人口处于小雇主或资本家的阶级位置上；美国是这些国家中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有7.8%的劳动人口处于这些位置。的确存在真实的差距，但并不显著。



这些国家在小资产阶级(雇佣员工数不超过一的自我雇佣者)规模上的差异要大得多,其变化范围是从约占瑞典劳动力的5%到日本的超过23%。日本显然是个局外人了。<sup>3</sup>而且,如表2.1所示,日本这种相对于其他5国而言小资产阶级在劳动力中占高比例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主要经济部门中。其中大多数部门小资产阶级的人口百分比至少是我们所分析的其他国家的两倍,甚至有些部门超过3倍。<sup>4</sup>那么,我们得到的第一个一般结论是,日本的小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庞大得多,而且遍及日本经济各部门。那种不是由资本家公司直接组织的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在日本比在我们所研究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强得多。

其他5个国家在财产边界的阶级分布上有两个主要对比:比起其他国家,加拿大自我雇佣比例稍高些(17.7%),瑞典则稍低些(10.7%)。加拿大自我雇佣较高完全归因于农业部门:在这5国当中加拿大从比例上看有着最大的农业部门,并且,在各部门里,加拿大比其他地方有较高的自我雇佣率。<sup>5</sup>如表2.1所示,把所有非农业部门合在一起来看,加拿大的自我雇佣率只有11%,这大约是中国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拿大庞大的小资产阶级便是相对庞大的农业部门持续存在的结果,这些部门还在比其他地方更大的范围内以较小的家庭农场的方式组织生产。瑞典较小的自我雇佣率大体上也源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虽然瑞典的情况不是因为农业部门而是因为国有部门就业的缘故。在瑞典将近42%的劳动力直接由国家雇佣。反之,这个比例在美国低于20%,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处于居中位置。由于国家部门没有任何自我雇佣者,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庞大的国家雇佣部门将降低一国小资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当我们单独考察私有部门时,美国的小资产阶级规模的确要比瑞典稍微

表 2.1 不同部门中雇主和小资产阶级的百分数

	大经济部门						非农业和私有部门			
	部门总计	天然生产	制造	分配	商业服务	个人服务	社会政治服务	非农业	私有	私有非农业
瑞典										
小资产者	5.4	38.6	4.4	5.2	5.0	10.0	0.0	3.4	9.3	6.1
雇主	5.4	15.8	5.3	10.8	12.5	5.7	0.3	4.7	9.1	8.4
自我雇佣	10.7	54.4	9.7	16.0	17.5	15.7	0.3	8.1	18.4	14.5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5.3) <sup>a</sup>	(31.7)	(18.1)	(3.7)	(6.5)	(34.6)	(95.1)	(58.2)	(53.3)
挪威										
小资产者	10.3	58.8	5.9	10.4	12.5	14.6	2.1	6.8	16.5	11.3
雇主	3.7	5.2	2.8	8.9	3.4	4.9	0.2	3.6	6.0	6.0
自我雇佣	14.0	63.9	8.7	19.3	15.9	19.5	2.2	10.3	22.5	17.3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6.4)	(25.7)	(22.2)	(5.8)	(8.1)	(31.8)	(94.4)	(61.7)	(56.1)
英国										
小资产者	6.7	12.0	5.2	10.1	7.2	16.1	1.1	6.4	10.3	10.0
雇主	7.2	18.0	5.8	6.7	13.3	17.8	1.1	6.8	11.2	10.6
自我雇佣	14.0	30.0	11.0	16.8	20.5	33.9	2.1	13.2	21.5	20.6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4.5)	(31.0)	(21.3)	(7.4)	(10.6)	(25.2)	(95.6)	(64.9)	(62.5)

续表

美国										
小资生产者	6.8	17.8	4.8	5.4	10.8	16.3	3.0	6.4	8.3	7.8
雇主	7.8	31.2	6.5	9.8	8.0	14.6	1.7	7.1	9.5	8.7
自我雇佣	14.7	49.1	11.3	15.2	18.8	30.9	4.6	13.5	17.8	16.1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4.4)	(28.0)	(20.5)	(10.0)	(11.2)	(25.8)	(97.3)	(82.4)	(79.7)	(79.7)
加拿大										
小资生产者	13.5	71.3	6.4	8.9	9.0	20.9	2.0	7.1	18.9	10.3
雇主	4.2	5.1	4.9	5.6	5.1	4.5	1.8	4.1	5.8	5.9
自我雇佣	17.7	76.4	11.3	14.5	14.1	25.4	3.7	11.1	24.7	16.2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10.0)	(22.9)	(22.0)	(8.8)	(7.5)	(28.7)	(91.6)	(71.3)	(63.0)	(63.0)
日本										
小资生产者	23.2	100.0	16.7	27.4	13.3	43.1	20.7	22.9	24.4	24.1
雇主	7.8	0.0	9.1	8.3	6.7	7.7	6.9	8.1	8.2	8.5
自我雇佣	31.0	100.0	25.8	35.7	20.0	50.8	27.6	31.0	32.6	32.6
(占部门劳动力的百分数)	(0.7) <sup>b</sup>	(34.7)	(27.5)	(10.5)	(11.4)	(15.2)	(99.3)	(95.1) <sup>c</sup>	(94.4)	(94.4)

a. 括号里的数字是样本在部门中的比例。

b. 在日本的天然生产部门中(主要是农业)实质上没有受访者,因为日本的样本是局限于东京及其近郊。

c. 由于未加解释的原因,日本调查抽样低估了国家雇员。在样本中,4.9%的受访者是国家雇员,而公布的数据中这个数字是9.1%。

小些：在美国占劳动力的8.3%，而在瑞典则是9.3%。然后，我们得到的第二个一般描述性结论是，对于除日本之外的其他5国，阶级结构财产维度上的阶级分布的大部分差异是源于劳动力部门构成差异——特别是国有部门与农业部门的规模——而不是部门内阶级分布的明显差别。

## 雇 员

乍一看，图2.1所显示的这6个国家的雇员阶级分布有相当多的差异。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经理这一类别规模是英国的两倍多，而瑞典的工人阶级比挪威、日本和加拿大要多30%。但是，由于两个原因，这些国家间的差别可能稍微有点误导。第一，因为不同国家自我雇佣的差异（特别是日本的高自我雇佣率）、国有部门间一些雇员子类的差别就只简单反映了雇佣上的大的差异而没有反映任何对雇员阶级分布本身有着特别意义的情况。这表示我们应单独考察雇员中的阶级分布。第二，由于在方法附录中所讨论的原因，国家间这些分布上的差别有些很容易存在衡量问题，特别是阶级结构矩阵中的技术/专长维度。要精确比较不同国家经济的技术水平是极其困难的，而这可能潜在地歪曲了所观察到的在阶级结构某些位置相对规模上国家间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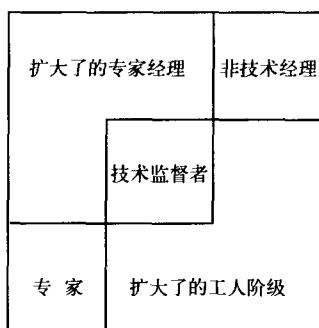
因此，为了比较雇员中阶级分布，把极点处的阶级位置与紧挨着它们的中间类型合并起来，这样也许可能会稍微可靠些。在经调整的雇员阶级分布图中(图2.2)，国家之间的差别减弱了不少。其中5个国家——美国、挪威、加拿大、英国和日本——13%~15%的雇员处于扩大了的专家经理这个阶级位置，71%~74%处于扩大了的工人阶级这一类型。想想这些国家的工作组

织和历史经历是多么不同，再看看她们的雇员阶级分布是如此相似，这的确是相当让人吃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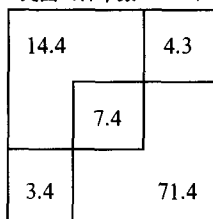
与这些数字有一定出入的国家是瑞典，在瑞典，雇佣劳动力的79.2%处于扩大了工人阶级位置，而只有9.6%处于扩大了专家经理这个阶级位置。与瑞典的小资产阶级相对较少的情况不一样，瑞典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此处的不同不再是瑞典劳动力在经济部门或国家雇佣上分布的结果——在每一个部门里瑞典比其他国家都有较高比例的雇员属于工人阶级或扩大了工人阶级类别。<sup>6</sup> 瑞典的这种分布也不是由于它在阶级和性别的关系中存在什么特殊情况——瑞典男子中的工人比例比所有其他国家都高，而在妇女中，这个比例比除日本外的所有国家也要高。年龄构成以及公司的规模分布看来也无法解释瑞典和其他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瑞典和其他国家之间在阶级分布上的差别看来不是由于某种瑞典经济构成的特征，而是因为瑞典和其他国家阶级结构不同的缘故。

瑞典阶级分布与众不同的核心之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较之于任何一个国家，瑞典处在经理或监督者的位置上的雇佣劳动力比较少。这种对比在美国和瑞典之间尤其显著：在美国，全部雇员中将近35%的工作都具有某种真实的工作场所权力；而在瑞典，这个数字只有22.5%。<sup>7</sup> 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别十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瑞典的工人阶级队伍比美国的相对要大。如果美国具有与瑞典相同的权力整体分布，而在权力类别里面保持它当前的技术分布状况，那么，美国就业人口中的56.6%将处在阶级结构矩阵中的工人阶级这个角落上（并且79.9%将处在扩大了工人阶级中）。反之，如果美国具有与瑞典相同的整体技术分布，而在技术类别里面保持它当前的权力分布状况，美国工人阶级只能增加到就业人数的49.1%（并且扩大了工人阶级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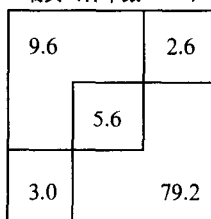
调整过的雇员阶级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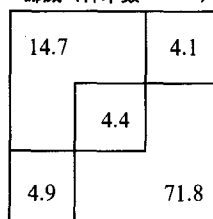
美国 (样本数 = 1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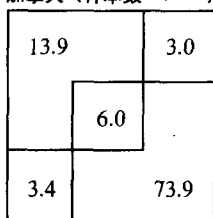
瑞典 (样本数 = 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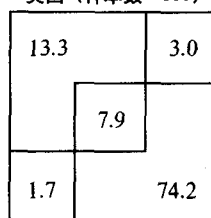
挪威 (样本数 = 1309)



加拿大 (样本数 = 1465)



英国 (样本数 = 960)



日本 (样本数 = 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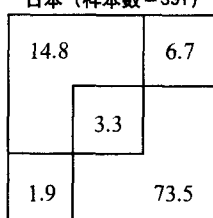


图 2.2 六国调整过的雇员阶级分布图

增到 74.8%)。\* 根据对工人阶级相对规模的解释说明来看, 瑞典和美国间的主要对比便是两国的工作岗位中的权力分布情况。

解释为什么瑞典的工作场所比它的比较对象美国拥有更少的经理和监督者则超过了这个项目数据的范围。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一种方法就是去考察特定行业的权力分布状况。表 2.2 给出了这些数据。在地位高的职业人群中——专业人员、技术专家、教师、经理——美国拥有权力的人的比例只是一般地稍高于瑞典。<sup>9</sup>除劳工的情况之外，两个国家那些通常被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职业——办事人员、手工艺人、技工和服务员——人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在这些职业中，美国和瑞典在手工艺人上的差别是最大的：在美国，39.2%的手工艺人处在监督位置上，而在瑞典只是 8.7%。

这些结果似乎说明，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把管理职能中监督方面的权力授予了那些没有此权利就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位置。特别是技术工人阶级的位置——手

表 2.2 各职业类别中的监督权分布

职业	拥有监督权的雇员的百分比		比值
	美国	瑞典	美国：瑞典
专业人员	54.9	51.2	1.1: 1
教师	23.2	15.6	1.5: 1
技术专家	58.3	40.2	1.45: 1
经理	85.1	79.5	1.1: 1
办事员	25.9	13.1	2.0: 1
销售员	15.6	21.8	0.7: 1
领班	93.2	75.5	1.2: 1
手工艺人	39.2	8.7	4.5: 1
技工	18.6	8.9	2.1: 1
劳工	15.8	16.7	0.95: 1
技术服务员	51.9	17.5	3.0: 1
非技术服务员	23.3	5.9	3.9: 1

工艺业——在美国比在瑞典更倾向于被赋予监督其他工人的权力。

虽然，在没有看到两国关于生产领域中结构转变以及工人和资本家政治策略的历史数据的情况下，我不可能为这些差异提供一个精确的解释，但我可以对那些发挥作用的机制做些思考。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围绕在两国工会的角色和力量方面。比起美国、瑞典的工人运动成功得多地消除了限制其组织工资收入者的能力的法律。特别是，在美国那些属于“经理”的雇员一般是在法律上被排除在工会讨价还价的单位之外的。这意味着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至少要把关键类别的工资收入者的一些工作并到低层管理活动中去，否则，这些类别仍属于工人阶级(劳动教育和研究协会1982: 315)。在瑞典，由于经理和监督者工会化的比例也很高，因此雇主没有任何把权力等级制度作为一种消除工人运动的方法来使用的动力。因而，把监督职务扩展到部分工人阶级中便是美国资方要削弱工会运动的众多努力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可能说明瑞典相对于美国其经理等级制度较弱的因素，主要围绕在大约最近40年在瑞典存在的“阶级妥协”的性质。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瑞典一直以劳资之间所谓的“社会民主妥协”而出名。在这种妥协中，工人同意节制他们的斗争性，特别是在部门发言权方面，并且与经理们合作，作为交换条件，经理要保证他们的工资或多或少随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以及保持最低失业水平。<sup>10</sup> 在这类妥协得到严格实施的情况下，劳动过程中社会控制的问题将会减少。其结果呢，借用鲍尔斯、戈登和威斯科普夫(1990: 194~196)的说法，就是对广泛的“保卫劳动”的需求较低。在美国正相反，工人和经理之间面对面的冲突性关系要多得多，而隐含在工作场所和国家



政策中的“社会契约”要弱得多。因此，典型地，美国的工作场所要求一套包括严密监督在内的相当复杂的社会控制机构并且相当依赖于消极的惩罚规则。后果之一便是大量雇佣监督者，包括监督者的监督者。因而瑞典比美国拥有较少的监督类雇员，这至少部分应归因于这两个国家在工人运动、阶级和解以及劳动纪律问题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瑞典的资本家较少需要把如此多的位置和资源用在社会控制活动上。<sup>11</sup>

不管对瑞典雇员的阶级分布的与众不同作何种解释，从图 2.2 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工人阶级以及与工人阶级最近的位置构成了这些国家四分之三左右的雇佣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即扩大了的专家经理类这一特权部分大约占 10%~15%。

## 2.2 阶级和性别

任何有关阶级和性别之间关系的分析都必须面对为阶级分布的分析寻找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对它的详细讨论我们放在第十章，它是约翰·戈德西尔帕(1983)以一种让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来的，它认为在阶级结构中占据某种位置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因为家庭是共同消费单位，戈德西尔帕辩论道，家庭的所有成员在对家庭经济资源的控制中享有共同的利益，因此，说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属于”不同的阶级没有道理。因而戈德西尔帕支持那种他称之为“传统”的做法，即把“家长”(典型的争取面包的男性)的阶级位置指定为包括已婚职业妇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阶级位置。

另一可供选择的探讨方法是把个人当做阶级位置的任职者。在这种观点中，阶级位置是在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在消费关系

里构筑的，并且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典型的是由个人来填充的，所以个人才是合适的分析单位。因此，那些已婚职业妇女的阶级位置并不是从她们丈夫的阶级位置派生出来的，并且家庭从阶级位置这点来看可以是异质的。

对已婚妇女的阶级地位的这两种不同想法导致阶级结构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如表 2.3 所示（以美国和瑞典为例）。（为了与家庭阶级作比较在此采用了不同的操作标准，因此，这个表中的工作—阶级分布图与本章其他地方的分布图并不完全相同。）<sup>12</sup> 这个表既有个人的工作—阶级的阶级分布记录，也有家庭—阶级分布记录。根据戈德西尔帕所宣扬的“传统的智慧”，对于男子而言，家庭—阶级和工作—阶级是一致的，但是对妇女而言，如果她们单身或者她们的配偶没有参加工作，那么其家庭—阶级是由她们自身的工作—阶级来界定，但是如果她们的丈夫有工作，那么她的家庭—阶级是由她们丈夫的工作—阶级来界定。

不出所料，比起用工作—阶级来界定它的时候，当用家庭—阶级来界定阶级位置时，男子和妇女的阶级分布要相似得多。<sup>13</sup> 例如，当用个人工作—阶级来界定时，在美国有 31.5% 的男子和 53.7% 的妇女属于工人阶级，但是当我们用家庭—阶级来确定阶级位置时，妇女的这个数字则下降为 46.2%。用工作—阶级方式来界定时，甚至在瑞典，对比也十分显著：35.9% 的男子和 63.5% 的妇女属于工人阶级，然而以家庭—阶级方式来界定时，只有 42.8% 的妇女属于工人阶级。其结果是，这两个国家的总体阶级结构的比较会随着所用的阶级结构的概念不同而呈决定性不同：如果用工作—阶级的方式，我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瑞典的工人阶级要比美国的工人庞大得多——在瑞典，它占雇佣劳动力的 47.3%，而在美国只是 41.6%——然而，如果我们

表 2.3 按个人的工作—阶级和家庭—阶级标准界定的  
美国、瑞典男子和妇女的阶级分布

	男子	工作—阶级		家庭—阶级	
		妇女	总量	妇女	总量
<b>美国</b>					
1.资本家和小雇主	10.2	5.2	7.9	5.8	8.2
2.小资产阶级	6.4	7.5	6.9	6.8	6.6
3.有权的专家和技术者	24.9	9.5	17.8	18.0	21.8
4.有权而无技术者	5.3	12.7	8.7	8.7	6.8
5.无权的专家	3.3	2.7	3.0	3.7	3.5
6.无权的技术雇员	18.4	8.6	13.9	10.7	15.0
7.无权无技术者(工人)	31.5	53.7	41.6	46.2	38.2
<b>瑞典</b>					
1.资本家和小雇主	7.8	1.6	5.2	2.1	5.5
2.小资产阶级	7.0	2.9	5.3	6.0	6.6
3.有权的专家和技术者	9.7	10.0	15.7	18.5	19.2
4.有权而无技术者	9.4	5.3	7.7	7.2	8.5
5.无权的专家	2.3	2.7	2.5	4.4	3.2
6.无权的技术雇员	17.8	14.0	16.3	19.0	18.3
7.无权无技术者(工人)	35.9	63.5	47.3	42.8	38.7

采用家庭—阶级标准，实质上规模相同——瑞典 38.7% 而美国 38.2%。因而，比起美国，瑞典有更多的无产阶级化工作，但不是更多的无产阶级化家庭。

我们将在第十章系统地研究由这些可供选择的观点所提出的理论和经验的问题。在本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将致力于把个人作为一恰当的分析单位的实践。因此，我们在表 2.4 中所考察的阶级—性别的分布应理解为职业男子和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阶级分布。

不出所料，当把个人而不是家庭作为阶级结构中的分析单位时，6国的妇女和男子的阶级分布都存在巨大的差别：

1. 在全部6国中，比起男子，妇女属于专家经理的位置以及扩大了专家经理类别的比例要小得多。在所有国家的专家经理中男子比例最小的是80%，并且有些国家，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90%。

2. 在除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中，男子是专家监督者的可能性至少是妇女的两倍(在加拿大男子和妇女是专家监督者的比例都是2.2%)，并且在除瑞典之外的所有国家中，男子是技术监督者的可能性至少是妇女的1.9倍(在瑞典妇女是技术监督者的百分比稍高于男子)。于是在权力获得上性别不平等便是所有这些国家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3. 在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中，比起妇女，男子成为资本家和小雇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比如，在瑞典，1.5%的妇女是小雇主或资本家，而男子这个比例是8%，在美国，这两者分别是5.1%和10.1%。结果在这些国家中70%~85%的雇主和资本家是男性。日本在这方面是惟一的例外，在样本中，7.5%的妇女是小雇主或资本家，而男子这一比例是8.0%。<sup>14</sup>

4. 与自我雇佣中的两个雇主类别相比，小资产阶级中的性别不平等要小得多。虽然6国中有4个国家(瑞典、挪威、加拿大和英国)男子是小资产者的比例还是比妇女来得高，但是这种差别比他们在雇主和资本家类别中的差别要小，而且在美国和日本，妇女是小资产阶级的比例确实比男子来得高。

5. 在所有国家中，妇女比男子要多得多地聚集在工人阶级中。在6个国家中，大致有50%~60%的妇女是处在非技术工人阶级位置上，而男子这个比例只是25%~45%。结果是，虽然这

些国家妇女占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一般是在 40% ~ 50% 左右，但是她们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明显多数——55% ~ 60%。

因此，在 6 国中，男子处在特权和有利的阶级位置上的可能性比妇女一般要大得多。

这些国家在性别型式上贯穿着两个明显的差异：

1. 这些国家在阶级结构的权力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是相当不同的，这点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探讨。权力上的性别缺口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它在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在 3 个英语国家要大。日本妇女在扩大了专家经理中只占 3.2%，相比较而言，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占 11% ~ 13%，3 个英语国家占 20% ~ 23%。虽然在所有国家都是男性统治着扩大了专家经理类，但是有些国家的妇女比其他国家的妇女更多地闯进这个领域。

2. 6 个国家自我雇佣的性别类型存在明显不同。在瑞典、挪威、加拿大和英国，17% ~ 25% 的自我雇佣者是妇女，而在美国是 39%，在日本是 50%。当我们更严格地考察资本家和雇主时，结构是一样的：在日本，所有资本家（雇佣的员工超过 9 人的自我雇佣者）中有 50% 是妇女，在美国大约是 20%，在英国是 12.5%，而在其他 3 个国家是 6% 或更低。

乍一看，日本的结果似乎相当矛盾：日本在专家经理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迄今为止是最大的，但是在资本家和小雇主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却是最小的。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相对于其他国家日本在自我雇佣方面所具有的特征时，这种异常就减少了。就像在方法附录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把“在家庭企业或农场里无酬的工人”归类为自我雇佣这一类，并按家庭企业有酬员工数把他们放在相应的特定阶级位置上。大多数无酬的家庭工人是在那种经常是高度家族式组织的传统家

表 2.4 阶级—性别分布列联表

	美国		瑞典		挪威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1.两性中的阶级分布												
1.资本家	0.8	2.7	0.0	1.1	0.0	1.3	0.1	1.5	0.6	3.1	1.9	1.4
2.小雇主	4.3	7.4	1.5	6.9	1.7	3.7	1.9	4.1	1.9	7.4	5.6	6.6
3.小资产者	7.4	6.4	2.9	7.2	7.4	12.2	7.9	17.5	5.4	7.7	28.2	19.4
自我雇佣者总计	12.6	16.5	4.4	15.3	9.1	17.2	10.0	23.0	7.9	18.1	35.7	27.5
4.专家经理	2.3	8.1	0.2	5.3	0.8	7.3	2.2	7.5	1.1	3.2	0.0	8.7
5.技术经理	2.2	5.0	1.5	5.9	2.9	5.0	3.2	6.1	3.6	9.1	0.8	2.9
6.非技术经理	3.8	1.9	1.8	2.7	1.2	5.1	2.3	2.6	3.6	1.9	0.4	7.8
7.专家监督者	1.7	4.4	0.4	1.9	0.7	5.7	2.2	2.2	0.9	2.9	0.0	5.8
8.技术监督者	3.9	8.3	5.8	4.5	2.3	4.8	3.2	6.1	4.3	8.5	0.4	7.8
9.非技术监督者	9.5	5.3	2.2	5.6	3.0	3.7	4.7	3.1	5.4	4.0	1.9	5.8
10.专家	2.9	3.0	3.3	2.3	3.5	4.6	2.7	2.8	1.5	1.5	0.0	2.3
11.技术工人	7.8	17.7	15.9	18.5	23.0	19.7	19.9	23.0	13.1	19.0	9.0	11.0
12.非技术工人	53.3	29.8	55.2	44.8	53.5	27.0	51.1	24.4	58.7	31.7	51.9	24.0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4,5,7)	5.2	17.5	2.2	13.2	4.4	18.0	6.2	15.2	5.6	15.3	0.8	17.5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9,11,12)	70.6	52.8	82.5	62.1	79.5	50.3	75.6	50.4	77.1	54.6	62.8	41.3
样本数	686	807	452	622	596	926	730	1049	467	679	266	346

续表

	美国	瑞典	挪威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II. 阶级中的性别分布						
(各阶级位置中女性的百分比)						
1. 资本家	20.6	0.0	0.0	5.9	12.5	50.0
2. 小雇主	33.1	14.0	22.7	24.6	15.3	39.5
3. 小资产者	49.8	22.4	28.0	24.2	32.5	52.8
自我雇佣者总计	39.4	17.4	25.4	23.2	23.1	50.0
4. 专家经理	19.7	2.9	6.8	16.8	18.5	0.0
5. 技术经理	27.4	15.9	27.0	18.6	21.5	16.7
6. 非技术经理	62.7	32.0	13.0	38.6	56.7	3.6
7. 专家监督者	24.2	14.3	7.0	41.0	24.1	0.0
8. 技术监督者	28.7	48.1	24.1	26.4	25.6	7.1
9. 非技术监督者	60.5	22.2	34.6	51.5	48.1	20.0
10. 专家	45.2	51.7	23.8	40.8	41.2	0.0
11. 技术工人	27.2	38.5	23.0	37.6	32.1	37.5
12. 非技术工人	60.3	55.2	53.5	59.3	56.0	62.4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4,5,7)	23.2	10.9	13.5	22.1	20.0	3.2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9,11,12)	53.2	49.1	50.4	51.1	49.2	53.9
总计	45.9	42.1	39.2	41.0	40.8	43.5

庭企业中工作。而且，一些认为自己是雇主而不是“无酬”的家庭工人的妇女仍然在那个她们丈夫也是雇主的传统家庭企业中工作。

表2.5把资本家、小雇主和小资产阶级分成四个子类：(1)自立者(那些没有和自我雇佣者结婚的或本人不是家庭企业的无酬工人的人)；(2)配偶是雇主的人；(3)配偶是小资产者的人；(4)配偶是无酬的家庭工人(对男性受访者而言)的人或本人是无酬的家庭工人(对女性受访者而言)的人。如表所示，日本自立女资本家

表2.5 处于不同家庭阶级状况的自我雇佣者的分布<sup>a</sup>

女性	美国	瑞典	挪威	加拿大	英国 <sup>b</sup>	日本
资本家阶级						
独立的	42.8	0.0	0.0	0.0	33.3	40.0
配偶是雇主	42.8	0.0	0.0	0.0	66.7	40.0
配偶是小资产者	0.0	0.0	0.0	100.0	0.0	0.0
无酬家庭工人	14.2	0.0	0.0	0.0	n.a.	20.0
样本数	7	0	0	1	3	5
小雇主						
独立的	65.5	57.1	50.0	35.7	44.4	0.0
配偶是雇主	10.3	28.6	30.0	50.0	44.4	33.3
配偶是小资产者	3.4	0.0	20.0	0.0	11.1	0.0
无酬家庭工人	20.7	14.3	0.0	14.3	缺	67.7
样本数	30	7	10	14	9	15
小资产阶级						
独立的	72.5	46.2	56.8	50.0	48.0	38.7
配偶是雇主	7.8	0.0	0.0	3.4	24.0	9.3
配偶是小资产者	7.8	23.1	11.4	25.9	28.0	4.0
无酬家庭工人	11.8	30.8	31.8	20.7	缺	48.0
样本数	51	13	44	58	25	75



续表

男性	美国	瑞典	挪威	加拿大	英国 <sup>b</sup>	日本
资本家阶级						
独立的	95.2	85.7	83.3	93.8	100.0	80.0
配偶是雇主	4.8	0.0	8.3	6.3	0.0	0.0
配偶是小资产者	0.0	14.3	8.3	0.0	0.0	0.0
无酬家庭工人	0.0	0.0	0.0	0.0	缺	0.0
样本数	21	7	12	16	21	5
小雇主						
独立的	91.7	90.7	88.2	86.0	88.0	73.9
配偶是雇主	3.3	4.7	2.9	9.3	6.0	13.0
配偶是小资产者	3.3	4.7	8.8	4.7	6.0	0.0
无酬家庭工人	1.7	0.0	0.0	0.0	缺	13.0
样本数	60	43	34	43	50	23
小资产阶级						
独立的	88.2	86.7	85.0	91.2	90.4	82.1
配偶是雇主	0.0	2.2	0.0	0.0	1.9	10.4
配偶是小资产者	5.9	11.1	7.1	7.1	7.7	1.5
无酬家庭工人	5.9	0.0	8.0	1.6	缺	6.0
样本数	51	45	113	182	52	67

a.各栏目数字指的是身处不同家庭阶级状况在各类个人界定的自我雇佣位置中的人们的百分数。

b.英国的调查中没有访问“无酬家庭工人”受访类别。

的比例与美国和英国大致相同，但是日本自立的女性雇主和小资产者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低得多。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小雇主是自立的，在瑞典、挪威、加拿大和英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女雇主是自立的，而在日本没有自立的女性小雇主；样本中的15个日本女性小雇主有33%和小雇主结婚，其余的67%把她们自己看做是家庭企业中的无酬工人。其他国家中，没有

一个国家有超过20%的女性小雇主这样给自己定位的。在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女性小资产阶级中同样存在着相似的对比，只是差异没有这么悬殊罢了。

这些结果表明，比起北美和欧洲，看来日本的小企业更多是由传统的家庭企业控制的。这类家庭企业典型的是以一种高度家长制的方式组织起来，即男性家长有效地控制着企业的经营并实施业主和雇主的职能。因此，把这种小企业中无酬的女性家庭工人归作“雇主”这种做法多少有点误导。<sup>15</sup>

### 2.3 阶级和种族

在本书所包括的6个国家中，种族只有在美国才是阶级结构的一个突出方面。表2.6显示的是美国的阶级—种族—性别分布情况。表的结果意味着，在对阶级分布的影响上种族和性别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相互作用。对各种不同的自我雇佣类别而言，种族差别一般要比性别差大得多。至少在我们的样本里，没有任何黑人资本家，只有一个黑人小雇主(女性)并只有少数黑人小资产者(全是男性)。相比之下，白人妇女中有5.6%是资本家或小雇主，并且有将近9%是小资产者。在获取财产所有权方面，种族不平等看来比性别不平等要造成大得多的差别。

当我们考察专家经理阶级位置时，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这里相对于白人妇女，黑人男性看来稍占优势：所有黑人男性(就业劳动力)中的5.1%处在专家经理的位置，而白人妇女这一比例只有2.8%，没有黑人妇女处于这个位置(在我们的样本中)。对扩大了专家经理这一类别而言，这些数字分别是黑人男性为8.4%，白人妇女为6.9%，黑人妇女为1.7%。当然，白人男性是毫不含糊地占绝对优势，他们之中的18.5%属于扩大了

表 2.6 美国阶级—种族—性别分布列联表

	不同种族和性别的阶级分布				不同阶级的种族—性别分布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其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资本家	3.0	0.7	0.0	0.0	80.6	16.4	0.0	0.0	0.0	0.0	0.0	0.0	3.1	
2.小雇主	8.2	4.9	0.0	1.3	63.1	30.3	0.0	1.3	0.0	1.3	0.0	1.3	5.4	
3.小资产阶级	6.4	8.8	3.6	0.0	44.6	49.4	2.7	0.0	2.7	0.0	0.0	0.0	3.2	
自我雇佣者总计	17.6	14.4	3.6	1.3	56.6	37.5	1.3	0.5	1.3	0.5	0.0	0.0	4.2	
4.专家经理	8.5	2.8	5.1	0.0	72.2	19.3	4.7	0.0	4.7	0.0	0.0	0.0	3.9	
5.技术经理	5.7	2.4	2.0	0.0	72.0	24.2	2.7	0.0	2.7	0.0	0.0	0.0	2.7	
6.非技术经理	2.3	3.9	1.0	6.3	35.6	49.2	1.6	12.0	1.6	12.0	1.5	1.5	1.5	
7.专家监督者	4.2	1.7	1.3	1.7	64.8	20.9	2.2	3.2	2.2	3.2	8.8	8.8	8.8	
8.技术监督者	7.9	4.3	7.5	2.0	58.6	25.8	6.1	1.8	6.1	1.8	7.8	7.8	7.8	
9.非技术监督者	5.0	9.3	4.6	7.7	32.4	48.8	3.3	6.1	3.3	6.1	9.4	9.4	9.4	
10.专家	3.2	3.5	2.9	1.8	47.9	42.8	4.7	3.2	4.7	3.2	1.4	1.4	1.4	
11.技术工人	17.4	7.7	24.3	10.9	60.3	21.6	9.2	4.6	9.2	4.6	4.3	4.3	4.3	
12.非技术工人	28.2	50.0	47.7	68.4	33.3	47.6	6.1	9.9	6.1	9.9	3.1	3.1	3.1	
扩大的专家经理(4,5,7)	18.5	6.9	8.4	1.7	70.3	21.2	3.5	0.8	3.5	0.8	4.3	4.3	4.3	
扩大了工人阶级(9,11,12)	50.6	67.0	76.6	86.9	39.2	42.0	6.5	8.3	6.5	8.3	4.1	4.1	4.1	
所有样本总计					47.0	37.9	5.1	5.8	4.2	4.2	4.2	4.2	4.2	
样本数					648	524	70	80	70	80	58	58	58	

的专家经理类。

如果我们通过界定一个包括资本家、小雇主和扩大了专家型经理类的“特权阶级位置”类别的方法把以上的发现综合一下，那么，就有不足30%的白人男子处在特权阶级位置上，与之相对的是：12.5%的白人妇女、8.4%的黑人男子和不足3%的黑人妇女处在这一位置上。从无产阶级化方面来看，就业劳动力中，将近87%的黑人妇女、77%的黑人男子以及67%的白人妇女属于扩大了工人阶级。因此，当把所谓的“底层阶级”——正式劳动力之外的长期贫穷的那部分人口——的问题排除在外，种族比性别似乎对人们获得特权阶级位置有着更大的总体影响。<sup>16</sup>

当大多数人想到“工人阶级”时，满脑中出现的形象是一个白人男性产业工人。当我们根据个人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来界定工人阶级时，很明显这个形象在整体上是不准确的。工人阶级中只有33%的人是男性白人，即使在扩大了工人阶级中也只有39%是男性白人。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美国工人阶级绝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少数民族构成的。

## 2.4 就业组织的类型

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由资本主义组织构成的。尤其是，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一个很大比重的劳动力是直接受雇于国家的。即使一个人相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家雇佣受下面事实的巨大影响，即国家组织通过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招募他们的劳动力并且与资本主义企业以各种方式发生相互作用，但是，国家组织仍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一幅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构图应该区分私有的资本主义部

门内的阶级位置和国有部门中的阶级位置。

而且，即使在经济的私有市场部分，人们工作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性质上也有重要差异。当然，小资产者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导向的“企业”中工作的。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是那种在一高度竞争的市场上经营的小型、地区性的企业；另外一些则是那种雇有成千上万人的、不论在生产组织上还是在市场上都横跨全球的巨型公司。因此，在理解国家之间阶级结构上的差异时，了解不同阶级是如何分布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是很重要的。这些分布显示在表 2.7 中。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国家雇佣问题。在每一个国家中，比起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有更高比例的属于扩大了专家经理类的人被国家雇佣。在三个国家中(英国、瑞典和挪威)，大约 50% 的扩大了专家经理类的人是直接被国家雇佣，而没有哪个国家其所雇佣工人阶级的比例超过了 42%。更为普遍的是，中产阶级(扩大了工人阶级类别之外的所有工资收入者)与国家雇佣的联系比工人阶级要多得多。与国家联系的差别对于典型存在于工人和中产阶级中的阶级觉悟的形式有复杂的影响。

在私有部门里，除加拿大之外的所有国家，比起属于扩大了专家经理类中的人，有更高比例属于扩大了工人阶级类别中的人在小公司(员工数少于 50)就业，并且，在除加拿大和挪威之外的所有国家，比起属于扩大了工人阶级类别中的人，有更高比例属于扩大了专家经理类中的人在大公司(员工数超过 1000)就业。不同阶级就业环境的不同在瑞典尤其明显：在瑞典的私有部门中，15% 扩大了专家经理类的人在小公司就业，而与之对应的有 28.5% 的扩大了工人阶级中的人在小公司就业；有 62.5% 的扩大了专家经理类的人在雇员超过 1000 人的大公司就业，只有 43.8% 的扩大了工人阶级中的人在大公司

就业。在其他国家，工人和专家经理之间的对比没有这么明显，但一般来说差别仍是存在的。

那么，总的来说，作为一个一般特征，在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与大公司和国家部门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于是，相对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人不仅从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普遍更有利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就业组织权力等级制度中所处的位置方面看具有相对优势，而且从他们就业于最安全及在经济上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部门这方面来看也具有相对优势。

表 2.7 不同阶级位置上雇员的就业组织类型分布

	私有企业的规模			国有
	小型 (<50)	中型 (51 ~ 1000)	大型 (>1000)	
美国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13.3	25.4	38.7	22.1
扩大了工人阶级	20.2	25.1	31.3	23.5
工人阶级	21.2	27.2	34.1	17.4
雇佣劳动力总计	20.5	24.4	33.4	21.5
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17.3	32.9	49.8	
扩大了工人阶级	26.5	32.7	40.8	
工人阶级	25.7	32.9	41.4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26.2	31.1	42.7	
瑞典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7.0	10.5	29.6	53.4
扩大了工人阶级	15.1	14.7	23.2	47.0
工人阶级	17.6	14.6	25.6	42.2

续表

雇佣劳动力总计	13.6	14.0	23.0	49.4
私有部门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	15.0	22.5	62.5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	28.5	27.7	43.8	
工人阶级	30.5	25.3	44.2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27.0	27.6	45.4	
挪威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	15.5	22.8	8.3	53.4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	24.5	18.6	12.0	44.9
工人阶级	29.8	21.8	13.7	34.7
雇佣劳动力总计	23.0	19.5	11.3	46.1
私有部门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	33.3	48.9	17.8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	44.5	33.7	21.7	
工人阶级	45.5	33.4	21.0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42.8	36.3	20.9	
加拿大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	21.8	18.3	23.4	36.5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	21.3	20.1	23.7	35.0
工人阶级	23.8	22.3	27.1	26.8
雇佣劳动力总计	20.6	19.2	23.2	36.9
私有部门				
扩大了的专家经理	34.4	28.8	36.8	
扩大了的工人阶级	32.7	30.9	36.4	
工人阶级	32.6	30.4	37.0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32.7	30.4	36.9	

续表

## 英国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13.1	11.5	26.2	49.2
扩大了工人阶级	19.5	14.1	25.9	40.6
工人阶级	19.4	15.4	29.2	25.9
雇佣劳动力总计	17.5	12.8	25.8	44.0
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25.8	22.6	51.6	
扩大了工人阶级	32.8	23.7	43.5	
工人阶级	30.3	24.0	45.7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31.2	22.8	46.0	

## 日本

公有和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22.5	33.9	33.9	9.7
扩大了工人阶级	31.2	31.9	29.2	7.7
工人阶级	33.1	31.3	32.7	2.8
雇佣劳动力总计	30.1	32.6	29.9	7.1
私有部门				
扩大了专家经理	25.0	37.5	37.5	
扩大了工人阶级	33.8	34.5	31.6	
工人阶级	34.1	32.2	33.7	
私有部门就业者总计	32.5	35.2	32.3	

## 2.5 总 结

本章描述性地探讨了大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特征，得出了几个主要概括判断。



即使采用狭义的定义，工人阶级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最庞大的阶级位置，而且如果把它扩展到包括紧挨着它的矛盾性的位置，那么它就构成了劳动力的绝大多数。就像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那样，虽然近年来工人阶级有所减少，但是如果用相关方式来界定工人阶级，那么几乎不可能出现像有些评论者所暗示的工人阶级已大部分消失了的那种情况。

工人阶级不仅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国家中占据最大的阶级位置，这些国家受到单独对待的雇员阶级分布差异是相当小的。惟一有点例外的是瑞典，它比其他国家有着更大的工人阶级和更小的专家经理类别。瑞典的这种不同可能源于瑞典式的“阶级妥协”这种政治特殊性，“阶级妥协”可能减少了劳动过程中严密监督和监视的需求。即使把瑞典包括在内，这些国家的雇员阶级分布差异仍是相当微小的。

与国家间雇员的阶级分布相对较小的差别形成对比的是，在小资产阶级规模上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排除日本的情况，在小资产阶级规模方面这些国家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它们的经济部门结构的特性：巨大的国家部门压缩着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使它得以扩大。日本的情况是，在它的所有部门中都有一个较高的自我雇佣率。这表明在日本传统的、极小规模的家庭企业有着更强的生命力。

与整个阶级分布中国家之间的差别相对缓和相比，国家内两性之间的阶级分布差别却十分明显。在所有的国家中，妇女比男子都更加无产阶级化，尤其被排除在专家经理阶级位置之外。虽然在日本这些性别差异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但是所有国家的基本状况是相同的。从一个人处于某一特定阶级位置的可能性上看，他(她)的性别比他(她)所处的国家起更大作用。

## 方法附录

### 样 本

样本的精确定义和访问的特定程序各国稍有差异。所有的样本都包括劳动就业人口，但有些国家还包括失业人口，并且有些国家还包括家庭主妇。有些国家的样本把65岁以上的人排除在外；另外一些则没有任何年龄限制。有些国家调查是通过面对面采访进行的，另一些国家完全采取电话访谈的方式，还有一些国家既有信函调查又有亲自访谈。除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调查都是全国随机抽样的；在日本，样本是来自东京及其近郊。为了尽可能保证可比性，在本章的数据分析中，我们把所有国家的样本限定在目前正在就业的成年的劳动力这个范围内。不同国家调查的特点如附录表 2.1 所示。

附录表 2.1 样本特征

国家	访问方式	样本数	日期
美国	电话	1498	1980
澳大利亚	面谈	1195	1986
英国	面谈	1770	1984
加拿大	面谈	2577	1982
瑞典	电话 / 信函	1145	1980
挪威	面谈	2532	1982
日本 <sup>a</sup>	面谈	823	1987

a. 日本样本是采自东京及其近郊，覆盖大约日本人口的 40%。

## 阶级结构变量的操作

本章以及本书其他大多数章节所用到的阶级结构变量的操作如附录表 2.2 所示。对这些操作有两个评论是必要的。第一，我们根据多数人在家庭企业中的就业方式把“家庭企业或农场中无酬的工人”合并到小资产阶级、小雇主及资本家中去。在“无酬的家庭工人”这一标题下包含着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有时这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哪个家庭成员才是“真正”的主人的文化习俗。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它反映了家庭单位内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等级制。然而，一般情况下这种表达并不表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位置，因而我们把无酬的家庭工人看做自我雇佣者。

第二，阶级结构三种维度的每一维度上的中间类型——权利维度上的监督者、技术/专长维度上的技术雇员，以及所有者关系维度上的小雇主——代表着两种情况的综合：一是那些从维度的理论逻辑来看其真实的地位是次要的人，二是那些我们对他们的真实地位标准评价是模糊的人。比如说，“监督者”这一类别综合了那些确实处在一个经理/非经理级别中间位置的人和那些也许实际上是经理或实际上是工人，但对于他们我们的衡量标准没有给予我们以明确的信息。因此，矩阵中包含中间类型的效用是提高我们的信心，相信处于表角落中的人们——专家经理、非技术经理、无管理权的专家和工人——是准确地给予了归类。这对于我们在本书后面致力于分析诸如工人和经理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类事情时尤为重要。在这种分析当中，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划为工人的人确实是工人以及我们划为经理人的确实是经理，而不是有些工人或经理可能被错

附录表 2.2 阶级结构的操作

自我雇佣者 或无酬家庭工人	员工数	权力结构中 的位置 <sup>a</sup>	劳动市场上的位置 (职业)
1 资本家	10 或超过 10	是	
2 小雇主	2 ~ 9	是	
3 小资产阶级	0 ~ 10	是	
4 专家经理		否	专门人才和管理职业 <sup>b</sup>
5 专家监督者		否	专门人才和管理职业
6 无管理权的专家		否	专门人才和管理职业
7 技术经理		否	技术专家、半专门人才、手工业者
8 技术监督者		否	技术专家、半专门人才、手工业者
9 技术工人		否	技术专家、半专门人才、手工业者
10 非技术经理		否	所有其他职业
11 非技术监督者		否	所有其他职业
12 非技术工人		否	所有其他职业

a. 权力等级制中位置的三层级别是根据调查的三组项目建立起来的: 1. 直接参与工作中广泛的政策决定(决策权); 2. 对下属有实施奖惩的能力(赏罚权); 3. 在组织正式权力等级中的位置(非管理者, 监督者, 低层经理, 中层经理, 高层经理, 总经理)。这些项目根据附录图 2.1 中的间接操作(权力-2)指标进行了综合。关于这一串项目是如何汇集到阶级结构的权力维度上的详细讨论, 见赖特(1985, 附录 II, 303 ~ 317)。

b. 管理类职业不应与权力结构中的管理类位置混淆起来。有许多人的工作名义上是管理类职业, 却没有真正的管理权力, 而许多人的工作虽然不是管理职业, 却有相当大的管理权力。

放到邻近的中间类别中去了。

### 与官方统计相比，分布评估的可靠性

很难把我们对阶级分布的评估与其他统计作一比较以评价我们估计的可靠性，因为很少有关于权力或自我雇佣者的就业数这些特殊的问题的其他资料。然而，官方的政府劳动统计确实包括关于自我雇佣的信息，因而我们能够从这个维度上把我们的评估与其他资料进行比较。附录表2.3给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收集的关于我们考察的6个国家的私人雇佣劳动力中自我雇佣率的政府统计。如表所示，在我们的样本中，对除挪威之外的每一个国家，我们对自我雇佣的评估比这些官方的政府统计高30%~70%。例如，在美国，我们的评估是14.7%的就业劳动力是自我雇佣的，而OECD的报告数据所显示的只有9.4%的人是自我雇佣的（从美国经常人口调查推得）。

附录表 2.3 比较项目和公共数据对自我雇佣的评估的比较

	比较项目的评估	OECD的评估	项目评估与OECD 评估的比率
美国(1980)	14.7	9.4	1.56
瑞典(1980)	10.7	8.0	1.34
挪威(1983)	14.0	13.2	1.06
加拿大(1983)	17.7	10.4	1.70
英国(1982)	14.0	9.2	1.52
日本(1986) <sup>a</sup>	31.0	19.2	1.61

资料来源：劳动力统计，1970~1990(OECD, 巴黎：1992)

a. 日本的数字是非农部门的，因为日本的样本几乎没有一个是来自农业部门的。日本的官方评估来自日本劳务省的劳动统计年鉴(1986)。OECD关于整个日本劳动力的自己经营率在1986年是24.9%。

这样，问题便是：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的估计还是比较项目的估计？对于自我雇佣上的分歧我并没有非常有力的解释。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在比较项目调查中有一个有利于自我雇佣的样本误差。然而，如果考虑到我们对美国的数据根据美国普查的1980年职业—教育分布进行了加权处理，那么这两个评估间的不一致就不可能是由于某种特殊的样本误差所致。如果不是对高自我雇佣职业组也抽样过多，那就很难以想象我们能够对自我雇佣者抽样过多。尽管样本设计和访谈程序有着实质上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在样本评估和官方统计之间的分歧量次序却非常相似，这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这再一次表明在调查和政府统计之间的评估差异可能并非是对自我雇佣者取样过多的结果。

我们的调查和政府统计之间评估差异的第二个可能来源是提问时措辞的不同。比如，表2.3中日本的统计数字专门指的是在非合作经营的自我雇佣者，而比较项目对自我雇佣的定义包括那些进行合作经营的自我雇佣者。在美国，1980年大致22%的自我雇佣者是与人合作经营的。而且，如果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相似的话，那么这必然会在我们关于自我雇佣的评估和政府统计之间造成不一致。<sup>17</sup>

对评估分歧的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仅仅是由于在大多数国家里，比起在由官方政府机构进行的访问中，在比较项目访问时有更高比例的人宣称他们是自我雇佣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受访者接受政府机构询问时他们担心像税收责任这类事，也有可能，在比较项目中有更多自我雇佣者的回答是因为比较项目的访问者被告知要确信从受访者那里探求这个问题的精确信息。普查经常是自行支配的，而这可能导致系统的回答错误。比如，在美国，普查数字是以自行支配的问卷

为基础的，在那里相关问题的答案类别如下所列：“(1)就业于私人公司；(2)就业于联邦政府；(3)就业于州政府；(4)就业于地方政府；(5)在自己的商行、专门职业实践场所或农场中工作；(6)独立经营；(7)合作经营；(8)以无酬方式在家庭商业或农场中工作。”可能有一部分为某种个体委托人工作的自我雇佣者在自行支配的调查问卷中就会选择第一种答案。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评估要比那些出版的官方资料更准确。无论如何，评估差异是存在的，并且我们在考察结论时应记住这一点。

### 各国间衡量标准的可比性

比较调查研究永远为衡量标准的可比性问题所困扰。即使认真地翻译这些项目并且重新翻译成最初的语言以确定可能的信息传递损耗，也难以确保调查项目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有同样的实质意义。<sup>18</sup>因此，题目含义的可比性问题是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实质问题上的一个薄弱点。

在本章，阶级结构矩阵中的技术/专长维度是特别容易受到各国之间没有可比性问题的困扰。这个维度依赖于对职业头衔和描述的符号化，并且由于各国职业分类的传统不同，很难完全确信这种标准在不同国家是以一种完全相同的方式具体化的。当然，我们也曾希望所有国家使用一套共同的国际职业标准，但是这不曾实现。<sup>19</sup>虽然所有国家的项目负责人都同意把他们具体的职业标准汇归到一套共同的27个职业类别的规则中去，但是在未曾收集到的标准中存在的国家差异削弱了已汇集的标准的严格可比性。

在不同时间里，我曾试着通过把教育资格证书和工作自主

明确算作划分专家、技术雇员和非技术雇员之间级别的附加标准这类策略来提高技术 / 专长维度的比较衡量标准的可信度。在本书第三编和第四编的一些分析中，只有美国和瑞典的对比使用了这种更细化的分类标准。然而，在最后把更多的国家引到分析中时，这种细化却不能奏效，因为难以用一种可比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教育体系的教育资格证书，并且有些国家的数据资料缺乏工作自主这类问题。结果，我们在本章对于技术 / 专长维度使用了简单的职业标准，尽管认识到这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严格的国家间的可比性。

### 操作任意性问题

抽象概念和具体衡量标准之间的关系，这是所有的社会调研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并且在这二者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存在着某种任意性。概念总不足以确定衡量标准。在目前的例子中，我们有一个围绕着三个维度——财产关系、权力关系和技术——建立起来的抽象的阶级结构概念。在这个抽象的概念图和具体调查研究之间存在着两类衡量标准问题：

1. 要用什么作为衡量其中每一个维度的指标？比如，有很多种东西可作为衡量权力维度的指标：组织机构图所示的权力等级的正式位置；个人在工作场所中所作的决策的特征；个人对下属所拥有的权力的类型；其他对某个人所具有的权力的类型。而且，其中每一个“权力”的可能指标本身又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衡量方式。

2. 应怎样把这些指标合并成操作变量？即使把一系列特定的观察结果与阶级结构分类的每一维度联系起来，还存在把这些数据汇集成可用变量的问题。在阶级分析比



较项目中，我们有成打涉及权力不同方面的问题。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他们参与8种不同决策的情况，对他们参与每一种决策的形式我们提供4个选择项。我们询问他们对那些由他们的下属执行的不同种类任务所负的责任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他们下属所能执行的奖赏惩罚的类型。我们还详细询问对于每种奖赏惩罚的执行情况，他们的控制和公司更高职位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接着的问题便是去获取这大量的数据并以制作我们在本章所用的阶级图的方式来部署这些数据。

在比较项目中，处理衡量标准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的基本策略是在调研工具中包含大量不同指标。这样做是希望能通过囊括多余的以及可供选择的指标来提高我们构建阶级结构图的精确度。

不幸的是，增加指标的数量只是增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把这许多观察项汇集成一个有用的变量。附录表2.4显示了把职业汇集成技术维度类别的三种不同方法，而附录图2.1显示了权力维度可选的三种操作。在界定阶级结构的技术和权力维度界限的阈限标准的严松程度上，这些方法是不同的。所有这些选择在逻辑上与这个抽象概念是可比的。在技术-1和权力-1中，阈限是以一种产生最小的工人阶级和最大的专家经理类别的方法设置的。这就是说，在技术维度方面，成为一个专家或是一个有技术的人的标准相当松，以至于技术雇员列位于专家类，并且某些技术服务工人列位于技术雇员类别。相似地，在权力维度方面，每个拥有任何一种表明他(她)可能是经理的指标的人列位于经理类，并且每一个拥有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监督职责的人都被看做是监督者。在技术-3和权力-3中，采用的是截然相反的策略：运用了非常严格的标准来界定专家、技术雇

附录表 2.4 技术维度可供选择的操作

职业	不同的技术维度变量		
	技术-1 严的无技术和 宽的专家标准	技术-2 居中的标准	技术-3 宽的无技术和 严的专家标准
1.医生和牙医	专家	专家	专家
2.其他医药职业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3.会计师、审计师	专家	专家	专家
4.教师：初级和中级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5.教师：大学	专家	专家	专家
6.工程师、科学家	专家	专家	专家
7.专门技术人员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8.公共顾问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9.法官和律师	专家	专家	专家
10.创作业、娱乐业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11.公共部门经理	专家	专家	有技术
12.企业经理	专家	专家	有技术
13.其他类经理	专家	有技术	有技术
14.秘书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15.其他办公人员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16.a.销售员：零售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16.b.销售员：批发	有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17.领班	有技术	有技术	无技术
18.手工业业	有技术	有技术	无技术
19.政府保卫人员	有技术	有技术	无技术
20.运输工人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1.除运输业外的技工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2.除农业外的劳工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3.农业劳工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4.白领服务业	有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5.技术手工服务业	有技术	有技术	无技术
26.非技术服务	无技术	无技术	无技术
27.农民	有技术	有技术	无技术

员、经理和监督者。结果便是专家经理类别很小而工人阶级很庞大。技术-2和权力-2是这两极的相互让步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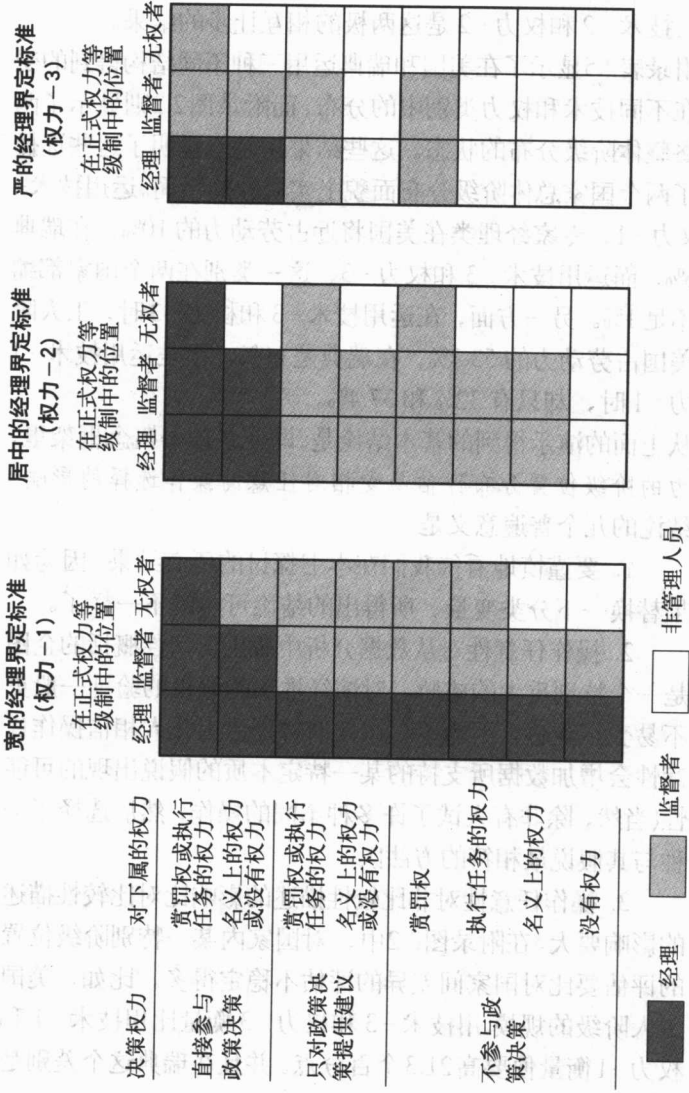
附录表2.5显示了在美国和瑞典运用三种不同结构得到的受访者在不同技术和权力类别中的分布,而附录图2.2则显示了两国最终整体阶级分布的状态。这些结果清楚地说明了这些选择造成了两个国家总体阶级分布面貌上实质性的不同。运用技术-1和权力-1,专家经理类在美国将近占劳动力的10%,在瑞典是7.6%,而运用技术-3和权力-3,这一类别在两个国家都缩小到不足1%。另一方面,在运用技术-3和权力-3时,工人阶级在美国占劳动力的53.3%,在瑞典是60%,但是运用技术-1和权力-1时,却只有32%和37.4%。

从上面的演示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即使在单一概念框架里,劳动力的阶级位置分布评估易受相对任意的操作选择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几个普遍意义是:

1. 要谨慎地看待我们在本书探讨的所有结果,因为如果替换一下分类变量,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了。

2. 操作任意性对从数据分析中做出归纳性概括的企图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威胁。对演绎推出的假设的验证一般更不易受到威胁,因为不存在任何特别原因让人相信操作任意性会增加数据所支持的某一特定本质的假说出现的可能性(当然,除非有人试了许多种不同的操作,然后选择了一种与其假说最相符的方法!)

3. 操作任意性对非比较性描述的影响比对比较性描述的影响要大。在附录图2.2中,对国家内某一特别阶级位置的评估要比对国家间差异的评估不稳定得多。比如,美国工人阶级的规模,用技术-3和权力-3衡量比用技术-1和权力-1衡量便要高21.3个百分点。并且在瑞典这个差别是



附录图2.1 可供选择的权力的操作

22.6个百分点。然而，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在第一种结构是5.4个百分点，在第三种结构中是6.7个百分点。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对国家之间差异的描述比对任何国家内的绝对数值的结果要更有信心。

4. 最后，这种操作任意性严重破坏了一项最受欢迎的阶级分析活动——对可供选择的阶级概念进行比较。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证明了从某些标准上看阶级概念X比阶级概念Y“更好”(如，在回归方程中它有更高的 $R^2$ 或者较少出现异常的类型)，很难证明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更好的概念而不是因为概念X的操作比概念Y的操作更好。正是由于概念不足以决定操作，不同概念操作的经验比较与作为其基础的概念的比较好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直接从这些概念操作的经验观察结论中推断竞争性概念的

附录表 2.5 按不同标准区分的受访者分布

I. 按不同技术标准区分的各类别雇员的百分比 %<sup>a</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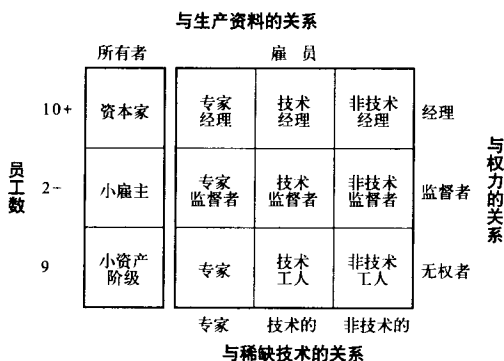
	美国			瑞典		
	技术-1	技术-2	技术-3	技术-1	技术-2	技术-3
专家	25.4	13.5	6.5	26.4	8.2	4.9
有技术者	19.2	27.2	18.8	19.8	29.7	21.5
无技术者	55.3	59.3	74.6	53.8	62.3	13.6 × 73.6

II. 按不同权力标准区分的各类雇员的百分比 %<sup>b</sup>

	美国			瑞典		
	权力-1	权力-2	权力-3	权力-1	权力-2	权力-3
经理	23.3	17.3	9.0	14.3	10.0	5.2
监督者	30.1	20.7	19.8	20.2	11.0	10.0
无权者	46.6	62.0	71.2	65.0	72.1	84.4

a. 这些不同技术变量的操作见附录表 2.4。

b. 这些不同权力变量的操作见附录表 2.1。



**权力和技术维度的操作标准**

技术（技术-1）：  
严的无技术标准  
和宽的专家标准

美国（样本数=1493）

1.8	9.9	2.6	3.9
6.0	6.9	6.7	11.4
6.9	4.8	7.1	32.0

瑞典（样本数=1074）

0.7	7.6	2.2	3.0
4.7	6.8	3.7	7.6
5.4	9.1	11.7	37.4

权力（权力-1）：  
严的无权标准  
宽的经理标准

技术（技术-2）：  
居中的技术  
和专家标准

1.8	5.5	3.7	2.8
6.0	3.1	6.3	7.2
6.8	2.9	13.1	40.6

0.7	3.2	4.1	2.3
4.7	1.3	5.0	4.2
5.4	2.7	17.4	49.1

权力（权力-2）：  
居中的无权和  
经理标准

技术（技术-3）：  
宽的无技术标准  
和严的专家标准

1.8	0.7	2.6	1.3
6.0	1.8	4.3	9.2
6.8	3.1	7.7	53.3

0.7	0.7	2.6	1.3
4.7	0.8	3.6	4.5
5.4	2.8	12.9	60.0

权力（权力-3）：  
宽的无权标准和  
严的经理标准

附录图 2.2 不同的操作下美国和瑞典的阶级分布图

相对一致性存在一定困难。对此,马歇尔、纽拜、罗斯和沃格勒(1988)所著的《现代英国阶级》有一很好的例子。这本由阶级分析比较项目的英国调研小组成员所著的书部分围绕着我的阶级结构概念,运用由约翰·戈德西尔帕提出发展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仔细比较。虽然这在本书很值得注意,但是它的弊端在于不曾注意到可供选择的操作方案相对价值的问题和那些作为其基础的概念自身的问题之间的差别。例如,他们于是批评我的阶级概念图,理由是我把一些人——如带有学徒下属的技术机工——划到“经理类”阶级位置上,这些人本应正确地归作工人(就像戈德西尔帕框架中的这类人那样)。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批评,但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对我研究中所用的操作标准的批评,而不是对区分这两种探讨方法的概念问题的批评。就经理类权力而言,戈德西尔帕和我实质上使用着相同的概念标准;在这两种情况中,关键是真正(不仅仅是名义上)参与制定重大公司政策决策并对下属拥有大量权力。因此,如果带有一个学徒下属的技术机工根据我的操作标准被划入到经理阶级位置上,这也许也是划分错了。然而,由于我的特殊的分析目标,我在实验工作中特别关心的是尽可能避免把经理不正确地算作了工人(例如,我要得出一个相对“纯”的工人阶级类别),因而我有意地采取一套“大方”的操作标准来界定经理类位置。很可能这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目标是一相当不令人满意的操作决策,甚或对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些操作标准的缘故而导致一些人在归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不应归因于我的探讨方法和戈德西尔帕的方法之间的概念差异。

## 如何用较少的问卷项目来衡量阶级结构

本书所采用的衡量阶级结构的策略是对工作和权力的众多不同方面提出了成打的、耗时的问题。对于许多致力于把阶级概念用到他们研究中去的人而言，要涵盖这一大串项目是不可能的。那么，问题便是问卷项目的一个更小的子集制作阶级图(它是由全部的项目集得出的)的近似图这一工作的效果如何的问题，在实践中，这主要是一个简化阶级分类权力维度的衡量标准的问题，因为技术维度主要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其次在有的分析中还加上教育，这二者在大多数的调查中是按例行程序收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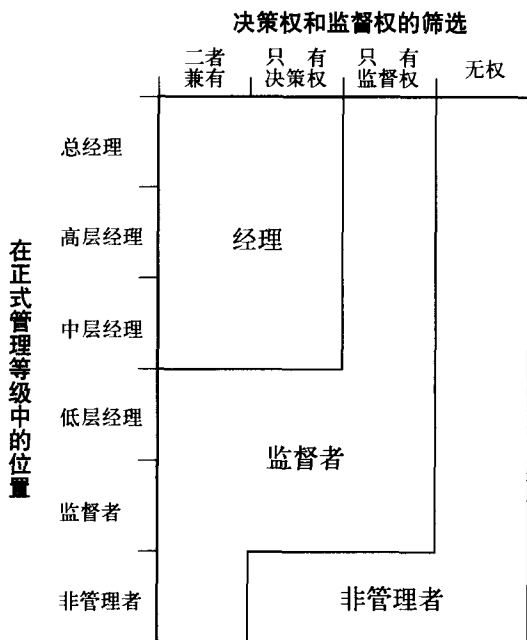
假设你只能问三个问题：(1)正式的等级位置变量；(2)用来筛选一串监督选项的问题；(3)用来筛选一组决策选项的问题。附录图2.3显示了一种把这三个项目汇集成一个阶级分类权力维度的衡量变量的方法。附录表2.6显示了这种相当简单的结构和本章所用的三分法的交叉联表。它还显现了甚至更为简单的关于正式等级变量的三类形式和复杂的权力变量之间的联表。

这个做法的精彩之处是你可以用很少的问题把事情做得相当漂亮。借助这种简单的正式等级变量的三层形式，86%的受访者被归入与附录表2.2和附录图2.1中复杂的操作时他们所处的相同的类别中。当使用这种简单的正式等级变量时，最大的分类问题发生在经理这一类别：有三分之一被复杂的操作处理归为经理的人，根据这种正式等级变量却划为监督者或是没有管理权的雇员。然而，当我以附录图2.2所示的方式加入两个简单的筛选问题时，分类得到相当不错的改进。现在，几乎有94%的人是“正确”地归类了，而且81%被简单的标准划做经理的



人也由更为复杂的操作法划做经理。

考虑询问这么多有关监督和决策的详细问题所花的时间和费用，回过头来看，我希望在阶级分析比较项目中我们由采取这套简单得多的衡量标准。这可能使我们的衡量增添了另外一些错误，至少如果一个人认为我们当前所用的操作方法拥有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了错误，情况确实是如此。但是它却开辟了更广阔的调查空间，使我们可以问一些其他那些原来由于时间限制而不能问的问题。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在将来有兴趣做这类调研的人而言，使用如附录图 2.2 中的这套更加有限的问题，其损失会相对小些。



附录图2.3 只用三个项目的权力维度操作

附录表 2.6 简单的和复杂的权力操作对比

		与权力的关系		
		以等级制中的正式位置作为惟一标准 <sup>a</sup>		
		经理	监督者	非管理人员
复杂操作 与权力的关系	经理	67.1 (7.3) <sup>b</sup>	0.0 (0.0)	0.0 (0.0)
	监督者	25.3 (2.8)	85.7 (17.5)	10.8 (7.4)
	非管理人员	7.6 (0.8)	14.3 (2.9)	89.2 (61.2)
总计 %		100.0	100.0	100.0
样本数		137	254	855
		与权力的关系		
		根据正式等级位置、监督筛选和决策筛选划分 <sup>c</sup>		
		经理	监督者	非管理人员
复杂操作 与权力的关系	经理	81.2 (7.3)	0.0 (0.0)	0.0 (0.0)
	监督者	17.8 (1.6)	95.0 (22.5)	5.4 (3.6)
	非管理人员	1.0 (0.1)	5.0 (1.2)	94.6 (63.6)
总计 %		100.0	100.0	100.0
样本数		113	294	836

a. 正式等级的位置问题中高级经理、高层经理、中层经理归做“经理”；低层经理和监督者归做“监督者”。

b. 括号中的数字是整个表算作一单元时的百分数。

c. 关于这个变量的构建见附录图 2.2。

## 第三章

### 1960~1990年美国阶级结构的转变

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统治着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转变的讨论。<sup>1</sup>第一种是与这样的理念相联系的，即现代技术变化极大地改变着社会和经济结构，使得我们正走向那个有着不同命名的社会，如“后工业社会”(贝尔，1973)、“程序化社会”(图雷恩，1971)、“服务社会”(辛格尔曼，1978；富曲斯，1968)等诸如此类的名称。第二种印象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化观，认为尽管“生产力”发生了这些转变，但我们仍然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阶级结构的变化仍然继续由资本主义基本的“运动规律”所推动。

人们一般展望着这样一种社会转变的后工业景象：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对这当中的一些理论家而言，标志着这种趋势的中心过程便是经济从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转向了以服务业为基础。于是，富曲斯(1968: 189)在一较早的有关服务社会前景的声明中把工业化社会和服务社会进行了比较，观点如下：

工业化使得工人与他的工作相隔离，个人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且从一个手工业社会转向一个大生产社会导致了工作的个人特征的丧失……[然而]服务业中经常出现的顾客和工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了一个更完整的人和满意的工作体验的可能性。

其他的理论家更加强调在物质生产自身内部那些摆脱种种束缚的技术—科学革命的影响。雷多旺·里赫塔和他的同事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详尽阐述了这种立场观点，里赫塔及其同事认为自动化：

把[工人]从他那仅仅是机械系统上的一个齿轮的这种角色中解救出来，并为他提供了技术系统的鼓动者、创造者和主人能使他处身于现场生产程序之外的位置……我们可以设想，科学和技术革命的进展首先吞没的将是包括手工的看管机器在内的技工类工作，紧接着是那些不太复杂的规章制度活动和控制活动——总而言之，传统的简单的工业工作，只要人们不再需要它或没有外部的需要而去实施它，那它就将减少到这么一种程度，即少到人们不再有想干这工作的需要。这样，当人类停止做那些可以为他服务的事情时，他就可以盼望他们的日常职业就是做那些创造性活动、那些能发挥他所有的能力的活动——充满着科学成分、发现、发明、开拓和对人的能力的培养的活动。

虽然里赫塔和他的同事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制约，这种趋势不能完全实现，但他们仍然觉得朝这个方向的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工作转变的特征了。结果是这样一个变化

轨迹，即这些变化通过有步骤地为雇员提供更多对他们工作条件的控制权和工作上的自由，消除了生产内财产权转让的物质基础。就阶级而言，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减少了，而各种各样的专家和管理类阶级位置扩大了。

后工业社会理论早期的言论倾向于描绘出一幅非常美好的阶级关系的未来变化轨迹的画面。这个一般观点更近期的一些表述倾向于表达一种更加矛盾的心理。比如，罗伯特·里奇(1991)就看到了出现一个两极分化更严重的社会的潜在性，这个社会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富裕的“符号分析者”阶级和一个越来越贫困的“日常机械性生产工人”与“在场服务员”阶级构成。在他所认为的最悲观的前景中，这些符号分析者实质上是脱离了国家社团，抛弃了大多数有利于私立教育、私立公园和私人警察的公共服务业，还脱离了占人口4/5左右在绝望中挣扎着的最底层的人们。

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转变的描述几乎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完全相反：工作两极分化程度愈发地严重了；技术专家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变成了机械常规化，甚至波及到了技术性甚至专门性职业；并且责任心在工作中的意义变小了。这种观点在布雷维尔曼那本极有影响的《劳动和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中得到了最清楚的展现。基本观点可表述如下：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剥削和统治的过程，因此资本家便一直都面对压榨工人劳动努力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可用的社会控制策略宝库中，关键武器之一便是降低工作级别，也就是使直接生产者与技术 and 处理权相分离。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是趋向于加强劳动过程的两极化特征。从阶级结构方面看，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将扩大，技术雇员和专家将减少，而监督性劳动将随着强化社会控

制需求的强化而增长。

本章试着运用美国1960~1991年人们阶级结构分布变化的定量数据作为一种调停这个争论的方法。我将在3.1节列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理论假说，这些假说的内容是那些根据后工业社会理论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而推得的不同阶级位置上的变化。3.2节将解释我们将要采用的经验策略。3.3节展示基本结果。

### 3.1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预测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测之比较

后工业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变化概念上的争论可以看做是关于阶级结构中不同位置的相对扩大和缩小问题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观点。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尤其是劳动者贫困化理论和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理论，指出了三个直接影响劳动力分布的趋势。第一，资本主义的扩充将摧毁独立的、自我雇佣的生产者。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前半叶这个过程对农业部门中的自我雇佣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在，这个过程正普遍影响着所有经济部门。这预示着小资产阶级将稳步减少。第二，随着小规模资本主义公司的被摧毁和大公司的成长，资本积累的动力将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增长。这个趋势将预示着小雇主的减少及管理者的增多，特别是那些身为公司管理机构的专家管理者。第三，就像前面曾提到过的那样，为了加强对劳动的控制以及对劳动努力的压榨，资本家有减少技术劳动自主权并在可能的地方用非技术劳动来代替技术劳动的动力。这便要求扩充生产中的社会控制机构来监控和监督那些

日益被剥夺了生产知识的工人。知识从技术工人方挪到了经理方必然导致了专家经理类别的扩大。劳动过程中两极分化加剧的这些趋势将预示着工人阶级的扩大，监督者、经理和专家经理的增多，以及(非管理类)专家和技术工人的减少。

后工业社会理论并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不同位置转变的假说。后工业社会对两类自我雇佣的预测尤其不明确。一方面，一些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在赞同韦伯主义关于权力官僚化和集中化的观点的同时，也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将减少的预测。另一方面，许多服务业——特别是那些人力资本有着特别重要性的服务业——的资本密集度较低，这可以被认为是为那些自我雇佣的顾问和其他以知识为中心的小企业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由于这些并非后工业理论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我就不去探究对这些类别的正式预测了。

对各类雇员变化的预测可以更清楚地从后工业主义的逻辑中推导出来。后工业理论预测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与工业资本主义相比，人们的工作拥有多得多的自我管理权和自由，这表明他们预测纯粹的监督劳动(如不属于经营管理决策机构工作中的社会控制的位置)将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他们预测管理类位置将会随着组织和决策的复杂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上文列出了后工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论点之间相差最大的地方，是对专家、技术工人和工人的预测。作为进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经济的伴随物，后工业理论家一般会预测到那些要求具备高水平专长和自主性的工作的大量增多。这表示的是一个劳动者逐步摆脱贫困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专家和专家经理阶级位置稳步扩大并且核心工人阶级相应缩小。在那些还需要手工劳动的领域中，将不断增加其技巧方面和技术方面的特征，

因而高技术工人的数量也应增多。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展望的基本假说归纳如表 3.1。

### 3.2 方法策略

本章所用的分析技术有时称为“变化分担”分析。<sup>2</sup>这个过程把劳动力的阶级构成中跨时间的整体变化分成三个成分：“部门变化”成分、“阶级变化”成分和相互作用成分。其中第一个表示跨经济部门变化中劳动力分布所导致的阶级结构变化部分。例如，历史上农业部门曾是小农场主这种形态的小资产阶级格外集聚的地方。于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农业部门规模的相对萎缩对小资产阶级的相对规模会产生不利影响。这在我们的分析中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负的部门变化”。“阶级变化”指的是那种不管部门相对规模如何变化而由经济部门内阶级构成

表 3.1 美国阶级结构转变的假说

阶级位置	阶级分布变化预测	
	传统马克思主义 的预测	后工业理论的 预测
两种理论预测不同的阶级位置		
工人	增多	减少
技术工人	减少	增多
监督者	增多	减少
专家(非管理者)	小量减少	大量增多
两种理论预测相似的阶级位置		
经理	增多	增多
专家经理	增多	大量增多
预测上没有明确分歧的阶级位置		
小资产阶级	减少	不曾预测
小雇主	减少	不曾预测



变化所致的阶级结构的变化。例如，夫妻店逐步为连锁超市所替代将会在零售商业部门内产生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的负的阶级变化，以及经理和监督者的正的阶级变化。最后，有些阶级结构的变化不能单一地归因于部门内的变化或劳动力的部门构成的变化。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致。阶级分布整体变化中的这一部分便称作相互作用成分。

变化分担方法依赖于反现实的阶级—部门列联表的构建，并且依赖于表中所示的整体阶级分布与现实中真正出现的阶级分布的比较。于是，为了测算1960年到1970年之间“部门变化”，我们先假定这十年中部门内的阶级分布保持不变，但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分布像现实那样发生变化。接着，我们在这个假定上运用1970年劳动力的真实规模数据构建一个阶级—部门列联表。然后，我们把某一特定阶级的反现实的规模评估与这个阶级真实的规模进行比较。这两个数字间的差就是“部门变化成分”。对“阶级变化成分”的测算是运用相似的方法，即假定部门内的阶级分布像它们在这两个十年间发生的那样发生变化，而部门分布保持原样，并在这基础上构建一个虚构的阶级—部门列联表。“相互作用成分”便是每一阶级规模变化中仍未得到解释说明的部分。

### 3.3 结 果

由于样本规模所限，在本章分析中，12类别的阶级结构矩阵就折叠成一个更为简单的8类别的模型，如图3.1所示：雇主、小资产阶级、经理、监督者、专家经理、专家、技术工人和工人。<sup>3</sup>我们还要考察把工人和技术工人进行合并的结果。这种8类别的分类法略去了权力等级中技术和非技术两类别之间的区

别和专家类别中非管理人员和监督者之间的区别。评估 1960 ~ 1990 年这段时期里经济部门中这些阶级分布的方法详见本章方法附录中的讨论。

贯穿我们全部分析的关注对象主要是挣工资者中的不同阶级类别而不是雇主和小资产阶级。这并不表示影响这些自我雇佣阶级类别的变化不令人感兴趣或不重要，只是说它们并非是正在讨论的无产阶级化这个论题的理论探讨对象。美国自我雇佣的历程问题将在第四章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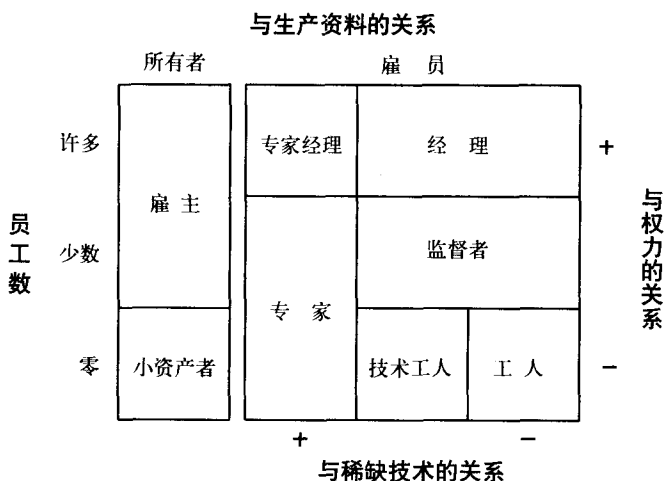


图3.1 阶级结构转变分析所用的阶级类别

表 3.2 显示了 1960 ~ 1990 年之间阶级分布的基本时间序列数据。表 3.3 显示了变化分担分析的结果，图 3.2 显示了经过选择的阶级位置。表 3.3 的数字显示了把每一阶级位置的人 10 年分布变化率分解成各个相应归属的变化分担分解成分的情况。以经理阶级位置在 1980 ~ 1990 年这 10 年中的情况为例。1980

年,有7.95%的劳动力是(非专家)经理。199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8.25%。这表示10年的变化率是3.76%(8.25减去7.95,再除以7.95)。<sup>4</sup>这个增长率中,1.88个百分点应归因于阶级变化成分(这表示10年中经理比例在38个经济部门的每个部门的平均增长率是1.88%),1.58个百分点应归因于劳动力在这些部门中的变化,这些部门是经理最常出现的部门。余下部分(0.30百分点)构成了剩余的相互作用成分。

表 3.2 1960~1990年美国的阶级分布

阶级位置	1960	1970	1980	1990
非所有者				
1. 经理	7.50	7.57	7.95	8.25
2. 监督者	13.66	14.86	15.23	14.82
3. 专家经理	3.87	4.41	5.06	5.99
4. 专家	3.53	4.53	5.49	6.90
5. 技术工人	13.46	14.08	12.92	12.77
6. 工人	44.59	45.13	44.05	41.38
全部工人(5, 6)	58.08	59.21	56.97	54.15
所有者				
7. 小资产者	5.54	4.09	4.53	5.19
8. 雇主	7.86	5.33	4.77	4.71

## 20世纪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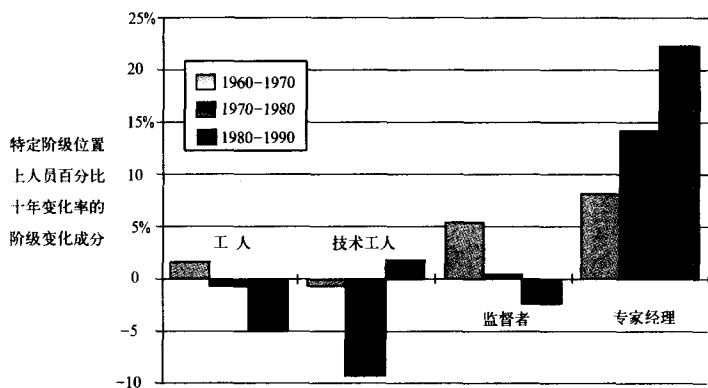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理论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就像两种观点都预测的那样,这10年中经理和专家经理都增多了,自我雇佣中的两个阶级位置也都像二者所预测的那样减少了。然而,其他结果却给这两种观点提供了相互

表 3.3 阶级结构变化率的分解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90	(%)
阶级位置	阶级效应	经济部门 效应	相互作用 效应	总效应
1960 ~ 1970				
1. 经理	3.23*	-1.76	-0.87	0.60
2. 监督者	5.19	3.37	-0.81	7.75
3. 专家经理	7.94	6.47	-0.50	13.91
4. 专家	14.36	13.73	0.14	28.22
5. 技术工人	-0.78	7.64	-0.91	5.95
6. 工人	1.55	-0.55	0.21	1.21
全部工人(5, 6)	1.01	1.35	-0.05	2.31
7. 小资产阶级	-15.42	-12.55	1.83	-26.14
8. 小雇主	-19.04	-14.67	1.50	32.21
1970 ~ 1980				
1. 经理	3.57	0.71	0.71	4.99
2. 监督者	0.38	2.09	0.03	2.50
3. 专家经理	13.93	0.54	0.19	14.66
4. 专家	15.90	4.02	1.34	21.26
5. 技术工人	-9.22	0.63	0.32	-8.27
6. 工人	-0.75	-1.37	-0.28	-2.40
全部工人(5, 6)	-2.76	-0.90	-0.13	-3.79
7. 小资产阶级	11.69	-0.18	-0.58	10.93
8. 小雇主	-9.41	0.37	-1.44	-10.48
1980 ~ 1990				
1. 经理	1.88	1.58	0.30	3.76
2. 监督者	-2.45	-0.38	0.14	-2.69
3. 专家经理	22.04	-1.96	-1.69	18.39
4. 专家	24.71	1.41	-0.50	25.62
5. 技术工人	1.63	-2.38	-0.45	-1.20
6. 工人	-5.17	-1.20	0.32	-6.05
全部工人(5, 6)	-3.63	-1.47	0.15	-4.95
7. 小资产阶级	4.58	8.56	1.32	14.46
8. 小雇主	-8.17	8.41	-1.57	-1.33

- a. 表中各项目给出了特定阶级位置中的人们的比例 10 年中整体变化的 3 个成分。这些项目可理解为每个 10 年中源于阶级效应、经济部门效应和相互作用效应的阶级位置相对规模的变化率。

矛盾的证据。因此，像后工业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专家阶级位置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扩大，这既是由于部门内阶级构成的变化所致，又是由于劳动力在部门间分布的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与后工业理论相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相一致的是，这10年中，工人阶级和监督者阶级位置都扩大了。技术工人的情况不论与哪种预测都不完全相符：虽然像后工业理论所预示的那样，这一阶级位置整体上确实扩大了(增长了近6%)，但是又如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退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有一个小小的负阶级变化成分(表示在经济部门内技术工人的比例下降)。这样，在整体上20世纪60年代提供了一个混合的结果，虽然总的来看对后工业理论的预测的支持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的支持也许要多些。



注：数字表示的是经济部门内部阶级分布变化导致的特定阶级位置上的人员百分比变化的比率。

图3.2 一些特定阶级位置上阶级分布的各个十年变化率的阶级变化成分

##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结果稍微明确些。20世纪70年代，专家经理、专家和经理的相对规模继续扩大。虽然监督者也在增多，但是其增长率较之于20世纪60年代要低得多。尤其是监督者中的阶级变化成分，20世纪60年代是5.19，20世纪70年代下降到接近于零。这符合后工业的思想，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而且，20世纪70年代工人阶级减少，这既是由于部门内变化所致(负的阶级变化成分)，又是由于人们在部门之间分布的变化所致。对20世纪70年代而言惟一一个可认为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超过支持后工业理论的结果，是关于技术工人类别的情况，这一类别在这10年中下降得相当迅猛。就像劳动退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这种下降在阶级变化成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又一次表明了部门内技术工人的相对下降)。然而，是专家而不是核心工人阶级的增长完全抵消了技术工人的减少，甚至连这个结果也是更符合后工业理论的观点的。

## 20世纪80年代

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结果中的任何模糊不清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都消失了，因为在这个10年中，我们所得到的几乎就是后工业理论对不同挣工资的阶级位置变化的样子所作的预测。<sup>5</sup>工人阶级位置整体下降率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还要大，甚至是更显著，尽管这样，但是负的阶级变化分量还是大得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为-5.17%，而20世纪70年代只是-0.75%)。就像后工业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现

在技术工人有一个正的阶级变化成分，而监督者有一个负的阶级变化成分。惟一令后工业理论有点吃惊的重要结果是专家经理类有一小小的负的部分变化成分，但是极其巨大的阶级变化成分完全扭转了这种情况，并在这个阶级位置中出现了很大的整体增长率。

这些结果有可能不符合逻辑吗？

那么，从整体上看，这些结果的主要走向直接违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预测，这些预测根据假说具体化成表 3.1。而且，假定相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那么经典马克思主义就会预测劳动退化的压力将会加强。而这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结果中的证据表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非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加快了。虽然这些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工人阶级正在消亡的迹象——1990 年，核心工人阶级仍超过劳动力的 40%，加上技术工人，扩大了工人阶级占劳动力的 54%——较之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变化轨迹还是更符合后工业理论的预测。

由于这些结果不约而同地违背了我的理论预测，我探讨了若干可能的方法，以期用这些方法来表明这些结果是相互矛盾的。首先，我考察了那些可供选择的区分阶级的操作，看它们是否会影响这些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我查看预测的失败是否是把对正式技术水平的依赖当做引发无产阶级化的方式的结果。布雷维尔曼的概念更关注的是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权问题，而不是证书和可售的技术本身。在我早期的阶级分析中，我曾通过把“半自主的雇员”类别引入到阶级结构概念中来阐述这个思想。如果用“半自主雇员”来

代替“专家”类别。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明显的非无产阶级化确实有可能消失。这又一次说明，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比较而言，运用两种探讨方法，这些结果的实质从所有的实践目标来看都是一致的(赖特和马丁，1987:17)。

最后，我对这些结果是失业率变化产物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如果阶级之间的失业率有显著的差别，并且这些失业率在不同的10年期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那么那些表面上的工人阶级的减少可能只是就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比例的变化。1980年和1990年比1970年和1960年有着更高的失业程度，必定就是这种情况，而这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表3.3的一些或所有的形式。我用两种方式探讨了失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情况的可能影响：第一，我把失业者划入他们失业前的工作所属的阶级和部门位置(这样失业工人也包括在工人阶级中)；第二，我把失业者算作分析中一个特殊类别。这又一次说明，虽然这些结果在细节上有些差别，但是它的基本形式仍与表3.3一样(赖特和马丁，1987:18)。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分析的含义就是：这些结果更符合的是我所理解的“后工业社会”的假说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的论点。

### 细化了的部门分析

为了加强这个结论的说服力，在数据分析中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最后步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考察了不同阶级位置合并的阶级和部门变化。知道这些影响是大量存在于某些特殊部门中还是散布在整个经济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将影响到对这些结果的整体解释。表3.4把表3.3的阶级和部门变化分成了6个不同的汇总部门：天然生产部门、制造部门、分配部门、商



业性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社会政治服务业。<sup>6</sup>表 3.4 显示的这些结果极其复杂，我不想全面探讨它们的含义。然而，有几条一般的观察结论是与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有关的。

第一，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的负阶级变化成分——经济部门内的非无产阶级化过程——可在这 6 个汇总部门中的 4 个中观察到，它不仅仅是一个部门内巨大变化的结果。在两个 10 年中，对工人阶级负的阶级变化做出最大贡献的都是制造部门(生产和加工)。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有一个部门的工人的阶级变化是负的。因而，虽然总体上工人阶级的阶级变化成分的方向是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正向(无产阶级化)变成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负向(非无产阶级化)，但是在制造部门中，非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实在 60 年代就已经发生了，而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个过程继续加速进行。

第二，专家和专家经理几乎在所有这些大部门中都有着正的阶级变化成分。一贯例外的只有分配服务业部门，经理在这个部门的三个 10 年中的阶级变化成分都是负的。因此，这些需具备大量资格证书和专长的阶级位置的扩大遍及各部门，这是与后工业理论相一致的。

第三，部门变化形式也大致符合后工业理论的预测：经理、专家以及专家经理的增多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政治服务业的膨胀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商业服务业的增长有着最为密切联系，而工人阶级、技术工人和监督者在这些年代中的减少大部分是与制造部门就业人数的减少有关。

最后，专家和专家经理特殊的部门和阶级变化方式是那些强调在后工业经济中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的后工业理论家的预测相一致的。以社会政治服务业(特别是医疗服务业)增长为中心的就业结构的部门变化和部门内这些阶级位置的增

表 3.4 美国阶级分布变化的阶级变化—部门变化成分的分解列表, 1960 ~ 1990<sup>a</sup>

阶级位置	天然		制造业		分配		商业性		社会政治		个人		总计 <sup>b</sup>
	生产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服务业	
1960 ~ 1970													
1. 经理													
部门成分	-2.73	-1.38	0.25	1.32	8.99	-8.19	-1.76						
阶级成分	1.38	0.75	0.79	0.77	-1.34	0.88	3.23						
2. 监督者													
部门成分	-2.01	-2.83	0.63	1.91	5.70	-0.03	3.37						
阶级成分	1.52	1.92	1.40	0.46	-0.63	0.51	5.19						
3. 专家经理													
部门成分	-0.33	-2.78	1.66	2.96	5.20	-0.24	6.47						
阶级成分	0.56	4.25	-0.01	0.05	4.15	-0.08	7.94						
4. 专家													
部门成分	-0.45	-1.97	0.58	4.12	11.54	-0.09	13.72						
阶级成分	0.91	4.87	1.20	1.12	6.41	-0.14	14.36						
5. 技术工人													
部门成分	-0.32	-2.93	0.07	0.51	10.36	-0.05	7.64						
阶级成分	0.40	-0.12	1.00	0.13	-2.54	0.34	-0.78						

续表

6. 工人									
部门成分	-1.71	-3.16	0.50	1.45	3.85	-1.48	-0.55		
阶级成分	0.37	-1.03	0.70	0.12	0.77	0.62	1.55		
全部工人(5, 6)									
部门成分	-1.39	-3.10	0.40	1.23	5.36	-1.15	1.35		
阶级成分	0.38	-0.82	0.77	0.12	0.00	0.56	1.01		
7. 小资产阶级									
部门成分	-14.87	-1.10	0.44	2.46	1.06	-0.54	-12.55		
阶级成分	-3.86	-0.92	-3.38	-2.24	-2.92	-2.12	-15.42		
8. 雇主									
部门成分	-16.89	-1.05	0.92	1.69	0.19	0.46	-14.67		
阶级成分	-4.73	-1.63	-6.54	-1.37	-0.51	-4.25	-19.04		
1970~1980									
1. 经理									
部门成分	-0.54	-1.47	-0.51	2.28	3.75	-2.79	0.71		
阶级成分	0.05	2.61	-0.08	-0.19	-0.66	1.84	3.57		
2. 监督者									
部门成分	-0.25	-2.52	-0.68	2.65	1.87	1.01	2.09		
阶级成分	0.65	1.00	0.38	-0.75	-1.39	0.48	0.38		

续表

3. 专家经理													
部门成分	0.17	-3.40	-0.55	3.22	1.06	0.04	0.54						
阶级成分	0.51	8.62	-3.08	1.19	6.07	0.63	13.93						
4. 专家													
部门成分	0.27	-1.92	-0.15	3.52	2.24	0.06	4.02						
阶级成分	0.74	2.18	-0.58	5.97	7.29	0.30	15.90						
5. 技术工人													
部门成分	0.23	-2.83	-0.38	0.77	2.34	0.50	0.63						
阶级成分	0.56	-5.41	-0.46	-0.52	-3.17	-0.23	-9.22						
6. 工人													
部门成分	-0.13	-3.81	-0.97	2.07	1.43	0.03	-1.37						
阶级成分	-0.20	-0.76	0.58	-0.42	0.42	-0.38	-0.75						
全部工人(5, 6)													
部门成分	-0.04	-3.58	-0.83	1.76	1.65	0.14	-0.90						
阶级成分	-0.01	-1.86	0.33	-0.44	-0.43	-0.34	-2.76						
7. 小资产阶级													
部门成分	-3.79	-0.57	-1.25	4.35	1.04	0.05	-0.18						
阶级成分	-0.84	4.44	5.51	1.31	-0.69	1.97	11.69						

续表

8. 雇主													
部门成分	-4.64	-0.42	-1.08	2.94	1.69	1.88	0.37						
阶级成分	-2.14	1.82	-5.83	0.25	-1.08	-2.43	-9.41						
1980 ~ 1990													
1. 经理													
部门成分	-0.54	-2.60	0.18	1.93	1.12	1.49	1.58						
阶级成分	0.25	-0.42	-0.08	-0.12	0.68	1.58	1.88						
2. 监督者													
部门成分	-0.72	-4.16	0.31	2.31	0.44	1.45	-0.38						
阶级成分	0.41	-0.80	-0.88	-0.06	-1.46	0.34	-2.45						
3. 专家经理													
部门成分	-0.43	-6.62	0.31	3.13	0.82	0.83	-1.96						
阶级成分	0.82	14.21	-3.62	2.67	7.32	0.64	22.04						
4. 专家													
部门成分	-0.59	-3.78	0.05	4.78	0.58	0.37	1.41						
阶级成分	0.78	8.92	1.80	3.01	9.57	0.62	24.71						
5. 技术工人													
部门成分	-0.86	-4.58	0.11	0.55	1.19	1.21	-2.38						
阶级成分	-0.17	2.17	-0.33	0.22	0.18	-0.45	1.63						

续表

部门成分	-0.43	-5.50	0.49	1.94	0.85	1.45	-1.20
阶级成分	0.19	-3.58	0.93	-0.91	-1.48	-0.32	-5.17
全部工人(5, 6)							
部门成分	-0.53	-5.29	0.40	1.63	0.92	1.40	-1.47
阶级成分	0.11	-2.27	0.65	-0.66	-1.10	-0.35	-3.63
7. 小资产阶级							
部门成分	-1.34	-0.26	0.64	4.26	1.23	4.03	8.56
阶级成分	-1.40	2.97	0.21	1.34	-0.66	2.11	4.58
8. 雇主							
部门成分	-1.93	-0.39	0.47	3.78	3.28	3.20	8.41
阶级成分	-3.47	2.22	-3.22	0.70	-1.45	-2.95	-8.17

a. 表中各项目表示每个经济部门对每一阶级 10 年中阶级和经济部门成分总变化率的贡献。这些项目可理解为每个经济部门对源于阶级变化和经济部门变化的阶级相对规模 10 年变化率的贡献。

b. 这个栏目是各个经济部门的成分的加总；其项目与表 3.4 各项相对应。各个经济部门项目加总的任何偏差都源于四舍五入。

长对20世纪60年代阶级结构中专家和专家经理的增多几乎起了同等的推动作用。相反,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阶级位置的相对增长几乎完全是部门内——特别是制造部门和社会政治服务部门——阶级构成变化的产物。这是与下面的思想相一致的,即,甚至在经济中的制造部门里,知识和信息在后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也日益集中。

### 3.4 解释和意义

本章显示出来的结果向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一般的发展轨迹的预测,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化加剧这种过程的预测提出了真正的挑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相反,在过去的3个10年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减少了,并且看来这种减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正在加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减少不仅仅是一个就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问题;制造部门本身这种减少也在加速。近几十年中工人阶级内部本身的工作条件在恶化并且随着真实工资的下降剥削在增加,虽然这仍是真的,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结构内无产阶级化正在扩大和深化的预测。

对这个挑战的一个回应是通过论证这些结果是所运用的衡量标准的产物来对结果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以20世纪80年代的部门内部阶级—职业分布为根据,1960年和1970年的阶级结构成因的过程必定要受到质疑。这个过程隐含的假设条件是特定职业—部门类别中的挣工资者的阶级分布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如果在这种具体类别中有过显著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那么我们的结果就会被相当严重地歪曲了。职业—部门类别内部的这种无产阶级化意味着,我们明显高估了1970年这些类别中

工人的比例，而且对1960年的高估甚至更严重，却低估了1990年的工人的比重。如果这些高估和低估足够严重，那么如果光看劳动力分布3个10年中在职业和部门间是如何变化的，就有可能发生下面这种情况，即：用这种方法显示的是工人阶级规模在下降而现实中它却是确实实实在上升了。<sup>7</sup> 我们无法立即排除这种可能性。可是，在缺乏特定证据证明存在着明显改变我们评估的巨大的衡量偏差时，这些结果仍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化正在继续的预测的一个尖锐的挑战。

第二个回应是接受这些结果，但是辩论道，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具有国际特征，这使得在单一国家内去研究阶级分布的转变不再合适了。最近20年，跨国公司在第三国的工业投资确实是在急剧增长，并且伴随着这个过程，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工人阶级在扩大(见弗罗贝尔及其合伙者1980; 纳什和费尔南德斯-凯利 1983; 沃伦, 1980)。许多关于美国“非工业化”的讨论是伴随着关于资本逃向第三世界、边界工业、工业出口区和第三世界中的其他工业发展形式的辩论(布卢斯顿和哈里森, 1982; 纳什1983)。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理论是一个关于如上所说的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结构变化轨迹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单位中变化轨迹的理论。因此，在一个资本迅速国际化的时期中，国家的统计数据可能会提供一个歪曲了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转变的印象。

如果这些辩论正确，那么，可以预测世界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将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均等地分布。特别地，至少经理类阶级位置和专家阶级位置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倾向于增长得更快，无产阶级的位置在第三世界国家倾向于增长得更快。在表3.4，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散的分解项中专家经理最大的正阶级变化成分是出现在制造部门——同时这个部门还有



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专家经理最大的负部门变化——这个事实符合这些转变反映着资本全球化的一般过程这个假说。类似地，20世纪80年代专家的阶级变化在制造部门特别大(仅次于社会政治服务部门，居第二)。如果能够衡量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阶级结构，那么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全球范围的无产阶级化的时期，这可能是真的。

对这些结果的最后一个回应是承认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正以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加深的理论未曾预测到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虽然从工人那榨取劳动努力的问题仍是阶级关系的一个议题，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这不再导致出现劳动退化的必然趋势了。相反，就像皮奥里和萨贝尔(1984)曾认为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第二工业分界”之中，这个阶段要求劳动力要具备比以“福特制”为特征的生产高得多的技术培训水平和工作自主权，这类培训使工人能够灵活适应技术和工作组织的迅速变化。20世纪80年代制造部门中技术雇员正的阶级变化(+2.17)——这与20世纪70年代同一类别在同一部门的相当大的负阶级变化(-5.41)正相反——是与前面的解释相一致的。

这些走向并不表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比它的前辈更缺少任何资本主义特性；剩余仍被资本家占有；投资还是根据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工人还是被排除在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之外。它们并不表示工人阶级的消除近在眼前了。尽管存在着我们所看到的下降，但是1990年工人阶级仍占劳动力的40%左右，若加上技术工人，扩大了工人阶级仍然超过了50%。然而，这些结果真正要表示的是这样一条变化轨迹，即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中的矛盾位置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除非这些走向只是一暂时的迂回，否则，看

来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正继续日益复杂化而不是被简化为单一的两极分化的阶级对立关系了。

## 方法附录

### 经济部门变量的操作

经济部门是由一个相当细致的38类别的变量来衡量的。这种经济部门分类法是源于赖特和辛格尔曼所用的分类法(1982)，而他们所用的分类法又是以布朗宁和辛格尔曼(1978)的著作为基础的。对早期的分类法有一个地方作了修改。在1990年以前，大多数从事家庭儿童照看的人被划到旅馆和房屋出租部门中。1990年引入了一个新的部门“家庭儿童照看服务业”。由于实质上100%的家庭儿童照看服务业中的人是自我雇佣的，除非给更早的那些年份创造一个儿童照看服务业，否则20世纪80年代这类服务业的大量增长，从表面上显示的只是旅馆和房屋出租部门内部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不是部门之间自我雇佣者分布的变化。于是，我找出所有职业是儿童照看工作而不管他们原来所在的部门类别是什么的人并把他们并入到儿童照看服务部门，通过这种方式我为1970年和1980年创造出了一个儿童照看服务部门。运用1960年的数据无法做这个工作，因为那年儿童照看职业还没有独立确定。于是，儿童照看服务只有在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普查中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因此，在1960~1970的分析中，我们只区分为37个部门。

虽然所有的变化分担分解项都根据这些详细部门变量测算出，但为了某些目的，这些部门被集中到6个更一般的标题下：天然产业、制造业、分配服务业、商业性服务业、社会政治

服务业, 以及个人服务业。每一标题下所包含的部门名录见附录表 3.1。

附录表 3.1 经济部门分类

I. 天然生产业	19. 会计
1. 农业	20. 其他
2. 矿业	
	V. 社会政治服务业
II. 制造部门	21. 法律服务
3. 建筑业	22. 医疗服务
4. 食品	23. 医院
5. 纺织	24. 教育
6. 冶金	25. 福利
7. 机械	26. 公益事业
8. 化工	27. 邮政
9. 其他制造业	28. 政府
10. 公用事业设备	29. 儿童照看服务业
	30. 其他社会服务业 <sup>a</sup>
III. 分配服务业	
11. 交通运输	VI. 个人服务业
12. 通讯	31. 家庭服务业
13. 批发业	32. 旅馆
14. 零售业	33. 饮食
	34. 修缮
IV. 商业性服务业	35. 洗衣店
15. 银行业	36. 美容美发店
16. 保险业	37. 娱乐业
17. 房地产业	38. 其他个人服务业
18. 工程	

a. 儿童照看服务只有在 1970、1980 和 1990 年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因此, 1960 - 1970 年的分析是建立在 37 个部门分类的基础上。

## 阶级结构的衡量

由于阶级结构这个概念的许多主要标准都不存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时间序列，要精确地衡量阶级结构变量特别困难。通过把1980年收集的《阶级分析项目》跨部门的有关阶级结构的数据与1960、1970、1980和1990的普查数据相联系，去估计早期的阶级分布，而本分析便依赖于这个估计策略。根据这些推断的阶级分布，便产生了变化分担分析所需要的阶级—部门列联表。

产生这些推断估计的第一步是要从1980年美国阶级分析项目数据中得出经济部门内的阶级—职业分布表。然后，我们运用从1980年阶级分析项目中得到的这些分布去估计1960、1970、1980和1990年统计数据中公共使用的样本在部门内的阶级分布。估计策略的具体细节见赖特和辛格尔曼(1982: 192-193)。基本上，我们是假设职业—部门列联表中的各栏内的阶级分布在各统计期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在这个假设下，我们便能运用1980年的阶级分析项目的分布把四个时点上在职业—部门统计表各栏中的人们按比例分配到各个阶级里。例如，如果在1980年阶级分析项目数据中70%的耐用品制造业中专门人才是经理，那我们就会把每一统计表相应栏目中的70%的人分配到经理阶级这一位置上。实际上，这个程序是以1980年阶级结构项目数据中这些部门内阶级—职业实际分布为依据，把统计数据中38个经济部门的每一个部门中的人从职业类别重新分配到了阶级类别里。这些重新配置使得我们得以制造出所需要的四个时点上的阶级—部门列联表。

当阶级结构项目数据中某个特殊的职业—部门栏目里的实

例数目太小,以至于无法对阶级分布做出可靠的估计时(如实例数目小于十),我们假设这个栏目的阶级分布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具体部门所属的较大的经济部门的分布是一样的。如果这个较大部门的实例数还是太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把所有部门间的阶级分布作为其合适的估计。所有的这些分析使用的只是民用部门的劳动力;军事力量的数目完全排除在外。

虽然普查数据缺乏有关经理和监督位置以及自我雇佣的雇员数的直接信息(因此需要上面所述的估计程序),但是普查数据确实给出自我雇佣和雇员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在对四份统计数据做部门内阶级分布估计时,我们把这些估计限定在重现部门内自我雇佣者统计分布的范围内。这就是说,我们是分别完成推断统计数据中的自我雇佣者和雇员的阶级结构的程序。

## 第四章

### 美国小资产阶级的下降和上升

200年前，托马斯·杰斐逊(1786 [1984: 580])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即自我雇佣的前景使得伴随着契约服务和工资劳动的任何浩劫都合情合理了：

欧洲的穷人是如此渴望来到美国这个能够改善他们境况的国家，于是，他们不会因无力支付他们的旅费而不走，而是同意等他们到那儿时提供两年或三年的服务作为旅费。在服务期间，他们比在欧洲时吃得好、穿得好，并且干活儿也轻松。继续受雇几年后，他们买了一个农场，结了婚，享受着他们自己的民主社会的所有快乐。

19世纪中叶，亚伯拉罕·林肯(1865 [1907: 50])也把自我雇佣看做是个人成功的自然之路：“世界上那些节俭的一无所有的新手先为工资劳动一段时间，省下钱来给自己购买工具或土地，然后又为自己劳动一段时间，最后便雇一个新手来帮忙。”甚至在20世纪经济衰退的年头里，在一个有着大公司和强政府的时代中，罗纳德·里根(美国总统公报。罗纳德·里根，1983：

689)还在颂扬自我雇佣的美德。在年度国家小企业主授奖大会的演讲中，里根讲道：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让我们小镇正常运转、建设着我们社区、我们国家的店主、药铺老板、饲料店老板，以及所有小镇上男女业主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你以及遍及全国的你的同伴们，从许多方面看，代表着美国的开拓精神……你们还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正是在你们的梦想、你们的志向中产生和形成我们的未来。

做自己的老板、自己雇自己，这是美国文化深层的理念。如表 4.1(栏目 1)所示，1980 年的美国阶级分析项目数据中，美国工人阶级中有 54% 的人、2/3 的男性工人说他们喜欢有一天成为自我雇佣者。而且，这种理想并非完全是异想天开：虽然，根据精确定义和数据资料，在美国 1980 年大约只有 8%~14% 的劳动力是自我雇佣的，16% 的目前雇员在他们工作生涯的某一时期曾经是自我雇佣的(而男性几乎达 20%)，这就意味着，至少有 1/4 的劳动力以及 1/3 的男性劳动力是或曾经是自我雇佣者。如果我们往回退一代，美国目前劳动力中大约有 31% 是来自于那些家长在他们成长时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自我雇佣的家庭，且有 46% 是来自于那些家长至少在他们成长期的一段时间中是自我雇佣的家庭。最后，如果我们要求美国人描述一下他们三个最好的朋友的工作，有 31% 表示至少他们朋友中的一个自我雇佣者、7% 是与一个自我雇佣者结婚。把这些数据合在一块，有 2/3 美国劳动力与自我雇佣有着某种直接的个人关系，有些人本人就是或曾经是自我雇佣者，有些人是出生于一个家长是自我雇佣者的家庭，有些人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是自我雇佣者，

还有些人是与一个自我雇佣者结婚。而且，与自我雇佣的联系密度在不同雇员阶级位置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这种小资产阶级和雇员生活相互交错并不是美国所独有的特征。我们可以在阶级分析比较项目的其他国家中找到大致相当的数字。在瑞典、挪威和加拿大，大约55%的劳动力与自我雇佣有着某种直接的个人联系，而在日本则高达68%（主要原因是其目前自我雇佣者的水平高得多）。看起来美国和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别的地方是雇员想成为自我雇佣者的抱负：将近58%的美国雇员说他们希望有一天成为自我雇佣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加拿大49%、瑞典40%、日本31%，而挪威则只有20%。

于是，自我雇佣既是美国生活理念构成也是美国社会构成的中心部分。然而很明显，几乎还没有社会学家对自我雇佣做任何系统的经验研究。当社会学家研究分层问题时，极少把自我雇佣看做一个特别的问题。典型的社会学研究所用的阶级三分法是从高层的白领到较低的蓝领和农场职业，而自我雇佣者则根据他们的职业活动混在这些类别中。<sup>1</sup>并且，虽然有许多对小企业及各类特殊种类的自我雇佣——特别是农场主和各种专门人才——的研究，但是却极少有关于自我雇佣一般问题的定量研究。<sup>2</sup>

本章的基本目标是要分析美国自我雇佣的历程，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历程。本章将围绕着劳动力自我雇佣率时间走势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特征展开阐述：根据可获得的最好的时间序列资料，看来从20世纪40年代到大约1973年美国的自我雇佣率实质上每年呈单调下降，从大约20%下降到10%以下；从1973年到1976年自我雇佣率基本稳定，但从那以后，自我雇佣率逐步上升（见图4.1）。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比率已经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的高出了足足25%。对这种剧变的解释是什么呢？



表 4.1 目前阶级位置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系列联表

阶级位置	(1) 你希望 有一天自 成为自 我雇佣 者吗? <sup>a</sup> (是%)	(2) 在你成 长期间 家长曾 经自我 雇佣过 (是%)	(3) 在你成 长期间 主要是 自我雇 佣者 (是%)	(4) 你曾自 我雇佣 过吗? <sup>a</sup> (是%)	(5) 你的三 个最密 切的朋 友有一 个是自 我雇佣 者 <sup>b</sup> (是%)	(6) 你的伴 侣是自 我雇佣 者。 (是%)	(7) 任何一 种与自 我雇佣 者的联 系 (2, 4, 5 或 6 中的是%)
美国							
雇主	X	66.5	51.3	X	52.1	25.1	83.4
小资产阶级	X	64.4	51.9	X	59.0	27.7	85.6
中产阶级	60.7	43.3	27.5	18.7	27.7	3.5	62.3
专家经理	65.2	38.9	23.5	19.8	29.9	5.2	59.1
经理	57.7	47.9	28.2	17.4	28.8	3.5	64.5
专家	57.6	45.6	31.7	18.1	23.8	1.4	64.4
工人阶级	54.0	42.1	26.8	13.1	24.1	3.5	59.3
总计	57.6	46.1	30.8	16.0	31.2	6.9	64.3
美国男子							
所有自我雇佣者	X	64.3	52.3	X	56.7	21.7	82.3
中产阶级	66.9	41.1	24.8	20.6	30.8	2.9	61.1
工人阶级	66.3	34.9	19.8	18.3	32.6	0.7	58.6
总计	66.7	43.1	27.8	19.8	35.6	5.3	64.1

续表

美国妇女										
所有自我雇佣者	X	67.4	50.6	X	53.3	33.3	87.6			
中产阶级	49.3	47.5	32.6	15.1	21.4	4.6	63.5			
工人阶级	45.9	46.8	31.3	9.6	22.5	5.3	59.7			
总计	47.3	49.7	34.3	11.8	26.0	8.6	64.6			
国家比较										
自我雇佣者										
美国	X	65.5	51.6	X	55.4	26.3	84.4			
瑞典	X	57.4	49.5	X	62.9	29.4	85.0			
挪威	X	65.2	59.1	X	51.3	18.4	84.9			
加拿大	X	74.4	70.9	X	65.7	24.6	91.0			
日本	X	61.8	n.a.	X	62.7d	57.4	91.1			
雇员										
美国	57.6	42.7	27.2	16.0	27.0	3.5	60.9			
瑞典	39.9	36.1	30.6	7.8	24.3	3.1	52.0			
挪威	19.9	39.1	34.4	7.4	24.1	3.9	54.5			
加拿大	48.8	38.9	34.3	14.6	27.9	4.1	59.9			
日本	31.3	44.4	n.a.	9.5	24.8d	3.6	58.5			

a. 只向目前的挣工资者询问。

b. 根据受访者觉得个人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的阶级来定。

c. 这个栏目的百分比适用不论是否处于结婚状态的受访者。

d. 日本的数据是以只有两个亲密朋友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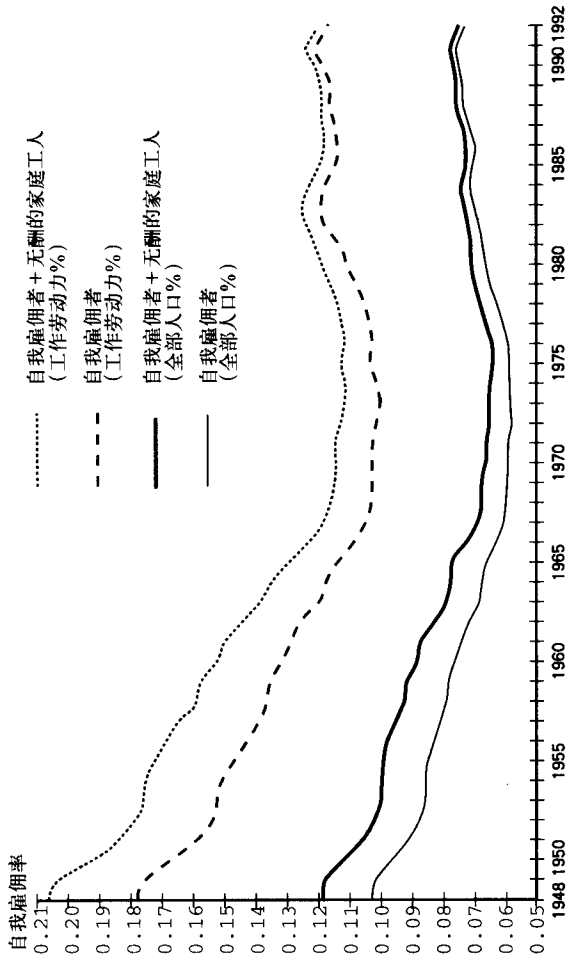


图4.1 美国自我雇佣率的时间序列, 1948~1992

它反映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的停滞状态吗?它是朝着其中各种新的、经常是需要相对较小的物质资本的服务业正在发展的“后工业”经济转型的一个方面吗?这些都是我们将要探索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考察这些经验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自我雇佣这个概念做一个更严格的理论阐述。这就要对我们将要用到的数据和不同衡量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经验调查是从“二战”以后的美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分析开始的。这个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说明在小资产阶级下降中确实有一个逆转,并且对这一逆转不能简单地看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间的周期性失业的一个反映。一旦严格确立了这些走势,我们将把 1940 年和 1990 年之间的自我雇佣变化以 10 年为单位分解成两个成分,源于经济部门内自我雇佣变化的成分和源于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分布变化的成分。这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确认当前的自我雇佣增长发生在哪里。

#### 4.1 自我雇佣的理论地位

自我雇佣基本上是与另外两种情况相对而言的:为他人所雇佣(如成为一个挣工资者)或不劳而获(如成为某种不劳而获的年息收入者)。因此,“自我雇佣”类别描述的是经济关系的两个维度的交错处:第一,他的收入是否部分地依靠他自身的劳动,第二,他是否为了工作而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看来,一个自我雇佣者也可以是一个资本家——雇主,但是应与那种固定地靠投资而不是靠工作获得一笔收入的消极减息票者区分开。表 4.2 列出了这些选项。

表 4.2 是把自我雇佣从其他类型的雇佣中区分出来的描述性

的分类法，但是它没有赋予这个类别一个严格的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处理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是从所谓的“简单商品生产”方面来定位自我雇佣。

表 4.2 自我雇佣的理论标准

	不为收入而工作	为收入而工作
雇佣劳动力	领年金的资本家	企业家式的资本家
不雇佣也不 出卖劳动力	永久的残疾人； “低层级”	小资产阶级
出卖劳动力	暂时失业者	工人

简单商品生产被定义为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其中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因而也就拥有那些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产品。因此它既有别于维持生计的生产，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在维持生计的生产中，直接生产者拥有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产品的生产是用于生产者及其基本社会群体的直接消费而不是市场。<sup>3</sup>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但是商品直接生产者不拥有生产资料，因此，为了获得工作，他们必须在劳动市场上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售给生产资料所有者以获得工资，于是，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便拥有并出售这些劳动产品。

因此，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直接生产者是处于一种不应与这里的资本主义本身混为一谈的独特形式的生产中。<sup>4</sup> 虽然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直接生产者经常被称做“小”资产阶级，但他们不应该被理解为“小的”资本家，因为他们是在一种相当不同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生产的。<sup>5</sup> 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有别于资本家的地方是他们不雇佣也不剥削挣工资的劳动者；他们有别于工人的

地方是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不在劳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当然，现实社会从来就不是由单纯的生产模式组成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模式还是其他模式。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曾认为的那样(赖特，1985:11)，应把现实社会当做是不同类型生产关系的特殊组合形式来区分类型。当用“自我雇佣”类别这个词时，它所表示的是某项结合了纯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征的自我雇佣者——小雇主。这类位置是“阶级关系中相互矛盾的位置”的一个例子，相互矛盾的位置是同时处在两种不同形式的阶级关系上。(由于大多数小雇主的确是非常小——1980年50%以上的小雇主的员工数少于5，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假设处在这类相互矛盾位置一端的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因而，典型的做法是把小雇主和纯粹的小资产阶级合并到一个更为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位置上<sup>6</sup>。)于是经验类别“自我雇佣”在分析上合并了种类相当不同的阶级位置：纯粹的小资产阶级、小雇主和企业家型的资产阶级。

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简单商品生产一般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形式，是封建社会中存在的生产形式之一，并且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转换之际获得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植根于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类别——农民、手工艺者、小店主等等——是与时代不符合的事物，是那些其长期社会存在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动力侵蚀的类别。另一方面，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简单商品生产只是构建在市场社会里并且与资本主义(也许还有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形式。它的前资本主义出身的历史事实并不排除它在资本主义自身内继续再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壮大的结构事实。因此，与历史色彩

较浓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根植于这类关系的社会类别压根儿就不是时代错误，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给自我雇佣披上了鲜明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标识，经典马克思主义预测小资产阶级会普遍消亡。马克思更具体地指出了决定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历史轨迹的两个长期因果过程。第一，资本主义的扩张将摧毁所有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有时候这种破坏是采取暴力及政治的形式，就像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取缔某些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奴隶制、封建制)那样。有时候，对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破坏是采取完全从经济上侵蚀它们经济活力的形式，农业中出现的简单商品生产下降，就是典型的这种方式。不论是哪一种情况，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大比例的经济活动是直接 in 资本主义关系内部组织进行的。如果把简单商品生产看做是严格的前资本主义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的发达便标志着小资产阶级的下降。

第二个决定自我雇佣命运的长期因果过程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情况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简单商品生产衰落了，而且资本主义的积累单位不论是相对地还是绝对地都趋于变大。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经过一段时间，在小企业工作的劳动力比重也应是下降的。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小雇主在人口中占的比例。

把两方面合起来看，这两个因果过程导致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下面的预测，即在破坏简单商品生产的双重压力和资本主义内部资本积聚/集中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理解为小雇主和纯粹小资产阶级的组合)将逐渐消亡。当然，从一开阔的历史角度上来衡量，这是马克思最有力的预测之一。如

表4.3所示,在美国、法国和德国,自我雇佣长期稳步下降,从100年前大约占劳动力的40%下降到现在的10%~15%。

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说有相当的成就,但是下面两个地方是需要给予考虑的,而这表明对它进行大的修改是有必要的。第一,在过去的100年中资本主义猛烈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的既定条件下,人们可能会预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理论主张下)目前小资产阶级在实质上应已消失了。人们不但没有把自我雇佣占劳动力的比重由40%下降到10%~15%看做是对经典观点的确凿无疑的证实,反而认为自我雇佣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保持在15%也许证明了传统观点是有缺陷的。如果经典观点心照不宣地预测道,在一个跨国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自我雇佣的预期水平只应是劳动力中一个很小的百分比,那么15%的确是高了点。

第二,也许更常谈论的是,有迹象表明对自我雇佣的侵蚀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也许还发生了逆转。表4.4显示了欧洲九国工业和服务业中自我雇佣的年度数据(源于比彻霍费尔和艾略特 1985:195)。其中五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爱尔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间农业部门之外的自我雇佣率是相当稳定地上升。在这个时期九个国家整体上的自我雇佣是接近于停滞不动的。当然,对小资产阶级历史性下降的阻截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它至少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需要补充有关小资产阶级再现、也许甚至是壮大的作用机制方面的内容。

我们本章的目标是开始着手这样一个任务,即通过从经验上详细考察美国战后自我雇佣历程来促进对这些抵消机制的理解。我们将通过两个主要数据分析的策略来做这件事:首先我们将对20世纪40年代晚期以来的年度自我雇佣率的变化做一时



间序列回归分析，第二，运用与我们在第三章关于美国阶级结构整体转变一般分析相似的方式，我们对自我雇佣的变化进行变化分担分解。

表 4.3 美国、法国和德国自我雇佣的长期趋势

年份 <sup>a</sup>	(自我雇佣者加家庭工人占整个劳动力或就业劳动力的百分比)					
	美国 <sup>b</sup>		德国 <sup>c</sup>	法国 <sup>d</sup>		
	占有收益的 工人劳动力 的百分数	占就业 人数的 百分数	占劳动 力的百 分数	占有收益的 工人劳动力 的百分数	占就业 人数的 百分数	
1800					60.0	
1866					42.2	
1870/75		41.85			39.2	
1880/82/81	41.77		38.16		42.2	
1890/95/91	37.49		34.58	36.8		
1900/01		34.28		35.7	36.8	
1907/10/11	30.58	34.83			39.5	
1920/25/21	27.79		33.51	37.8	38.6	
1930/33/31	25.47		32.87	36.7	37.5	
1939/40/46	20.92	23.50	29.26		38.3	
1950/50/55	18.24	19.06	28.45	33.9	34.4	
1960	13.14	13.79	22.56	30.1	30.5	
1970	9.47	9.85	16.49	20.8	21.3	
1976 <sup>e</sup>	8.27					
1980	8.80	9.31	12.19	15.5	16.6	
1984 <sup>f</sup>	9.16		11.7	14.1	15.7	

a. 在每一行中，各数字所指的年份略有不同，它们在第一列中给予了表示。

它们的顺序同标题中国家的顺序(美国、德国、法国)。

b. 1940年的估计值取自《美国历史统计》第一编(Washington D.C.特区, 1975). 系列第152~156页。随着在1940年统计资料中首次提出“工人阶级”这一变量(虽然出于编码的目的，自1910年的统计资料中便使用它

了；见康克,1979),在美国的数字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为了获得1940年以前自我雇佣者数量的最小估计值,把1940年人口统计中工业部门的自我雇佣百分数(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因为1940年前的数字指的是“有收益的工人”类别)运用到1870~1930年统计资料每一部门的绝对劳动力上。

- c.资料来源:霍夫曼(1965, P: 171~209);西德联邦统计局:《Bevolkerung und Wirtschaft 1872~1972》(斯图加特,1972),第142~145,有关劳动力规模和全部自我雇佣者的估计部分;伊洛斯塔特(1980和1985)。1950年相关数字使用的是前西德联邦统计局的最新估计值。
- d.来源于托泰恩(1963,151页及其后),和伊洛斯塔特(1980和1985)。1955年之前不含家庭工人。我们把托泰恩的数字与法国原始统计资料进行了对比,确定他已把所谓的“isoles”(独立的工人)类正确地划为估计的自我雇佣和挣工资者(ouvriers a facon和白天劳动者)部分,并对他们进行了正确的分配。而且,在这些数字里,家庭工人是(正确地)不包含在自我雇佣者中,这与19世纪法国统计的一般做法不同。最后,失业者既不算在分子里(在法国的统计中过去是算的),也不是年金收入者(那些“viant exclusivement de leurs revenus”的人)。
- e.我之所以把1976年放进这个长期序列中,是因为这一年美国的自我雇佣达到了它的最低水平。正如文中所强调的那样,经常人口调查对自我雇佣的每年估计总比相应的统计数字要高。为了保持本表时间序列的一致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校正过的1976年的经常人口调查估计值插入其中。于是,为了使它与整个统计的时间序列保持一致,我通过把1976年的估计值乘以0.751对它进行缩小,这个比率是1980年统计值与校正了的1980年经常人口调查估计值之间的比值。
- f.1984年自我雇佣的估计值是通过把1980年统计值和1980年经常人口调查自我雇佣百分数之间的比率运用到1984年经常人口调查数字上得到的。见前注e。

## 4.2 对美国自我雇佣的时间序列分析

对自我雇佣的时间序列分析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我将

表 4.4 西欧自我雇佣的走势, 1970 ~ 1982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英国	爱尔兰	丹麦	总计
1970	10.1	12.3	23.7	9.9	14.9	12.2	6.6	10.6	13.1	12.2
1971	9.6	11.9	22.7	10.0	14.3	11.6	7.2	10.4	13.0	11.9
1972	9.5	11.6	22.6	9.7	14.1	11.2	7.2	10.3	11.7	11.8
1973	9.4	11.3	22.2	9.6	13.8	10.4	7.2	10.2	11.8	11.6
1974	9.4	11.0	22.2	9.3	13.5	10.5	7.0	9.9	11.5	11.5
1975	9.4	10.9	21.9	9.0	13.7	10.1	7.1	11.1	12.1	11.5
1976	9.2	10.8	21.8	8.7	13.8	10.1	6.9	11.2	11.7	11.4
1977	9.0	10.7	22.6	8.5	13.8	9.9	6.7	11.0	11.5	11.3
1978	8.8	10.6	21.0	8.5	14.0	9.7	6.7	10.9	11.2	11.3
1979	8.7	10.6	21.7	8.5	13.9	9.5	6.6	10.8	10.7	11.2
1980	8.5	10.6	22.2	8.9	14.0	9.2	7.0	10.7	10.6	11.4
1981	8.4	10.7	22.7	9.2	14.5	9.1	7.8	11.3	9.4	11.7
1982	8.5	10.5	23.2	9.6	14.6	8.9	8.0	11.6	8.6	11.9

资料来源: 比彻霍费尔和艾略特(1985, 第 195 页)

a. 工业和服务业中的非农业自我雇佣者和家庭工人占非农业劳动力的百分比。

证明美国近年来自我雇佣率的下降确实是有了逆转，并且这个结果在有关自我雇佣率可供选择的详细说明中被证明是可靠的。第二，我们将考察对这种逆转所作的一个重要的可能解释，即它是周期性失业的一个直接反应。<sup>7</sup>有些自我雇佣似乎是对缺乏好的挣工资劳动就业机会的一个反应。虽然失业保险和福利项目会减少失业者寻求自我就业的动力，但是人们还是会预期到失业率的上升导致自我雇佣的上升。在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经济的相对停滞这种情况下，自我雇佣长期走势的明显逆转确实有可能只是对这个时期的失业增多的一种反映。

### 基本的时间序列结果

美国1947年到1992年每年的自我雇佣率时间序列估计值见图4.1。表4.5显示了总的自我雇佣者(正式自我雇佣者和无酬的家庭工人)和正式的“自我雇佣者”分别占成年人百分比的基本时间序列模型。<sup>8</sup>对图4.1的观察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我雇佣率发生了回转，而不管计算比率时无酬的家庭工人是否包括在内、是用成年人口还是用劳动力作分母。表4.5的结果证实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我雇佣的这种上升在统计上也是很明显的。在这些模型中时间平方记作 $(t-20)^2$ ，这里 $t$ 取0到45。<sup>9</sup>在模型1中只出现了简单的趋势变量——时间。在模型2中增加了二次项。这一项的系数为正，表明时间趋势基本上是一条抛物线，先降后升。模型2对数据的拟合显然要比模型1好得多，不论是对全部自我雇佣者(如，包括无酬的家庭工人)还是对正式自我雇佣者而言。解释方差明显高得多且二次项目系数也很高。在不曾在这里显示的结果里，这个基本的二次关系也成立，如在我们分别对农业和非农部门自我雇佣情况的考察中，如我

们运用劳动力而不是成年人口作为分母来测算自我雇佣率时。<sup>10</sup> 因此,图4.1中呈现的自我雇佣逆转的样式为正式统计分析所证实。

表4.5 对自我雇佣的时间序列回归

自变量	因变量: 自我雇佣者和无酬家庭工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数		因变量: 自我雇佣者占成年人口的百分数	
	模型1 B(t-值)	模型2 B(t-值)	模型1 B(t-值)	模型2 B(t-值)
时间 <sup>a</sup>	-0.129(4.3)**	-0.118(10.8)**	-0.092(3.3)**	-0.081(9.3)**
时间平方		0.007(8.3)**		0.007(10.1)**
D-W 检验	0.60	1.27	0.48	1.27
矫正 R <sup>2</sup>	0.76	0.97	0.72	0.97
样本数 N	37	37	37	37
*p < 0.05	**p < 0.01			

a.时间取值为0到45(如:年份-1948),时间平方用(时间-20)<sup>2</sup>表示。对时间平方标准化使得二次项的t值最大化。

### 失业效应

表4.6显示了失业率和自我雇佣率二者关系的基本结果。在模型3中年均失业率以添加项的形式出现。在模型4中它与时间相互作用。本表有两个基本结果尤为重要。第一,把失业率和失业与时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在内并不减少模型中的时间二次项的值。这暗示着20世纪70年代初自我雇佣下降的逆转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失业增加的直接效应。第二,在模型4中失业率有一个明显的正系数而时间与失业相互作用项目有一个明显的负系数。这意味着虽然存在着对自我雇佣的反周期特性——自我雇佣随失业的上升而上升——这种效应随着时间在下降。

与简单时间序列分析一样,不论无酬家庭工人是否算在自

表 4.6 失业对自我雇佣效应的时间序列回归

自变量	因变量: 自我雇佣者和无酬家庭工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数		因变量: 自我雇佣者占成年人口的百分数	
	模型 1 B(t 值)	模型 2 B(t 值)	模型 1 B(t 值)	模型 2 B(t 值)
时间 <sup>a</sup>	-0.122(11.1)**	-0.100(6.6)**	-0.851(9.8)**	-0.609(5.2)**
时间平方	0.007(8.4)**	0.008(8.6)**	0.007(10.4)**	0.008(11.1)**
失业率	4.220(1.2)	14.500(2.3)*	4.613(1.6)	16.047(3.5)**
失业率 - 时间 <sup>b</sup>		-0.560(2.0)*		-0.622(3.0)**
D-W 检验	1.31	1.42	1.31	1.44
矫正 R <sup>2</sup>	19.97	0.97	0.98	0.98
样本数	37	37	37	37

\*p < 0.05      \*\*p < 0.01

a. 时间取值为 0 到 36 (如: 年份 - 1948), 时间平方表示作(时间 - 20)<sup>2</sup>。

对时间平方的标准化使得二次项的 t 值最大。

b. 失业 × 时间可直观地理解作是失业效应随着时间变化而减少的程度。

我雇佣数字中, 这些基本结论都成立。而且, 当自我雇佣率是用劳动力的比例而不是全部成年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时, 其形式是一样的, 并且对非农部门的自我雇佣进行独立考察时, 结果还是一样(见斯坦梅特兹和赖特, 1989: 1011 - 1012)。"<sup>11</sup>

我们可以从这些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 在过去的 20 年中, 美国小资产阶级的下降呈现出明显、持续的逆转; 第二, 这种逆转看来并非只是对失业增加的一种简单的反周期的反应。虽然普遍的、长期的停滞仍能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 但是其作用机制必定还不只是失业率和自我雇佣二者间的直接联系。

### 4.3 自我雇佣变化的部门分解

对小资产阶级历史轨迹逆转的一种可能解释是自我雇佣机会的增多与向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经常提到，后工业主义的标志之一就是知识、通讯和信息的重要作用。人们可以设想，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服务业的增多给自我雇佣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服务业需要相对少的物质资本。

我们运用部门的变化分担分解程序来考察就业劳动力部门构成变化和自我雇佣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考察我们初步探索这种后工业假说的合理性。<sup>12</sup>

表4.7显示了1940年到1990年间全部就业劳动力及6大经济部门自我雇佣每10年一次的变化情况。本表总体情况中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应予以注意。第一，从表中得知，1950~1970这一时期是自我雇佣下降最剧烈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自我雇佣占就业劳动力的比例每年下降2.9%，而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数字只是2.1%。第二，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自我雇佣比例的下降是整个经济一相当普遍的现象：20世纪40年代，除制造部门之外的所有大部门都发生了这一现象。相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各部门之间自我雇佣的轨迹的差异是相当大的。我们很快就要详细察看这些差异了。

表4.8和图4.2显示了从1940到1990年间每10年自我雇佣比例变化的基本变化分担分解。就像第三章中的变化分担分析那样，这些是自我雇佣比例每10年变化率的全部分解。表4.8和图4.2的情形表明80年代自我雇佣的增长完全是部门间劳动力分布变化的结果。70年代是这些变化的关键10年：50年代和

表 4.7 就业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比例, 1940~199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1. 总就业劳动力的自我 雇佣百分数	23.91	18.72	13.29	9.38	9.30	9.90
2. 与前 10 年相比的变比		-5.19	-5.43	-3.91	-0.08	0.60
3. 与前 10 年相比变化的百分数		-21.71	-29.01	-29.42	-0.85	6.45
各部门的自我雇佣百分数						
天然生产业	67.14	65.94	57.91	47.84	40.55	37.57
制造业	5.49	5.73	5.16	4.70	5.93	7.71
分配服务业	20.78	16.97	14.11	10.91	10.46	9.82
商业性服务业	21.18	17.69	16.12	12.71	14.00	15.27
社会政治服务业	6.58	4.58	4.19	2.87	2.75	2.94
个人服务业	20.42	19.77	19.35	17.12	16.34	16.96

表 4.8 自我雇佣变化率的分解

	1940 - 1950	1950 - 1960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90
1. 自我雇佣比例的 10 年变化率	-21.71	-29.01	-29.42	-0.85	6.45
2. 阶级变化	-4.20	-10.56	-17.85	-0.30	-0.94
3. 部门变化	-16.72	-20.29	-12.24	-0.04	7.07
4. 剩余	-0.79	1.84	0.67	-0.51	0.32
各成分对自我雇佣十年 变化率的贡献百分数					
5. 阶级变化	19.35	36.40	60.67	35.29	-9.95
6. 部门变化	77.02	69.94	41.60	4.71	109.61
7. 剩余	3.64	-6.34	-2.28	60.00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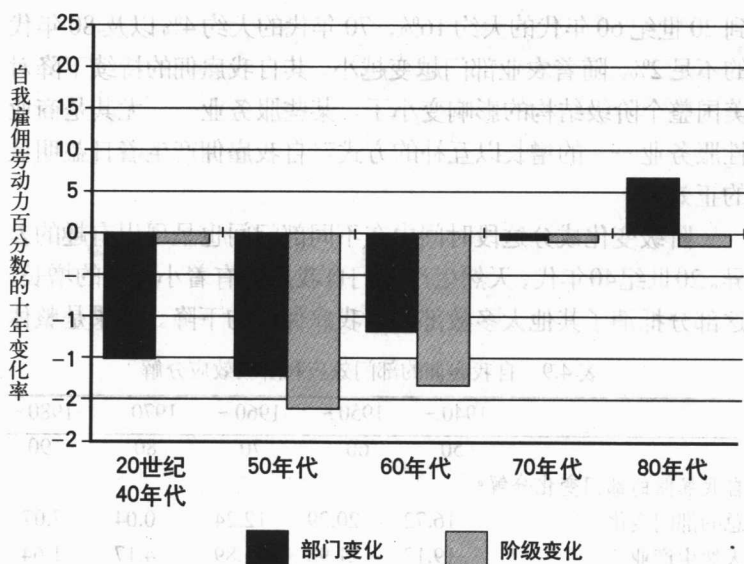


图4.2 自我雇佣十年变化率的分解，1940~1990

60年代，不论阶级变化成分还是部门变化成分都是大幅度的、负向的。70年代，不论部门变化成分还是阶级变化成分都微不足道。80年代，部门变化就相当大地且是正向的。<sup>13</sup>

为了获取隐含在这些变化下经济过程更精确细致的面貌，把每10年总的部门和阶级变化分解成各大经济部门对它的贡献份额是有帮助的。<sup>14</sup>表4.9中显现了这种情况。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部门变化。50年代以来，天然生产部门(主要是农业)中自我雇佣下降效应在稳步减小。农业是一个自我雇佣水平最高的经济部门。因此，农业部门中自我雇佣的下降，在历史上对自我雇佣下降的部门效应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天然生产部门自我雇佣下降使自我雇佣大致减少了22%。这个数字降

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约 16%，70 年代的大约 4% 以及 80 年代的不足 2%。随着农业部门越变越小，其自我雇佣的持续下降对美国整个阶级结构的影响变小了。某些服务业——尤其是商业性服务业——的增长以互补的方式对自我雇佣产生着日益明显的正效应。

阶级变化成分这段时间中在不同部门间也呈现出有趣的差异。20 世纪 40 年代，天然生产部门自我雇佣有着小幅度的增长，这部分抵消了其他大多数部门自我雇佣率的下降。结果是整体

表 4.9 自我雇佣的部门效应和阶级效应分解

	1940 ~	1950 ~	1960 ~	1970 ~	1980 ~
	50	60	70	80	90
自我雇佣的部门变化分解 <sup>a</sup>					
总的部门变化	-16.72	-20.29	-12.24	-0.04	7.07
天然生产业	-19.17	-21.93	-15.89	-4.17	-1.64
制造业	-0.44	0.11	-1.02	-0.54	-0.32
分配服务业	2.03	-0.55	0.68	-1.12	0.56
商业性服务业	0.24	1.77	1.47	3.57	3.89
社会政治服务业	0.80	1.37	2.49	1.59	0.92
个人服务业	-0.19	-1.08	0.02	0.62	3.67
自我雇佣的阶级变化分解 <sup>b</sup>					
总的阶级变化	-4.20	-10.65	-17.85	-0.30	-0.94
天然生产业	0.08	-5.51	-4.36	-1.56	-2.46
制造业	1.51	-0.67	-1.28	2.99	2.58
分配服务业	-2.83	-3.65	-5.20	-0.84	-1.55
商业性服务业	-0.52	-0.37	-1.47	0.65	1.03
社会和政治服务业	-0.87	-0.40	-2.20	-1.03	0.44
个人服务业	-1.56	0.04	-3.34	-0.52	-0.58

a. 各栏目指的是各个部门内相对就业变化对总的部门变化成分的贡献。

b. 各栏目指的是各部门内自我雇佣率的变化对总的自我雇佣率变化的阶级变化成分的贡献。

的阶级变化是平缓的-4.2%。20世纪50年代,6大经济部门中除了一个以外,自我雇佣都下降了,这导致相当巨大的整体阶级变化,部门内的自我雇佣在20世纪60年代加速下降。在这10年里,各部门对负的阶级变化成分的贡献是很大的,并且在经济中分布得相当均衡,这表明当时存在一非常广泛的无产阶级化。

20世纪70年代这10年代表着与前两个10年型式的明显断裂。70年代在那些阶级变化成分还是负的部门中,这种负效应一直都比60年代来得小。而且有两个部门——制造部门和商业性服务部门——的负阶级变化效应确实是在发生逆转:这10年中这些部门自我雇佣占劳动力的比例是增加的。制造部门和商业性服务部门中这一基本趋势持续到80年代。

这些特定部门结果是怎样回答自我雇佣是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工业”现象这个问题的呢?为了获取关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变化的更精细的情况,把表4.8和表4.9的结果分解到完整的32部门中去是有帮助的。这些结果体现在表4.10中。在表中,这些具体部门对自我雇佣率变化的总贡献度按顺序从最大正贡献度排到最大负贡献度。在表4.11中,这些部门又被重新汇总成反映后工业主题类别:后工业服务业(例如,那些后工业活动占统治地位的服务业);传统制造部门;高层次知识的产品和应用并不占主要地位的传统服务业;农业;以及其他一些部门。

表4.10和表4.11的结果为自我雇佣的增长与后工业主义有明显联系的观点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对总的自我雇佣增长贡献最大的10个部门中有6个是后工业活动占统治地位的部门:商业性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专门服务(律师、工程等等)、银行、教育和保险。第7个部门——儿童照看

服务——虽然本身不是一种后工业服务(因为它不含有高层次经整理过的知识),但是,因为这些部门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有重大贡献,它仍然与后工业经济部门的增长有着密切联系。除专门服务业之外的所有这些部门对自我雇佣的部门变化和阶级变化都有正的贡献。在排列的另一端,对自我雇佣总贡献为负的12个部门中有11个是后工业活动普遍处于边缘地位的部门。这包括像房屋出租或零售这些传统的服务业、像金属制造和食品加工这些工业经济中的核心部门,以及农业。于是这些结果看来是巩固了后工业趋势在自我雇佣增长中的核心地位。

表 4.10 不同部门对自我雇佣率变化的总贡献率的排列  
1970~1980 和 1980~1990

	部门对(1)(2)(3)的总贡献		
	(1) 自我雇佣总变化率	(2) 阶级变化	(3) 部门变化
1970~1980			
1.商业性服务	2.11	0.42	1.50
2.建筑	1.94	1.63	0.26
3.房地产	1.21	0.15	0.99
4.专门服务	0.94	0.02	0.91
5.修理服务	0.85	0.15	0.68
6.儿童照看服务	0.59	0.87	-0.10
7.交通	0.53	0.68	-0.12
8.娱乐业	0.50	0.18	0.27
9.批发	0.45	0.17	0.26
10.其他制造业	0.29	0.94	-0.51
11.福利及公益事业	0.28	0.21	0.05
12.银行	0.18	0.06	0.11
13.机械工具	0.14	0.24	-0.08
14.教育	0.13	0.01	0.12

续表

15.采矿	0.10	-0.01	0.11
16.保险	0.07	-0.001	0.07
17.公用事业	0.04	0.03	0.01
18.通讯	0.04	0.04	0.002
19.冶金	0.03	0.12	-0.07
20.纺织	0.01	0.07	-0.03
21.邮政服务	0	0	0
22.政府	0	0	0
23.化工	-0.01	0.01	-0.01
24.家庭服务	-0.06	0.07	-0.10
25.食品	-0.13	-0.04	-0.09
26.医疗和保健	-0.18	-1.26	1.14
27.旅馆和房屋出租	-0.21	-0.28	0.08
28.洗衣业	-0.42	0.20	-0.53
29.饮食	-0.61	-1.53	1.40
30.其他个人服务业	-1.24	-0.19	-1.09
31.零售	-2.88	-1.73	-1.27
32.农业	-5.52	-1.55	-4.27
总计	-0.85	-0.30	-0.04
1980 ~ 1990			
1.儿童照看服务	2.73	1.52	0.50
2.商业性服务	2.45	0.66	1.60
3.建筑	1.55	0.66	0.84
4.医疗和保健	1.05	0.38	0.62
5.修理服务	1.02	-0.20	1.29
6.房地产	0.88	0.21	0.63
7.专业服务	0.65	-0.56	1.38
8.银行	0.59	0.42	0.11
9.教育	0.51	0.38	0.10

续表

1970 ~ 1980			
10.保险	0.50	0.30	0.17
11.交通	0.47	0.43	0.04
12.其他制造业	0.45	1.06	-0.48
13.其他个人服务业	0.42	-0.35	0.84
14.娱乐	0.27	-0.24	0.60
15.通讯	0.26	0.29	-0.01
16.机械工具	0.12	0.49	-0.27
17.公用事业	0.01	0.04	-0.02
18.纺织	0.01	0.08	-0.05
19.政府	0	0	0
20.邮政服务	0	0	0
21.化工	-0.01	0.04	-0.04
22.洗衣业	-0.06	-0.02	-0.04
23.批发	-0.08	-0.15	0.07
24.食品	-0.09	0.003	-0.09
25.金属业	-0.09	0.22	-0.22
26.家庭服务	-0.10	-1.10	-0.03
27.采矿	-0.10	-0.13	-0.18
28.旅馆和房屋出租	-0.22	0.29	0.12
29.饮食	-0.60	-0.91	0.40
30.福利及公益事业	-0.66	-0.72	0.20
31.零售	-1.72	-2.12	0.46
32.农业	-3.82	-2.59	-1.46
总计	6.45	-0.95	7.07

表 4.11 后工业部门对自我雇佣增长的贡献

	变化分担分解的成分		
	总计	阶级变化	部门变化
1970 ~ 1980			
后工业服务业 <sup>a</sup>	3.29	-0.71	4.12
传统制造部门 <sup>b</sup>	1.00	2.04	-0.79
传统服务业 <sup>c</sup>	-3.26	-2.96	0.01
农业	-5.52	-1.55	-4.27
其他:			
儿童照看服务业	0.59	0.87	-0.10
福利和公益事业	0.28	0.21	0.01
修缮和建筑	2.79	1.78	0.94
总计	-0.85	-0.30	-0.04
1980 ~ 1990			
后工业服务业 <sup>a</sup>	6.01	1.87	3.97
传统制造部门 <sup>b</sup>	1.65	2.70	-0.72
传统服务业 <sup>c</sup>	-2.09	-3.60	2.42
农业	-3.82	-2.59	-1.46
其他:			
儿童照看服务业	2.73	1.52	0.50
福利和公益事业	-0.66	-0.72	0.20
修缮和建筑	2.57	0.46	2.13
总计	6.45	-0.95	7.07

a.后工业服务业 = 商业性服务业、专门服务业、银行、教育、保险、医疗和健康、通讯。

b.传统制造部门 = 交通、其他制造业、机械工具、采矿、公用事业、冶金、食品、纺织、化工。

c.传统服务业 = 房地产、娱乐业、家庭服务、批发、旅馆和房屋出租、洗衣店、饮食、其他个人服务、零售。

然而，如果我们稍微仔细地察看一下这些对自我雇佣效应的分解，那么情况就变得稍微复杂了点。如表 4.11 所示，不论 20 世纪 70 年代还是 80 年代，有着最大的正阶级变化的经济部门都是传统制造部门。事实上，20 世纪 70 年代后工业服务业内的自我雇佣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而对总体的自我雇佣率是有负的阶级变化贡献的，而且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后工业服务业内的阶级变化是正的，但它还是比制造部门内的变化要小。而且，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传统制造部门内的正阶级变化成分是由一些工业经济核心的子部门产生的：其他制造业(1.06)，机械工具(0.49)和金属制造(0.22)。于是制造部门对自我雇佣增长的总体贡献比后工业服务业的贡献小的原因便完全是由于制造部门有着负的部门效应。

把这些结果合在一起，那么，看来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指向后工业服务业的部门变化对自我雇佣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经济活动特定行业内的自我雇佣的增长却更多地集中在制造业和其他传统制造部门里。如果制造部门内的这种阶级变化不曾发生(而其他条件保持原样)，那自我雇佣的增长就会减少到不足 40%。

因此，看来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一半以上自我雇佣的增长可以归因于经济中指向后工业服务业的部门变化，但是制造业和其他传统制造部门内部自我雇佣的增长仍是一重要因素。因此，自我雇佣的增长便不只是一简单的后工业现象；它还反映了传统工业经济内部阶级分布的变化。

#### 4.4 结论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从各种数据分析的结果中突显出四个一般结论，表述如下：



第一，存在着有力的证据表明曾作为美国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特征的小资产阶级数量上的下降至少暂时停止了，也许还缓和地回升了。

第二，对小资产阶级历史性下降的这种逆转并不是人们从失业转为自我雇佣这种反周期运动的直接后果。虽然失业率对自我雇佣有一种效应，但是战后这种效应已经在下降，而且它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自我雇佣增长。

第三，后工业服务业的成长看来确实是对自我雇佣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主要是通过一种直接的部门转换效应发生的，而不是后工业部门内自我雇佣普遍快速增长的缘故。

第四，在许多更传统的老经济部门内似乎近来自我雇佣在增长。当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和其他制造业，当然在机械、交通甚至金属制造中也是如此。因此，在经济生活中特定行业里自我雇佣的增长不完全只是一个后工业过程而且也是更传统的经济部门的一个结构特征。

本章的数据没有提供对这些传统工业经济部门内自我雇佣增长的可供选择的可能解释进行探索的依据。有5种可能解释看来是特别重要的。第一，自我雇佣表面上的增长有可能证明只是一种幻觉，它只是代表特别工作分类系统的变化而不代表正规理解中的自我雇佣的真正增长。例如，戴尔(1986)曾提出，许多表面上的“自我雇佣”其实只是雇主在下列这些名目下招募工人的一种新方式，如家庭工作、自由撰稿(演员)工作、承包、户外工作以及其他类似的名称。马赫、什迪和马瑟逊(1981)发现在建筑工业中有1/3的正式自我雇佣工人只为承包人工作并只提供他们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挣工资工人间的真正

区别非常小。虽然出于税收以及劳动关系的目的，雇主把他们的一部分劳动力重新划作“自我雇佣者”是有好处的，但是这却不反映那种有着社会学意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增长。<sup>15</sup>就像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小雇主阶级分布变化的阶级变化成分是负的，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成分却是正的，这个事实符合下面的观点，即很大部分自我雇佣的整体增长是与劳动市场中这类约束机制相联系的。

第二，某些传统工业经济部门自我雇佣的增长至少部分是人口统计现象，反映了出生高峰期这一代人进入最大可能自我雇佣的年龄段。自我雇佣最高的发生期一般是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中期和晚期阶段，在有了一定量的积蓄之后。因此，当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进入中期职业生涯这一阶段时，人们可以看到自我雇佣的暂时增长。如果这种人口统计的解释是对的活，那么随着这一代人的年龄增长，自我雇佣率又应下降。

第三，自我雇佣的增长也可以认为是部分由于劳动力中已婚妇女就业增多的效应。自我雇佣一般比挣工资劳动就业更具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减少了，人们可以预见有更多的人开始他们自己的事业。减少家庭风险的一个可能机制是一个成员拥有一份稳定的挣工资的工作，而另一个试着自我雇佣。因此，夫妻都有收入的家庭的日益普及可能部分支持了自我雇佣的增长。

第四，传统工业经济部门中自我雇佣的增长可能反映了经济的长期停滞。虽然我们已经证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自我雇佣的增长不能归因于对失业率的一个直接的反周期的反应，但是，它仍然是对工业经济中好工作机会的减少的一个结构性反应。就像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在挣工资劳动力中增多的许多工作主要是低报酬的服务部门的工作，而减少的多是高薪的核心产业工作。因此，许多人进入自我雇佣

队伍是由于缺乏可选择的好工作，而不只是由于缺乏像上面所说的那类工作。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可以预计在小雇主中自我雇佣的增长是非常小的，而增长会集中在个体自我雇佣的小资产阶级中。第三章中阶级变化的型式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些支持。

最后，信息技术的引进和交通及通讯的改善降低了进入许多轻工业领域的壁垒，为较小企业的数目的增多提供了条件。近年来，人们纷纷谈论分散化的优点，许多大公司降低了它们的规模并增加了对各种形式的向小雇主的转承包的依赖。经济中更传统的制造部门中自我雇佣的增长可能部分反映了这些技术和组织的发展。

看来美国的阶级结构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重组时期。就像我们在第三章所注意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下降率近10年来看来是加快的，并且20世纪80年代，监督者在劳动力中的比例看来也在下降。现在我们还看到自19世纪以来小资产阶级的持续下降停住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理解美国阶级结构进入下一个世纪的轨迹，那么对导致这些变化的机制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

## 方法附录<sup>16</sup>

### 对美国自我雇佣年度时间序列的分析

自我雇佣的衡量标准。用于自我雇佣分析的劳动力时间序列数据来自每月刊登在《工资与收入》上的经常人口调查(CPS)统计资料。对大多数论题，我把“无酬家庭成员”当做“全部自我雇佣者”的一部分，但我也给出了更正式界定的自我雇佣

的数据。<sup>17</sup> 所有统计资料提到的是 16 岁或 16 岁以上的平民。

由于普查和经常人口调查处理“合作的自我雇佣者”方式的变化,1967年之后对自我雇佣人数的估计比更早时期要复杂。许多企业主相互合作或从技术意义上成为他们自己公司的雇员,这从税法及责任问题上考虑是有利可图的。<sup>18</sup>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合作对构成一个人阶级位置的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希望把相互合作的自我雇佣和非合作的自我雇佣者看做同一类别。不幸的是,从1967年开始,经常人口调查便把这类人归作挣工资者。更糟的是,公开发表的经常人口调查数据磁带上并没有用来产生这些分类的关键调查问卷的项目,因此就不可能把“合作的自我雇佣者”重新从挣工资收入者类别中划回到自我雇佣者类别。这导致严重低估这些人的数量,而这些人根据社会学定义来看确实是自我雇佣者。

因此,为了拥有有意义的自我雇佣年度时间序列,我不得不对这些低估进行矫正,否则,名义自我雇佣率的变化可能只是反映了那些出于法律和税收策略的原因而将企业合并了的自我雇佣者的比例的变化。幸运得很,我能够获得在1967、1975、1978及1982年四年中进行合作的全部自我雇佣者比例的估计。<sup>19</sup> 根据这些年的数据,我可以借助线性内插法估计出中间的数字,运用线性外推法估计出1982年以后的数字。<sup>20</sup>

失业率。自我雇佣时间序列分析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估计失业率对自我雇佣率的现存效应及其历史变化。这便产生了一个用什么作这些“比率”的分母才合适的问题——全部劳动力还是全部人口。用劳动力作分母的问题是,随着失业的增加,由于“失去信心的工人”的增长从而劳动力本身也趋于减少。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只是由于分母的减小而不是由于失业和自我雇佣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本身,自我雇佣占劳动力比

例就有着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不用劳动力而是用全部美国成年人口作为分母。我还运用劳动力比值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且没有任何结论因此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 自我雇佣变化的变化分担分解

1940年和1990年之间自我雇佣变化分经济部门和十年期的变化分担分析是建立在国家普查统计数据之上的。在美国对自我雇佣的普查统计估计值一般比其他来源的估计值要小。例如，1970年，普查表示有9.85%的劳动力属于非合作的自我雇佣者加无酬家庭成员这一类别，而经常人口调查的估计值是11.30%，1980年普查的结果是9.47%，而经常人口调查的值是11.70%，阶级分析调查的估计值超过14%。就像在第二章中提过的那样，自我雇佣的估计问题不仅仅在美国存在；几乎在阶级分析比较项目所有国家中，项目调查的估计值都要比国家普查的估计值高出几个百分点。

我不曾知道有哪个调研曾仔细调查了普查中自我雇佣估计值长期比样本调查中的估计值低的原因，但我猜测这一定与普查问卷的自我管理特点有关，这种特点导致自我雇佣的少报。不管怎样，如果少报问题在不同时间和部门没有显著差别，普查数据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把自我雇佣变化分解成归因于劳动力部门构成变化成分和归因于部门内自我雇佣率变化成分的可信的根据。

自我雇佣的衡量。变化分担分析使用了来自1940~1990年的每十年的美国统计资料中的“class of worker (工人阶级)”栏目，包括最近公布的1940和1950年美国普查公共使用的微观数据样本(档案的1%)(人口统计，1940，1950)。我使用“工人阶级”和工业变量制出了工业部门—自我雇佣者/挣工资者列联

表。这些数据是适用于所有 16 岁或 16 岁以上的成年就业劳动力。我之所以把本章这部分的分析限于就业的成年人(而不是一般时间序列分析中的成年劳动力或全部成年人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自我雇佣的部门分布。由于失业者在经济部门中至多只具有模糊不清的地位,所以很难以一种有意义的方法来界定一个部门的全部劳动力。因此,在变化分担分析中所用的自我雇佣率全使用部门中的就业成年人作为分母。

统计局所用的 The class of worker 变量只是在 1940 年以后的普查中才转变为它目前的形式。<sup>21</sup> 在 1940 年的普查中,自我雇佣者被分列在“自负盈亏”工人和“雇主”这两个类别中。普查数字指出把那些为工资而工作的人排除在“自负盈亏”这一地位的类别之外(美国商业部 1940: 69)。然而,有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挣工资工人,如计日劳工,也会被归入这一类别。<sup>22</sup>

像时间序列分析时那样,在变化分担分析中,无酬家庭工人包括在传统界定的自我雇佣这个类别中。在年度经常人口调查数据中我们所遇到的估计合作的自我雇佣者的困难在 1970 ~ 1990 年的普查数据中并没有出现,因为在公共使用样本中这些情况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类别,于是把他们与非合作的自我雇佣者混为一谈了。1940 ~ 1980 年数据分析不包括当前失业者以及所有 16 岁以下的人。<sup>23</sup>

经济部门。对经济部门的分类,我使用在第三章讨论过的修正了的 38 部门形式的工业目录。因为 1940 和 1950 年普查所用的工业编码不如后来的详细,所以有必要像附录表 4.1 所示的那样对一些类别进行分解。另外,由于无法确定 1960 年及这以前的儿童照看服务部门,因此只有在 1970 ~ 1990 年这期间的分析才包含这个部门。

附录表 4.1 用于变化分担分析的部门分类

部门*	对小资产阶级 分析时用的 类别	第三章阶级分 布分析时用的 类别
1.天然生产		
农业、林业、渔业	1	1
矿业	2	2
2.制造		
建筑	3	3
食品	4	4
纺织	5	5
冶金	6	6
机械	7	7
化工	8	8
其他制造业	9	9
公用事业	10	10
3.分配服务业		
交通	11	11
通讯	12	12
批发	13	13
零售	14	14
4.商业性服务业		
银行	15	15
保险	16	16
房地产	17	17
专门性服务业(法律、工程等)	18	18,21
商业服务	19	19, 20
5.社会政治服务业		
医疗保健服务业	20	22, 23
教育	21	24
福利和非营利事业	22	25, 26, 29

续表

邮政服务	23	27
政府	24	28
儿童照看服务	25 <sup>b</sup>	
6. 个人服务业		
家庭服务	26	30
旅馆和房屋出租	27	31
饮食	28	32
修理(汽车、其他)	29	33
洗衣店	30	34
娱乐	31	36
其他个人服务业	32	35, 37

a. 军队及失业人员不在分析之列。

b. 1990年前, 大多数从事以家庭为基地的儿童照顾被划在旅馆和房屋出租部门里。1990年, 引进一个新部门——“家庭儿童照看服务”。由于实质上100%的从事家庭儿童照看服务的人是自我雇佣的, 因此, 除非给更早的年份设立一儿童照看服务部门, 否则, 20世纪80年代这类部门的大量增长呈现出来的只是旅馆和房屋出租部门中自我雇佣的增长。把所有职业是儿童照看工作的人(不管他们所属的部门是什么)挑出来, 合并到儿童照看服务部门里,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为更早的年份设立了这个部门。



## 第二编

###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 第五章

###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概念和方法问题

阶级结构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此结构中各种不同位置上的人口分布，而且表现在特定阶级位置对人们生活的约束程度。在微观层次上，阶级之所以是解释性的是因为它塑造了人们的兴趣、谋略能力和经历，而且这其中的每一个影响不仅取决于职业等级结构中个人的固定位置，还取决于通过职业、流动、自愿社团和社会纽带把他们的生活与各种不同阶级相联系的复杂的方式。<sup>1</sup> 在一些阶级结构中，友情、婚姻、教会和体育运动俱乐部就阶级而言大体上是同质的。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边界可以视为是高度无渗透性的。在其他阶级结构中，这些社会过程常常把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边界变得相对渗透了。

在本章中，我将赋予阶级边界渗透性概念以某种程度的精确性，并且为分析渗透性提出一个总的经验性策略。在第六、第七和第八章里，我将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三类渗透情况中：超阶级友谊纽带的形成，家庭的阶级组成和代际间的阶级流动。

## 5.1 理论问题

### 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中的渗透性

社会学阶级分析的两个主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赋予了作为分析对象的阶级结构和边界渗透性不同的优先位置。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例如卡彻迪，1977;波兰特扎斯，1975;雷斯尼克和沃尔夫，1988;希曼斯基1983;赖特，1978, 1985, 1989a)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阶级结构(或者某个像“生产关系”之类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分析置于一个中心位置，而对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关注相对较少(作为特例参见伯陶克斯，1977)。相比之下，在韦伯主义传统里，不管是称作“阶级结构化”(安东尼·吉登斯，1972)还是称作“封闭性”(帕金，1974, 1979)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地位相当重要。这在社会流动的分析中特别明显。这一点主要是受根植于与韦伯主义的“生活机会”相关的阶级观点(似乎以某种扩散的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韦伯主义者不倾向于对阶级结构概念本身严密的细节给予太多的关注。正如博里斯(1987)和赖特(1990, 313-323)所指出的那样，韦伯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家的典型做法是把阶级结构内的位置视为仅需要宽松定义以及相对随便的理论为之辩护的稀疏类别。

因此，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对阶级边界的渗透性分析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概念工具与韦伯主义传统对人们生活和阶级结构的相交点的主要关注结合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分类与韦伯主义问题的结合是由深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阶级的微观分析的强烈欲望所驱使。我的假设是，个人生活跨越阶级边界的复杂方式是形成人们所处阶级结构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

跨越特定阶级边界的政治联盟应当能达到促进友谊和家庭纽带越过这些边界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友谊纽带和个人生活经历受到同一阶级的极大限制而不是分散在种类不同的阶级位置上的社会里可以期待较高层次阶级意识的存在。

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的重点不是个人渗透经验水平上的对诸如政治行为或阶级意识的可能影响，而是阶级边界渗透性的结构型式。对于渗透的一个方面——阶级流动——的意识的影响问题将在第十五章中讨论。

### 静态的和动态的渗透性

阶级边界渗透性能够有效地分为两种一般形式，即我们所指的静态的渗透性和动态的渗透性。阶级边界的静态渗透性是指处于某一阶级结构内不同位置上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纽带型式。这类例子包括诸如邻里组成、家庭组成、自愿社团成员以及友好网络的跨边界型式等。而动态渗透性则指的是阶级结构内个人经历跨越不同位置的方式。当然，代际和代内阶级流动会是主要的例证，但各种社会网络中生活过程的参与型式也会与阶级边界的动态渗透性相关。例如，不同层次的教育系统在把来自非常不同阶级的人们聚集在教室中的程度上会有很大差异。学前班可能比初级教育有更多的阶级同质性，初级学校的教室比起高级中学又有更少的阶级隔离性(由于分班教学制度)，而高级中学比起大学又有较少的阶级隔离性。因而，教育系统所造就的人们的人生历程能够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的具有可渗透的阶级边界的场所而迁移。

这些术语所界定的社会边界渗透性问题绝不局限于阶级分析。例如，国际迁移构成了国家边界动态渗透性的一个方面，而

国际职业协会的成员资格形式和参与形式却构成了这些边界静态渗透性的一个方面。<sup>2</sup>族际婚姻和友谊是民族边界静态渗透性的方面，而“沙拉带民族”和民族代际传递问题则是这类边界动态渗透性的方面。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和院系研讨班是学科训练边界静态渗透性的例子，而通过学科专业的职业经历模式则是一个动态渗透性的例子。

社会边界的渗透性问题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中被人们的社会纽带和经历所强化或削弱的各种社会裂痕的程度（参见布劳，1988）。例如，人们常常认为，一个社会流动性非常高的政体比一个有严格阶级界限的政体更容易产生比较缓和的阶级间冲突（布劳和邓肯，1967，440；索罗金，1927；韦斯特加德和雷斯勒，1975，285-286）。可以期望高度的种族之间、民族之间或宗教之间通婚和联谊的情况将有助于（并受鼓励于）低水平的边界冲突（参见布劳和施瓦兹，1984，第五章，关于宗教群体问题的讨论）。联络各公司之间的董事会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公司间的合作（伯特，1983）。涉及从私营商业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再回到商业部门的职业经历有可能减少政府和私人企业间的冲突。不同种类的社会边界的可变渗透性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架构或强化社会结构的断裂边界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第六、第七和第八章中，我们将探讨阶级边界静态渗透性的两个方面——友谊和跨阶级家庭——和动态渗透性的一个方面——代际流动。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列出我们研究这些过程所采用的变量、量度标准和总的分析策略。

## 5.2 阶级结构变量

### 运用阶级结构

为了研究阶级边界的渗透性，我们必须既测量受访者又测量其他各种人，包括朋友、配偶和受访者成长过程中生活过的家庭的家长的阶级定位。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阶级分析项目》调查中，一般来讲运用阶级对这些其他人进行测量所得的数据不如对受访者本人进行测量所得数据详细。因此，为了使阶级界定具备同样的标准，既适用于受访者也适用于这些其他类别的人们，有必要采取与本书其他大部分的分析稍微不同的运作方式。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对渗透性进行分析基于理论的而不是实用的原因，在技能方面也采取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运作方式。表 5.1 对这些具体运作做了总结。

财产维度。没有关于作为自我雇佣的朋友、配偶和儿童时期家长的雇员数量的资料。因此，雇主定义为拥有雇员的自我雇佣者。

权力维度。受访者被问及有关对朋友、配偶和儿童时期家长的权力这一个问题：“这(这个人的工作)是一个管理者或监督者的位置，还是一个非管理者的位置？”仅仅根据这个问题只可能把处于同为管理者和监督者之类的人与非管理者区分开来。然而，对于朋友和配偶的分析，有可能用在第七章中所描述的方法区分管理者与监督者。对于流动性的分析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流动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中，权力维度是由一个较简单的二分法来衡量的。

技能维度。在本书其他大多数分析中，“专家”定义为处于

专业或管理职业中的人们。很明显，“管理职业”的类别在稀缺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所有权方面要比“专业职业”的类别更具有异质性。特别是因为，管理职业与专业不同，它一般不受资格认可的限制。因此，对于阶级一边界的渗透性分析来说，看来采用一种更加限制性的“专家”定义是可取的。在这个“专家”定义中，这一类别只限于从事专业的人们（即要求文科学士以

表 5.1 渗透性分析中阶级结构的操作

阶级位置	财产		权力	技能
	自我雇佣	有雇员	管理者或监督者位置 <sup>a</sup>	职业
雇主	是	是		
小资产阶级	是	否		
专家管理者	否		是	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业
管理者/监督者	否		是	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业之外的职业
专业人员 <sup>b</sup>			否	专业职业(即需要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职业)
技术雇员	否		否	技术、管理或半专业职业
工人	否		否	业专业、技术或管理职业外的职业

a. 对被访者，不是对朋友、配偶或出身，我们能够根据被访者在报告中是否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恰当地描述为一个“管理者位置”或一个“监督者位置”来区分“管理者”和“监督者”。

b. 为了达到分析阶级边界渗透性的目的，通过把专家限定为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我们在这里给专家类别的定义要比其他分析中所给的定义更加狭义。这样，我们所指的这个类别是“专业人员”而不是“专家”。介乎于这二者之间的技能类别也有别于其他分析，因为它包含了管理的和半专业化的职业，这些职业在别的地方被包括在专家类别里。我们所指的那个类别是“技术雇员”而不是“技术工人”，为的是把它与在其他分析中的做法区别开来。



上学位的职业)。由此，在阶级结构变量的技能维度，管理职业和技术雇员以及技术职业相结合而成为中间类别(指的是“技术雇员”)。

由于样本规模的限制，我们不能在对阶级一边界渗透性分析中运用这三个维度的所有结合。有关友谊和家庭的分析，我们能够运用8个阶级位置：雇主、小资产阶级、专家管理者、管理者、监督者、专业人员、技术雇员和工人。图表5.1根据以上3个方面对这些阶级位置进行了描述。在流动分析中，管理者和监督者是合在一起的，因此总共有7个类别。

### 渗透性事件矩阵

根据图5.1中的定义类别，我们能构建一个关于渗透性事件的 $8 \times 8$ 矩阵(关于流动性事例是一个 $7 \times 7$ 矩阵)，如图5.2所显示的那样。在流动分析中，此矩阵的一个轴线代表了阶级出身，另一轴线代表阶级归属。在对有关友谊纽带的阶级结构渗透性的分析中，矩阵的一个轴线代表了受访者的阶级位置，第二个轴线则代表了受访者朋友的阶级位置。另外，在对跨阶级家庭的分析中，一个轴线代表了丈夫的阶级位置，而另一轴线代表了双收入家庭中妻子的阶级位置。这样，表格中的单元便构成了渗透性和非渗透性事件的类别：非对角线单元代表跨阶级位置的事件；对角线单元代表了包含在某个特定阶级位置之中的事件。例如，在流动分析里，对角线上的单元是非流动性的不同类别，而非对角线中的单元则为流动性的不同类别。

在这个矩阵中，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分析不同类型的渗透性事件的相对可能性。例如：如果联结雇主和雇员的友谊纽带的可能性远低于联结专业人员和非专家的友谊纽带的可能性，那

么我们会说财产边界的渗透性要小于技能边界的渗透性。为这类事件的差异性相对几率建立模型的统计学策略是标准的对数线性分析。对于不熟悉对数线性分析的读者，在本章的附录里，有一个简短的、非技术性的介绍。

### 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所有者		雇 员			与稀缺技术的关系
有雇员	无雇员				
		专家经理		专业人员	有专业证书
				技术雇员	有技术的
雇主	小资产阶级	经理	监督者	工人	非技术的
经理	无权者	经理	监督者	无权者	

所有者与权力的关系

雇员与权力的关系

**虚线：** 这些表示分析中由于样本受规模的限制我们所不能做出的区分。在雇主和小资产阶级之中，我们不能够在专业知识维度将二者加以区分。这样，我们把全部的有产者当做非专家来处理。在经理和监督者之间，我们不能够区分专业人员和半专业人员。在专家和技术雇员之中，我们不能够区分管理者和监督者。我们把这四个类别的结合完全当做的管理者—专家类别来处理。

**技术维度：** 为了分析阶级边界的渗透性，技术维度的定义比其他分析中所使用的定义更加严格。最有技术的类别限定为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而不是相对宽泛的“专家”类别。二者之间类别融合了半专业人员和其他技术雇员。具体操作参见附录图5.1。

图5.1 在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中所使用的阶级分类

**个人的阶级位置**

	Emp	PB	EM	Mgr	S <sub>up</sub>	Pro	SE	Wkr	
朋友、配偶或父母的阶级位置	Emp	1	2	3	4	5	6	7	8
	PB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M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Mgr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S <sub>up</sub>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Pro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SE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Wkr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Emp = 雇主; P = 小资产阶级; EM = 专家经理; Mgr = 经理;  
 Su = 监督者; Pr = 专家; SE = 技术雇员; Wk = 工人

图5.2 渗透事件的矩阵

### 5.3 渗透性变量

#### 分析渗透性可供选择的方法

有两种方法可以把阶级结构中“边界渗透性”这一问题概念化。第一个策略是把阶级结构视为一系列分类界定的位置(矩阵里的单元), 诸如图 5.1 所描述的那样。因此, 一个渗透性事件可以是一个人生活中任何事物, 只要这个事物把这个人 and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些位置相联系。这样, 对于工人来说, 会有 7 种可能跨越边界的事件: 工人|雇主, 工人|小资产者, 工人|

专家管理者等等。对于专家管理者而言，有6种额外的跨越边界的事件（因为工人|专家经理边界已计算在内）。这样，在图 5.1 的 8 个阶级位置中，就有 28 个边界，而渗透性事件就可以跨越这些边界得以发生。我们将把这一点称为位置渗透性。<sup>3</sup> 那么，研究阶级边界渗透性的一个方法就是测量这 28 个位置边界中每一个的相对渗透性，并且按渗透程度把这些位置边界从最高到最低排列起来。

第二个策略是直接分析产生阶级结构中位置的 3 个基本机制：财产、权力和技能 / 专业知识。这些机制可以认为比阶级位置更为根本，因为阶级结构这个概念是由这些机制的不同方式的组合所构成的。<sup>4</sup> 那么，对资料的分析就不是研究阶级结构矩阵的成对单元之间的渗透性事件，而应专心于评估横跨由这 3 个基本机制所界定类别的渗透性事件的相对密度。我们将把这点称之为维度渗透性。

尽管重点将放在维度渗透性上，在本书对友谊、流动和家庭结构的经验性调查中，我将使用以上两个策略。大部分分析将围绕跨越财产、权力和技能边界渗透性事件相对可能性的一系列对数线性模型来进行。一旦维度渗透性的基本模式根据这 3 个阶级边界被绘制出来，我们将采用第一个策略以更加条理缜密的方式来分析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位置之间的位置渗透性。

### 维度渗透性变量：财产、权力和技能

为了检验阶级结构中由 3 个剥削机制所构成的边界相对渗透性，我们用图 5.2 中的渗透性矩阵构成了 3 个变量：财产（测量跨越财产边界的渗透性事件尺度）；权力（测量跨越权力边界的渗透性事件尺度）；技能（测量跨越技能边界的渗透性事件尺

度)。说明这些变量是如何构成的一个便捷的方法便是使用一个称为“策划矩阵”的方法。建构这些变量的策划矩阵如图 5.3 所示。在这些矩阵中，单元记录“1”或“0”表示矩阵中某个特定单元是否包括了一个跨越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三个阶级边界之一的渗透性事件。这样，3 个边界跨越变量中的每一个变量——财产、技能和权力——都是一个两分的虚拟变量，其中，“1”代表跨越一个阶级边界的事件，而“0”则相反。

在这些变量中，如果一个事件与剥削维度的三分法中的极端类别相联系，那么，这个事件就作为跨越一个特别的剥削维度的边界来对待。这样，关于财产变量，只有把雇员和雇主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才视为跨越财产边界。这样涉及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的小资产者的事件就不视为跨越财产边界。关于权力变量，把管理者和非管理者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视为跨越权力边界，而介于纯粹的监督者和管理者或者非管理者之间的事件则不是。关于技能变量，把专业人员和非专家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视为跨越技能边界，而处于技术雇员和专业人员或非专家之间的事件则不是。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边界跨越事件就这样定义为跨越相关维度的两个“层次”的事件。

受样本规模的限制，在操作这三个边界跨越变量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许多决定。首先，不可能在根据技能维度的三个层次分解管理和监督位置的同时，渗透矩阵的每一个单元中还有足够的事例来为这些分析中所使用的各种模型服务。因此，我创建了一个把四个在概念上稍微不同的类别(管理者专业人员、监督者专业人员、管理者技术雇员和监督者技术雇员)结合在一起的宽泛的“专家管理者”阶级位置。这在构建技能和权力变量过程中引出一个问题。例如，工人和不同的“专家管理者”类型之间的某些友谊只跨越权力边界的一个层次(因为实际上这个

### 跨越财产边界的两个层次 的渗透事件 [财产]

	Emp	PB	EM	Mgr	Sup	Pru	SE	Wkr
Emp	0	0	1	1	1	1	1	1
PB	0	0	0	0	0	0	0	0
EM	1	0	0	0	0	0	0	0
Mgr	1	0	0	0	0	0	0	0
Sup	1	0	0	0	0	0	0	0
Pru	1	0	0	0	0	0	0	0
SE	1	0	0	0	0	0	0	0
Wkr	1	0	0	0	0	0	0	0

### 跨越权力边界的两个层次 的渗透性事件 [权力]

	Emp	PB	EM	Mgr	Sup	Pru	SE	Wkr
Emp	0	1	0	0	0	1	1	1
PB	1	0	1	1	0	0	0	0
EM	0	1	0	0	0	1	1	1
Mgr	0	1	0	0	0	1	1	1
Sup	0	0	0	0	0	0	0	0
Pru	1	0	1	1	0	0	0	0
SE	1	0	1	1	0	0	0	0
Wkr	1	0	1	1	0	0	0	0

### 跨越技能边界的两个层次 的渗透事件 [技能]

	Emp	PB	EM	Mgr	Sup	Pru	SE	Wkr
Emp	0	0	1	0	0	1	0	0
PB	0	0	1	0	0	1	0	0
EM	1	1	0	1	1	0	0	1
Mgr	0	0	1	0	0	1	0	0
Sup	0	0	1	0	0	1	0	0
Pru	1	1	0	1	1	0	0	1
SE	0	0	0	0	0	0	0	0
Wkr	0	0	1	0	0	1	0	0

### 联系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定 位的渗透性事件 [工人]

	Emp	PB	EM	Mgr	Sup	Pru	SE	Wkr
Emp	0	0	0	0	0	0	0	1
PB	0	0	0	0	0	0	0	2
EM	0	0	0	0	0	0	0	3
Mgr	0	0	0	0	0	0	0	4
Sup	0	0	0	0	0	0	0	5
Pru	0	0	0	0	0	0	0	6
SE	0	0	0	0	0	0	0	7
Wkr	1	2	3	4	5	6	7	0

### 阶级内事件: 准独立矩阵 [Q]

	Emp	PB	EM	Mgr	Sup	Pru	SE	Wkr
Emp	1	0	0	0	0	0	0	0
PB	0	2	0	0	0	0	0	0
EM	0	0	3	0	0	0	0	0
Mgr	0	0	0	4	0	0	0	0
Sup	0	0	0	0	5	0	0	0
Pru	0	0	0	0	0	6	0	0
SE	0	0	0	0	0	0	7	0
Wkr	0	0	0	0	0	0	0	8

跨越一个阶级边界的两个层次  
 0 没有跨越边界的两个层次  
 1 仅仅跨越边界的一个层次

Emp 雇主  
 PB 小资产者  
 EM 专家管理者  
 Mgr 管理者  
 Sup 监督者  
 Pru 专业人员  
 SE 技术雇员  
 Wkr 工人

[NAME](方程式) 中变量名称方程

图 5.3 阶级—边界—跨越变量的策划矩阵

人是一个专家主管者)，而有些友谊则跨越两个层次。为了达到这些分析的目的，我决定把这一混合类型视为完全由管理专业人员组成的。因此，把工人和专家管理者相联系的事件就当做既跨越技能边界又跨越权力边界的情况来处理了。

其次，在权力变量中，雇主被认为有完全的经营管理权力，而且被作为管理者来对待。然而，小资产者因被视为没有权力而属于非管理者。也许可以认为小资产者因做组织方面的政策决定而应当视为管理者。但是，为了在财产边界和权力边界之间维持一个明晰的概念区别，我们把有关权力变量的管理价值作为要求对人而不仅仅是对事的权力来处理。

第三，由于我们只是从雇员中区分专家和非专家，技能变量就给两种自我雇佣的类别带来了问题。尽管雇主和也许还有小资产者都能够被当做“专家”，但是不管有没有资格证书或是否参加职业活动，我们把所有雇主和小资产者都分类为非专家。在关于剥削机制阶级分析方法中，对稀缺技能的所有权是剥削的基础，只要是它能够让在劳动市场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行动者在其工资中获得“租赁”的成分。由于雇主和小资产者不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两个位置都无需资格证书（特例除外），因此专业知识，就我们所使用的意义而言，与他们阶级利益的形成基本无关。<sup>5</sup>但是，在雇主和小资产者之中区分专家和非专家本应是合适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技能如何决定了以剥削为基础的利益的问题，而且是技能如何塑造了生活方式和非正式的互动机会的问题。然而，我们的样本规模不可能允许我们这样做。那么，在构建技能变量时，问题就成了是否应把自我雇佣者全部视为“专业人员”、“技术雇员”或“非专家”。根据我们用于定义非专家雇员的职业性特征，雇主和小资产者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非专家类别（69.8%的雇主和81.4%的小资产者）。因

此，我们决定，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把所有的雇主和小资产者作为非专家处理。<sup>6</sup>

### 位置渗透性变量：工人

图 5.3 的第 4 个矩阵，工人，抓住了工人阶级和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位置之间的渗透性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阶级分析家对阶级边界的渗透性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阶级结构的流动性可能对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之间联盟的形成产生影响。例如，如果流动经历把处于某些阶级类别的人们结构性地联系到其他类别中，而且如果能自由地在这些相同的阶级位置之间形成友谊关系，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预测那些阶级位置上的成员之间的阶级结盟可能性会增加。这一论据表明，除了制造跨越阶级类型构成维度的事件模型以外，我们还应当制造连接具体的成对的阶级位置渗透性事件模型，即我们所说的“位置渗透性”模型。

对我们的类型中所有阶级位置之间的相对边界渗透性进行综合考察就要涉及给 28 对阶级类别之间的位置边界排序的问题。由于参数之中的内部重复，不可能在估计 3 个边界跨越系数的同时又做到以上这一点。考虑到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联盟对社会变迁的理论重要性，我们把重点放在对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之间的边界渗透性研究上。工人变量由 7 个名义类别组成，这些类别的价值指示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位置之间的具体边界。工人被用来确切地说明涉及工人阶级的所有不同渗透性事件之间的一系列比照。当这个变量通过其他术语包括在对数线性模型中时，它接受工人阶级与每一个因未能被抓住更加普遍作用的变量而未涉及的其他类别之间的任何剩



余的单元特定组合。<sup>7</sup>

### 对角线单元：准独立矩阵

图 5.3 中的最后一个矩阵是在对流动的研究中使用的标准“准独立”矩阵(QI)。这个变量把所有非对角线上的单元，也就是越过任何阶级边界的渗透性事件，作为除了区别对角线上每一单元（即 8 个阶级内事件）以外的单独类别来对待。<sup>8</sup>虽然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些阶级内事件，但要恰当地说明边界跨越模型还要求我们引入一个标明矩阵对角线的变量。当我们在包含这三个边界跨越变量的模型中加入 QI 时，由于阶级内事件可能既影响对角单元又影响非对角单元，我们将清除任何有特定对角线影响的渗透性变量系数。这就意味着边界跨越术语的系数是对财产、技能和权力边界固有渗透性的“纯粹”或“部分”估计。这些估计不会被任何影响主要对角线的事物所玷污。

### 对称问题

从图 5.3 中可以看到，围绕主要对角线我们对 3 个边界跨越变量进行了对称操作。但在关于友谊的研究事例中，只要友谊是相互的关系，就不会产生概念性问题，因为此矩阵在逻辑上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有雇主朋友的可能性和一个雇主有工人朋友的可能性是相同的）。<sup>9</sup>然而，在关于流动性和跨阶级家庭的研究事例中，概念本身并不在逻辑上承担对称。例如，大多数人会预测女性工人嫁给男性资本家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资本家嫁给男性工人的可能性。这样，对称看来就很牵强。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六、第七、第八章中探索的模型所显

示的那样，围绕着对角线的那些资料是相当对称的。原因是，循着对数线性分析的常规程序，我们在所有这些模型里控制了矩阵每个维度的边缘分布影响。例如，在跨阶级家庭分析的事例中，我们所有的模型都控制了夫妻的边缘阶级分布。因此，即使女性工人嫁给男性资本家的总体可能性高于男性工人娶女性资本家的可能性这点仍是真实的，一旦我们控制了女性资本家要比男性资本家少得多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控制了边缘分布），那么，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机会看来是差不多的。我们正在探讨的对围绕矩阵的主要对角线的几率的对称的整体测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数据都是以大体对称的组合结构为特点的。

#### 5.4 模 型

图 5.3 中的矩阵区分各种渗透性事件。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把这些变量配置到一个基线模型和四个主要分析模型中，这些模型将用于每一种所分析的渗透性形式：

$$\log F_{ijk} = C + D_1 + D_2 + QI + C \times D_1 + C \times D_2 \quad (\text{基线})$$

$$\log F_{ijk} = \text{基线} + \text{财产} + \text{权力} + \text{技能} \quad (1)$$

$$\log F_{ijk} = \text{模型}(1) + \text{工人} \quad (2)$$

$$\log F_{ijk} = \text{模型}(1) + QI \times C \quad (3)$$

$$\log F_{ijk} = \text{模型}(3) + \text{财产} \times C + \text{权力} \times C + \text{技能} \times C \quad (4)$$

这里， $D_1$  和  $D_2$  代表渗透性矩阵的两个方面（比如，流动分析中阶级出身和阶级归属）； $C$  代表国家； $QI$  代表准独立矩阵；财产、权力、技能和工人是图 5.3 中所定义的变量； $F_{ijk}$  代表由  $D_1 \times D_2 \times \text{国家}$  组成的  $8 \times 8 \times 4$  矩阵（对流动分析来说是  $7 \times 7 \times 4$ ）中的  $ijk^{\text{th}}$  单元中的期望频率。<sup>10</sup> 在这些模型中，我们把关注的中心主要放在三个维度渗透性变量财产、权力和技能的

系数的相对数量上。每个变量的系数告诉我们一个发生在越过相关边界的渗透性事件相对于不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的对数机会。因此，这些系数中的差异是几率对数，即对一种边界比较另一种边界的相对渗透的度量。

模型（1）渗透性事件的基本添加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虽然国家作为一个添加条件并且作为与渗透性事件矩阵两个维度的边缘分布相互作用的条件而出现，但是不存在国家与渗透性变量本身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这个模型假定跨越三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模式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模型（2）在模型（1）的变量中加进了工人这个相互作用变量。这个模型使我们能够看到，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中任一位置之间发生渗透性事件的可能性大于或小于根据三个渗透性变量的累加影响所预测的可能性。

模型（3）和模型（4）让我们能够考查渗透性模式中的跨国变量。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进了国家与QI矩阵的交互作用。由于我们的分析关注的是阶级边界渗透性，我们将不会明确地对 $QI \times C$ 的交互作用，即在阶级内友谊模式中跨越国家的差别，进行考查。但是，为了从对角线上国别差异的可能影响中清除我们对国家与渗透性变量的相互影响的估测，在检验3个边界跨越系数中国别差别的方程中必须有 $QI \times C$ 交互作用。因此，模型（3）的拟合优度与模型（4）的拟合优度的比较为全面检查阶级边界渗透性中的国家差异提供了基础。

## 方法附录

### 对数线性模型的简单介绍

对数线性模型是对表格中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一个特定方法。当测定概念的自然方法是根据名义类别而不是连续变化时，这种方法尤其有用。在我们对渗透性的分析中，我们所探讨的所有主要变量都包括对阶级位置的确切说明——被访者的位置，被访者的阶级出身位置，被访者朋友的位置以及他们的配偶的位置。这些位置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别，而不是连续度量器上简单的数值。

对数线性分析的根本中心思想是机会以及几率的观念。当我们说一匹马赢得一场比赛的机会是2:1时，我们的意思是，这匹马赢的可能性为66%而输的可能性为33%。这两个百分比的比值为2。如果这匹马赢的可能性是50%，那么它取胜的机会将是1.0(即“相等”或者50:50)。实际上，我们是通过用一种结果的频率和另一种结果的频率之间的比率来计算机会的。用比较技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把事件X发生的概率定义为X确实发生的概率—— $\Pr(X=1)$ 除以X不发生的概率—— $1-\Pr(X=1)$ 。以简单的流动分析为例，在此分析中，1000个人被分成两个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假定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中60%成为中产阶级，40%成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仅有20%成为中产阶级，80%成为工人阶级。这样，中产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为60:40或1.5。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变成中产阶级的机会为20:80或0.25。如果我们要比较这两个机

会，那么我们就来计算一个几率值——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和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机会的比值。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几率是 $(60/40) \div (20/80) = (60 \times 80) \div (40 \times 20) = 6$ 。(注意：中产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概率只比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概率大3倍，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则超过6倍。)

对数线性分析是围绕着对所发生的特殊种类事件的机会以及几率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在常规的线性回归分析中，“独立变量”和“相关变量”是有区别的：前者被认为是预测（而且在许多例子中引发）相关变量。在对数线性分析中，没有“独立”和“相关”之类的变量。相反，有一个二维或更多维度的表，而且频数是被包含在表格的单元之中的。对数线性分析试图要做的基本上就是根据有关哪些单元在理论上是相同的以及哪些单元是不相同的假设来预测这些单元内的频数。

考虑一下附录图5.1中的简单流动性矩阵。此图中的每一个单元代表了一类事件。例如，左上角是出身于资本家最后又成为资本家的事件。这一特殊事件的频数标示为 $F_{11}$ 。在更加一般的情况下，图单元中事件的频数可以被标示为 $F_{ij}$ ，这里， $i$ 表示矩阵中的横行， $j$ 表示矩阵中的竖列。

对数线性分析是分析此种图表单元中频数的一个策略。任何给定的单元中的频数都可以是作为图表中每一边缘分布的频数的一个数学函数的表现——表中每行每列有多少人——以及在某一特定行列结合中的机会。当然，如果我们明确说出足够数量的机会，我们将能够出色地预测矩阵每个单元里的频数。关键的技巧是看你如何准确地通过明确说明少量机会来预测表中的频数。这就是我们构建的不同边界跨越变量所试图要做的。

		原属阶级			
		资本家阶级 1	小资产阶级 2	中产阶级 3	工人阶级
现 属 阶 级	资本家阶级 1	F <sub>11</sub>	F <sub>12</sub>	F <sub>13</sub>	F <sub>14</sub>
	小资产阶级 2	F <sub>21</sub>	F <sub>22</sub>	F <sub>23</sub>	F <sub>24</sub>
	中产阶级 3	F <sub>31</sub>	F <sub>32</sub>	F <sub>33</sub>	F <sub>34</sub>
	工人阶级 4	F <sub>41</sub>	F <sub>42</sub>	F <sub>43</sub>	F <sub>44</sub>

$F_{ij}$  = ij 单元中的频数

附录图5.1 用于对数线性分析中的流动性矩阵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在对交叉表数据的对数线性分析中，有必要根据频数的对数转换来分析这些表。因此，方程中变量的系数预测的是表中单元和边缘的频数对数，而不是频数本身。让我们看看我们用于举例说明这一点的一个变量。图5.3中定义的财产变量在渗透性事件跨越财产边界时，其值为1；而渗透性事件没有跨越边界时，其值为0。在对数线性模型中，这一变量有一个表示单元中的事例的频数的数值为1的对数与单元中的频数的数值为0的对数之间差异的系数（这点和标准线性回归中的虚拟变量的系数的意思颇为相似：是虚拟变量数值为1的人们和虚拟变量数值为0的人们的相关变量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因此，这一系数的反对数正是这些频数的比率。然而，这仅仅是存在于财产变量值为1的单元中的几率。”

许多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家主要关心的是模型“适应”资料

的程度。良好的适应意味着这个模型能相当好地再现交叉于图表单元的频数分布。在我们关注模型的整体适应性的同时，我们将更加关心三个渗透性变量系数的相对大小。这些系数的每一个都代表了一个特殊类型的渗透性事件的机会的对数。我们的预测是，所有这些渗透性系数都将是负数，并且表明这些事件的机会小于1。因此如果财产变量系数明显小于技能变量系数，就意味着跨越财产边界事件的机会要明显小于跨越技能变量边界事件的机会。由于这些系数中的每个系数的反对数是正在发生的特殊事件的机会，这些系数之间差值反对数就是一个机会比值。

## 第六章

### 阶级边界代际流动的渗透性

资本主义核心的合法原则之一是围绕着自愿交换所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构成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的观念，由于这一点，这些交换所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是公正的。这一主要原则可以分解为两个更具体的声明：(1)纯粹竞争的过程(无强制性)产生了带来收入的位置上的人们的分布；(2)自由竞争还产生了这些位置上的收入分配。因而，结果的分配在这两重意义上是公正的，既是因为人们进入这些位置的方式是公正的，又是因为附属于这些位置的收入量也是公正的，所以这些结果的分配是公正的。

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是剥削性的论点主要攻击的是第二个公正声明。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尽管收入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产生，这是事实，然而结果的分配包含着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性的占有。自愿交换被视为掩盖着一个包含于财产关系之中的基本的强制结构。

如果人们最终达到的具体阶级位置的过程本身不带有任何强制的成分，那么对市场所带来的收入的分配当做包含剥削的指责就会受到较少注意。假定收入是根据以税收为基础的彩票来分配给人们，税收系统强制性的占有人们的剩余价值，然后



根据随机抽签的方式分配不同的数量。这样，税收能够被视为一种剥削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反对彩票的人来说。人们可能会以各种理由反对这一机制，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和平等的机会得到奖金，那么这种反对将没有多少赞同者。“平等对待”至少能部分地缓和由“平等分享”的缺失所产生的不公正的感觉。<sup>1</sup>

这类规范性问题构成许多关于社会流动的社会学研究基础。成就是与作为过程的归属相比较的。通过这些过程个人被分配到社会位置上。如果个人的命运——他们的生活机会——是由才能和勤奋来决定的，那么道德直觉告诉我们，生活物质条件的结果是怎样的不平等没有太大关系。物质条件不平等仍属于规范问题，因为它们可能会妨碍成就过程发挥正常作用，但是它们本身不会在规范上显得突出。物质获得的“平等机会”，而不是结果本身的不平等程度是这一系列推理中的关键问题。

在这个规范的框架之中，代际阶级流动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在何等程度上接近自由成就模型的基本指针。社会分层体系内的人们所占据的位置与他们的父母位置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会对市场提供一个真正平等机会舞台的声明产生了怀疑。因而这些忧虑自然会导致阶级稳定性模式——父母所占据阶级的范围为成年子女所占据的阶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预测——成为基本关注点。

给出了这组规范的问题之后，如下这一点便不足为怪了：大多数社会流动研究至少与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框架有着松散的联系。韦伯主义阶级概念是围绕着市场交换中人们一般生活机会这一问题展开的。这必然会导致对生活机会的代际传递的关注——即某人自身的阶级位置由其出身和成长的阶级决定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对流动问题给予了更少的系统性关注。尽管从事有关阶级意识和阶级构成这类问题的定性和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阶级文化和社区团结的发展和转变时经常提到流动问题，但是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事实上没有关于阶级流动的系统的定量调查。因此，虽然我们对用职业术语所定义类别之间的社会流动有大量了解，但我们对社会生产关系明确定义的跨阶级边界流动的具体模式知之甚少。探讨这些模式是本章的基本目标。

## 6.1 理论期望

### 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为什么人们会预期不同程度的阶级边界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代际流动渗透性呢？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父母一代能够通过剥削机制占有剩余收入的程度造就了他们的孩子所体验的物质上的有利和不利环境。因此可以预测，剥削越与阶级边界相联系，阶级边界流动越不具有渗透性。第二，就父母一代的文化资源与不同阶级位置的联系而言，来自不同阶级出身的孩子将有不同的职业抱负和文化优势。因此，可以预测，跨越边界的“文化资本”差异越大，边界就越难渗透。第一个机制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最有关联。第二个机制与理论家比如布迪厄(1984,1985,1987)的联系更为紧密。布迪厄强调阶级关系的文化维度。戈德西尔帕(1987,99)融合了这些观点，断言阶级流动依赖不同的物质机会时，父母通过这些物质机会造就出他们孩子的经济福利，以及后代对某些职业而不是对其他职业的可能偏好。

总之，这些论点暗示了与财产和技能相联系的边界的相对不可渗透性，并且还暗示了与权力相联系的边界的较易渗透性。<sup>2</sup> 财产边界流动很可能受到限制，原因是：第一，经济和物体资本具有传递给财产拥有者的后代的可能（斯蒂尔和格鲁司吉，1990）；第二，资本家父母有能力资助他们的孩子做无利润或不举债的买卖。因此父母财产所有权“保证”了资本家后代不会向下流入工薪阶层，而资本所有权的要求是大多数雇员的孩子进入资本家阶层的障碍。财产边界的刚性会因自我雇佣（而不是工薪劳动）的财产拥有者的孩子的偏好而进一步增强。在小买卖中，无酬家庭劳动的经历可能使得自我雇佣者的后代特别强烈地尊重自我雇佣（霍特，1989：79）。至少，在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家庭中的成长经历为孩子提供一个把财产所有权作为经济活动的可行形式的范例，而父母为非自我雇佣者的孩子可能缺少这种例子。

物质环境和生活经历与高层次的技能资产相联系，也有利于划出阶级类别技能维度上的一条相对渗透的流动边界。像经济资本一样，技能和专门知识有传递给孩子的潜在可能，这就产生了一个进入专家劳动力市场的障碍。由于工资有租金成分，作为专家的父母会把重要的经济资源投资于他们孩子的教育。另外，如果专家的经济福利依赖于组织化的技能调动，那么专家父母会把特别强烈的教育承诺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机制。这些偏好构成了部分的文化资本。通过家庭社会化，作为专家的父母独特地承担了把这部分文化资本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的责任（乔帕克，1986）。

不像财产和技能边界，与管理权力相联系的遗传机制非常弱，因而我们预期管理者和非管理者流动边界将更易渗透。组织的控制是处于正式权力等级上的某个位置的特性，它不能以

物体资本或专门知识的形式个别地传递给后代。即使我们得出一个限制性的论点：即由于特定的文化资本与所处责任的位置相联系，某类代际权力传递会间接发生，我们预期这一机制比人力资本和财产的传递更加无力，而人力资本和财产造就了技能和财产边界的相对不可渗透性。

这样，我们的一个期望是，对于代际流动，财产和技能边界要比权力边界具有较小的渗透性。对与技能边界相比较的财产边界的相对流动渗透性的预期应该如何则不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假定生产资料中私人财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福利分配和剩余产品控制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财产所有权应当比任何其他阶级边界产生可以为后代获得的经济资源中的更大部分。这表明，财产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流动边界应该得到特别严格的界定。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布迪厄(Bourdieu, 1987: 733)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权力的最重要的资源是文化资本——而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象征性动员。在布迪厄的论述中，一般化的文化资产在正规的学术规范里象征性地合法化了，并且通过特定阶级的区别性的教育目标得以代际再生(布迪厄和帕斯龙, 1990, 153~164)。这个观点表明技能边界的代际流动最不易渗透。

以上论点暗含着阶级边界代际流动渗透性从低到高的两种排序：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财产、技能、权力；布迪厄的以文化为基础的阶级分析的技能、财产、权力。这两个学说都依靠这样两个假设：其一，把财产传给后代的能力是生产性资源里面财产权利的一个不可能分割的方面。其二，与这些资料相联系的流动边界的不可渗透性是这些资源在社会权利分布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一个作用。

## 跨国变化

马克思主义和布迪厄的阶级研究方法中的推论，暗示了阶级边界渗透型式中的预期的跨国变量。两种方法都认为，经济制度越是纯资本主义化，相对其他边界来说财产边界越不可渗透。用布迪厄的话来表述，就是一个特定的“资本形式”越是靠近权力和特权系统的中心，拥有它的人为了维护这一资本的再生，对它的关注越是强烈。这意味着，根据阶级边界的渗透性，资本主义关系越是支配着阶级结构，那么获得资本主义财产的障碍也就越大。因此，在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中，布迪厄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财产边界渗透性应比技能边界渗透性小的观点。<sup>3</sup>这不符合流行的资本主义的神话。该神话认为，“自由市场”越是开放和自由，无产者个人聚集财富以及跨越工资收入者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边界的机会就越大。

本章中我们将分析四个国家的数据：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虽然这四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它们在经济受资本主义原则支配的程度方面却明显不同。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家族中，美国通常被认为在组织结构和流行文化两个方面是最纯粹资本主义的，而瑞典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典型。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中，政府在反对由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中扮演着一个系统性角色。根据柯里和斯科尔尼克(1988: 41 ~ 43)所引用的数据，除日本以外，美国的税率最低(1984年为29%)，而且政府开支占GDP的比率(1983年为38%)，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低的。然而瑞典在这两个方面是最高的(税收为50.5%，支出为GDP的66%)。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典政府在社会福利支出水平上也是最高的(金斯博格，

1992, 33)。在某些指标上, 加拿大通常与美国更接近, 而挪威与瑞典更接近。

这导致了对所研究的4个国家的两个相比较的假设: 第一, 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财产边界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的财产边界相比, 其渗透性要小些。第二, 北美国家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财产边界与技能边界之间渗透性方面的差异要更大些。

## 假 设

结合所有这些论点产生了5个与代际流动阶级边界相对渗透性有关的一般假设。

假设1 权力边界是3个阶级边界中最具渗透性的。

假设2 马克思主义假设: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由最小到最大程度的排列顺序是财产、技能、权力。

假设3 文化资本假设: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由最小到最大程度的排列顺序是技能、财产、权力。

假设4 北美财产边界的渗透性要比斯堪的纳维亚财产边界的渗透性小些。

假设5 财产边界与技能边界之间在渗透性方面的差异, 北美国家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大些。

这些假设中的预测容易受到来自关于职业流动核心研究的批评。在流动研究中, 最有力的发现之一是人们低层次的流动是由非农民出身的人流入职业“农民”的人口流动和相伴随的农民中高层次的自我补充。既然大多数农民都是自我雇佣者, 那么我们在财产和技能边界中所观察到的任何差异都可能是农民职业边界低渗透性的一个结果。当然, 用于解释农民的特殊

流动模式的一些机制——特别是家庭农场的特殊继承性以及“当自己的老板”的偏好——能够被解释为与农业的阶级特性相关。但是其他因素，诸如与农业劳动相关的专门技能和农民的后代对农场工作的强烈偏好（格鲁司吉和霍瑟，1984），相对来说与农业的特定的阶级维度关系无关。这样由于农业的独特的职业特性而不是阶级的特性，假设2中财产边界比技能边界有更大的不可渗透性真可能是农民的相对稳定性的一个产物。因此，看似一个阶级障碍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是一个职业障碍。

受样本规模的限制，要用目前的数据通过检验这些模型来全面探讨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模型中我们允许农民职业与阶级流动矩阵的维度是相互作用的。然而我们所能做的是从矩阵中排除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这样，我们就将能检查我们获得的整个样本的结果对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中的阶级边界的适用程度了。这导致了第6个假设：

假设6 当农民出身和 / 或归属的人们排除在分析之外时，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的基本模式仍将是一样的。

### 性别与代际流动的阶级边界渗透性

大多数社会流动的研究都局限于分析男性的流动。<sup>4</sup>这可能部分地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的性别歧视，但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对女性流动问题的关注，这在界定阶级结构中，在已婚女性位置及在流动矩阵中说明她们“归属”位置的过程中，反映出理论上的模糊不清。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首先，假如大多数流动研究是根据劳动力职业来界定出身和归属的，那么，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程度在传统上要比已婚男性更低而且更不稳定的事实，使人把一个有活力的职业归属分配给许多女性便成为

问题。即使人们能把主妇的角色当做一个“职业”，这很明显超出了韦伯主义的有关市场交换中一般生活机会概念的观念范围。其次，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大多数已婚女性的生活标准，甚至当她们处于有酬劳动力职业时，更多依赖于丈夫的而不是自己的职业。这再次使得根据她们自己的职业在流动矩阵中给她们分配一个明确的“归属”，从概念上讲也是成为问题的。由于这些复杂因素，多数研究者简单地规避了这一问题，而仅仅研究男性代际流动。

虽然本章大部分关注的是男性的阶级边界的流动渗透性，但我还将提出一个有关女性的探索性分析。这个分析之所以是探索性的既是由于我没有强烈地系统陈述出有关渗透性中的性别差异的演绎性假设，从而使这个研究有一个更加归纳性特征；又是由于资料中女性劳动力的样本量相当小，从而做出系统性假设检验就很困难。

在性别分析中，我们的目标是双重的。第一，我们想看看在男性中观察到的阶级边界渗透性模式是否也适合女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没有用任何具体事物来说明阶级边界渗透性如何因男性和女性而不同。当然，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来从事研究的学者可能对性别差异有特殊的期望，但这些期望应该不是完全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本身，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观点中没有表明边界渗透性的排列次序仅适用于男性。由于疏忽，我们的核心假设是：

假设 7 女性中代际流动的边界渗透性的排列顺序与男性的相同。

我们考察女性阶级边界渗透性的第二个目的是以初步的方式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双收入家庭里已婚女性的阶级位置及其阶级流动加以概念化。我们已经在第二章中简单地讨



论了这一问题，在后文第十章中还将更为详细地讨论。戈德西尔帕和其他人赞成把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阶级分析的单位，由他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经济活动把她们分派到某个阶级，这会导致对女性阶级流动的虚假高估计。既然通常女性占据白领办事员和销售工作，戈德西尔帕认为从源自父亲的蓝领出身向这些阶级的流动造成了一个关于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阶级之间“阶级”边界渗透性的错误印象。<sup>5</sup>

为了探讨用于分析界定一阶级位置的适度的单位这一问题，我们将比较女性的边界渗透性模式——她们的阶级位置是根据个人一阶级位置来界定的。<sup>6</sup>我们要考查的基本假设是：

假设 8 戈德西尔帕家庭阶级假设。当个人而不是家庭被用作分析界定一阶级的位置的单位时，女性的阶级边界渗透性会更大。

## 6.2 与以往流动研究的关系<sup>7</sup>

本章试图通过分析阶级边界的动态渗透性的一个方面来对我们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知识做出贡献。因此，我们的目的主要不是对有关社会流动本身的一般文献做出贡献。然而简单地讨论一下我们研究的分析策略和目标与别的流动研究之间的关系将是有益的。在本章的结论中，我将把我们的调研发现与以往流动研究的主要结果联系起来。

### 分析策略

目前在代际流动研究中，两种方法占了主导地位。<sup>8</sup>首先是代际阶级流动的调查，通常利用约翰·戈德西尔帕的以职业为

基础的阶级图表(参见例如,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85,1987a,1987b,1993;埃里克逊,戈德西尔帕和波托卡雷罗,1979,1982,1983;戈德西尔帕,1987;石田博,戈德西尔帕和埃里克逊,1991;琼斯和戴维斯,1986,1988a,1988b)。这些分析根据限定名义阶级类别的职业市场和工作情况把阶级结构概念化(戈德西尔帕,1987,40~43)。他们认为没有坚实的等级制度做阶级结构的基础(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93:123;戈德西尔帕1987,43),而且没有系统性的“垂直”倾度能够解释相对流动机会。从任何出身到任何归属的流动的机会不是阶级类别之间度量距离的连续函数(参考霍特和霍瑟,1991),然而它反映出了促进或阻碍出身与归属之间流动的可能性的不同的机制。这些机制是由“拓扑的”模型(霍特,1983,37~51)提出的,这种模型根据每个单元都是所探讨的流动机制的主题这种方法,把流动矩阵的每个单元描绘成一系列的虚拟变量。

在戈德西尔帕阶级流动框架中,3个基本原则常常被认为造就了相对流动机会:不同阶级位置的相对必要,特殊阶级出身的相对优势,与特定阶级归属相关的障碍(戈德西尔帕,1987,99)。在由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87a,1992,121~131)发展起来的“核心流动模型”中,这些思想通过特定的虚拟变量被操作化,它们抓住了阶级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过度的对角线稳定性,农业与非农业类别之间的部门流动以及剩余的流动倾向。<sup>9</sup>

第二种主要方法是根据基本的垂直维度将流动概念化(参见示例布林,1987,布林和惠兰,1985,冈泽布姆,留久克斯和特雷曼,1989;格鲁司吉和霍瑟,1984;霍瑟和格鲁司吉,1988;霍特,1988,1989第六章;霍特和霍瑟,1991;霍特和

杰克逊, 1986; 沃恩, 1990, 1992; 谢, 1992; 山口和雄, 1987)。通常, 这类研究所关注的是代际职业流动而不是阶级流动, 但有些例子是运用戈德西尔帕的阶级类别来进行研究的。然而这些类别把流动解释成为垂直移动(尽管戈德西尔帕明确反对阶级结构有一个基本的垂直维度这一观点)。垂直流动描述了社会结构中“上向”或“下向”流动, 在这些社会结构中, 一个已知移动的概率在(数学上)函数上与类别之间的间距有关系。此类距离能表示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声望或其他特性中的职业差异。不论等级制度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假定能够按照社会经济性质的某种度量给类别进行有意义的衡量, 那么, 相对流动模式应(至少就部分而言)反映出这些分数值所代表的类别之间的距离。上述提及的研究通过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对数乘法关系模型说明了这一点。对数乘法关系模型在塑造流动机会中的垂直趋势中明显地考虑到类别量值(参见艾格雷斯特, 1984, 1990; 古德曼, 1979, 1984; 霍特, 56~68 说明了这些模型)。

本章的研究与这两个策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像韦伯主义阶级流动研究一样, 我提出了阶级结构的名义度量以及后来的拓扑对数线性模型。我们要探讨的这些模型也以这样一个观点为预设前提, 即相对流动模式既反映了与阶级出身的有利与不利以及进入阶级归属的障碍等相联系的一般机制, 又反映了与家庭出身相联系的文化资源。韦伯主义阶级分析家没有明确设计出跨越阶级结构的组成维度的流动轨迹。在决定哪种机制最强烈地限制或鼓励了流动的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实际上, 戈德西尔帕的第一阶级在概念上的不一致, 加之在大业主、高地位专业人员和高层管理者概念上的不一致, 妨碍了这一分析。

阶级边界渗透性研究也与某些垂直流动分析有一定关系。

对阶级结构的财产和技能维度的三分法处理,表示了一类边界跨越的垂直图像,甚至对权力边界的两分法处理也表示了上向/下向移动。更为明显的是,这里所采用的方法与各种职业流动研究所采用的霍特提出的“多维”关系模型(1983: 76~80, 1984, 1988, 1989: 62~68)与沃恩(1992)提出的垂直和非垂直流动的“混合”模型之间也有着相似之处。霍特通过给各职业类别分派不同的分值来反映职业地位、自治和培训的层次,他认为这构成了分层等级的基础。这样就能够决定有关每一个单独维度的垂直流动机会。为了考察受限制的变动流动发生在自我雇佣和工薪劳动力之间,即职业阶层之间等级差异影响的净值的论点,沃恩发展了一个新的阶级结构分类。这一分类明确地包括了自我雇佣者。之后,他创造了自我雇佣者与工薪劳动力之间的自动伴随垂直流动的模型。这样,这两个模型都与这里的尝试相似,即通过研究阶级结构中不同边界的相对渗透性来构造流动过程的具体理论维度。

然而,在垂直流动分析与我们的边界渗透性分析之间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首先,三维阶级分类没有暗含任何阶级位置整体垂直等级。虽然有可能根据阶级位置间流动普遍或稀少的程度来给阶级位置间边界排序,但这并不是说阶级结构中有一个相应于位置的整体垂直等级。虽然阶级类别间的流动边界可能或多或少地被定义好了,但位置本身却不能按任何弓形续谱排列。其次,虽然关于垂直流动研究探讨了职业阶层的多维关系模型,但此类研究并没有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3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因此,在我们所注意到的有关代际流动的任何当代分析中,有差异的阶级边界渗透性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系统性的探讨。

## 阶级结构的概念化

通常，在分层研究中，与这里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最为接近的阶级分析框架是由约翰·戈德西尔帕创建的(戈德西尔帕, 1987; 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 1987a, 1987b, 1993; 石田博, 戈德西尔帕和埃里克逊, 1991; 琼斯和戴维斯, 1986)。正如我的阶级类别中所反映的那样, 戈德西尔帕承认财产、专门知识和管理权力的重要性, 并且像我的图表一样, 他根据数据的有效数据和分析的情况, 运用不同数量的类别, 有效地设计了他的阶级框架。虽然这两个框架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不管其中一个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另一个源于韦伯主义传统这一事实), 但有两个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其一, 这一点已经被注意到了, 依照剥削而不仅仅是“生活机会”, 我们使用的框架解释了阶级关系。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剥削而不仅仅是特权和优势, 在划分阶级和形成他们的对立关系方面最具决定意义。其二, 在对阶级结构概念详细叙述的方面, 戈德西尔帕(1987, 39)把他的“第一阶级”、大业主、大型国有和私人组织的高层专业人员和高级官员等合成为一个单独类别。这一点有效地消除了我们的3个阶级边界中的那些控制任何一个边界的最高层次资产的人们同这些边界的任何一个人的区别。<sup>10</sup> 这就不可能利用戈德西尔帕的阶级类别直接比较阶级结构中财产、技能和权力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 比较设计

资料分析将首先开始于假定4个国家中阶级边界渗透性模

式是相同的。实际上，这暗示着产生边界渗透性的机制反映的不是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而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般特性。这就是与阶级分析相对等的职业流动研究中的著名“FJH假设”(费舍曼、琼斯和霍瑟，1975)。这一假设认为产生职业流动的机制在工业化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在我们探讨了这些假设跨国一致性的模型之后，我们在模型中加进了国家间相互作用。我们对方程系数中的跨国差异的解释，表明在产生跨越特定阶级边界流动的因果结构中存在着重要的国家变化。这一方法不同于以前使用FJH假设研究。此方法中，我们将检测衡量跨国相对边界渗透性系数中的特殊差异，而不去完全关注模型的总体适应性或这些模型的单个系数。因此，这个比较设计为我们可能得出的任何宽泛结论提供了某种证实。这些结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边界的流动渗透性以及探讨全国性的具体变化模式的情况相关的。

### 6.3 结 果

我们首先探讨关于第五章最后所提出的模型(1)和(2)的男性的结果，然后转向模型(3)和(4)的跨国比较。当农场出身和归属的人们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时，随之而来的是考察模型(1)。我们将以考察女性的基本模型作为本章的结束。

#### 男性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表6.1描述了模型(1)中有关男性的3个跨阶级变量的系数。”

我们将在整个讨论中把这些当做“流动渗透性系数”。很明显，模型(1)在适应方面对基线模型是一个改进：可能性比率卡方(L<sup>2</sup>)值在自由度为3的情况下减少到了108。显著的负财产和技能系数说明这两个阶级边界构成了代际流动的障碍。比较起来，权力边界看来相对容易渗透。

表6.1底部分组展示了对渗透性系数差异的正式检验。根据这些数据和变量，财产边界流动渗透性要小于技能边界和权力边界，而技能边界渗透性又小于权力边界。这些结果在广义上符合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期望。(假设 1 和 2)

表6.1 阶级边界流动的渗透性参数估计：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变量	系数(s.e.)	反对数
边界跨越系数 <sup>a</sup>		
财产	-1.10(0.125)***	0.33
权力	-0.08(0.049) <sup>b</sup>	0.92
技能	-0.61(0.099)***	0.55
尺度偏差(134d.f.)	192.2	
基线尺度偏差(137d.f.) <sup>c</sup>	300.6	
整体适应性改进	108.4***	
边界跨越系数中的差异		
财产—权力	-1.01(0.118)***	
技能—权力	-0.52(0.100)***	
财产—技能	-0.49(0.155)**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p<0.05      \*\*p<0.01      \*\*\*p<0.001

- a. 此系数从模型(1)计算得出： $\log_{ijk} = \text{国家} + \text{出身} + \text{归属}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出身} + \text{国家} \times \text{归属} + \text{财产} + \text{权力} + \text{技能}$
- b. 此系数利用单尾检验的显著水平为0.05，这种检验是适当地给出了假设的定向特征。
- c. 基线模型： $\log_{ijk} = \text{国家} + \text{出身} + \text{归属}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出身} + \text{国家} \times \text{归属}$

应当否认的是模型(1)中较高层次的权力边界渗透性是由于对权力的测量比对财产或技能的测量更加粗糙这一事实,因为我们仅能够把权力维度二分化,而其他两个维度都能三分化。为了查看这一反对是否合理,我们可以通过把雇主和小资产者压缩为一个更加分散的自我雇佣类别,并把专业人员和技术雇员压缩为广义的专家类别来重新分析模型(1)。虽然这的确减少了财产和技能系数(分别从-1.09到-0.51,从-0.59到-0.42),但是,两个渗透性系数仍显著小于0并且显著小于权力系数。

### 男性跨工人阶级边界的流动

表6.2展示了模型(2)的结果,模型(2)中基本的附加边界跨越模型加进了工人位置渗透性变量。这一模型的适应性是对模型(1)的重大改进,表明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间的流动可能性,不仅仅是跨越界定阶级结构的3个阶级边界的流动的平均可能性的附属功能。模型(2)的结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人与小资产者之间阶级流动渗透性系数(3个边界跨越边界变量的累加影响的净值)明显大于0,而工人与雇主之间流动系数又明显小于0。很显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跨越财产边界流动的重要社会障碍不是在工人与自我雇佣者之间而是在工人与雇主之间。

根据表6.2中的结论,通过把与表中某特定单元相关的系数累加起来,依照边界渗透性的整体程度,有可能把所有工人阶级与其他特定地位之间的边界排列成序。流动矩阵中工人|非工人单元系数的总和的反对数告诉了我们有关工人阶级的不同流动经历的相对机会(模型中其他影响的净值)。如表6.3中所显示的:这些结果表明,工人|专业人员流动机会两倍于工人|



雇主流动，而工人 | 小资产者流动的机会则超过工人 | 雇主流动的5倍。

### 男性跨国变化

表6.4显示出了国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对国家相互作用的

- 表 6.2 与跨越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变量	系数(s.e.)
财产	-1.05(0.15)***
权力	0.18(0.09)
技能	-0.40(0.12)***
工人与非工人之间流动 <sup>a</sup>	
层次 1 <sup>b</sup> 工人   雇主	-0.52(0.13)***
层次 2 工人   小资产者	0.38(0.11)***
层次 3 工人   专家管理者	-0.33(0.13)**
层次 4 工人   管理者 / 监督者	-0.17(0.11)
层次 5 工人   专业人员	-0.24(0.21)
层次 6 工人   技术雇员	-0.15(0.14)
度量偏差 (129d.f.)	162.7
对模型(1)的改进	29.5***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p<0.05    \*\*p<0.01    \*\*\*p<0.001

- a.工人 | 非工人流动是用一系列名义变量来衡量的。系数显示出了一特定类别的工人 | 非工人流动与非跨越工人边界流动(即工人 | 工人稳定性与非工人 | 非工人稳定性的结合)之间的差异。
- b.“层次”指的是图 5.3 的工人变量结构矩阵中的类别。由于不能在阶级出身方面区分管理者和监督者，因此图 5.3 的结构矩阵中层次 4 和 5 在流动分析中是结合在一起的。

表 6.3 跨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边界非渗透性排序: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跨阶级边界	得出总体渗透性的累加系数	系数总和的累加系数		系数总和和反对数	
		与工人   雇主流动	相关的反对数	与工人   雇主流动	相关的反对数
1. 工人   雇主	财产 + 权力 + 工人(层次 1)*	-1.39	0.25	1.0	
2. 工人   专业人员	技能 + 工人(层次 5)	-0.65	0.52	2.1	
3. 工人   专家管理者	权力 + 技能 + 工人(层次 3)	-0.55	0.58	2.3	
4. 工人   技术雇员	工人(层次 6)	-0.15	0.86	3.4	
5. 工人   管理者 / 监督者	权力 + 工人(层次 4)	0.01	1.00	4.1	
6. 工人   小资产者	工人(层次 2)	0.38	1.46	5.9	

a. “层次”指的是图 5.3 中的工人变量的结构矩阵中的类别以及表 6.2 中所报告的系数。由于不能在阶级出身方面区分管理者和监督者，因此结构矩阵中层次 4 和 5 流动分析中是合在一起的。

总体检验中(模型(4)对模型(3)),当国家与边界跨越变量的相互作用加到了等式中时,在拟合优度方面没有明显的改进。<sup>12</sup>这一结果会诱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表6.2所展示的渗透性的基本模式对于我们样本中的四个国家来说是没变化的。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我们单独看每个国家内的渗透性系数时(表6.4 II组),一个清晰的跨国变化模式便出现了。在美国和加拿大,财产边界渗透性显著小于技能边界;在瑞典和挪威,这两个边界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实际上,瑞典的技能边界渗透性稍微(尽管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小于财产边界。

在跨国变化分析中经常发生某些系数在一些国家中很重要,而在其他国家中则不是这种情况;而且这些系数中的跨国差异本身在对国家作用的总体检验中并不重要。总体检验的重要性没能加大边界渗透性中的明显的跨国差异的原因之一是,这类总体检验削弱了发现以上所指类别的具体差异的统计力量。在检验四国的三个阶级边界的跨国变化的同时,我们用尽了九个自由度,然而对特定国家流动表的考察表明,仅有两个突出的跨国差异,即在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关于财产和技能的差异。因此,我们用以下模型重新说明国家相互作用。

$$\log F_{ijk} = \text{模型(3)} + \text{财产} \times \text{NA} + \text{技能} \times \text{NA} \quad (5)$$

这里NA是一个区分两个北美国家与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虚拟变量。<sup>13</sup>结果(表6.4组IV)表明这两个阶级边界有差异的流动渗透性中有一个显著的跨国差异:财产边界与技能边界之间的差异方面北美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大0.74(有效水平0.05)。这一调查研究结果主要是由于北美的财产边界较不易渗透(与斯堪的纳维亚相比,北美渗透性要小,-0.56,有效水平0.05)。这样,这些结果与假设4和5是一致的,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受到政府干预较少约束的社会中,财产边界较不易渗透。

表 6.4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中跨国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劳动力

I 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		d.f.	度量偏差
模型			
基线模型		137	300.6
模型(1): 财产 + 权力 + 技能		134	192.2
模型(2): 模型(1)+工人		129	162.7
模型(3): 模型(1)+QI × 国家		113	157.5
模型(4): 模型(3)+财产 × C+权力 × C+技能 × C		104	146.2
模型(5): 模型(3)+财产 × NA+技能 × NA <sup>a</sup>		111	151.5
模型(4)对模型(3)		9	11.3
模型(5)对模型(3)		2	6 <sup>b</sup>
II 国家内边界渗透性系数			
	美国	加拿大	瑞典
财产	-1.36(0.28)***	-1.33(0.21)***	-0.67(0.35)*
权力	-0.03(0.11)	-0.04(0.09)	-0.29(0.12)*
技能	-0.45(0.20)*	-0.54(0.17)***	-0.09(0.27)***
			挪威
			-0.39(0.23)***
			-0.03(0.09)
			-0.63(0.19)***

续表

III 国家内渗透性系数间的差异				
	美国	加拿大	瑞典	挪威
财产—权力	-1.33(0.26)***	-1.29(0.20)***	-0.39(0.33)	-0.90(0.22)***
技能—权力	-0.43(0.20)*	-0.50(0.17)**	-0.62(0.27)*	-0.60(0.19)***
财产—技能	-0.90(0.33)**	-0.79(0.26)***	+0.23(0.42)	-0.30(0.29)

IV 北美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在财产和技能边界渗透性方面的差异

财产	-0.56(0.24)*
技能	+0.18(0.20)
财产—技能	-0.74(0.32)*

显著水平: \*p<0.05 \*\*p<0.01 \*\*\*p<0.001

a. NA = 北美名义变量(美国和加拿大 = 1; 瑞典和挪威 = 0), 既然财产系数不因国家而变化, 那么我们也只考虑 NA 与财产和技能的相互作用。

## 农民问题

表6.5展示了当把农民出身或当前是农民的人排除在流动矩阵之外时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分析结果。这种排除减少了每个国家约20.25%的样本规模。把农场出身和归属排除在分析之外的确影响到了财产边界的技能边界系数的大小：当农民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时，两个边界看来似乎更易渗透(即系数是较小的负值)。例如美国样本中，财产边界的系数总体样本为-1.36，而排除农场出身和归属的样本为-0.86；技能边界的系数总体样本是-0.45，排除农民的样本为-0.32。结果，当农民排除在分析之外时，财产和技能边界之间在不易渗透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变

表6.5 对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参数估计，排除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

财产跨越变量	边界跨越系数			
	所有国家合起来	北美	斯堪的纳维亚	
财产	-0.70(0.18)***	-0.83(0.24)***	-0.54(0.28)*	
权力	-0.02(0.06)	0.08(0.08)	-0.06(0.08)	
技能	-0.44(0.10)***	-0.34(0.14)*	-0.57(0.16)***	
财产-技能	-0.26(0.20)	-0.05(0.26)*	0.02(0.32)	
财产跨越变量	边界跨越系数			
	美国	加拿大	瑞典	挪威
财产	-0.86(0.41)*	-0.82(0.29)**	-0.49(0.49)	-0.60(0.34)
权力	0.09(0.11)	0.09(0.11)	-0.24(0.14)	0.05(0.10)
技能	-0.32(0.21)	-0.33(0.18)*	-0.81(0.28)**	-0.45(0.20)*
财产-技能	-0.55(0.45)	-0.49(0.34)	0.32(0.55)	-0.16(0.39)

显著水平(单尾检验):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这个系数的t-比率为1.875。这刚好低于双尾检验的常见的显著水平 $p < 0.05$ 。

小。因此，财产和技能边界渗透性的一些总体差异看来的确与农民的特殊流动模式有联系。

然而，我们在表 6.4 所观察到的结果的基本模式在表 6.5 中仍是这样。在两个北美国家之中，财产边界渗透性小于(在  $p < 0.06$  水平上，双尾检验)技能边界，而在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非农场样本中的这些边界的渗透性程度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sup>14</sup> 因此，有差异的阶级边界渗透性的一般模式不只是农民职业稳定性的产物。

### 性别与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拿男性结果与女性结果相比较，其间异同很有趣。表 6.6 表明，对于女性，正如男性一样，财产和技能构成了阶级流动的明显统计学方面的障碍。不管是把个人还是家庭用作界定女性阶级位置的分析单元，都是正确的。同样，正如对男性分析的结果一样，权力边界渗透性比技能和财产边界渗透性要明显的小。然而与男性结果不同的是，对于女性来说，财产边界渗透性明显小于技能边界。

女性与男性模式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异集中在财产边界上，这条边界对女性比对男性更具明显渗透性(参见表 6.6 Ⅲ组)。使用女性直接阶级的财产边界的渗透性系数是 -0.42，相比之下男性为 -1.10。得出的这些系数的反对数表明，女性的财产边界流动的相对机会几乎两倍于男性。相比之下，男性与女性间技能和权力渗透性系数几乎没什么不同。这些结果不以个人阶级或家庭阶级作为界定女性阶级位置的基础。

对女性较男性在财产边界阶级流动方面具有更大渗透性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婚姻为女性提供了比男性更强有力的跨越财

表 6.6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参数估计: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男性与女性劳动力比较

变量	系 数 (s.e.)		
I 边界跨越系数 <sup>a</sup>	女性: 直接阶级 <sup>b</sup>	女性: 间接 / 直接	男性: 直接阶级
财产	-0.42(0.19)***	-0.5.(0.17)***	-1.10(0.13)***
权力	-0.08(0.06)	-0.15(0.06)**	-0.08(0.05)#
技能	-0.16(0.11)***	-0.59(0.10)***	-0.16(0.10)***
度量偏差(134d.f.)	158.6	170.8	192.2
基线度量偏差(137d.f.) <sup>c</sup>	190.8	208.2	300.6
总体适应性改进	32.2***	37.4***	108.4***
II 性别类别内边界跨越系数中的差异			
财产—权力	-0.34(0.18)#	-0.36(0.16)*	-1.01(0.12)***
技能—权力	-0.52(0.13)***	-0.44(0.11)***	-0.52(0.10)***
财产—技能	0.18(0.22)	0.08(0.20)	-0.49(0.16)**
III 边界跨越系数中的性别差异	女性直接对 男性直接	女性间接 / 直接 对男性直接	
财产	0.67(0.23)**	0.59(0.21)**	
权力	0.00(0.08)	-0.06(0.08)	
技能	0.00(0.15)	0.02(0.14)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这些系数是从模型(1)中计算出的:  $\log^{ijk} = \text{国家} + \text{出身} + \text{归属}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出身} + \text{国家} \times \text{归属} + \text{财产} + \text{权力} + \text{技能}$ 。

b. “直接阶级”定义为个人自己职业的阶级; “间接 / 直接阶级”定义为如果已婚则为个人配偶职业的阶级, 如果单身则为自己职业的阶级。

c. 基线模型是:  $\log^{ijk} = \text{国家} + \text{出身} + \text{归属}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出身} + \text{国家} \times \text{归属}$



产边界(通往两个方向)的通道。例如:由于性别影响职业抱负和阶级机会的途径,可以预期,当资本家出身的男性娶非资本家出身的女性时,他们的两个比资本家出身的女性嫁给非资本家出身的男性的两个人更可能成为资本家归属(不管这些归属是以直接或是间接方式加以界定)。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女性财产边界渗透性要比男性财产边界渗透性更大。虽然在当前的资料中,我们没有办法探讨这一假设,但它表明,“婚姻市场”对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影响,至少是当涉及阶级结构的财产维度时。<sup>15</sup>

表6.7列出了使用工人相互作用变量时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之间女性阶级流动的结果。和男性情况相同,模型(2)中工人|雇主边界与工人|专家管理者边界的渗透性明显为负数,表明这些边界的渗透性比根据累加边界跨越模型的预测要小。再次,如模型(1)中所显示的那样,使用个人阶级或家庭阶级作为断定当前阶级位置标准对于女性来说,其结果的差异很小。

表6.8中显示了女性跨国相互作用的结果。如男性结果一样,当模型(3)中加入了国家相互作用时模型(1)的拟合优度没有明显的提高。同样,与男性的情况一样,在特定系数中,缺少整个国家的相互作用,暗示着一些更加精细的跨国变化。然而,与男性情况不一样的是,女性的跨国比较不在北美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而在美国与其他三国之间。正如表6.8(Ⅱ组)显示的那样,美国技能边界没有构成女性阶级流动的明显障碍,然而在其他三个国家中,技能边界系数明显为负数(实际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男性来说是同样的)。美国与其他所有三国之间的差异本身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得出这些系数的反对数表明美国女性跨专家边界流动的机会基本上两倍于其他三国的女性。<sup>16</sup>我不能为这些女性边界渗透中的跨国变化的特殊模式提供一个令人

信服的解释。

表 6.7 与跨工人阶级边界流动的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大、瑞典和挪威的女性与男性劳动力的比较

变量	系数 (s.e.)		
	女性： 直接阶级	女性： 间接 / 直接	男性： 直接
财产	-0.55***	-0.48***	-1.05***
权力	-0.05	-0.01	0.18
技能	-0.40***	-0.47***	-0.40***
工人与非工人间的流动:			
层次 1* 工人   雇主	-0.34(0.14)*	-0.43(0.15)**	-0.52(0.13)**
层次 2 工人   小资者	0.01(0.12)	0.07(0.12)	0.38(0.11)**
层次 3 工人   专家管理者	0.40(0.153)*	-0.30(0.14)*	-0.33(0.13)**
层次 4 工人   管理者 / 监督者	-0.11(0.12)	-0.21(0.12)	-0.17(0.11)
层次 5 工人   专业人员	-0.46(0.26)	-0.34(0.23)	-0.24(0.21)
层次 6 工人   技术工人	-0.51(0.14)**	-0.22(0.15)	-0.15(0.14)
模型 (3) 的度量偏差 (129d.f.)	147.0	162.0	166.0
模型 (1) 的度量偏差 (134d.f.)	158.6	170.8	196.5
适应性的改进 (5df)	9.6	8.8	30.5***
显著水平: *p<0.05    **p<0.01    ***p<0.001			

a.“层次”指的是图 5.3 工人变量结构矩阵中的类别。由于不能在阶级出身方面区分出管理者和监督者，图 5.3 中结构矩阵里的层次 4 和 5 在此分析中结合在一起。

## 6.4 流动研究结果的含义

这些结果如何与以前的社会流动研究相符合呢?这一研究项目与以往流动研究之间在概念框架和分析目标上的差异使我们难以对这些结果做出直接比较。在我们的类别与分层研究的职业层次或者和大多数受韦伯主义启发的研究相关的阶级类别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立性。更进一步说,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大多数流动研究中那样关注流动形式的总体轮廓,而是关心相对边界渗透性的具体问题——涉及对流动系数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差异分析。

然而,利用其他研究的调研结果,能够做出一些比较。约翰·戈德西尔帕受韦伯主义启发的阶级流动研究表明:首先,在服务阶级内和农场与非农场小资产阶级内存在不匀称的稳定性,其次白领和蓝领阶级之间以及农业与非农业阶级之间的整个阶级结构存在着不同强度的流动障碍(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87a,1993:第四章;埃里克逊,戈德西尔帕和波托卡雷罗和冈泽布姆,1987)。职业流动研究反复证实农民的不匀称稳定,以及农民与其他层次之间的边界(冈泽布姆等,1989;霍特,1984,1989:第六章;霍特和霍瑟,1991;沃恩,1990)。职业流动研究还表明,随着类别度量距离的增加,层次间流动机会相应减少(沃恩,1992)。既然大多数职业流动研究或利用或得出度量分值,这些分值把专业人员、管理者和业主等职业排列在一个极端,而把半技术或非技术体力工人排在另一极端(例如霍瑟,1984;霍特和霍瑟,1991;冈泽布姆等,1989),这些结果暗示了一个由流动机会中垂直分层所主导的流动体制。在这里,流动机会与社会经济地位呈线性变化(冈泽布姆、特雷曼和

表 6.8 阶级边界流动渗透性的跨国相互作用: 美国、加拿大、瑞典、挪威的男性女性比较

## I. 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

模型	d.f.	度量偏差			
		女性:		男性	
		直接	间接/直接	直接	间接/直接
基线模型	137	190.8	208.0	300.6	
模型(1): 财产 + 权力 + 技能	134	158.6	170.8	192.2	
模型(2): 模型(1)+工人	129	147.0	162.0	162.7	
模型(3): 模型(1)+QI × 国家	113	133.9	147.6	157.5	
模型(4): 模型(3)+ 财产 × C+ 权力 × C+ 技能 × C	104	124.0	136.1	146.5	
模型(4)对模型(3)	9	9.9	11.5	11.3	

II. 国家内的边界渗透系数<sup>a</sup>

变量	边界跨越系数			
	美国		加拿大	
	瑞典	挪威	瑞典	挪威
男性:				
财产	-1.36**	-1.33**	-0.67*	-0.93**
权力	-0.03	-0.04	-0.29*	-0.03
技能	-0.45**	-0.54**	-0.90**	-0.63**

续表

女性: 直接阶级				
财产	-0.71*	-0.18	0.57	-0.57
权力	-0.10	-0.02	-0.13	-0.14
技能	-0.05	-0.66**	-0.94	-0.72***
女性: 间接/直接阶级				
财产	-0.58	-0.51	-0.43	-0.48
权力	-0.18	-0.04	-0.28	-0.15
技能	0.12	-0.77***	-0.74**	-0.67***
III. 女性渗透性系数间的跨国差异: 美国对其他国家				
		<u>直接阶级</u>		<u>间接/直接阶级</u>
财产		-0.43		-0.09
权力		-0.01		-0.04
技能		0.68*		0.85**
财产—权力		-0.42		-0.04
技能—权力		0.69*		0.90**
财产—技能		-1.12		-0.94(t=1.9)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任何国家中女性的边界跨越系数之间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乌尔梯, 1991)。伴随着这种情况的是农业边界的进出, 以及更为普遍的涵义是所有权和自我雇佣。

我们调研结果显示了对这些结果的一些详细描述, 还显示了未来研究的一些方向。如果我们的结果是正确的, 那么由韦伯主义阶级分析所发现的蓝领与白领阶级之间的流动交换分层模式, 更有可能反映的不是权力的影响而是财产和技能的相对不可渗透性。戈德西尔帕(1987: 99)认为相对流动模式可以归结为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不同重要性, 但根据他的阶级图表, 他仍不能直接研究这个问题。他对不同类型阶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的推论必须间接地得出, 因为他的阶级在财产和技能方面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结果表明戈德西尔帕关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论断是不精确的, 而财产对流动构成了比文化资本更为强大的障碍(至少反映在技能和专家知识方面)。

我们的调研结果还暗示, 职业流动研究应把财产所有权视为伴着垂流动的一个独立的流动维度。沃恩(1992)通过把自我雇佣与工资劳动之间的流动合并到他的关于垂流动研究中去而部分地强调了这个问题。然而, 他认为自我雇佣本身而不是资本家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决定了相对流动。我们对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过量流动以及财产影响的净值的调研结果表明, 重要的是资本主义财产所有权而不仅仅是自我雇佣。很明显, 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后, 我们的调研结果还与这个观点一致, 即社会民主福利国家能影响到资产阶级机制向着更加平等方向运作(例如斯蒂芬斯, 1979)。在我们所考察的两个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财产边界比技能边界构成了代际流动的更为重要的障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 财产对流动机会的影响显得较弱。很明显, 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国家差异归于福利国家制度和公共

政策中的差异，如果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确减少了阶级不平等情况，那么我们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的调研结果是一致的。

## 6.5 结 论

从这些结果中得出了5个一般性结论。第一，在北美国家，男性阶级边界流动的渗透性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化期望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财产边界是最不易渗透的，其次是技能边界，再次是权力边界。即使农民的特殊职业稳定性促成了阶级边界渗透性中的差异，当农民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时，财产和技能边界渗透中的差异还是均衡的。根据这些结果，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相关的物质资源看来在美国和加拿大构成了比与技能相关的文化资源更为明显的流动障碍。

第二，在瑞典和挪威，财产和技能边界在男性代际流动渗透性的程度上没有明显差异。这种区别于北美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在瑞典和挪威财产边界更容易渗透。因此，不同阶级边界流动渗透的相对程度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不变特性。我们的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越是纯粹资本主义化，代际流动的财产边界越不容易渗透。

第三，渗透性模式表明，阶级结构不应简单地被视为构成它的三个基本维度的“总和”。哈拉比和威克里尔姆（1993）认为把这三个维度合并成为一个“阶级结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对阶级的分析能够根据三个“原始”维度一个接一个地直接进行。对模型（2）中工人相互作用项的分析结果显示，三个维度的累加影响没有详尽阐述这一类型中的流动模式，因而阶级结构实际上就是“全部”。在格式塔本身的独特影响的意义上，“全部”不能还原为“它们的部分的总和”。

第四，男性和女性的阶级边界渗透性模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对男性来说，财产边界的渗透性比技能边界的渗透性明显小些；对女性来说，这两个边界没有明显差异。这一比较反映出财产边界流动中女性面临的障碍比较弱。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市场”的作用。

这些边界渗透性中的性别差异为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流动的理解提出了有趣的问题。流动形式中性别差异主要是因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财产边界渗透性上不同。男性或女性财产边界是否更好地代表了财产对流动机会的“正常”影响这一问题受到了挑战。然而，如果资本继承和与资产阶级通婚的机会因性别而不同，那么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流动机会都分别由性别关系所塑造。这些性别关系是由家庭和婚姻市场以及独特的阶级机制来操作的。在这些阶级和性别机制经验上相互联系的意义上看，对相对边界渗透性模式的进一步研究应当明确考虑性别，即男性和女性。

最后，除了一些边际特例外，对于女性来说，把个人或家庭作为界定阶级位置的分析单位，其结果实际上完全相同。没有证据显示，把直接阶级作为女性阶级归属加大了女性的阶级流动量。当然，这没有解决关于阶级分析的适当单位的争论中提出的概念问题，但它的确表明在经验上它似乎并不重要，至少对阶级流动问题而言是这样。

## 方法附录

### 变 量

在以上分析中使用的基本变量在第五章中已经描述过了。



在我们所有的流动表格中，阶级出身变量源于有关受访者家庭出身中主要养家者的职业信息。调查表要求受访者说明，在“你成长的时候”的那段时间中，他们家庭“主要养家者”的职业的大量特性。如果受访者说主要养家者曾有大量不同种类的职业，那么受访者会被问及有关在其成长期间养家者主要职业的信息。如果受访者回答说没有“主要”职业，那么这个问题则限定在受访者16岁时主要养家者的职业。为了得到有关受访者特有的“阶级出身”的数据，我们以这种有些分散的方式提问——“在你成长的时候”——而不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即在整个童年时期而不只是在接近他们离开家庭的时刻。这个人无须是受访者的父亲；相反，主要养家者本人可能就是受访者。然而，这些数据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把父亲作为家庭中的主要养家者。

### 测量问题

本章中的所有分析都容易带有各种度量问题。受访者可能对他们父亲职业的权力方面比对他们父亲的技能或财产方面的精确信息所知更少，因而我们很可能在测量权力时要比测量其他两个阶级边界更加粗糙。同样，正如第五章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受访者的出身而言，在权力维度上，我们不能区分监督者和真正的管理者；这再次削弱了对矩阵中这一维度的度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阶级类别的三个维度的绝对度量不能真正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因此，没有理由相信小资本家与雇员之间的“距离”等于专业人员与无资格证书雇员之间的“距离”。这样，如果对“非专家”(限定他们为完全非技术劳动)和“专业人员(限定他们为处于最高地位的专业人员)采用更为限制的定义，那么

---

这个边界的渗透性将可能显出比本章所公布的结果中的渗透性更小。对于权力维度可能同样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管理者”限定在“高层执行官员”或“CEOS”（首席执行官），那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重新界定的权力边界也可能变得最不易渗透。这意味着，如果假设2得到证实而且所测量的财产边界渗透性小于技能边界，那么这可能是分类图表中一个任意的产物。为此，我在此分析中，用一种极端脆弱的方式来定义资本家——资本家是拥有任何雇员的自我雇佣者——这样，所得结果不可能偏离我们的主要假设方向。

## 第七章

### 跨阶级友谊

阶级流动不是理解阶级边界渗透性中所涉及的惟一问题。在婚姻和友谊中人们之间的亲密的社会互动模式，也是这类边界渗透性的有关方面。在刚性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生活紧紧地限制在特定的阶级位置上，个人流动少有希望，而且社会网络也难以跨越阶级边界。在大众意识里面，当人们认为社会阶级在美国不是很重要时，他们的部分意思是，把人们分到不同阶级中去的社会障碍被认为相对弱小。跨阶级友谊的范围是这种情况属实程度的一种衡量。

正如阶级流动中的情况一样，如下观点是合理的：友谊相互作用的阶级模式化，是塑造人们所经验的阶级结构的方式的微观过程之一。例如，应当促使跨特定阶级边界的政治联盟达到友谊纽带经常跨越这些边界的程度。其他情况一样时，在友谊纽带基本上存在于相同阶级位置中而不是分散在跨越各种阶级位置上的社会里的情况下，有望产生较高层次的阶级意识。

本章中，我们将不探讨关于友谊网络的阶级内容的主观影响这一问题。相反，像第六章那样，通过对友谊形成的不同阶级边界相对渗透性的调查，我们的关注中心将放在这些网络的

阶级模式化上。

## 7.1 定向假设

有关友谊的研究最初不是为了检验一系列的优先假设。因为有关结构阶级分析的文献没有系统性地(并且肯定没有在一个相对框架中)考察友谊纽带,所以没有完善建立的假设可以检验。因此,检验目标大体上是解释性的和归纳性的——为了发现相关模式以及为了表达我们对观察的信心。

然而能够从阶级分析和关于友谊的社会学中得出大量定向假设,来引导我们对这些模式的探讨。正如第六章一样,这些假设能够根据不可渗透性的程度被组织在三个阶级边界顺序的周围(参见表 7.1)。预测的排序依赖于这样的理论期望,即财产、权力和技能对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如何产生各种障碍的。我们探讨了三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阶级机制可能会产生上述障碍,并由此影响着友谊形成模式:(1)通过建构行动者的利益;(2)通过塑造行动者的生活方式;(3)通过创造非正式人际接

表 7.1 不同理论观点中的友谊纽带的阶级边界相对不易渗透性的排序

理论观点	从最不易渗透(1)到最易渗透(3)的顺序		
	财产	权力	技能
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变式) <sup>a</sup>	1	2 或 3	3 或 2
阶级利益(达伦多夫变式)	2	1	3
阶级习性(布迪厄)	2	3	1
作为机会结构的阶级 <sup>b</sup>	1 或 2	3	2 或 1

a. 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变式观点预测,财产边界最不易渗透,但没有为权力或技能边界排序提供明显的基础。

b. “机会结构”观点预示着权力边界最易渗透,但也并没有为财产或技能边界排序提供明显的基础。

触的不同机会。每一个因果过程都显示了根据相对渗透性的三类阶级边界的不同排序。

### 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变式)

马克思主义对人际关系的讨论相对很少。然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通常预测,两个个体的阶级利益越是对立,他们之间形成友谊的可能性越小,即相应的阶级边界越不易渗透。这种情况对于工人与他们雇主之间的友谊来说很明显,因为对于这些行动者来说,在他们具体的人际关系与他们一般阶级利益之间有着直接的一致性。尽管这些对立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阻碍不处于直接雇佣关系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友谊的形成,但可以预测这些友谊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工人与资本家不处于相互之间直接的雇佣关系中,他们却在广义上处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阶级结构客观属性与行动者主观状态之间的关系中。在阶级利益塑造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反过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又影响了友谊的可能性和持续性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预测跨财产边界的友谊尤其不可能,即财产边界应该最不易渗透。

由于在作为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基础的权力和专门知识的重要性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很大的不一致性,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给权力和技能边界的相对渗透性排序是不明确的。就马克思主义者把管理者的利益视为与资本家利益紧密相连而言,他们会把权力边界作为比技能边界更不易渗透而加以排列。但是,认识到被资格证书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深刻根源,就削弱了上述判断。

### 阶级利益(达伦多夫变式)

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是阶级对立的根本基础。他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权力和财产是一致的,因而社会理论家比如马克思,把财产错误地视为阶级冲突的基本轴心。然而在20世纪,财产形式的正式所有权与独立的支配权相分离的加深,意味着财产所有权已降落成为阶级关系的一个基础。因此,这一观点预示着权力边界应是最不易渗透的。在财产所有权仍赋予了某种权力这个意义上,人们期望财产边界有居中的渗透性。既然无组织权力的技能几乎没有赋予什么控制权力,那么技能边界应是三者中最易渗透的。

### 阶级习性(布迪厄)

实际上所有关于友谊形成的研究都认为塑造友谊模式的一个主要机制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那些共享明显生活方式的特点的个人要比那些生活方式上高度无关的个人更可能成为朋友。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阶级习性”中所分析的那样,生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是文化资本。这表明,专家与非专家之间友谊纽带的机会应该特别低,因为处于技能边界任何一边的人们从文化资本上说都可能明显不同。因此,阶级习性理论预测,技能边界最不易渗透。此外,由于财富和收入通常被视为生活方式的关键基础(尽管其重要性低于文化资本),因而人们会预期财产边界比权力边界更不易渗透。

## 互动机会

社会学的关于友谊分析把友谊的形成过程分解为两个连续的过程即相遇过程和交往过程。相遇过程是由陌生人转变成为熟人的过程；交往过程则是由熟人转变成朋友的过程(维布鲁格, 1977 : 576-577)。尽管相遇可能只是一种机会,但这通常是人们处于系统性促成友谊形成情况中的结果。部分而言,这是一个空间上的临近问题,这一点与把居住邻里的的重要性作为影响友谊形成的因素一样——人们经常与不同社会地位的邻居交上朋友(哈克费尔德特, 1983; 内厄矛和劳顿, 1975)。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比纯粹临近更重要的是,社会互动的某些“中心”,用费尔德(1981)的话来讲,在人们之中产生了持续的共同活动,因而以能导致友谊的方式增加人们彼此了解的可能性。

工作地点是这类互动中心的重要例子。进一步说,许多工作地点包含着不同阶级位置间人们的共同行动,因此产生了跨阶级友谊的机会,特别是在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这些机会会因许多监督者甚至一些管理者的职业生涯的相当部分都是非管理雇员这一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职业内部的权力流动毫无疑问要比职业内跨财产或者技能边界流动程度更高。在友谊经历升职后仍能存在的意义上,这又将增加权力边界的渗透性。因此,机会结构论点表明权力阶级边界应最易渗透。然而,机会结构观点没能清晰地预测有关财产或技能边界的相对不易渗透性。

## 韦伯主义传统

我没有明确根据韦伯主义传统的预测而提出假设,因为韦

伯主义阶级分析实际上与任何排序都是一致的。以一种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口吻，韦伯主义者，如吉登斯(1973)，很可能会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其他人，如帕金(1979)，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封闭的作用，很可能会预测出像阶级习性观点那样的排序。专注于地位群体和象征性社团形成的韦伯主义者也将可能参与阶级习性理论的预测。达伦多夫因强调官僚组织的重要性而常被视为韦伯主义传统的理论家，于是他的阶级利益理论的变式也可以看做和受韦伯主义启发的方法相一致。不管怎样，表 7.1 中所描绘的理论预测并不是从第一原理的严格推导而来，而是与促进不同的社会学想象相联系的一般定向假设，而不同的社会学想象将促进对我们调研发现的解释。

### 与以往研究的关系

这一研究在 3 个方面区别于以往对友谊和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柯蒂斯，1963；霍林谢德，1949；杰克逊，1977；劳曼，1966，1973；维布鲁格，1977，1979)。首先，以往研究，不管用不用“阶级”术语，都是围绕着社会经济分层的地位定义展开的，而我们的研究却围绕着阶级的经济结构定义组织的。其次，地位内友谊在早期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地位内友谊比跨地位友谊更为可能的程度以及地位内跨社会阶层友谊的易变性。以往很少关注跨地位类别的友谊，而这一点恰恰是本章所关注的。最后，虽然对跨地位友谊已有过研究，这些研究没有对跨越这些性质上不同的地位边界的友谊模式给予系统关注。以往研究主要关心地位差异程度与友谊纽带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关心跨地位友谊选择的地位不对称性，即倾向于把位置稍高的人们当做自己的朋友(霍瑟，1981)。比较起



来，此项关于阶级边界不同渗透性的研究，关注的是跨越3个性质上不同的阶级边界的友谊模式。

## 7.2 结 果

### 三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表 7.2 中展示了模型(1)的核心主要结果。结果中展示了对数据的两项稍微不同的说明：一个是样本规模由数据中友谊总量来界定的说明；另一个是，样本规模由受访者数量来界定。对这两项说明的解释参见本章中的方法附录。不管如何界定样本规模，所有3个边界统计学系数都明显为负数，这表明这些

表 7.2 三个剥削边界渗透性系数：四国成年劳动力

变量	以友谊组带数量界定的样本规模		以受访者数量界定的样本规模	
	系数(s.e.)	反对数	系数(s.e.)	反对数
边界渗透性系数				
财产	-0.99(0.09)***	0.37	-0.98(0.14)***	0.38
权力	-0.32(0.03)***	0.73	0.30(0.05)***	0.74
技能	-0.79(0.04)***	0.45	-0.77(0.07)***	0.47
度量偏差	370.1		139.0	
自由度	185		185	
边界渗透性系数差异				
财产—权力	-0.67(0.08)***		-0.68(0.14)***	
技能—权力	-0.47(0.04)***		-0.47(0.09)***	
财产—技能	-0.20(0.10)*		-0.22(0.15)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p<0.05      **p<0.01      ***p<0.001				

边界实际上构成了友谊形成的障碍。<sup>1</sup> 财产和专家边界的负系数明显大于权力边界的负系数。因而权力边界比财产或技能边界更易渗透。由这些系数的反对数可以看出跨权力边界友谊的机会几乎是超过跨财产边界友谊的机会的100%，是超过跨技能边界友谊的机会的60%。

财产和技能边界渗透性的比较有些不甚明显。如果把受访者的数量而不是友谊纽带的数量用作样本规模，权力边界系数与技能边界系数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当样本规模是友谊纽带的总量时，财产边界的系数与技能边界的系数则存在明显差异。<sup>2</sup> 由这些系数的反对数可以看出跨技能边界的友谊的机会约比跨财产边界友谊的机会大20%。

### 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位置间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模型(1)给出了有关根据阶级结构中3个基本的维度所界定的边界相对渗透性的信息。模型(2)加进了工人相互作用矩阵以测量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称的位置渗透性。这一矩阵区分了工人阶级与每一其他阶级位置之间的友谊。如果由此矩阵产生的虚拟变量系数没有一个是显著的，那么工人与其他阶级位置间友谊的可能性，只与跨越我们所考虑的三个剥削边界的各种组合的全部累加影响有密切关系。

模型(2)对模型(1)在适应性方面的明显改进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位置间边界的不同渗透性不是完全由三个基本的阶级边界变量的累加影响所说明，即跨越具体阶级位置的相互作用影响也是存在的。同样，工人变量也使我们能够通过累加创建一个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间边界渗透性的完整的排序。对于每一工人|非工人友谊纽带来说，表7.4中显示了相应的财

产、权力、技能和工人变量的系数。在模型(2)方程的个人系数是几率的对数。在已知模型(2)中的限制条件下,与每个单元对应的系数总和的反对数就显示出发生在那个单元中的友谊纽带的相对机会。

表7.3给出了模型(2)中3个累加剥削变量和涉及工人阶级的

表 7.3 工人|非工人边界渗透性系数: 四国成年劳动力

变量	以友谊纽带数量	以受访者数量界
	界定的样本规模	定的样本规模
	系数 (s.e.)	系数 (s.e.)
边界渗透性系数		
财产	-0.95(0.11)***	-0.96(0.16)***
权力	-0.40(0.06)***	-0.34(0.09)***
技能	-0.72(0.06)***	-0.67(0.10)***
工人/非工人纽带 <sup>a</sup> :		
层次 1 <sup>b</sup> 工人 非工人	-0.17(0.08)*	0.20(0.12)
层次 2 工人 小资产者	-0.30(0.07)*	-0.26(0.11)*
层次 3 工人 专家管理者	-0.18(0.07)*	-0.23(0.11)*
层次 4 工人 管理者	0.06(0.08)	-0.06(0.13)
层次 5 工人 监督者	0.06(0.06)	0.07(0.09)
层次 6 工人 专业人员	-0.36(0.11)***	-0.38(0.16)*
层次 7 工人 技术雇员	-0.31(0.06)***	-0.33(0.09)***
度量偏差	337.2	126.11
自由度	179	179
对模型(1)尺度偏差的改进	32.0***	12.89*
自由度	6	6

a. 这些系数显示了给定类别的工人|非工人纽带与所有非跨越工人边界友谊之间的差异。(即工人|工人和非工人|非工人纽带)

b. “层次”指的是图 5.3 工人变量结构矩阵中的类别。

7个跨阶级友谊组带的系数估计。模型(2)的拟合优度是对模型(1)的重大改进,表明在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间存在重要的特定友谊组带的相互作用。除了工人|管理者和工人|监督者友谊之外,很明显,工人与非工人之间友谊的可能性比累加模式所预测的明显要小。此外,工人|管理者和工人|监督者边界系数都显著地比任何其他类别的系数大,这表明对于工人来说权力边界的渗透性相对于其他边界要比对整个劳动力来说渗透性更大。

正如流动渗透性分析中所显示的,表7.3的结果对阶级结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暗示。重要的特定组带的相互作用模式的存在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阶级结构不能简单被理解为3个基本剥削维度的总和。如果没有特定组带的相互作用,那么通过3个“原始条件”的结合形成的“阶级结构”概念将只是一种启发性的工具。如果只是依次讨论财产所有权的影响、技能的影响、权力的影响,以及忽视阶级结构中具体位置的影响,那么什么信息都不会丢失掉。“位置”可以从产生给定位置的具体维度结合的协同结果中获得它的分析支点。用一句老掉牙的话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sup>9</sup>而特定组带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便说明了这一点。

模型(2)中的累加和相互作用条件产生了表7.4所显示的各种工人|非工人友谊的可能性排序。7个边界之中,工人|雇主边界是最不易渗透的,而工人|监督者边界是最易渗透的:工人与监督者的友谊机会几乎5倍于监督者与雇主友谊的机会。第二个和第三个渗透性顺序是工人|专家管理者边界和工人|专业人员边界。像模型(2)界定的那样,这两个组带都跨越技能维度的两个“层次”。接下来的三个边界——工人|管理者、工人|技术雇员和工人|小资生产者——都有大致相等的渗透性。在模型(2)

表 7.4 工人与其他阶级位置间友谊纽带的边界非渗透性的排序

跨阶级边界	估计总体渗透性的		系数总和 <sup>a</sup>	系数总和	相对工人 雇 主友谊纽带
	累加系数	反对数			
1.工人 雇主	财产 + 权力 + 工人(层次1) <sup>b</sup>	-1.52	0.22	1.0	
2.工人 专家管理者	权力 + 技能 + 工人(层次3)	-1.30	0.27	1.3	
3.工人 专业人员	技能 + 工人(层次6)	-1.07	0.34	1.6	
4.工人 管理者	权力 + 工人(层次4)	-0.34	0.71	3.2	
5.工人 技术雇员	工人(层次7)	-0.31	0.74	3.4	
6.工人 小资产者	工人(层次2)	-0.30	0.74	3.4	
7.工人 监督者	工人(层次5)	0.06	1.06	4.9	

a. 样本规模是友谊纽带的数量。

b. “层次”是指图 5.3 工人变量与表 7.3 报告系数的结构矩阵中的类别。

的结构中，最后两个边界仅跨越其各自剥削维度的一个“层次”——工人|技术雇员跨越技能而不跨越财产或权力的层次；工人|小资产者跨越财产而不跨越权力或技能的层次。因此跨越权力维度的两个层次(但不跨越财产或技能维度)工人|管理者的友谊大约类似于仅跨越技能或财产边界的一个层次。这证实了权力边界有相对高的渗透性。正如以往对流动的研究结果一样，工人|小资产者的边界结果表明，财产边界的突出问题不是自我雇佣本身而是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工人与小资产者之间友谊纽带的机会超过工人与雇主之间友谊纽带的3倍以上。<sup>4</sup>

### 国家相互作用

模型(1)和(2)假定边界的相对渗透性在4个国家中都是一样的。模型(1)中渗透性系数的国家间差异的存在通过比较模型(3)和(4)的拟合优度以及通过考察国家内系数模式而得到检验。这些结果反映在表7.5中。

在模型(4)对国家相互作用的总体检验中，尽管我们把友谊纽带数量用做样本规模，然而对模型(3)拟合优度的改进在统计学上却不明显。<sup>5</sup>此外，对所有可能的边界系数中的跨国差异的配对检验(共有18对检验)都没有显示出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所以，根据这类直接检验，人们将得出结论：阶级边界渗透性模式在国与国之间是相对恒定的。

当我们逐一检验每个国家内的模型时，这种跨国恒常性为我们所观测到的大多数模式所证实。特别是，在所有4国内，三个阶级边界渗透性系数明显为负数，而且权力边界较财产或技能边界的渗透性明显大些。在4国的3个国家中——美国、加拿大和挪威——三个边界相对渗透性排序是同样的：财产、技能、

表 7.5 友谊阶级边界渗透性的跨国相互作用

I. 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样本规模 = 友谊纽带数量)		自由度	度量偏差
模型		188	783.9
基线模型		185	370.1
模型(1): 财产 + 权力 + 技能		179	337.2
模型(2): 模型(1) + 工人		161	318.7
模型(3): 模型(1) + QI × 国家		152	313.9
模型(4): 模型(3) + 财产 × C + 权力 × C + 技能 × C		9	5.2
模型(4)对模型(3)			
II. 国家内的边界渗透性系数			
	美国	瑞典	挪威
财产	-1.11(0.16)***	-0.67(0.22)***	-1.03(0.15)***
权力	-0.28(0.06)***	-0.29(0.07)***	-0.35(0.06)***
技能	-0.72(0.09)***	-0.81(0.10)***	-0.80(0.07)***
III. 国家内渗透性系数差异 <sup>a</sup>			
	美国	瑞典	挪威
财产—权力	0.83(0.15)***	0.42(0.21) <sup>*</sup>	0.08(0.15)***
技能—权力	0.44(0.09)***	0.52(0.10)***	0.45(0.07)***
财产—技能	0.39(0.07) <sup>*</sup>	-0.14(0.23)	0.23(0.16) <sup>#</sup>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sup>#</sup> < 0.01	*p < 0.05	**p < 0.01	***p < 0.001

a. 跨国渗透性系数在统计学上没有明显差异。

权力。最后，虽然仅在美国财产边界渗透性明显小于技能边界，但如果我们结合挪威和加拿大的数据，就会减少我们对系数估计的标准误差，那么财产和技能边界系数间的差异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显著水平为 0.05 的单尾检验里也是很明显的。<sup>8</sup>

这些结果类似于流动分析的结果，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看起来更像挪威，而不太像美国。同样，正如流动分析那样，因为瑞典的技能边界名义上（但不是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上）比财产边界具有更小的渗透性。瑞典系数的名义模式看来特别有别于美国的模式。然而与流动结果的情况不同的是，对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系数差异的检验没有一个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甚至当结合其他国家时也是这样。比较分析中的情况常是这样，因为相互作用项的标准误差倾向于比较大。很可能出现在跨国关系模式里似乎存在着显著的描述差异的情况——正如美国而不是瑞典的财产和技能边界系数中的显著差异的情况一样——然而在这些系数差异中跨国差异本身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因此，我们总的结论是，这些模式对于我们考察的国家（瑞典可能除外）来说相对恒定。

### 7.3 结 论

总的说来，本章结果表明，瑞典可能除外，财产边界最不易渗透到友谊形成过程中去，接着是技能边界，最易渗透的是权力边界。这种排序与基于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达伦多夫的观点，严格说来最不一致，因为这些观点完全围绕着权力轴线建立的。权力不仅在相对条件中的三个边界里是最易渗透的，而且它在绝对条件中也是非常易渗透的。

7.1 节中讨论的其他三个理论观点又怎样呢？马克思主义理



论预测，财产边界应最不易渗透，这一点为本分析所支持。然而技能和权力边界结果不完全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结果一样：技能边界渗透性小于，而权力边界渗透性大于只根据剥削、支配和共同利益的某个理论而预测的渗透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和阶级利益的关注可能与技能边界渗透性小于权力边界的调研结果一致，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会预测这两个渗透性系数的相对重要性没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因此，技能和权力边界的调研结果看来与阶级习性和机会结构观点更为一致。一方面技能边界相对较高的不易渗透性与文化资本理论是一致的，尽管这些理论倾向于把财产的持续重要性贬低成为建构阶级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关友谊的机会结构观点最恰当地预测了权力边界的相对高渗透性。在很多工作场所，工人与监督者之间，甚至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非正式互动机会。相互作用可能性的密度，加上跨越与财产和专家边界相比较的较高层次的职业流动性，可以解释权力边界相对高的渗透性。

因此，本分析表明，由阶级利益(至少是马克思主义变式)、阶级习性和机会结构理论所确认的因果机制，可能都对跨阶级边界的友谊形成产生障碍和机会。这三组原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最不易渗透的边界实际上就是最不易渗透的。这可能暗示，财产—剥削—利益机制比阶级习性或机会机制是更加有力的构造机制。然而这一结论在两点上容易受到批评。<sup>7</sup> 首先，关于因果过程的相对潜能的主张总是容易出现度量问题。如果我们采纳一个更加严格的权力定义，如限定“管理者”为高层执行官，那么我们关于权力边界相对高渗透性的结论可能会改变。同样，如果我们在专业人员中区分出高级职称专业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那么技能边界会变得“最不”易

渗透。虽然这类猜想的结果可能潜在地与财产边界的可比较性的重新说明相反，但这仅仅再次证实了有关对测量选择的相对因果潜能的主张的敏感性。<sup>8</sup> 其次，即便一项更为精细的调查揭示出我们的核心结果对这些边界的可选择说明是强有力的，仍会有把这里的非渗透性归于“剥削利益”而不是阶级习性或机会结构的问题。雇主的生活方式肯定与大多数非财产所有者的生活方式不同，而且大多数雇员与雇主间非正式互动的物质机会很少。因此，虽然我们的数据与基于财产利益对友谊形成的影响比机会结构或阶级习性对友谊形成的影响更强烈的主张一致，但它们不能有效地反驳相反的主张。

## 方法附录

### 友谊纽带矩阵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感到“个性上最接近”的3个人——朋友或亲戚但不是直系家庭成员——是谁。(尽管他们中有些是亲戚，但我还是把这些人视为“朋友”。因样本规模太小而不能单独分析亲戚。)然后询问受访者有关他们的每个朋友职业的一系列问题。除开阶级结构的权力维度外(参见下文)，我们运用几乎与用于被访者同样的标准为朋友的阶级位置编码。非劳动力朋友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与第五章中所解释的一样，我把这些阶级位置分解为8个类别。

一旦所有这些朋友都被分派到阶级位置上，我便对这些数据进行转换，以便使友谊纽带成为分析单位。例如美国样本中1363位被访者提供的数据显示，至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总数为3114个。这样我们拥有了3114个友谊纽带的样本量，每个组

带都带有两个数值——受访者的阶级和受访者朋友的阶级。数据分析在一个  $8 \times 8$  友谊纽带矩阵上展开。

### 对数据结构的异议

对数据结构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几个异议。首先，如果我们主要的兴趣是对友谊模式的全面社会结构分析，那么排除非劳动力朋友的决定可能会使我们的结果出现偏见。然而，由于我们的兴趣在于阶级结构的某些特性——阶级边界的有差异的渗透性——因此，相关数据是把占据那个阶级结构位置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友谊纽带。无论如何，受访者的数据取自多数国家中的劳动力样本，而如果把劳动力范围外的朋友(家庭主妇、无工作者、退休者)引入分析则会造成矩阵中的不对称。

其次，把我们的分析限定在三个朋友而不是一长串朋友上可能会引起结果上的曲解。霍兰德和雷哈特(1973)认为这类研究友谊模式的固定选择程序可能会在社会关系分析量表中产生严重的测量误差，因为它迫使有多于固定数量朋友的人们任意忽略一些朋友，而且迫使有少于固定数量朋友的人们任意把一些非朋友包含在朋友内。我认为这一问题不可能严重歪曲这些结果。与霍兰德和雷哈特所报告的社会关系测量工作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研究诸如教室中孩子间的友谊模式之类的群体内社会距离。在考察跨阶级边界社会纽带时，我们对个体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封闭、不对称等模式不感兴趣，而是对有着特殊阶级属性的个体间亲密友谊的可能性感兴趣。霍兰德和雷哈特在构造社会距离中提出的各种曲解是否适用于我们的分析背景还不清楚。<sup>9</sup>

最后，可能会招致异议的，还有格兰若卫特在关注“亲密”

朋友的同时我们忽略了“弱纽带力量”这一重要问题。可能某些阶级边界通过一般友谊可能比通过亲密的人际关系更易渗透。把注意力限制在亲密朋友上可能会低估边界人际关系的总体渗透性。然而，我们的分析并不是对边界渗透性的所有维度的全面分析。全面的分析将包含婚姻模式、流动、邻里相互作用，以及参与自愿社团，还有一般友谊的参与。我们的分析是考察跨阶级边界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相互作用——亲密友谊——的合理的第一步，为此，把我们的资料限制在“被访者在个性上最接近的三个”上是适当的。

### 不对称友谊问题

正如流动分析中的情况一样，我把友谊纽带矩阵视为对称的。也就是说，我假定作为工人的受访者回答说自己有管理者朋友的可能性与作为管理者的受访者回答说有工人朋友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有多种理由导致人们预期不对称的回答。特别是，如果涉及回答说自己有“处于高地位的朋友”时，那么人们会预测，工人更可能声称他们有专家、管理者或资本家做朋友，而不像处于这些类别的人可能声称他们有工人做朋友那样。这种歪曲可能或者因为把职业特性错误地归于受访者的一个真正朋友，或者因为错误地声称某特定人物事实上是一个朋友。当然还有可能在友谊模式中有真正的不对称：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工人实际上更可能有管理者朋友而不是相反，因为无需所有友谊都完全是双边的。<sup>10</sup>

为了检验这些数据是否大致符合这一假设，我通过如下比较对关于友谊矩阵对角线总体不对称做了一次检验。这一比较是在准独立模型的拟合优度(所有对角线外单元都被视为单一类

别而对角线上每一单元都有差异)与区别了上对角线单元和下对角线单元的模型之间进行的。用这种方式来区分对角线外单元的模型没有明显改进其适应性,因而有关上下对角线数据大致对称的假设不能够遭到否决。

### 样本规模问题

很明显,在原始样本中友谊纽带数量要比受访者数量大得多——4国中具有有效数据的受访者的总数为4896,而友谊纽带数量则是11782。在计算我们的模型的各种系数的标准误差时该用哪个样本规模不甚明显。最保守的选择是采用原始受访者的数量。然而这又会把数据视为仿佛我们的样本中每位受访者仅有一个朋友,这会削弱对我们所考察的任何模式的信心。最不保守的选择是把友谊纽带数量作为样本规模。但是,由于这些友谊纽带相互之间不是独立的,因而它们不是一个随机的纽带样本。我不熟悉任何有关决定把样本规模设定到这个范围中什么地方的可靠的统计学原理。因此,我使用了两个样本规模来提出我的结果。由于在不同国家中每位受访者的朋友数量有所差异,因而,在分析中使用这两个不同的样本数字时,实际的系数会稍有差异。

### 朋友阶级位置中管理者与监督者的区分

有关受访者的数据要比他们的朋友的数据更为精确,因而,有关在阶级关系的权力维度方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受访者被问及:“下述哪一项最如实地描绘了你在你工作的公司或组织中占据的位置?它是一个管理位置,一个监督者位置或是一个非

管理位置?”那些出处在非管理位置中的人被划分为“非管理者”。为了区分监督者与管理者,我们利用了有关第二章所讨论的管理等级中决策参与、监督责任和正式位置的信息。一个受访者会被界定为“管理者”,如果他/她直接参与工作场所政策的决定,又或者处于被正式称作“管理者的”位置(这与监督者的位置相对),或者拥有对属下的处罚权力。所有自称处于管理或监督位置的其他人被划分为“监督者”。

关于朋友,受访者被问及:“(这个朋友)在他/她工作的地方处于管理或监督位置吗?”“不”的回答被划分为“非管理者”。不幸的是,有关朋友的数据缺乏必需区分监督者与管理者的信息。由于按照这三个维度进行的个体分类用于创造后面的友谊纽带矩阵的8个阶级位置,并且由于我们需要一个 $8 \times 8$ 对称矩阵,因而需要一个策略来对每类受访者阶级位置的朋友中估测管理者和监督者的数量。既然在友谊纽带模型中我们不能为受访者或朋友从专家中区分出监督者和管理者(由于样本规模限制),我只能对非专家朋友做出这些估测。

我采用的估测程序假定友谊纽带围绕对角线大致对称。对于朋友的每个阶级位置,我们知道受访者中非专家管理者与非专家监督者的比率。然后,对于相应的受访者阶级位置来说,每一个这类比率都用于把朋友中不加区分的非专家管理者和监督者划分为独立的成分。例如,工人受访者的朋友中非专家管理者与非专家监督者之间的比率被认为是和已知的拥有工人朋友的非专家管理者的受访者与拥有工人朋友的非专家监督者的受访者之间的比率是相同的。这使得我们能够估测出工人受访者的非专家监督者朋友的频率以及工人受访者的非专家管理者朋友的频率。通过这种方式构造出完整的 $8 \times 8$ 矩阵。

## 第八章

### 跨阶级家庭

我们所探讨的第三种阶级边界渗透形式发生在双收入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占据不同阶级的职业时候。在第六章关于女性阶级流动的讨论中已经提到，在如何最好地将“跨阶级家庭”概念化的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在这些情况中家庭的阶级特征应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内部异质性，还是应把家庭的阶级严格地等同于主要养家者的阶级？如果把个体当做阶级结构分析的主要单位，那么这些家庭显然有着一个混合的阶级特征并构成了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场所。如果把家庭作为阶级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且如果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被视为必然拥有相同的家庭—阶级，那么把这作为一个严格的边界渗透性例子就更不明显了。表面上看，秘书嫁给资本家似乎是一个跨阶级家庭的例子，但这没有真正构成一个渗透性事件，因为女性秘书会通过成为资本家家庭的妻子而真正“成为”资产阶级。

我们将把有关如何理解家庭的阶级特征的争论中各种论点的详细考察推迟到第十章讨论。在本章中，我们将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并且考察双收入家庭中婚姻纽带跨越具体阶级边界的范围。

## 8.1 理论问题

家庭内阶级构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模式是三个相互关联过程的结果：

1. 社会学家称之为“分类匹配”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不同阶级出身和占据不同阶级职业阶级的婚前男女会首先做出婚姻选择。在阶级出身影响阶级归属和婚姻伴侣这个意义上，家庭的阶级构成将会受到分类匹配的影响。

2. 婚内过程。这一过程决定妻子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加入劳动大军。除非人们把“主妇”角色视为本身就有着显著的阶级特征，否则跨阶级家庭问题只是在妻子加入劳动力时才会产生。如果妻子劳动力参与比率因丈夫的阶级而明显有别，那么这种情况会影响到双收入家庭中跨阶级家庭模式。

3. 已知他们的阶级出身和劳动力参与决定的情况决定着丈夫和妻子所占据的职业阶级的过程。

利用现有数据，我们甚至不能着手对这三个过程的独立贡献进行分类。我们所能做的是以一种与探讨友谊和流动阶级边界渗透性相同的方式，勾画出家庭内阶级边界渗透性的静态模式。这种模式可从分类匹配、劳动力参与决定和职业获得的相互作用中得出。

我没有做出任何关于这些反映家庭形成和决策过程的明显特征的家庭内模式的预测。例如，可以有理由相信，阶级在“婚姻市场”和友谊形成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对于财产继承问题很突出的有产阶级来说。在许多工作场所是性别隔离的情况下，工作地点对潜在婚姻伴侣的选择来说可能是一个不比友谊更重要的途径。这可能对跨阶级家庭中阶级边界渗透性模



式具有一定涵义。虽然这种复杂情况可能会存在，我们对产生细微差异假设的家庭形成过程没有足够深的理解。此外，现有的社会学文献在这方面也没有能提供特别的帮助。虽然存在有关社会经济背景、种族、宗教和教育影响分类匹配(上述的第一个过程)方式的文献，但很少有关于结果家庭阶级构成的系统定量研究，没有一种文献明确探讨了双收入家庭中阶级边界的渗透性。<sup>1</sup> 因此要从现有文献中直接得出有关家庭内阶级边界渗透性的一组比较预测是不可能的。

因此，由于疏忽，我将只把第六章、第七章中相同的模型和预测应用到跨阶级家庭研究中。也就是说，我将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预测推断为：跨阶级家庭的财产边界是最不易渗透的。然而强调文化资本问题的阶级分析将预测技能边界是最不易渗透的。

## 8.2 结 果

### 跨阶级家庭模式

在检查我们的跨阶级家庭阶级边界渗透性统计模型之前，对跨阶级家庭的总体分布得到某种感觉是有用的。图8.1显示了在我们所考察的4个国家中双收入婚姻中的人们在不同阶级构成的家庭中的分布。在方法附录中，我给出了关于此表是如何创建的详细情况。这些矩阵对角线上的单元代表依阶级构成而具有同质性的家庭，矩阵中非阴影部分单元构成了其中配偶占据跨越至少阶级结构类别三个维度之一的两个层次阶级位置的家庭。较轻的阴影部分单元属于阶级构成的边缘异质性情况。

表中有几种情况值得注意。首先，在所有国家中，跨阶级

美国 样本数 = 550

妻子的阶级

	Emp	PB	EM	Mgr	Pro	Sup	SE	Wkr
Emp	0.1	1.6	1.4	0.0	0.4	1.2	0.5	3.1
PB	0.8	0.3	0.4	0.0	0.0	0.5	0.6	1.8
EM	1.8	0.7	2.6	0.9	0.6	1.2	3.4	8.3
Mgr	0.2	0.1	0.4	0.0	0.3	0.2	0.5	0.8
Pro	0.1	0.4	0.6	0.0	0.4	0.4	0.5	1.0
Sup	0.5	0.4	1.0	0.0	0.3	2.3	0.7	6.3
SE	0.0	0.0	0.1	0.0	0.3	0.4	1.4	1.1
Wkr	1.2	1.6	3.1	1.4	0.5	5.9	1.8	25.3

丈夫的阶级

瑞典 样本数 = 672

妻子的阶级

	Emp	PB	EM	Mgr	Pro	Sup	SE	Wkr
Emp	0.5	1.3	0.4	0.3	0.0	0.3	0.3	3.1
PB	0.4	1.5	0.4	0.0	0.1	0.3	0.6	2.5
EM	0.0	0.6	2.0	0.4	1.0	0.4	4.8	7.9
Mgr	0.0	0.0	0.3	0.0	0.2	0.0	0.2	1.8
Pro	0.0	0.0	1.5	0.0	0.6	0.0	1.3	2.2
Sup	0.0	0.6	0.7	0.2	0.2	0.9	0.8	9.3
SE	0.0	0.0	0.9	0.1	0.1	0.1	1.5	2.7
Wkr	0.0	0.7	2.1	0.2	1.0	1.6	3.4	33.7

丈夫的阶级

挪威 样本数 = 960

妻子的阶级

	Emp	PB	EM	Mgr	Pro	Sup	SE	Wkr
Emp	0.1	1.3	0.2	0.0	0.1	0.8	1.4	3.6
PB	1.1	0.5	0.5	0.1	0.1	0.9	0.9	3.1
EM	0.3	0.3	2.5	0.0	0.0	1.0	4.5	7.6
Mgr	0.2	0.5	0.3	0.1	0.0	0.1	0.5	2.3
Pro	0.0	0.2	0.5	0.0	0.3	0.1	1.9	0.8
Sup	0.0	0.5	0.3	0.4	0.5	0.4	2.2	9.9
SE	0.2	0.5	2.1	0.0	0.1	0.3	1.0	2.8
Wkr	0.2	0.7	1.1	0.4	0.1	1.3	7.6	24.1

丈夫的阶级

加拿大 样本数 = 690

妻子的阶级

	Emp	PB	EM	Mgr	Pro	Sup	SE	Wkr
Emp	2.6	0.8	0.8	1.0	0.0	0.8	1.0	4.3
PB	2.1	2.6	0.8	0.4	0.0	0.8	1.1	4.2
EM	0.8	0.5	2.7	0.0	0.7	1.2	5.7	4.5
Mgr	0.3	0.3	0.1	0.0	0.5	0.0	1.0	1.6
Pro	0.0	0.1	0.4	0.0	0.4	0.1	1.2	0.7
Sup	0.2	0.2	0.5	0.3	0.1	1.0	1.2	4.6
SE	0.0	0.2	1.7	0.0	0.3	0.4	3.3	1.6
Wkr	0.2	0.7	2.9	0.7	1.2	3.7	5.6	23.2

丈夫的阶级

■ 阶级同质性  
家庭

■ 边缘阶级异质  
性家庭 (阶级  
成分不横跨两  
个“层次”)

□ 阶级异质性家  
庭 (阶级成分  
横跨阶级结构  
至少一个维度  
的两个层次)

Emp = 雇主; PB = 小资产阶级; EM = 专家经理; Mgr = 经理;  
Sup = 监督者; Pro = 专业人员; SE = 技术雇员; Wkr = 工人

图 8.1 双收入家庭的阶级构成

家庭的可能形式大都存在。在所有国家中都存在雇主丈夫和工人阶级妻子的情况；瑞典是个例外情况，那里甚至雇主妻子嫁给处在工人阶级职业中的丈夫。

其次，跨阶级家庭不是一种很难发生的事件。在4国的约30%~35%的双收入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占有明显不同阶级位置的职业。这些家庭中大约有一半是由工人阶级的一方与雇主、专家管理者、管理者或专业人员的另一方组成。既然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集的数据表明这些国家约有40%的人生活在双收入家庭中，这就意味着大约有12%的人口生活在跨阶级家庭中。<sup>2</sup>虽然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大多数人生活在阶级同质性的家庭，但跨阶级家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一种现实。

第三，正如人们会预期的那样，在跨阶级家庭中丈夫处于比妻子较为有利的阶级位置是相当普遍的。例如美国约10%双收入家庭由管理者或专业人员丈夫以及工人阶级妻子构成，而仅有5%的双收入家庭由管理者或专业人员妻子与工人阶级丈夫组成。在瑞典和挪威，这种反差甚至更大：10%~12%的双收入家庭是由管理者/专业人员丈夫和工人妻子组成，而仅有2%~3%由管理者/专业人员妻子和工人阶级丈夫组成。然而，尽管发生了这种预期的性别差异，仍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特别在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妻子的职业处于比丈夫的职业较为有利的阶级位置上。

### 三个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表8.1显示了在无国家相互作用情况下累加模型的结果(模型(1))。所有三个阶级边界的系数都表明了某种程度的不可渗透性。很明显，对于跨阶级婚姻来说，财产边界是最不易渗透

的而权力边界是最易渗透的。从系数的反对数可以看出，一个跨越财产边界的跨阶级家庭的机会比跨越权力边界的跨阶级家庭的机会小于1/6，比跨越技能边界的跨阶级家庭的机会小于1/3。这些结果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预期高度一致。

### 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位置间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正如先前关于流动和友谊分析一样，工人相互作用矩阵区分了涉及工人阶级的每个跨阶级家庭类型。当这一变量加入(模

表 8.1 双收入家庭中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

变量	系数(s.e.)	反对数
边界跨越系数 <sup>a</sup>		
财产	-1.96(0.18)	0.14
权力	-0.17(0.9)	0.85
技能	-0.86(0.9)***	0.42
度量偏差(185d.f.)	295.67	
基线度量偏差(186d.f.) <sup>b</sup>	500.29	
适应性的总体改进(3d.f.)	204.66	
边界跨越系数的差异		
财产—权力	-1.79(0.18)***	
技能—权力	-0.70(0.10)***	
财产—技能	-1.09(0.19)**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p<0.05 \*\*p<0.01 \*\*\*p<0.001

a.从模型(1)中计算出系数:  $\log_{ijk} = \text{国家} + \text{H-阶级} + \text{W-阶级}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H-阶级} + \text{国家} \times \text{W-阶级} + \text{财产} + \text{权力} + \text{技能}$ , 其中H-阶级是指丈夫的阶级, 而W-阶级是指妻子的阶级。

b.基线模型是:  $\log_{ijk} = \text{国家} + \text{H-阶级} + \text{W-阶级} + \text{QI} + \text{国家} \times \text{H-阶级} + \text{国家} \times \text{W-阶级}$ 。

型(2)与模型(1)相比较)时,在方程中的适应性有了明显改进。这显示,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间阶级边界渗透程度明显区别于简单累加模型所做出的预测。如果工人相互作用明显,那么我们就能够利用模型中的系数为工人阶级与其他7个阶级位置间的不同位置的渗透性排序。

表8.2显示了模型(2)的结果。工人相互作用变量明显地改进了模型的适应性。因此,正如以前分析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

表8.2 跨越工人阶级边界的双收入家庭中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变量	系数(s.e.)
财产	-1.79(0.22)***
权力	-0.23(0.13)
技能	-0.75(0.14)***
跨越阶级边界的跨阶级家庭 <sup>a</sup>	
层次1 <sup>b</sup> 工人 雇主	-0.31(0.17)
层次2 工人 小资产者	-0.41(0.15)**
层次3 工人 专家管理者	-0.21(0.16)
层次4 工人 管理者	-0.27(0.20)
层次5 工人 监督者	0.25(0.11)*
层次6 工人 专业人员	-0.43(0.22)*
层次7 工人 技术工人	-0.37(0.11)***
度量偏差 (179.d.f)	273.49
对模型(1)的改进	22.14***
自由度	6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工人|非工人家庭阶级构成是由一系列名义变量来衡量的。系数表明了给定工人|非工人家庭类别与不跨越工人边界的家庭构成之间的差异(工人|工人以及非工人|非工人家庭阶级组成)。这个变量的定义见图5.3。

b. “层次”是指图5.3中工人变量的结构矩阵中的类别。

简单累加模型不能完全涵括涉及工人阶级的阶级边界渗透性。同时也和对友谊和流动分析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我们合计表 8.3 中累加的和相互作用的系数时，工人|雇主跨阶级家庭的机会要比任何其他的结合几乎小得多。工人|专家管理者家庭的几率 3 倍于工人|雇主家庭，工人|小资者家庭的几率几乎是 7 倍于工人|雇主家庭，而对于工人|监督者家庭几率来说是 13 倍于工人|雇主家庭。这些结果再次证实了权力边界的相对较高的渗透性，财产边界的不易渗透性以及财产边界的突出方面不是自我雇佣本身而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这一事实。

### 国家相互作用

表 8.4 显示了对渗透性模式中跨国变化检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没有迹象表明在双收入家庭中阶级边界的渗透性模式因国家不同而明显有别。在对国家相互作用的总体检验中，模型 (4) 没有对模型 (3) 进行明显改进。除此之外，甚至当我们观察成对国家或成组国家间的比较时，任何系数之间基本不存在显著差异。<sup>3</sup> 虽然国家间存在大量名义上的差别，如果我们有更大的样本，这些差别可能被证明是很重要的——在美国，有关技能的系数似乎比较小（即较小负值），而在瑞典，有关财产的系数似乎比较大，然而利用现有数据，没有一个差别能达到常见的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跨阶级家庭内阶级边界渗透模式在这些国家中呈现相对的稳定性。

### 8.3 阶级边界渗透性三种形式的比较

图 8.2 比较了我们正探讨的三个阶级边界渗透方面的机会

表 8.3 双收入家庭中工人阶级边界的边界非渗透性排序

跨阶级边界	系数累加得到 总体渗透性	系数总和	系数总和 反对数	与工人 雇主 相关的流动
1 工人 雇主	财产 + 权力 + 工人(层次1)*	-2.33	0.10	1.00
2 工人 专家管理者	权力 + 技能 + 工人(层次3)	-1.18	0.31	3.18
3 工人 专业人员	技能 + 工人(层次6)	-1.17	0.31	3.194
4 工人 管理者	权力 + 工人(层次4)	-0.50	0.61	6.26
5 工人 小资产者	工人(层次2)	-0.41	0.67	6.87
6 工人 技术雇员	工人(层次7)	-0.37	0.69	7.14
7 工人 监督者	工人(层次5)	0.25	1.28	13.18

表 8.4 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中的跨国相互作用

I. 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		d.f.	L <sup>2</sup>
模型		188	500.29
基线模型		185	295.63
模型(1): 财产 + 权力 + 技能		179	273.49
模型(2): 模型(1)+工人		161	260.94
模型(3): 模型(1)+QI × 国家		152	249.88
模型(4): 模型(3)+ 财产 × C + 权力 × C + 技能 × C		9	11.06
模型(4)相对于模型(3)			
II. 国家内边界渗透性系数			
美国			
财产	-1.55(0.38)***	加拿大	-1.82(0.34)***
权力	-0.26(0.18)		-0.14(0.16)
技能	-0.52(0.21)*		-0.92(0.18)***
瑞典			
	-2.68(0.45)*		-2.01(0.30)***
	-0.22(0.22)*		-0.001(0.17)
	-1.01(0.18)***		-0.91(0.15)***
挪威			
			-2.01(0.27)***
			-0.91(0.15)***
			-1.11(0.31)***
III. 国家内渗透性系数间的差异 <sup>a</sup>			
美国			
财产 - 权力	-1.29(0.36)***	加拿大	-1.68(0.31)***
技能 - 权力	-0.26(0.22)		-0.78(0.16)***
财产 - 技能	-1.03(0.42)*		-0.90(0.36)*
瑞典			
	-2.46(0.46)***		-2.01(0.27)***
	-0.79(0.22)***		-0.91(0.15)***
	-1.67(0.4)***		-1.11(0.31)***
挪威			
			-2.01(0.27)***
			-0.91(0.15)***
			-1.11(0.31)***

显著水平: \*p<0.05 \*\*p<0.01 \*\*\*p<0.001

a. 国家间系数差异统计上并不显著。



(渗透性系数的反对数)。考虑到友谊、家庭结构和流动作为社会现象是多么的不同，国家内的边界渗透性模式非常类似于跨越这三种社会现象。<sup>4</sup>在所有4国之中，权力边界对于所有这三种社会现象来说都是最易渗透的，尽管美国的跨阶级家庭在权力和技能边界方面没有明显差异。虽然存在着有关财产和技能边界系数在边界内并没有明显差别的许多情况，但是对于三种现象中的每一个来说，渗透性排序在美国、加拿大和挪威都是相同的。只有瑞典显示出了跨越这三种现象的财产边界基本模式方面的明显差异：对于婚姻的阶级构成来说，财产边界渗透性要比技能边界渗透性小得多，而这两个边界对于流动或友谊来说又没有明显差异。所以除了瑞典，边界渗透性模式对于这些性质上不同的社会现象来说还是相当一致的。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支持了以下几个一般性结论。第一，它们支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总体期望：阶级结构中的财产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是最基本的。虽然不能只依照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就能足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但是，财产边界看来还是最具刚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财产边界的这种相对不易渗透性不是由自我雇佣者与雇员之间的分离产生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产生的。正如关于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之间位置渗透性分析在三个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样，工人阶级与雇主之间的边界是所有边界中最不易渗透的，大大小于工人与小资产业者之间边界的渗透性。

第二，除了瑞典的一些结果外，阶级边界渗透性模式中的跨国变化是非常小的。虽然在流动结果情况中，存在着区分北欧社会民主国家模式与较为纯粹的北美资本主义模式的某种基础，然而这些差异构成的不是完全不同的模式而是一个主题的变化。这表明，不同阶级边界的相对渗透性与其说是由文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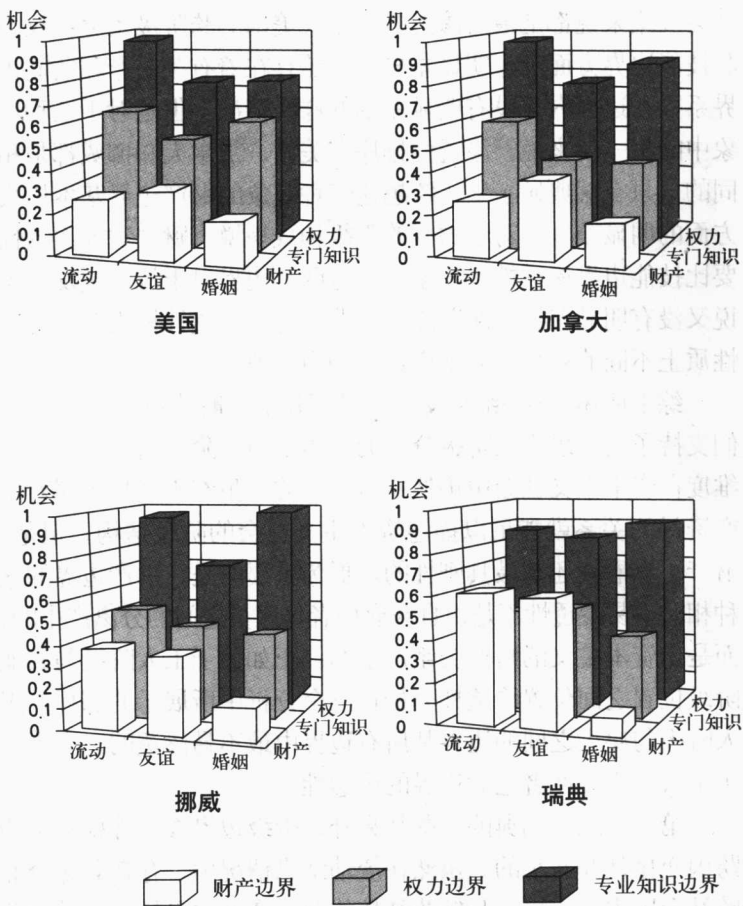


图8.2 美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流动、友谊和跨阶级家庭的阶级边界渗透性机会

政治过程造就的，还不如说是由阶级结构本身的特性造就的。

最后，关于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位置之间位置渗透的分析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阶级结构不是它的基本维度的简单“总和”。跨越特定阶级边界的友谊、传记和婚姻的概率是这些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各自的作用的结果。如果对这些结果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阶级结构”概念应不只是被当做概括三个独立的基本维度的启发性的手段。

## 方法附录

###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

正如有关友谊分析的情况一样，关于受访者的数据比他们配偶的数据要更精确。特别是我们仅能在受访者中而不是在他们的配偶中区分真正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沿用第五章中的编码策略，这意味着关于受访者我们有8个阶级类别而关于他们的配偶我们仅有7个。然而与友谊分析中的情况一样，在家庭阶级构成资料里做出对完整的 $8 \times 8$ 丈夫—妻子的家庭阶级构成矩阵进行合理估测是可能的。我们通过创建独立的女性与男性受访者 $8 \times 7$ 的受访者 $\times$ 配偶矩阵来开始着手这类估测。因此，在我们的女性受访者之中，我们能够区分关于她们丈夫的每个阶级类别的监督者与管理者。同样，在我们的男性受访者之中，我们能够区分关于他们的妻子的每个阶级类别之中的监督者与管理者。因此，根据这些独立的矩阵，我们能够估测出所处每个阶级妻子类别中丈夫的管理者同监督者的比率和所处每个阶级类别丈夫中妻子的管理者同监督者的比率。这样，我们利用这些比率创建了一个 $8 \times 8$ 家庭阶级构成对称矩阵。<sup>5</sup>

## 主 妇

一个完全发展起来的关于家庭阶级构成的分析会包括不属于有薪劳动力的配偶。阶级结构中跨阶级家庭存在的特征不仅依赖于丈夫与妻子各种职业阶级结合的频率，而且依赖于双收入家庭的频率。如果仅有10%的家庭有两个挣钱者，那么即便大多数的这些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处于不同职业阶级，这种情况也不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阶级结构。这样，我们便理想地想勾画出所有家庭的阶级特征——单身家庭、单收入家庭、双收入家庭以及无劳动力家庭(包括退休者、依靠社会福利者等等)，然后再考察这些不同类型家庭的阶级分布。这样，这种关于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具体研究就能够控制家庭形式的分布。

这一研究的数据不允许进行这种分析，因为大多数国家的样本都限制在劳动力人口上。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没有一个是主妇、退休者、靠社会福利生活者等等，因而我们不能对所有家庭的阶级分布做出一个充分的估计。结果是，分析被限制在双收入家庭中。

## **第三编**

### **阶级和性别**



## 第九章

### 阶级和性别互动的概念化

#### 9.1 关于阶级第一重要的争论

阶级分析作为近年来批判性社会理论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受到来自女性主义的最持续的挑战。阶级分析家们，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常认为在社会结构里阶级是比性别“更重要”或“更基本”的维度。<sup>1</sup>虽然把阶级视为具有首要解释作用的现实很少被明确地提出过，但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里对性别的相对较少的关注，在许多评论家那里却成了对作为一个重要因果因素的性别事实上的诋毁。

认为阶级比性别“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套特定理论关注的副产品。在社会阐释中，把阶级作为一个因果机制来关注还有其他涵义。第一章已经说过，阶级分析是一个“自变的”专门研究，这也就意味着有必要关注阶级及其分支而对其他因果要素给予较少注意。这并没有使阶级分析从认为它有时夸大了阶级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力的批评中解脱出来，但是它的确隐含着，只关心阶级及其影响的纯粹事实并不是表明阶级分析合法基础的意思。

尽管如此，有时还会出现这种说法，认为阶级(或是“生产模式”、“经济结构”这样密切联系的概念)比其他因素“更重要”这种看法是一个实质性命题，而不是一个启发式手段。古典历史唯物主义是这种观点最详尽阐释的一例。科恩(1978)已经断言过，历史唯物主义者围绕基础/上层建筑这个隐喻，对阶级第一重要的说明是通过利用功能性阐释的：基础(在阶级术语中概念化为经济结构)“功能上解释了”上层建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上层建筑现象采取它们现在所采取的表现形式是因为这种表现形式有助于重现现存经济结构。这很类似于生物学中的功能解释，一个动物天生的特点从功能上可以解释为它的作用有助于动物生存繁衍。为什么鸟类翅膀上的骨头是中空的呢？因为这可以帮助它们飞翔。骨头中空(使翅膀更轻)的好处解释了中空这一事实。在社会事例中，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功能阐释意味着，各种社会制度——国家的某些特征，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法律的某种形式等等——都可以由它们能产生帮助重现经济结构这一事实来解释。<sup>2</sup>既然经济结构本身由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组成，而这些关系又共同界定了阶级结构，因此这就是阶级第一重要的一种形式。

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的中心地位给予了格外有力和相关的论点。但是正如G. A. 科恩(1988, 第9章)所已经指出的一样，即使是古典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提出阶级是社会中的每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这样宏大的主张判断。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论，它只是一组特定现象的解释项——经济结构及其伴随的上层建筑的历史轨迹。<sup>3</sup> 这里的上层建筑并不是指所有非经济基础部分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相反，上层建筑仅限于那些对基础再现起作用的非经济社会现象；这些现象正是等待历史唯物主义所捍卫的那种功能性



阐释的现象。科恩恰当地称之为“限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表示了阶级对各种非经济结构部分和非上层建筑部分的相对解释重要性的不可知，它潜在地包含了许多文化现象和可能重要的性别关系方面。<sup>4</sup>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功能主义推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性别关系的分析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例如恩格斯(1968 [1884])的关于男性统治起源的著名文章就根据其对稳定私有财产的继承作用来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的。这是根据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功能性要求而做的有关性别关系解释。在最近的讨论中，功能主义阐述已经转向了性别压迫对资本积累的有利影响。<sup>5</sup> 例如，70年代关于“家务劳动大辩论”中，有人(如加德纳，1975；瑟康姆伯，1974)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根源于家务劳动中性别的分工，这反过来又可以被妇女无报酬的家务劳动降低了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从而提高了利润(因为工人消费的一部分采取了家庭主妇无偿服务的形式)这一事实来解释。其他人(如扎列茨基，1976)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被压迫的主要基础在于，劳动的性别分工通过强化家庭生活的私有化的、消费中心的想象，帮助重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在以上所有例子中，通过运用功能性的阐释，使阶级获得了解释性第一的地位。

很少有阶级分析者，即使是那些仍明确认同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的人，还在严格坚持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条。其实没有人在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形象问题上捍卫强烈的功能主义观点，即便是在解释经济结构的历史轨迹这一特定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古典分析现在通常被认为近似于所谓“社会学唯物主义”的松散用词，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阶级与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开发密切相关，因而它对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都具有推定的重要意义，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地被视作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这种观点虽然保留着马克思主义通常试图把阶级分析放入历史背景下的做法，但是它通常最多与关于人类历史本身整个发展轨迹的唯物主义理论保持了一种脆弱联系。在实践中，“历史地”看问题通常也就是意味着要“历史特定而具体地看问题”，而并非是将问题“包含在一种历史理论中”。<sup>6</sup>因此，关于所谓“阶级消减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讨论近年来明显减少。

如果接受了这种对阶级分析解释项目的理解方法，那么中心任务就是要挑选出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特定因果互动的特定解释项。在某些问题上，阶级也许的确比性别“更重要”，同样地，在其他问题上性别又可能比阶级更重要。对性别的阶级分析和对阶级的性别分析要进一步发展，就得靠澄清这些互动的研究。

## 9.2 阶级和性别相互联系的形式

作为关于阶级和性别的经验性调查上的最初任务，设计出一个关于阶级和性别可能会相互联系的各种形式的概念化列表是有用的。这个列表没有穷尽一切，当然也不成其为阶级和性别的理论。但是，它是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议程上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 性别作为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

尽管阶级和性别概念在分析中不同，但是经验环境中存在着性别关系本身就是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或者说，阶级关系本身就是直接由性别关系组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8 [1884]: 503)在他关于家庭和私有财产的经典著作里，这样阐述了早期文明中的阶级和性别关系：“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对立恰巧

伴随着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男女对立而产生，而最初的阶级压迫也恰巧伴随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产生。”加达·勒那(1986)对早期文明中性别和阶级的汇合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男性统治的最初形式之一就是男性能有效地占有女性，并通过这种占有而占有女性所生产的剩余。这种剩余最重要的形式是新的人——儿童，他们在早期农业文明中是很有价值的资源。因此控制女性生育新劳动力就成了财产关系中的重要形式。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构成了性别和阶级合为单一关系中的性别奴隶关系的一种特定形式。<sup>7</sup>

### 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某些阶级位置之所以可能存在只是由于有特定性别关系形式存在这个事实。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务劳动：性别关系在进行可能的家务和照看儿童这些工作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92)。性别不仅是分给各人工作；而且如果性别关系突然变得平等起来，那么这些工作可能本身就不存在了。19世纪在新英格兰，雇佣那些农场里不需要、也不能继承农场的单身未婚女孩的存在曾对纺织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随之出现的则是早期工业工人阶级。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性别在补充各种制造业雇佣的廉价、脆弱的劳动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性别不仅把人们分布到一组独立创造的阶级地位中去，而且性别关系的结构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工作带有某种特征。

同样地，阶级关系对性别也有影响。许多蓝领工人阶级工作对体力的需要，使得人们重视强壮，这反过来可能有助于强化了工人阶级男性中的男子汉性别文化。管理性和专业性职业的竞争性和压力的职业要求有助于强化一种特定的家庭性别关

系，其中由家庭主妇来处理她们丈夫的个人事务。正如这类职业中的妇女所经常讥讽的那样，她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妻子。

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相互影响的最重要形式之一集中在“家庭工资”问题上。约翰娜·布雷内尔和玛丽亚·雷梅斯(1984)认为，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局限是影响工人阶级家庭形式和性别关系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婴儿的高死亡率和工人中高生育率的需要(拥有成年存活的子女是父母老年保障的关键)，因此妻子留在家里，丈夫外出工作赚钱符合工人阶级家庭利益。但是，直到“家庭工资”形成制度，这种现象才行得通。家庭工资反过来又成为女人留在家里和强化收入中性别差异的强有力物质因素。这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又进一步使得围绕“男人养家者”的阶级和工作利益制定家庭经济政策合理化，从而进一步使妇女的有酬工作成为次要的。只有在近几十年里，随着男人养家者的家庭工资的开始减少，这套体系也才开始衰落。<sup>8</sup>

特定阶级关系也能促使性别关系朝着更平等的方向转化。作为一名教授，我拥有较特权的阶级位置，是相对富裕的“专家”，能高度控制自己的工作。对许多教授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控制日程和时间的工作方式。教授可能每周要工作很长时间，但他们经常自行决定何时工作。此外，在不同时间里我还有经费，可以使我买断教学，从而使我在组织自己的时间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我的家里我就有可能从孩子们尚在襁褓中开始，在养育孩子的各个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也改变了家庭生活，使得关于家务劳动分工的纠纷成为有酬的。结果是大多数家庭杂务的劳动分工相对平等。这并不是说阶级决定了劳动中的性别分工。远不是这样。我们在第十一章会讲到，阶级位置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没有有力的

全面影响。尽管如此，阶级地位的特定性质改变了对人们自己生活中性别关系的束缚，在某些情况下它又促使更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形成。

### 性别作为进入阶级位置的一种分类机制<sup>9</sup>

性别把人划分到不同阶级位置的方式可能是阶级和性别相互联系中最显而易见的方面。无需进行高智力研究，就能观察劳动力中的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职业和阶级分布，大多数人都将以某种方式用性别来解释这种差异。当然，具体哪种性别机制在这里起作用可不那么明显。现在很少有社会科学家认为男女的生理差异是形成他们工作中两性隔离状态的主要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在普通民众中仍相当流行。在典型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讨论中，人们在解释职业和阶级分布中的性别差异时，主要关注跟性别关系有关的两类因素：(1)形成男性和女性的职业抱负和技能，并因此影响他们可能获得工作种类的性别社会化过程；(2)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控制和歧视，直接影响男性和女性获得各种类型的工作，或是通过影响他们取得相关资源来间接影响他们获得各类工作。女性主义者常常注意到，家务劳动中两性劳动分工的不平等限制了许多妇女的劳动市场策略，并因此限制了她们现实中能够竞争的工作种类。信用市场上的歧视使女人要想成为资本家变得比较困难。传统上，进入某种专业学校的歧视使得女性相对难以取得必要的资格证书，也就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专家位置。我们在第十二章会看到，权力等级中升迁方面的性别歧视直接影响女性成为经理的可能性。在每一个例子中，性别关系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都影响了男性和女性占据某种阶级位置的可能性。

### 性别作为与阶级位置的间接联系

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谈过，个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而不是他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直接位置与阶级结构相联系的。儿童的阶级位置来自于把他们与父母的阶级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的家庭中的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建构了这种与阶级结构的“间接联系”已在其中组成（特别是通过婚姻）相连接的关键方式之一。这样，阶级和性别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家庭内性别关系和亲属关系网络把人们与阶级结构中各种位置联系起来。这些间接阶级位置既影响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利益——这种利益是他们通过所处特定性别关系取得的——也影响了他们的阶级利益。

### 性别在决定结果过程中作为与阶级的因果互动

性别和阶级不仅通过它们彼此影响的各种方式，也通过它们对一系列广泛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而联系起来。阶级和性别产生互动作用的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互动作用的存在表明“阶级”和“性别”概念所代表的因果过程是交错在一起的，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机制运行。

正式表示阶级和性别互动的方法之一是多变量回归分析中所用的一种简单等式。假设我们研究阶级和性别对政治意识的影响。阶级和性别的互动可以用如下等式表示：

$$\text{意识} = a + B_1 [\text{阶级}] + B_2 [\text{性别}] + B_3 [\text{阶级} \times \text{性别}]$$

系数  $B_1$ 、 $B_2$  和  $B_3$  代表着等式中每一项对意识作用的程度。 $B_3$  作为互动项，表示阶级随性别而变动的程度，或者是性别随

阶级而变动的程度。资本家和工人意识形态的不同程度在男性中比女性中要大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类模型中,可能的情况是附加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 $B_1$ 和 $B_2$ 可以是零)。这说明当阶级和性别通过某种特定方式被结合起来时,它们只会对这个自变量产生影响。例如,可能有这种情况,男资本家、女资本家和男工人都有相同的态度,但女工人的态度则明显不同。这时,我们等式中的两个自变量——阶级和性别——实际上就会被一个单独变量所取代,这个变量对女工人的价值是1而对其他每一个人的价值则是0。阶级和性别的影响就像水中的氢和氧一样起作用。浇植物的水总量改变了,植物生长中不存在氢的总量和氧的总量的“附加影响”,这些影响完全是“互动”混合物水的总量的功能。如果阶级和性别以这种方式行动,那么可能需要介绍一个新概念“clender”来表示互动项本身。但是,通常主张的产生结果中的阶级和性别“互动”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附加影响。这说明关于性别的一些后果的发生与阶级无关,而关于阶级的一些后果的发生与性别无关。因此,阶级分析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不同结果进行分类。

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里,我们探讨阶级和性别相互联系的几种形式。第十章讨论双收入家庭中已婚妇女的阶级位置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对性别介入阶级位置方式的调查。这一章还包括分析家庭中性别和阶级构成相互作用对阶级认同的影响。第十一章探讨阶级位置可能会影响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的方式。最后,第十二章详细考察性别把人们分类到阶级位置中去的方式的一个特定方面——男性和女性在获得工作场所权力位置的不同。

## 第十章

### 个人、家庭和阶级分析

考虑一下下面列出的一组夫妻从事不同职业的家庭：

#### 家庭的职业构成

<u>妻子的职业</u>	<u>丈夫的职业</u>
1.打字员、全职	无丈夫
2.打字员、全职	工厂工人
3.打字员、全职	律师
4.打字员、兼职	律师
5.律师	律师
6.律师	工厂工人
7.家庭主妇	工厂工人
8.家庭主妇	律师

界定这组中每一个人的社会阶级的恰当方法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情况来说，这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头两家的妇女和第二家的丈夫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而第五家夫妇双方都会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与之相似的是，第七家和第八家家庭主妇的阶级一般与她们丈夫所处的阶级位置一致。<sup>1</sup>但对其他家庭来说，就没有不无矛盾的解决办法了。尤其是，如果已婚妇女的



阶级特性跟她们丈夫的不一致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她们在劳动力中的阶级地位呢？直观地讲，跟一个工厂工人结婚的打字员和跟一名律师结婚的打字员，尽管工作一样，但她们不处于同一个阶级。然而，简单地断言第二个打字员是“中产阶级”又似乎在阶级分析中忽视了她的工作。在阶级术语中，她应当跟第五家的女律师没有什么区别。跟工人结婚的女律师又怎么样？不说她与嫁给工人的打字员处于相同的阶级位置似乎又很不合适。许多女权主义者强烈反对把已婚妇女的阶级位置跟她丈夫的阶级位置等同起来，用琼·艾克(1973)的话来说，这是“智力性别歧视”一例。然而把女性的阶级位置与她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概念问题。嫁给律师的打字员可能和嫁给工人的打字员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最不同的是有着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当然，如果这些“跨阶级”的家庭构成是很少见的现象，那么这种分类问题即使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见，上面所举的这类例子并不是少见的情况：在美国(1980年)，从事专家管理工作的已婚妇女中有32%的人嫁给了属于工人阶级的丈夫，而同样从事专家管理工作的已婚男性中有46%的人的妻子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阶级多样化的家庭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很盛行，以至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不能忽视这些分类问题。

本章的中心目的是试图提供一个清楚的概念方法来解决确定已婚职业妇女在劳动力中的阶级位置的问题，然后在对美国和瑞典的阶级位置和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经验分析中采用这个方法。我之所以认为解决这个分类问题是重要的，有这样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一个人从事任何涉及个人阶级问题重要性的研究，那么这个人就必须

采用某个方法解决这个概念性问题。例如，对政治态度的调查研究经常会调查个人的阶级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典型的情况是，在没有做任何辩护的情况下，受访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工作的特性，都会用来界定阶级。无论喜欢与否，这表明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坚持：即个人阶级是由他们自己的职业来适当测量的，而他们家庭的阶级构成是与此无关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问题引发了关于阶级分析的主要解释性逻辑的重要议题。一个人的阶级位置通过什么来说明问题？是因为阶级等同于影响主观的一套微观职业经验吗？尽管他们并没有涉及阶级和性别问题，但在梅尔文·科恩(1969)大量的关于工作复杂性对认识功能影响的研究和迈克尔·布劳沃伊(1985)关于工作中一致与冲突的研究中，这仍是他们的基本观点。如果采纳这种通过这些机制使阶级变得重要的以工作为中心的观点，那么家庭阶级构成在阶级分析中就会成为相对次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把阶级的主要解释力与阶级位置造成的物质利益的方式相联系，那么家庭阶级构成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分类问题的解决与弄清使阶级具备解释性的机制有密切联系。

在本章下一节，我将扼要地回顾一下最近有关已婚妇女阶级位置问题的讨论。在第 10.2 节中，我将详细阐述第一章中简要讨论过的一种以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间的区别为基础的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然后，第 10.3 节将运用这种区别形成一套具体预测，一套关于瑞典和美国的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之间的联系。第 10.4 节将展示分析结果。

## 10.1 关于妇女和阶级的讨论

妇女阶级分析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约翰·戈德西尔帕1983年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女人和阶级分析：为传统观点的辩护》——里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了。戈德西尔帕赞同妇女的阶级来源于她们丈夫的阶级这一传统观点：

“家庭是分层的基本单位，主要因为只有某些家庭成员，通常是男性，由于加入到劳动市场中，才能在阶级结构中占有一个直接决定了的位置。另一部分家庭成员，包括妻子，没有参与劳动市场的同等机会，这样她们的阶级位置就是间接决定了的：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家长的阶级位置……”

“此外，正在被谈论的这些作者（传统阶级分析家）不会把他们的情況看做是基本上受已婚妇女从事有偿工作的数量增多的影响。他们会强调，尽管妇女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会以这种方式而有所降低，但这种受雇典型地形成了家庭策略的一部分，或者无论如何，在家庭整体阶级地位的限制和可能性之下发生了这种雇佣情况，而其中丈夫的受雇情况才是支配性的因素。（戈德西尔帕，1983：468～469）”

戈德西尔帕的文章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有时太过争论性的观点交换。对他的批评（如赫斯和布里特恩，1984；斯坦沃思，1984）认为劳动力中，已婚妇女职业的阶级特性有着跟她们丈夫的阶级无关的重大影响，因此，那些夫妻双方处于不同职业阶

级的家庭应视为具有双重阶级性质。

戈德西尔帕(1980)回答这些批评,认为把家庭作为一个跨阶级的组织,有破坏阶级分析的连贯性和破坏阶级概念的阐释能力的风险。因为阶级冲突是在于家庭之间而不是通过家庭进行的,如果视家庭为缺乏单一阶级性质,那么阶级结构将不能为阐释阶级冲突提供一个系统的基础。

戈德西尔帕的论点可被分为两个主要议题:

1. 单一家庭—阶级论: 家庭把收入集中起来用作消费单位。这就意味着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受益于任何成员的赚钱能力。<sup>2</sup>随之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家庭成员拥有同样的物质——因而阶级——利益。所以,通常是家庭,而非原子化的个人,才是阶级形成的集体组织的有效单位。阶级斗争发生在家庭之间,而不是家庭之中。

2. 丈夫阶级起源论: 因为家庭中性别劳动分工和社会中男性的统治,多数家庭的经济命运更多依靠丈夫职业的阶级性质而不是妻子的。因此,为使家庭福利最大化,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丈夫职业的阶级职责远远优于涉及妻子职业的策略考虑而受到重视。因此,已婚妇女的因果有效阶级(即拥有解释权的阶级)通常来自于其丈夫的阶级位置。

戈德西尔帕当然没有否认,在资本主义经济里,大体上是个人而非家庭从事各种工作。他驳斥的只是那种认为阶级结构与职业结构有联系的观点。阶级应当定义为“拥有共同物质利益的人类群体”。虽然人们的基本物质利益有可能依靠他们与生产体系的关系,但是那并不一定表明那些利益主要靠个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即他们的“工作”)。只要家庭是消费单位,所有成

员的收入集中起来使用，那么所有家庭成员都有相同的物质利益，并因此处于同一阶级中，这与他们个人的职业无关。只有当家庭停止把成员的收入集中起来消费，并不再作为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消费单位行动时，单个家庭成员才能在阶级结构里占据不同的位置。

可以收集一些反对这些观点的相互联系的批评。首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能真的从家庭收入中获益，但不能据此得出他们因这种收入而有一致的、无差别的利益这种结论。认为在家庭总收入方面夫妻双方有相同的利益，类似于说在公司总收入最大化方面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兴趣——多数情况下这是真的——因此他们便处于同一个阶级——而这又错了。家庭可以把收入集中起来，但有证据证明这并不表明夫妻双方在消费那些收入时能均分一切。<sup>3</sup>

夫妻家庭收入消费中的不平等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已婚职业妇女对她们自己的个人收入本身有物质利益，也不能表明她们在工作中明确个人基础之上的阶级利益。有可能家庭内权力的再分配中她们有着性别利益，但是家庭总收入之外个人收入中她们仍没有独立的阶级利益。但是，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认为已婚妇女拥有跟个人收入相联系的个人阶级利益。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高离婚率意味着许多职业妇女的工作构成了对她们来讲的一种“阴影阶级”——面临婚姻解体时她们所占据的阶级地位。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较高的可能性，已婚妇女在她们个人职业带来有收入能力方面拥有个人的阶级利益。<sup>4</sup> 第二，很明显，妻子提供的家庭预算比例会影响她在家里讨价还价的权力。<sup>5</sup> 所以，即使家庭集中收入，已婚妇女还是由于工作收入能力而拥有一些独立的个人利益。

对戈德西尔帕的另一个通常的批评认为，他非常狭隘地理

解了阶级利益。单一家庭—阶级论的理论依据是，因为夫妻把收入集中起来，在家庭总收入能力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因而就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是，与阶级相联系的利益并不仅仅只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利益。如果采用一种广泛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至少自主性、付出的努力和工作中的领导权这些问题都与阶级有系统的联系。这类利益正是布劳沃伊(1985)所说的“生产政治”和中心点，它更为直接地集中在作为工作岗位持有者的个体，而不是在作为家庭消费单位的成员的个体。即使已婚夫妇处于共同的家庭消费阶级，他们职业阶级的潜在不同还是会使其们的阶级利益产生不同。

第三，与戈德西尔帕的观点相对的是，家庭而非个人引起阶级斗争的情况并不一定是注定的。虽然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同阶级的家庭里，但也可以想象另外一些情况，妻子是工会成员、积极从事工会各种斗争，而丈夫则是反对工会的经理或小资产者。<sup>6</sup>尤其把阶级利益视为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收入利益范围时，可以想象不同职业阶级的夫妻参加不同阶级利益组织的情况。确实，不大可能夫妻双方在某次阶级斗争中分别处于相对的两个阵营——丈夫是妻子参与罢工的那个公司的高级经理或老板。但这不能说明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不会卷入相当分明、甚至敌对的阶级类型中去。

最后，戈德西尔帕认为，因为家庭的经济命运更依靠丈夫的收入而不是妻子的，所以家庭的阶级位置应当跟丈夫的工作绝对吻合。这就假定了家庭中在做劳动市场参与和选择工作的决策时，很少有斗争、商量和讨价还价，因此，与丈夫工作有关的利益经常优先于妻子工作的利益而得到考虑。家庭策略并不是对与每个配偶工作相连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责任的一般权衡，而是由男性的阶级责任独特地决定的。

戈德西尔帕的这个观点只有他一个人赞同，既没有理论论证也没有经验证据。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说法表面上具有很大的正确性。丈夫从事收入丰厚的管理性或专业性工作，而妻子只有一份投入很少的兼职弹性工作，这样的家庭无疑存在。这种情况下，每当与妻子工作相连的利益和与丈夫工作相关的利益之间需要权衡时，夫妻双方都愿意以丈夫利益为重。这种情况下，把家庭阶级完全与丈夫的职业等同起来有可能是合理的，至少作为第一优化决定。但是没有理由假定这种特殊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在这种利益和权力平衡之中不同家庭之间存在着系统变化，因而，在形成作为整体的全家阶级性质时，不同配偶不同职业阶级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

1980年，10%的美国双收入家庭里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49%，25%双收入夫妻中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甚至更多。瑞典这个数字还要高：45%双收入家庭中被调查者报告说妻子收入占了“大约50%”，其中10%被调查者报告说她带来了75%甚至更高的收入。<sup>7</sup>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使从狭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家庭策略也应当受配偶双方职业阶级性质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即使在决定性的零和折中条件下，从丈夫的职业中所得利益优先于从妻子的职业中获得利益，也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下妻子的职业利益与此无关，无助于影响家庭收入的最大化策略。所以，即使是在妻子的收入比丈夫低的情况中，她有偿工作的阶级性质还是能系统地影响家庭政策，并进而影响家庭单位的阶级性质。

如果这些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把已婚职业妇女的阶级位置与她们丈夫的职业阶级简单等同起来就没道理了。但把她们的阶级简单地视为以她们自己的直接工作为基础，这也不能令

人满意。需要找到另外一些界定她们所处阶级的概念性的方法。

## 10.2 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直接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大多数阶级概念认为阶级结构就是一套住满了客人的宾馆房间。住的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他们可以随时变换房间，但给人的印象是“空位置”正为人所占据。然而，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理解阶级结构：阶级结构可以理解为特殊种类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一套房间。决定这种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阶级结构的是它决定人们获得基本的社会生产资源、开发过程以及影响人们的物质利益形成的方式。<sup>8</sup> 因而一个“位置”不是一幢楼里的一个“房间”，而是关系网络里的一个结点。

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世界模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简化为个人和生产资源之间的单一关系，这个关系是由个人对这些资源的指挥、个人控制或占有所构成。这是多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抽象特征。但不需要把阶级分析局限于这种简化。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物质利益不仅是由这种直接跟生产资源联系的个人关系所决定的，也受到其他把个人与生产系统联系起来的各种关系的影响。在当代资本社会里，这些关系首先包括与其他家庭成员(既有一代之间也有代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sup>9</sup> 我把这些个人和生产资源之间的非直接联系称为“间接的”关系，用来与包含在个人直接职业和对生产资源的个人所有权之中的“直接的”关系相对照。

对当代资本主义中的某类人来说，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是完全由间接关系所构成的。这点在儿童身上最为明显。说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儿童“处于”工人阶级中，就是说他们的阶级利益是由他们与生产体系的(通过家庭)间接联系所决定的。间接阶级



关系在理解家庭主妇、失业者、靠养老金救济的人以及学生的阶级利益时也显得很重要。在以上每种情况中，简单地考察他们对生产关系的直接参与是不能够导致对他们阶级利益的充分理解。

阶级结构应当视为由整个直接和间接的阶级关系所构成。这说明直接阶级关系相同而间接阶级关系不同的两种阶级结构应视为是不同的阶级结构。为了描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相当鲜明的对比：

阶级结构 I 66%的所有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是被雇佣的工人阶级，而33%的家庭，夫妻都是小公司的共同所有者，并从其他家庭里雇佣工人。

阶级结构 II 33%的家庭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家庭，33%的家庭有一个工人阶级丈夫和一个当小雇主的妻子，33%的家庭有一个当小雇主的丈夫和一个工人阶级妻子。

如果坚持认为阶级结构是由个人与生产资料的直接联系所决定的，那么这两个阶级结构就是一样的：66%工人阶级，33%小雇主。可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坚持戈德西尔帕的以丈夫为基础的家庭阶级研究方法，这两个阶级结构完全一样：66%工人阶级，33%小雇主。但是，如果阶级结构是根据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组合来界定，那么这两个阶级结构差别看起来就很大：第一个结构里，三分之二的人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的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是工人阶级)；第二个结构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完全的无产阶级。<sup>10</sup>

一旦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区别被引入阶级分析的保留概念组成中，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与生产

资源这两种联系对某类行动者的相对重要性?说阶级结构全是由这种关系组成,并不是说阶级利益同样由直接和间接关系所决定。在把人们与生产资源相联系的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确实在阶级结构之中和之间会有变化。可以设想一个阶级结构,其中在决定物质利益并且因而在决定他们在阶级结构中整体位置过程中,间接关系对某些人而言显得十分重要,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不那么重要。

由于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在决定阶级利益中的相对突出影响,现在可以重提阶级结构中的妇女问题了。戈德西尔帕在对当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立场:毫无例外,已婚妇女的间接阶级位置完全超越了她们与直接阶级位置的关系。但是,他的论证也暗示着承认在适当的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如果家庭中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劳动分工和权力与劳动竞争机会方面的性别差异受到巨大力量的侵蚀,那么已婚妇女的直接阶级位置就会开始既影响她们的阶级位置也影响她们丈夫的阶级位置。<sup>11</sup>

这样,理解阶级结构中妇女位置的理论任务就是由试图认同影响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相对重要性的因果过程所构成。我们会在下文有关瑞典和美国的家庭阶级结构和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一个经验比较,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 10.3 研究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影响之方法

探讨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问题,通常可以采取两种经验性策略。如果能收集到足够的纵向微观水平的家庭数据,就能实际度量出美国和瑞典已婚妇女的物质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她们自己的直接阶级位置或她们丈夫的阶级位置,并且还能测定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阶级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和全家的决策的影响程度。另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阶级位置至少意味着部分地阐释——诸如阶级意识、阶级认同、参与阶级冲突等等现象——并且能够检验个人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相对“阐释性能力”。引入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区分的惟一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有先后顺序，这种区分能更好地体现这种产生过程的顺序。因此，无论解释什么样的阶级位置问题时，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相对重要性方面的差异应当在这两个阶级维度的影响上有所体现。

本章我将使用第二种方法。我们将比较具体地考察(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和工人阶级认同(即主观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主观阶级认同可能不是阶级位置的主观影响中最微妙的指标。但是，在所有“阶级意识”的维度中，它可能是最直接反映对阶级结构中个人位置的主观理解的一个。阶级认同是与本章所讨论的理论问题联系最密切的指标。分析的前提是因为直接阶级关系比间接阶级关系更有力地决定了个人的阶级位置，它因此与特定阶级认同的可能性有更密切的联系。

下面的经验调查是图 10.1 所显示的简单理论模型。直接和间接位置与影响阶级身份的不同因果通路有关系。直接阶级位置影响阶级身份，既因为个人的职业影响了工作中一系列阶级经验，也因为直接阶级位置决定了物质利益。另一方面，间接阶级位置只通过物质利益影响阶级身份。因此，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阶级认同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两种因素：(1)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物质利益的相对重要性，(2)在决定阶级身份中，以生产为中心的阶级经验和以消费为中心的阶级经验的相对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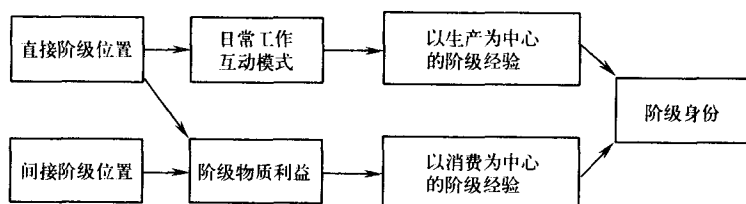


图10.1 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阶级认同影响的一个常用模型

## 假 设

下列简单线性方程将是数据分析的基础:

妻子拥有工人阶级身份的可能性 =  $H_w$ (丈夫的职业阶级) +  $W_w$ (妻子的职业阶级)

丈夫拥有工人阶级认同的可能性 =  $H_h$ (丈夫的职业阶级) +  $W_h$ (妻子的职业阶级)

$H_w$ 是丈夫的职业阶级对妻子身份的影响,  $W_w$ 是妻子的职业阶级对妻子身份的影响,  $H_h$ 是丈夫的职业阶级对丈夫身份的影响,  $W_h$ 是妻子的职业阶级对丈夫身份的影响。<sup>12</sup>

戈德西尔帕预言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而言,  $H$ 系数都会比 $W$ 系数大得多。实际上, 在他所举的最极端的公式中,  $W_w$ 和 $W_h$ 应当是零——家庭的单一阶级完全由丈夫的阶级所决定, 因此妻子职业阶级对阶级身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相对而言, 认为个人的阶级位置应视为是直接和间接关系的组合的观点就说明了:  $H$ 和 $W$ 的相对重要程度是跨家庭、跨性别和跨国家的变量, 这些变量依赖于个人的直接阶级位置和通过家庭纽带的间接位置的相对重要性。由于已婚妇女经济上依赖她们丈夫的职业, 因此可以想象, 家庭间接阶级位置对妇女的影响比对男人的影响更大。这也就是说,  $H_w$ 应当比 $W_h$ 更

大。但与戈德西尔帕的观点不同的是，人们一般不会期望忽略  $W_w$  和  $H_w$ 。

我们将考察美国和瑞典双收入已婚夫妇的上述问题。有各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期待已婚妇女的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相对重要程度在美国和瑞典之间有所不同：瑞典男女工资的更为平等意味着瑞典妻子比起美国妻子来，在经济上更少依赖她们丈夫的职业，也就是她们的经济福利更少依赖她们的间接阶级位置；国家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使得普通瑞典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较之美国人更少依赖家庭收入维持生活水平；瑞典工作中的高度阶级组织化意味着个人自己的职业在决定他们的阶级意识时可能更重要。这些原因表明，瑞典  $W_w/H_w$  的比率应比美国的高。

所以，接下来的经验分析会围绕以下对比的假设而展开，来预测主观工人阶级认同的可能性。<sup>13</sup>

### 戈德西尔帕假设

(1.1) 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 $H > W$  (即丈夫的职业阶级在预测夫妻的阶级身份中比妻子职业阶级更重要)。

(1.2)  $W_w$  和  $W_h$  永远是无足轻重的 (即妻子的直接阶级不会影响她自己的或她丈夫的阶级身份)。

### 间接和直接阶级位置假设

(2.1)  $H_w > W_h$  (即间接阶级位置对妻子比对丈夫有更大的影响)。

(2.2) 瑞典  $W_w/H_w$  会比美国的高 (即瑞典已婚妇女的直接

阶级位置对她们间接阶级位置的影响比美国的要大)。

## 10.4 结 论

我们将分两步来展示分析的结论。第一步,我们将检查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夫妻双方阶级身份的影响。这为检验核心假设提供了首要基础。第二步,我们给方程中加入了一批控制变量以验证最初结果的程度。正如本章研究方法附录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分析中的因变量是两分的(1=有工人阶级身份),所以分析是以对数回归而不是以OLS回归为基础。<sup>14</sup>

### 阶级构成对阶级身份的影响

表10.1和图10.2表示出了在美国和瑞典每个家庭阶级类型单位中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的男女所占比例。表10.2展示出了表10.1中用于为所观察到的型式建立模型的对数回归方程。因为表10.1的分析单位中小资产阶级家庭成员中人数太少,下面的讨论只集中于表10.1中那些夫妻双方都是挣工资者的单元(即位于表10.1中每一分表中右下角的四个单元)。<sup>15</sup>

在美国依靠工资收入的家庭中,妻子的职业阶级特性似乎看上去对夫妻的阶级认同没有丝毫影响。嫁给中产阶级丈夫的职业妇女中约20%的人、嫁给工人阶级丈夫的职业妇女中约50%的人主观认同工人阶级,不管妇女自己职业的阶级特性是什么。男性的型式大致相等(百分比上还有轻微差异):20%处于中产阶级工作位置的男人和超过35%的工人阶级男人主观认同工人阶级,不管他们妻子工作的阶级特性如何。<sup>16</sup>

这些观察在表10.2中通过对数回归得到了统计学的证实。

表 10.1 不同阶级构成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数的百分比  
(仅限双收入家庭)

美国		妻子的职业阶级		
男性受访者 (N=268)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丈夫的	小资产阶级	62. 5 <sup>a</sup>	(24. 7) <sup>b</sup>	(43. 7)
职业	中产阶级	(18. 4)	20. 9	23. 4
阶级	工人阶级	(0. 0)	35. 7	38. 9
女性受访者 (N=273)		妻子的职业阶级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丈夫的	小资产阶级	16. 2	(8. 5)	(26. 5)
职业	中产阶级	(43. 4)	20. 0	22. 9
阶级	工人阶级	(23. 0)	51. 0	53. 0
瑞典		妻子的职业阶级		
男性受访者 (N=318)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丈夫的	小资产阶级	41. 2	(18. 2)	47. 8
职业	中产阶级	(40. 0)	19. 0	37. 8
阶级	工人阶级	(100. 0)	64. 0	71. 8
女性受访者 (N=297)		妻子的职业阶级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丈夫的	小资产阶级	(22.2)	(37.5)	(41.7)
职业	中产阶级	(66.7)	11. 6	39.7
阶级	工人阶级	(100.0)	44.8	71.7

a. 每一项是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受访者所占百分比。

b. ( ) 表示本项人数少于 15 人。

双收入家庭中的美国妻子，只有丈夫的阶级系数才能预测她们的阶级认同。另一方面，对美国丈夫而言，他们妻子的阶级位置似乎对他们的认同没有丝毫影响。所以，间接阶级位置对妇女阶级认同有重大影响，而对男性阶级认同毫无影响。简而言之，在美国，一旦你知道了丈夫的阶级位置，你预测丈夫或妻子的阶级认同的能力不会因为了解了妻子的阶级位置而有所提高。

然而当我们来看瑞典的数据时，我们却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形。在瑞典，无论是男性受访者，还是女性受访者，丈夫和妻子的职业阶级都对他们的主观阶级认同有持续的影响。对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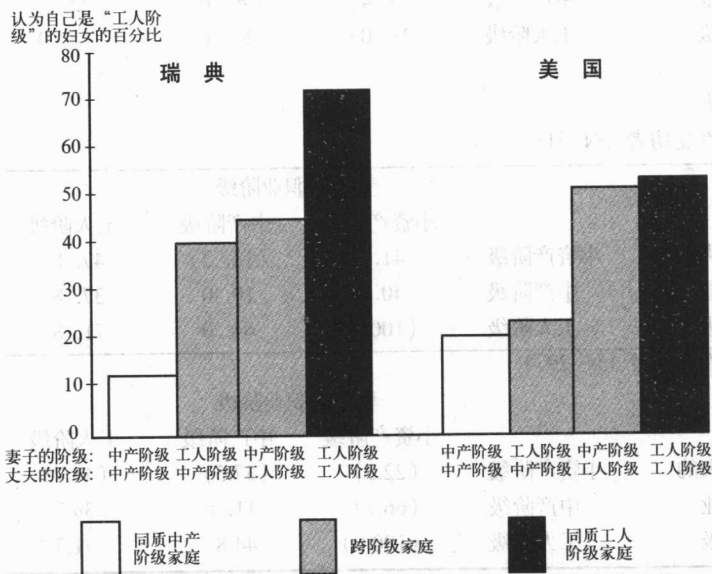


图10.2 不同阶级构成的双收入家庭中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妇女的百分比



妇女来说，同质中产阶级家庭中12%的被调查者主观认同工人阶级，而同质工人阶级家庭中这一比例近于72%。阶级异质家庭中的妇女——妻子从事中产阶级工作而丈夫从事工人阶级工作，或者妻子从事工人阶级工作而丈夫从事中产阶级工作——有一个居中的工人阶级认同可能性大约为40%。类似的如果比较弱的型式也发生在瑞典男人身上：同质中产阶级家庭里19%的男人和同质工人阶级家庭里72%的男人主观认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丈夫与工人阶级妻子中这一比例大约是38%，工人阶

表 10.2 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认同的影响（对数回归）

变量	女性		男性	
	美国	瑞典	美国	瑞典
受访者阶级： <sup>a</sup>				
小资产阶级	0.01 <sup>b</sup>	1.11	1.01**	0.24
(标准误差)	(0.43)	(0.64)	(0.38)	(0.38)
工人阶级	0.29	1.23**	0.73*	1.61**
(标准误差)	(0.31)	(0.30)	(0.31)	(0.27)
配偶的阶级：				
小资产阶级	-0.38	0.17	0.59	0.87
(标准误差)	(0.45)	(0.47)	(0.44)	(0.53)
工人阶级	1.07**	1.46**	0.27	0.78**
(标准误差)	(0.31)	(0.28)	(0.31)	(0.28)
量度偏差	310.2	348.1	329.5	384.4
自由度	249	265	275	313

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 $p < 0.05$  \*\* $p < 0.01$

a. 受访者及其配偶的阶级类别都是“中产阶级”的被排除在外。所以，这些变量的系数跟哑变量的阶级分类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一致（常用术语表中未列出）。

b. 对数系数和标准误差都来自于计算各类人群工人阶级认同的对数回归分析。

级丈夫与中产阶级妻子中这一比例是 64%。

这些观察在表 10.2 的对数回归中也得到了统计学的证实。工人阶级哑变量的系数对男女受访者及其配偶的阶级位置有统计学上的意义。瑞典妇女中  $Ww/Hw$  的比率是 0.84, 这表明她们的直接阶级位置对阶级认同的影响与间接阶级位置的影响几乎一样大。与美国不同, 瑞典夫妻的阶级认同主要受妻子职业和丈夫职业的阶级性质影响。<sup>17</sup>

### 多变量结果

为了使表 10.2 的结果构成对有关瑞典和美国的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假设的合理验证, 这些结果显示出的所观察到的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之间的联系必须归因于阶级而不是其他的变量。例如, 可以想象实际情况是阶级认同基本上是家庭收入的结果, 而不是由丈夫或妻子的阶级位置在结构上所决定的结果。进一步说, 让我们假定瑞典和美国的家庭收入以不同方式跟家庭阶级构成相联系(因为工资结构不同)。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出现家庭收入和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国家中会显得十分不同, 即使家庭收入和认同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因果机制——在两个国家中确实有相同的情况。

所以, 我们想要发现的是, 当各种控制变量被加入表 10.2 中的方程时, 这些模式是否还保持大体不变。我们不会特别关注这些控制系数本身的价值, 而会关注方程中添加了这些控制变量对被访者及其配偶的系数值的影响。

分析中会涉及四个基本的控制变量: 受访者每周工作的小时数, 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妻子的经济贡献), 家庭总收入和受访者年龄。表 10.3 给出了含有这些变量的方程。

有一个例外就是表 10.3 所含的控制变量并不能改变表 10.2 所报告的基本模型。对美国女人而言,受访者的阶级系数仍然不重要,而工人阶级配偶的系数则很重要,对美国男人而言,情况正好反过来。在瑞典女人中,正如表 10.2 所示,妻子阶级的影响和丈夫阶级的影响几乎是同等的,即使加了这四个控制变量也是如此。控制变量改变表 10.2 的模式的情况是关于瑞典男人:一旦控制变量被加入方程中,他们配偶的阶级对他们的阶级认同就不再具有重要显著的影响(在 0.05 显著水平上),然而,从最初的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仍然有效:与美国妇女相比,瑞典已婚职业妇女的直接阶级在预测她们阶级认同方面比她们的间接阶级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 10.5 含 义

概括我们讨论的结果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根据戈德西尔帕模型的“传统智慧”所做的预言在美国很准确,而在瑞典就不准了。对前者而言,根据丈夫的阶级来界定已婚劳动妇女的阶级位置不会失掉预见力,而在后一个国家里情况并非如此。

怎样解释瑞典和美国这些不同的因果结构呢?有一系列可供探究的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模式能够直接反映两个国家里男女阶级认同含义的不同文化传统。或者说,它们可能受到政治党派和工会在组织集体团结过程中对男女不同策略的影响。或者也许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在分析一个或多个变量测量问题的产物。所有这些论证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把讨论限定在两个可替换的以阶级为中心的阐释上,因为这最直接地体现了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的理论议程。

我们讨论的瑞典和美国之间的基本不同可以用两种略有区

表 10.3 加入控制变量后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认同的影响(对数回归)<sup>a</sup>

变量	女性		男性	
	美国	瑞典	美国	瑞典
受访者阶级: <sup>b</sup>				
小资产阶级	0.20	0.68	1.08*	0.23
(s.e.)	(0.47)	(0.73)	(0.43)	(0.43)
工人阶级	0.09	1.16**	0.75*	1.61**
(s.e.)	(0.34)	(0.32)	(0.31)	(0.31)
配偶阶级:				
小资产阶级	-0.48	0.16	0.63	0.52
(s.e.)	(0.49)	(0.51)	(0.56)	(0.59)
工人阶级	0.99**	1.31**	0.23	0.53
(s.e.)	(0.33)	(0.31)	(0.31)	(0.31)
控制变量:				
每周工作时间	-0.00	0.03**	0.01	0.02
(s.e.)	(0.01)	(0.01)	(0.01)	(0.02)
妻子的经济贡献	-0.01	0.01	-0.01	0.01
(s.e.)	(0.01)	(0.01)	(0.01)	(0.01)
家庭收入:千美元	-0.41**	-0.40*	-0.25*	-0.47**
(s.e.)	(0.15)	(0.18)	(0.11)	(0.15)
年龄	-0.01	0.04**	-0.01	0.04**
(s.e.)	(0.01)	(0.01)	(0.01)	(0.01)
度量偏差	294.9	324.3	316.6	360.6
自由度 <sup>c</sup>	241	258	268	306

显著水平: \* $p < 0.05$     \*\* $p < 0.01$

- a. 方程里的系数被包含在控制变量的缺失数值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处于其中的一个方程里,1 代表着变量的缺失数值,0 代表着变量有此值。只有一个例子中(美国男性的家庭收入),这些缺失数值虚拟变量的系数接近于统计学的显著度(即并不能说明缺失数值的出现常跟系数的计算值有偏差)。通常这些系数没有统计学意义,所以缺失数值虚拟变量并未包括在本表的结果中。常用术语表中未列出。
- b. 受访者阶级和配偶阶级未包含的分类是“中产阶级”。所以,这个变量的系数跟虚拟变量阶级分类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一致。
- c. 方程中的自由度包括上面脚注 a 中所提到的缺失数值虚拟变量。

别的方式描述出来。第一种,我们来看  $W_w/H_w$  比率——即妻子阶级对妻子意识的影响与丈夫阶级对妻子意识的影响之比——而且可以说,对瑞典女人而言,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她们阶级认同的影响差不多,而在美国,间接阶级影响比直接阶级影响就大得多。或者也可以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间接阶级位置对女性的影响差不多,两个国家所不同的只是直接阶级位置对男女阶级认同的影响,在瑞典比在美国大得多。<sup>18</sup> 在第一种说法中,我们的重点是在直接和间接关系的相对重要上;在第二种说法中,重点是在每一种关系的绝对重要程度上。

这两种描述表明了可能作出的对美国 and 瑞典模式之间的差异以阶级为中心的不同解释。第一种描述符合强调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决定了阶级利益构成及阶级认同的观点(从阶级位置,通过阶级利益到阶级认同的因果途径见图 10.1)。前面已经提过的原因是妻子的物质福利越少依赖于丈夫的职业,她的阶级利益就越少来自于他的直接阶级,她自己的直接阶级位置也就相对更重要些。在瑞典双收入家庭中,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同样,瑞典国家的福利和再分配政策使得已婚妇女的个人经济利益较少依赖她们的丈夫。由此看来,瑞典已婚妇女自身职业对她们的阶级认同影响大于美国是瑞典妻子从经济上更少依赖丈夫的结果。运用图 10.1 中的模型,也就是说相对瑞典女性,美国女性中,直接阶级位置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途径比间接阶级位置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途径要弱得多。

相反,第二种描述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阶级位置是解释性的,不仅仅因为它决定了一套物质利益而且因为它们深深影响了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在工作中。<sup>19</sup> 这些以个人工作经验为中心的阶级观点并没有关注妻子对丈夫的各种物质依赖,而是把调查引向一种对我们已观察到的模式的完全不同种类的解释。

迈克尔·布劳沃伊在关于这些结论的非正式讨论中提出，瑞典和美国的主要对照可能会是，一个阶级主要通过工作产生影响的社会与一个阶级主要通过消费产生影响的社会对比。这种对阶级影响的一般看法强调了图10.1中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因果途径。用这个模型的术语来说，就是美国社会的特征是阶级的因果影响——直接的和间接的——主要通过物质利益/消费取向来发生作用，而瑞典社会的特征是两个因果取向都产生重要作用。

对两个国家间的这个差异(如果这种概括化是正确的)的解释可能在于一系列风俗习惯和历史的因素：这两个社会内生产政策的本质，“全球政策”和店层政治之间的表现形式，工人通过工会的集体组织程度，等等。例如，瑞典法团主义和集中工会主义的特定形式对缓解不同劳动市场中(既有国外也有国内)工人的竞争有一定效果。反过来，这又表明日常工作经验有助于增强阶级团结，进而增强工人阶级认同。但是不管特定的历史和制度解释是什么，结果都是瑞典较之美国，主观阶级认同是更系统地通过工作经验形成的，而在美国，阶级认同主要是在消费和社团中形成的。

这些讨论说明，已婚妇女的直接阶级对预测美国的阶级认同并不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美国阶级主要是以在单独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消费中形成的，就消费而言，已婚妇女的间接阶级位置通常比她自己的直接阶级位置还重要。如果瑞典阶级也同样主要在消费领域内形成，那么尽管妇女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弱，她们的直接阶级也不会对认同起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瑞典已婚妇女的直接阶级对认同的较大预测力来自于瑞典工作中的阶级经验对一般工人生活的较大重要性。<sup>20</sup> 所以，在这个可替换的方法里，戈德西尔帕在美国合理地实现了对已婚妇女的

预言，这是因为他对阶级概念化的主要假设——即阶级是由作为共同的物质利益/消费的单位的家庭组成——更适合于美国的而不是瑞典的阶级结构。

现在分析的数据并未直接评估这两种可选择的解释。为了正确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两个其他的例子：一个例子里妇女经济独立程度跟瑞典的差不多，但与美国一样都有以消费为基础(家庭为基础)的阶级构成；另一个例子与瑞典一样都有以生产为中心的阶级特征，但有美国的经济依赖模式。无法得到这些例子的相应数据。

但是，数据中有几条间接证明资料可以支持图 10.1 强调两个因果途径的解释。如果物质利益依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可以期望表 10.3 中妻子的经济贡献这一变量对阶级认同应当有系统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妻子贡献越大，工人阶级认同的可能性越大——或者也可能是互动的——妻子贡献越大，她的直接阶级和她的认同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或者说，她丈夫的阶级和她的认同之间的联系越薄弱)。无论在哪一个方程中，这个变量从未具备统计学意义。<sup>21</sup> 所以，虽然瑞典已婚妇女比起美国已婚妇女，对家庭总收入贡献的比例要大，但是没有证据说明瑞典和美国妇女的阶级认同受这类贡献中跨家庭变量的影响。

另一个证明与工作经验而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相一致，这涉及表 10.3 中工作小时数变量。这个变量对瑞典妇女很有意义，但对美国妇女就不重要，这说明瑞典妇女工作时间越长，工人阶级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假定随着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场所中的阶级经验就会更显著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对瑞典妇女来说符合这样的观点：瑞典与众不同的是形成阶级中以工作场所为中心的阶级经验更为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结果并不表明根据共同物质利益把阶级概念化是不对的。在美国和瑞典，关于妇女的间接阶级位置对她们认同的一贯解释，以及两国中男女家庭收入变量的强大的负系数，都符合下面的观点，即阶级结构由于它导致的物质利益至少部分地具有解释性。这些数据所不能支持的观点是两国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妇女物质利益构造不同，能解释我们所研究的模式的不同。因此瑞典妇女中直接阶级关系比间接阶级关系更重要的原因，主要归于瑞典社会总的阶级构成中强化了工作场所阶级经验的重要性，而不是由于影响对直接和间接关系物质利益相对贡献的机制。

## 10.6 结 论

许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核心者主张，阶级结构是社会冲突和社会变化的基本决定性因素。为了维护并加深这种直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一个理论脉络之间被分裂了。第一个脉络是保持阶级结构概念尽可能简单，甚至接受了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简单两极分化的观点，接着又在分析中引进一些其他阐释性原理(如阶级或部门分化，工人和社区间的关系，国家或意识形态在形成阶级集体组织时的作用，等等)来弥补这样一个简单概念的不足。第二个脉络是逐渐增加阶级结构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希望这种复杂性能更有效地抓住处在阶级关系中的阐释性机制。这些可以选择的脉络基本上把不同的赌注放在了阶级结构概念本身应做多少阐释性工作这一问题上：前一方法采取了最小化立场，认为阶级结构至多决定了对行动和变化的广泛局限；后一方法采取了最大化立场，认为阶级结构是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潜在和系统的决定性因素。



我对阶级的研究采用的是后一方法。在我关于阶级结构的理论讨论中，我全神贯注于“中产阶级”问题，详细阐述了一个使得阶级结构中非无产阶级的雇主能有一个连贯的、系统的理论地位的阶级结构概念。这导致了对“阶级关系中相互矛盾的位置”概念的介绍，随后，导致了运用多角度的剥削观点重新规范了那个概念。

本章中，我尽力阐述了阶级结构问题中的另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因为人们不仅通过自己的职业和财产，而且还通过各种其他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结构联系。这里，首先是家庭里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一种重要的途径，使得人们间接地与阶级结构相联系。由于家庭是消费的单位，因此行动者的阶级利益部分地从家庭成员控制的总物资资源中取得，而不仅是从成员自己所控制的物资资源中得到。所以，家庭里的社会关系成为我所说的“间接阶级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性来源。

把这种复杂性加入到阶级分析中要冒风险，即阶级结构的概念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马克思理论著作里所包含的简单、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形象有很强的说服力，概念上也清楚易懂。一个阶级结构的概念如果假设了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的复杂结合和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也许最终会增添更多的混淆，而不是分析力。

但是，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些值得详细阐述的理论。特别是，直接/间接这对阶级关系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性别关系分析联系起来的一个特殊方法，而没有把后者简单地归入前者。当阶级结构的概念完全围绕直接阶级位置而建立时，似乎有理由认为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彼此有严格的外在联系。性别关系能有助于解释人们如何被分成不同的阶级位置，它甚至还对阶级位置的全面分配有特定影响(即特定性别模式能决定

某种劳动力的使用，因而能进一步潜在地解释某种阶级位置)，但这两种关系——性别和阶级——并未结合成一个有内部联系的系统。<sup>22</sup>

当间接阶级关系加入阶级结构分析中时，外部关系严格双重化就不能令人满意。性别机制并不仅仅把人们按间接阶级位置来分类，这些位置的特性是在独立于性别的情况下定义的。反之是性别关系也对间接阶级关系本身起了构成作用。这种间接阶级关系通过家庭就自然而产生了，因为夫妻间的性别关系正是他们各自间接阶级位置的基础。所以，间接阶级关系的概念有可能改变对于阶级和性别的观点，即认为这两种关系完全是区别的、分离的结构。但它也没有改变成认为阶级和性别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无差别的系统程度。间接阶级关系因而能够为概念化阶级和性别互动的形式，同时在不忽略这些区别本身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基础。

本章以提出有关“跨阶级”家庭里夫妻双方的阶级位置问题开始。本章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都表明，这个问题需要用稍微不同的方法来重新表述。我们不问“X这个人属于哪个阶级的？”而是应该问“处于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网络之中的X这个人的位置在哪里？”虽然这个问题有些啰嗦，但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复杂性的一个关键维度的认同。

## 方法附录

### 变 量

阶级位置。由于样本规模有限，也由于用于度量配偶的直接阶级数据不够详尽，在本章大部分分析里，我们不得不把阶

级分类中的类别分解到更广的群体中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两个对更为细微差异分类的重要偏离。第一，有必要把所有的自我雇佣者合并成一个单一类别，从而忽略小资产者和小资本家之间的区别。由于这个合并类别里大部分人或者严格地是不雇佣挣工资工人的小资产者，或者是雇佣少于5名工人的雇主，我通常在讨论里把这一类叫做“小资产阶级”。第二，挣工资者中“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这一类可以合到单一的、甚至是相当异质的“中产阶级”中去。分析因而围绕三个基本的阶级类别(见赖特, 1985: 表6.13: 226, 详细了解本分析的运作细节):

小资产阶级 = 所有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 所有挣工资者，拥有管理或监督权的职位，或从事专业、管理及技术工作

工人阶级 = 所有处于专业、管理及技术工作之外的非监督职位上的挣工资者

阶级认同。贯穿整个分析，我们把工人阶级主观认同作为因变量。所有受访者都被问道，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阶级。如果他们回答“是”，就会要求指出是哪一个阶级；如果回答“不”，就会被问道，如果要做出选择，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层中产阶级。现有分析中所有工人阶级回答被综合起来形成简单的两分：1=工人阶级认同；0=其他。阶级认同变量只适用于受访问者，不适用于他们的配偶。

妻子的经济贡献。配偶处于劳动力之中的受访问者被要求估计他们配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对女性受访问者来说，这就是丈夫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对男性受调查者来说，这就是妻子收入所占比例。从100减去女性受访问者提供的数字，这个变量就可理解成为妻子的经济贡献变量。

## 作为经验策略基础的假设

任何经验调查都要事先规定一套关于概念量度的前提，而概念并未直接服从研究中的经验检验。因为有些前提会影响数据分析和解释，所以需要把它们表述得尽可能清楚。

1. 阶级位置中的正式标准对男女都一样。在整个分析中，我们使用了相同的正式标准——权力位置，职业资格，财产所有权——来界定和操作男女职业的阶级位置。这可能会造成问题。例如，如果权力等级中同样正式职位极端地授予男女不同的权力，或者同样职业资格赋予“技能开发”的不同潜力，那么对男女就应当使用不同的正式标准。所以，总有可能的情况是，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对男女阶级认同的似乎不同的影响可能仅仅是阶级度量特定性别问题的结果。

2. 对关于阶级认同的直接问题的回答是衡量阶级认同的恰当方法。度量主观性的任何方面都需要提出熟悉的、符合研究方法要求的问题。这里无需重复运用态度调查作为度量阶级认同工具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分析的前提不在于我们的度量有无偏差，而在于度量阶级认同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与男女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的相对重要并无系统的联系。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那么即使我们不能肯定所研究的工人阶级认同的实际程度，我们还是有理由确信带有其他变量的工人阶级认同的联系模式。

3. 工人阶级认同在瑞典和美国含义基本一样。比较研究里度量主观性维度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大大增多了。如果“工人阶级”一词在两个国家内意思大不一样，那么任何跟“自变量”有关的不同模式都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可操作因变量实际只表现了主观性的不同侧面。例如，假设“工人阶级”这个

词在一个国家指“手工劳动者”，而另一国指“非监督性劳动者”，在第三国又指“努力工作的人”(跟“社会寄生虫”相对)。可以想象，这三个国家里不同职业的客观特征都能预测“工人阶级认同”，这仅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用法不同。的确，这种语言学上的差异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学影响，它们自己可能会与不同历史模式的阶级斗争有密切联系，但文化意义上的这些差异不能与同类别的主观阶级认同的因果结构的不同而混为一谈。

4.形成阶级位置中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的相对特性反映了它们各自与主观阶级认同的联系。我们把阶级位置(直接和间接)和主观阶级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标准，来评价关于直接和间接阶级关系相对重要的论点。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即当直接阶级位置比间接阶级关系更重要时，它跟主观阶级认同的联系也就更密切。如果这个前提不正确，或者它只适用于一国或一种性别而不能用于另一国另一性别，那么我们从前提中得出的结论也不正确。质疑这个假设的原因之一是阶级本身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就很不一样。性别也许不仅决定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相对重要性；它也决定使得这些位置具备因果特征的东西。所以，对男性和女性应用同一个指标，会歪曲对结果的解释。

我们不可能系统地谈到本章数据分析里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偏差和歪曲。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严重削弱我费尽力气对结果所做的解释。但是，要记住，一个度量上的偏差本身并不能内在否定一整套结果的价值，因为偏差能随意地得出一个支持某一特定假设的结果。例如，以上假设(1)所说明的度量阶级位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符合阶级(如度量的)对女性的阐释力比对男性的小这个看法，而且在美国和瑞典性别模式的特殊差异问题上，也是一致的。简单指出度量偏差并不足以质疑对结

果模式进行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所以，怀疑的责任就是要表明某一具体度量偏差是如何实际影响了所观察到的模式，从而使它们成为错误的。

## 第十一章

### 阶级对家务劳动性别化分工的有限影响

本章的中心目标是系统地探讨在阶级结构中家庭所处的位置和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之间的经验性联系。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起性别的阶级分析家们，尤其是那些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都把家务劳动作为分析的中心。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论证，阶级术语里所分析的生产系统和性别术语里所分析的家务劳动分工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理解性别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我再现(或者甚至被生产出来)的社会过程的核心。有时这些论证采用了相当简化的形式，特别是当家庭里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工作被资本主义积累的功能性需要所解释时，它的论证就更简单了。<sup>1</sup>另外一些情况下，论证就不那么简化了，它强调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协商性别关系时，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功能联系时，他们的策略所受到的阶级性别限制的本质。<sup>2</sup>其他一些分析则认为，有可能在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逻辑和父权制男性统治的逻辑之间存在着系统矛盾。<sup>3</sup>所有这些分析不管理论上有何差异，家务劳动在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之间的作用都是中心问题。

有了这些理论论述，也许可以设想有相当多的研究探讨家

务劳动分工和阶级之间的经验关系。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虽然有一些历史的和定性的个案探讨家务劳动分工问题，其中一些还试着研究这些模式中的阶级变量，但是几乎没有试着研究以系统量化方法探讨家务劳动分工里的阶级和性别关系问题。<sup>4</sup>

一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研究。对家务问题采取量化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者没有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阶级分析或对话。阶级至多是许多变量中的一个以职业的形式进入分析中，而不是调查的中心焦点。<sup>5</sup> 主要关注阶级及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通常在抽象的宏观结构分析层面上提出作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关系的阶级和性别问题。这极易忽略更多潜在的微观层面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跟阶级位置和性别关系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女性主义经常进行具体的微观过程的调查，却往往不重视阶级。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对量化研究抱有敌意。

本章的基本目的则是从经验上探讨阶级和家务劳动性别化分工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会更为具体地研究双收入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比例如何在不同阶级构成的家庭之间而不同。我们不想建立一个有关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多变量综合解释模型。我们解释的目的并不是严格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本身，而是阶级和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之间的关系。虽然阶级及其对家务劳动的影响这个问题适合放在这样一个综合模型中去研究，但是我们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没有为这一目的所需要的一些关键变量。无论如何，在考虑阶级如何与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的其他决定因素发生复杂的多变量联系前，尽可能系统地确立阶级影响本身便很重要。这就是当前分析的任务。



## 11.1 理论设想

与第十章一样，因为关于配偶所处阶级的数据有限，也因为样本规格有限，本章经验调查依靠一个把阶级区分为3类的概念：自我雇佣者（包括雇主和小资产者）、“中产阶级”（在权力等级里拥有管理或监督职位的雇员，和/或者从事专业、管理、技术工作的雇员）和工人阶级（所有其他雇员）。这个概念上的简单三类别阶级变量可以组合出九种家庭—阶级位置。但不幸的是，又因为样本规模的相对较小，所以涉及自我雇佣者家庭—阶级位置的人数太少，以至于不能区分所有这5个类别。这样，凡涉及自我雇佣的家庭，我们都不区分丈夫还是妻子是自我雇佣者。最终的家庭—阶级分类在表11.1中列出。我们的经验性任务就是找出在各种家庭—阶级构成分类中不同的类别之间，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不平等是如何体现的。

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权主义，都没有对不同阶级构成中跨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变异提出一套全面的理论，但是他们有时会针对这种关系的某些宽泛假说进行阶级分析和女权主义研究，提出一些一般的设想。我们将在下面讨论5种这类假说。

### 无产阶级化和性别平等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劳动性别分工的最著名讨论见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1968[1884]）。恩格斯认为家庭里男性居支配位置根源于男性对私有财产的控制。这种联系的关键是男人保证财产由自己孩子继承的愿望。为实现这一个愿望，男性需要控制女性的生育。他

表 11.1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妻子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1	2	3
	中产阶级	2	4	5
	工人阶级	3	6	7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中的分类:

- 1 = 纯粹自我雇佣者家庭
- 2 = 自我雇佣 + 中产阶级
- 3 = 自我雇佣 + 工人阶级
- 4 = 纯粹中产阶级家庭
- 5 = 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 6 = 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 7 = 纯粹工人阶级家庭

们通过控制财产而拥有权力和地位，在这种条件下，男性能把愿望变成现实。恩格斯认为，整个男性支配的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推理的基础上，恩格斯认为，在没有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家庭里，男性支配位置会削弱：

这里没有一点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性支配位置正是由此建立并继承下来。所以，这里没有任何刺激确立男性支配位置的制度……除此之外，大规模工业把妇女从家庭转移到了劳动市场和工厂中，常常使得她们也能成为

养家糊口的人，无产阶级家庭里最后余留的男性支配地位也失去了所有基础……（恩格斯，1968[1891]：508）

恩格斯的推理导致了两个基本假说：

假说1. 工人阶级平等论。家庭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越多的家务劳动就有可能在夫妻之间平等分配。所以，同质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分配家务劳动上最平等。

假说2. 小资产阶级不平等论。以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家庭会在家务劳动分工上更加不平等。因此，同质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分配家务劳动上最不平等。

### 性别歧视和阶级文化

大众文化所创造的持久形象之一就是中产阶级丈夫戴着围裙在厨房里帮忙，与此对比的是工人阶级丈夫在修理汽车或跟朋友在酒吧里喝酒。有很多可以解释这种对比形象的可能方法。手工劳动要求身体强壮和男性团结一致这个前提构成了工人阶级中被夸大的男子汉认同的物质基础。与梅尔文·科恩(1969)对工作和价值之间关系的论述一致，中产阶级职业的较高认知复杂性会鼓励在性别角色上采取更灵活、更开放的态度。不管是哪种具体方法，这种形象都会导致一种对阶级和性别劳动分工的特定预言：

假说3. 阶级文化。工人阶级男性通常比中产阶级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比例要小得多。所以，同质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家务劳动分配上最不平等，而同质的中产阶级家庭是最平等的。

## 家庭中的阶级和权力

社会学中关于性别的一个论题是家庭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的问题。特别是在性别角色受到质疑的时代，家务劳动分工不能简单视为高度社会化的男性和女性所追随戏剧样本的结果。相反地，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程度应至少部分地视为一个充满争议、冲突和讨价还价的过程的结果。

夫妻的阶级位置以两种方式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家庭权力。第一，跟任何讨价还价情况一样，人们带给家庭讨价还价的资源影响了他们的相对权力。这种情况下，男女阶级不平等可以认为是家庭中权力的差异。妻子在经济上越依赖丈夫，她在家里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弱，而性别劳动分工上就会越不平等。<sup>6</sup>这就说明，当妻子的阶级位置比丈夫的更优越时，家务劳动的分工就越平等。第二，与纯粹物资资源不同，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位置差异有可能发生作用(卡弗曼，1985)。如果妻子在劳动力中所占的地位比丈夫低，她们在家庭里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有可能比较弱。把以上两点合起来，就得到下面的假说：

假说4. 阶级讨价还价能力。在妻子比丈夫处于更优越的阶级位置的家庭里，妻子讨价还价的能力相对高些，因而其丈夫也可能会干更多的家务。中产阶级妻子和工人阶级丈夫组成的家庭有可能是最平等的。

## 性别关系的自主性

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关系的议题核心之一就是，

由于其他原因，性别关系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的自主性。一方面，这意味着性别是社会建构的、而不仅是生理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这又说明在这个发生建构的社会过程中，性别不可降为任何其他社会现象，尤其是归于阶级或经济现象。虽然阶级和性别之间可能存在着重要的不可因果互动，但是性别关系不仅仅是阶级或其他事物的作用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备某种真正的自主性。

性别自主性问题上相对重要的看法的涵义是认为男人所干的家务劳动量主要是由性别关系和性别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阶级这类因素决定的。这并不意味着阶级一点影响也没有，但是它的影响确实不大。这就引出了下面的假说：

假说5. 性别自主性。劳动性别分工中平等的程度在不同阶级构成的家庭之间变化不大。

## 11.2 结 果

与第十章一样，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探讨瑞典和美国的这个问题。<sup>7</sup>在经济不平等的普遍问题和性别不平等的具体问题上，瑞典和美国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相反的两个例子。瑞典政府花大量资金用于公共幼儿园、带薪父母假和其他影响家庭内劳动性别分工的项目。<sup>8</sup>所以，对两国家务劳动不平等的比较，可以使我们了解公共领域内的平等性反映在私人领域内更大的平等性的程度。

我们将分3个步骤提出结果。第一，我们将简要考察两国内家务劳动的总分配情况。这主要是提供以下分析的背景。第二，我们将检验丈夫在家务劳动表现方面的阶级变量总体模式。

最后，我们将检查，当分析中包括了其他各种变量时，这些模式是如何受影响的。我们还会特别关注方程中教育的影响，因为可以认为最初看上去的类似家务劳动中的阶级差异实际上可能是教育差异。

### 总体分布

表 11.2 列出了丈夫对家务劳动所贡献的比例的基本分布情况，这是根据美国和瑞典的男女受访者所报告的情况而制成的。这里有一些相关这些分布的特征值得注意。

首先，表 11.2 中分布的基本情况跟其他研究所报告的情况相类似。多数研究都表明，在夫妻都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里，男性做 20% 至 30% 的家务劳动。这近似于我们这里的研究发现。<sup>9</sup>

第二，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虽然男性受访者认为丈夫做的家务劳动一致比女性受访者所认为的要多，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瑞典，男女受访者所说的丈夫承担各种不同家务劳动活的排列顺序在美国是一样的，在瑞典几乎一样。就日常家务工作而言，两个国家中，丈夫干得最少的是洗衣服，干得最多的是食品购物。

第三，总的来说，双收入家庭中，瑞典丈夫普遍比美国丈夫做的家务劳动的比例大。<sup>10</sup>根据女性受访者对丈夫家务贡献的说法，除去看孩子这一项，瑞典男人在其他每一项里都比美国男人做的家务多。把这些家务劳动合到一起，双收入家庭里的瑞典男人大约平均做多于 25% 的家务劳动，而美国男人只做了大约 20%。

这可能低估了两国中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的实际差异，因为瑞典已婚职业妇女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比例大大高于美国。

表 11.2 在美国和瑞典, 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分布情况

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百分比	1	2	3	4	5	6	7	8
	日常清扫工作	做饭	饭后收拾	食品购物	洗衣服	全部日常家务劳动*	照顾孩子	全部家务劳动*
美国								
女性受访者的回答								
0%	43.7	46.1	44.0	42.3	68.9	19.8	5.1	12.1
1% ~ 10%	9.1	18.4	12.2	10.4	8.3	23.5	1.5	23.5
11% ~ 30%	17.6	14.2	13.2	10.0	7.0	37.4	32.3	42.5
31% ~ 49%	6.3	3.1	2.0	3.8	1.9	13.1	18.7	15.4
50% 或更多	23.2	18.2	28.5	33.6	13.9	6.2	42.4	6.5
平均值	20.8	17.0	21.7	24.7	11.3	18.9	37.8	20.5
加权值	276	279	273	278	276	281	133	281
男性受访者的回答								
0%	26.2	34.4	22.6	31.9	50.0	11.6	0.0	3.9
1% ~ 10%	12.3	21.5	18.0	12.3	10.3	17.8	2.1	21.7
11% ~ 30%	27.1	17.1	15.0	12.9	14.0	36.2	26.6	37.8
31% ~ 49%	6.6	4.9	10.3	4.6	3.8	24.4	23.9	26.8

续表

50%或更多	27.9	22.1	34.1	38.4	21.9	10.0	47.4	9.8
平均值	25.9	21.8	28.5	30.0	20.1	24.6	41.0	26.2
加权值	259	266	259	264	261	266	149	266
女性平均值 与男性平均 值的比率	0.80	0.78	0.76	0.82	0.56	0.76	0.92	0.78
瑞典								
女性受访者的回答								
0%	29.4	21.8	31.0	14.2	52.0	4.3	16.9	3.7
1%~10%	11.7	27.3	14.8	16.3	9.5	20.7	15.8	18.7
11%~30%	22.4	22.2	20.7	20.4	15.6	40.5	24.3	44.5
31%~49%	7.4	3.8	2.1	9.2	3.1	25.1	9.0	24.1
50%或更多	29.1	24.9	31.4	40.0	19.7	9.4	33.9	9.0
平均值	26.2	23.1	24.5	32.4	17.1	24.6	28.2	25.1
加权值	299	293	290	240	294	299	177	299



续表

男性受访者的回答										
0%	19.0	13.5	29.7	8.5	39.0	3.4	6.6	3.2		
1%~10%	15.8	27.4	14.8	11.3	23.3	14.9	22.3	13.2		
11%~30%	22.1	22.8	20.1	23.9	13.7	40.4	29.9	42.4		
31%~49%	7.2	6.9	5.5	8.9	4.4	29.2	9.5	30.7		
50%或更多	35.9	29.4	29.9	47.4	19.8	12.0	31.8	10.6		
平均值	30.5	27.6	25.7	37.4	19.1	28.2	30.8	28.5		
加权值	348	347	344	293	344	349	211	349		
女性平均值										
与男性平均值的比率	0.86	0.84	0.95	0.86	0.90	0.87	0.92	0.88		

a. “全部日常家务劳动”是从第1栏至第5栏的加权总和。加权情况是：日常清扫工作=0.27；做饭=0.32；饭后收拾=0.12；购物=0.14；洗衣服=0.15。

b. “全部家务劳动”对于家中没有16岁以下儿童的人来说就是“全部日常家务劳动”，而对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是第6栏和第7栏的加权总和。加权的情况是：日常家务劳动是0.84，照顾孩子是0.16。

我们的样本里,瑞典妻子每周工作的时间平均是30.9个小时,而美国妻子是39.9个小时。如果调整了劳动力有偿工作时间上的差别,那么两国之间在丈夫做家务方面的差别还要更大。对两国妻子有偿工作的时间对丈夫做家务比例的影响进行Tobit回归分析<sup>11</sup>得出了下列方程:

瑞典: 丈夫家务贡献 = 16.01 + 0.563[妻子的时间]

美国: 丈夫家务贡献 = 3.32 + 0.418[妻子的时间]

以这些方程为基础,在妻子每周工作40小时的双收入家庭里,美国丈夫可能会干20%的家务,与他相对的瑞典丈夫可能会干多于38%的家务。<sup>12</sup> 这些数据的确表明了两个国家内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均衡,而且也说明了美国家庭性别不平等的程度明显高于瑞典。<sup>13</sup>

### 不同阶级位置之间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不同

我们关于阶级和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分析中的因变量是表11.2第8栏中的变量“全部家务劳动”。关于这个变量构成的情况在本章的研究方法附录里有详细说明。这个指标对男女被访者都适用。我们将列出对所有被访者和女性被访者分别进行研究的结果。<sup>14</sup>

表11.3列出了不同阶级构成的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平均量。表11.4展示的是对表11.3进行Tobit回归分析的结果。在这些回归分析里,纯中产阶级家庭是省略的哑变量。方程中的系数因此是给定阶级位置的家庭和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异。<sup>15</sup>

在审查具体阶级差异之前,值得先看一下这些方程的总分析能力。正如表11.4所指的那样,与Tobit方程相应的OLS回

归分析里 $R^2$ 值在两个国家里都很低：美国女性受访者的方程中只有约0.02，而瑞典女性受访者那里则为0.04。这不仅是因为对因变量的测量不准的缘故，表11.5第二个方程里对应瑞典女性的 $R^2$ 值增加到0.28，对应美国女性的 $R^2$ 值增加到0.18。所以，表11.4中 $R^2$ 值低，说明了各家庭之间丈夫做家务的比例变化几乎不能够归因于两国中家庭的阶级构成不同。

阶级差异对总人口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阶级之间的某些反差还是很大的。让我们首先来看配偶双方都是雇员的家庭（表11.3中第4~7个家庭单位）。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结论：第一，瑞典较之美国，阶级位置之间的差异更大；第二，即使在瑞典，阶级差异也并不十分明显。根据女性受访者，在美国，4个雇员阶级位置的家庭之间，丈夫所做家务的比例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而在瑞典，纯中产阶级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雇员家庭（表11.3里，要高出5.0~7.6个百分点）。看一下表11.3里瑞典和美国的实际数字，两国的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纯中产阶级家庭里瑞典丈夫比美国丈夫所做的家务劳动大约高10个百分点（30.4%比21.0%），而美国和瑞典之间在三个其他雇员阶级位置的差别只有几个百分点。

转回到自我雇佣者这类家庭中来，我们发现尽管瑞典的阶级差异比美国的大，但两国都存在着重大的阶级差异。在夫妻双方一个是自我雇佣者而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美国家庭里，丈夫所做的家务劳动比其他家庭——阶级位置的都少（表11.3中这类家庭里丈夫只做大约13%的家务，而其他家庭里大约是21%）。根据整个样本得出的结论，纯自我雇佣者家庭里丈夫做的家务也比处在其他阶级位置的家庭里的丈夫要少得多。<sup>18</sup>在瑞典，两种阶级位置的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是自我雇佣者的家庭

表 11.3 根据不同家庭—阶级构成划分的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占全部家务劳动的平均比例程度(仅限双收入家庭)

## 全部受访者

美国(N=537)

瑞典(N=641)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1] 17.1	[2] 22.8	[3] 16.1
[2] 22.8	[4] 23.9	[5] 25.5
[3] 16.1	[6] 22.3	[7] 27.1

自我雇佣者  
妻子的职业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1] 16.0	[2] 25.1	[3] 19.6
[2] 25.1	[4] 32.4	[5] 27.8
[3] 19.6	[6] 25.1	[7] 28.1

自我雇佣者  
妻子的职业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女性受访者

美国(N=267)

瑞典(N=297)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妻子的职业 阶级	自我雇佣者	[1] 19.8	[2] 22.4	[3] 13.1	
	中产阶级	[2] 22.5	[4] 21.0	[5] 20.0	
	工人阶级	[3] 13.1	[6] 21.3	[7] 22.1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妻子的职业 阶级	自我雇佣者	[1] 17.9	[2] 22.8	[3] 19.3	
	中产阶级	[2] 22.8	[4] 30.4	[5] 22.9	
	工人阶级	[3] 19.3	[6] 24.3	[7] 25.4	

a. “全部家务劳动”（对于有1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来说）是五项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加权平均值，而对家中无儿童的家庭来说仅是五项家务劳动的加权平均值，加权情况已在表11.2中列出。

b. 中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表11.1中所列出的类别。

表 11.4 家庭—阶级构成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

	男性和女性受 访者(p) <sup>a</sup>	女性受访者
美国		
阶级类别 <sup>b</sup>		
1.自我雇佣者家庭	-7.5(0.03)	-2.4(0.60)
2.自我雇佣者 + 中产阶级	-1.4(0.69)	1.1(0.83)
3.自我雇佣者 + 工人阶级	-8.7(0.02)	-9.9(0.04)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1.0(0.75)	-1.8(0.68)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2.0(0.48)	-0.6(0.89)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3.6 <sup>c</sup> (0.17)	1.8(0.62)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03	0.02
样本数	537	267
瑞典		
阶级类别		
1.自我雇佣者家庭	-17.9(0.00)	-13.8(0.01)
2.自我雇佣者 + 中产阶级	-8.3(0.02)	-8.9(0.11)
3.自我雇佣者 + 工人阶级	-13.3(0.00)	-11.0(0.02)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4.8(0.09)	-7.7(0.05)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7.4(0.00)	-6.2(0.04)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4.4(0.03)	-5.1(0.07)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06	0.04
样本数	641	297

a.(P)是对 Tobit 系数进行 t 检验时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b.纯中产阶级家庭被排除在外。因此所有的系数都是某一家庭阶级与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异。

c.在第 7 类纯工人阶级家庭和第 6 类工人阶级妻子和中产阶级丈夫的家庭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p < 0.03$ ),这一差异在全体受访者中很明显,而在女性受访者中不那么明显。

表 11.5 家庭—阶级构成和所选其他变量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

	美国 女性受访者(p) <sup>a</sup>	瑞典 女性受访者(p)
阶级类别 <sup>b</sup>		
1.自我雇佣者家庭	-1.4(0.77)	-9.5(0.10)
2.自我雇佣者 + 中产阶级	0.9(0.86)	-7.7(0.17)
3.自我雇佣者 + 工人阶级	-8.9(0.06)	-7.5(.014)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0.6(0.89)	-5.0(0.22)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0.3(0.93)	-2.9(0.39)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2.5(0.52)	-0.8(0.82)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	1.0(0.40)	1.8(0.03)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03	0.06
样本数	267	297
阶级类别		
1.自我雇佣者家庭	0.5(0.91)	-10.5(0.04)
2.自我雇佣者 + 中产阶级	1.7(0.71)	-8.8(0.08)
3.自我雇佣者 + 工人阶级	-1.4(0.77)	-5.0(0.29)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3.3(0.46)	-5.9(0.11)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0.8(0.83)	-2.4(0.42)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4.3(0.26)	-2.6(0.41)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	-0.2(0.86)	0.5(0.55)
受访者的有酬工作时间	0.4(0.00)	0.4(0.00)
妻子的经济贡献	0.5(0.78)	3.7(0.002)
全部家庭收入(\$ × 10 <sup>4</sup> )	0.5(0.51)	0.8(0.28)
受访者的性别观念	1.2(0.06)	0.9(0.09)
年龄	-0.3(0.03)	-0.2(0.02)
家中有 16 岁以下儿童(0-1)	-1.4(0.57)	-4.5(0.02)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18	0.28
样本数	267	297

a.(p)为对 Tobit 系数进行 t 检验时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b.纯中产阶级家庭被排除在分类之外。因此所有系数是某一家庭阶级与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异。

和一方是自我雇佣者、另一方是工人的家庭)的妇女都认为她们丈夫所做的家务比其他阶级位置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都要少——比纯中产阶级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少了2/3。所以,这两个国家里,似乎在被认为是传统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存在着更传统的父权制形式。

### 多变量方程

表 11.5 表明了控制其他变量时阶级影响的 Tobit 方程。第一组方程里只加入了教育,第二组方程里加入了家务劳动分析中通常表示的其他变量。因为许多变量只能在个人(而不是在家庭单位)的分析层次上进行测量,所以我们没有在这些结果中加入男女混合样本的回归分析。

方程中包含着教育变量有其重要的分析目的。在阶级结构的大多数概念中,教育水平在各阶级之间发生系统的变化。按照我们采取的概念方法,教育与构成阶级关系的三个基础中的一个——技能的拥有——有密切联系。所以,最初看上去类似丈夫做家务方面存在的阶级差异可能严格地讲是教育差异本身的作用,反映了教育程度的文化影响而不是与控制教育资产有关的阶级影响。这里的问题是“教育”这一分类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机制——一个是与劳动市场和工作关系有关的阶级剥削机制,另一个是文化认知机制。这两个因果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把妻子的教育程度跟丈夫所做家务联系起来。这种可能性与美国的结果不怎么相关,因为阶级影响在那里并不是最重要的,但这跟瑞典的研究很相关,因为表 11.4 中,纯中产阶级家庭里的丈夫的确比其他阶级位置家庭里的丈夫做的家务更多。

正如表 11.5 表明的一样,当教育加入方程中时,瑞典纯中



产阶级家庭和其他家庭之间的差异就大大地减少了。只有一项对比还保留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不过，它在显著水平上也只处于0.10这样的边缘水平），这就是中产阶级和纯自我雇佣家庭之间的对比。雇员家庭里这些差异都没有什么统计学上的意义。其实，对这些比较之一——纯中产阶级家庭跟纯工人阶级家庭比较——来说，不同家庭里丈夫所做家务的绝对值从5.1降到0.8。这两类家庭一阶级位置之间的初始差别基本上与两个阶级中妻子教育水平的差别有关。

该如何解释教育的影响呢？这能否解释为跟阶级剥削有关？表11.6表明，当表11.5第一组方程里加入其他变量时，教育系数的值所发生的变化。这张表指出，可能潜伏在教育影响背后的因素是年龄：当年龄包含进方程中时，教育系数便分成两半，它的统计学显著水平也从0.03降到0.29。不管想如何解释年龄自身的影响，年龄对教育系数的影响都表明，教育影响本身不能合理地被认为是阶级影响的间接形式。<sup>17</sup>

表11.5的第二组提出了更复杂的多变量方程。因为我们的兴趣主要是在阶级影响本身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们不会详细考

表11.6 控制其他变量时教育对丈夫所做家务劳动影响的  
Tobit 回归系数(仅限于瑞典女性)

	教育系数(p) <sup>a</sup>	加入控制变量的系数(p)
教育 + 阶级虚拟变量	1.79(0.03)	
教育 + 阶级 + 年龄	0.89(0.29)	-0.30(0.001)
教育 + 阶级 + 观念	1.35(0.10)	1.49(0.010)
教育 + 阶级 + 妻子的经济贡献	1.33(0.09)	6.24(0.000)
教育 + 阶级 + 妻子的工作时间	1.76(0.02)	0.58(0.000)
教育 + 阶级 + 家中有16岁以下儿童	1.78(0.03)	-7.00(0.001)

a.(p)是对Tobit系数进行t检验时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察这些方程里的系数。但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瑞典而不是在美国，自我雇佣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最初两个类别之间的对比在比较复杂的多变量方程中比在只包括阶级和教育的方程中显得更鲜明，而在美国多变量方程中则绝对没有任何重要的阶级对比。

第二，在两个国家里家庭总收入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在瑞典有很大影响(而美国就没有)。<sup>18</sup>这说明，虽然在瑞典直接阶级对男性做家务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妻子在家里的经济位置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三，促使表11.5的两国第一组和最后组之间 $R^2$ 值增加的最大的单一因素是妻子每周有偿工作的时间。在瑞典，单单这个变量的 $R^2$ 值是0.14，在美国是0.07。这与其他许多研究的结论一致，都表明是由于时间不足，随着妇女增加了她们劳动力的参与时间，就会少做家务，这样一来，家务劳动时间上的不平等就能缩小。这个结果也跟这种说法相一致，即妇女有偿工作时间越长，在家庭内部讨价还价中她们就越能使丈夫干更多家务。<sup>19</sup>

最后，两个国家里，妻子的性别观念都有一定作用。可以想到，在对男性受访者平行方程中（见研究方法附录里附录表11.5），性别观念系数影响会更大。在美国这一系数尤其大。<sup>20</sup>因为年龄变量（被认为是度量文化—历史同龄人）也有可能部分地把性别关系中的文化维度排除掉，所以这些数据都表明，性别观念在家庭之间以影响家庭性别实践的方式有所不同。

### 11.3 含 义

总之，这些结论的基本含义就是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并不是

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十分强有力或决定性因素。这跟假说5性别自主性假说的观点高度一致。这确实不是我开始分析时就设想过的情况。实际上，作为我的阶级分析总议程的一部分，我最初一直努力证明阶级是性别实践里变量阐释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当我开始接触这类边缘阶级影响时，我试过很多方法使阶级变量的细节可操作，并使阶级差异可集中。我分别研究丈夫和妻子的阶级，而不是简单地研究家庭—阶级构成。我改变样本的范围，把它限制在有两个全职工人的双收入家庭，或者是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双收入家庭。我甚至研究了阶级跟家务劳动分工的末端——高度平等的家庭和不平等的家庭之间的对比——而不是所有分工之间联系的可能性。这些数据操作都没能改变结果的基本内容：在影响丈夫所做的家务劳动方面，阶级位置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阶级跟任何分析都无关。至少在瑞典，即使控制了表11.5中变量的范围之后，至少拥有私有财产家庭(特别是纯自我雇佣家庭)里的丈夫比雇员家庭里的丈夫所做的家务劳动要少得多。这种差异在我们对男性受访者进行的单独研究(见附录表11.5)中也同样存在。因此，这些结果部分地支持了恩格斯关于财产所有权和男性支配地位的经典论述。虽然这种特定阶级影响看上去很有力，但它并不是家庭里性别关系变量产生和协商的过程的中心。无论如何，在美国的数据中，不存在对家务劳动一致的、重大的阶级影响。所以，总的来说，这些数据并不能支持假说1、3和4——关于工人阶级平等的论点、阶级文化论点和阶级讨价还价能力论点，至多能在瑞典有限地支持假说2，即小资产阶级不平等论点。

阶级分析坚定的维护者可能会对这些结果有一些异议。首先，我们把分析限于双收入家庭。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阶

级首先在家庭关于妻子的劳动力参与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而且正如所有研究都表明的那样，这又当然影响了丈夫所做家务的相对量（不是绝对量）。但是这种异议几乎得不到经验上的支持。无论在美国还是在瑞典，妻子劳动力参与率并未因丈夫的阶级位置而有变动（见表11.7）。而且，当妻子也工作时，所有阶级位置里的丈夫做家务的比例也就高一些。但是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双收入家庭和单收入家庭里跨阶级的变量模式本身变化并不大。<sup>21</sup>

对阶级分析更有可能成功的辩护是，把焦点从家庭里变量的问题转到了更制度化的问题上，即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性别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中家务劳动平等的程度作为一个整体部分地依赖于减少或增加整体经济不平等的

表 11.7 由丈夫的阶级所决定的妻子劳动力参与率和丈夫对家务劳动的贡献

丈夫的阶级位置	妻子劳动力参与率	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百分比	
		有经济收入的妻子	无经济收入的妻子
美国			
资产阶级	54.3	20.1	17.0
小资产阶级	55.8	16.9	13.0
中产阶级	51.6	25.2	19.8
工人阶级	50.4	30.8	21.7
样本数		266	247
瑞典			
资产阶级	78.6	18.2	13.3
小资产阶级	86.0	19.0	10.6
中产阶级	83.4	29.6	20.0
工人阶级	74.6	31.3	25.7
样本数		348	89

阶级政治过程。瑞典家庭中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更高程度与瑞典社会民主和工人运动联合影响下造成的较高级别的社会平等合理地联系在一起。

我并不想贬低瑞典福利制度形成中阶级政治的重要性，但是，把瑞典的性别政策完全归因于政治阶级形成的逻辑，也有问题。瑞典的社会民主不仅产生了一种由工人阶级进步政治所驱动的无形的经济平等主义，而且也支持了起源于女性政治参与中的性别平等的具体议程。摩恩(1989)指出，尤其是在70年代，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地改变了工作、性别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1971年起对丈夫和妻子强制征收单独收入税（这确立了每对夫妇经济各自独立的原则）；1974年实行父母假，使父母有权分享孩子出生后的带薪产假；1978年带薪产假延长到270天，1980年又增至360天；1989年，法律授权婴儿的父母每天工作六小时，这就鼓励了缩短工作周数创造机会。此外，正如哈斯(1981:958)所报告的，瑞典教育中文化政策的特定目标就是鼓励在看孩子问题上，更广一点说，也包括家庭杂务问题上，建立性别平等。瑞典家庭里性别较为平等，有可能对特定家务劳动政策和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正如其对瑞典社会中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比较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一样。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政策的确有助于维持便于执行这些政策的一套政治和社会价值；但这种政策本身不可能从根本上用阶级术语加以阐释。

阶级理论家对这个研究最后的异议是把问题从家庭—阶级位置和性别之间的关系转到了阶级结构本身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上。分析的焦点不是询问家庭里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如何在阶级结构里的不同位置间变动的，而是询问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如何在不同阶级结构里变动。这种调查或者是在产生模式的分析层

次上,包括比较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与各类非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或者是在更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包括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阶级生产体系,它的主要动力肯定有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参与工作的变化形式和程度给予最重要的阐释,这些变化中的工作参与形式又进一步成为改变家庭内性别关系(反映在丈夫所做家务劳动的变化上)的重要结构基础。所以,即使在给定的阶级结构的不同位置中性别关系没有系统地变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发展进程也可以解释性别关系中许多轨迹的变化。但是现在,这些论证都还只是值得推测的假说。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或修正这些说法。

这把我们置于何处呢?女权主义者长久以来在解释男性支配位置的产生和再生产时,认为性别机制具有自主性。虽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承认这种自主性,但马克思主义还倾向于把阶级看成对这种自主性的性别机制操作有系统的影响。本章数据分析表明,至少在微观分析不同家庭中家务劳动性别关系的变量方面,并不能证明阶级起到了全面作用这一观点。阶级影响极弱——实际在美国并不存在,在瑞典主要限于自我雇佣的影响。虽然经济因素确实似乎与此相关——妻子工作的时间是家务劳动变量里一个相对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至少瑞典如此)——这些经济因素并不与阶级本身有密切的关系。

## 方法附录

### 变 量

####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既有质的也有量的方面。就质的方面来说，这个概念上包括了不同种类工作和责任在夫妻之间的分配；就量的方面来说，这个概念包括了相对其他活动（包括休闲）每一配偶干家务的时间量。所有相关研究都表明，大多数家庭里男人所做的家务不仅跟妻子的不同，而且他们干家务的总时间也大大少于妻子。<sup>22</sup>虽然这两个维度都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但本章我们主要关注家务劳动分工的量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对家务劳动的时间贡献上性别不平等程度是否在阶级结构的不同位置家庭之间有变化。

完全度量家务劳动分工是件费力的事。最详细的研究涉及了复杂的时间安排综合日记簿，其中家庭成员详细地在上面认真记下一段特定时间内他们开始和结束每项活动的时间。<sup>23</sup>我们则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数据。调查中，每一名受访者都要求估计一下，一张日常家务劳动列表里每一项工作中，他们自己工作所占的百分比和他们配偶工作所占的百分比。这张表里列出了五项工作：日常清扫房屋、做饭、饭后收拾桌子及洗碗等、食品购物和洗衣服。有1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还会包括看孩子这一项。夫妻每一方在这些工作中所占的百分比都合入到两个家务劳动综合量表中去：

1. 简单添加量表(未加权的成分平均值)；

2. 加权量表,其中按照这些工作一般所用的相对时间量(已有的时间安排研究为基础的)对成分进行加权。

这个量表起初主要是为日常家务劳动构建的。对有孩子的父母,量表里又加入看孩子这一项,以形成一个全面家务劳动贡献量表,称为“全部家务劳动贡献”。这些量表的结果差异已证明并没有主要差异,所以贯穿于本章分析局限于全部家务劳动分配加权量表。用于构成这一量表的加权如下:<sup>24</sup>

日常家务劳动量表 = 0.32[做饭] + 0.12[饭后收拾] + 0.15[洗衣服] + 0.27[日常清扫房屋] + 0.14[购物]

全部家务劳动量表 = 0.84[日常家务劳动] + 0.16[看孩子]

所以,结果变量是对受访者所做全部家务劳动的百分比(从0到100)的量度。对于家里有16岁以下儿童的人来说,还包括看孩子这一项;没有孩子的家庭则无此项。为便于数据分析,我把这个量表转变为丈夫所做家务变量。<sup>25</sup>所以,50左右的数字都意味着,夫妻所做家务大体上相等。

需要注意,家务劳动贡献中的相对平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取得:或者男人做更多的家务,或者女人做更少的家务。其他研究表明,当女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中就业时,丈夫做家务的绝对时间量至多会有一定增长,而妻子会大幅度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总量。<sup>26</sup>夫妻所做的家务劳动会减少,他们所做的家务更为集中。结果就是家务劳动贡献中的不平等减轻,但最主要的不是由于丈夫做了更多的家务。<sup>27</sup>我们现有的研究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我们的分析完全关注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分工上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而不是实际做的家务劳动总量。



### 家务劳动度量中的偏差问题

强调我们对丈夫所做家务的度量是完全以主观估计为基础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没有任何独立的方法能检验受访者所说话的可信度。所以，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些估计里存在着偏差。特别是，有人会预料男人会夸大他所做家务劳动的相对量。这种推测得到以下事实的证实，样本里妻子所报告的有关丈夫在量表中每一项家务劳动（并且因此对综合量表本身而言）里所做的工作的平均值都明显比丈夫自己说的平均值要低得多（见表 11.2）。这在美国的数据里尤为明显，美国妇女认为她们丈夫所做的家务只有男人自己报告的 75%，而在瑞典，妇女的说法接近男人说法的 90%。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不同阶级位置之间丈夫所做家务的变化，由于没有对家庭内性别不平等绝对程度的估计，所以一旦这些偏差跟阶级发生了密切联系，那么它们就能削弱数据的有用性。不幸的是，有迹象表明这可能是事实。如果在度量家务劳动时性别偏差跟阶级无关，那么家庭—阶级矩阵的每一单元之间丈夫所做家务的差异模式就应该与根据妻子和丈夫分别报告的数据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说，这样的分析中所有变量都是由家庭层次的数据而来：家庭的阶级构成和总家务中丈夫所做家务的比例。考虑到我们把样本限制在双收入家庭中，所以，没有实质性原因能解释根据男性和女性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不同家庭—阶级分类之间差异模式为什么与表中的模式会有不同这个问题。

但是差异模式确实不同。举一个例子，瑞典纯中产阶级家庭里妇女所报告的丈夫所做的家务平均量是 30.4%，而同一种家

庭里男性所说的平均量是 33.9%。这些估计相差不大。另一方面，在丈夫有一份工人阶级职业而妻子有一份中产阶级职业的家庭里，两种报告分歧很大：女性受访者报告是 22.9%，而男性受访者则报告是 32.6%。所以，这些跨家庭—阶级位置的家庭之间，女性受访者所报告的差异是 7.5%，而男性的差异只是 1.3%。根据男性受访者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家庭—阶级构成没有什么影响，而按女性受访者的说法，我们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不管度量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都说明，男性不仅过高估计了他们所做家务的数量，而且这种过高估计在不同阶级之间有变动，这样一来就潜在妨碍了我们对家务劳动进行阶级分析的努力。

在这类情况下该怎么办呢？<sup>28</sup>有两个可行策略。第一个分析办法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说法都有偏差，但是方向不同。每一方配偶都过高估计了他或她自己的贡献，而我们的数据是比例，这就意味着他们过低估计了配偶的工作。这样一来，对家务劳动最准确的度量可能来自于把男性和女性分别提供的数据合在一起进行单一分析。这要求在双收入家庭里全部受访者样本中，分析阶级位置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忽略受访者的性别因素。第二个办法认为女性的说法更准确，因为她们对家务劳动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因为较之丈夫，她们所做的家务经常不被看到，这样就更可能为她们的配偶所忽略。如果接受这个假设，那么只采用女性的数据就更有意义。在这两个策略中，单独分析男性受访者的报告都没什么价值。

所以，在 11.2 节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几乎完全只关注来自女性受访者的数据，其次才关注全部样本的结果。怀疑这种方法公正性的读者会对这些数据里的偏差有异议，针对这些读者，本附录末尾列出了单独对男性受访者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

在家务劳动数据里还有另一个相关的偏差。分析中所列的家务劳动完全是由典型的传统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工作的那部分构成的。我没有包括典型的男性工作，如修理房屋、整理草坪等等。如果家庭里这种认为是男性的工作占了很多时间，那么可以想象，我们的量表不能准确度量出这种家庭里家务劳动总时间上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但是，除非这个度量问题跟阶级密切相关，否则它不会损坏本章的目标。无论如何，所有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有关家务劳动的研究，都说明较之女性家务劳动，认为男性应该做的家务劳动日常化程度比较低，它所占家务劳动总时间的比例也小于女性家务劳动。

### 其他变量

分析里还包括其他变量。有三个描述了家庭的特点：家庭年总收入，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家中有无16岁以下儿童。其余描述了受访者的特点：受访者工作时间，受访者性别观念，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年龄。这些变量中有的需要解释一下：

妻子收入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对被访者要求估计其配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他们的回答转换成“妻子的收入百分比”变量，这个变量对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含义是一样的。

性别观念。我根据关于性别观念的4个里克特(Likert)型(同意/不同意)问题构建了一个性别—观念类型：

- 1.如果丈夫出外挣钱，是主要的养家者，妻子主要负责家务和孩子，那么对这一家庭来说比较合适。
- 2.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那么他们应当平分担家务劳动和

看孩子的工作。

3.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没有足够的妇女位于负责人职位。

4.理想的是,在政府和企业的主要职位上,女人和男人应该一样多。

第1项和第2项先合成一个变量,测试对家务劳动分工性别歧视的态度(家庭—性别态度量表),第3项和第4项合成一个变量,测试对性别和公共权威的态度(性别—权威态度量表)。每一个构建的变量都有三个值:1=性别歧视的回答类型,2=混合回答的类型,3=平等回答的类型。附录表11.1里列出了每一个间接构建变量的编码计划。这两个间接变量接着又合成一

附录表 11.1 构建家庭—性别态度变量和权力—性别态度变量

1.性别—家庭态度

		第2项		
		性别歧视的回答	平等的回答	缺失数据
第	性别歧视的回答	1	2	2
1	平等的回答	2	3	3
项	缺失数据	1	3	缺失

2.性别—权力态度

		第4项		
		性别歧视的回答	平等的回答	缺失数据
第	性别歧视的回答	1	3	1
3	平等的回答	2	3	3
项	缺失数据	1	3	缺失

各项定义:

1. 如果丈夫外出挣钱,是主要的养家者,而妻子主要负责家务和孩子,那么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2. 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那么他们应当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和看孩子的工作。
3. 在政府和私人企业中,没有足够的妇女位于负责人职位上。
4. 在政府和企业的主要职位上,理想的是女人和男人应该一样多。

个七级性别—观念排序变量，见附录表 11.2。样本里在家庭—性别态度变量上持极端性别歧视立场的人的比例比性别—权威变量上的人的比例要少是多，所以我把性别—家庭变量里的性别歧视作为比性别—权力变量更为极端的性别歧视形式来处理。因此，当这两个变量合到一起，性别—家庭变量被认为界定了性别—观念量表中的性别歧视的终极，而性别—权威变量被用来区别量表里的混合和平等部分的差异程度。在建立起这个变量后，检验了各种各样其他集合最初四项的方法。本章里所有结果实质上都不受其他形式的性别观念变量的影响。

附录表 11.2 构建性别观念量表

		性别权力态度变量			
		性别歧视	混合	平等	缺失
性别	性别歧视	1	1	1	1
家庭	混合	2	3	4	4
态度	平等	5	6	7	7
变量	缺失	5	6	7	缺失

教育。教育由受访者所受最高教育水平来度量。因为美国和瑞典的教育系统不同，所以量表里对两个国家的实际步骤并不完全一样。美国变量有下列级别：1 = 小学或更低；2 = 中学；3 = 完成高中；4 = 高中毕业后教育；5 = 大学文凭或更高程度。瑞典变量编码如下：1 = 小学或更低；2 = 没有高中学位的职业教育；3 = 完成高中学业；4 = 高中毕业后考试通过或教育；5 = 大学文凭或更高程度。

家庭收入。家庭收入由来自原有渠道的家庭总收入，包括非劳酬收入。瑞典数据按调查时(1980)的汇率折合成美元。

## 数据、方法和分析策略

### 样 本

为了达到此项分析的目的，样本仅限于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不管是结婚还是未结婚)的家庭和夫妻双方都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这使得美国有效样本量为271名男性和268名女性，瑞典有效样本量为349名男性和299名女性。因为总人口里，生活在双收入家庭里的男性人数跟女性人数完全一样，所以样本里能满足这个标准的男性受访者和女性受访者的人数应该大致一样多。美国情况如此，但瑞典可不是这么回事，瑞典的男性比女性多50人。我不能找到样本规模中这种差异的原因。这也许有可能是定义受访者及其配偶“有工作”的标准略有不同的缘故，但我敢说，这不是原因。

这个限定并不意味着阶级和性别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仅仅在夫妻都有工作的情况下才成为问题。很明显，阶级和性别互动的问题可以与已婚妇女参与劳动力有关，即使在有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里，阶级也仍然会影响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决定。但是，现有研究出于3个原因仅限于双收入家庭：第一，瑞典的数据从受访者样本里排除了家庭主妇，在这样的瑞典家庭里，就只有男人对家务问题所提供的数据了；第二，当夫妻双方都工作时家务劳动分工中的平等问题才更迫切被提出；第三，如果阶级位置对家务劳动分工有影响，而不仅仅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劳动供应决策有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在双收入家庭里最有可能显现出来。

### 数据的局限

需要承认这些数据有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每个家庭中只有一名成员被访问，所以没有关于受访者配偶的观念取向的数据。可以想象，夫妻双方的态度都对家庭中的性别实践有影响，因此这是我们这类研究模型中的一个重大局限。其次，调查无意间没有问受访者有关他们配偶有偿工作时间的的问题，或配偶教育程度的问题。这两个变量都只有从受访者那里才能得到。没有得到男性受访者对妻子有偿工作时间长度的数据是一个尤为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这显然是家务劳动不平等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如果本章的目的是对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的常见解释提供经验性证据，那么这些数据的局限就更重要。但这不是目的。相反地，正如已经指出的一样，这个目的是比较窄的，只具体关注阶级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更为广义的家务劳动本身。

### 分析策略

本章的基本分析策略是检验表 11.1 家庭—阶级构成矩阵单元之间丈夫所做家务劳动总量方面的差异。研究这种差异常用的方法是用普通最小平方回归方程来计算家务劳动，其中阶级是方程中一系列合类变量(0~1哑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家务劳动变量的特定分布违背了OLS回归分析的假说，即它比正常分布有更多的零值(即丈夫不做一点家务)。用正式的统计学术语来说，这种分布被“减”为0。用这种方法截短关于因变量的回

归方程，又潜在地导致自变量斜率的严重歪曲，在任何统计检验中，这都可能传导方程中的系数。

我们可以用Tobit回归而不是OLS回归来解决这个技术上的问题。这一步骤的统计学逻辑和原理曾在迈达拉(1983)和梅尔(1986)的著作中讨论过。Tobit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可视为跟普通回归基本一样，这样在解释结果时就不会引起什么困难了。我也对所有方程进行了OLS回归分析，这些结果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用Tobit回归惟一的缺点是它不能得出简单的 $R^2$ 统计值，而很多人认为对方程的分析能力来说， $R^2$ 统计值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关于方程的解释力的总结性统计数据。考虑到现在的分析里OLS和Tobit回归分析差别不大，所以我在相应的Tobit分析中报告OLS方程里的 $R^2$ 值，使读者能理解方程的相对总体分析能力。

### 对男性被访者单独分析的结果

附录表 11.3 不同家庭—阶级构成的双收入家庭中，丈夫所做家务占全部家务的平均比例：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美国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妻子的职业 阶级	自我雇佣者	[1] 14.1	[2] 23.2	[3] 23.1
	中产阶级	[2] 23.2	[4] 27.8	[5] 30.7
	工人阶级	[3] 23.1	[6] 23.4	[7] 30.9



续表

瑞典

丈夫的职业阶级  
自我雇佣者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妻子的职业 阶级	自我雇佣者	[1] 14.6	[2] 26.3	[3] 19.7
	中产阶级	[2] 26.3	[4] 33.9	[5] 32.6
	工人阶级	[3] 19.7	[6] 25.8	[7] 30.8

附录表 11.4 家庭—阶级构成对丈夫所做家务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  
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美国	瑞典
阶级类别*		
1.自我雇佣者家庭	-13.8***	-21.0***
2.自我雇佣 + 中产阶级	-4.7	-8.4*
3.自我雇佣 + 工人阶级	-4.8	-15.1***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2.4	-1.6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4.3	-8.2**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3.2 <sup>b</sup>	-3.2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07	0.09
样本数	270	344

显著水平: \*p<0.10 \*\*p<0.05 \*\*\*p<0.01

- a.纯中产阶级家庭被排除在分类之外,因此所有的系数是某一家庭阶级与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异。
- b.在第7类纯工人阶级家庭和第6类工人妻子和中产阶级丈夫的家庭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0.05)。

附录表 11.5 家庭—阶级构成和其他变量对丈夫所做家务影响的  
Tobit 回归分析:仅根据男性受访者的报告

	美国	瑞典
阶级类别 <sup>a</sup>		
1.自我雇佣者家庭	-2.8	-10.2*
2.自我雇佣者 + 中产阶级	-1.9	-2.0
3.自我雇佣者 + 工人阶级	-0.4	-6.2
5.中产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0.6	-1.8
6.工人阶级妻子 + 中产阶级丈夫	-2.0	-4.1
7.工人阶级妻子 + 工人阶级丈夫	5.7	-0.5
受访者的教育程度	-0.71	0.95
受访者的有酬工作时间	-0.21**	-0.46***
妻子的经济贡献	3.5**	2.48**
家庭总收入(\$ × 10 <sup>4</sup> )	0.20	0.75
受访者的性别观念	3.0***	1.32**
年龄	-0.15	-0.22**
家中有 16 岁以下儿童(0-1)	1.2	-2.0
对应的 OLS 回归的 R <sup>2</sup> 值	0.2	0.2
样本数	270	344

显著水平: \*p<0.10 \*\*p<0.05 \*\*\*p<0.01

a. 纯中产阶级家庭被排除在分类之外, 因此所有的系数都是某一家庭阶级与纯中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差异。

## 第十二章

### 工作场所权力方面的性别差距

本章我们将研究性别不平等和阶级关系的一个特定方面——工作场所中的权力构成——之间的交叉关系。权力在三个主要方面对性别不平等分析有特殊意义。第一，权力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职业特征，因为它标明了个人的地位，而且它包含的责任会具有内在的回报性。第二，权力是分配工作报酬的主要方式（哈拉比，1979；贾菲，1989；雷斯金和佩达威克，1994：85；雷斯金和鲁斯，1992；罗宾逊和凯利，1979；鲁斯，1981；斯佩斯，1985；赖特，1979）。我们经常提起，雇员通过两种基本途径跟职位和收入相联系——从外部劳动市场中吸收新劳动力和内部劳动市场里的升迁。内部升迁到更高报酬的职位经常也能提高个人的权力等级。<sup>1</sup> 第三，可能最重要的是，由于与权力等级中的地位有关的实权，权力上的性别不平等，会成为有助于维持一般工作场所后果方面性别不平等的关键机制。女性在权力职位里较低的代表性，在高级管理层中这一现象更突出，这本身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例，它还有可能是引起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肯特（1977）在她对性别和管理职位的经典研究中已经指出，男性支配的等级制度里男经理可能会按

保持男性特权和优势的方式行事，那么工作场所权力上的性别不平等就成为在工作组织中性别不平等再生的一个关键制度成分。

当然，没有人对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里工作场所权力方面男女分布不均等这一普遍事实感到惊讶。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对权力方面性别差距的跨国变化模式感到吃惊。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男性获得“高级”或“上层”经理职位的可能性是女性获得这一职位的可能性的1.8倍，而在瑞典，男性的可能性是女性的4.2倍。这些结论看上去违反常理，因为瑞典在很多方面性别关系比美国更平等：瑞典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比美国低得多；<sup>2</sup>丈夫所做家务的平均比例比美国高；<sup>3</sup>瑞典的性别观念也比美国平等得多。<sup>4</sup>但是，瑞典工作场所权力上的性别差距却比美国要大得多。

本章的目的是记录并试着解释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工作场所权力方面性别不平等的跨国变化——美国、加拿大、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和日本。<sup>5</sup>虽然关于权力分配的性别不平等有一些数量有限的研究（迪普雷特和索尔，1988；格兰得简，1981；希尔，1980；雅各布斯，1992；贾菲，1989；麦克吉尔和雷斯金，1993；雷斯金和鲁斯，1992；罗森鲍姆，1984；沃尔夫和菲丽格斯顿，1979a），但是，我知道没有一项量化研究，系统地在广泛的比较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本章的目的就是开始填补这个研究上的空白。

## 12.1 研究“性别差距”的分析策略

几个常见因素使得女性较之男性，较少可能获得涉及权力的工作场所职位。工作抱负和职业选择上的性别差异，半是社

会化过程的结果，半是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可以使得女性把自己排除在权力职位竞争之外。各人身上的性别差异，尤其是专业训练和就业经验，可以使女性更不具备出任许多管理职位的资格。雇佣机构——部门、雇佣组织的规模、政府相对于私人雇主、兼职工作——的性别差异可以影响进入权力职位的升迁机会。当然，有效的性别歧视完全会使合格女性难以升迁。从事性别歧视的行动者的观念和动机可以有不同形式：制定工作规范阻止女性对男性实施权力（伯格曼，1986；肯特，1977）；刻板地认为女性太过情绪化，以至不能成为有效的经理（肯特，1977；雷斯金和哈特曼，1986）；相信“统计出来的歧视”的有效性（比尔必和巴伦，1986；沃尔夫和菲利格斯顿，1979a）；或希望仅仅保持男性的权力和特权（艾克，1990；雷特金，1988）。不管动机如何，歧视都影响了男性和女性得到权力职位的相对机会，这或者是因为它影响了接近便于升迁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互动，或者是因为居于更高权力职位的人在分配权力职位时直接歧视女性。

分析获得权力方面中的性别歧视的理想数据要包括对有效影响升迁结果的歧视行为的直接观察。因为这种数据从来不能以系统的、量化的方式存在，所以对劳动就业中性别不平等研究就典型地靠评定歧视的间接方法。可以采用两个主要的方法。第一个可称为“净性别差距”研究方法，即对预测工作场所权力的多变量方程进行估计，这个方程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加上一系列被认为是代表对权力的各种非歧视性影响的控制变量（例如，教育程度或职业经验）。这个方程里性别变量的一个重要系数被认为是工作场所权力的直接分配中的可能歧视程度的指标。因此，当其他非歧视性解释（方程中的控制变量所代表的）不能充分解释权中的性别歧视时，分配权力职位时有效

的、直接的歧视就当做“剩余解释”来看待。<sup>6</sup>当然，即使性别系数是零，这也不能证明在生产权力的总性别差距的社会过程中没有歧视，因为歧视可以系统地影响控制变量本身。<sup>7</sup>所以，净性别差异策略只有在评定组织内分配权力过程中歧视的直接运作程度时才有效。

因为对方程可能错误说明（重要的性别差距的非歧视性原因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或者因为一些变量度量不准确，所以净性别差距分析方法总是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表面上看来像是剩余“歧视”差距，其实也仅仅反映了数据分析的局限。然而，如果在控制了各种可信因素后，权力方面中的性别差距仍很大，那么这就使得权力职位分配过程中存在直接歧视的说法更可信。采用这种方法分析权力中的性别差距的研究有贾菲（1989），雷斯金和鲁斯（1992），沃尔夫和非丽格斯顿（1979b）。在所有这些研究里，当方程中加入大量控制变量后，权力方面中的净性别差异仍很明显。<sup>8</sup>

间接测定歧视在产生权力中性别差异时所起作用的第二个策略称为“性别互动方法”。用这种策略，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预测权力的多变量方程的评估。关键变量斜率的性别差异被认为是反映了可能的歧视程度。这里的中心要点是，歧视不仅仅对结果有附加影响，它也影响了女性能够把各种相关个人属性转化为权力的相对成功。例如，沃尔夫和弗利格斯顿（1979a）在最早的关于权力性别差异的量化模型中，发现男性较之女性，从教育可以得到更高的权力回报，即使控制了年龄和工作经验这些变量，结论也一样。她们认为，这种斜率差异更可能归因于雇主的行为而不是女性的行为和观念，因而这又可能反映了权力升迁过程中的歧视。采用这种策略的研究通常都发现，男性和女性权力方面更多总差异都可归因于从教育或经验这类因

素身上获得权力回报的差异，而不是归因于这些权力的决定因素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均值差异（也见哈拉比，1979；希尔，1980；麦克吉尔和雷斯金，1993）。

本章研究主要使用净性别差距策略。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跨国比较中，研究歧视的性别互动方法会涉及三维互动术语的分析（国家×性别×自变量）。由于我们数据样本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即使两维互动规模中出现跨国的重要名义差异，三维互动系数的标准误差也会很大。在我们的数据中，对性别互动进行的几十次可能的国家比较里，只有几个分散的三维互动，它们还算接近了统计意义上的常用标准。此外，即使不是出于这种统计学考虑，由于有7个国家和很多自变量，性别互动方法在概念上极易变得很复杂。由于这是权力性别差距第一个跨国分析，所以即使互动方法对理解歧视过程更有用，这里采取相对简单的净性别差距方法则更可取。

## 12.2 经验性议程

本章数据分析围绕4个主要任务：记录权力性别差距的跨国变化；找出国家内获得权力方面中性别差距的大致原因；找出不同国家内权力总量方面的性别差距；探讨关于净性别差距的跨国变化的各种可能解释。

### 性别—权力差异的范围与跨国模式

由于关于权力性别差异几乎没有公开可得到的研究文献，更不用说对这种差异的跨国变化进行的研究了，所以在我们开始解释跨国变化前，用文献尽可能准确地说明需要解释什么便

十分重要。为此，我们使用三个不同的基本量度对权力进行测量：约束权（对下属施加积极的或消极的约束的能力）；决策权（直接参与就业组织中的重大决策）；和在权力等级中的正式位置。我们还建立了两个综合量度：综合权力两分（如果一个人在3种基本权力形式中至少占有两个，那么哑变量值是1）和权力程度量表（3种基本权力形式结合成一个10级变量）。这些变量在本章研究方法附录里都有说明。

### 解释不同国家里权力拥有方面的性别差距

“净性别差距”方法的核心观点是对没有涉及直接歧视的权力升迁中的性别差异给予合理的解释，并探讨当这些非歧视因素在度量权力的方程中保持不变时，权力差距是否能够消失。我们将探讨这些有关权力性别差距的两种解释：(1)性别差距是由男女的不同个人特征中和他们工作环境中的性别差异所引起的；(2)性别差距是女性自我选择所引起的。

1. 构成因素。如果经理和雇主以性别中立的态度来考察潜在候选人的不同特点以决定谁被升迁，那么女性在权力等级中的过低代表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在潜在候选人群的代表人数少的结果，或者是她们比男性缺少足够资格的结果。例如，因为雇佣全职经理比兼职经理对企业来说更有效率，所以兼职雇员处于潜在升迁候选人地位的可能性就小些。<sup>9</sup> 因为兼职工作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所以权力职业中的性别总歧视有可能是兼职工作里不同性别分布的结果。或者另举一例，由于就业中断，女性的就业经验平均都比男性少，这样一来，当她们处于潜在升迁候选人群中时，她们普遍地更不合格。当然也有可能这两个事实本身都要部分地归于各种性别歧视。但是，如果一旦我



们控制了这些构成因素，权力性别差距就消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差距不可能是由于工作环境里权力直接分配给个人的歧视所造成的。

我们将研究三组构成因素：公司特征（工业部门，国家就业，公司规模）、职业特征（职业，兼职工作，工作任期）和个人特征（年龄，教育，就业中断情况）。<sup>10</sup> 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集中于经理比例较低的部门，或者是带有与升迁管理层可能性低相关的职业和个人特征，所以只要我们控制了这些因素，男女之间的权力差距就会减小甚至可能消失。

可能会有人反对这些构成因素，认为其中一些是升迁歧视的部分后果而不是性别差距的间接原因。例如，女性更有可能做兼职工作的原因之一，准确地说是因为她们被排除出了进入管理层的升迁。女性的平均职业任期更短，可能是她们被排除了升迁可能性因而跟雇主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的缘故。当然也有可能，女性虽不能升迁进入权力职位，但至少有时候从低级白领到高级白领的升迁会带来正式职业称谓的变化，所以她们得到低级白领职位的可能性更大。<sup>11</sup> 被排除在权力职位之外就可能解释了一些构成因素，而不是相反。我们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数据分析去调查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些控制因素的集合未能明显地减少权力性别差距，那么这就为有力证明这样一种看法添加了重要力量，即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职位分配中的直接歧视所造成的结果。

2. 出于家庭责任的自我选择。由于各种原因可以认为，与男性处于相似工作环境中、个人特征也与男性差不多的女性不愿意像男性那样经常想要升迁进入权力职位，特别是由于家庭责任的缘故。如果给女性各种可行的就业选择，那么，即使“妈咪路线”职业轨迹导致较低职业前景（尤其是在向上升迁上），

实际中她们也愿意选择它，因为这里压力小且需要的工作时间少。这不是又一次否认这种喜好本身反映了社会中压迫性的性别实践的运作。例如，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或无法支付高质量的看孩子服务，都妨碍了女性现实挑选工作场所的选择自由。但是，这种自我选择是一种与经理和雇主在实际升迁中的直接歧视完全不同的机制。

自我选择是一个特别难度量的过程。除非能得到有关雇主决定实际升迁的微观细节和雇员职业策略选择的直接数据，否则难以排除自我选择是导致性别差异后果的过程的一部分。虽然这样，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性别和可能与自我选择关系密切的某些变量之间的互动来抓住这个问题。

性别自我选择最常见的形式是围绕着女性在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之间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责任作为附加“构成因素”。但是，与建立在构成影响的添加模型基础之上的简单构成论证不同，自我选择的论证要求一个互动的模型。例如，自我选择假设认为儿童在家庭的出现会使女性自己选择不会竞争晋升权力职位，而对男性就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在一个度量权力的模型里，如果儿童的出现刺激男性寻求升迁以满足家庭财政需要，那么测量儿童出现的变量的系数对女性可能是负值，而对男性是零，甚至是正值。所以，为了确定这种自我选择的存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性别互动和自我选择变量（还有附加的构成影响）的模型，然后用互动的自变量合适值来确定权力性别差距。为此，我们包括了3个与自我选择合理相关的变量：婚姻状况、在家庭中儿童的出现和丈夫所做家务的百分比。

对用这种方法研究自我选择可以提出两个反对意见。第一，看上去是自我选择，也许其实只是歧视和排斥的另一种形式。

例如，儿童的出现可以建立一个标准，即雇主以此来要求女性去走“妈咪路线”，而不是采取女性选择不去竞争升迁的这样一种处境。从现有数据中，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如果当我们控制这些所谓的自我选择指标时，权力差距明显减少，我们就可以简单地探讨雇主拒绝女性升迁的机制。但是，如果控制这些指标对权力差距没什么影响，那么这将是反对自我选择假设的有力证据。

第二，与附加构成影响变量一样，一些家庭责任变量可能部分地只是女性对权力的关系结果，而不是那种关联的原因。例如，处于权力职位上的女性可能由于工作中增加的压力而做更少的家务，因此家务劳动分工也就更平等。所以，住在一个不平等的家庭里可能不能解释为什么女人没有权力，而是她们没有权力的结果。我们无法探讨这些相互影响，所以我们对这些互动术语的解释只能说是尝试性的。

### 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

有关女性在工作场所里争取和男性平等的努力最重要的隐喻之一就是“玻璃天花板”。这个表述在政府听证会、报告、法律和大众媒体中都用过。<sup>12</sup> 这种形象就是，虽然女性可能已经通过了进入管理等级层的第一道门，但是在某处她们会撞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障碍，这个障碍阻止了她们进一步向管理高层上升。在对这个问题最早的研究之一中，莫里森等把（1987:13）玻璃天花板定义为“一个透明的障碍，使女性在公司里无法升迁到某一水平之上……它适用于仅仅因为是女人便不能进一步高升的女性群体”。<sup>13</sup>

玻璃天花板隐喻不仅仅意味着女性在工作环境和管理层中

面临着不利条件和歧视，而且还意味着随着女性向更高等级迈进，这种相对于男性的不利条件还会增加。<sup>14</sup> 雇主和高级经理可能愿意让女性做监督者，甚至做到比中等经理略低一些的级别，但是，他们不愿让女性得到有“实权”的职位，这样一来，在公司和其他组织里女性被排除在升迁到上层管理层之外。这可以归因于性别歧视观念或者是更微妙的歧视性实际，但无论如何，玻璃天花板假设认为女性在上层管理层中，较之下层，在获得工作和升迁上，面临着更大的相对不利处境。

随便一个观察似乎都能证实这个观点。毕竟，低级监督者中的女性比例比首席执行官中的要高得多。在阶级分析项目数据里，美国管理层底层大约20%~25%的低级监督者是女性。与此相对，大公司里的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至多有百分之几是女性。<sup>15</sup> 雷斯金和佩达威克(1994:85)评论这些他们称为“升迁差距”的数据，认为“尽管1992年女性占据了联邦政府职位的一半和86%的政府办事员，但只有1/4的监督者和1/10的高级执行官是女性”。雷斯金和佩达威克报告了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结果：在丹麦，14.5%的经理和管理人员是女性，但高级经理只有1%至5%；在日本，7.5%的经理和管理人员是女性，但私人企业高级经理里只有0.3%是女性。威斯康星州政府处理玻璃天花板动议的报告指出，在威斯康星，虽然47%的监督者和42%的中层管理者是女性，但只有34%的上层管理者和18%的执行官是女性。美国劳动部1991年《关于玻璃天花板动议的报告》(第6页)也有相似结果：从《财富》杂志1989年和1991年的1000家最大企业中随机抽样94家，这些公司里女性占了所有雇员的37.2%，但只占了管理层的16.9%和执行经理的6.6%。这种现象对那些争取性别平等的人来说一点也不惊讶，在美国存在着玻璃天花板。

但是，情况跟他们想象的有所不同。一个简单的算术例子能说明这一点。假定如表 11.2 描述的一样，把管理层分为 6 级。在这项说明的第一个例子里，每个等级中 50% 的男性和 25% 的女性能得到升迁（即男性在每一等级里升迁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25% 的生产线监督者是女性，那么只有 1% 的高级经理是女性。在第二个例子里，男性升迁机会和女性升迁机会的比率随着等级的提高而逐渐平等。从非管理层升到监督职位，这个比率是 2:1，但是升入高级管理层的比率只有 1.16:1。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高级经理的比例也大大低于女性监督者的比例：6% 比约 25%。<sup>18</sup>

表 12.1 女性高级经理很少的情况和没有“玻璃天花板”的性别歧视情况

经理层	男性	处于该层的人数		进入更高层次的升迁率		
		女性	% 女性	男性	女性	比率
随地位升高歧						
视持续增加						
总经理	100	1	1			
经理层 4	200	4	2	50%	25%	2:1
经理层 3	400	16	4	50%	25%	2:1
经理层 2	800	64	7.5	50%	25%	2:1
经理层 1	600	256	14	50%	25%	2:1
生产线监督者	3000	1024	24	50%	25%	2:1
非经理层	6400	4096	42	50%	25%	2:1
随地位升高歧						
视程度下降						
总经理	100	6	6			
经理层 4	200	14	6.5	50%	43%	1.16:1
经理层 3	400	36	8.3	50%	40%	1.25:1
经理层 2	800	98	11	50%	37%	1.35:1
经理层 1	600	297	15.7	50%	33%	1.52:1
生产线监督者	3200	1024	24	50%	29%	1.72:1
非经理层	6400	4096	42	50%	25%	2.00:1

这两个例子都不能说明“玻璃天花板”为问题。按照玻璃天花板假设，女性得到管理职位的障碍应该随她们地位的提高而增加。这或者是采取激烈的形式——在某些等级上，较之男性，女性被招收和升迁的机会骤然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或者就是女性较之男性的机会逐渐减少。无论哪种情况，玻璃天花板假设都意味着随着女性向上升迁，她们得到管理职位的困难较之男性在不断增大。在刚举过的两个例子里，女性较之男性面临的不利处境或者会随她们等级地位的提升而一直持续着（例1），或者会有所减少（例2）。这两个例子都几乎没有女性高级经理。

这些例子说明了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不能简单根据公司的高级梯队中女性比男性少这一事实得出。当个人升向公司的高级层时，歧视减少的积累影响仍能造成“权力性别差距”增加。

比较阶级分析项目数据不允许我们对玻璃天花板假设进行严格验证。但是，我将使用两种经验方法来删除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用10级权力性总量量表来研究净性别差距，同时还用相同的方法研究拥有权力可能性的净差距。如果玻璃天花板存在，那么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应比简单地拥有权力的性别差距要大得多。

第二，我们将探讨玻璃天花板假设很少为人注意的一种形式，我们的方法就是单独检查把玻璃天花板带入权力等级的那些人的权力性别差距。如果我们发现对处于权力等级的人来说，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跟样本总体一致或比后者小，那么这就推翻了玻璃天花板认为进入权力等级时的性别歧视比在权力等级里升迁的性别歧视要小的假设。这并不意味着，在权力等级里垂直升迁时没有性别歧视，这只能说明，这种歧视比影响进入权力等级里的歧视要强烈得多。当然，玻璃天花板可以采取

一种突然步骤功能的形式，只在公司的最高级别上发生强烈的歧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在分析里就由于样本规模局限而看不到玻璃天花板。但是，如果玻璃天花板采取了权力级别越高则歧视逐渐增多的形式，那么人们所拥有权力大小方面的性别差距应当比人们简单地拥有权力方面的性别差距要大。<sup>17</sup>

### 解释跨国变化

我们用两种不同的策略探讨权力性别差距跨国变动的可能解释。首先，我们会比较权力总体性别差距（即不控制任何构成影响一国特定的性别差距）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和除去各种构成因素后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性别差距的重要部分可以被这种构成因素所解释，那么这些因素也可能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性别差距不同的原因。例如，瑞典女性更有可能比美国女性做兼职工作，而已经指出过，兼职工作的雇员更不可能拥有工作场所权力。所以，瑞典与美国相比，权力总体性别差距更大，这也要归于雇佣模式的差别。在极端的例子里，如果国家内所有性别差距都由这些构成的控制因素来解释，这也就说明升迁中的直接歧视可能不是关于性别差距国内解释的重要部分，那么这些构成的控制因素也有可能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总体性别差距不同的原因。

第二，如果在控制了所有构成因素后，国家之间性别权力差距的显著不同仍存在，那么我们就比较7个国家内权力净性别差距的排序和下列变量的排序，用这种不太正式的方法来探讨一些可能的宏观社会解释：

1. 性别观念。形成工作场所权力性别差距的明显文化因素之

一是性别观念。在所有事物都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会期望有着相对平等的性别观念的社会比起有不平等观念的社会，权力性别差距更小一些。

2. 女性的生育权和性权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在一系列国家所支持的性别平等的权利方面存在着差异。虽然在所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里女性都有跟男性平等的选举权，但是国家之间在女性的生育权和性权利上在一系列的影响妇女权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如流产权、怀孕期和哺乳期内带薪产假、关于性暴力、性虐待和性骚扰的法律。这些国家支持和规定的权利可能不会直接阻止升迁中的歧视，但它们能间接影响升迁和工作场所权力的不平等程度，以促成政治承认。所以可以断言，强力支持这些权利的社会比不支持这些权利的社会，权力的性别差距则更小。

3. 性别收入差距。除了性别观念和法律权力之外，性别—权力差距还与劳动市场结果中性别平等的各种制度安排有关。可以设想，特别是在收入性别差距相对较小的社会里，权力性别差距也会相对较小。这不是说男女收入能力越平等，权力差距就越小（如有可能的话，权力性别差距较小本身能减少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而是说降低男女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可能降低权力不平等。所以，收入中的性别差距低可以当做对性别平等本身基本制度许诺的一个指标。

4. 职业性别隔离。职业性别隔离和权力性别不平等的逻辑关系很复杂。很明显，获得权力的可能性因不同职业而不同，所以，这种职业性别隔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可能是造成权力不平等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反对女性监督男性的规范很强力有效，那么职业性别隔离会有限地使女性居于管理职位上，这样就增加了女性只监督女性的机会。此外，升迁进入权力职位经



常会带来职业称谓的改变。对正式称为“经理职业”的职业，尤其如此。所以，阻止女性获得工作场所权力的障碍也可能成为职业性别隔离的一个原因。在探讨不同国家里职业性别隔离中的变化时，我们并不是认为这种变化本身是权力净性别差距的直接原因。相反地，跟收入差距的情况一样，我们把职业性别隔离作为决定社会不平等基本过程的指标。因为有人争辩说，职业性别隔离是影响权力性别差距的许多相同因果过程的结果——男孩和女孩社会化程度不同、人力资本获得的模式不同、歧视的不同形式——所以可以想到，职业性别隔离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也会有很大的权力性别差距。

5. 拥有权力的劳动力比例。可以想到，拥有权力的劳动者比例小的国家比拥有权力劳动者比例大的国家，在权力性别差距上也大，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公司雇员拥有权力高比例的国家里，雇主和高级经理用男性填补这些职位就更困难了。用简单的供求术语来说，在一个管理层和监督者职位在整个职业构成中占很大比例的国家里，雇主愿意用女性填补更高比例的权力职位。这种招收反过来又意味着，女性开始建立这种促使妇女随后的招收和提升的网络（肯特，1977）。特别是随着时间流逝，更多的女性有可能处于招收和提拔他人的职位上。

第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如艾克，1990；伯格曼，1986；雷斯金，1988），性别—权力差距至少是男性维护权力等级中的男性支配地位的利益的部分结果，那么当这些职位相对较少时，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就会更强。这不是说，男性一起协调密谋。相反地，当权力是一种稀少的物品时，男经理们会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网络、减少管理层职位的竞争，这么做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女性被排除。所以，管理层人数多会促使公司首脑招收妇女进入管理层，同时又会减少男性经理保住职位的有

限努力。

6. 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和政治文化。如果性别歧视在把女性排除在工作场所负责职位和实权职位之外起了很大作用,那么可以想象,削弱这种性别歧视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妇女组织起来挑战这些歧视的组织程度和方式。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妇女运动的总体力量是其挑战工作场所权力性别差距的关键。第二,可能不那么明显,妇女运动的特定观念取向会影响妇女运动致力于解决工作场所歧视问题所投入的精力程度。更广一些说,我们可以区分出主要关心直接改进妇女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妇女运动和更多致力于使妇女和男性平等地拥有分配福利的社会实权职位的妇女运动。前一种运动常与社会民主政见相联系,关注的是服务的提供和妇女的利益;后一种运动更多地与自由民主政见相联系,关注权利、机会和歧视的问题。这种推理表明一种预期,即所有事物平等的情况下,自由权利取向妇女运动的国家里,权力性别差距应当比社会民主妇女运动的国家里要小。

### 12.3 结 果

本章大多数的正式统计分析都围绕着量度个人是否拥有各种工作场所权力的方程而进行的。我们用来分析这种两分因变量的基本方法是对数回归。<sup>18</sup> 为了确定总体权力性别差距——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性别差距——我们首先估测每一国家当性别是惟一的自变量时的对数回归:

$$\text{Log} [\text{Pr} (A=1) / \text{Pr} (A=0)] = a + B_1 \text{女性} \quad (1)$$

式中  $\text{Pr} (A=1)$  是个人拥有我们各种度量所定义的权力的可能性,  $\text{Pr} (A=0)$  是个人没有权力的可能性, 女性是一个虚

拟变量。这个模型里系数 $B_1$ 的显著程度是对男性和女性获得管理层权力的机会是否存在重大差别的测试。

为了估计“净性别差距”，我们添加了构成控制变量来测试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双变量关系是否反映了与性别和管理层权力相关的其他因素：

$$\text{Log}[\text{Pr}(A=1)/\text{Pr}(A=0)] = a + B_1 \text{女性} + \sum_i B_i X_i \quad (2)$$

式中 $X_i$ 是附录表12.1所列的公司特征、工作特征和个人特征这些构成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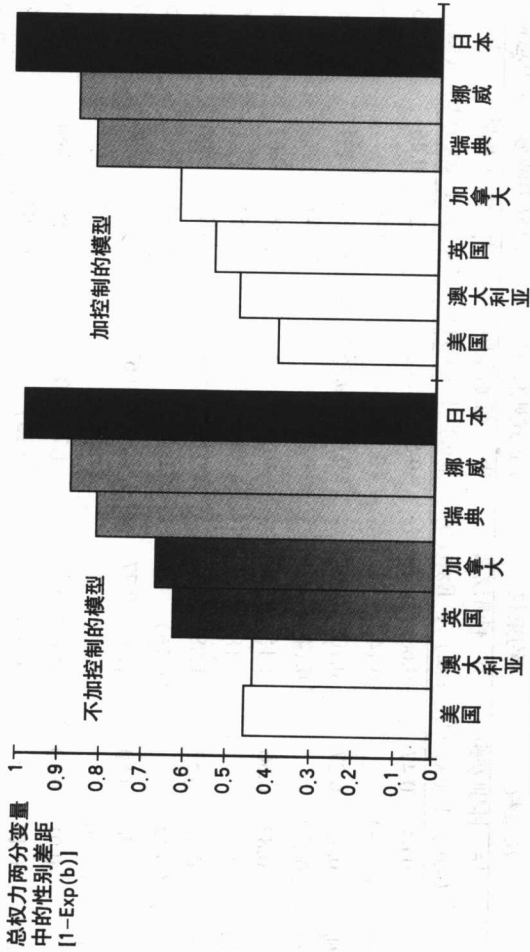
在解释这些对数回归时，我们特别关注双变量和多变量方程中的性别系数。因为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1 = 女性），所以系数表明了女性和男性获得管理层权力的对数几率之间的机会的差异。对系数进行反对数运算又会产生一个几率。<sup>19</sup> 这就是女性拥有权力的机会与男性拥有权力机会之比。例如，如果方程中除去其他因素，性别系数的反对数是0.9，那么女性拥有权力的机会是男性机会的90%。这样，“性别差距”就被定义为1减去女性虚拟变量的对数系数的反对数：当它为0时，就没有权力性别差距；当它是1时，权力方面一个女人也没有。在模型（1）中，我们把这叫做“总体性别差距”，在模型（2）中，又称工作场所权力的“净性别差距”。

### 拥有权力的总体性别差异

表12.2列出了对本研究中七个国家性别—权力的基本描述交叉列联式。图12.1以图的形式表现了整体权力两分变量中的性别—权力差距（1代表着性别系数的反对数）。表12.3表示了对我们用模型（1）量度出的总体权力性别差距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的结果。<sup>20</sup> 这几个结果都很重要。

表 12.2 性别分类中的权力分布：七个国家

	决策权 (%是)		约束权 (%是)		正式职位 (%是)		总权力两分 (%是)		样本数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美国	22.3	13.1	32.1	20.5	37.6	25.9	29.9	18.7	629	549				
澳大利亚	37.0	29.9	37.9	23.4	50.4	39.9	40.3	27.4	543	463				
英国	24.0	12.3	27.9	10.9	38.7	22.4	29.5	13.6	594	457				
加拿大	26.1	14.3	25.0	10.2	35.4	18.8	26.6	11.1	785	639				
瑞典	19.7	10.8	17.4	4.7	34.1	16.3	21.9	5.3	549	436				
挪威	26.6	12.7	23.3	4.1	39.4	10.7	29.4	5.4	827	588				
日本	28.5	3.5	34.0	2.9	47.0	3.5	38.3	1.7	253	173				
	总经理		高级经理		中级经理		低级经理		监督者		非经理层		样本数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美国	3.3	2.8	4.5	1.5	5.7	3.6	3.3	2.2	20.7	15.9	62.4	74.1	622	539
澳大利亚	3.0	1.9	5.9	2.1	8.7	4.1	2.4	2.6	30.3	29.1	49.6	60.1	492	419
英国	3.9	0.9	1.2	0.2	8.6	1.8	4.9	1.1	20.2	18.4	61.3	77.6	594	456
加拿大	3.7	0.9	5.2	0.9	5.4	3.0	2.3	2.0	18.9	11.9	64.6	81.2	785	639
瑞典	1.9	1.0	2.3	0	6.2	1.7	4.9	2.6	18.8	11.1	65.9	83.7	531	416
挪威	5.0	0.9	5.5	0.9	5.1	0.5	0.5	0.2	23.4	8.3	60.6	89.3	822	581
日本	1.2	0	4.3	0	2.8	0	1.6	0	37.2	3.5	53.0	96.5	253	173



不同阴影条表明了差异显著水平在  $p < .05$  或更好，有两个例外：在不加控制的模型中，英国和澳大利亚在  $p < .06$  显著水平上有差异，英国和美国在  $p < .09$  显著水平上有差异。

图12.1 七个国家内权力的性别差距

表 12.3 七个国家里女性相对男性拥有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的性别系数:不加控制的模型

国家 (N)•	权力特定量度						权力总体量度									
	决策权			约束权			正式职位			总权力两分			权力总量(0~9级量表)			
	b <sup>a</sup>	性别差距	(s.e.)	b	性别差距	(s.e.)	b	性别差距	(s.e.)	b	性别差距	(s.e.)	b <sup>c</sup>	性别差距	(s.e.)	
美国 (1178)	-0.64 (0.16)	0.47 (0.14)	-0.60 (0.14)	0.45 (0.14)	-0.54 (0.13)	0.42 (0.13)	-0.62 (0.14)	0.46 (0.14)	-0.63 (0.14)	0.47 (0.14)	-0.63 (0.14)	0.47 (0.14)	-0.63 (0.14)	0.47 (0.14)	-0.63 (0.14)	0.47 (0.14)
澳大利亚 (1006)	-0.32 (0.14)	0.27 (0.14)	-0.70 (0.14)	0.50 (0.14)	-0.43 (0.14)	0.35 (0.14)	-0.58 (0.14)	0.44 (0.14)	-0.64 (0.13)	0.47 (0.13)	-0.64 (0.13)	0.47 (0.13)	-0.64 (0.13)	0.47 (0.13)	-0.64 (0.13)	0.47 (0.13)
英国 (1051)	-0.82 (0.17)	0.56 (0.18)	-1.15 (0.18)	0.68 (0.18)	-0.79 (0.14)	0.55 (0.14)	-0.98 (0.16)	0.62 (0.16)	-1.06 (0.16)	0.65 (0.16)	-1.06 (0.16)	0.65 (0.16)	-1.06 (0.16)	0.65 (0.16)	-1.06 (0.16)	0.65 (0.16)
加拿大 (1424)	-0.75 (0.14)	0.53 (0.16)	-1.08 (0.16)	0.66 (0.16)	-0.86 (0.13)	0.58 (0.13)	-1.07 (0.15)	0.66 (0.15)	-1.10 (0.15)	0.67 (0.15)	-1.10 (0.15)	0.67 (0.15)	-1.10 (0.15)	0.67 (0.15)	-1.10 (0.15)	0.67 (0.15)
瑞典 (985)	-0.70 (0.20)	0.50 (0.20)	-1.46 (0.26)	0.77 (0.26)	-0.97 (0.16)	0.62 (0.16)	-1.61 (0.24)	0.80 (0.24)	-1.57 (0.24)	0.79 (0.24)	-1.57 (0.24)	0.79 (0.24)	-1.57 (0.24)	0.79 (0.24)	-1.57 (0.24)	0.79 (0.24)
挪威 (1415)	-0.91 (0.15)	0.60 (0.22)	-1.95 (0.22)	0.86 (0.22)	-1.70 (0.15)	0.82 (0.15)	-1.98 (0.20)	0.86 (0.20)	-1.98 (0.20)	0.86 (0.20)	-1.98 (0.20)	0.86 (0.20)	-1.98 (0.20)	0.86 (0.20)	-1.98 (0.20)	0.86 (0.20)
日本 (426)	-2.40 (0.44)	0.91 (0.44)	-2.85 (0.47)	0.94 (0.47)	-3.21 (0.43)	0.96 (0.43)	-3.56 (0.60)	0.97 (0.60)	-3.58 (0.60)	0.97 (0.60)	-3.58 (0.60)	0.97 (0.60)	-3.58 (0.60)	0.97 (0.60)	-3.58 (0.60)	0.97 (0.60)

- a. 这里的样本数来自于总体权力模型，其他模型里的样本数可能略有不同。
- b. 模型 1 中的性别影响的对数系数： $\text{Log}[\text{Pr}(A=1) / \text{Pr}(A=0)] = a + B_1$  女性。
- c. 累积对数（顺序对数）模型的系数。

已排序国家之间在权力总量量度上差异的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总权力职位二分 （不同国家之间对数 差异的 p 值）	(0.03) <div style="border-top: 1px solid black; width: 100%; margin-top: 5px;"></div>	澳大利亚[0.85]美国[0.09]英国[0.69]加拿大[0.05]瑞典[0.24]挪威[0.01]日本
权力总量量表（不 同国家之间累积对 数差异的 p 值）	[0.06] <div style="border-top: 1px solid black; width: 100%; margin-top: 5px;"></div>	美国[0.92]澳大利亚[0.03]英国[0.76]加拿大[0.10]瑞典[0.19]挪威[0.02]日本

解释：国家按权力性别差距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括号里的数字表示相关方程中各个国家间性别系数差异的 p 值。当 p 值未达到 0.05 以下对排序中相邻国家的阈值时，系数在 0.05 显著水平上不同的两个最邻近的国家被列在国家一列中的最上端或最下端。无论何时，显著水平都跟排序保持内在的一致。

第一，在每个国家中，对权力的每个度量里，都存在着重大的性别差距。女性较之男性更不可能处于正式权力层中，拥有对下属的约束权，或是参与公司的决策。

第二，权力性别不平等的程度上的跨国变化在统计学上很重要。在所有对权力的量度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性别差距最小，而日本的差距最大。<sup>21</sup>以经过指数运算的性别差距系数为基础，在日本，女性拥有权力的几率只是男性的3%~9%，而（根据计算）美国和澳大利亚女性拥有权力的几率通常是男性的50%~60%。另两个讲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联合王国——比起美国和澳大利亚来有更大的性别—权力差距，但令人吃惊的是，比起瑞典和挪威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其差距又小一些。我们已经指出，在阶级和性别关系的许多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但是在我们分析的工作场所的权力分配时，它们又明显比四个说英语的国家要不平等一些。

第三，虽然性别差距出现在我们对权力的所有量度中，但是决策方面比起约束权和正式等级地位来，性别差距又多少更小些。除了美国以外其余国家中，参与决策的性别差距比起其他两个量度来要小得多，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也不那么大。虽然这可能反映了我们决策量度有些缺陷，但它也说明了权力中性别不平等现象最重要的问题是以对别人的直接权力而不是以组织的责任本身为中心的。

### 带有构成控制因素的权力的净性别差异

表12.4列出了模型(2)中的性别系数。这些系数告诉了我们除去方程里其他变量上男女之间的构成差异后权力性别差距的规模。



表 12.4 和图 12.1 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任何国家中男性和女性在权力上的相对小的总差异都不能归因于这些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差异。<sup>22</sup> 最大的构成影响看来是在美国和联合王国里,当加入控制后,那里的总体性别—权力差距减少了 20%。<sup>23</sup> 其他国家中,这一数字在日本不到 1% 和加拿大 12% 之间变动。在美国和联合王国,权力性别差距相当大地减少实际上是由两个职业特征变量造成的(职业和全职);包含有个人特征变量的方程几乎对权力差距没有任何影响。

表 12.4 的结果也表明,虽然在控制了构成影响的方程中一些跨国差异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但是,结果的基本模式跟总体性别差异的方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计算综合权力两分的方程中,没有构成影响的模型和有构成影响的模型之间的惟一变化是在后者里,四个说英语国家中的性别系数不再有显著不同。所以,针对净性别差距,我们把 7 个国家可以清楚地分成几个组:四个说英语国家权力净性别差距最小,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明显较大的净性别差距,日本的差距最大。

虽然我们总是有可能从分析中删去一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关键性构成变量,但是,这些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下列看法,即权力的性别差异和这种差异的跨国模式,并不主要是男女相关特征和他们工作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这就增加了认为升迁过程本身的直接歧视或自我选择可能很重要这种看法的可信性。

### 自我选择模型

自我选择假设认为,女性出于家庭责任,会自觉自愿地使她们自己更少得到进入工作场所权力职位的升迁机会。我们将

表 12.4 七个国家内女性相对男性拥有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加入控制的模型<sup>a</sup>

国家 (N) <sup>b</sup>	权力职位特定量度				权力性总体量度				模型 I 加入 控制后“总体 权力差距”的 百分比 <sup>c</sup>
	决策权		正式职位		普通权力职位		权力性总量 (0-9 级量表)		
	b <sup>c</sup>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sup>c</sup>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sup>c</sup>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sup>c</sup> 性别差距 (s.e.) 1-Exp(b)	b 性别差距 (s.e.) 1-Exp(b)	
美国 (1178)	-0.55 0.42 (0.19)	-0.51 0.40 (0.17)	-0.48 (0.17)	0.38 (0.18)	0.36 (0.17)	-0.51 0.40 (0.17)	0.40 (0.17)	0.40 (0.17)	22
澳大利亚 (1006)	-0.51 0.40 (0.17)	-0.66 0.48 (0.17)	-0.44 (0.17)	0.35 (0.17)	0.45 (0.17)	-0.70 0.50 (0.16)	0.50 (0.16)	0.50 (0.16)	-1
英国 (1051)	-0.72 0.51 (0.22)	-0.96 0.62 (0.22)	-0.59 (0.20)	0.44 (0.21)	0.50 (0.21)	-1.02 0.64 (0.21)	0.64 (0.21)	0.64 (0.21)	19
加拿大 (1424)	-0.84 0.57 (0.17)	-0.80 0.55 (0.18)	-0.77 (0.16)	0.54 (0.18)	0.58 (0.18)	-0.93 0.61 (0.17)	0.61 (0.17)	0.61 (0.17)	12
瑞典 (985)	-0.85 0.57 (0.24)	-1.24 0.71 (0.29)	-0.98 (0.21)	0.62 (0.27)	0.79 (0.27)	-1.51 0.78 (0.27)	0.78 (0.27)	0.78 (0.27)	1
挪威 (1415)	-0.95 0.61 (0.18)	-1.53 0.78 (0.25)	-1.44 (0.18)	0.76 (0.22)	0.82 (0.22)	-1.68 0.81 (0.22)	0.81 (0.22)	0.81 (0.22)	5
日本 (426)	-2.12 0.88 (0.52)	-2.51 0.92 (0.52)	-3.29 (0.53)	0.96 (0.76)	0.98 (0.76)	-3.65 0.97 (0.75)	0.97 (0.75)	0.97 (0.75)	-1

a.构成变量是工业、国家、职业、兼职情况、教育和年龄（只包括所有国家都有的变量）。

b.这里的样本数来自于总体权力模型。其他模型里的样本数可能会略有不同。

c.模型 2 中性别影响的对数系数： $\text{Log}[\text{Pr}(A=1)/\text{Pr}(A=0)] = a + B_1 \text{女性} + \sum B_i X_i$ 。

d.累积对数（顺序对数）的系数。

e.已定的差距的百分比 = (模型 1 中的差距 - 模型 2 中的差距) ÷ (模型 1 中的差距)

已排序国家在权力总量量度上差异的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总权力两分（不同国家之间对数差异的 p 值）

美国[0.54]澳大利亚[0.71]英国[0.55]加拿大[0.04]瑞典[0.65]挪威[0.01]日本

权力总量量表（不同国家之间累积对数差异的 p 值）

(0.005)

美国[0.82]澳大利亚[0.22]英国[0.87]加拿大[0.09]瑞典[0.59]挪威[0.03]日本

解释：国家按权力性别差距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括号里的数字表示相关方程中各个国家间性别系数差异的 p 值。当 p 值未达到 0.05 以下对排序中相邻国家的限时时，系数在 0.05 显著水平上不同的两个最近国家被列在国家一列中的最上端或最下端。无论何时，显著水平都与非序保持内在的一致。

通过下列互动模型检验这一假设:

$$\text{Log} [\text{Pr} (A=1) / \text{Pr} (A=0)] = a + B_1 \text{女性} + B_2 \text{已婚} + B_3 \text{孩子} + B_4 [\text{丈夫所做家务}] + B_5 [\text{女性} \times \text{已婚}] + B_6 [\text{女性} \times \text{孩子}] + B_7 [\text{女性} \times \text{丈夫所做家务}] + \sum i B_i X_i \quad (3)$$

式中  $X_i$  指模型 (2) 里所有国家中都能得到的构成变量。如果自我选择是决定权力性别差距的一个有利因素, 那么这个方程中的互动项会有统计学意义。

表 12.5 用总权力两分作为因变量, 列出了模型 (3) 的互动系数。<sup>24</sup> 结果表明, 在美国、瑞典和澳大利亚, 没有一个互动在模型 (3) 里有意义。但是在挪威和加拿大, 女性与丈夫所做家务的互动有意义, 在加拿大, 女性  $\times$  已婚的互动结果接近 0.05 显著水平, 当女性  $\times$  孩子互动结果下降时, 这一互动就有了统计学上的意义。<sup>25</sup> 这两个国家里, 随着丈夫所做家务的比例上升, 已婚妇女拥有工作场所权力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但是, 只有在加拿大, 这个互动项才对权力性别差距产生较大影响。正如表 12.5 所指出的那样, 比较瑞典和挪威, 家庭相对平等 (丈夫做了 40% 的家务) 的已婚、无孩子的妇女来说, 权力性别差距是 0.23, 而家庭相对不平等 (丈夫只做了 10% 的家务) 的已婚、有孩子的妇女来说, 差距是 0.82。我不能解释为什么加拿大的模式与其他国家如此不同。因此, 对于加拿大, 这些互动与自我选择假设相一致, 即当女性的家庭责任大时, 她们就常常把自己排除在竞争权力职位之外。<sup>26</sup> 但是, 对本研究里的其他国家又没有或很少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自我选择假设。

## 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

至今我们只讨论了男性和女性在拥有权力方面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总量。我们用两种方法来考察权力总量。第一，我们用10级权力量表作因变量，估计模式(2)的累积对数；第二，我们来查看男性和女性在有一定权力的条件下的权力总量。第二种分析方法能用来验证玻璃天花板假设。

表12.3和12.4已经表明，用累积对数来度量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模式通常与两分权力变量的结果很近似。以前的分析也表明，加入构成控制变量对性别差距至多有微小的影响。而且，国家在权力总量的性别差距上的排序，几乎跟拥有权力率的排序一模一样。

评价玻璃天花板假设的方法涉及限制对权力等级中被访者的分析，然后检验这个分样本中权力的性别差距。为此，我们用权力等级里的正式地位变量作标准来限制样本：所有说自己至少是个监督者的人都被认为是处在权力等级中。在这个有限样本的基础上，我们又转向模型(2)的三个因变量：约束性权力；正式等级中的中级经理或更高位置；权力总量量表。<sup>27</sup>结果见表12.6。

表12.6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鲜明差异。在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中当我们把样本限制于处在权力等级的人时，约束权、等级地位和权力总量三者中的性别差距仍旧很大，并具有统计意义。<sup>28</sup>相反地，在美国，三个变量中的性别差距都失去了统计意义。<sup>29</sup>这不是因为性别系数的标准误差在美国变大了(它是所有国家中最小的)，而是因为性别差距系数的绝对值相对变小了。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在美国处于

表 12.5 验证“自我选择”假设:在包括婚姻状况和丈夫所做家务之间的互动模型里,对女性较之男性获得权力机会的分析

	对数系数 <sup>a</sup>		自我选择指标值的权力的性别差距 <sup>b</sup>				
	女性 × 已婚	女性 × 孩子	女性 × 丈夫 所做家务	未婚(自我选 择压力小)	已婚,家庭相对平等, 无孩(自我选择压力 中等)。	已婚,家庭相对不 平等,有孩(自我 选择压力最大)。	
美国	b (s.e.)	-0.46 (0.27)	0.21 (0.43)	0.009 (0.010)	0.37	0.33	0.38
澳大利亚	b (s.e.)	-0.31 (0.29)	-0.21 (0.49)	-0.01 (0.35)	0.27	0.49	0.44
加拿大	b (s.e.)	-0.13 (0.36)	-0.94 (0.52)	-0.49 (0.38)	0.13	0.23	0.82
瑞典	b (s.e.)	-1.61* (0.54)	-0.36 (0.84)	-0.18 (0.58)	0.80	0.80	0.82
挪威	b (s.e.)	-1.42* (0.52)	-0.84 (0.71)	-0.22 (0.47)	0.76	0.71	0.89

显著水平: \* $p < 0.05$

- a. 对数系数来自于包含预测总权力两分的构成变量的模型:  $\text{Log}[\text{Pr}(A=1) / (\text{Pr}A=0)] = a + B_1 \text{女性} + B_2 \text{已婚} + B_3 \text{孩子} + B_4 \text{丈夫所做家务} + B_5 \text{女性} \times \text{已婚} + B_6 \text{女性} \times \text{孩子} + B_7 \text{女性} \times \text{丈夫所做家务} + \sum_i B_i X_i$ ,  $X_i$  是工业、国家、职业、半职、教育和年龄。
- b. 性别差距  $= 1 - \text{Exp}$ 。这个差距可由互动变量的特定值计算出。例如, 美国已婚(已婚=1)有孩(有孩=1)不平等家庭(丈夫所做家务=10)中的性别差距  $= 1 - \text{Exp}[-0.46] + (-0.32) + 0.21 = 0.009 \times 10 = 1 - \text{Exp}(0.48) = 1 - 0.62 = 0.38$ 。
- c. 平等家庭定义为丈夫做 40% 家务的家庭。
- d. 不平等家庭定义为丈夫做 10% 家务的家庭。

表 12.6 检验玻璃天花板假设：在七个国家里，女性相对男性拥有不同工作权力机会的对数回归分析（样本限制在正式权力等级中）

国家	带有控制变量的模型 2 <sup>a</sup>					
	约束权		正式等级中处于中 级经理或更高职位		权力总量 (0-9级) <sup>b</sup>	
样本数 <sup>c</sup>	b (s.e.)	性别差距 1-Exp (b)	b (s.e.)	性别差距 1-Exp (b)	b (s.e.)	性别差距 1-Exp (b)
美国 (373)	-0.08 (0.27)	0.08	-0.36 (0.28)	0.30	-0.28 (0.23)	0.24
澳大利亚 (414)	-0.65 (0.25)	0.48	-0.55 (0.27)	0.42	-0.64 (0.21)	0.47
英国 (332)	-0.80 (0.31)	0.55	-1.08 (0.39)	0.66	-1.03 (0.27)	0.64
加拿大 (398)	-0.44 (0.26)	0.35	-0.71 (0.29)	0.51	-0.72 (0.23)	0.51
瑞典 (248)	-0.61 (0.36)	0.46	-0.91 (0.43)	0.60	-0.91 (0.32)	0.60
挪威 (376)	-0.93 (0.35)	0.61	-0.98 (0.38)	0.63	-1.06 (0.23)	0.65
日本 (125)	-2.37 (1.26)	0.91	n.a. <sup>d</sup>	1.0	-1.21 (1.05)	0.70

a. 模型 2 里性别影响的对数系数:  $\text{Log}[\text{Pr}(A=1) / \text{Pr}(A=0)] = a + B_1 \text{女性} + \sum_i B_i X_i$ 。所包含的控制变量有: 工业、国家职业、半职、教育和年龄 (只包括所有国家中都有的变量)。

b. 对应着模型 2 的累积对数 (顺序对数) 模型的系数。

c. 这里的样本数来自于约束权力模型。其他模型里的样本数可能会略有不同。

d. 在日本样本里, 没有女性居于中级经理职位或更高职位。因此, 这些模型在日本无法计算, 但是我们假定女性相对男性而言拥有工作权力的机会接近于零。



权力等级的人中，约束权方面的净性别差距大约是 0.08（即控制了方程中其他变量后，权力等级中的女性拥有约束性权力的机会大约比男性少 8%），而中级经理中的性别差距只有 0.30，权力总量中的性别差距经过累积对数的度量后是 0.24。在其他国家，权力等级人群中的性别权力差距通常都是 0.50 或更高。<sup>30</sup>

这些结果对“玻璃天花板假设”有何意义？玻璃天花板假设认为，女性相对男性，在权力等级内部升迁所面临的障碍通常比她们进入权力等级所面临的障碍要大得多。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那么权力性别差距在权力等级内部（表 12.6）比在整个劳动力中（表 12.5）要大。除了两个例外，这些表中的系数与这个假设并不一致。对约束权和权力总量量表来说，每个国家里权力等级内部的性别系数与样本总体的性别系数或者一样或者小一些。符合玻璃天花板假设设想的惟一一例是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的正式职位变量。<sup>31</sup> 所以，在只有有限例外的情况下，这些结果并不能支持玻璃天花板假设。尤其是在美国，并未出现一旦女性进入权力等级，她相对男性而言所面临的升迁进入中级权力的障碍就比她最初进入权力等级面临的障碍大这一现象。

有必要强调，这些结论并不说明对已经身处权力等级的人来说，升迁中不存在性别歧视。确实，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里，对已经身处权力等级的人来说，权力的性别差距都具有统计意义，在更大的样本里，美国数据中的差距也几乎肯定有统计意义。但是，玻璃天花板假设并不仅仅是认为权力等级内部存在歧视；它认为随着个人的权力等级的提高，这种歧视会增加，但是我们的比较数据并不能支持这一观点。当然，这些数据也不能证明在大公司最高权力等级上是否存在着重要的玻璃天花板。在这种随机样本里，我们没有关于大公司首席执行官

或高级执行人员的足够数据去验证在高级权力等级上是否存在着重大的障碍。<sup>32</sup> 然而，虽然在身处权力等级的人群中，各级权力的性别差距可能在美国并不存在，但是，我们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权力性别差距比本研究中其他国家的都小，而且，至少在组织等级的中层方面，性别差距不能描述为构成了一个玻璃天花板。

表 12.7 按照权力的性别差距和其他相关变量  
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国家排列顺序

拥有权力的净性别差距 (模型 2)		性别态度 <sup>c</sup>		法律性别平等 <sup>d</sup>	
国家的排列顺序 <sup>a</sup>	性别差距 <sup>b</sup>	国家的排列顺序	平均值	国家的排列顺序	平均值
美国	0.36	瑞典	1.77	挪威	1.83
澳大利亚	0.45	挪威	1.82	瑞典	1.17
英国	0.50	加拿大	2.01	美国	1.17
加拿大	0.58	澳大利亚	2.05	加拿大	-0.48
瑞典	0.79	美国	2.17	英国	-0.48
挪威	0.82	日本	2.43	澳大利亚	-1.02
日本	0.98			日本	-1.02

性别收入差距 <sup>e</sup>		职业性别隔离 (差异性的指数) <sup>f</sup>	
国家的排列顺序	女性小时收入是男性的百分比	国家的排列顺序	意义值
瑞典	91.0	日本	22.2
挪威	81.9	澳大利亚	31.9
澳大利亚	81.7	美国	36.6
英国	74.0	加拿大	41.0
加拿大	66.0	瑞典	41.8
美国	65.0	英国	44.4
日本	51.8	挪威	47.2

续表

职业性别隔离 (“性别隔离的比率指数”) <sup>a</sup>		官方经理职位中的劳动力比例 <sup>b</sup>	
国家的排列顺序	平均值	国家的排列顺序	劳动力比例 (%)
美国	0.65	澳大利亚	15.8
日本	0.72	美国	13.7
加拿大	0.75	加拿大	12.2
英国	0.92	英国	12.2
澳大利亚	0.95	瑞典	10.9
瑞典	0.96	挪威	10.4
挪威	0.99	日本	5.9

- a. 正如图 12.1 所指出的, 国家的排列顺序其实跟总体性别差距和净性别差距一致 (模型 1 和模型 2)。
- b. 工作场所权力的性别差距定义为  $1 - \text{Exp}(b)$ , 这里  $b$  是模型 2 里预测总权力两分对数回归的性别系数。
- c. 这是建立在三个有关性别角色态度的里克特 (Likert) 型问题基础之上的一个简单指数。分数值越低越平等。分数值在 1 到 4 之间变化。英国样本中没有这一变量。
- d. 这是女性 3 项法律赋予的权力的简单因素分析量表: 堕胎权, 至少 12 周带薪产假, 婚内强奸也是犯罪。见查尔斯 (1992:491-492)。
- e. 来源。瑞典, 挪威,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国家工资平等委员会, “减少工资差距: 一个国际展望” (华盛顿: 国家工资平等委员会, 1988), 第 10~14 页; 日本: 劳动统计年鉴 (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第 51 版, 1992), 第 798~804 页。每个国家的定义有所不同: 澳大利亚 (1985), 全职, 周平均收入; 加拿大 (1986), 没有具体说明; 日本 (1984), 月平均收入; 挪威 (1980), 制造业中小时平均收入; 瑞典 (1985), 月平均收入, 工业; 英国 (1985), 小时平均收入; 美国 (1987), 中等年收入。
- f. 布劳和弗伯尔 (1990)。
- g. 查尔斯 (1992:489)。
- h. 这定义为处在正式等级变量中 “经理层职位” (而不是监督者职位) 的人们的变量。

## 解释跨国变化

对不同国家间工作场所权力的性别差距的不同，我们已经检验并否定了—个可能的解释。这些差异不能归于模型(2)所含的各种构成因素的差异。我们已经指出(见图12.1)，国家之间差异的基本模式对我们检验过的每一个权力量度来讲，在模型(1)和模型(2)里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将不太正式地探讨一些可能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性别差距变化的宏观社会和文化因素。结果见表12.7。

1. 性别观念。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项目包含一些有限的关于性别平等的态度项。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完全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还是完全不同意下列每一种说法：

1. 在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职位上，理想的是女性和男性应当—样多。

2. 如果夫妻双方都工作，那么他们应当平等分配家务劳动和看孩子的工作。

3. 如果丈夫出外工作、是主要养家者，而妻子主要负责家务和看孩子，那么这对家庭比较好。

重新安排第3项使对它的平等性回答跟其他两个问题的处于同一方向，接着对每一项进行回答，并平均其有效值，这样就建立起—个性别—观念量表。每个量表范围从1到4，1代表着对性别角色—贯持有很平等的态度，4代表着—贯持有很保守的态度。

从表12.7第2栏可以看出，在性别平等观念的程度上国家的排列顺序与工作场所权力性别差距的排列顺序一点也不—致。

瑞典和挪威在观念上最平等，但权力性别差距却最大；美国在观念上的不平等上仅次于日本，但它的权力性别差距却最小。所以，这些社会里性别平等观念的总体程度看上去与工作场所的权力性别差距的相对程度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2. 性权利和生育权。玛丽亚·查尔斯(1992)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律保障性别平等的指数，这个指数的基础是一项主要成分分析和三个虚拟变量的单一因素解释：(1)必要的堕胎权；(2)婚内强奸是犯罪；(3)保证妇女至少有12周带薪产假。量表的值在1.83~1.02之间，正值意味着更多的权利。从表12.7第3栏可以看出，7个国家里这个变量的排列顺序跟性别观念和拥有权利中净性别差距的排列顺序都不一样。

3. 性别收入差距。虽然看上去性别平等观念的跨国变化跟性别—权力差距的变动联系并不紧密，但是性别—权力差距与工作中性别平等范围更广的制度安排仍然会有联系。收入中的性别差距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指标。但是，与这种设想相反，表12.7的数据表明，在小时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别的程度和权力性别差距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日本和美国的收入上的性别差距都相对较大，但美国权力上的性别差距较小而日本的性别差异最大；瑞典和挪威在收入性别差异上都相对比较平等，但它们的权力上的性别差距都相对较大。<sup>33</sup>

4. 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方面性别差距的情况一样，认为国家在职业性别隔离上的排列顺序应当大致反映了权力性别差距的看法也不能得到现有数据的证实。以职业性别隔离的两个比较研究的数据为基础，布劳和弗伯尔(1990)和查尔斯(1992)认为，7个国家内总体职业性别隔离的排序与权力性别差距的排序并不完全一致。<sup>34</sup>表12.7第5栏和第6栏里，日本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最低，而根据所用性别隔离的程度，联合王国和澳大

利亚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最高。虽然在职业性别隔离的更加详细的分析中，这个排序有可能会变化，但是布林顿和吴（杭月）（1991）已经指出，在89种职业分类里，美国比日本的差距指数都要高（55.6比49.8）。<sup>35</sup>所以，更详细的分析似乎也不可能支持这种观点，即不同国家之间性别—权力差距的变化仅仅是反映了更广范围内性别和职业之间关系过程的变化。

5. 拥有权力的劳动力比例。表12.7第7栏指出了我们样本里的管理位置占劳动力的比例（通过正式等级变量来度量）的国家排列顺序。结果表明，管理类别规模的排序近似地反映了权力性别差距的排序：四个说英语的国家里管理位置占劳动力的比例最大，接下来是两个北欧国家，而日本的数字最小。<sup>36</sup>所以，管理职位在社会中的总体比例看起来影响了权力分配中性别差距的程度。

6. 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和政治文化。我不知道有任何比较研究曾系统地评估过不同国家里妇女运动的组织和政治力量，或者它的思想观念立场的细节。所以，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将不得不保持在一个相对印象的水平上。

在妇女运动的政治影响力量方面，有一个现象似乎特别清楚：日本的妇女运动比其他国家都弱。虽然看上去美国有政治组织的女性运动是最强大的，但是如何断定其余六个国家里女性运动的相对影响力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凯曾斯顿（1987:12）写道：“美国的主流女权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是本栏”<sup>37</sup>讨论的所有运动中惟一一个有群众基础的、由有酬的、职业阶层来操纵的全国性组织。西欧没有哪一个国家有类似于全国妇女组织（NOW）这样的全国性组织”。她进一步指出，在瑞典，女权主义意识在人口中高度传播（相对地，她认为不列颠不那么发达），而且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府的社会政策有重大影

响，“在瑞典，赢得政策成功以（女性运动的）组织弱小为代价”（卡岑施泰因，1987：16）。这种瑞典女权运动相对较少组织的看法也得到了玛丽·鲁吉（1988：187）的呼应，她写道：“瑞典女性本身并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求改变现状，无论是以独立组织的形式还是以工作场所组织的形式。”虽然这些证据只是印象性的，但似乎可以说政治上有组织的女权运动在日本最弱、在美国最强，其他国家则处在这两极之间。

断定不同女性运动的观念取向多少相对容易一些，至少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女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她们所处社会的更广范围的政治文化。埃斯平-安德森（1990）把资本主义民主按福利国家的各种思想准则特征来分类。这在表 12.8 中有体现。把日本从这些排序中排除出去，这些政治排序与性别差距排序十分类似。尤其是四个说英语国家在埃斯平-安德森所说的“非商品化”（即减少工人对市场依赖的福利国家政策）方面得分低，而在政体的自由主义程度方面得分高，但是挪威和瑞典在非商品化上得分高，而在自由主义程度上得分极低。

这跟权力职位的性别差距问题又有什么关系？自由主义学说认为只要市场是“公平的”，它就是福利分配的合法和有效的手段。因此，排除那些限制个人在劳动竞争和雇佣关系成功的内在障碍就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的中心目标。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推动的女权运动因而会特别关注平等权利和这些权力障碍的限制。与这个设想一致，戈德堡和克雷曼（1990，28~30）已经强调过美国通过的反歧视法的相对完备形式和相对有效性，至少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是这样。

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无视机会的平等，质疑市场决定的不平等的合法性，并寻找至少能部分地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其他途径以增加人类福利。处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之中的女性运

动可以被认为很少关注劳动市场途径这类问题，更多地关注国家直接提供服务和资源以提高女性福利待遇的干预行动。因此政治动议会围绕父母假、母亲健康护理、看孩子服务和幼儿补助这些问题。正如许多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的评论家所强调的那样（戈德堡和尤勒曼，1990:141~144；摩恩，1989），女性当然可以从许多这种政策中受益，但是这些优待并不能直接影响工作场所里晋升权力职位的障碍。在评论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对比的时候，南希·弗雷泽（1983）认为前者采取了强调工作权的“普遍养家人”性别平等模型，而后者采取了“照顾者同等”模型、强调服务和资源的提供使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生活条件平等。所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里，工作场所权力的性别差距相对较大，可能部分地是相对更多社团利益，较少优先考虑个人竞争和成功的自由主义目标这一做法的一个后果。

这些说法都表明，国家之间在工作场所权力性别差距程度上的跨国变化是，一方面权力职位相对稀少或丰富，与另一方面挑战女性升入这些职位的障碍的政治上有组织的女权运动的能力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管理职位相对较少因而女权运动很薄弱的国家，如日本，权力的性别差距将会很大。在管理职位比较多而女性运动目标在集体利益和非商品化的社会供应上的国家，性别差距仍相对较大。在就业结构中管理位置相当多，并且女权运动比较强大以及运动具有自由个人主义目标的社会中，对性别差距的挑战是最有效的。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还很粗浅，特别是因为我们没有管理职位比例高而女权运动薄弱的国家作为个案，或者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而管理职位相对较少的国家的个案。需要用这样的个案来梳理这两个因素相对重要性和它们互动关系的性质。在有信心肯定这些



解释前，还需要对女性斗争的影响和权力性别差距在一国内和不同国家之间长期变化的过程进行更多的研究。

表 12.8 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机构从自由 / 商品化到社会主义的 / 非商品化制度的排列顺序

福利国家里“非商品化”的程度 <sup>a</sup>		政体特征中自由主义的程度 <sup>b</sup>		政体特征中社会主义的程度	
排列顺序	分值	排列顺序	分值	排列顺序	分值
澳大利亚	13.0	美国	12	美国	0
美国	13.8	加拿大	12	日本	2
加拿大	22.0	澳大利亚	10	澳大利亚	4
英国	23.4	日本	10	英国	4
日本	27.1	英国	6	加拿大	4
挪威	38.3	挪威	0	挪威	8
瑞典	39.1	瑞典	0	瑞典	8

a. 根据埃斯平 - 安德森 (1990:52)。这个分值表示了福利国家通过它的福利政策使市场影响中立的程度。

b. 根据埃斯平 - 安德森 (1990:74)。分值指数表示了福利国家的干预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的程度。社会主义的分值指数表示了国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干预的程度。因为在埃斯平 - 安德森的分析里还有第三种政体：“经典保守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排列顺序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排列顺序的相反结果。

## 12.4 结 论

本章考察了几个国家中工作场所权力的性别不平等，并且对男性和女性获得权力中一直存在的性别差异的几个竞争性解释进行了经验评估。我们直接检验了三套广义的非歧视因素的影响——职业抱负中的性别差异（自我选择）、个人特征的性别

差异、工作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并间接检验了积极歧视对权力中性别差距的影响。最后，我们考察了男性和女性拥有权力程度的跨国差异，以及影响获得工作场所权力的因素的跨国差异。

本研究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虽然在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里都存在着权力性别差距现象，但是这种差距程度有很大的跨国变化：它在说英语的国家相对较小，尤其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差距程度最小，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对较大，在日本是巨大的。用各种方法来度量，这些结果看上去都很有力。日本的结论可能是最不奇怪的，但是英语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瑞典和挪威都有推行旨在取得性别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很长历史，在许多指标上，重要的在收入性别差距、税收政策、看护孩子项目政策和福利权利方面，它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成绩。但是，我们的数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获得工作场所权力方面的性别不平等远远落后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联合王国这些不太“进步”的国家。这些结果因而对减少工作场所性别不平等的最有效方法提出了严重的怀疑。虽然对性别平等和社会供给非商品化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但是这似乎要与其他行动结合起来，特别是与一个直接面对女性在劳动市场和工作环境中所碰到的障碍的强有力的、政治上有组织的女权运动结合起来。

第二，一国之内权力的性别差距和跨国变化的模式似乎并不是劳动力中男性和女性构成因素的重要结果。即使当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公司、职业和个人特征，每个国家内的差距和跨国差距的基本模式仍然存在。这说明，男性和女性获得权力中的差距相当大一部分要归于歧视。虽然看上去一些国家中（尤其

是加拿大)权力的某些性别差距可归于女性自我选择的原因,但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并不支持这是权力性别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并且在我们所研究的大多数国家里,它的重要性看上去相对小些。在我们所研究的国家里,许多工作场所权力的性别差距因而可以暂时归因于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升迁中的歧视。

第三,玻璃天花板假设(至少在我们能验证相对弱的形式中)在我们研究的大多数国家内未得到证实。虽然当我们把分析限制在已经身处权力等级中的人时权力的性别差距持续存在,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比最初获得权力的差距更大。通常认为女性运动比较成功地女性打开了组织等级的底层职位、而在使女性沿公司阶梯向上移动不那么成功的观点得不到这些数据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就关于这个问题上的国家差异而言,在美国,已经身处权力等级中的女性被提升的可能性似乎比其他国家中要明显少很多障碍。虽然在许多其他方面,美国远不是平等政策的领头羊,但是在工作场所权力等级中的性别问题上,美国相对大多数其他国家又取得了很大进步。

最后,我们试验性地检验了下列数据,即说明国家之间性别差距的变化可能是权力职位相对丰富和挑战女性进入这些职位时所面对的障碍的不同女性运动的有效性之间互动的结果。因而,在解释工作场所权力性别不平等变化时政治和经济因素似乎很重要,而与性别观念有比较特定关联的文化变化似乎不那么重要。

## 方法附录

### 对数模型中所用的变量

本章所用变量的操作标准在本章附录表 12.1 中列出。需要阐释一下表中一些变量。

正式权力等级位置。权力最简单的量度是权力等级中的正式位置，其中，受访者把自己归入非管理层、监督者、低级经理、中级经理、高级经理或总经理地位。这些不同“层次”的含义因公司规模大小和划分不同职位的常用标准而不同，所以，在大多数分析里，我们不把这个变量作为权力等级位置的连续度量。而是把正式位置变量定义为两分，如果一个人在正式权力等级中至少是个监督者，那么其值为 1，如果一个人处于非管理层位置，那么其值为 0。在分析中，有时另一些更具限定性的变量在这些项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

约束权。这个变量指个人对下属施加各种约束影响——正面奖励或惩罚——的能力。如果受访者说他们对下属的三种约束形式的任何一种——给下属涨工资或提升，因为工作不力或表现不佳而不给下属涨工资或提升，辞退或暂时推迟雇佣下属——都有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受访者就被认为有约束权。在美国样本里，自认为在工作中监管他人的受访者中刚刚超过 37% 的人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约束权。如果受访者有约束权力，那么约束权变量值为 1，如果没有约束权力，那么变量值为 0。

决策权。这一变量关注的是受访者直接参与公司政策决策的问题。对直接参与制定下列六种决策中的任何一种的受访者来说，决策者变量值为 1。对那些对这些决策仅提供建议或完全

未参与的受访者来说，变量值为0：决定增加或减少你所在公司的雇员总数的政策，决定极大地改变公司提供的产品、工程或服务的政策，决定改变公司里主要部门的基本工作方式或工作程序的政策；决定你所在公司的预算规模或分配的政策。

约束权和决策权在以上的正式权力等级问题中并不一样。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拥有约束标准和决策标准赋予的权力，但是他又不在于“正式的”权力等级，或者一个人处于正式权力等级里却又没有约束权或决策权。附录表 12.2 列表显示了七个国家样本中与约束权变量和决策权变量有关的正式权力等级位置变量。

权力一两分构成的变量。如果受访者在这个变量的三个维度的任何两个上值都是1，那么这个值就是1，否则就是0。实际上，它把权力的三个单独方面当做实际权力的多个指标，并区分了那些我们确定拥有权力的人和那些几乎没有权力的人。

权力总量量表。这个变量试着探讨在受访者所控制的权力“总量”变动。权力观点变化程度很复杂，因为它意味着所谓拥有高、中、低“级”权力的意思主要依靠不同组织环境中的内容来说明。例如，一个人进行的决策数量多少，并不是他拥有多大权力的好指标，因为某些决策在不同组织里重要程度不同，而且经理中的劳动分工可以受到类似组织规模这样的因素的极大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里，与权力程度密切联系的量度是正式权力等级位置，因为在一个权力等级中，当个人从底层升迁到高层时，发号施令的能力也会逐渐增加。当然，我们并不太清楚一家公司里的“上层经理”是否比另一家公司的中级经理拥有更多或更少的权力，因为这要根据两家公司的规模大小和内部构成这些因素来决定。一家小公司的高级经理比通用汽车公司的中级

经理有更多还是更少的权力？这种确定公司之间职权的等价的困难一定会给度量带来误差，因为可以想象，我们样本里，自认为是“高级”或“上层”经理的那些人比起自认为是中级或低级经理的人来说，更有可能在小公司里工作。但是，这是个

附录表 12.1 分析中所使用的变量

I. 两分权力变量			
变量	定义		
1. 约束权	对下属的工资、升职、或处分有直接影响(肯定或否定)		
2. 决策权	直接参与工作场所的决策(不仅是提意见)		
3. 正式位置	在工作场所的正式权力等级结构中有一个位置: 监督者, 低级经理, 中级经理, 高级经理或总经理		
4. 总体权力两分	对以上三个指标中的任何两个给出肯定的回答		
II. 权力总量量表			
权力性总量量表	总体权力的两分变量	约束权	正式等级中的位置
0	没有		
1	有	有	0= 非经理层
2	有	没有	1= 监督者
3	有	有	1= 监督者
4	有	没有	2= 低级经理
5	有	有	2= 低级经理
6	有	没有	3= 中级经理
7	有	有	3= 中级经理
8	有	没有	4,5= 高级或总经理
9	有	有	4,5= 高级或总经理
III. 控制变量			
1. 公司特征			
1.1 工业	虚拟变量以常见的制造部门、加工部门(制造业、交通业、消费业)和服务部门方式区分。对照分类是加工部门		无

续表

1.2 国家	虚拟变量区分为公共和私人雇主 (1= 私人)。	无
1.3 公司规模	连续变量度量受访者对于所处公司里雇员数量的估计 (只用于私人雇主)	澳大利亚
2. 职业特征		
2.1 职位	四个虚拟变量来测量职位差异: 上层白领, 下层白领, 上层工人, 下层工人职位。对照分类是低级工人	无
2.2 全职	虚拟变量, 1= 每周至少工作用 30 小时, 0= 少于 30 小时	无
3. 个人特征		
3.1 教育	受了多少年教育	无
3.2 年龄	实足年龄	无
3.3 劳动中断情况	虚拟变量, 0= 曾有过劳动中断的情况, 1= 在完成教育后从第一份全职工作起就一直参加工作	澳大利亚 日本, 瑞典
3.4 工龄	在现在的雇主手下工作了多少年	瑞典, 英国
4. 家庭特征		
4.1 孩子	虚拟变量, 1= 孩子仍待在家里与父母同住, 0= 家中现没有孩子同住。	无
4.2 婚否	虚拟变量, 1= 已婚, 0= 未婚	无
4.3 家务劳动	根据受访者关于丈夫所做每项家务总时间的百分比的说法, 来测量丈夫在五项家务劳动里做了多少 (见第十一章有关段落)	日本, 英国

附录表 12.2 七个国家里的男性与女性中, 权力等级中的正式位置、施加约束的能力和参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拥有约束权的百分比 正式等级里的位置	拥有决策权的百分比		在每一等级上的百分比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b>美国</b>						
总经理	84.3	68.9	90.4	63.4	4.4	3.4
上层经理	85.0	[69.6]	72.8	[56.1]	5.8	1.9
中级经理	71.3	80.0	60.0	43.4	7.7	4.1
低级经理	59.2	40.9	33.2	[41.2]	3.8	2.8
监督者	64.4	59.1	28.9	20.4	21.8	15.3
非经理层雇员	9.5	6.1	8.5	6.4	56.7	72.5
样本数	622	539	618	537	639	535
<b>瑞典</b>						
总经理	[70.0]	[50.0]	[62.5]	[50.0]	1.9	1.0
高级经理	[75.0]	-	[83.3]	-	2.3	0.0
中级经理	66.7	[85.7]	72.4	[66.7]	6.2	1.7
低级经理	[36.0]	[36.4]	38.5	[57.1]	4.9	2.6
监督者	40.0	15.2	38.2	9.1	18.8	11.1
非经理层雇员	0.9	0.03	5.1	8.2	65.9	83.7
样本数	519	410	497	390	531	416
<b>挪威</b>						
总经理	56.1	[40.0]	75.6	[40.0]	5.0	0.9
高级经理	81.0	[00.0]	75.0	[40.0]	5.5	0.9
中级经理	56.1	[66.7]	42.9	[66.7]	5.1	0.5
低级经理	[66.7]	[00.0]	[50.0]	[00.0]	0.5	0.2
监督者	50.5	25.5	42.6	40.4	23.4	8.3
非经理层雇员	2.4	1.6	10.7	9.5	60.6	89.3
样本数	807	572	817	577	822	581
<b>加拿大</b>						
总经理	86.2	[83.3]	96.6	[66.7]	3.7	0.9
高级经理	85.4	[66.7]	87.2	[80.0]	5.2	0.9
中级经理	71.4	[42.1]	61.0	[42.1]	5.4	3.0



续表

低级经理	[44.4]	[30.8]	[44.4]	[30.8]	2.3	2.0
监督者	50.7	44.7	37.2	30.3	18.9	11.9
非经理层雇员	4.5	1.9	10.7	9.2	64.6	81.2
样本数	785	639	782	638	785	639
<b>英国</b>						
总经理	95.7	[75.0]	82.6	[75.0]	3.9	0.9
高级经理	[100.0]	[00.0]	[71.4]	[00.0]	1.2	0.2
中级经理	88.2	[75.0]	62.7	[85.7]	8.6	1.8
低级经理	79.3	[60.0]	55.2	[60.0]	4.9	1.1
监督者	55.0	42.9	30.8	31.0	20.2	18.4
非经理层雇员	[0.8]	0.6	9.1	4.8	61.3	77.6
样本数	594	456	592	456	594	456
<b>澳大利亚</b>						
总经理	86.7	[87.5]	92.9	[100.0]	3.0	1.9
高级经理	86.2	[66.7]	96.4	[88.9]	5.9	2.1
中级经理	81.4	[58.8]	79.1	[64.7]	8.7	4.1
低级经理	[58.3]	[27.3]	[75.0]	[54.5]	2.4	2.6
监督者	71.1	53.7	48.6	43.0	30.3	29.1
非经理层雇员	4.9	4.4	18.4	21.1	49.6	60.1
样本数	492	418	489	417	492	419
<b>日本</b>						
总经理	[100.0]	-	[100.0]	-	1.2	0.0
高级经理	[81.8]	-	[100.0]	-	4.3	0.0
中级经理	[100.0]	-	[71.4]	-	2.8	0.0
低级经理	[75.0]	-	[75.0]	-	1.6	0.0
监督者	60.6	[16.7]	43.6	[33.3]	37.2	3.5
非经理层雇员	5.2	2.4	6.7	2.4	53.0	96.5
样本数	253	173	253	173	253	173

a.中括号表示本单元计算百分比的样本数少于20。

b.这个国家里的经理层样本中没有女性。

最直接地表示权力职位不同级别的观点的变量，因此权力总量量表更依靠正式等级位置量度而不是其他两个权力维度。在总体权力两分度量中得分为0的被调查者也在权力总量变量上得分为0。被认为在两分度量中有权力的受访者将主要以等级里的正式位置和他们所拥有的约束权为基础，被分为1~9九个值。

控制变量。四组控制变量被用于检验权力性别差异是其他变量中的性别差异的结果这一可能性：公司特征、职业特征、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我们在分析的七个国家里都以相同的方式得到大多数变量，但是正如附录表12.1所指的那样，有几个变量在某些国家里没有。在研究权力性别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些变量来解释时，我们因而分别进行两个分析——一个只包含由现存各个国家的变量，另一个则包含每个国家内的所有变量。因为这两个分析的结果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探讨共同变量分析的系数。

对两个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第一，我们把兼职工作比全职工作作为两分的0/1变量，而不是工作小时数，因此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加班工作时间是做一名经理的后果，而不是成为经理机会的决定因素。兼职/全职的区分因而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看法，即女性中出现的权力低发生率可能是因为在无法升迁的工作环境中比例不当。第二，我们用相对粗糙的四类职业分类以避免使用更精确的分类带来的循环论证问题。职业的较高分散会涉及诸如“管理职业”的分类，而这种分类在概念上与因变量联系太密切以至于在现有分析中不能认为是一个构成控制变量。

## 权力量度的跨国可比性的问题

虽然每一个国家调查里问的问题都一样，但是可能问题的含义在跨文化背景下差别很大。所以，权力性别差距中的跨国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调查表各项中的术语含义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例如，正式等级问题中的“监督者”一项在一些国家可能经常用作尊称并无实权，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它只用于有实权的职位。在美国，很多被正式称为“监督者”的职位可能监督者至多只有对其他工人或工作场所决策的名义权力。如果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得到监督者尊称，那么在监督者作为尊称的国家里，权力性别差距要小于“监督者”称呼使用范围有限的国家。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结果没有受到问题含义不同的影响，但是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在分析中不是一个重大问题。第一，我们所用的权力三个量度中的两个（约束权和决策权）是问受访者他们在自己的职位上实际可以做什么，而不是问他们职位的正式称呼是什么。这些问题能够较少地受含义这类问题的影响。第二，在我们所用的权力综合度量中，一个人至少满足三个权力标准中的两个，这意味着偏差将不得不在同一方向上的两个度量上发生影响，才能产生一个有偏差的综合量度。最后，如果看一下附录表 12.2 中的分布，那么很清楚，性别差距最小的国家不是正式等级称呼的实质内容最少的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相比其他国家，都有较小的性别权力差距，但正式等级变量中居于监督者职位的女性有 50% 多的人说她们有约束权，而在挪威和瑞典——权力性别差距明显更大的国家——这一数字分别只有 25% 和 15%。不管怎样，在

性别权力差距较大的国家中，“监督者”正式称呼似乎都比性别差距小的国家中有更多的掌权意思。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分析中所用的权力量度都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量度在不同国家之间更具可比性，所以这是一套可信的数据，可以用来研究工作场所权力性别模式的跨国变化。

### 样本限制

在整个分析中，我们把国家的样本限制在劳动力中的雇员上，这就排除了自我雇佣者、失业者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人。雇佣了雇员的自我雇佣者——雇主——可以认为在工作场所里拥有权力职位，但是因为围绕雇员中的权力性别差异的因果过程与财产所有中的性别差异明显不同，所以我们把自我雇佣者排除在分析之外。

### 权力总量量表的分析方法

在分析权力总量量表时，我们用累积对数（也叫做顺序对数）回归运算。这比OLS回归要优越，它没有假定因变量不同程度之间间隔相等，它导致了一个在概念上类似于权力一两分变量对数回归的系数的性别系数。J顺序类别的因变量的累积对数被定义为：

$$L_j = \log [(\sum_i P_i) / \sum_i P_{i+1}]$$

式中  $j = 1, \dots, J-1$ ,  $P_j$  是因变量位于  $j$  分类的可能性（艾格雷斯蒂，1990:321）。男性和女性权力的总量的净差异多变量模型也相应地规定为：

$$L_j = a_j + B1 \text{ 女性} + \sum_i B_i X_i \quad (2a)$$

式中  $j = 1, \dots, J - 1$ 。每一个对数值因此都是一个单独截取和一套斜率系数的函数。这样一来，方程 2a 中性别虚拟变量的系数就像是方程 2 里一系列分别计算的对数回归中的性别系数加权平均值，方程 2 中的因变量——这里就是权力总量量表——已经在每一个可能点上被连续两分了。

因为本章中我们只对性别系数有兴趣，所以我们没有展示控制变量的系数，除了这些控制变量系数对解释结果很重要的自我选择分析以外。



## **第四编**

### **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 第十三章

### 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一般研究框架

从不同的方面来讲，大多数阶级分析家认为，阶级分析的核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因果结构，该结构看上去像图 13.1 的图解。当然在这个因果流向中，对于如何精确地把箭头概念化还存在很大分歧。这些箭头是指“决定”或“形成”还是“强行施加限制”？有这样一个明显的道理，即在这一结构中单一的因果流向比未特别说明的“其他原因”“更重要”或“更基础”吗？一个极端是，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能够直接地从阶级结构中概括地解读出阶级斗争的模式，并且，这些模式依次决定历史的基本过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至少人们认为，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同生产力的发展一起)决定社会变迁的轨迹。另一个极端是，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家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结构看做至多是给我们提供划分阶级斗争中的潜在行动者的词汇；然而，阶级结构不一定在决定实际的阶级斗争模式方面比许多其他机制(意识形态、国家、少数民族等)起更重大的作用，并且阶级斗争仅仅是许多产生变化的要素之一。

本章我们将探讨图 13.1 左半部分的成分：“阶级结构→阶

级斗争”。我将提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一个一般模型,这一模型抓住了主要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二者的直觉意识,即阶级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阶级斗争的根本决定因素,但是仍然允许其他因果因素在解释跨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变化时起重大的潜在作用。模型的核心是试图把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微观概念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之间关系的更宏观层次的理解联系起来。

在本章13.1节我们将通过简短描述微观与宏观分析层次的对比,为这个模型定位(set stage for)。在13.2节,我们将讨论将会用到的许多核心概念的定义,尤其是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定义。紧接着在13.3节,将对微观模型、宏观模型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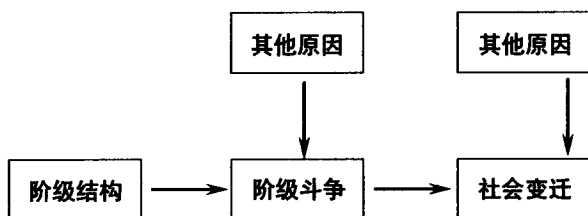


图13.1 阶级分析的简要核心模型

### 13.1 微观与宏观分析层次

社会学常常在微观与宏观分析层次之间进行比较,并且对于这些层次间前后“移动”的必要性已做过了许多研究,但是区别的准确的概念性状态常常是混乱不清的。我将用不同术语标明不同的分析单位,在这些分析单位中,宏观分析层次总是

被理解为相关的微观分析单位的“聚合体”。这种用法的范例是生物学：生物体是相互联结的器官的聚合体；器官是相互联结的细胞的聚合体；细胞是相互联结的细胞结构的聚合体；细胞结构是相互联结的分子的聚合体。当然在这些表述中“是……的聚合体”的表达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任意地集成”，而是“在结构上相互联结的成套的组合”。一个特定的宏观层次总是由有关组成成分的微观单位之间的关系组成的。

说微观单位间的“关系”，我们的意思确切地是指什么呢？这一术语常富于神秘的含意。我将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使用它，以指明微观单位之间任何系统的相互作用模式。因此，关系能够变强，秩序良好以及成体系，这涉及构成成分微观元素间的大量和重复的相互作用；或者关系变弱，和相当杂乱，这涉及那些元素间少量和无规律的相互作用。所以，为了分析任一分析单位，就要调查研究其子单位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后果。

所以，在详细说明任何把微观放入到宏观层次的等级体系的时候，我们需要界定相关的子单位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在表 13.1 和图 13.2 中描绘了一种在社会学里理解分析单位的体系的方式。

社会学的微观分析层次是由研究个人之间关系组成的。在这些关系中个人是构成元素，但是这种关系本身正是微观层次上社会学分析的研究对象。因此，同胞间或老板与雇员间的互动研究都是微观层次的社会现象。

当然，在这些关系中个人也能被看做是“分析单位”，并且他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也能作为研究对象。这类个人内部关系是人类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合适对象。因此，个人作为个人的分析处于社会学（在社会学中，个人是微观关系中的单位）和心理学（在心理学中，个人是宏观层次，在这个宏观层

次里各种关系得到研究)的交叉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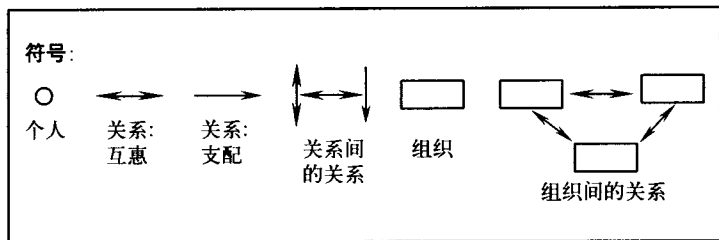
表 13.1 社会分析微观与宏观层次的逻辑

分析层次	成分的子单位	关系的性质	关系的例子
微观社会层次	个人	人际关系	友谊, 生产点 阶级关系
中观社会层次	人际关系	有边界的组织和 网络(人际关系 中的关系)	公司, 家庭, 工会, 学校
宏观社会层次	组织	组织中的关系	国家, 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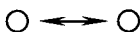
社会分析的中观层次是由调查研究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虽然像社会网络这样的松散单位也将构成中观层次的分析,但这种关系间关系单位的特征即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组织”的东西。于是,宏观分析层次由组织之间关系和其他形式的中观层次单位之间的关系组成。在最宏观的层次上,“世界体系”是由国家之间和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所组成。

当然,以这种方式划分社会学分析单位未免过于形式化和简单化。依个人的理论目的而定,人们可以给这个简单的纲要增加许多中间分析层次。例如,组织可以根据一系列次级组织单位——办公室、分部、部门——之间关系来分析,每一个次级组织又可以依次根据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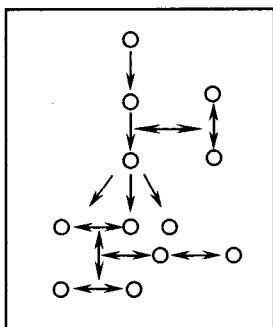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别不应同抽象与具体的区别混淆在一起。虽然微观分析看上去常常比宏观分析更具体——因为它所处理的显然是具体实体——“个人”,但人们能够顺利地发展很抽象的概念以处理微观分析(像通常在理性行动者模型中所做的那样)或发展很具体的概念以处理宏观分析(像在许多机构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所出现的那样)。正如细胞不比生物体更具体一样,个人在本质上也并不比公司或社会更具体。



微观层次



中观层次



宏观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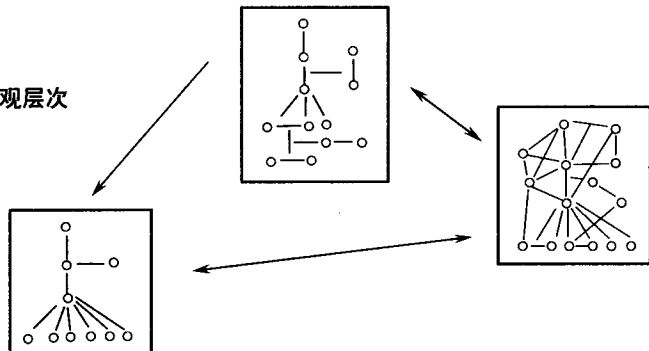


图13.2 微观、中观与宏观分析层次

用阶级分析的术语说，“阶级位置”概念是一个著名的微观层次的概念。个人是占据由阶级结构所限定的阶级位置的单位。<sup>1</sup>“资产阶级位置”和“工人阶级位置”是通过在这些地位中把个人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关系来定义的。所以，阶级位置的微观分析不应被看做是一个对阶级关系分析的替代选择：在关系中，位置总是特定具体的。

为了“进入”一个社会地位，就要隶属一系列的机制，这些机制随着人们在上所做出的选择和行动，直接冲击个人的生活。对隶属于阶级结构内位置的这些微观机制而言，什么是其最显著的特征，有这样一些争论：它们应该主要被看做是决定个人物质利益呢，还是形成他们对世界的主观理解，还是决定他们为追求自己利益而拥有的基本资源？无论如何，要在分析的微观层次上发展一个阶级的概念，就要依照直接影响阶级位置内个人的机制来详细描述这个概念。

于是，“阶级结构”一词就是指在不同的分析单位中阶级关系和地位的背景的方式途径。例如，人们可以指一个公司的阶级结构。一些公司是由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他雇佣几个经理和一些同质的工人。这样的公司与一个大公司有非常不同的阶级结构，大公司在等级体系上分化了管理结构，一个外在的董事会代表靠债券生活的资本家股东和一个被分裂的工人阶级。人们也可以指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或甚至，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阶级结构。例如，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一些则会有一个较小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规模是社会自身的一个特征，它取决于该社会中所有公司的组织和联结的独特方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国家机器和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有大有小。整个社会中，中间阶层的规模取决于这些中观层次雇佣组织的特定混合。

## 13.2 基本概念

我们将讨论的模型涉及许多相互联系的阶级分析概念：阶级结构、阶级位置、阶级利益、阶级经验、阶级意识、阶级形成、阶级实践和阶级斗争。其中一些概念，特别是阶级结构，在前面的章节已有大量讨论，因此，这里我们不再对它们作详细讨论。

### 阶级结构和阶级位置

我将把“阶级位置”这个术语作为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个人(有时是家庭)位置的微观层次概念来使用。而同时用“阶级结构”术语作为在某种更加宏观的分析层次上(典型的是整个社会层次上)阶级关系的整体组织的概念。说一个人“处于”管理阶层位置，就是说他们被嵌置在一整套人际互动(关系)之中，在其中，他们有权或者向下属直接下达各种命令(比如，监视权)，或者间接地通过控制生产决策实施命令。阶级结构是在某种较为宏观的分析层次上那些微观层次的阶级位置间的所有关系的聚集体。

### 阶级形成

我将使用“阶级形成”一词来表达或者反映一个过程(阶级形成的过程)，或者指一个结果(一个阶级的形成)。在两者情况下，该词都是指在追求阶级利益的阶级结构中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如果说阶级结构是通过阶级位置之间的对抗性社

会关系来定义，那么阶级形成则是通过在阶级结构中的合作性社会关系来定义。强烈团结一致的关系中，个人准备为集体的目标做出巨大牺牲，这种关系是阶级形成的一种形式，但阶级形成也可以是在更狭窄意义上起作用的，即在没有强有力的团结把人们约束在一起的情况下。<sup>2</sup>

阶级形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在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之间构成一个关键的链环。当然，阶级斗争也可能涉及严格地作为个人、以不对等的方式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但由于单独行动时个人追求其阶级利益(尤其受剥削阶级中的人们)的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人们不断地试图锻造各类集体以提高他们的斗争能力。在这些词汇中，阶级形成是重要的，主要因为它是阶级能力形成的途径，并因此在阶级斗争中使力量达到平衡。

照这种理解，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的区别，就类似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区别。然而，阶级的自在与自为的区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轨迹的目的论观点联系在一起，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的形成。比较而言，“阶级形成”这个词不蕴含着在阶级结构里集体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有任何内在的趋向，围绕“基本”阶级利益发展成革命组织。因此，“阶级形成”是一个描述性类别，它包括潜在变化的广阔范围。对任何一个给定的阶级或阶级位置群体，人们可以说“强”或“弱”的阶级形成；一致的或分裂的阶级形成；革命的、反革命的或改良主义的阶级形成。

典型的情况是阶级形成包括创立正式组织(尤其是政党和工会)，这些组织把人们联系在一个阶级结构的不同位置里或位置之间，但阶级形成决不局限于正式组织。在追求阶级利益中任何有利于团结一致行动的集体的社会关系形式，都是阶级形成



的样例。非正式社会网络，社会俱乐部，社团，甚至教堂，在合适的条件下，都会成为阶级形成的元素。例如，对社会俱乐部在协调统治阶级利益中的角色所进行的广泛的研究，应被看做是为资产阶级形成的一个方面提供了证明。<sup>3</sup>

阶级形成不应仅仅根据在一个阶级结构中的同等阶级位置内人们之间关系的形成去考虑。跨越一个阶级结构内位置边界的团结关系的锻造，同样是在阶级结构内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形成的例子。因此，阶级形成包括阶级联盟以及阶级本身内部组织的形成。<sup>4</sup> 例如，“平民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追求提供了一个脉络，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阶级形成的形式，这一形式锻造了工人阶级和某些其他阶级的位置，典型的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的小农场主)之间的团结纽带。

“阶级形成”的这个定义和“阶级结构”与“阶级形成”之间的相应区别并没有为阶级分析家广为采用。有时，“阶级形成”这个词用于描述有关特定种类阶级位置的变迁状况。比如，戈德西尔帕(1983: 467)写道：

对任何位置的结构而言，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经验性问题：在特定社会集体的意义上，在该位置结构中阶级实际上形成到了何种程度；所谓特定集体是指一些通过持续程度——由于阶级的流动和不流动模式，其成员长期与特定的位置组联系——可以界定的集体。

马歇尔等(1988: 22)称此为“人口统计的阶级形成”。“阶级形成”术语的用法也与吉登斯(1973)的“阶级结构化”这个词的用法很接近，指的是人们的生活被有效地约束在特定阶级位置里的方式。

也有一些例子，作者使用未加修改的“阶级”术语意指我所称的“阶级形成”。例如，普热沃斯基(1985: 47)写道，“因此，阶级必须被视为同时发挥作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客观条件结构化斗争的结果。”我所称的“阶级结构”是普氏所称的“客观条件”的组成部分；他所称的“阶级”正是我所说的“阶级形成”。

### 阶级实践

阶级实践是一个阶级的成员，为了实现（至少是部分地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而利用阶级力量参加的活动。“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意指活动是有意识的（即，它有一个有意识的目标）；“阶级”实践意指目标是基于阶级的利益的实现。阶级实践包括诸如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领班惩戒操作生疏的工人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选举这类普通平常的活动。但是，阶级实践也包括像参加罢工或击垮工会这类事情。

###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指敌对的阶级实践的组织化形式，即相互直接对立的实践。虽然在有限的事例中，人们可能指一次阶级斗争涉及一个工人和一个资本家，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中，阶级斗争涉及各种类型的集体。阶级形成，而不是化为原子的个人，是阶级斗争的特有工具。所以，阶级斗争一般是指宏观现象。考虑到由阶级结构决定的利益的对抗性质，个人的阶级实践将强烈地倾向于发展成集体性阶级斗争，因为一个阶级的成员的利益的实现通常意味着与另一阶级成员利益的对抗。

## 阶级意识<sup>5</sup>

我将用阶级意识概念去指个人主观性的特定方面。因此，意识将作为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来使用。当它进入宏观社会解释时，它正是凭借它帮助解释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的。集体，尤其是阶级形成，在字面的意义上看并不“有”意识，因为它们不是有思想、能思考、能衡量选择和有选择机会等等的实体。所以，当把“阶级意识”用于集体或组织时，它或者是指个人意识在有关的聚合体内模式化的分布，或者它是一种描绘中心倾向性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超个人的社会机制是不重要的，而仅仅是说它们不应该在“意识”范畴内概念化。并且它也不是指个人意识在社会中的实际分布不具有社会意义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它也很可能是这样；但意识的分布不是“意识”。<sup>6</sup>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研究“意识”就是研究个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方面，也即是一个人的那些主观性成分，这些成分能散漫地进入个人自己的意识。因此，意识和“非意识”对立起来，非意识不能随意地进入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意识的要素——信仰、观念、意见、信息、理论、偏爱——也许不可能持续地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但是他们能够进入个人意识。<sup>7</sup>

这个意识的概念化是与意志和有意识紧密相连的。我们说某些东西可以随意地进入意识，即是说通过意志行动，个人能够使自己意识到它。当人们对可选择的行动方向做选择时，最终的行动至少部分地可通过进入到做选择的行动者的意图中的特定意识要素来解释。虽然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不是可还原的有意识(intentionality)问题，但从社会理论的观点看，意识进

人到社会解释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隐含于行动者的意图和做出的最终行动选择。

当然这并不能表明主观性发挥作用仅靠有意识的选择。不通过意识目的,大量的心理机制也会直接影响行为。意识与有意识的联系和选择都不意指在每种社会条件下,对结果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通过意识而发挥作用的。也有理由这样认为,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是在决定对行动者开放的可能行动方法范围的过程中被发现的,而不是在潜在在选择当中的意识过程中被发现的。现在要表明的是:为了充分理解把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联结起来的真正机制,对由生活在这些结构中并参加这些实践的行动者所做的有意识选择的主观基础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而这即意味着研究意识。

在这个“意识”的定义下,“阶级”意识可视为意识中带有独特的阶级特性的意识方面。说是意识的阶级“特性”,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意味着信仰有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内容——从某方面来讲是关于阶级问题的信仰。例如,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结构特征;所以,对私有制愿望的信仰就可以视为一个阶级内容。第二,意识的阶级特性是指意识中那些影响个人实际上是如何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以及影响这些关系本身的方面。意识的阶级维度蕴含在意图、选择和实践之中,而这三者在世界上可称作“相关阶级影响”。

意识的“阶级特性”这些方面的两种含义——信仰的内容和信仰的影响——都有必要认为与阶级意识相关,如关于性别关系的观念,比如说,男子气概在阶级斗争中会损害男女之间团结的陈旧观念,就能够产生相关的阶级影响。然而,描述作为阶级意识的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是无用的,虽然它们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与解释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某个方面有关。于是，要把该信仰作为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来认识，它必须既有阶级内容，又要有相关阶级影响。<sup>8</sup>如果把社会结构理解为决定行动者客观物质利益的社会关系的场所，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试图实现客观物质利益的社会实践的形式，那么，阶级意识就可以被理解为带有阶级内容的主观过程，该过程决定与那些客观物质利益和斗争相关的有意识选择。

在这方面，需要澄清术语的潜在混淆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中，对“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同“无阶级意识”的工人进行区别是普遍的。这样使用的一般性的“阶级意识”所表达的同某个特定类型的阶级意识是一致的。在使用我所提出的这个术语时，它是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其中个人对他们的阶级利益有比较“真实的”和“一致的”理解。所以，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是指各种形式的相关阶级意识，而不管其对现实或客观利益是否忠诚。所以，为了特别地指明特定类型的阶级意识的存在，有必要采用合适的修饰语：赞成工人阶级意识，反资本主义阶级意识，革命的工人阶级意识等等。当我使用未修改的“阶级意识”术语时，它总是指有一个与阶级实践相关的阶级内容的意识的一般范围，并不是指这种总能评价为“对”或“错”的意识。

这种理解阶级意识的方式表明，概念能分解为几个要素。不管何时，人们做出有意识的选择，都要涉及主观性的三个维度：<sup>9</sup>

1. 知觉和观察。从某个方面讲，意识选择涉及处理关于世界的信息。然而，“事实”总是通过关于“存在什么”的类别和信仰而被过滤。有些工人认为他们的雇主关心雇员的福利，而另一些工人则认为，雇主仅对他们自己的利

润感兴趣。这种关于雇主动机的观念是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们暗含着工人可能对他们的雇主的种种阶级实践做出反应的方式。在这些术语中，“阶级意识”涉及各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对某种情况的事实感觉有一个阶级内容，并因此，阶级意识是随阶级行动而发生的。

2. 后果理论。感觉事实还不足以本身允许人们做选择，人们还必须对所希望的特定的行动选择后果有所了解。这意指选择涉及推测。它们可能是“实用性”推测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化推测；它们也许有“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的特征而不是解释性原则。这类推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关于什么是可能观念。工人也许会判定为了建立工会所做的斗争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胜利的。当然，“不可能”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试图建立工会，而只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所想要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工人阶级拒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与这样一种信念紧密相关，即这样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选择决不会起作用，或由于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使它们不能实现；正如，与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不为人们所期望的这种信念紧密相关。

3. 偏爱。知道了一个人的知觉和推测，仍不足以解释一个特定的意识选择。另外，当然有必要了解他的偏爱，也就是说他们对后果的可取之处的评价。在这里，“可取之处”可以意指依据对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想要的，但不必局限于对自私的和利己主义的评价的偏爱。偏爱也涉及深层的对基于共享认同和意图的其他人的福利的赞成。所以就它形成的范围而言，“阶级认同”可能是阶级意识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在这个范围内，个人偏爱包括对一个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幸福关心。<sup>10</sup>

以对阶级意识的这种理解，根据个人获取知觉、推测和偏爱的方式促进或阻碍对阶级利益的追求，人们可以开始发展性质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相当复杂的类型学。例如，根据知觉、推测和偏爱的特定组合，在“霸权的”、“改良主义的”、“对立的”和“革命的”工人阶级意识间进行区别是可能的。在本质上，这正是近几年发展的阶级意识的更为复杂的类型学所努力去做的。

在目前研究中，我不去试图描述一个细微差别的阶级意识形态的类型学。我们将潜在地展开所采用的资料，使这种类型学操作化，但我的总体感受是，调查研究方法论的局限使得采用较为简单和直接的变量更可取。所以，我们将使用的阶级意识的测量，被设计成旨在用一般方法开掘与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个人所持态度的范围。

### 限制、选择和转变

在详细描述阶级意识的微观模型和阶级形成的宏观模型中，我们将根据三个不同的“决定模式”：限制、选择和转变，来描述模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让我首先来解释限制和改变。

图 13.3 说明了限制和改变之间总的抽象关系：结构给实践施加限制；实践改变限制他们的结构。在这个脉络中，限制不只是意味着，在所谈论的社会结构存在的情况下，某些实践绝对不可能，即它们处于“界限”之外。在极端情况下，假如特定的结构存在，某些实践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界限这个概念的解释是指结构对各类相关实践发生概率的影响。当做出实质性断定时，人们说“结构—限制—实践”是结构对结构中

的行动者施加影响，结构中包括有各种障碍和便利、鼓励和刺激、冒险的选择和易得的机遇，这使某些种类实践比其他实践更可能和可持续，并且某些实践完全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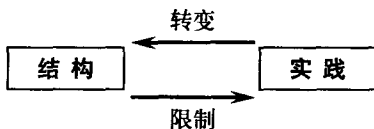


图13.3 结构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转变指的是实践对结构的冲击。结构是人类干预的对象。准确地说，是因为它们限制行动，人们试图依结构对他们利益的影响或改变或坚持这些结构，该结构也许置于如国家这样的社会生活的最宏观背景中或像家庭和车间这样更为微观的背景中。准确地说，男女平等主义的格言“个人是政治的”正确地宣称：实践在日常生活通俗的微观领域中能改变结构。

“结构—限制→实践”与“实践—转变→结构”的相互影响是理解结构和能动（agency）间的基本“辩证关系”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创造历史（实践改变结构），但并不能随心所欲（结构限制实践）。因此，这种关于结构和能动的思考方式既不是忽视能动的结构主义的方式，也不是忽视结构的强制约束力量的唯意志论。社会结构的限制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们是可以透过人类的有意识行动而改变的。

第三个决定方式“选择”又怎么样呢？选择应理解为“限制的限制”。当我们涉及超过一种结构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时，我们就要分析选择。这在图13.4这个基本的抽象的图中得到阐明。现在，我们有两个结构，X和Y。结构X对实践施加限制，同时结构Y选择在这些限制内的实践。在极端的情况下，结构Y也会把选择收缩到仅有一类实践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可以说结构 Y 决定了结构 X 所施加的限制内的实践。更为典型的是，选择指可能性的降低。用这些概念，我们可以着手解答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因果模型的问题。

### 13.3 微观模型

如果根据形成与阶级利益相关的有意识选择的那些知觉、推测和偏爱的内容来理解阶级意识，那么，在阶级意识的分析中解释问题就是去详细描述影响意识的阶级内容变化的过程。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精确地说是这样一个理论：它是对行动者的知觉和推测是如何根据商品关系的操作而浸满于一个阶级内容的一个解释。在生产商品的社会里，生产者的直接现实经历在起作用，表明了如同物品(商品)之间关系的人际社会关系，并且这依次产生以“拜物意识”为特征的精神结构。据称，这种意识在传播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和自然性质的观念中依次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它妨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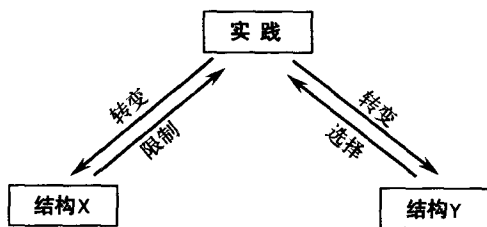


图13.4 决定的形式：限制，选择，转变

在本章我们将讨论的意识形成的微观因果模型是故意简化了的。目的是试图抓住最普遍的和最成体系的起作用的决定因

素，而不是囊括那些可能进入任一特定个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的广泛的复杂事物。图 13.5 阐明了这个梗概式模型。该模型应被读作：阶级位置对在这些位置中的个人的意识和他们的阶级实践施加影响。阶级意识又依次在阶级位置施加的限制内选择特定具体的实践方式。于是，阶级实践改变了阶级意识和阶级位置。让我对因果连接关系逐一加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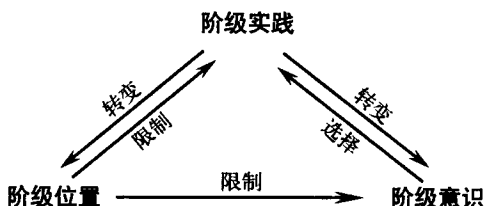


图13.5 阶级位置、阶级意识和阶级实践关系的微观模型

1. 阶级位置—限制→阶级意识。在特定阶级位置上的责任更可能提供某种形式的阶级意识。在极端情况下，对在该阶级位置中的个人来说，特定意识形态实际上也会变得不可能维持下去，但限制概念不需暗含对任一意识形态的任何绝对的障碍。资本家比工人更可能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德，但有些资本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成了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产业工人比资本家更可能相信有强大工会和参与管理决策的需要和愿望。而有些工人认为，非管理的雇员没有权利干预自由市场的功能和雇主权力。生活在特定阶级位置增长了这样的可能性：特定知觉、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特定推测和特定价值观念似乎比其他的更为直接可信。但广泛的其他因果因素的介入会抵消这些可能性。因此，由于其他的偶然的因果过程的存在，根据“阶级位置—限制→阶级意识”关系似乎不可能的意识形态也会变得更可能。

2. 阶级位置—限制→个人阶级实践。阶级位置以相当直接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形成个人在这些位置中能够可行的一套做法以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关键机制，通过它在一个阶级位置限制了一套可行的实践，是追求特定行动过程所需的可得到资源。生存在工人阶级位置中，并因此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意味着，为了获得目前和未来的生活费，他们一般必须寻找一份支付薪水的工作。某些其他的选择也许比较容易，至少对某些国家工人阶级位置的一些人来说是这样。犯罪活动可能是一个选择，或者靠福利救济生活也是。其他选择可能更为困难，但依然不是绝对不可能。对一个工人来说，借款开办企业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并且大多数工人不能够储蓄足够的收入以投资回报方式获得未来的生活费，但在独特条件下两种选择都是可能的。更为经常的是，有些工人投资到那些提高他们的物质利益潜力的各种培训中。当然，工人有追求阶级利益而加入工会和参加集体实践的选择。这些行动方向选择的比较容易或困难，是以阶级位置—限制→阶级实践所表达的“限制”所解释的。

3. 阶级意识—选择→个人阶级实践。虽然阶级位置可以形成一套可行的阶级实践，但特定实践的真正选择依然依赖于个人的知觉、推测和价值观。在此种意义上，阶级意识选择的是由阶级位置所施加的限制内的实践。

4. 个人阶级实践—改变→阶级位置。在最明显的意义上说，个人的阶级实践能改变他的阶级位置，这是通过阶级流动实现的。但在通常意义上，没有产生阶级流动，阶级实践也能改变各种具体的相关阶级的工作特征——权威度，自治权，工资。当一个工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抗老板控制的活动，该工人改变了他或她的阶级位置的诸方面。当雇主引进了提高他们控制监视劳动过程和榨取工人劳动的能力的新技术和工作组织时，他

们已进行了改变同他们的雇员的阶级关系的一个特定方面的阶级实践。

5. 个人阶级实践—改变→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中的传统主题之一是这样一种观念：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在生产商品的同时生产了自身。这是迈克尔·布劳沃伊对店铺里工人的大量研究中的中心课题之一（布劳沃伊 1979, 1985, 1992; 布劳沃伊和怀特 1990）。他认为，工人的规范和价值观主要不是工作领域之外高度社会化的结果，而是在生产中通过工人为努力处理两难困境而采用的实践产生的。这些术语中特别突出的是个人参加有助于社会连带主义的偏爱所形成的各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更为一般的认为是，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个人所持有的对选择、推测和价值的知觉，恰恰不是由他们在哪里，而是由他们做什么而形成的。

在下几章中，我们的经验性目标，特别关注的是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微观模型中，阶级位置通过两条路线影响阶级意识：一是通过处于一个阶级位置对意识的直接冲击；二是通过阶级位置影响阶级实践而阶级实践依次影响意识的方式。思考这两个因果流向的一个方式是，前者涉及的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后者涉及的是人们所做的事情。

由于处于一个阶级位置上（在第十章讨论的意义上，阶级位置被作为直接和间接的位置来理解），一个人遭遇某些经历的可能性可大可小。在阶级位置决定获得物资资源的机会的范围内，处于一定阶级位置形成了生存的一般物质条件——日常生活的舒服程度如何，工作上的身心负担如何，个人的饥饿程度如何。阶级位置深刻地决定了做各类犯罪的牺牲品的可能性。阶级位置塑造了人们可能生活其中的社区和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网络的特征，并且所有这些都可能对阶级意识有冲击影响。首要的是，

阶级位置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中面对的一系列权衡和两难处境施加影响。资本家必须担忧来自竞争者的挑战，设法最大程度地榨取工人劳动，以及选择对投资资源的使用。工人必须担心找份工作、失业和工作安全，担心技术过时和工伤，担心工资人不敷出。说一个阶级的成员共享阶级利益是指，在客观上，他们为提高他们的物质福利而面对的相似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环境不断地产生塑造人们对世界信仰的经验。”

然而，人们不是仅仅生活在一个战略性环境中，他们也采取具体的战略。而且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也塑造了他们的意识。管理者不只是面对诱导下属努力劳动和给上司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他们也发布命令，惩戒下属以及对高层管理和上司拍马逢迎。工人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与同等工人竞争或团结一致为提薪而斗争的战略问题。他们也参加工会，跨越纠察线和辞职去找份更好的工作。于是，阶级意识一方面通过物质条件和人们面对的选择而形成(阶级位置—限制→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人们实际上做的选择而形成(阶级位置—限制→实践—改变→意识)。意识作用于选择，选择改变意识。

这两条因果路线有个关键的时间维度。阶级意识不是个人目前阶级位置和阶级实践的同时性产物。在时间的任一特定点上，关于任何事情的意识都是一生发生于人的身上和人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也是人们面对的选择和做出的选择，以及利益和经历的结果。最明显的是，在阶级结构内个人位置的自传历程(代际和代内阶级流动的传统社会学问题)，但诸如失业和罢工之类的其他经历也是相关的。

一个充分发展的意识形成理论也应包括一种心理学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利益和经历真正地塑造选择、推测和偏爱的知觉。对阶级位置限制阶级意识的一系列显著的经历和利益的区

别是不充分的，也有必要理解这些限制是如何通过个人内部的心理过程起作用的。乔恩·埃爾斯特(1985, 第八章)对于像如意算盘和相应偏爱的形成(认知失调)的认识机制的解释是这方面的例子。

我不去试图详细描述这些心理机制的解释，因此它们基本上依然是一个“黑箱”。然而，毫无疑问，我的论点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学习理论，它是以社会条件对意识的影响的大多数社会学解释为基础的。其基本假设是，人们坚持与他们的阶级位置一致的信念的可能性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强化或削弱这种信念的程度。在其他所有事情是同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活越是束缚于一套单一的连贯的阶级经历，这个人的意识越可能充满相应的阶级内容。知识、推测和偏爱是从经验中学习的结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个人阶级经验都在同一个方向上扩展，阶级意识倾向于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阶级内容。<sup>12</sup>

然而，人们可能会反对说：一系列阶级经验不管多么一致，都不足以预测意识的形式。经验不能直接转变为意识。首先，它们必须被解释，并且解释总是以某种政治和文化脉络为前提。同样的微观阶级经验和具有同样的心理机制利益，会根据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历史脉络产生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意识。为了解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宏观模型，然后转向宏观和微观分析的相互作用。

### 13.4 宏观模型

在宏观模型中，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个人阶级意识，而是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集体形式。图13.6展示了这一模型。像在微观模型里一样，因果逻辑围绕的是结构限制行动和行动反

过来改变结构的方式。在宏观模型里，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这些限制内，阶级形成选择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式。阶级斗争改变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让我们看看每一种连接关系。

1. 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说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意思是，阶级结构对任何试图锻造阶级形成的能动者施加必须克服的障碍和提供必须争夺的机遇。因此在任一特定的阶级结构内，特定的阶级形成将比较容易创立，并且一旦创立，也可能是稳定的，其他阶级形成会较难创立且不稳定，以及特定的阶级形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sup>13</sup>正如普热沃斯基(1985:47)所解释的：“工人形成阶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与剩余劳工组织化过程融合在一起的。结果，阶级的许多可任选的组织的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是可能的。”

这一限制过程中的三种核心机制是：(1)由阶级结构产生的物质利益的性质；(2)产生于阶级结构中不同位置人们的生活经验的认同模式；以及(3)在阶级结构中分配的资源性质，它使阶级结构中特定潜在跨位置联盟或多或少具有吸引力。前两个机制与阶级位置的微观分析关系密切，而第三个则在特征上更为宏观。

物质利益。关于物质利益的论证是最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的中心论点是，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剥削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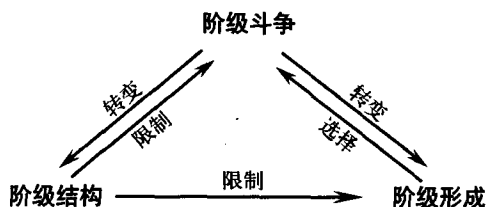


图13.6 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宏观模型

有力地决定着结构中人们的物质利益。考虑一下在本书中我们所采用的阶级结构中的位置矩阵，这个矩阵也可以视为在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的物质利益内在对抗程度图，即位置之间相互较“接近”则有较多一致的物质利益，而位置之间距离越远，物质利益对抗性越强。所以，在同样情况下把物质利益相当一致的位置联系在一起形成比把物质利益十分不同的位置联系在一起形成更容易实现。从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位置的优势点开始(矩阵的右下角)，当你移向左上角时(雇员中的专家管理人员，财产所有者中的资本家)，阶级利益逐渐变得更富对抗性，并且因此，把工人和这类位置联结起来的阶级形成越来越难于实现。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物质利益独自决定阶级形成；但是，它们限定了一系列的障碍，即各政党、工会和其他阶级形成的能动组织为巩固或再造特定的阶级形成模式必须与之斗争的障碍。

认同。通过第二个机制，阶级结构决定了阶级形成的可能性。这个机制以阶级影响人们阶级认同的方式为中心，以人们界定谁与自己相似或相异，该经济制度中谁是他们潜在的朋友和潜在的敌人的诸种方式为中心。就物质利益来说，人们可以期望那些试图把人们与相似认同相联结的阶级形成能够更容易实现，并且比那些试图把高度分歧和有潜在冲突的认同结合在一起的阶级形成更稳定。在同样情况下，可以预测，阶级认同或多或少地沿着像阶级利益同样的路线发展，并且因此，共同特征会强化作为实现阶级形成的基础的共同利益。

然而，同样的情况是极少的。阶级认同主要是由个人经历的特有风格和历史的斗争模式以及阶级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类属(民族、宗教、语言、区域，等等)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虽然，认为客观上给定的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和他们所发展的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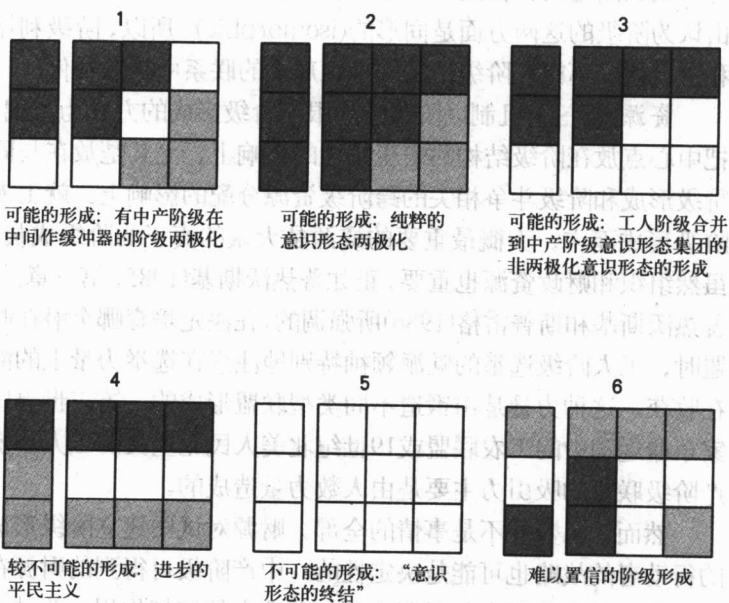


种阶级认同之间存在某种粗略的联系似乎是有理的，但没有理由认为阶级的这两方面是同形的(isomorphic)。所以，阶级利益和阶级认同不能在阶级结构同阶级形成的联系中相互强化。

资源。第三个机制以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的方式为基础，把中心点放在阶级结构的宏观特性的影响上，尤其是放在与同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相关的跨阶级资源分配的影响上。就工人阶级形成而言，大概最重要的资源是大量的真正的阶级成员，虽然组织和财政资源也重要。正如普热沃斯基(1985, 第三章)与普热沃斯基和斯普雷格(1986)所强调的，在决定培育哪个潜在联盟时，工人阶级选举的党派领袖特别地注意在选举力量上的潜在收获，这种力量是由锻造不同类型联盟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运动中的工农联盟或19世纪北美人民党主义的工人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吸引力主要是由人数力量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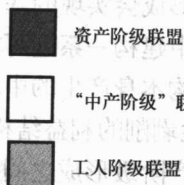
然而，人数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财源对试图建立阶级形成的行动者的战略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中产阶级可得到的财源在锻造特定种类的联合与联盟方面起着重大的杠杆作用。为什么工人阶级政党在吸引中产阶级的进步因素方面比在动员人口中最贫穷和最被忽视的人群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其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有做出更大贡献的潜力。

这三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机制：剥削→物质利益；在阶级结构中的生活经验→阶级认同；阶级资源的分配→潜在的联盟的吸引力，它们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潜在的阶级形成会实现的基本概率。图 13.7 阐明了在同样的基本阶级结构中建构一系列可能的阶级形成。前两个可能的构成沿着阶级结构本身产生的中心倾向的路线发展：阶级形成直接地反映了产生剥削的利益结构。在模型 1 中，中产阶级形成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在模型 2 中，是存在于两个“阵营”之间的一个纯



## 基本阶级类型

## 阶级形成的类型



1 资本家	4 专家经理	7 技术经理	10 非技术经理
2 小雇主	5 专家监督者	8 技术监督者	11 非技术监督者
3 小资产阶级	6 专家	9 技术工人	12 非技术工人

图13.7 可能的和不可能阶级形成

粹的两极化。在模型3中，工人与对立位置之间的结构分裂在阶级形成过程中被极大地削弱；工人被合并到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集团。模型4和5大概更不可能，但依然与基本阶级结构相一致；在模型4中，伴随着一个微弱的中间构成，一个由资本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阶级形成对抗着一个由工人、知识分子（非管理专家和半专家）和小资产者所组成的“平民主义联盟”；模型5，锻造出了广泛的跨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这种一致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意识形态阶级联盟。最后，模型6代表一个在结构上非常不可能发生的阶级形成：工人、管理者和资本家共同组织成工人阶级联盟，而专家和小资产者组织成资产阶级联盟。

2. 阶级结构—限制→阶级斗争。<sup>14</sup> 阶级结构限制阶级斗争的最简单的道理是，在不存在特定种类阶级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特定种类的阶级斗争的有关行动者完全不会存在。没有资本家阶级关系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但是，阶级结构以更微妙的方式决定不同阶级斗争形式的可能性。正如前面3—5章所讨论的，不同的阶级结构以阶级边界的不同渗透度为特点，并且这使被剥削阶级中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个人主义策略似乎合理。个人主义策略被排斥的（即边界高度不可渗透的）地方，更加可能产生集体组织和集体斗争。在与剥削的不同方面相联系的物质条件的极化程度上，阶级结构也发生变化。不过，人们可以预期，态度强硬的斗争形式在比较两极化的物质条件下比在相对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更为可能发生。从这些方面上讲，阶级结构限制阶级斗争。

3. 阶级形成—选择→阶级斗争。阶级结构可以通过它决定行动者的利益和机遇的方式对阶级斗争施以限制。但实际的斗争非常依赖斗争的行动者可进入的集体组织。关于独裁的右翼政体的生动事实是，它们最重视令人受约束的集体组织，尤其

是工会和政党。当这些组织受到破坏时，各类斗争自身较容易被控制。然而，重要的不只是阶级形成的组织的真正存在，这些组织的特定形式也对阶级斗争的形式有系统的影响。正如乔尔·罗杰斯所论证的，劳工运动组织结构的集权或分权，一致或分裂的程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类工人阶级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

4. 阶级斗争—改变→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阶级结构本身。在极端情况下，当特定的阶级关系形式受到破坏时，这就构成了革命改变的一个对象。更为普遍的是，通过改变阶级关系的特定性质——物质条件的剥削和两极化程度，所有者和管理者自由行使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渗透的障碍(仅举这几个例子)——阶级斗争改变了阶级结构。关于国家再分配行动的斗争，关于资本家对污染的权力的斗争，或关于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的斗争，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改变阶级结构的斗争，因为它们对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权力有影响。

5. 阶级斗争—改变→阶级形成。阶级斗争不全是关于对植根于阶级结构中的物质利益的斗争。阶级斗争也对准那些方便或妨碍斗争本身的组织和政治条件。这是普热沃斯基(1985:71)阶级分析的中心议题，他写道：

- (1) 阶级是作为斗争的一个结果而形成的；
- (2) 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不断的：阶级不断地被组织，解散，及再组织；
- (3) 阶级形成是全体斗争的一个结果，在斗争中，许多历史的行动者试图把和阶级成员，用其他术语说是集体成员，有时仅仅是“社会”的成员——同样的人们组织起来。

工人组织工会的斗争和国家镇压劳工运动是阶级斗争改变

阶级形成的两个例子。

### 13.5 微观模型与宏观模型的结合

在几个地方，我们已经提到了分析的微观与宏观层次间的相互联系。例如，声称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部分地依赖于这个问题的论证：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经验是怎样由他们的阶级位置在微观层次上造成的。同样，微观层次上声称阶级位置限制阶级行动也部分地依赖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论证：在不同位置上的个人面对不同机遇和两难处境，决定如何最有效地追求他们的物质利益。然而，机遇和两难处境不是严格的微观概念；它们关键依赖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征。

这是社会理论的一个传统，有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旗帜下进行。这个传统坚持认为宏观现象可以还原成微观现象。当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定义时，埃尔斯特(1985:11)明确地为这种观点辩护，他的定义为“这样一个信条，即所有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都是可以解释的，解释的方式仅涉及个人——他们的特点、目标、信仰和行动。从社会机构和行为的集合方式到个人的运作过程，与从细胞到分子的过程是同样的”。虽然，为了务实的原因有必要继续使用像“阶级结构”这样的宏观概念，但原则上，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这些宏观概念都可以由纯粹的微观概念取代。<sup>15</sup>

多数社会学家反对这种还原论，而喜欢宽泛地谈论分析的宏观与微观层次的“相互联系”。宏观社会现象被看做是给个人施以各种真正限制的东西，这些限制又不能简单地分解成个人行动。但依然认为个人做出实际的选择，这些选择会产生实际作用，包括对宏观现象本身稳定性和转变所发挥的作用。

思考这一微观与宏观相互联系的一个方式在图13.8中得以阐明：微观层次过程构成了所谓的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而同时宏观层次过程调解微观过程。

社会理论家为整体论辩护及反对个体还原论的标准途径之一是，表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学家喜欢说，整体具有“突现性”，它不等同于一个一个的部分及部分之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单独对一个部分做充分描述就足以形成对整体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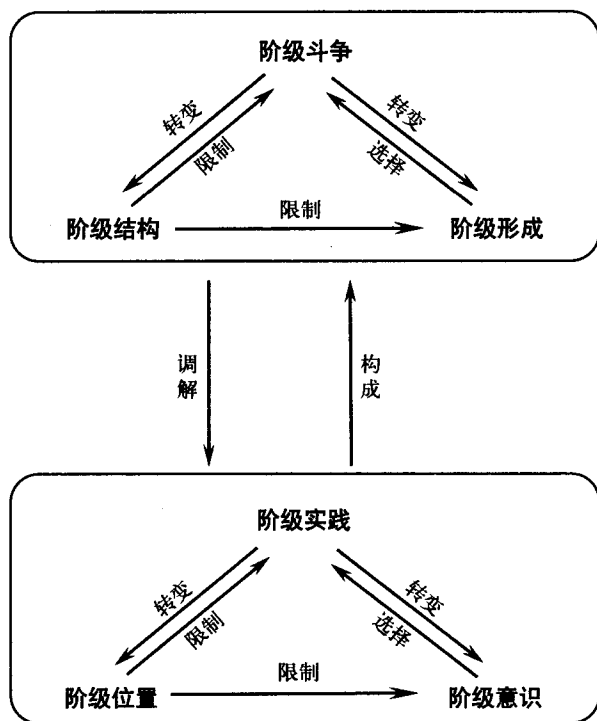


图13.8 阶级分析中宏观与微观的联系

个充分描述。然而，没有部分就不会有整体，这也是事实，并且这表明，在某种意义上，结合在一起的部分构成整体。这两种观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部分共同构成整体——能通过这样的表达达成妥协，即“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加上部分之间的所有的相互作用”。整体“突现性”可以看做部分相互作用产生的特性，不完全是它们依次集合起来的个体特性。

因此，要研究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就是要研究整体由部分总和及部分相互作用构成的方式。让我们来看阶级结构。阶级结构是由处于阶级位置中的个人和根据其所占据位置的功效在他们中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构成的。所以，要研究阶级结构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探索个人属性，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帮助解释这些位置和相互关系本质的方式。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因此，他们为了获得生活费，而寻求雇佣。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为了获取利润而寻找雇员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是由具有这些属性(拥有的仅是劳动力和拥有资本)和这些偏爱(寻求生活费和寻求利润)的个人行动所构成。由这些相互联系的个人属性和选择造成的这类关系的总体构成我们所称为“阶级结构”的宏观现象。

同样，阶级形成也是由在为实现阶级利益而组成的集体社团内，带有各种不同阶级意识形式的个人的参与构成的。研究这些集体组织的微观基础涉及对过程的理解，通过此过程，围绕不同的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中间锻造了的团结一致；同时还涉及对促使他们在集体追求阶级利益中合作方式的理解。不同类型的阶级形成基于不同的个人意识形态和一致的相互依赖。

最后，要研究阶级斗争的微观基础就要探索由占据特定阶级位置和参与特定阶级形成的个人的属性、选择和行动，构成集体行动的方式。这里集体行动是阶级斗争的特征标志。举一

个阶级斗争的典型例子，一次工会发起的罢工。对微观基础的研究坚持，把分析限制在“工会”是决不会令人满意的。这里“工会”是作为一个做选择和参加对“资本家”或“资方”行动的集体性实体而使用的。因为，作为组织化社会力量的工会(阶级形成的一个例子)是由它的成员和成员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所以，要理解工会的行动——例如，决定号召罢工——我们必须理解构成该工会的个人的属性、选择和相互作用。这将涉及对这样一些事情的讨论：工会内部的讨便宜者问题，成员关系中产生团结一致的条件，形成工会决策中普通成员和领导之间的关系，等等。<sup>16</sup> 因此，可以说，阶级斗争是由阶级形成和阶级结构中个人的阶级行动和所有这些阶级实践的相互作用构成的。

探讨了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只是探讨了图 13.8 中微观与宏观关系的一半。另一半是由可以说成是宏观现象调停微观过程影响的方式组成的。说宏观调停微观的意思是说特定的微观过程的特定影响取决于它们发生的宏观背景中。例如，在图 13.5 中，意识构成的微观模型的核心是个人阶级意识是由他们的阶级位置所决定的主张。然而，这些微观层次的影响主要是由宏观层次的条件和过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决定的。在一个工人阶级没集体组织起来的阶级结构中占据一个工人阶级位置，比在阶级政治形成一致的条件下占据同样的阶级位置，对个人的意识有更多样的影响作用。这不只是宣称，阶级形成本身的宏观条件对意识有影响；它暗含着，个人阶级位置对意识的因果影响根据宏观条件而有所加强或减弱。

在正式条件下，这意味着该模型是为赞成微观与宏观因素的相互影响而不是简单的添加影响而辩护。例如，假定我们想在一个简单方程式中表示阶级位置和阶级形成对阶级意识的影响。简单的添加模型看上去像这样：



式中  $B_1$  和  $B_2$  是调节这些变量对意识的线性影响的系数。互相影响模型——宏观调停微观的模型——增加了一个相乘的条件：

$$\text{意识} = a + B_1[\text{阶级位置}] + B_2[\text{阶级形成}] + B_3[\text{位置} \times \text{构成}]$$

$$\text{意识} = a + B_1[\text{阶级位置}] + B_2[\text{阶级形成}]$$

式中  $B_3$  表示在不同阶级形成的宏观背景条件下阶级位置变化的影响程度范围。<sup>17</sup> 当然，在特定的经验性背景中， $B_3$  也可能无关紧要，表明在不同的阶级形成方式条件下，阶级位置的影响是不变的。的确，虽然似乎比较不合理，但  $B_1$  和  $B_2$  也会无关紧要，表明在阶级形成上的变化和阶级位置上的变化对个人意识形成并不重要。

### 13.6 模型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

图 13.8 中展示的模型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首先，依据模型中某些元素的有关变化范围的说明，该模型在描述上非常不足。因此，虽然我已提出了一个对微观模型中的“阶级位置”与解释阶级意识相关的变化的详细解释，但关于在微观模型中的“个人阶级行动”或宏观模型中的“阶级形成”或甚至“阶级结构”变化的有关范围的讨论还非常不够。甚至更重要的是，没有对模型中因果关系的实际数量进行详述。例如，说阶级位置对个人阶级意识施加“限制”，但是，模型本身中这些限制的性质和范围还是空白。说阶级形成的宏观过程调停意识形成的微观过程，然而这个模型在这些相互影响的精确形式和重要性方面是沉默的。因此，在模型中不存在表明对不同阶级位置上的人们形成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的相对可能性的东西，也不存在表明这些可能性本身在阶级形成的不同宏观条件下是如何变化的。最后，模型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把自己本身

限制在模型中元素的有关阶级的决定因素中。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完善的理论必须包括广泛的其他因果过程——从各种非阶级的社会区分形式的性质(种族、民族、性别)，到宗教，到地缘政治。

鉴于这些限制，这些模型不应该看做是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基本理论的界定，而应作为为阶级分析中的经验研究界定问题日程的一个框架。所以，在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多变量经验研究中，我们将不去直接“检验”模型本身。模型构成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一系列的替代选择假设可以系统地进行阐述和检验，但框架本身将不受到任何直接检验。

## 第十四章

###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本章将试图把前一章中详细描述模型的某些元素应用到三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瑞典和日本——的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经验研究中去。更具体地说，这个研究有三个主要目标：首先，是为了检测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总的关系与在本书中使用的阶级结构分析的逻辑相一致的程度；第二，为了比较三个国家中阶级形成的模式；第三，为了考察跨三个国家的微观、多变量意识构成模型变化的方式。这些工作中，第一个是集中探讨模型中“阶级位置—限制→阶级意识”部分，第二个是集中于“阶级结构—限制→阶级形成”部分，以及第三个是集中于“宏观—调停→微观”方面。

在下面一节我们将讨论为测量阶级意识而部署的策略。在14.2节将继续对经验性议程和资料分析的策略做更加详细的讨论。然后在14.3~14.5节提出资料分析的结果。

#### 14.1 测量阶级意识<sup>1</sup>

众所周知，阶级意识很难测量。该概念的解释是指冲击含

有一个阶级内容的意识选择活动的主观性特征。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该概念要求的主观状况是否实际上只有在有意义的选择情况下，才能“活动”，而阶级意识首要地暗含着阶级斗争形势。没有必要假定这些主观状态，受访者在访问中在进行的意识选择时都是一样的。在调查中的选择回答是与选择如何讲述商店里的冲突不同的实践，并且开始起作用的主观性形式可以非常不同。访问背景本身毕竟是一个社会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可能会影响受访者由于顺从或敌意或其他反应而作的回答。此外，在人们对调查的人为的选择的回答方式与对社会实践的真的选择的回答方式之间不仅存在滑动，而且存在一个对回答的系统转换，这是可能的。结果，人们认为，试图通过调查工具测量阶级意识几乎没有价值。<sup>2</sup>

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并且潜在地削弱了对阶级意识做问卷调查研究的价值。然而，我的假定是，在访谈中人们对人为环境和阶级斗争的真实生活环境的认知过程中至少具有某种稳定性，以至虽然结构访谈可能被曲解，但社会调查能够潜在地测量这些稳定成分。虽然，对任一特定个人来说预测他们在“真实生活环境”中的行为方式，调查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但调查也可以提供一个关于阶级结构是如何与可能的阶级行为联系起来概括的形象。

当然，决定使用问卷去发现阶级意识，这使问卷中条款保持留有余地的，以便更好精确地测量这个概念。这里还要做一个关键性选择：制作问卷应该以开放性问题还是以预先设计好的固定选择项的问题为主。开放性的问题的优点是给个人真正的认知过程提供一个更加微妙的窗口。当你问一个人，“你认为在美国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比当你问固定选择项问题，“对‘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某些人懒惰和不愿意努力工

作’这个观点，你是非常同意，稍微同意，稍微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时，个人更可能揭示他们对问题的真正理解认识。固定选项问题会冒人们说你要他们讲的话有限制其选择的风险，和给人们的选择项对其无实际特点的风险。

另一方面，开放性问题常常造成严重的编码与资料分析的一致性问题。已有无数的有大量开放性问题社会学调查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因为编码问题难以克服。开放性回答常常主要用于从趣闻轶事方面为分析增加丰富的例证，但它们在定量分析中常会被放弃。

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对开放性问卷回答进行编码的问题被大大的混淆了。即使人们能用某种方法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中能为开放性问题设计出一个共同的编码约定书，实际上，确保在跨国研究中以一种严格的比较方式使用编码程序也是不可能的。这已被证明极为困难，甚至在把专业性描述编进国际上一致同意的范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开放性回答来说，对编码态度问题进行编码将更加困难。在比较阶级分析研究项目中，我们发现，让不同国家的研究坚持用一份共同问卷极为困难。把可接受的可比性标准强加给开放性问题的编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sup>3</sup>

因此，虽然开放性问题可能提供对个人意识的更深刻理解，但为了实用的原因，我们的分析将限制在封闭性的问题上。总之，在这类研究中，有规则的肤浅比无秩序的深刻更可取。

在这项研究中所用的调查，包括各种各样的态度条款，范围从直接涉及政治话题的问题，到关于妇女机会平等的规范问题，到对各类社会问题的解释。这些条款中有许多可以认为是阶级意识的指标，但对大多数条款而言，条款的特定阶级内容是间接的和以相当强的理论假定为前提的。例如，马克思主义

者常常认为,用个人主义术语(“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而不是用社会结构术语(“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和缺乏教育)解释社会问题的区别是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虽然这个主张可能看似合理,但它确实需要有一套相当强的假定,以解释作为反资本主义意识的一个方面的第二种对贫困的解释。所以,为了这个调查目的,关注那些最直接带有阶级含义的条款,并把这些问题的聚集成一个相当简单的、清楚明白的阶级意识尺度似乎是可取的。

建构阶级意识尺度,将会用到的问卷中有5个态度条款。<sup>4</sup> 这些条款都是里克特型(Likert-type)问题,询问受访者对下面每个问题是强烈同意、同意、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

- 1.公司牺牲工人和顾客的利益以有益于所有者。
- 2.罢工期间,法律禁止资方雇佣工人以取代罢工者。
- 3.在这个国家,许多人所得收入远远低于他们应得的报酬。
- 4.现在,在美国、瑞典和日本社会中,大公司有太多的权力。
- 5.在你的工作场所,非管理雇员没有老板也能对事物有效地进行管理。

对每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都给出一个值,-2代表强烈的赞成资本主义的答复,-1代表有点赞成资本主义的回答,0代表“不知道”,+1代表有点反资本主义的回答,+2代表强烈反资本主义的回答。<sup>5</sup> 把这些单个条款的分值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简单的加法尺度,范围从-10(赞成资本主义的极值)到+10(反资本主义的极值)。如果受访者对某些条款的数据遗漏掉了,就要把有效条款的平均值算出来,然后用5乘以该平均值,从而获得与可能分值的同样的范围。许多和这个尺度相连的方法论问题,在本章的方法附录中将予以讨论。

## 14.2 经验性议程

### 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

在我们详细讨论阶级形成模式和阶级意识的多变量模式之前，检测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总体关系与我们已经探讨的阶级结构概念的基本逻辑相一致的程度，将会是有用的。扼要重述这个基本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根据人们与物质剥削过程联系的三条途经交叉分析阶级结构，即通过财产所有制，通过权力等级中的位置，以及通过拥有技能和专长。如果以这种方式定义的阶级位置系统地决定个人物质利益和生活经验，并且如果这些利益和经验又决定阶级意识，那么，在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应该是一个有规则的关系。这一推理链条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假设：在一切情况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至少会有一个微弱的趋势，即在阶级位置中有责任发展和这些位置相联系的物质利益相一致的阶级意识的形式。对这些利益的知觉可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但一般说来，对利益的歪曲知觉将采用偏离于对利益充分理解的形式，并因此，一般情况下，阶级位置和利益意识间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经验联系。

根据我们在本章所使用的阶级意识的经验性指标，这个关于阶级位置和意识之间联系的论点表明，当某人沿着阶级结构矩阵的一个维度从剥削者移到被剥削者位置时，个人意识形态方向会更加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如果我们也假定，这些影响是累加的（即在两个维度上受剥削比仅在一个维度上受剥削的人将倾向于更反对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富有雄心的经验性假设：

沿着阶级结构矩阵的每一个横行和纵列，在反资本主义尺度的值与阶级位置之间，应是一个单调不变的关系。

根据我们已经在使用的12个位置阶级结构矩阵，我们将探讨三个更具体的假设：

假设1 在矩阵中，工人阶级位置应是最反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位置应是最赞成资本主义的。

假设2 在矩阵中的所有者部分里，随着人们从小资产阶级上升到资产阶级，他们的态度应单调地变得更加赞成资本主义。

假设3 在矩阵的雇员部分，随着人们从矩阵的工人阶级角落沿着横行和纵列上升到专家管理者角落，其态度应该单调地变得更加赞成资本主义。

假设3特别适用于矩阵中雇员部分的四类——专家管理人员、非管理专家、非专家管理人员和工人。正如在第二章所解释的一样，每个维度上的中间过渡类型——监督者和技术雇员——把各种测量错误和实际的中间过渡数值结合在一起，并因此，关于这些类型的预测必然更不可靠。

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概念不会导致与雇员中间对立的阶级位置相比较的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显的假设。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小资产阶级比与剥削过程有矛盾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即管理者和专家）或多或少地更赞成资本主义。一方面，小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因此，明显地与私有财产制利害攸关。另一方面，他们在商品市场和信用市场上又常常受到资本家公司的威胁和控制，这些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敌意。给定我们正在使用的处理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制——的态度的阶级意识尺度中的问题，可能会



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站在十分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立场上。我决不会预测，他们是否会比“中产阶级”（即雇员中对立的阶级位置），或多或少地更反对资本主义。

### 阶级形成

在前一章我们根据阶级结构中团结一致的社会关系定义了阶级形成。个人在阶级结构中占据位置，这些位置就他们如何能追求到他们的物质利益，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和提供诸多机会。在追求这些利益的过程中，锻造出了一致性和持久性程度不同的各个集体。阶级形成的研究包括对这些集体的调查研究——它们的构成、它们的战略、它们的组织形式等。

本章所报告的关于阶级形成的研究十分有限并且完全集中在阶级形成成分的问题上，也即是我将称作“意识形态的阶级形成”问题上。我们的方法将主要是归纳和描述。中心工作将是为美国、瑞典和日本筹划把阶级结构中的各类各种位置分类归入多少在意识形态上同质的集团的途径。

因此，这个研究至多是恰当研究阶级形成本身的一个间接方法。为了理想地绘出跨国家的阶级形成中的变化图，我们打算研究各种团结组织——尤其是像工会和政党这样的组织——在阶级位置内部或跨阶级位置上，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轮廓的有关阶级的组织进入阶级结构的不同部分的方式图，将为阶级形成的模式提供一个基本描述。关于在政党和工会里的正式成员和非正式加入者的阶级形成的资料，将提供一个达到这一目的的经验性途径。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资料，实际上经不起对阶级形成的组织基础的精致分析的检验。所以，我将使用更加间接的策略来

分析在这三个国家中阶级形成的轮廓线。我将把指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方向上跨阶级结构的变化作为筹划团结和敌对模式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去检测组织同盟。

由于两个原因，这种分析策略可以产生易误解的结果。第一，阶级的态度图大体上与阶级的组织集体的团结图相符合，这个假定肯定要受到质疑。即使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人们可以持有非常相似的态度，他们仍然还是有不同的脆弱性，控制不同的资源和面对不同行动方向的选择——实际上，这正是指他们处于不同“位置”的意思——并且这能产生实际参加阶级形成的集体行动的非常相异的倾向。

第二，我们正在使用的测量意识形态阶级联盟的方法，对困扰着比较调查研究的所有问题来说，是有弱点的。显然完全相同的问卷条款总是可能实际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意指十分不同的东西，不管翻译的多么好。在我们的问卷中一个好的例子是下面这个利克特型问题：“对这个陈述：在罢工中的工人用身体阻止破坏罢工者进入工作场所是完全有道理的，你是非常同意、稍微同意、稍微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随着这个问题的问题是，在瑞典的情况下，不存在一个用纠察线阻止进入工作场所的已为大众接受的罢工传统。结果，一名瑞典受访者会比一名美国受访者更认为，“用身体阻止”词汇表明的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潜在暴力。实际上，对一名同意该问题的瑞典人而言，他们必会感到对工人来说，强暴攻击破坏罢工者是合法的。为了这个原因，虽然这个条款在调查中出现了，但我们没有把它包括在这个分析中。<sup>6</sup>

问卷条款的文化上无从比较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方面，跨国差异可能仅仅是问题意思的滑稽产物。我相信，随着来自各国的研究人员中的充分讨论和问卷

条款充分的预先测试，发展出一套相对可比较的条款是可能的（或者至少来自每个国家的研究者相信它们意指同样的事物）。<sup>7</sup> 无论如何，条款的精确词汇是一个记录的问题，它应当促进对怀疑意思可比性的挑战。

那么，我们的经验性策略就是，把个人所持的相关阶级态度的阶级分布看做是在诸阶级形成里意识形态联盟模式的一个指标。在处于一般不同阶级位置的个人拥有相似的相关阶级态度的地方，我们会说，这些阶级位置构成了阶级形成结构里一个意识形态联盟。用态度作为团结和对抗的指标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阶级形成还原成人们头脑中关于阶级利益的态度。这个主张仅仅是，意识形态构造的形成促成并反映了团结一致集体，并因此是研究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之间关系的一个合适的经验性指标。

我们所用的区别意识形态阶级联盟的具体方法将在本章的方法附录中做详细解释。基本方法是问，对阶级结构矩阵中的12个位置的每一个而言，处于该位置的一个普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更接近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还是处于两个阶级之间的中立立场。更接近于中立立场的位置将归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一部分，而更接近于极端的阶级位置将归于工人阶级联盟或资产阶级联盟的一部分。这部分分析的基本目的是检测——在美国、瑞典和日本——这些意识形态阶级联盟是何等不同。

## 阶级意识

我们对阶级形成的分析，围绕的是检测在阶级结构矩阵中跨位置的意识形态方向上的区别和相似之处。在阶级意识分析

中，分析单位转移到了个人。这里的任务是建构一个关于个人意识变化的多变量模型，用相同的反对资本主义尺度测量，并且观察在不同国家这些模型是怎样变化的。

这些模型含有五组变量：阶级位置（11个虚拟变量）；过去的阶级经验（为工人阶级出身、资本家出身、先前的自雇者、先前监督人和先前失业者的虚拟变量）；现在的阶级经验和物质条件（工会成员，户主，不劳而获收入的虚拟变量，个人收入，与资产阶级的联系程度，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程度）；人口统计变量（年龄和性别）；以及国家（两个虚拟变量）。方法附录给出了这些变量的精确定义。数据分析的建立将围绕预测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尺度中数值的5个方程：

方程 1. 仅有阶级位置

方程 2. 阶级位置 + 过去的阶级经验 + 现在的阶级经验 + 工会会员 + 人口统计

方程 3. 仅有国家

方程 4. 阶级位置 + 国家

方程 5. 方程（2）+ 国家

首先我们将把三个国家的样本合并到一个单一的数据集里，在这个数据集里，我们完全像处理其他任一变量一样来处理民族国家这一变量。这将使我们能够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预测个人的阶级意识中，哪个变量更重要，是他们生活的国家还是他们的阶级位置和阶级经验？于是我们把数据分成三个国家的样本，并对每个国家分别进行方程1和2的估算。这里我们对比较跨国的不同变量群的解释力特别感兴趣。

### 14.3 结果：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总体关系

图 14.1 展示了瑞典、美国和日本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总体关联的结果。虽然有些缺点，但这些结果与前面所讨论的三个广义的假设中每一个大体上都一致。在这三个国家中的阶级结构矩阵中的工人阶级位置不是最反对资本主义的，就是实际上与最反对资本主义的位置相一致的。<sup>8</sup> 也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资产阶级不是最赞成资本主义就是有着与最赞成资本主义的位置没有重大差别的价值观。<sup>9</sup> 因此，这些结果与假设 1 一致。

对这三个国家研究的结果也支持假设 2。在每个实例中，所有者中间都有一个明显的意识形态倾斜度：资产阶级在赞成资本主义上比小资产阶级高 3~4 分，小雇主落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假设 3 得到了在瑞典和美国研究结果的强烈支持，而在日本研究的结果对假设 3 的支持某种程度上较为模糊。在瑞典，其结果几乎精确地遵循假设的预言：随着你从矩阵的工人阶级角落上升到专家管理人员角落，在尺度中的分值以一种几乎直线式地下降，无论你是沿着表中横行方向，或者纵列方向，还是沿斜线方向。<sup>10</sup> 的确，在瑞典的数据中，单一性的延长跨越了财产边界。在美国，结果仅仅稍微有点不那么单一：在矩阵的雇员部分，技术管理人员比非技术管理人员的反对资本主义态度稍弱些。在其他所有方面，美国的数字以假设所预测的单一方式表现出来。

该模式对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不太一致。如果我们仅看矩阵中雇员部分的四个角，那么所预言的单一性是适用的。与假设 3 的偏差产生于某些中间过渡分值。特别是，技术监督人员比非

技术监督人员表现出更强的反对资本主义态度。然而，在这些位置中的个案数目是非常小的（各自分别为 25 和 19），并且在这些类别之间反对资本主义态度的分值的差别在统计学意义上也是不显著的，甚至在 0.20 的水平上。日本阶级结构矩阵中纯粹单一性的其他偏差在统计学意义上甚至更不显著。因此，对日本研究的结果与假设 3 的预言不十分矛盾，虽然它们依然比瑞典和美国的结果较为不符。

因而，总体上看，对这三个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阶级意识方面，跨阶级结构的位置的变化模式，正像用反对资本主

瑞典		雇主		雇员		
资本家	-3.14	-2.36	0.60	1.05		管理人员
小雇主	-0.70	0.56	2.07	3.05		监督人员
小资产阶级	0.87	1.98	4.69	4.61		非管理者
		专家	技术	非技术		
美国		雇主		雇员		
资本家	-2.17	-2.62	-0.68	-1.09		管理人员
小雇主	0.35	-0.73	1.30	2.28		监督人员
小资产阶级	1.08	0.16	2.67	2.66		非管理者
		专家	技术	非技术		
日本		雇主		雇员		
资本家	0.17	0.32	2.10	1.83		管理人员
小雇主	0.76	0.68	2.68	1.57		监督人员
小资产阶级	3.08	1.09	2.61	3.07		非管理者
		专家	技术	非技术		

阶级结构矩阵单元中的数字是反对资本主义态度量表上的分值（范围从 -10 到 +10），其中负值表示赞成资本主义的倾向，正值表示赞成工人阶级的倾向。

图 14.1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义尺度所测量的那样，同来自多维度的阶级结构的剥削概念的理论预言十分一致。虽然经验上的一致性不能独自最后证明一个概念的有效性，然而它能给构成本书阶级分析基础的概念的基础增加可信性。

#### 14.4 研究结果：阶级形成的宏观分析

我们将以三种不同的直观形式描述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基本模式，因为每种形式都有助于揭示结果的不同特征。图 14.2 描述了研究结果，根据与附图 14.1 相似的方式指出了不同阶级位置的分值的一个单维意识形态系谱。图 14.3 代表了同在第 13 章图 13.7 所讨论的一样的双维联合图模式。图 14.4 描述了像阶级结构矩阵中的反对资本主义尺度的数值和位置间关系的三维图表一样的这些结果。（注意：在这些三维图表中，阶级结构矩阵中种类的顺序——图表中的水平面——已经发生了与图 14.3 和其他地方的等级程序不同的变化，以致在图表中没有隐藏线条。）图 14.1 中给出了这些图所基于的数据资料。

在我们开始对这三个国家之间阶级形成模式进行颇为明显对比之前，有两个类似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这三个国家，技术工人处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里，并且他们实际上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与非技术工人有完全相同的得分。这个发现支持了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看做“工人阶级”的构成的普遍实践。第二，在这三个国家，虽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总体构成非常不同，但专家经理是这个联盟的一部分。雇员中最具剥削和控制对方的阶级位置（专家经理）一贯是资产阶级形成的一部分，同时，最不具剥削和控制对方的位置（技术工人）是工人阶级形成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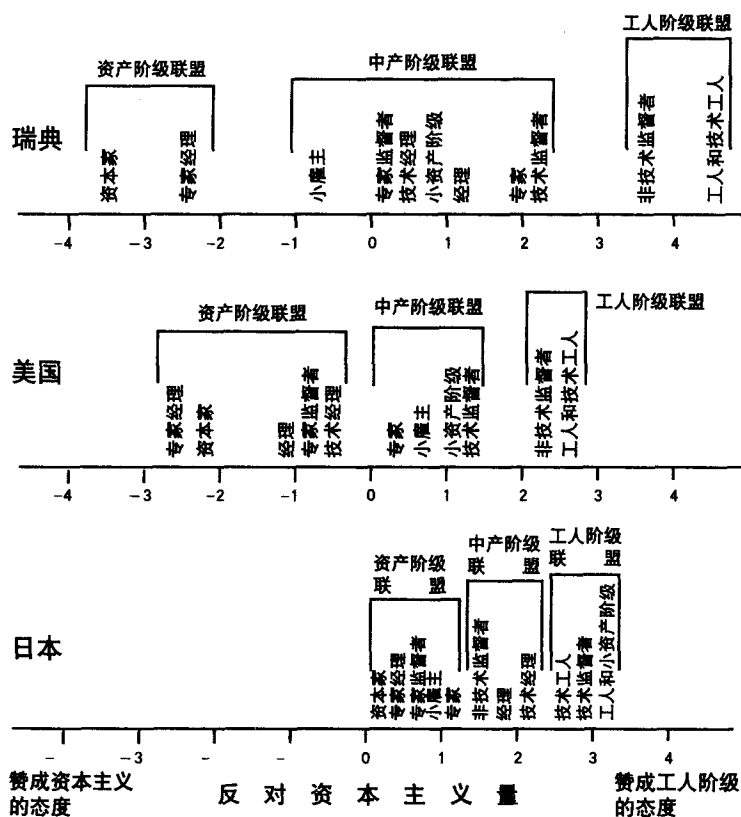


图14.2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系谱



## 瑞典

资本家	专家 经理	技术 经理	非技术 经理
小雇主	专家 监督者	技术 监督者	非技术 监督者
小资产阶级	专家	技术 工人	非技术 工人

## 美国

资本家	专家 经理	技术 经理	非技术 经理
小雇主	专家 监督者	技术 监督者	非技术 监督者
小资产阶级	专家	技术 工人	非技术 工人

## 日本

资本家	专家 经理	技术 经理	非技术 经理
小雇主	专家 监督者	技术 监督者	非技术 监督者
小资产阶级	专家	技术 工人	非技术 工人




-  资产阶级联盟  
 中产阶级联盟  
 工人阶级联盟

图14.3 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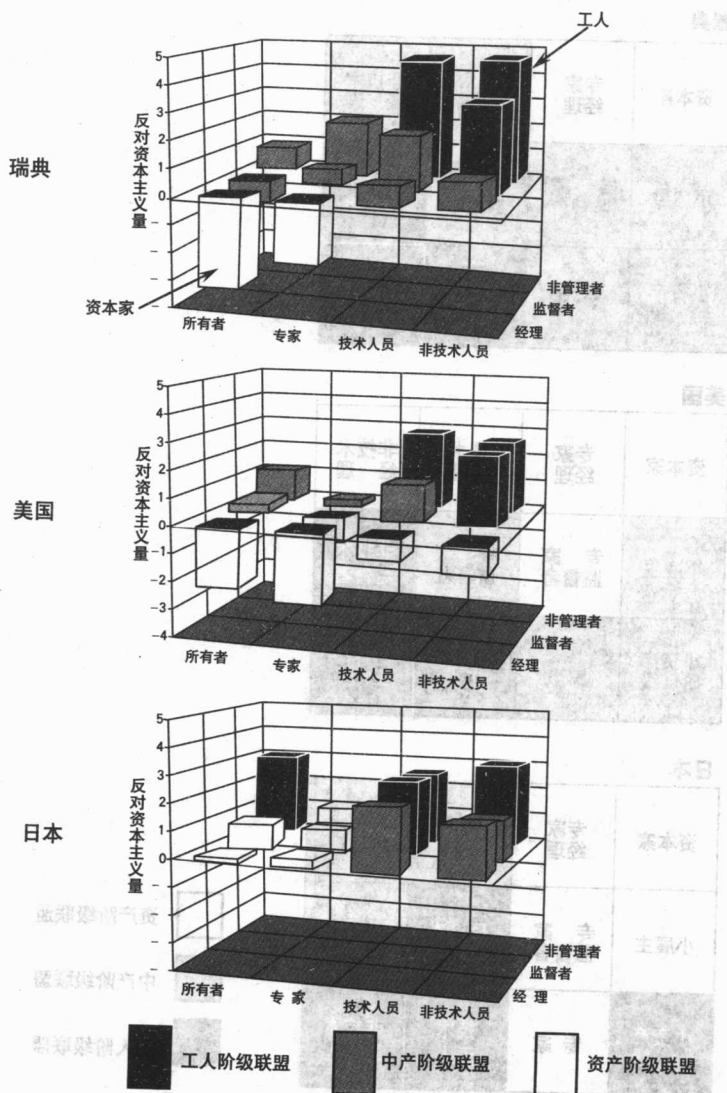


图14.4 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的三维表示

在其他方面，我们所讨论的三个国家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模式。让我们依次看看每个国家的情况。

## 瑞 典

正如图 14.2 所示，跨阶级结构位置的意识形态范围在瑞典比在其他两个国家大，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跨全部 8 个点以上。<sup>11</sup> 在这一意识形态范围，三个意识形态阶级联盟得到很好的界定，并明显地相互区别开来。每个联盟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以不超过 0.001 的显著水平相互区别。

工人阶级联盟包括三类阶级位置：工人阶级加上两个相邻的阶级位置——技术工人和非技术监督人员。这个联盟十分明显地在意识形态上给中产阶级联盟划清了界限。工人阶级联盟类别反对资本主义度量表上的最低值（非技术监督人员，3.50），比中产阶级联盟类别的最高值（技术监督人员，2.07）大得多（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

资产阶级联盟相对工人阶级联盟来说在意识形态上有更大分化。它由资本家和仅一类对立阶级位置——专家经理——组成。像工人阶级联盟一样，资产阶级明显地与中产阶级划清了界限。专家经理在赞成资本主义态度上比中产阶级联盟中有最赞成资本主义的——小雇主——高出 1.66 分。<sup>12</sup> 虽然在瑞典的样本中，资本家成员数很小（8），但很明显，他们比美国或日本的资产阶级持更强烈的赞成资本主义的观点。就瑞典总体政治而言，社会民主也许会成为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框架，甚至保守党的政策形象也受其影响，但瑞典资产阶级依然牢固地赞成资本主义。

在瑞典中产阶级联盟是非常广泛的，包括阶级关系中对立

位置的大多数雇员以及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这个联盟比其他两个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异质性更强。在这个中产阶级形成中有三类落入到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的“边缘区”(参见方法附录中的讨论,第二节,建构阶级形成边界的策略),并且这个联盟中的位置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几乎跨越了3个分数点(从-0.7到+2.07),比较而言,在资产阶级联盟和工人阶级联盟中仅跨越1个值点。<sup>13</sup>

## 美 国

在美国阶级结构中构建的意识形态阶级形成,在意识形态上,比瑞典的分化程度略低。特别是,美国工人阶级联盟明显的比瑞典工人阶级联盟反对资本主义程度轻。比较在瑞典的4.24,美国工人阶级联盟的未加权平均值是2.53。美国资本家和专家经理(在美国和瑞典资产阶级联盟中的两种位置)仅仅比瑞典同类人对资本主义的赞成的程度略小,-2.40对比-2.89。<sup>14</sup>这样描述两国意识形态系谱之间总的比较特征的方式就是,同瑞典相比,美国工人阶级联盟明显地趋于集中,而资产阶级联盟的核心部分(资本家和专家经理)同样处于右部(即赞成资本主义)。然而,虽然它的分化程度有些低,但三个意识形态联盟都依然在超过0.001的显著性水平相互区别。

美国工人阶级联盟包括同瑞典一样的三类人员。尽管明显不如瑞典工人阶级联盟激进,但几乎同样地同中产阶级联盟划清界限。工人阶级联盟中类别(非技术监督人员,2.28)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值最低,仍然比中产阶级联盟中具有最高分值的类别(技术监督人员,1.30)的值大得多(在0.05显著性水平上)。

在美国，资产阶级联盟比在瑞典更深层地扩展到对立阶级位置（主要参见图 14.3 和图 14.4）。所有这三个管理阶级位置以及专家监督人员都是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一部分。所以，不像在瑞典那样，管理部门牢固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合在一起。<sup>15</sup>

与瑞典相比，美国中产阶级联盟有些薄弱，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雇员中对立阶级位置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一体化为资产阶级联盟。中产阶级联盟与资产阶级联盟间划的界限清晰度也比与工人阶级联盟所划界限的清晰度低些。虽然中产阶级联盟和资产阶级联盟的总体均值差别很大（在  $p <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但最接近这两个联盟的“边界”的两类（中产阶级联盟中的专家和资产阶级联盟中的技术管理人员）差别并不很明显。

## 日 本

在日本，意识形态阶级形成模式展示了一个与美国和瑞典的鲜明对比。首先，整个意识形态系谱与其他两国相比，有非常大的压缩。尤为明显的是，资产阶级和专家经理移到了反对资本主义尺度的中部。这两类人合在一起比瑞典和美国（同时，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这两类人在瑞典和美国之间并无差别）同样的两类人明显地反对资本主义强度低（0.01 显著性水平）。事实上，在日本，资产阶级联盟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值几乎全部落入其他两个国家中产阶级范围内。比较而言，日本工人阶级联盟在反对资本主义态度上与美国工人阶级联盟无重大差别。作为缺乏高度对抗的阶级形成的日本社会的传统形象，也因此得到了这些数据资料的明确支持。虽然这三个意识形态

联盟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仍然差别显著,<sup>16</sup>但这些联盟之间划分的界线没有其他两国清晰。

不但阶级结构的意识形态分化的总的程度在日本比在瑞典和美国小的多,而且反映在意识形态分歧中的阶级形成模式也十分不同。特别是,在日本雇员中意识形态分歧线在专家和非专家之间,比在权力维度要明显得多。相比较而言,在瑞典和美国,沿着这两个维度的分歧大体相当。

在图 14.4 的三维图像中以尤为严格的方式揭示出这些比较。与其他两国相比,在日本,沿着权力维度的分歧是十分柔和的。在专家中间和技术雇员中间,这一点尤其明显。在日本,跨权力层次的这两类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而在瑞典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明显的和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例如,我们看看技术雇员。在日本,技术雇员中的管理人员、监督人员和非管理人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值分别是 2.1、2.68 和 2.16。在美国,相应的值为 -0.68、1.30 和 2.67,在瑞典,相应值分别为 0.6、2.07 和 4.60。所以,技术雇员中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在日本是 0.5,在美国是 3.3,在瑞典是 4。非技术监督人员(反对资本主义分值为 1.57)和非技术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分值为 3.07)之间的比较的一个例外是,在日本跨权力层次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

与对于权力的这些模式形成对照的是,在权力层级内的专家和技术雇员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方面,日本与瑞典和美国的不同较少。专家管理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之间在反对资本主义上的差别,瑞典是 3 分,美国是 1.9 分,日本是 1.8 分。监督人员中这三个国家相应数字为 1.5、2.0、2.0。而非管理雇员中为 2.6、2.5 和 1.5。

正如在图 14.3 中所看到的,在日本,这些意识形态分歧模

式方面的差别产生了非常不同的阶级形成模式。首先来看资产阶级联盟：在日本，权力等级各级别的专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一部分，而技术和非技术管理人员却不是。这与美国及瑞典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各技术层次的管理人员都是资产阶级联盟的一部分；在瑞典，只有专家管理人员才是该联盟的一部分。所以，在日本，看起来是资格而不是组织地位构成了意识形态联结资产阶级的基础。

正如我们的程序所测量的，日本的工人阶级联盟有一个奇怪的状态，它由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以及技术监督人员而不是非技术监督人员组成。这些结果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对立阶级位置的概念框架中，人们通常会认为，与技术监督人员相比，非技术监督人员会有更多的和工人的利益一样的利益，从而更强烈地倾向于成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一部分。对瑞典和美国而言，这是肯定的事实。而对这些特殊的结果，我给不出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它们也许反映出在对日本的技术和非技术之间区别的操作中某些重大的测量问题。但是，这些结果反映出阶级位置——与诸如雇佣形势、雇佣部门、年龄或某些其他因素方面——的变化之类事物的某些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可能的。不幸的是，在这些类别中个案数目太少，以至我们不能在经验上为这种明显的反常探讨可能的解释。无论如何，正像我们已经特别提到的，在日本，技术和非技术监督人员之间的差别甚至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日本和其他两个国家的最后一项比较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在日本，正像工人阶级一样，小资产阶级也一样反对资产阶级，并且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牢固的组成部分。在瑞典和美国，小资产阶级是中产阶级联盟的一部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分值上明显地低于工人阶级。在这些方面，日本模式看上去颇像美

国几代人之前的类似平民主义的主张。该主张中，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反对资本家。日本继续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小资产阶级，并且它呈现出有一个与工人阶级相当接近的意识形态形象。<sup>17</sup>

### 三国比较概要

把阶级形成的宏观分析的所有结果集中到一起，我们已检测过的三个国家间的三个对比就突显出来了：

1. 跨阶级形成的意识形态分化程度在这三个案例中显著不同。瑞典最分化，日本分化程度最低，美国介于二者之间。这些分化程度上的差异不是来自于跨阶级的意识形态变化范围中的系统下降。与瑞典相比，美国工人阶级联盟反对资本主义的程度相当低，但资产阶级联盟的核心在赞成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两国之间几乎不存在差别。对比而言，在日本，资产阶级联盟和工人阶级联盟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如他们的瑞典同类那么极端。

2. 虽然专家经理在这三个国家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核心联盟合作者，但在这三个案例中资产阶级联盟的总体形态却极为不同。在瑞典，资产阶级联盟处在这个核心内。在日本和美国，该联盟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相当纵深地伸展到雇员的对立阶级位置中。在日本系统地通过资格，而不是通过权力，把对立阶级位置合并成了资产阶级形成，而在美国情况正相反。因而权力级别体系在美国比在其他两个国家，在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扮演一个更为核心的角色，而在日本，资格是一个更为核心的角色。

3. 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较，瑞典和美国彼此更相似。工



人阶级形成的状态在美国和瑞典是一致的，并且明显地在意识形态上与中产阶级联盟不同，在美国即使资产阶级联盟深深地渗入雇员位置，而在做法上，它完全与瑞典的基本模式一致。在这些方面，日本是十分不同的。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工人阶级形成更多带有人民党主义的特征，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与中产阶级差别很小。中产阶级联盟看上去也完全与其他两国不同。此外，在瑞典和美国，雇员中的技术和权力维度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而在日本，仅由有资格证书的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比较就构成雇员间分歧的一贯根源。

#### 14.5 对阶级形成中差别的解释

系统地检验我们已经制定出的阶级形成的跨国模式的可选择的解释，超出了本研究项目的资料能力。最终这要求构筑一个对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和机构建立——尤其是工会、政党和国家——的历史轨迹的描述。但是，通过查看那些可能巩固我们所检测过的意识形态构成成分的某些相近的机制因素，我们能得到某些有关解释的有启发性的想法。我们将先集中在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比较，然后转向日本问题。

瑞典和美国之间阶级形成模式的总体差别可以从两个对比来概括：第一，在美国，资产阶级形成渗入中产阶级的程度比瑞典大得多，第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工人阶级形成与资产阶级形成在瑞典比在美国更两极分化。

在第十三章设计的阶级形成分析的概念框架里，阶级形成被视为两组因果因素的结果，一个与阶级结构对阶级形成的影响相联系，另一个与阶级斗争对阶级形成的影响相联系。阶级结构被看做通过它影响人们的物质利益、认同和资源的方式而

决定阶级形成。阶级斗争则被视为通过影响集体行动组织而决定阶级形成。所以，在阶级位置和物质利益的联系非常不同的案例中或阶级位置与组织能力的联系非常不同的形势下，应该预料到阶级形成的模式有所不同。我们将探讨反映这两个因素的两个具体机制：国家雇佣和工会组织。

### 国家雇佣

就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分离而言，国家雇佣可能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在资本家公司内，通过如职业等级、垂直提升、工作保障等机制，以及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的，各种股利、管理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利益倾向于与公司本身的利益紧密联系，并因此，私有公司雇佣的中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倾向于与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紧密联系。<sup>18</sup>然而，在国家内，中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这种联系远非这样直接。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雇员的薪水依赖国家收入，而国家收入依赖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依赖利润，但一般国家雇员的物质利益并不直接依赖某一特定的资本家的利益。所以，国家雇佣能潜在地构成为中产阶级发展与资产阶级利益感相当不同的自己的阶级利益感的一个物质基础。相同条件下，在一个国家部门庞大的社会里，人们会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将比在一个国家部门相对较小的社会里，更独立于资产阶级。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物质命运比在瑞典更直接地与公司资本主义的命运相联结。在美国仅有约18%的劳动力被国家雇佣，虽然，对不处于工人阶级联盟中的那些中产阶级位置来说，这类数字一般来说是较高的（约23%为国家所雇佣），但事实依然是，大多数中产阶级职位在私有部门。相比较而言，在瑞典，整

体劳动力的 38%，以及中产阶级对立位置的近 50% 被国家直接雇佣。这使得瑞典的中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更不直接。并因此为特殊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形成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表 14.1 中给出了支持这个解释的一些证据。在美国，国家部门中的“中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即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之外的雇佣劳动者），一般地，比在私有部门中的中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倾向上，赞成资本主义的程度明显低。这个对比在专家管理人员（最接近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对立阶级位置）中间尤为明显。在国家部门中的专家管理人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值为  $-0.04$ ，而在私有部门中的值则为  $-3.59$ （差别在  $p < 0.05$  显著性水平）。此外，美国在国家部门的中产阶级雇员与瑞典国家部门中的雇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数值无重大差别（ $1.37$  与  $1.56$  相比）。<sup>10</sup> 所以，美国中产阶级非常保守的形象主要集中于美国经济的私有部门。在瑞典，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雇员之间的差别在范围上像美国的一样，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明显。或许，这表明在国家部门庞大的条件下，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更大的脱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主性，而不仅仅是实际上由国家所雇佣的中产阶级成员。因此，瑞典资产阶级联盟仅限于中产阶级的专家经理，而美国资产阶级联盟则深深地扩展到管理阶级位置，这可能是瑞典阶级结构中国家雇佣起了较大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第十五章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 工会组织

巩固一个阶级形成的边界的第二个相近的机制是集体组织，

其中对工人阶级形成而言，工会组织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预期，在工会基础广泛并且在组织上有自治权，并且脱离了资产

表 14.1 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中各阶级类型在反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

	美国		瑞典		日本 <sup>a</sup>	
	国家 (N)	私有 (N)	国家 (N)	私有 (N)	国家 (N)	私有 (N)
资产阶级或中产						
阶级联盟中的类别						
专家经理	-0.04 (8)	-3.59 (23)	-2.00 (10)	-2.55 (19)		
专家监督者	-0.05 (13)	-0.92 (47)	0.16 (18)	0.51 (17)		
专家工人	0.62 (10)	-0.01 (26)	1.88 (25)	2.06 (29)		
技术经理	-2.13 (5)	-0.52 (44)	1.50 (8)	-0.42 (7)		
技术监督者	2.56 (1.44)	0.85 (119)	2.29 (53)	1.78 (41)		
非技术经理	4.00 (1)	-1.37 (12)	8.00 (1)	0.19 (8)		
总计	1.37 (80)	-0.23 (271)	1.56 (115)	0.76 (121)	1.92 (9)	1.44 (106)
国家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差别的显著水平 (单尾检验) <sup>b</sup>						
		p<0.005		p<0.10		p<0.35
工人阶级联盟中的类别						
非技术监督者	2.56 (14)	2.25 (112)	4.50 (20)	2.93 (35)		

续表

技术工人	2.73 (69)	2.63 (127)	3.52 (106)	5.62 (112)		
非技术工人	3.07 (96)	2.58 (485)	4.52 (174)	4.67 (287)		
总计	2.89 (179)	2.53 (724)	4.16 (300)	4.77 (434)	4.31 (21)	2.74 (283)
国家和私有部 门之间差别的 显著性水平 (双尾检验)	p<0.15		p<0.07		p<0.04	

a.因为在日本样本中仅有30名国家雇员,对在特定阶级位置内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态度上的差别,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估计。

b.因为中产阶级内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假设有一个特定方向,所以单尾显著性检验是合适的。对工人阶级联盟而言,用双尾检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方向性假设。

阶级的地方,比在工会较弱又缺乏真正自治权的地方,工人阶级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更两极分化。

瑞典和美国在它们各自的工会运动性质方面提供了清晰的比较。虽然两个国家的工会在组织上都比较脱离资产阶级而自治——公司工会在这两国都无明显特征——但是,瑞典的劳工运动比美国的劳工运动有更广泛的基础。在美国工人阶级联盟中,24.4%的是工会成员,在瑞典是82.6%。也许,更明显的是,在瑞典,在中产阶级对立阶级位置中的工会组织率很高。在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之外的中产阶级对立位置中的人们83.9%属于工会,比较而言,美国仅有10.3%。美国的低数字部分地反映了美国劳工运动整体较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对“管理部门”部分正式人员中工会组织的法律障碍。在管理阶级

位置（专家经理、技术经理和非技术经理）人们中微小的工会组织率也反映了这一点：在美国，我们的样本中处于这种位置的人们，92人中仅有2名是工会成员，比率为2.2%，而在瑞典，53个处于管理阶级位置的人中，60.4%属于工会。<sup>20</sup>

那么，瑞典的这种工会组织的较高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化程度在瑞典比在美国更大？表14.2表明，在美国和瑞典两个国家中，所有阶级位置中工会成员和非成员间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差别。这些意识形态差别在瑞典中产阶级的各类位置中尤其明显。对瑞典中产阶级中大多数对立阶级位置而言，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工会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在4到5分之间。<sup>21</sup>结果是加入工会的工人和没加入工会的专家经理之间的差别在尺度上相差接近11分。

就我们当前所关心的而论，与这些结果特别相关的是，在瑞典和美国的工人阶级联盟内，这两个国家非工会成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无显著差别。美国工人阶级联盟中未参加工会的人员平均值是2.24，而在瑞典是2.41。另一方面，参加工会的成员的均值差别显著( $p < 0.001$ )：瑞典是4.97，美国是3.72。

因此，瑞典工人阶级联盟总体上更反对资本主义，部分是由于瑞典工会成员比美国工会成员更反对资本主义，部分是由于瑞典工人阶级联盟的工会比率比较高。我们可以通过做一种反事实游戏来估计这些成分的粗略的大小量。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

1.如果(1)有同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一样的工会比率，但(2)在美国工人阶级联盟中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在尺度上的数字依然是同现在的一样，那么，对美国工人阶级联盟而言，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将会是多少？

表 14.2 阶级类别中工会成员和非成员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

	美国				瑞典				日本				
	工会		非工会		工会		非工会		工会		非工会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成员数	
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联盟中的类型													
专家经理	-0.03 (1)	-2.74 (30)	-0.84 (20)	-5.75 (9)	0.67 (3)	0.26 (19)							
专家监督者	2.59 (3)	-0.89 (58)	1.41 (29)	-3.5 (6)	0.56 (4)	0.71 (14)							
专家工人	1.45 (2)	0.08 (33)	2.36 (48)	-1.0 (6)	1.17 (6)	1.00 (5)							
技术经理	5.0 (1)	-0.76 (48)	3.00 (8)	-2.14 (7)	2.25 (4)	2.06 (17)							
技术监督者	4.06 (29)	0.71 (134)	2.30 (89)	-2.0 (5)	3.71 (7)	2.08 (12)							
非技术经理	(0)	-1.09 (12)	2.25 (4)	0.10 (5)	3.60 (5)	1.37 (19)							
总计	3.65 (36)	-0.27 (315)	1.89 (198)	-2.72 (38)	2.21 (29)	1.23 (86)							

续表

	美国		瑞典		日本	
	工会成员数	非工会成员数	工会成员数	非工会成员数	工会成员数	非工会成员数
工会成员和非成员间差别的显著水平(单尾检验)。	p<0.001		p<0.001		不显著	
排除专家管理人的总计	3.75	-0.01	2.19	-1.78	2.31	1.50
工会成员和非成员间差别的显著水平(单尾检验)	p<0.001		p<0.001		不显著	
美国和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中的类别						
非技术监督者	4.37 (19)	1.90 (107)	4.44 (45)	-0.73 (10)	1.62 (8)	1.54 (17)
技术工人	3.56 (59)	2.27 (136)	5.04 (189)	1.77 (29)	2.43 (27)	2.74 (39)
非技术工人	3.71 (143)	2.32 (439)	5.00 (372)	2.97 (89)	3.13 (73)	3.03 (140)



续表

	美国		瑞典		日本	
	工会 成员数	非工会 成员数	工会 成员数	非工会 成员数	工会 成员数	非工会 成员数
总计	3.72 (222)	2.24 (681)	4.97 (606)	2.41 (128)	2.85 (108)	2.84 (196)
工会和非工会成员 间差别的显著水平 (单尾检验)	p<0.001		p<0.001		不显著	不显著
日本工人阶级联盟 总数(技术监督者, 技术工人, 非技术 工人)					3.00	2.91
差别的显著水平					(107)	(191)

a. 工会和非工会成员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假设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所以单尾检验显著水平是合适的。

2.如果(1)工会的比率与实际的一样,但(2)美国每个工人阶级联盟中工会成员和非成员与瑞典同等人员在尺度上的数字相同,那么,就美国工人阶级联盟而言,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将会是多少?

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所有变化都是工会比率的变化的前提下,把尺度上的平均数归因于美国工人阶级联盟;第二个问题假定所有变化都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在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国家工人阶级联盟之间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方面总的差别分解成三部分:一个部分反映了工会比率(分布效果)方面的差别,一个部分反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以及一个互相作用的部分。互相作用项是数学上的剩余,它是当前两个结果的总和与两国间总的差别不等时产生的。表14.3展示了该结果。

在这个反事实的游戏中,美国和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之间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总差别的不足45%可归因于瑞典工会比率较高,大约20%可归因于瑞典工会成员比美国工会成员更激进这样的事实,大约35%可归因于这两个影响的互相作用。所以,单纯较高水平的工会组织事实,在实质上促进了瑞典工人阶级形成和资产阶级形成之间更大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sup>22</sup>

当然,这个分析完全是静态性质的。由于意识形态分化程度进入工会比率变化的解释,把反事实的情况作为一个动态命题完全是不现实的。在上一章详细描述的动态的微观—宏观模型中,阶级斗争改变阶级形成,但是那些阶级斗争本身是由带特定意识形态的个人阶级实践所构成的。从而,与美国相比,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中工会成员更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资本主义,既是瑞典劳工运动力量的一个结果(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也

表 14.3 美国和瑞典工人阶级联盟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分解

国家内意识形态实际平均分数	
(1) 美国工人阶级联盟平均意识形态分数	2.60
(2) 瑞典工人阶级联盟平均意识形态分数	4.52
(3) 美国与瑞典平均意识形态分数总差别 反事实意识形态分数	1.92
(4) 如果美国有了瑞典工会成员分布 + 美国 工会和非工会平均意识形态分数, 美国 平均意识形态分数	3.40
(5) 如果美国有与瑞典同样的工会和非工 会平均意识形态分数 + 美国工会成员分布, 美国平均意识形态分数实际国家差别分解 后的成分	3.04
(6) 分布影响 (4) - (1)	0.86
(7) 意识形态影响 (5) - (1)	0.44
(8) 互相作用影响 (3) - (6) - (7)	0.62
(9) 可归因于分布影响的两国间总体差别 百分数 (6) ÷ (3)	44.8%
(10) 可归因于意识形态影响的两国间总体 差别百分数 (7) ÷ (3)	19.8%
(11) 可归因于互相作用影响的两国间总体 差别百分数 (8) ÷ (3)	35.4%

是对运动力量的历史性解释的一部分。在当前的研究中, 还无法区分该动态过程的这两个方面。<sup>23</sup>

## 日 本

在日本案例中, 需要解释把日本与美国和瑞典区分开的两个特征: 第一, 与另外两国相比, 总的意识形态两极化程度非常低; 第二, 沿着阶级结构的管理维度, 缺乏明显的意识形态

的分歧的形式。

日本的传统形象是这样一个社会：公司是以相对合作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多数工人，而不仅仅是经理，都具有高度的忠诚而冲突则是低水平的。在许多公司里，经理在承担他们的管理责任之前曾长期在基层做普通工人的工作，这进一步削弱了上下级对抗感。许多观察家认为，回报使日本公司能获得高生产率，因为人们的精力相对较少耗费在破坏性冲突上。<sup>24</sup>

正像为数众多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日本的这一通常的形象在几个重要方面是误导的。虽然根据国际标准，基本劳资关系是相对协调的，但这些高度合作与忠诚主要适用于有终身雇佣保障的公司经济核心的工人；在核心公司中大量的非全日和临时工人，以及为数众多的小公司中的工人在这种体制中收到的利益甚微（乔尔蒙斯，1989；戈登，1985；津田益美，1973）。此外，正像日本工厂的许多批评观察家所强调的，这些看起来协调的关系是与工人中激烈的竞争、遍布的监督和作业业绩的社会监督相关联的（多斯，朱更斯和马尔施，1985；镰田觉，1982）。

表14.2中工会成员和非成员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结果给我们一些关于日本案例中工作基本过程的线索。日本资料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工会成员和非成员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在工人阶级联盟内部（不管我们是否用了日本或瑞典/美国关于这个联盟的说明）。而在瑞典和美国，工人阶级联盟中的工会成员比非成员在反对资本主义上高出1.5到2分，在日本这些群体的差别仅为0.09分（用日本工人阶级联盟的说明）。对中产阶级而言，对比同样明显：瑞典和美国中产阶级联盟工会成员比非成员在反对资本主义上高出大约4分，而日本仅约0.8分。

这些结果表明，日本工会不是一个有系统地陈述和代表特殊阶级利益的组织基础。正像批评家常常提出的，日本工会功

能基本上像公司工会，是为公司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保护工人利益的。没有一个为阶级利益发言的自治组织基础，在意识形态上，阶级形成变得模糊，有扩散的边界和淡弱的对抗。结果是一个低度分化的阶级形成模式，尤其是沿着阶级关系权力维度分化的程度很低。

正像在对瑞典和美国之间差别解释中的那样，这是纯粹的静态解释：假定存在公司工会并缺乏任何为一个工人阶级形成的自治组织基础，日本阶级形成将相当非两极化和划界模糊。当然从动态上看，这些意识形态构成本身造成自治的工人阶级组织的缺乏并且阻碍任何改变日本阶级形成的策略。在这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阶级形成并不总是那样非对抗和非两极化。20世纪50年代早期是一个劳工激烈冲突和大量流动时期，有态度强硬的工会和定期的普遍的罢工。确实，只是在这些运动失败和被镇压之后，现在的准公司工会模式才得到巩固加强，并和现在的“合作的”劳资关系形式结合起来。<sup>25</sup>

## 14.6 阶级意识的微观分析

迄今为止，我们都是集中于阶级形成的宏观模式，用意识形态作为描绘阶级形成的边界标准。当然，个人获得他们的意识的过程就包含在这个分析里，既因为我们的测量全部基于个人对问卷条款的回答，也因为不提到组成这些群体的个人的利益和经验上的差别而讨论群体间的差别是不可能的。然而，就我们讨论的范围而言，我们还没有对解释这种跨个人的变化感兴趣。而现在我们所开始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正像表14.2所讨论的，我们将进行两类不同的对个人阶级意识的分析。首先，我们将把来自三个国家的资料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资料集，并检验与阶级相比较的民族的相对解释力。第

表 14.4 阶级意识的阶级决定因素: 三个国家的结合

	B	s.e.	beta
方程 (1): 仅仅			
阶级位置*	1.00	0.05	0.32***
Adj.R <sup>2</sup> =0.10			
方程 (2): 阶级 + 过去阶级经验 + 人口统计 + 现在阶级关联物			
阶级位置	1.00	0.10	0.20***
工人阶级出身	0.16	0.17	0.02
资本家阶级出身	-0.46	0.20	-0.04*
先前的自我雇佣者	-0.27	0.26	-0.02
先前的监督者	-0.24	0.22	-0.02
先前的失业	0.93	0.17	0.10***
性别 (女性=1)	0.20	0.17	0.02
年龄	-0.016	0.006	-0.05**
个人收入	-0.14	0.04	-0.07***
不劳而获的收入 (虚拟)	-0.14	0.17	-0.01
资本家网络	-0.25	0.08	-0.06**
工人阶级网络	0.07	0.05	0.02
户主	-0.57	0.17	-0.07***
工会成员	2.04	0.17	0.22***
Adj.R <sup>2</sup> =0.17			
方程 (3): 仅仅国家			
日本 (0 / 1)	-0.81	0.22	-0.07***
美国 (0 / 1)	-1.59	0.18	-0.17***
Adj.R <sup>2</sup> =0.02			
方程 (4): 阶级和国家			
阶级位置	1.0	0.05	0.32***
日本 (0 / 1)	-0.45	0.22	-0.04*
美国 (0 / 1)	-1.41	0.18	-0.15***
Adj.R <sup>2</sup> =0.12			
方程 (5): 阶级 + 过去阶级经验 + 人口统计 + 现在阶级相关物 + 国家			
阶级位置	1.00	0.11	0.18***
工人阶级出身	0.26	0.17	0.03

续表

资本家出身	-0.50	0.20	-0.05**
先前的自我雇佣者	-0.10	0.26	-0.01
先前的监督者	0.07	0.23	0.01
先前的失业者	1.04	0.17	0.11***
性别(女性=1)	0.16	0.17	0.02
年龄	-0.016	0.006	-0.05**
个人收入	-0.20	0.04	-0.10***
不劳而获的收入(虚拟)	-0.09	0.17	-0.01
资本家网络	-0.18	0.085	-0.04*
工人阶级网络	0.10	0.05	0.04*
户主	-0.55	0.17	-0.06***
工会成员	2.00	0.20	0.22***
日本(0/1)	0.89	0.25	0.08***
美国(0/1)	-0.43	0.21	-0.05*
Adj.R <sup>2</sup> =0.18			
方程(5a): 带有联合变量b的方程 <sup>5b</sup>		Beta	
阶级位置		0.18***	
过去阶级经验		0.13***	
人口统计		0.05**	
现在阶级相关物		0.15***	
工会成员		0.22***	
国家		0.11***	
Adj.R <sup>2</sup> =0.18			

显著水平(单尾检验, 因为对多数系数的预言是定向的):

\*\*\*p&lt;0.001

\*\*p&lt;0.01

\*p&lt;0.05

- a. 由于在这个方程里, 对于测量阶级位置的11个虚拟变量中每一个而言, 单个系数并不重要, 虚拟变量被一个聚合的阶级变量所取代, 该取代变量有一个代表阶级位置和意识之间总体关系的单独系数。详见第十四章方法附录第4节。聚合的阶级位置变量总有一个非标准的系数1.0, 而这个变量的标准beta系数表明与这个方程中其他变量相比的相对的解释力。
- b. 变量的集合从——过去的阶级经验、人口统计和现在的阶级相关物是以注a所描述的聚合的阶级位置变量的同样方式构建的。见方法附录第4节。

二，我们将调查研究对每个国家单独估计的更复杂的多变量方程系数上的差别。

### 附加的国家影响

表 14.4 提供了（在 14.2 节中所描述的）回归方程式的标准系数，在表中，三个国家的样本合并成一个单独的资料集。方程 1 仅包括阶级位置，而方程 2 则增加了过去的阶级经验、年龄、性别、当前阶级经验和现在物质条件。由于三个国家的样本被合并到这些方程式中，系数应该作为每个国家的系数的平均数来解释，应根据每个国家样本规模来加权。在这个合并的样本中，阶级位置单独可解释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数值差异大约为 10%。当在方程 2 中增加了过去的阶级经验、年龄、性别、当前阶级经验和现在物质条件时，解释力增长到 17%。

方程 3 仅包括两个国家的虚拟变量。它们一起解释变化的仅约为 2%。方程 4 包括国家与阶级的虚拟变量；方程 5 包括国家以及方程 2 中的变量。方程 5a 为方程 5 在巩固的形式上提供了系数，在这一形式中单一的系数用于代表在原始方程中的每组变量的结合的结果。这些方程清楚地表明，在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分数上，与阶级位置相比，国家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决定因素。的确，在方程 5a 中，对国家而言的次级系数比任何与阶级有关的次级系数更小，并且在方程 4 中，对国家而言的  $R^2$  是方程 1 仅有的阶级位置的  $R^2$  的 1/5。所以，至少在诸国家合在一起的样本中，如果你想预测个人的阶级意识，知道他们所在的阶级比知道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更重要。



### 微观方程的跨国比较

在表14.4中，国家是作为一个附加变量处理的。无需说，从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阶级形成方面的跨国变化看，这不是一个制作关于国家对个人意识影响的模型的令人满意的方式。一个较合适的模型包括国家相互作用，我们从中分别估计每个国家样本的回归方程并检测系数上跨国的差别。表14.5中给出了这些结果。

跨三个国家的这些方程上有几个显著的对比。首先，方程的总体预测能力在瑞典最强并且差距很大，日本最弱。在瑞典，方程2解释了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差异的24%，这对一个态度因变量而言是相当可观的 $R^2$ 。由于态度尺度中所观察的差异的一大部分是由跨个人的测量问题和随机变化引起的，“可解释的”差异比总的差异要少得多。<sup>26</sup> 从而，对一个态度差异方面的总体差异的1/4的解释表明，这个因变量与方程中的自变量联系得十分紧密。在美国方程中，16%的 $R^2$ 在态度变量上也有相当的回归特征。然而对日本，8%的解释差异则相当低，表明对日本而言这些变量不能解释反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大量差异。

第二，每一组与阶级紧密相联的变量在瑞典比在其他两个国家都更具强烈的预测意识，几乎每一个与阶级联系紧密的变量在瑞典比在美国尤其是比在日本，与意识的联系都更加紧密。在瑞典一组阶级虚拟变量本身就解释了态度尺度中差异的16%，比较而言，在美国是9%，在日本是5%。在多变量方程中（方程2），阶级位置虚拟变量集合组的系数，在瑞典是0.27，在美国是0.16，在日本是0.13。在过去的阶级经验，现在的阶级经验和工会成员身份诸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差别。所以，阶级位置

和阶级经验似乎决定意识，这在瑞典最普遍，在日本最不普遍。

第三，那些表现消费而不是直接反映阶级的变量，在美国和日本比在瑞典是更好的预测器。作为一个群体，消费变量的系数在瑞典是0.09，比较言之，在美国是0.15，在日本是0.20。这与第十章中对瑞典和美国的劳动力中已婚妇女的阶级认同方面的结果的解释相一致：相对于瑞典，在美国，阶级的主观构成呈现出主要是围绕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至少根据反对资本主义尺度的结果，这在日本表现的甚至更强烈。

表 14.5 瑞典、美国和日本的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

	瑞典	美国	日本
方程 (1)			
阶级位置 <sup>a</sup>	0.41***	0.31***	0.26***
校正 R <sup>2</sup>	0.16	0.09	0.05
方程 (2)			
阶级位置	0.27***	0.16***	0.13**
过去阶级经验			
工人阶级出身 (0 / 1)	0.04	-0.01	0.07*
资本家阶级出身 (0 / 1)	-0.06*	-0.05	-0.02
先前的自我雇佣者 (0 / 1)	-0.06*	0.00	0.07
先前的监督者 (0 / 1)	-0.06*	0.05	-0.01
失业的经历 (0 / 1)	0.13***	0.09***	0.04
现在阶级经验			
资本家阶级网络	-0.07*	-0.04	0.01
工人阶级网络	0.06*	0.02	-0.02
工会成员 (0 / 1)	0.23***	0.17***	0.07
消费			
个人收入	-0.05	-0.13**	-0.19***
不劳而获的收入 (0 / 1)	0.01	-0.02	0.03
户主 (0/1)	-0.07**	-0.05*	-0.01
人口统计			
性别 (女性=1)	-0.02	0.02	0.06

续表

年龄	0.02	-0.12***	0.00
经调整的 R <sup>2</sup>	0.24	0.16	0.08
带有变量集合丛的方程 (2 <sup>b</sup> )			
阶级	0.27***	0.16***	0.13**
过去阶级经验	0.18***	0.11***	0.12**
现在阶级经验	0.11***	0.05*	0.03
工会成员	0.23***	0.17***	0.07
消费	0.09***	0.15***	0.20***
人口统计	0.03	0.12***	0.06
(样本数)	(1089)	(1471)	(608)

显著水平 (单尾检验, 由于多数系数的预测是定向的):

\*\*\*p<0.001

\*\*p<0.01

\*p<0.05

a. 见表 14.4 注释 a 和方法附录第 4 节的解释。

b. 见表 14.4 注释 b 和方法附录第 4 节的解释。

最后, 在多变量方程中, 没有哪个国家, 其性别是阶级意识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并且仅仅在美国, 年龄才有重大影响。我没有对美国的年龄系数的具体解释。最为可能是, 这反映了历史上的同代人的一个影响, 美国的年轻的同代人, 也许特别是“60年代的一代”, 比老一代人更具批判资本主义的态度。如果这是对年龄系数的正确解释, 那么在意识形态上这些代际间分歧在美国比在其他两个国家更强烈, 也许这表明,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经历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构成一个比其他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大的断裂性。

#### 14.7 关于阶级、种族、性别和意识的简短注解

由于样本规模的限制, 用这个比较阶级分析项目的数据去

系统地探索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阶级、种族和性别交互作用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还是值得简要地看一看在美国跨种族、性别和阶级类型的意识方面总体变化的模式，因为这些结果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并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

图 14.5 给出了在“扩大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中黑人和白人男女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平均值。<sup>27</sup> 这些结果的最显著的特征是，阶级内部（尤其是工人阶级内部），阶级意识方面种族差别比性别差别大得多。在工人阶级内，白种男人（2.41）与白种女人（2.38）之间或黑种男人（3.8）和黑种女人（3.5）之间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数值上不存在明显差别，而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的确，在美国黑种和白种工人之间的差别的大小次序，像美国和瑞典工人之间的差别一样。

把工人阶级中在意识方面种族差别之所以大于性别差别，仅仅解释为阶级类别内部的异质性的一个结果，这总是可能的。图 14.5 中广泛类别的“扩大的工人阶级”内，黑人男女倾向于集中在最无产阶级化和最受剥削的部分。所以，黑种工人较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值，完全可能是这个类别的组成部分中种族差别的一个产物。这些组成部分的影响在种族类别内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大大减弱，是因为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意识的影响。<sup>28</sup>

一个更有趣的解释集中在人们生活中不同的压迫形式之间的联系。一个恰当论点就是，种族不平等比性别不平等与阶级压迫联系得更紧密。在美国，种族压迫从最早期的形式来看，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特定的阶级关系，即奴隶制度。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种族—阶级关联减弱了，但种族上受压迫的团体所经历的不利处境的内容与阶级紧密相关依然是事实。<sup>29</sup> 由于与阶级的这种紧密联系，种族压迫本身可能倾向于产生一个围绕阶级问题的高度批判意识。性别不平等与阶级的联系不那么紧

## 反对资本主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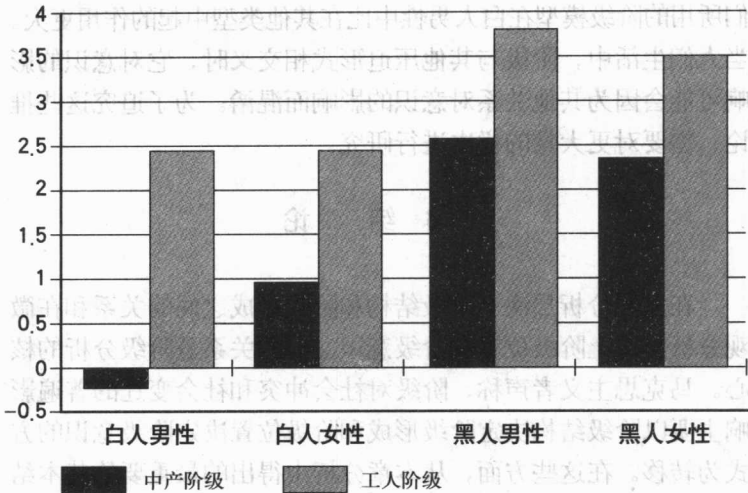


图14.5 美国在阶级意识方面的种族和性别差异

密，并因此性别压迫的经历不能很直接地变成阶级不平等的批判意识。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中男女有同样层次的阶级意识，而黑种工人却比白种工人更反对资本主义。

应该注意到图 14.5 中的结果的另一个方面：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在白种男性中比在白种女性或黑人中大得多。黑人男性和女性中，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分值比中产阶级的人们平均值高出约 1.2 分。在白人女性中高出约 1.5 分。比较而言，在白人男性中，工人分值比中产阶级高 2.6 分。正如阶级内种族差别的结果中所言，这些结果可以部分地由团体内阶级分布构成的差别而产生：在白人男性中，由专家经理组成的“中产阶级”类别比在其他群体中的比例更高，且这能解释在白人男性中工人阶级和聚合的“中产阶级”之间更鲜明

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但这些结果也可以表明，至少在美国，我们所用的阶级模型在白人男性中比在其他类型中起的作用更大。当人们生活中，阶级与其他压迫形式相交叉时，它对意识的影响可能会因为其他关系对意识的影响而混淆。为了追究这些推论，需要对更大量的样本进行研究。

## 14.8 结 论

在宏观分析层次上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之间的关系和在微观分析层次上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分析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阶级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的普遍影响主要以阶级结构决定阶级形成和阶级位置决定阶级意识的方式为转移。在这些方面，从本章分析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基本结论是，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关系上的高度变化性。虽然在很一般条件下，人们可以说，在我们所检测的三个国家中，在阶级形成的模式方面和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联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国家不同的程度。

反对资本主义尺度系谱的一端是瑞典。在宏观层次上瑞典以阶级形成的一个模式为特征，该模式既是非常两极化，又在我们所检测的三个阶级联盟间存在清楚的划界。在微观层次上，过去的和现在的阶级位置和阶级经验，呈现出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人对阶级问题的态度。从而在瑞典社会中阶级呈现出，对人们的生活和主观性的有力冲击。

系谱的另一端是日本。在宏观层次上，阶级形成在意识形态上既不是十分两极化，也没有非常清楚的界限。在微观层次上，虽然阶级和意识依然有重大联系，但影响非常弱，并且主要局限在经由消费领域阶级的间接影响。虽然日本社会的阶级

特性对理解日本经济发展的节奏、国家政策的强制、政党的性质等等，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微观层次上，阶级位置和阶级经验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出现普遍影响阶级意识方面的变化的现象。

美国处在以上两个案例之间的某处，可能稍微靠近瑞典。阶级形成的模式颇像瑞典，只是更缓和，有一个更广泛的资产阶级阶级联盟和一个更接近中产阶级的工人阶级联盟。在微观层次上，阶级位置和阶级经验系统地塑造了意识，但这种塑造没有在瑞典强烈，并且有一个相对更大的消费领域影响。

## 方法附录

### 创建阶级意识尺度的方法问题

#### 同意 / 不同意的代码强度

在创建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使用的态度问题的答复进行编码过程中，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是否编译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强度。在其他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仅涉及瑞典和美国，由于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的“有些地”比另一个人的“强烈地”实际上构成一个较弱的回答，把回答仅分成两类。意见的明显强度的比较仅能反映受访者的个性特征，某些人比其他人在公开发表意见时更是尝试性的。然而，在本章，我决定采用对问题的全面的回答。做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本章的分析包括日本，比仅涉及美国和瑞典的分析里可利用的态度条款更少，并且这缩减了根据这些条款创建的尺度中的差异。以同意 / 不同意的强度为基础的区分值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差异。第二，

根据经验，当对“强烈地”和“有些地”之间的区别进行编码时，在微观层次方程中的可解释的差异稍高一些，尤其在日本。

### 持肯定回答的偏向性

关于这些条款的一个潜在问题是，所有这些条款的措词表达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方向：同意该条款反映出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同意则反映出赞成资本主义的看法。显然，对这些条款而言，平衡正面和反面的措词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由于持“肯定回答的”偏见，这是需要的，因为有些人不顾内容而对每一个问题都倾向于答同意。关于问卷设计的方法论研究已表明“持肯定回答”似乎在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人中更是一个问题，并且因为教育与阶级位置相关，在阶级结构中在与位置相联系的持肯定回答的偏向性。<sup>30</sup>这会潜在地影响我们对各种形式阶级意识中阶级差别的分析。在调查中一大套态度条款里存在这种平衡，但问题恰好发生于子集里，这些问题对这三个国家是共同的，并且处理的是赞成和反对资本主义态度的特定问题，所有的条款的表达措词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上。由于没有理由认为“肯定回答的偏向性”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歪曲我们的比较分析，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扭曲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一个潜在源泉。

### 简单相加尺度对复杂因素分析尺度

在仅对美国 and 瑞典进行比较的根据同样的数据（赖特、豪和乔，1989）的那些早期研究中，用确定性因素分析测量模型（LISREL IV）也创建了许多复杂尺度。这些测量策略中的每一



个都既有分析和解释的优势，也有分析和解释的劣势。简单相加尺度的优势是，尺度中的绝对值有跨国的同样直接的、不言而喻的解释。比如，如果美国工人的平均值比瑞典的低得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一般地比瑞典相应的人更少对这些条款持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该矩阵在这两个国家是同样的，在结果中的重要性的解释是直接的。在确定性因素分析尺度中，矩阵在每个国家是不同的，这就使比较跨国间尺度数值成为问题。这种简单相加尺度的劣势是，不像由确定的因素分析形成的尺度，它们抹掉了我们所研究的态度潜在多维性，并且它们对不同国家的对条款的回答与基础概念变量之间关系的不同测量特征不敏感。

当前的分析完全依赖简单的相加尺度。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比较上，所以在 LISREL 尺度中的矩阵的非可比性是一个重大的不足。也可以认为，即使确定的因素分析展示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指标在概念上涉及个人态度结构测量的不同维度，然而，用一维尺度中的所有指标规划意识形态联盟是适合的。工人阶级联盟准确地说就是位置的联盟，即在所有跨这些维度的意识形态倾向上基本上相似的位置的联盟。意识形态联盟在全社会中是由集体组成的，而这些集体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这些联盟中的个人意识形态倾向的认知多维性。从而在技术上，用简单的相加尺度，比用更复杂的 LISREL 变量测量这类意识形态联盟效果更好。无论如何，在早期用这些复杂尺度对瑞典和美国进行的分析中，所得结论在实质上与用更复杂的测量策略所得的结论没有不同（参见赖特，豪和乔，1989，关于来自两类尺度的资料的介绍）。本项分析限于比较简单的、明显变量和相加反资本主义尺度，而不是用种种测量相同概念不同尺度来阻碍当前的讨论。

### 测量意识形态阶级形成的策略

为了把相关阶级的态度用作一种划分阶级结构内阶级形成模式的方式，我们需要发展一个分析策略，该策略能使我们把阶级类型学中的各类位置分成意识形态组。附录图 14.1 阐明了我们将使用的策略。具体如下：

1. 为阶级结构矩阵中的12类位置的每一类计算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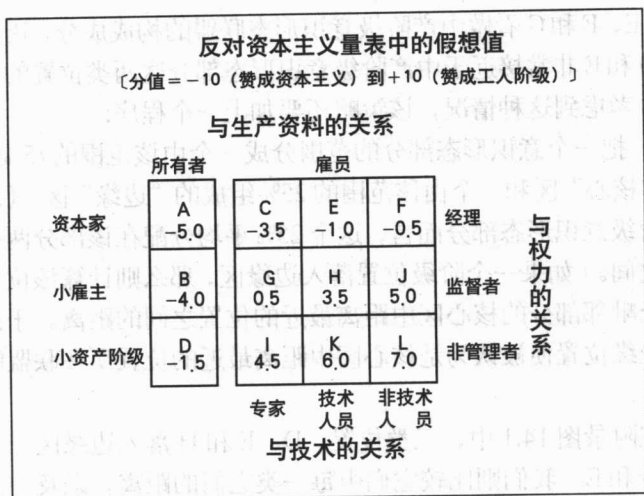
2. 矩阵中工人阶级位置的平均值与资产阶级位置的平均值之间的范围分成三个相等的部分。这些部分称作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部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

3. 于是矩阵中的每个位置都可以在这三部分中的某一部分找到自己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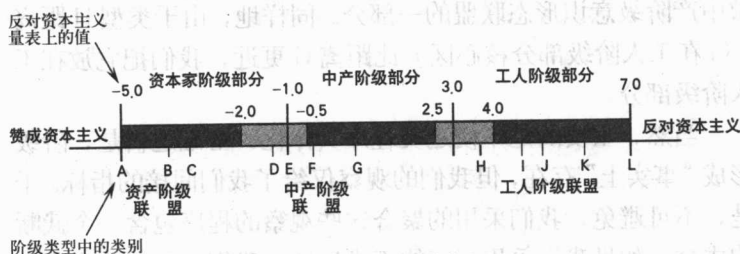
4. 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三个潜在联盟：工人阶级联盟、资产阶级联盟和中产阶级联盟。

当然，如果在极值之间阶级结构高度两极分化，在第三个联盟中没有位置存在是可能的。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程序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图景。例如，在图 14.1 中阐明的跨矩阵的位置的数值模式中，工人阶级位置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平均值为+7，资产阶级位置平均值为-5。这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的值在-5到-1之间，中产阶级部分在-1到+3之间及工人阶级部分在+3和+7之间。如果我们机械地应用上面指定的程序，那么阶级位置 F 和 G 将会处在中产阶级联盟中，位置 D 将会处在资产阶级联盟中，并且类别 E 将会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处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部分的分界点上）。然而，这些资料的一个更实际的特性描述将把类



### 限定意识形态阶级联盟的策略



■ 意识形态谱带中阶级部分的核心 = 范围的75%

■ 意识形态谱带中阶级部分的边缘区 = 范围的25%

附录图 14.1 意识形态阶级联盟构成的图像图解方法范例

别D、E、F和G看做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构成成分，因为类别D和E非常接近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这两类位置的的实际值。考虑到这种情况，该策略还要加上一个程序：

5. 把一个意识形态部分的范围分成一个由该范围的75%组成的“核心”区和一个由该范围的25%组成的“边缘”区。（对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而言，这个25%平均分配在该部分两个边界之间。）如果一个阶级位置落入边缘区，那么则计算该位置与每个毗邻部分的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于是这个边缘位置便被认为是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位置所在联盟的一部分。

在附录图14.1中，三类位置，D、E和H落入边缘区。对类型D和E，我们则比较它们中每一类之间的距离，以及一方面，和类型C（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的核心区中最近的类型），另一方面，和类型F（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部分核心区中最近的类型）之间的距离。由于它们两个都靠近F，我们把这两个类型看做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一部分。同样地，由于类型H距离I（I在工人阶级部分核心区）比距离G更近，我们把它放在工人阶级部分。

当然，重要的是不使这类程序具体化。基础逻辑是，阶级形成“事实上”存在，但我们的观察仅给了我们间接的指标。于是，不可避免，我们采用的聚合这些观察的程序包含一个武断的成分。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正式标准，我们一定能造成明显不同的联盟构成。所以，最终的类型不应该同它们试图发掘的真实情况混淆在一起，对最终模式的所有解释都必须注意阶级形成的真实模式和我们的意识形态联盟的形式化图像之间滑移的问题。

在这个分析策略中，一个阶级联盟限定为一组位置，落在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意识形态范围的特定部分里的位置。当然，在每个阶级位置里，将会有与这个准则根本不同的个人。有些个体资本家，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会牢固地把他们放在工人阶级联盟内。然而，这里我们的兴趣不是这类个人的意识形态轮廓，而是反映在不同阶级位置的意识形态倾向特点上的阶级形成的轮廓。

显然，对这些描述进行置信区间的正式统计检验是可取的。假定某一国家的数据中工人阶级位置的分值是 +4.0 和资产阶级位置的为 -2.0。从而意识形态这三个部分的分界点分别为 +2.0 和 0。则一个值为 2.5 的位置将落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而一个值为 1.5 的位置将落入中产阶级联盟。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观察值 2.5 实际上比标准临界值 2.0 大？结果证明是，用相对较小的样本，对这类检验的标准误差的估计几乎不可避免地非常大。问题是，我们不是仅仅检验两个样本的平均值间的差别——矩阵中两类位置的平均值上的差别。我们正在检测的是一类位置的平均值和一个值——区别联盟的标准值——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本身是依据两类其他位置的平均值估计出来的。因而，这个差别的标准误差来自于对三类位置估计的标准误差，其中一类位置（资本家位置）样本规模相对较小，并因此标准误差相对较大。<sup>31</sup>

因为这些困难，我不试图计算我们描述性断言的置信区间，并相应谨慎地对待这些结果。

### 多变量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

1. 阶级位置。这个变量通过表示阶级结构矩阵中的 12 个类型的 11 个虚拟变量测量的。

2. 过去的阶级经验。这些变量开掘了个人的阶级经历的不同方面：

(a) 工人阶级出身：虚拟变量，1=16岁时，家长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工作。

(b) 资产阶级出身：虚拟变量，1=16岁时，家长是雇主。

(c) 先前的自我雇佣者：虚拟变量，1=在某些从前工作中是自我雇佣者。

(d) 先前的监督者：虚拟变量，1=在某些先前工作中是监督者。

(e) 先前的失业：虚拟变量，1=在过去某个时候非自愿的失业。

3. 现在的阶级经验和物质条件。这些变量发掘了不是直接通过现在的阶级位置测量的现在的阶级经历的不同方面。

(a) 资产阶级网络：一个五分尺度，是测量同资产阶级人际关系强度的。它是通过三个关系最近的朋友的阶级和配偶的阶级来测量的。0=朋友和配偶都不是雇主；4=100%所有朋友和配偶全是雇主。

(b) 工人阶级网络：一个五分尺度，是测量同无产阶级人际关系强度的。它是通过三个关系最近的朋友的阶级和配偶的阶级来测量的。0=朋友和配偶都不是工人阶级；4=朋友和配偶100%都是工人阶级。

(c) 工会成员：虚拟变量，1=工会成员。

(d) 个人年收入：个人工资和其他来源的收入。

(e) 户主：虚拟变量，1=拥有家庭。

(f) 投资收入：虚拟变量，1=从投资中而不是银行储蓄中获得的一些收入。

#### 4. 人口统计变量

(a) 性别: 1= 女性

(b) 年龄

5. 国家。两个虚拟变量（日本、美国）描述三个国家。

### 变量群的单独系数的产生

在预测个人意识的微观层次的方程中，我们对每个阶级位置虚拟变量（测量阶级位置和被排除类型之间差别的变量）的系数的各个值不感兴趣，而是对作为一个变量的阶级位置的总体影响相当感兴趣（也就是，由整套的阶级位置的虚拟变量所描述的影响）。所以，在这些结果的展示中，11个单独的系数被一个单独的标准回归系数所代替，这个回归系数代表了阶级位置的总的的影响。这个代替是通过估计有11个虚拟变量的OLS回归方程而达到的。这11个虚拟变量以标准的方式代表着阶级位置，并因此构成一个新变量，它是一个以非标准系数同每个阶级虚拟变量的加权总数的乘积。然后这个变量替代了方程中原来的一套虚拟变量，并且一个新的方程得到了估价。在这个新方程中，聚合的阶级位置变量总有一个非标准化的系数1.0。这个变量的标准化（beta）系数表明，与方程中其他变量相比较时，它的相对解释力。这个方程的 $R^2$ 恰恰同有11个虚拟变量的最初方程中的 $R^2$ 相同。

为产生在方程2中所用的每个广泛的变量群中变量的共同联合影响的单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这里采用了一个类似的程序：过去的阶级经验；现在的阶级经验和物质条件；人口统计变量；国家。这些联合的系数有利于跨变量群的相对解释力的比较，这些比较既有国家内的，又有跨国家的。

## 第十五章

### 阶级、国家雇佣和意识

在第十四章，我证明了美国和瑞典构成阶级形成不同模式基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国家雇佣。更具体地说，我表明了，通过降低中产阶级主要部分对资本家阶级的物质依赖，国家雇佣可以有助于解释在瑞典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意识形态划界更清的原因。在本章我们将通过检测更广泛意识指标和关于国家雇佣更有区别的解釋，继续更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正像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最明显的发展之一是国家的成长。不管用国家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家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还是用国家雇佣的规模大小来衡量，每个工业社会中的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都有巨大的增长。

鉴于国家的这一巨大的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对国家雇员的态度和意识形态方向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对国家和私有部门的雇员间的态度的差异的经验研究，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这种情况还完全没有出现，至少还没出现在美国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对具体国家机关（学校、警察、军队、法院等）中人们的实践和思想意识的个案研究。有无以数计的关于诸如国家制度的转变、国家政策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影响、



国家内部的决策程序以及国家“精英”摆脱外界因素的控制的相对自治权或非自治权之类问题的研究。

有一个“把国家还原”的真正的行业认为，国家机器的制度特性和国家管理人的战略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尽管有许多历史和社会学著作讨论国家高层政治职位的人们的利益和思想意识，但探讨普通国家雇员的这些问题并把他们同私有部门中的同他们相当的雇员相比较的研究极为有限。<sup>1</sup>

我怀疑，缺乏对国家雇员总体的持续的关注反映了政治社会学家中共同的倾向，即把国家或者看做一个由领导精英（不管是被视为最高层国家管理人、职业政治家的精英，还是国家本身之外的统治阶级）间接控制的组织，或者看做带有特定制度结构的机构发源地。然而，同资本主义不是由资本家和公司单独组成一样，“国家”也不是仅由精英和机器组成。正像为了解资本家公司的原动力，必须了解工人和管理者的意识策略的形式一样，为了解国家内部的原动力，了解全体国家雇员和官员总体的思想意识和策略也非常重要。由于他们在实际执行国家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我所称之的“国家中产阶级”——日常的国家工人和国家“精英”<sup>2</sup>之间广泛阶层的专家和**国家官僚**——来说，上面一点尤其重要。关于国家的任何全面的社会学必须试图努力理解实际从事国家工作的国家雇员的利益、策略和思想意识。

本章我们所讨论的主要经验性问题是十分简单的：在国家 and 私有部门的雇佣之间存在阶级内或跨阶级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差异吗？更具体地说，我们将检测两组态度——支持增强国家对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干预的态度（称做“赞成国家主义意识”）和支持同雇主冲突的工人和批判现存经济制度的态度（称为“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研究的统计工作是察看在下列情况

中两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1) 跨国家和私有部门雇佣；(2) 跨国家部门内和私有部门内的阶级位置；以及(3) 跨阶级内的部门。

下面一节将简短地探索“国家”的概念，由于它导致国家雇员的利益和意识问题。接着在15.2节将列出一系列定向的假设来指导经验性调研。接着在15.3和15.4两节给出和解释资料分析的结果。

### 15.1 国家雇佣概念化

在第十三章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基本模型中，把阶级意识看做是由个人通过他们的阶级位置取得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经验塑造的。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对生活经验和利益有影响的另外一组物质条件：人们在其中工作的雇佣组织的性质。有许多可以区分雇佣组织的方式：大公司对小公司，不同经济部门中的公司，等等。本章我们仅集中一个理论上的显著差别：国家部门的雇佣对私有部门雇佣。基本假定是，为国家所雇佣的个人可能有同私有资本家部门中的个人不同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经验，甚至，在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被视为同一阶级位置的时候。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简单途径是把国家雇佣本身看做一个单一类别。毕竟，有些几乎所有国家雇员共有的东西完全是凭借被国家雇佣得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工资主要来自税收，并因此他们同私有利润和公共税收的关系与资本家公司中的雇员同它们的关系不同。在许多情况下，国家雇员也享有在私有部门中可得到的各种形式合法的工作保障。所以，人们可以期望，公共和私有雇佣之间的天然区别本身可以构成物质利益和相应

的意识之间一个明显的分野。

一个更复杂的视角是把国家本身看做内部分裂成同资本主义经济有种种不同的功能关系的机器。具体地说，不是把“国家雇佣”看成一个单一类别，而是把“国家”分成两类主要机器：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非商品国家服务。第一类部门是由那些国家机构组成，在这些国家机构中，繁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功能”特别重要。<sup>3</sup>这类机器包括警察、法院、政府行政机构、军队、立法机关等。这并不是说，这些机构的惟一功能就是维护资本主义，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复制资本主义是它们的主要功能。然而，这里所说的是，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机构中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功能关系特别重要。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整个国家机器就被视为这样一个上层建筑的构成。确实，在最极端的解释中，这是国家惟一重要的功能。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当代理论家不再用这种十足单一的功能主义术语分析国家。把国家看做是以不同方式分割的围绕不同原则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有可能划出一个直接生产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货物和服务——的国家机器子集。专营这种“非商品”（也就是不用于市场交换的）生产的国家机器包括，最主要的像公共卫生、教育、公用事业、公共娱乐等。这些机构不应被看做完全是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们应该被看做也是植根于国家内的一个刚萌芽的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成分。<sup>4</sup>

当然，许多国家机构兼备两种“功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通过生产非商品货物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论证说，在有助于宣传与资本主义一致的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从某些方面看，教育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社会福利机构可以同时既为满

足人们的需要提供实际的服务，又通过阻碍替代选择而再生产资本主义。尽管如此，粗略地区分这样两类国家机器还是可能的：一类是在上层建筑方面特别强大，另一类是在满足人们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中特别重要。<sup>5</sup>我们将称后者为国家服务部门，称前者为国家政治部门。

本章的主要资料分析是围绕着国家雇佣和阶级位置在塑造意识方面的相互作用进行的。在国家的两个分部门的每一个中，原则上，限定同我们已经探讨的私有部门雇员中一样的阶级位置的矩阵是可能的。可惜的是，因为国家雇员样本规模相对较小，尤其是美国数据，为了这里的数据分析，我们必须把阶级关系中所有的“对立位置”结合成一个单一的“中产阶级”类型。表 15.1 中给出了我们在本章将使用的最后一组类别。

## 15.2 定向假设

最初这个关于国家雇员的研究并不是作为一个精确公式化地阐述对立假设的“检验”而特地安排的，这里的对立假设是关于意识形态方向应如何因国家和私有部门的阶级和雇佣而发生变化。鉴于研究文献中缺乏对这个主题的持续的关注，该研究基本上是解释性的和归纳性的，而不是由既定的相匹敌的理论之间调节的企图所推动。尽管如此，列出可能称之为“定向假设”的主要概况还是有益的。定向假设来自为分析提供消息的概念框架。

主要经验性研究目标是区别出表 15.1 里诸类型中的任职者之间思想意识的差异，我们所考虑的意识形态有两个维度，即赞成国家主义意识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特别重要的是表中底端的两排，因为对这些类型我们既可以探索部门内阶级差异，

又可以探索阶级内部门的差异。

为什么人们可以预期意识形态差异会跨表中类型而出现，有许多原因。由于他们面对的压制因素和可能的事情不同，在不同部门阶级交互类型中的人们有十分不同的利益（物质以及非物质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反过来强化不同的意识形态方向。或者，以最终处于不同类别里的人们在他们的成长和受教育期间，易遭受不同的灌输方式。不同的雇佣环境可以描述为促进认知复杂性的不同程度的条件或产生各种形式的认知失调的条件。这些条件又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的倾向。更广泛地讲，在不同工作环境中的“生活经验”影响思想意识。例如，事实可能是，在工作环境中“异化”经验有别于对国家和私有雇佣中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来说是有系统的区别的，而且这些异化经验上的不同保证了不同意识形态方向。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人们可以期望对国家和阶级的态度会跨我们正在探讨的部门阶级交互类别而发生变化。

表 15.1 阶级和国家分析中使用的社会结构位置

阶级位置	私有部门	国家部门	
		政治上层建筑	非商品服务
资本家阶级	资本家阶级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私有部门中产阶级	国家政治 中产阶级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私有部门工人阶级	国家政治 工人阶级	国家服务 工人阶级

因为他们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从这一大组原因中推出一组先验推理的预言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将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因果联系，即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之间的

因果关系。一个意识形态机械论，即意识完全来自于这些物质利益——许多其他原因会介入而打破这种关系——但是它的确表明当发现这种一致关系存在时，人们不必惊奇。

根据表 15.1 中的类型，问题是去说明行动者的物质利益是如何根据跨阶级部门交互类别而发生变化的以及这将会怎样影响意识形态的方向。对我们的经验性调查研究结果的解释将围绕三个涉及位置、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之间关系的命题而展开：

假设 1 在每个部门内，处于工人阶级的人们持有比处于中产阶级的人们更赞成国家主义和更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与中产阶级相比，工人更易受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难以预测的变化的影响，并因此，他们一般地更支持国家在社会中的扩大作用。同样，因为随着资本利息的两极分化，工人的物质利益比中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更加两极分化，人们可以期望工人比中产阶级的人们更支持工人阶级斗争，对资本家阶级有更强的敌意。虽然这种两极分化程度在私有部门中更大，但在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可以在每个部门中，期望工人成为中间阶级中的左派。

假设 2 中产阶级内，国家服务部门雇佣的人们持有或者比私有部门或者比国家政治上层建筑部门中的人们更赞成国家主义和更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论证国家服务部门和私有部门中的中产阶级之间利益上的一个差异是非常简单的：因为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比国家服务部门中产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关系更密切，我们可以期待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更赞成资本主义。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对国家雇佣的依赖，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更赞成国家主义。但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

的中产阶级怎么样呢？为什么在思想意识上他们同国家服务部门中的中产阶级雇员不同？这里的论证集中在国家上层建筑和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功能关联上。国家上层建筑机构中的中产阶级在管理他们工作机构的方案程序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不同程度上，这涉及有限决策和计划的形式以及执行政策的权威角色。如果我们愿意假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功能角色同意识形态方向有因果联系，那么因为他们作为国家机关中的管理者和专家的角色在功能上对资本主义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中产阶级比国家服务部门中的中产阶级更赞成资本主义和更不赞成国家主义。<sup>6</sup>

假设 3 国家部门中（或者在国家上层建筑中或者在国家服务部门中）的工人阶级比在私有部门中的工人阶级更赞成国家主义，而私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比国家部门的则更反对资本主义。由于他们是国家雇佣的，国家部门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以更不直接两极化的方式相对立，因此他们更没有理由反对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福利直接依赖国家雇佣的活力，他们会倾向于更赞成国家主义。和中产阶级国家雇员的情况不同，因为国家部门的工人在控制他们工作所在机构的政策和计划方面不起作用，所以没有特别的理由去预测国家部门中工人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分野。

所以，这里所采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变种的总体期望是：

- (1) 工人将比各部门的中产阶级更赞成国家主义和更反对资本主义；
- (2) 跨国家两个分部门的中产阶级将在意识形态上分裂，而工人阶级则不会；
- (3) 工人阶级整体在意识形态上将在私有

部门和国家部门之间分裂，而私有部门和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将不会不同。这些期望导致产生了表 15.2 中的赞成国家主义意识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的期望水平的等级序列。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虽然这些预言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他们背后的解释原则却是十分刚愎自用的。因为许多最终进入到这些不同部门中的人在参加他们的工作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些基本思想意识方向。例如，这样说无疑是似乎合理的：人们寻求为国家服务部门所雇佣而当教师或福利事业工人，因

表 15.2 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定向假设<sup>a</sup>

赞成国家主义态度的等级序列<sup>b</sup>

阶级	雇佣部门		
	资本家	政治	非商品
	私有部门	上层建筑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4	4	3
工人阶级	2	1	1

赞成工人 / 反对资本主义态度的等级序列<sup>c</sup>

阶级	雇佣部门		
	资本家	政治	非商品
	私有部门	上层建筑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4	4	3
工人阶级	1	2	2

- a. 预报在意识形态两个维度上特定类型的等级序列的条目，等级序列 1 意指对所谈论的意识形态成分支持程度最强烈。当两个类型给以同样的等级序列时，意指不要期望二者在意识形态这个成分上会发生不同。
- b. 赞成国家主义 = 支持增强国家对解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干涉的态度。
- c. 赞成工人 / 反对资本主义 = 支持同雇主冲突的工人和批评现存经济制度的态度。



为他们已经有了某种国家主义和 / 或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不管由于新阶级理论列举的原因, 还是新韦伯主义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列举的原因)。意识的形式可以解释人们进入雇佣环境的自我选择过程, 而不是雇佣环境塑造意识。

在本章的经验性探讨中, 我们不能解决关于个人是怎样开始拥有他们所持有的态度的这个微观的问题。不过这无损于关于植根于个人所占据的不同类别的结构位置的利益和这些个人的思想意识方向之间的联系论证。不管是因为人们已经重视那些利益后才被吸收进那些位置, 还是凭借同位置相关的利益, 由位置产生了一组特定的态度, 跨阶级和部门意识形态差异的特定模式都要同依赖这些社会位置的利益联系起来。

假定我们观察到国家服务部门的管理者比私有商业公司的管理者更为国家主义, 并且进一步认识到甚至在他们参加这些工作之前, 就已经更国家主义了。尽管如此, 从这里得出结论: 认为在与这两类场所的雇佣有联系的意识形态方向上的比较仅仅是单独个人的属性的结果 (也就是说, 终归得到某特定工作的各类人的一个“选择”影响), 这是不对的。即使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的人们在进入国家雇佣之前就赞成国家主义, 但国家服务雇佣的属性 (与这些属性相关的利益) 依然是解释为什么国家服务和私有部门之间存在聚集的意识形态差异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为如果国家服务不在制度上体现这些特定利益, 则他们将“挑选”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们。<sup>1</sup> 虽然选择本身是重要的, 但因为探讨跨我们正研究的这种社会结构位置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去解决选择的问题是不必要的。因此, 我们的经验研究的任务是仔细地清理出跨阶级和部门的这些意识形态差异的模式, 并观察它们符合我们已检测的各种定向假设的程度。

假设4 两个国家分部门之间的工人阶级内意识形态分野程度在瑞典应该比在美国大。因为在瑞典后资本主义非市场化生产部门（国家服务）比美国发达得多，并因此为那个部门的中产阶级的与众不同的利益构成一个更强大的物质基础，人们可以预言，中产阶级的两个分部门之间的国家内意识形态分野，在瑞典应比在美国更大。然而，在政治上层建筑部门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轮廓方面与私有部门的相比，这两个国家不应该不同：在这两个国家，这里应该有相对较小的意识形态分野。

假设5 工人阶级内跨部门的意识形态分野在瑞典应该是比在美国小。第十三章的阶级形成模型表明，当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弱小时，一般会有比在工人阶级强大时更多的与直接物质利益分野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分野。就美国/瑞典的比较而言，这表明，在国家和私有部门之间工人阶级内出现的任何意识形态分野，在美国都应该比在瑞典大。因为美国工人阶级缺乏抑制这种分野的那种阶级范围的组织。假设4和假设5的结合从而表明瑞典和美国之间的一对有意义的对比：瑞典应比美国在中产阶级内的意识形态分野深（国家内分部门之间），而工人阶级内意识形态分野，在美国应比在瑞典深（整个国家和私有部门之间）。

### 15.3 结 果

我们的分析围绕着两组态度，“赞成国家主义意识”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在这个研究中，赞成国家主义指的是对国家

干涉主义活动扩张的积极态度。反对资本主义指对阶级问题，尤其是对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跨阶级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的态度。这些绝不是与意识形态方向分析相关的仅有的态度种类。不过，因为我们特别对国家雇佣和阶级位置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感兴趣，所以这两个维度似乎特别相关。本章的方法附录展示了把这两个变量操作化的具体问题。

本章经验分析的基本任务是察看意识形态方向在表 15.1 中的八个社会结构位置之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的，然后对比美国和瑞典的这些变化模式。这涉及对表中单元之间的特定差异进行大量的统计检验。更具体地说，我们将对以下对比进行探讨：

1.表 15.2 的竖栏中（即私有部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服务部门内）处在不同阶级位置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向方面有显著差异吗？

2.表中的横行内（即不同阶级内）处在跨不同雇佣场所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向方面有显著差异吗？

3.这些差异模式在美国和瑞典之间有显著变化吗？（即在部门内阶级比较和阶级内部门比较的规模上两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吗？）

表 15.3 给出了我们所正在考虑的意识形态尺度上的平均值，即在瑞典和美国的私有部门、聚集的国家部门和国家的两个分部门（国家服务部门和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内的各种阶级位置在意识形态尺度中的值的平均值。表 15.4 给出了跨部门内的阶级类型和跨阶级内的部门两个因变量差异的统计检验的一个概况。最后，表 15.5 给出了对瑞典和美国之间（就表 15.4 中给出的大量比较）的检验。

在检查实质的研究发现之前，先来看两个预先的评论：第

一，虽然对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向要找一些过去的参考，但由于本章的理论目标，我们将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涉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即那些私有和国家部门内的阶级位置）的比较上。第二，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类型的样本相对较小：在美国是84（约占国家雇员的34%），瑞典是54（约占全部国家雇员的13%）。<sup>9</sup>这意味着，要进行做涉及政治上层建筑内中产阶级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美国是36和瑞典是22）个案数目确实非常小，致使正式统计检验很有问题。所以，对涉及这些个案的比较，我将采用一个相当宽松的统计显著性标准，当然同时把研究结果看做必要的尝试。

### 部门内的阶级差异

关于部门内阶级差异的许多研究结果是特别引人注目的。首先，美国和瑞典的私有部门内，在赞成国家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一致的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在两个国家中，一般来说，工人比中产阶级的人们对国家干涉更积极乐观和更反对资本主义。<sup>9</sup>

第二，就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而言（而不仅仅是勉强地对赞成国家主义尺度而言），私有部门内的这些阶级差异在瑞典明显比在美国强烈（见表15.5，1.1行）：私有部门工人和中产阶级在该尺度上的意识形态差异，在瑞典几乎是2.5分，但在美国，仅仅1.6分。这与第十四章中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在第十四章我们没有区别国家和私有部门，所以整体上瑞典阶级结构在意识形态上比美国阶级结构两极化。

第三，在美国，国家的两个分部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服务部门——内，在国家主义方面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表 15.3 美国和瑞典阶级—部门交互类型的意识形态方向列联表

## I. 美国

I.1 每个阶级—部门交互类型中个案数 (加权总数)

阶级	雇佣部门				行总数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112				112
小资产阶级	110				110
中产阶级	291	89	36	53	281
工人阶级	680	159	48	111	839
列总数	1184	248	84	164	1432

I.2 赞成国家主义 (单元数字 = 在赞成国家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 范围从 -3 到 +3)

阶级	雇佣部门				行平均值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0.85				0.85
小资产阶级	0.84				0.84
中产阶级	1.03	1.26	1.05	1.40	1.08
工人阶级	1.64	1.30	1.26	1.32	1.58
列平均数	1.35	1.29	1.17	1.35	1.34

I.3 反对资本主义 (单元数字 = 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 范围从 -6 到 +6)

阶级	雇佣部门				行平均值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0.16				-0.16
小资产阶级	0.54				0.54
中产阶级	0.09	1.04	1.14	0.96	0.31
工人阶级	1.68	1.75	0.98	2.08	1.69
列平均值	1.02	1.49	1.05	1.72	1.10

续表

## II. 瑞典

## II.1 每个阶级—部门交互类型中个案数 (加权总数)

阶级	雇佣部门				行总数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61				61
小资产阶级	58				58
中产阶级	123	149	22	127	272
工人阶级	405	309	33	276	714
列总数	647	458	54	404	1106

## II.2 赞成国家主义 (单元数字 = 在赞成国家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 范围从 -3 到 +3)

阶级	雇佣部门				行平均值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1.08				1.08
小资产阶级	1.54				1.54
中产阶级	1.14	1.53	1.16	1.59	1.35
工人阶级	2.02	2.02	1.84	2.05	2.02
列平均数	1.72	1.86	1.57	1.90	1.78

## II.3 反对资本主义 (单元数字 = 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平均值; 范围从 -6 到 +6)

阶级	雇佣部门				行平均值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资本家阶级	-0.35				-0.35
小资产阶级	0.98				0.98
中产阶级	1.01	1.66	-0.29	1.99	1.37
工人阶级	3.47	3.17	3.41	3.14	3.34
列平均值	2.42	2.68	1.94	2.78	2.52

表 15.4 部门内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门之间的差异检验

I. 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每个部门内阶级差异的显著性

	工人阶级对中产阶级			
	私有 部门	国家 政治	国家 服务	整个 国家
美国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瑞典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II. 资本家阶级对中产阶级：部门内阶级差异的显著性

	资本家阶级对中产阶级			
	私有 部门	国家 政治	国家 服务	整个 国家
美国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瑞典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III. 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内跨部门差异的显著性

	国家服务 对私有	国家服务 对政治	国家政治 对私有	整个国家 对私有
	美国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瑞典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	=	=

续表

美国

IV.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内跨部门差异显著性

赞成国家主义 = = = =

反对资本主义 = (&gt;) &gt; &gt;

瑞典

赞成国家主义 = &gt; = &gt;

反对资本主义 &gt; &gt; (&lt;) =

a. 表中的符号:

> 意指第一类型比第二类型显著性大 ( $P < 0.05$ , 双尾检验)< 意指第一类型比第二类型显著性小 ( $P < 0.05$ , 双尾检验)(>) 意指第一类型勉强地比第二类型显著性大 ( $P < 0.10$ , 双尾检验)(<) 意指第一类型勉强地比第二类型显著性小 ( $P < 0.10$ , 双尾检验)= 意指两种类型没有明显差异 ( $P > 0.10$ , 双尾检验)。

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比较而言,在瑞典,国家服务部门的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在赞成国家主义的测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国家政治部门存在勉强显著的差异。<sup>10</sup>此外,正像表 15.5, 1.3 行所指出的,瑞典国家服务部门内的阶级差异明显比美国相应的差异要大。

第四,根据反对资本主义的尺度,瑞典国家的两个分部门内存在强烈的阶级差异,而在美国,这些差异仅在国家服务部门出现,而不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出现。政治上层建筑反对资本主义阶级意识方面的阶级差异在瑞典明显地比美国国家内的大(表 15.5, 1.2 行)。<sup>11</sup>

把这些不同的结果合起来引导出两国部门内阶级差异的下列特征。虽然,多数部门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化程度在瑞典一般比在美国高,但在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两极化程度在私有部门都比在国家服务部门高。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在美



表 15.5 跨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比较中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检验

I. 两国之间在工人阶级 (WC) 对中产阶级 (MC) 方面每个部门内比较的差异<sup>a</sup>

	赞成国家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	
	尺度	p <sup>b</sup>	尺度	p
I.1 私有部门: WCvs.MC	0.27	<0.10	0.87	<0.01
I.2 国家政治: WCvs.MC	0.46	ns	3.87	<0.01
I.3 国家服务: WCvs.MC	0.53	<0.05	0.03	ns
I.4 整体国家: WCvs.MC	0.45	<0.05	0.80	<0.10

II. 两国之间跨工人阶级内部门比较的差异

	两国之间的差异		p
II.1 赞成国家主义: WC 私有部门对整个国家	-0.34		<0.05
II.2 赞成国家主义: WC 私有部门对国家服务	-0.35		<0.05
II.3 反对资本主义: WC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1.37		<0.05
II.4 反对资本主义: WC 私有部门对国家政治	-0.64		ns

III. 两国之间跨中产阶级内部门比较的差异

	两国之间的差异		p
III.1 赞成国家主义: MC 整个国家对私有部门	0.16		ns
III.2 反对资本主义: MC 整个国家对私有部门	-0.30		ns
III.3 赞成国家主义: MC 国家服务对私有部门	0.08		ns
III.4 反对资本主义: MC 国家服务对私有部门	0.10		ns
III.5 反对资本主义: MC 国家政治对私有部门	-2.36		<0.01
III.6 反对资本主义: MC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2.47		<0.01

a. 差异是按瑞典—美国计算的。

b. 单尾检验。

国赞成国家主义尺度上, 国家服务部门内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仅是 0.08 (1.40:1.32), 而私有部门内的差异是 0.6 (1.03:1.64)。同样地, 举一个瑞典的例子,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尺度中, 国家服务部门内的阶级差异是 1.2, 而私有部门是 2.5。国

家政治上层建筑部门的结果在这些分值上的反映稍微不那么明显。在瑞典，尤其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上至少同私有部门一样两极化；而在美国却不是这样。<sup>12</sup> 总之，国家上层建筑的雇佣在两个国家是整个国家雇佣的少数（美国大约占1/3，瑞典约占1/8），因此，这两个国家，作为整体的国家内，阶级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化程度明显小于私有部门内的两极分化程度。这些研究发现大体上同表15.2中的预测一致。

### 阶级内的部门差异

现在让我们转向本章的中心问题，阶级内的部门差异。这里有两个突出的模式。第一，工人阶级的跨部门异质性在瑞典比在美国强得多。表15.4，第3组表示在瑞典工人中间不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而在美国，有无数案例是工人阶级内的部门差异显著的表现。<sup>13</sup> 举一个例子，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中的美国工人分值为0.98，相比而言，在国家服务部门的为2.08，以及私有部门的是1.68，而在瑞典，三个值分别是3.14、3.14和3.47。正像表15.5，II.3行所指出的，跨工人阶级内国家分部门的比较中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从而，跨经济—政治部门的瑞典工人阶级比美国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更一致。

第二，当我们看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时，我们得到一个十分不同的图像。在美国中产阶级内的两个国家分部门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因此，美国中产阶级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是在私有部门（十分保守的）和稍微进步一些的、相当一致的国家部门中产阶级之间分开的。另一方面，在瑞典国

家政治上层建筑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与私有部门中产阶级没有差异（如果有区别的话，正像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表明的，勉强地更保守些），而在赞成国家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两个尺度上，国家服务部门中产阶级比私有部门的进步得多。结果是，瑞典国家内的中产阶级内存在很大的意识形态分野，尤其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sup>14</sup> 那么，总的来说，美国中产阶级跨部门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比瑞典中产阶级的强。特别就意识形态的赞成国家主义而言，美国中产阶级内根本没有区分，而瑞典国家服务部门中产阶级明显是私有部门中产阶级的左派。

把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模式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在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是跨部门分开的，但分裂的方式不同。在美国，私有部门、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服务部门之间的差异构成了阶级内实际意识形态差异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瑞典，单就中产阶级而言，情况才是这样，只有在中产阶级内，国家部门内和国家与私有部门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意识形态分野。相对照，跨所有这些部门的瑞典工人阶级的区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保持相当强的一致。

根据表 15.2 中详细展示的预期，瑞典的情况与对中产阶级内跨部门的显著意识形态分野和工人阶级内的微弱的分野的预言一致。不过，美国的结果并不完全与这些预期一致。尤其是，我们没有预测出私有部门的工人会比国家部门的工人更赞成国家主义，或国家服务部门的工人会比国家上层建筑工人更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

### 控制个人属性的阶级内的部门差异

一个惯抱怀疑态度的人可能对这些描述性结果提出挑战。

他们可能提出，表 15.3 中的评价和表 15.4 中检验的阶级内跨部门差异仅仅是跨这些类型的各种构成差异的产物。例如，如表 15.6 所示，在性别构成方面跨阶级部门交互类型存在明显差异：在美国和瑞典，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 47% 是女性，比国家政治的中产阶级或者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中的数字高得多。再者，这后两个部门的性别构成在瑞典和美国之间存在大的差异：美国国家政治部门的中产阶级妇女仅占 10%，而在瑞典占 34%，同时在美国，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中女性占 33%，而在瑞典，仅占 18%。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如果每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部门差异归因于（例如）性别构成，那么，这也可能解释跨国家的不同模式。

为了消除阶级—部门交互类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虚假关系，我在进行多变量分析时控制了几个可能产生这类成分影

表 15.6 阶级—部门交互类型内女性的百分比

阶级	雇佣部门			
	私有	国家	国家内分部门	
			政治	服务
美国				
资本家阶级	29.2			
小资产阶级	49.8			
中产阶级	32.8	32.3	9.7	47.6
工人阶级	50.7	59.9	61.5	59.2
列平均值	44.2	49.9	39.1	55.5
瑞典				
资本家阶级	17.2			
小资产阶级	23.7			
中产阶级	18.0	45.2	33.6	47.2
工人阶级	38.3	68.6	67.7	68.7
列平均值	31.1	61.0	54.1	61.9

响的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sup>15</sup> 似乎第五个构成变量，工会成员身份，也适合作为一个受控制对象被包括进去。毕竟，工会成员身份在跨部门变化和在意识形态上与非会员不同。因而，人们会认为，阶级内意识形态上观测到的部门差异可能仅仅反映了工会成员身份上的差异。然而，我并没有把工会成员身份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包括进这个分析，因为，工会成员身份似乎就像是这种方向的一个原因一样，也似乎合理地是不同部门的人们的意识形态方向的一个结果，尤其在美国。也即是说，跨部门的工会会员身份构成差异可能部分地是由我们的因变量（意识形态方向）引起的，因此把工会会员身份看做一个控制变量来检验在意识形态上部门差异的强度，是不合适的。<sup>16</sup>

每个方程的策略都是要创建阶级一部门交互类型的三个虚拟变量——两个是针对所比较的类型的和第三个是为其他每一个类型的。于是，我们检测了当各种控制变量加入方程中时，各类别间的利益差异是应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在这些分析中，我们对控制变量本身的系数不感兴趣；我们惟一的兴趣是察看，当这些控制被包括进方程时，表 15.4 中报告的模式是否依然完好无损。分析结果见表 15.7。

这些控制似乎对赞成国家主义模式的影响比对反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要大。当这些控制被加入时，美国国家服务和私有部门的工人之间勉强显著的差异消失了（见表 15.7，I.1.2 行）。就美国中产阶级而言，没有控制变量时分析中没出现的国家服务和私有部门之间的显著差异，在加上这些控制变量时就出现了（见表 15.7，II.1.2 行）。模式上的这两个变化的结果是，一旦控制被加入分析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内针对赞成国家主义测量的跨部门模式在瑞典和美国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

就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而言，如果有区别就是这些控制变量

表 15.7 控制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的条件下阶级内部门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美国		瑞典	
	类型间差异的方向和显著性 表 15.4 中所报 告的	控制年龄、性 别、教育和收入	类型间差异的方向和显著性 表 15.4 所报 告的	控制年龄、性 别、教育和收入
1. 工人阶级				
1. 赞成国家主义	=	=	=	=
1.1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 $<$ )	=	=	=
1.2 国家服务对私有部门	=	=	=	=
1.3 国家政治对私有	$<$	=	=	=
1.4 整个国家对私有				
2. 反对资本主义				
2.1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	$>$	=	=
2.2 国家服务对私有	( $<$ )	=	=	=
2.3 国家政治对私有	=	=	=	=
2.4 整个国家对私有				

续表

美国		瑞典	
类型间差异的方向和显著性 表 15.4 中报告的	控制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	类型间差异的方向和显著性 表 15.4 报告的	控制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
II. 中产阶级			
1. 赞成国家主义			
1.1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	=	=
1.2 国家服务对私有部门	=	>	>
1.3 国家政治对私有	=	=	=
1.4 整个国家对私有	=	>	>
2. 反对资本主义			
2.1 国家服务对国家政治	=	>	>
2.2 国家服务对私有	(>)	>	>
2.3 国家政治对私有	>	(<)	=
2.4 整个国家对私有	>	=	(>)

表中符号的说明见表 15.4。

轻微地加强了表 15.4 中所评估的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差异。至于美国的数据，这些控制变量被加入后，工人阶级内跨部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方面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分野的较强的标志，至于瑞典的数据，工人阶级内的同质性没有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受影响。在中产阶级内，加入控制变量增大了美国国家服务和私有部门之间对比的统计学上的显著性（II.2.2 行），而瑞典的结果又一次基本上没有变化。从而对中产阶级的最初分析的主要研究发现得到证实：瑞典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分野于国家政治和服务部门之间，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分野于整个国家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

所以，总之，来自表 15.3 和 15.4 的基本结论仅仅是各类阶级—部门交互类型的组成的产物的看法，似乎并不合理。即使当控制教育、性别、年龄和个人收入被包括进分析时，瑞典工人阶级仍显示在意识形态上的跨部门一致性高于美国工人阶级，然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瑞典中产阶级在国家部门内似乎比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分野程度更大。

## 15.4 含 义

虽然本章的数据分析在开始时并没有对表 15.2 中提出的假设进行直接检验，不过分析结果同那些预期基本上一致。根据以与表 15.2 相同的方式的阶级—部门交叉类型中的不同单元的等级序列，表 15.8 对表 15.4 的结果进行重组。中产阶级的结果，尤其就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而言，为那些构成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机构与那些体现非商品化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支持。如果这个区别表明国内的不同机构的功能和相关的利益，那么人们可以期望，后资本



主义国家服务部门的雇员在政治上会比国家政治上层建筑部门的雇员更进步，至少中产阶级的国家服务部门雇员中会比其私有部门中同类的人员更进步。这些预期在瑞典的例子中得到强烈支持，以及至少部分地为美国的情况所支持。尽管这两个国家中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一贯地比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更进步，但在瑞典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政治上层建筑部门的中产阶级非常不同。所以，就美国而言，中产阶级的结果可能更符合称为新韦伯主义的预期，即对作为整体的国家部门管理者和专家与私有部门的管理者和专家之间意识形态的一个区别的预期，至于瑞典，其结果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预期一致，即预期国家部门内那些根本上是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国家机构中的中产阶级与那些体现非商品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机构中的中产阶级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

工人阶级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我们已经顾及的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变种的预期一致。正像预期的那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几乎总明显的是部门内中产阶级的左派，跨部门情况下工人阶级中比中产阶级中存在更小的意识形态分野。另外，这一相对的意识形态同质性在瑞典比在美国强。在每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类型工人的一系列具体环境给工人阶级内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性造成压力。在其他潜在的分野中，我们已经调查研究过的部门中雇佣工人的利益差异是构成这类变化性的一个基础。在瑞典，工人阶级广泛的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力量的作用，如果没有完全消除，至少也减弱了这类意识形态分野的倾向。在美国，工人阶级内的阶级形成特别弱的地方，以依赖不同雇佣部门的直接利益的差异为基础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轮廓的发展有比较大的空间范围。<sup>17</sup>

国家已经被牢牢地带“回到”关于公共政策、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分析议程中来。然而，它大部分依然被保留在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方面微观层次研究的问题之外。本章的分析结果表明，用新韦伯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論家喜欢的用词来说，“国家要紧”。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国

表 15.8 美国和瑞典的阶级—部门交互类型内意识形态方向的等级排序

I. 美国		两个部门模型		三个部门模型		
I.1 支持国家主义	私有	整个国家	私有	国家政治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2 <sup>a</sup>	2	2	2	2	2
工人阶级	1	2	1	(2) <sup>b</sup>		2
I.2 反对资本主义	私有	整个国家	私有	国家政治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3	2	3	2	2	
工人阶级	1	1	1	2		1
II. 瑞典						
II.1 支持国家主义	私有	整个国家	私有	国家政治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3	2	3	3	2	
工人阶级	1	1	1	1	1	
II.2 反对资本主义	私有	整个国家	私有	国家政治	国家服务	
中产阶级	3	2	4	3	2	
工人阶级	1	1	1	1	1	

a. 数字是在与表 2 中的预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特定类型的实际等级序号。等级序号 1 意指对谈论中的意识形态成分的支持程度最强烈。当两种类型在 0.10 显著性水平上无显著差异时，它们被给以同样的等级序号。

b. 这个例子中，该类型同表中其他任一单元并无显著差异。因为这个单元中值的绝对大小 (1.26) 实际上与某些等级 2 的其他单元一致，所以把它看做一个 2 级类型似乎是合适的。

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阶级的重要性不同。

## 方法附录

因变量：赞成国家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

测量赞成国家主义意识所用的三项提问：

- ①为了减少犯罪，需要增加穷人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你是强烈同意、稍微同意、稍微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sup>18</sup>
- ②在政府控制主要能源公司之前，能源危机将不会完全解决。（你是强烈同意，等等？）
- ③你认为政府应该在教育和卫生方面大量增加投资，还是稍多些，维持现在的数目，稍少些，还是大量减少？

反对资本主义意识是通过第十四章中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使用的五个条款加上一个附加条款来测量的。附加条款是：

假定主要产业里的工人为了工作条件和工资在罢工。你喜欢看到下面哪种结果：

- (1) 工人最重要的要求得到满足。
- (2) 工人的一些要求得到满足，并做出一些让步。
- (3) 工人仅有几项要求得到了满足，而做出了重大让步。
- (4) 工人的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而回去工作。

像在第十四章里的一样，我试用多种简单和复杂的把这些条款聚集成分析上有用的尺度的策略：构造这些条款的简单相加尺度；使用序数概率单位分析把级数指定在尺度的诸层上；构造以使用 LISREL IV 的证实因素分析为基础的尺度。<sup>19</sup> 最后证明，实际上不管用何种方法，所有结果都一样，实质性的结

论不受使用不同方法的任何影响。因而，我决定本章使用最不复杂的尺度构成技术，也就是说，仅仅计算一个人持赞成国家主义立场或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条款数字。（在注脚中我已经指出，如果使用一种较复杂的分析方法，很少在结果中产生差异的例子。）

为了构建这两类尺度，所有这些条款被分成三类，值+1表示反资本主义或赞成国家主义的回答，-1指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国家主义的回答。而0指“中性的”回答（一般地答“不知道”）。以同意或不同意作为回答的条款中，为了构建这些三分法，我们把每个问题中的“稍微”和“强烈”的两种回答压缩进一个类型。所以变量的构造不同于第十四章里的策略，即把每个条款以5分尺度编码，从2到+2。上述条款3通过把中间的回答——“政府应该在教育和卫生上投资当前的这个数目”——看做中性国家主义类型，为0，从而分为三类。在罢工结果的条款中，回答类型（2）——工人的一些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并做出一些让步——被视为一个阶级—中性的回答，并因而给以0；第一类给以+1值；第三个和第四个类型合起来给以-1值。

于是，通过把这三个赞成国家主义条款加起来构成赞成国家主义尺度（数值从-3到+3）并把表14.1中的条款和罢工结果条款加起来构成反对资本主义尺度（值从-6到+6），尺度就这样被构建成了。当用于构造这些简单尺度的某些条款缺少数值时，我们就计算有效回答条款平均值，然后用3（对于赞成国家主义尺度而言）和6（对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而言）去乘这个平均值。从而，我们用基于有效回答的平均值的最大似然估计值代替了所缺少的数值。

## 自变量

(1) 阶级位置。“中产阶级”将限定为管理者、专家或技术监督者的每一个人。所有其他雇员都被看做处在工人阶级中。因而在这一分析中“工人阶级”包括纯粹工人阶级加上那些有最强烈的工人阶级特征的“对立阶级位置”——非技术监督者，以及非监督性技术工人。这符合阶级结构中的那些构成第十四章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联盟”的核心的位置。

(2) 国家部门相对于私有部门。说他们“为其他人工作”(而不是自我雇佣)的所有受访者都被询问，他们是为政府机关、非赢利组织还是为赢利商业工作。在瑞典，又给他们一个附加回答类型，“政府产业”。国家雇员被认为是所有那些说他们是为政府机关，或者是为政府产业工作的人。

(3) 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相对于国家服务部门。国家部门中那些构成资本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机构和那些构成国家主义生产“服务部门”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区别，是用SIC(标准产业分类)编码来实现操作化的。政治上层建筑包括防卫、政府保护性服务、法院、税务行政机关和一般所谓的“公共管理”。国家服务部门包括国家部门内所做的各种社会的和相关的服务：教育、卫生、研究、通讯和邮政服务。除了这些，国家服务部门也包括政府产业中的雇员。<sup>20</sup>

至于我们所做的理论区别，国家部门里某些雇佣类型是模糊的。例如，福利机构常常把社会控制功能(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名副其实的社会服务功能(例如，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结合在一起。为了本分析的目的，我们把福利归为服务部门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这类机构中工作的人们的社会政治利

益似乎更像卫生和教育机构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利益，而不是更像防卫机构和法院中人们的社会政治利益。

### 统计检验

数据分析主要围绕两类统计调查：(1) 国家内每对阶级一部门交叉类型之间关于因变量的平均值的比较，和(2) 阶级一部门交叉平均值的那些差异的大小的跨国家比较。对这些任务中的第一个的正式统计检验由对两个类别之间的平均值上差异的标准t检验组成。在对美国和瑞典之间差异的分析中，正式统计检验是由这两个国家里阶级一部门交叉比较之间的差异的t检验组成的。

值得指出的为人熟悉的技术点是，类型之间的差异在A国具备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性而在B国不显著是可能的，而就这些差异的差异而言，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国家A中的差异减去国家B中的差异的差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比标准t检验的0大）。在比较两组差异——其中每组都在同一方向上——中，差异之间t值对比将会低于初始差异的t值。这是因为差异的标准误差（t检验的分母）总是比单个差异的标准误差大，同时分子总是比初始差异中的分子中至少一个要小。因此，在差异之间的一个评估差异方面通常比在单个进行的初始的国家内差异方面更难建立高水平的统计信度。

## 第十六章

### 时间性、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

8

本书中我们所使用的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概念是有时称为阶级分析的一种结构探讨的一部分。<sup>1</sup>结构探讨把阶级看做在关系上界定的由个人占据的空位置的矩阵。位置和人们在概念上区分开来：个人被想象为进出于这些位置，但位置本身被看做是严格独立于人们的这种移动。虽然，我在多个适当的地方已经强调了在这些“位置”中的责任产生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生活经验又反过来决定意识的形式的方式。不过，我的分析明显地以一个结构概念为基础。

存在另外一种关于阶级的一般思考方式，这种方式在集中于主观性问题的阶级分析家中特别有影响。与结构主义对限制人们行动的社会关系的关注形成对照，可以称之为程序观点，把阶级看做是首先由人们的生活经验构成的。仅在个人经历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以阶级的术语说，他们共有一套限定他们生活的长时期经验。E.P.汤普森(1968：9)的著名阶级定义反映了这样一种见解：“由于共同经验(继承的或分享的)，当一些人感到和明确表达对他们的利益认同时——这些利益既是他们自己之间共有的，而又排斥那些

同他们的利益不同(通常是对立)的人们——阶级便发生了。”生产关系中的个人位置作为产生这种经验轨迹的机制之一也许是重要的,但它们本质上不比以阶级术语所说的构成个人经历方面的共同体的形式、家庭结构或文化更重要。

本章我们将检测这两种对阶级分析的主要探讨对阶级意识的意义。

### 16.1 对阶级和意识的结构和程序探讨

对阶级的结构探讨和程序探讨之间突出的差异概括在表 16.1 里。这个比较的核心,是两种不同的直觉:是什么最系统地使阶级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得到解释。程序探讨把阶级看做解释性的,因为它决定冲突的主观条件——首先是参与冲突的各种行动者的认同和意图——的方式。与之相比,结构探讨视阶级的主要解释力来自于阶级通过决定个体行动者的物质利益和通过形成在追求这些物质利益时行动者可以集体部署的各种资源以及决定不同的行动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的方式。用理性行动者模型的语言,就是结构理论集中解释独立于行动者动机而存在的一套可行的行动,而程序理论关注于行动者本身优先选择的次序。在这种意义上,程序理论植根于所谓的以动因

表 16.1 阶级分析可选择的两类一般方法

	程序探讨	结构探讨
阶级解释冲突的条件	主观的	客观的
行动理论	以动因为中心	以关系为中心
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	认同	利益
阶级时间性	过去	未来



为中心的行動理論，而階級的结构概念則展開了以关系为中心的探討。

在討論這兩個方法中很容易不知不覺地陷入對每個方法的諷刺。結構探討的辯護者不是把程序探討描述為以動因為中心，而是常常把它們描述為唯意志論的和唯心主義的。而階級的程序探討的支持者則常常把結構探討描寫為經濟主義的或決定論的。找到這類極端立場的例子肯定是可能的。<sup>2</sup>但是一般來講，這兩類取向更多的是對某種情況的強調，而不是極端對立：很少有結構理論的階級分析者完全忽視主觀性和能動性，同樣也很少有程序理論家把主體行動視為沒有关系的約束。這兩類取向的每一類發掘了結構和能動“辯證法”的不同方面，而且依賴於所研究的具体問題，其中某個可能是一個更有效的分析起點。於是，階級分析的目标是理解如何把行動和理論這兩種形式之间的关系概念化，而不是如何選定一個或另一個。

把程序和結構方法整合起來，處理這項任務的一個途徑是，把它們同所謂的階級分析的時間方面聯繫起來。階級的程序探討圍繞的是學習的問題。主要任務是理解人們是怎樣開始學習成為具有與之相隨的認同、世界觀、生活方式和目的的階級成員。在任何特定的時刻，我們已學得的东西可以通過我們生活中積累的經驗的軌迹得到解釋。<sup>3</sup> 這個軌迹既是個人經歷又是集體歷史的問題。在過去的階級鬥爭中的勝利和失敗的制度和文化遗产恰如個人經歷中生活事件的積累一樣要緊。所以，在程序探討方面，階級分析的時間性主要是回顧：階級是過去在當前的體現。

相比之下，階級的结构探討圍繞的是行動者面臨的客觀選擇。<sup>4</sup> 階級結構內行動者面臨的一批可行的客觀選擇，限定了行動者可達到的可能的未來狀況的范围。在歷史有助於解釋為什

么阶级结构是现在的状况的范围内，历史可能是要紧的，但在概念上它并不是由阶级概念本身组成的。所以，在结构探讨方面，阶级分析的时间性主要是瞻望：阶级是可能的未来在当前的体现。那么，对实际未来的解释对实际行动者实际选择的具体选择对象的解释是这两个时间性交叉作用的结果——体现过去的时间性决定主观性和体现结构上受到限制的未来的时间性决定选择对象。

鉴于阶级分析中含有的这些时间性，就容易明白为什么阶级意识的概念化在程序和结构探讨之间不同了。程序探讨主要集中于认同问题，结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利益问题。

阶级认同指的是人们把自己看做不同阶级“成员”的方式。<sup>5</sup> 照此，它构成了人们限定关于他们的生活特点与其他人不同的许多方式之一。“认同”有认知的和感情的成分。从认知方面说，认同仅仅限定人们把自己放进正式分类的不同体系的方式。从感情方面说，认同涉及在个人的意义体系中主观上突出的各种分类。当向一个人询问的时候，这个人可能把他或她自己归为民主党党员而不是共和党党员，但是这可能有很少的感情特点，并因此不能构成认同的一个显著方面。通过在社区和社会互动——在其中特定认同在文化上是突出的——中经验的个人经历，形成了“认同”的感情方面。因为在一个人进入新阶级位置时，意义没有同时形成和再形成，所以阶级认同可以视为一个“回顾”概念：它植根于一个人的历史和个人历史依赖社区和社会群体历史的方式。

另一方面，围绕利益意识的构造，指的是对未来的期望，并因此可以把它看做“向前看的”。<sup>6</sup> 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工人有特定的阶级利益时，其假定是，涉及的个人可能有充分长的时间持续作为工人，以至他们的个人利益能够同他们作为工人的位

置一致。如果一个特定的工人知道他或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退出工人阶级——例如，他们的父母富裕，并知道他们将会继承大笔资金，或如果他们在麦当劳公司工作同时上着大学，并且自信靠获得学位能得到“中产阶级”的职位——那么，他们的个人利益将会仅仅微弱地与他们当前阶级位置相连。所以，阶级利益的意识是面向未来的，反映了时间视野，据此，个人理解了他们同阶级结构的关系。

因此，对阶级的程序理解可以看做为理解阶级个人经历导致阶级经验轨迹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这些阶级经验轨迹以不同的阶级认同方式体现出来，而阶级的结构则提供了一种理解阶级结构是怎样把机遇和限制强加给人们的方式，这些机遇和限制决定了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并因而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本章经验研究的目的是，把这两类探讨结合起来，以便理解阶级主观性的不同方面。

## 16.2 轨迹、结构和意识的模型

人们会想象一些特殊的个案，其中纯粹对阶级的结构说明或纯粹的程序解释是足够的。例如，如果对行动的结构限制是如此狭窄以致使一组可行的选择变成一个单一的选择，那么，阶级在文化上是如何构造的或阶级位置上的行动者以什么样的认同和偏爱为特征，实际上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阶级结构被描述成具有如此高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因而每个人都能够有效地选择他自己的阶级，并因此阶级成员资格几乎完全是特定生活方式的偏爱形成的问题，那么阶级的结构探讨将会有很小的解释力。

然而，现实的阶级社会都远非这些特殊的案例，并因此阶

级分析应该试图把程序和结构探讨的分析策略结合起来。我们尤其需要把阶级的结构和程序探讨的两个时间性相结合去理解在解释当前的实践和斗争中，过去的经验轨迹是怎样同未来的客观可能性相交叉的。<sup>7</sup>

在本章我将试图在对阶级意识的经验分析中把阶级的程序探讨和结构探讨的时间性连接起来。围绕四个基本假设建立该模型：

假设1：基本结构假设。个人的阶级位置比他们的阶级轨迹将更系统地决定阶级利益的主观意识。这是来自研究阶级的结构探讨的主要论点。阶级位置决定行动者的客观阶级利益。所以，同样的情况下，会有利益的主观感觉紧密地依赖于一个阶级位置上的责任的趋势。一个人的阶级经历——他们来自哪里，在过去他们有何种阶级经验——与个人对阶级利益的主观理解有关系，而这种关系仅限于它给阶级位置的责任者一个对他们的阶级利益更清晰的感觉的范围。

支撑假设1的是这样一个假定：由阶级结构决定的客观利益依赖于责任者的阶级位置。这个假定的有效性依个人进出阶级位置移动的时间范围而定。在一个极端是这样一个阶级结构，其中特定阶级位置的责任者和他们的孩子长久地处于那些阶级位置；在另一极端是这样一个结构，其中责任者有任意进入不同位置的非常高的可能性。与位置相连的客观利益在这两个结构中是不同的，即使关于“空位置”本身的描述是一致的。利益永远是对期望中的将来状况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实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未来阶级位置可能不同于其当前的位置，这个人当前的利益就受到影响。至少，个人高流动率在位置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了某些不确定性或模糊不清。所以假设1预先假定一般情况下阶级成员资格有充分的稳定性，

当前阶级位置是绝大多数人未来阶级位置的相当准确的预示器。

假设2：基本程序假设。个人的阶级轨迹将比他们当前的阶级位置更系统地决定个人主观的阶级认同。认同是长时间形成的；它们是学来的。一个特定个人是否认同工人阶级会更依赖于他们以阶级为基础的经验整个个人经历，而不是仅依赖于阶级结构内他们当前的阶级位置。

假设3：阶级的程序和结构方面的相互影响。人们的阶级认同，除了影响他们对阶级结构内他们当前位置的感知，还影响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感知。阶级结构限定一套阶级位置上责任者的客观利益，这本身自行造成一个对利益的主观感知随阶级位置而变化的趋势(假设1)。然而利益的主观感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原始感觉材料”的反映，并且，如果阶级的程序探讨理论家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是如何理解其利益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他们的认同。因此，可以期望：认同甚至在控制了个人阶级位置之后，还将影响利益感觉的形成。

假设4：阶级形成假设。阶级位置与主观阶级利益之间和阶级轨迹与阶级认同之间在微观层次上的关系强度随阶级的集体形成的程度而变化。假设1—假设3都是微观命题，因为每个命题都是一个关于个人的某种属性或状况是怎样造成他们有特定的意识形式的倾向的断定。不过，在第十三章强调了，这类倾向为发生于微观过程中的宏观历史脉络所调解。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高度组织化，在阶级形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可以期望，这些微观倾向比在阶级形成高度原子化和碎片状的条件更强烈。所以，一个特定的阶级位置在微观层次上产生对相应阶级利益的主观感知，或者一个特定的阶级轨迹导致特定的阶级认同，这两者的“效率”会随着阶级形成的集体机构的增强而增大。如果我们打算把一个工人阶级形成的形式相对

较弱和松散的国家(比如美国),与一个工人阶级形成的形式相对较强的国家(比如瑞典)比较,我们因此会期望假设1—假设3中假定的关联对前者会比对后者弱。

把这四个假设结合起来,我们得出图16.1所描绘的简单因果模型。这个模型将构成本章对于瑞典和美国的阶级位置、阶级轨迹和阶级意识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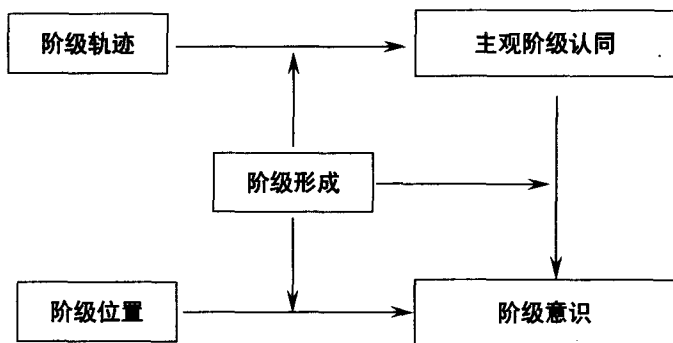


图16.1 阶级认同和主观利益的基本因果模型

### 16.3 阶级轨迹的概念化和测量

为了理想地全面测量阶级轨迹,我们需要完整的个人阶级经历。个人经历包括关于像如下之类的阶级特性的资料:个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曾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社区,受教育经验的阶级特性,所有以前的工作及每一个工作的时间长度,和一系列其他的有关阶级的经验(失业、罢工等等)。这个复杂、多维的长时间阶级经验的空间能够因此而压缩成较少数理论上一贯的生活类型(完全生活在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

来回变动的生活；和工人阶级距离越来越远的生活；等等）。

我们没有这类关于阶级的个人经历和经验方面的全面的资料。我们所有的是关于阶级出身和当前阶级位置的资料。这些资料能使我们创制一个简单的  $4 \times 4$  阶级流动矩阵。<sup>8</sup> 那么，我们的策略将把这个出身与归宿交叉的阶级流动矩阵中的单元作为与可能的阶级轨迹最接近的图形来使用。

阶级程序理论的拥护者可能会反对说，这是一个详细说明轨迹的程序观点的不合适的方式。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没有直接测量“生活经验”本身，而只是测量了这些经验发生在其中的结构脉络。为了把阶级流动轨迹看做一个反映阶级分析的程序探讨的变量，我们必须假定，通过阶级结构把特定的个人经历移动与实际的阶级经验轨迹密切连接起来。可以认为，把结构和经验之间的联系看做无问题的，正是程序理论家所反对的结构探讨中的东西。第二，流动轨迹发掘了整个阶级轨迹的一个相当有限的方面——阶级出身和归宿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由程序理论家所谈论的阶级构造过程的全部详细目录。甚至除了结构的个人经历与经验的轨迹之间关系的问题，流动轨迹对于开发使用程序探讨的方法来研究阶级问题可能是一个太薄弱的基础。

这些是有关的缺陷，当我们探讨经验研究的结果时应该记住它们。然而，我感到阶级流动轨迹是总体阶级个人经历的一个足够突出的方面。总体阶级个人经历是在经验上描绘这个观念空间的合适的开始方式。进一步而言，我认为与流动有联系的经验是充分一致的，所以，把流动模式在意识方面的经验性影响解释为对阶级的程序观点内假定的种种经验性机制的反映是合理的。总之，这些是我们用当前的资料对阶级轨迹做的最好的测量。

以这种方式,用一个流动矩阵测量阶级轨迹,应该注意,它与“流动影响”常规的研究中对这些矩阵的使用十分不同。在流动影响和研究中,典型的分析策略是以检测一个附加模型开始。在这个附加模型中,社会出身和归宿用于预测我们正谈论的问题的结果。仅在这一模型被详细说明后,被理解为出身和归宿相互作用的“流动”影响才包括到这个分析中。<sup>8</sup>以通常的话说,出身和归宿被看做是流动模式(即把出身和归宿连接起来的模型)的逻辑前提。的确,把流动影响看做一种剩余物——不能归因于出身或归宿本身的出身和归宿的后果的部分。然而,为了限定我们分析中的阶级轨迹的目的,出身和归宿仅仅是我们区别阶级意义上的不同生活类型的最有效的方式;关于出身和归宿相加影响的模型在分析上并不优越于“相互作用”的模型。

表 16.2 阶级流动矩阵中可能的个人经历轨迹

阶级出身	阶级归宿			
	资本家阶级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资本家阶级	1	2	3	4
小资产阶级	5	6	7	8
中产阶级	9	10	11	12
工人阶级	13	14	15	16

为了举例说明这一逻辑,让我们看看表 16.2 中的简单流动矩阵。在这个矩阵中界定了 16 种不同的个人经历轨迹。这个表中的单元可以视为阶级轨迹的每个单一的 16 种类型变量的值,不是把这些轨迹看做两个变量——出身和归宿——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我们有充足的资料,我们当然能够以轨迹影响的分析中的 15 个虚拟变量的方式展开这个完整的 16 种类型。然而,



这一般地不是理论上最有意义的策略，因为不是所有这些单元中的区别都有同等的理论意义。所以，一个替代选择是以根据人们的理论和经验对象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类型中的单元进行压缩。部分可能性情况见表 16.3。

这些模型如下。被指派同样数字的单元在观念上看做是相同的。数字的顺序没有内在的重要性——它们标明性质上不同的类型，而不是一个等级序列。在表中像模型 C 和 D 那样所有单元仅被指派两个数字的地方，暗含着原来的 16 个值的类型学

表 16.3 全部个人经历轨迹类型的聚集模型的范例

A. 出身模型					B. 当前位置模型						
归宿					归宿						
	C	P	M	W*		C	P	M	W		
出身	C	1 <sup>b</sup>	1	1	1	出身	C	1	2	3	4
	P	2	2	2	2		P	1	2	3	4
	M	3	3	3	3		M	1	2	3	4
	W	4	4	4	4		W	1	2	3	4
C. 特权模型					D. 非特权模型						
归宿					归宿						
	C	P	M	W		C	P	M	W		
出身	C	1	2	1	2	出身	C	1	1	1	1
	P	2	2	2	2		P	1	2	1	2
	M	1	2	1	2		M	1	1	1	1
	W	2	2	2	2		W	1	2	1	2
1= 特权所有者 (C) 或特权工资劳动者 (M) 所有生活					1= 涉及特权阶级的轨迹 (C 或 M)						
2= 涉及一般阶级的轨迹 (P, W)					2= 一般阶级的所有生活 (P, 或 W)						

续表

## E. 特权、非特权、移动模型

		归宿			
		C	P	M	W
出身	C	1	2	1	2
	P	2	3	2	3
	M	1	2	1	2
	W	2	3	2	3

1= 一直生活在特权阶级

2= 混合经历轨迹

3= 一直生活在一般阶级

## F. 特权、非特权、向上、向下模型

		归宿			
		C	P	M	W
出身	C	1	3	1	3
	P	2	4	2	4
	M	1	3	1	3
	W	2	4	2	4

1= 一直生活在特权阶级

2= 移入特权阶级

3= 流动进入一般阶级

4= 一直生活在一般阶级

G. 向上、向下模型<sup>c</sup>

		归宿			
		C	P	M	W
出身	C	1	3	3	3
	P	2	1	2	3
	M	2	3	1	3
	W	2	2	2	1

1= 不流动

2= 向上

3= 向下

a. C = 资本家阶级 P = 小资产阶级 M = 中产阶级 W = 工人阶级

b. 单元中的数字用于辨别被认为属于同样概念类别的单元；它们不代表任何种类的尺度。

c. 这个模型假定在中产阶级工资带有者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是向下的流动。

变量被压缩成一个单独的两分变量。这个两分变量仅区分两类生活。

表 16.3 中的模型 A 和 B 代表简单的阶级出身模型和当前阶级位置(或“归宿”)模型。通过沿着模型 A 中的横行把全部类型进行压缩, 我们说, 实际上在阶级个人经历上最要紧的是出身,

就任一特定的出身而言，所有归宿在概念上是相同的。另一方面，模型B沿竖列压缩表中类型，意指最重要的是人们归宿之所在。

从模型C到模型G代表不同类型的阶级轨迹模型；C和D是最简单的，每个仅区别两种生活。在模型C中，所有生活在可以称作“特权阶级”的所有的人——所有者阶级中的资本家，和工薪阶层中的“中产阶级”——不同于其他每一个人。在模型D中，完全生活在“一般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人们不同于曾经某些时候生活在涉及特权的人们。接着，模型E和F以不同的方式合并了C和D：模型E区别了特权生活(1)，完全在一般阶级的生活(3)和混合生活(2)；模型F把这个混合类型分成“向上”(一般到特权)和“向下”(特权到一般)两个构成部分。最后，模型G把各种“不流动”类型——原流动矩阵的对角线——压缩成一个单独的类型。其结果成为流动经验的一个惯例性的向上、向下、稳定分类。所以，这些模型的每一种，都可以视为一个理论假设，关于哪些类别的个人经历应看做本质上是相同的和哪些类别应加以区别的理论假设。

注意到阶级轨迹和当前阶级位置的概念在逻辑上不是独立的，这是重要的。阶级位置提供用于构造阶级轨迹变量的一部分资料。“轨迹”和“位置”之间的对照因此而不等同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区别。轨迹是指个人的全部经历，其中包括现在的位置。所以，在数据分析中，在一个多变量方程中同时包括轨迹和位置没有多大意义。<sup>10</sup> 所以，当我们比较假设1和假设2中轨迹和位置的解释力时，我们不是检测包括这两个变量的多变量方程中他们的相对解释力，而是检测单个变量方程中他们单独的解释力。

## 16.4 结 果

本经验分析集中在意识的阶级内容的两个方面：主观阶级认同和对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态度。主要假设是意识的这两个方面反映了不同的时间性，并因此可能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与个人经历轨迹和阶级位置的问题相关联。

阶级认同是通过一个关于阶级成员身份的相当传统的社会学问题来测量的。受访者首先被询问的是，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阶级。如果他们回答“是”，再问他们所属阶级的名字。如果他们回答“否”，接着问他们：“许多人说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如果你必须做出选择的话，你会说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从而，我们能够把自然地说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同那些仅在被促使做选择时才说他们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区别开来。如果我们假设自然的回答比强迫选择的回答表示更显著的阶级认同，那么这就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反映认同的认识和情感两个方面的工人阶级认同变量。<sup>11</sup>它拥有下列数值：

2= 自然回答的工人阶级身份

1= 被迫选择的工人阶级身份

0= 即使被要求选择时也没有阶级认同

-1= 被迫选择的非工人阶级身份

-2= 自然回答的非工人阶级身份

阶级利益意识是通过一个简单相加尺度测量的。该尺度由那些最接近于发掘对阶级利益的感知的问卷条款组成。<sup>12</sup>

## 阶级利益意识

表 16.4 为预测阶级利益意识的各个模型提供了  $R^2$ 。在模型合适度方面跨类别行动者之间(表中的数列)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模型一般地对瑞典男性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行动者都更合适,对美国男性和瑞典女性适合程度上大体相当。没有一个非常适合美国女性数据的模型。

就这两个国家的男性和瑞典的女性而言,当前位置模型(模型 B)是一个比轨迹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好的阶级利益意识预示器。至于瑞典的男性,最好的轨迹模型——模型 F(特权、非

表 16.4 预测阶级利益意识的轨迹模型的解释变量(调整过的  $R^2$ )

模型(自由度) <sup>a</sup>	美国		瑞典	
	男	女	男	女
A 出身(3)	0.01	0.00	0.03***	0.05***
B 当前位置(3)	0.08***	0.01	0.18***	0.05***
C 特权(1)	0.03***	0.00	0.04***	0.02***
D 非特权(1)	0.03***	0.00	0.10***	0.02***
E 特权, 非特权, 混合(2)	0.40***	0.00	0.10***	0.03**
F 特权, 非特权, 上, 下(3)	0.06***	0.00	0.12***	0.03**
G 向上, 向下, 不流动(2)	0.02**	0.00	0.03***	0.00
模型 B + E 或 B + F(5) <sup>b</sup>	0.08***	0.00	0.18***	0.06***
模型 A + B(6) <sup>c</sup>	0.08***	0.00	0.18***	0.09***

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 不同模型的字母对应表 16.3 中的模型。  
 b. 模型 B + F 仅有 5 个自由度, 因为模型 F 中类型 2 和 3 之间的区别在 B + F 模型中消失了(即是说, 模型 B + E 和 B + F 在数学上相同)。  
 c. 模型 A + B 是常规的相加出身 + 归宿模型。

特权、向上、向下模型)——解释了阶级利益意识上的变化的大约12%，而阶级位置模型(模型B)解释了变化的大约18%。虽然，就美国男性，尤其就瑞典女性而言，在这两个变量上被解释的变化较少，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美国妇女而言，阶级位置和任何轨迹模型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解释力。至少对于男性来说，当前位置对阶级利益意识的影响比个人经历的阶级轨迹的影响稍微大些。这与假设1的主张一致。

### 阶级认同

表16.5展示了瑞典和美国的整个4×4阶级流动矩阵中的每个单元内具有主观的工人阶级认同(即，在工人阶级认同尺度中的值1和2)的受访者的百分比。这个表揭示了瑞典男性或许瑞典女性，而不是美国男性和女性中阶级轨迹对阶级认同的强烈影响。就当前处在工人阶级位置的人们来说，瑞典男性中阶级出身对阶级认同没多大关系：大约70%工人阶级、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出身以及63%资本家出身的人们认同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就当前处在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位置上的人们而言，阶级出身非常重要。例如，虽然48%的瑞典工人阶级出身的中产阶级男性主观上认同工人阶级，但仅有20%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男性认同中产阶级。瑞典女性的结果是稍微不明显，但仍然显示了这种相互影响。所以，在瑞典，阶级轨迹看来系统地影响着阶级认同。

表16.6描述了阶级轨迹的各种模型和阶级位置二者对阶级认同差异的解释量大小的比较。像阶级利益意识的结果一样，就美国女性而言，表16.6中的模型对阶级认同的变化上的解释没有超过大约1%的。所以对不同模型的更详细的分析中，下面

的讨论将限制在美国男性和瑞典的样本范围内。

表 16.5 美国和瑞典由于阶级出身和当前阶级位置  
而拥有工人阶级身份的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

阶级出身 (父母的阶级)	当前阶级位置 (回答者的阶级)			
	资本家阶级	小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
<b>美国</b>				
男				
资本家阶级	0.16(19) <sup>a</sup>	0.10(10)	0.12(42)	0.42(26)
小资产阶级	0.43(21)	0.58(12)	0.20(30)	0.53(32)
中产阶级	0.21(19)	0.50(4)	0.20(106)	0.37(86)
工人阶级	0.13(8)	0.60(10)	0.25(106)	0.36(118)
女				
资本家阶级	0.17(6)	0.38(16)	0.26(38)	0.33(36)
小资产阶级	0.33(6)	0.50(12)	0.25(28)	0.44(57)
中产阶级	0.22(9)	0.14(14)	0.23(61)	0.39(66)
工人阶级	0.25(8)	0.40(5)	0.33(69)	0.34(116)
<b>瑞典</b>				
男				
资本家阶级	0.27(11)	0.20(5)	0.24(25)	0.62(13)
小资产阶级	0.38(13)	0.58(12)	0.49(35)	0.71(75)
中产阶级	0.17(6)	0.50(6)	0.20(71)	0.70(53)
工人阶级	0.33(9)	0.67(15)	0.48(77)	0.73(129)
女				
资本家阶级	0.00(1)	0.00(0)	0.08(13)	0.40(20)
小资产阶级	0.50(2)	0.20(5)	0.32(25)	0.68(65)
中产阶级	0.50(2)	0.00(2)	0.16(56)	0.43(49)
工人阶级	0.33(3)	0.40(5)	0.47(46)	0.58(133)

a. 括号外的数字是这一单元中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个人的百分比。括号内的是个案数。

表 16.6 预测工人阶级认同的轨迹模型的解释变量 (调整过的  $R^2$ )

模型(自由度) <sup>a</sup>	美国		瑞典	
	男	女	男	女
A 出身(3)	0.01*	0.00	0.05***	0.06***
B 当前位置(3)	0.04***	0.01	0.12***	0.08***
C 特权(1)	0.03***	0.01*	0.11***	0.07***
D 非特权(1)	0.03***	0.00*	0.08***	0.07***
E 特权、非特权、混合(2)	0.04***	0.01*	0.13***	0.10***
F 特权、非特权、上、下(3)	0.04***	0.01*	0.14***	0.10***
G 向上、向下, 不流动(2)	0.00	0.00	0.01*	0.00
模型 B + E 或 B + F(5) <sup>b</sup>	0.04***	0.01	0.15***	0.11***
模型 A + B(6) <sup>c</sup>	0.04***	0.01	0.14***	0.11***

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a. 不同模型的字母对表 16.3 中的模型。
- b. 模型 B + F 仅有 5 个自由度, 因为模型 F 中类型 2 和 3 之间的区别在 B + F 模型中消失了 (即是说, 模型 B + E 和 B + F 在数学上相当)。
- c. 模型 A + B 是常规的相加出身 + 归宿模型。

个人经历轨迹模型中, 模型 E 和 F 明显地对这些数据最适合。这两个模型提供了三种个人经历之间的区别: (1) 完全生活在“一般”阶级的人们(工人和小资产阶级); (2) 完全生活在特权阶级的人们(中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 和(3) 个人经历在前两类人之间移动的人们。模型 F 提供了混合个人经历内那些从一般阶级上升到剥削阶级以及那些从剥削阶级下降到一般阶级的人们之间进一步的差别。就瑞典男性而言模型 F 比模型 E 稍微更适合, 而对瑞典女性和美国男性而言, 这些模型之间没有差别。

怎样把这些轨迹模型同位置模型(模型 B)进行比较呢? 当前位置模型经调整的  $R^2$ , 对瑞典男性是 12%, 女性则是 8%。对瑞



典男性而言,模型F的经矫正 $R^2$ 增加到14%,对瑞典女性而言,模型E或F的 $R^2$ 增加到10%。这表明轨迹变量与当前位置变量相比有稍大一些的解释力。就美国男性而言,在被解释的变化方面位置模型与最好的轨迹模型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不是很大。所以,总而言之,是瑞典而不是美国的证据适度地支持了假设2:在瑞典阶级轨迹对阶级认同的影响比当前阶级位置对阶级认同的影响要适当强烈一些。

### 阶级认同对阶级利益的影响

表16.7展示了阶级利益意识方面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每个方程中,阶级认同明显地预测主观阶级利益。而且,对瑞典男性而言结果尤其显著:阶级位置和工人阶级认同各自单独解释18%和16%的工人阶级利益意识上的变化。当结合起来时,它们解释了变化的26%。就这样一个简单多元模型而言,这是一个关于态度的回归分析的很大的 $R^2$ 。就瑞典女性而言,被解释的变化是较低的,但依然是事实的是,除了阶级位置,阶级认同对阶级利益仍具预示力。就美国的方程而言,阶级认同对利益的影响虽然仍然对男性和女性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影响比在瑞典弱得多,至多在所解释的变化上增加一个边际增值。

### 瑞典和美国的比较

假设4认为,假设1、假设2和假设3中假定的影响在宏观社会条件(在其中社会和政治机构沿着阶级界线系统地组织起来)下应更强烈。鉴于以上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瑞典社会民

主党内比在美国民主党内更突出，和考虑到瑞典劳工运动的组织化力量，这个假设将使我们企盼分析结果的模式在瑞典比在美国牢固得多。

表 16.7 阶级位置和阶级认同对阶级利益意识的影响（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美 国		瑞 典	
	男	女	男	女
仅有阶级认同	0.46**	0.29*	0.77**	0.49**
调整过的 R <sup>2</sup>	0.01	0.01	0.16	0.08
仅有阶级位置 <sup>a</sup>				
工人对资本家	1.34**	0.08	2.48**	0.92 <sup>b</sup>
工人对小资产阶级	0.96**	0.56*	1.34**	1.71**
工人对中产阶级	0.85**	0.23	1.20**	0.47**
中产阶级对资本家	0.50*	-0.15	1.28**	0.46
中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	0.11	0.33	0.14	1.25**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家	0.39	-0.48	1.14**	-0.78
调整过的 R <sup>2</sup>	0.08	0.01	0.18	0.05
阶级认同				
阶级位置	0.31*	0.28*	1.12*	0.78*
工人对资本家	1.31*	0.04	2.04**	0.87
工人对小资产阶级	0.97**	0.55*	1.17**	1.47**
工人对中产阶级	0.79**	0.20	0.81**	0.24
中产阶级对资本家	0.52*	-0.16	1.23**	0.63
中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	0.18	0.35	0.36	1.23**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家	0.34	-0.51	0.87*	-0.60
调整过的 R <sup>2</sup>	0.08	0.01	0.26	0.10

显著性水平: \*p < 0.05    \*\*p < 0.01

a. 这些系数是从三个独立的带有不同的被排除的类型的回归方程中计算得来的。用四个虚拟变量因而有 6 个可能的比较。

b. 样本中仅有 5 位瑞典女性资本家，因此这些比较的标准误差很大。

正如表 16.4 和 16.6 所表明的, 各种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在瑞典倾向于比在美国大得多, 就瑞典男性而言尤其如此。就阶级认同变量而言, 所有的模型对瑞典男性和女性比对美国男性有更大的  $R^2$ 。这些模型对美国女性有不多的或没有解释力。就阶级利益意识变量而言, 模型都对瑞典男性比对美国男性能解释更多的变化。阶级位置(表 16.4 中的模型 B)解释了瑞典男性中在阶级利益意识上的变化的 18%, 但仅能解释美国男性中这种变化的大约 8%。最后, 在预测阶级利益意识的多变量方程中, 工人阶级认同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在瑞典比在美国大得多: 对瑞典男性是 1.12 和对瑞典女性是 0.78, 但对美国男性仅是 0.31 以及对美国女性仅是 0.28。

把这些结果结合起来, 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 阶级位置和阶级轨迹在瑞典比在美国是阶级意识的更有力的决定因素。结果对假设 4 形成有力的支持。

### 意识方面国家差异中的阶级和性别

本章数据分析的原来目标不包括探讨在塑造阶级认同和主观阶级利益上性别的交互影响。尽管如此, 在这些结果中, 性别影响是足够明显的, 因此有理由对此做一些评论。最明显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中, 方程的解释力对女性比对男性低得多。更微妙的是, 所解释的跨模型变化模式也因性别而不同。概括这些比较在表 16.8 中。

在我们已经调查研究的基本模型中所解释的差异对美国男性而言典型地处在 4%~8% 的范围内, 但对美国女性一般地是 1% 或更少; 对瑞典男性而言处在 15%~25% 范围内, 但对瑞典女性仅 6%~10%。至少像在这个研究中用变量和模型所测量的

表 16.8 跨国性别对比概要: 预测利益和认同的方程中的解释变量  
(调整过的 R<sup>2</sup>)

	美国 男性	瑞典 男性	美国 女性	瑞典 女性
因变量 = 认同				
1. 出身 → 认同	0.01	0.05	0.00	0.06
2. 位置 → 认同	0.04	0.12	0.01	0.08
3. 轨迹 → 认同	0.04	0.14	0.01	0.10
因变量 = 利益				
4. 出身 → 利益	0.01	0.03	0.00	0.05
5. 位置 → 利益	0.08	0.18	0.01	0.05
6. 轨迹 → 利益	0.06	0.12	0.00	0.03
7. 认同 → 利益	0.01	0.16	0.01	0.08
8. 位置 + 认同 → 利益	0.08	0.26	0.01	0.10
从阶级位置和阶 级出身预测利益 意识和阶级认同 的影响模式	位置在预测 认同和利益 方面的影响 比出身大得多		位置和出身 对或者认同 或者利益都 没有显著影响	出身和位置 对认同和利 益有大约同 样的影响

那样, 阶级位置和阶级轨迹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与阶级意识的各方面有着更系统的联系。

在跨方程影响模式中性别对比同样明显。如果我们单独检测男性, 模型中系数的基本模式在两个国家之间倾向于非常相似, 尽管事实是系数在瑞典一般地比在美国大得多和瑞典模型的解释力也大得多。就这两个国家的男性而言, 在决定利益意识和阶级认同方面阶级位置比阶级出身重要得多。相比较, 对瑞典女性而言, 阶级出身和阶级位置对阶级主观性的这两个方面有大体相同的解释力, 而对美国女性而言, 两者都无太大影响。

有两条解释这些性别差异的推理线。第一，女性中阶级出身和阶级位置的较低的因果效验可能主要是一个测量的问题。也许衡量阶级分野的相同正式标准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有一个更加不同的阶级内容。例如，可能是由于性别歧视，“中产阶级”女性的生产性财产（技术 / 证书）的价值降低了，并因此不能转化为剥削。这暗示女性中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比男性中更弱的阶级分野。这反过来既降低以阶级为中心的变量（位置和出身）的解释力，又潜在地改变了它们的影响模式。

解释这些结果模式的另一个方法是搜寻一些其他的阻碍女性中那些变量的效力（或提高男性中的效力）的机制。一个可能的候选者是性别、家庭结构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如在第十章中所讨论的，因为在家庭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已婚女性的物质利益一般地同她们丈夫的经济命运的关系比已婚男性的物质利益同他们妻子的经济命运关系更密切。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已婚女性的阶级利益将较少由她们自己工作的阶级决定，更多的是由她们的丈夫的阶级来决定。另外，从长时期来看这也意味着她们的阶级认同将更多地依赖于她们的家庭阶级轨迹，而不是仅依赖她们的个人阶级轨迹。所以个人阶级位置将倾向于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对阶级认同和阶级利益的解释力低。

## 16.5 结 论

本章试图在阶级分析中把结构和程序探讨结合起来。许多分析肯定是有待批评的。程序探讨一般地是围绕社团、工厂、学校等处的阶级组成经验的一个相当丰富的目录单而建立起来的。

相比较，我们对程序方法的使用是以一个相当贫乏的阶级轨迹的操作化为基础的，完全依赖阶级出身和阶级位置之间的联系。类似的情况，同时期的阶级的结构探讨一般地超出了雇佣劳动者中简单的工人阶级相对中产阶级的区别，但因为我们的数据资料和样本规模的局限，我们必须依靠这个相当粗糙的阶级模型。另外，正如关于性别的结果所揭示的，即使在这个简单的阶级结构模型内，我们的结果也可能因忽视阶级结构内家庭的位置的问题而大受影响。

尽管有这些局限，我还是相信我们已经检测的数据为本章的基本定向命题提供了一些支持。尤其应该强调以下的基本结论：

第一，阶级位置比阶级轨迹对狭义地影响以利益为中心的意识形成更重要，而阶级轨迹(至少在瑞典)在影响阶级意识的更高程度的文化方面似是比阶级位置更重要些。在这些变量的解释力上所观察到的差异的量并不巨大，但这些结果仍然符合这样一个观点：阶级利益意识更取决于个人对未来阶级状况的感知而不是个人的过去，而阶级认同则主要受以阶级为基础的社区、社会网络和互动中的个人经历的影响而形成的。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一些是对阶级的结构和程序的探讨在意识的不同方面的侧重点的辩护。

第二，阶级利益的感知受阶级认同的影响至少与受阶级位置的影响同样多。虽然在论断一组与创造阶级利益意识倾向的阶级结构相连的物质利益时，阶级的结构探讨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利益的实际感觉对阶级认同的依赖程度和对阶级位置的依赖程度一样或更大。的确，在瑞典男性中，阶级位置对阶级利益意识，阶级认同(排除阶级位置)有着最强烈影响的情况也对利益意识有最强烈的影响。因此，程序理论家在强调阶级

经验的个人经历轨迹和在解释阶级意识和阶级行为方面的经验性变化中重要性上是正确的。当然，结构在概念上要优先于程序阶级概念而具有首要性，因为没有对结构的阶级概念的优先详细描述，限定个人经历轨迹、社区、工作场所经验等等的阶级内容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概念上的首要性并不是意指对个人生活的解释的首要性。

第三，正如我们在第十四章所看到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成的微观机制都经受了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宏观社会环境的调解。在政治和经济冲突主要是沿着阶级界线被组织起来的地方，这些微观机制可能被强化；在阶级以集体组织的制度方式被忽略的地方，微观机制于是就会变弱。这再次反映了阶级程序理论家的一个基本洞察：构成阶级的个人经验的效力取决于这些经验产生于其中的历史脉络。

最后，尽管不是作为本章原始议程的一部分，我们对程序和结构本质的观察的结果因性别而有很大不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机制，因本身不具备独立效力而内在地受性别影响，但它确实意味着对阶级位置和阶级轨迹的影响的经验研究必须包括与性别相互作用的分析。





# 第五编

## 结 论



## 第十七章

### 验证：意外的发现和理论重建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分析在关于当代社会困境和人类平等与民主的未来目标的全民分析中占据着中心位置。阶级是一个突出标准化的概念，它根植于压迫、剥削和统治的思想。这一概念既赞同无阶级社会的解放前景，又认同源于本质上对利益的冲突、组织和社会变迁的解释性理论。这类阶级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以为使世界朝着那理想方向转变的政治方案做贡献的方式把解释理论与解放前景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验性研究，无论是哪一类——不管是人种学案例的研究、历史研究还是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都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乍一看来，本书中的经验研究似乎与这类宏伟前景毫不相干。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是紧密围绕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关注的特征，而没有围绕有力影响社会变化的时代矛盾。即便我运用了有变化的斗争命题，在实际经验分析中，对“阶级斗争”的苍白思考也就是以个人态度的形式出现的。即使我们所探讨的阶级概念是根据剥削而概念化的，也没有一个经验研究直接探讨了剥削本身问题。那么本书中的大量系数、表格和图示能以何种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议程的中心命题和思想的发展呢？

研究用两个基本方法推动了社会理论的发展。在有关某些问题的矛盾的理论主张之间存在争议的地方，研究可以潜在地提供在两种选择间做出裁决的基础。特别是，问题越是集中越是很好地界定过，在对需要解释的东西的精确说明的矛盾观点之间越是一致，而研究也就越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我们对阶级结构或阶级边界渗透性的改变两种预期的探讨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这里，已成功研究的结果只能认为是暂时“验证”了与理论观点相联系的一套特殊的期望。<sup>1</sup> 虽然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裁决和验证很少直接依赖更广泛的理论观点的支持，这种研究的累积影响有助于削弱的一些观点而强化另一些观点。

裁决和验证是当代社会学标准“假设检验”策略的核心。<sup>2</sup> 然而，存在着第二种程式，通过研究这种程式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即研究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发现与理论预期不一致的有趣的意外、反常的经验结果，从而引起反思。进行能证实人们所相信的研究已是很好的了，但知识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对挑战人们已有而且相对公认的常识来说是反直觉的观念，而进行的观察。

这类意外可能是在对立假设间做出裁决的副产品。毕竟，一个理论框架中的“意外”可能是另一个理论框架中的“常识”。工人阶级的加速衰落肯定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意外；而对后工业理论家来说则不足为奇。因此似乎证实某人理论对手的期望的研究却为理论重建的努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经验性反常事件也会发生在没有明确指向对立假设之间裁决的研究中。例如，在我的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中，意外产生于对性别关系阶级分析的含意的探讨而不是源于关于家务劳动可选择理论的直接对立。无论如何，经验的意外迫使我们理论进行重建，而且就是通过这种重建，社会理论才得以向前发

展。<sup>3</sup>

当然，借助经验性意外来进行理论的“重建”可能纯粹是一种自卫性的操作，就像修补一艘正在下沉的偏离航线的船。用伊姆雷·莱克托斯的话来说，不能确保重建构成理论框架内的“进步的”发展，而不会沦落为某一研究计划的分支。然而，也就是通过这种重建理论知识才得以发展。<sup>4</sup>

本书的研究包含这两种联系理论和研究的程式。此研究中有些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期望和源于其他理论观点的期望之间的经验性比较。其他研究则更较少地关注经过完备系统阐述的对立期望之间的裁决而更多的是仅仅探讨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的意义。<sup>5</sup> 本研究的大部分为研究之前我所相信的东西提供了证实，但也有许多意外发现，至少有些意外发现可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不断重建。

本章中我所关注的主要就是这些意外发现。接下来，对于本书中每一个主要命题，我将首先提出一个可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传统常识”的格式化的解释。这不总是一种轻松的工作，因为对于我们已探讨过的一些命题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很多可说的。无论如何，可以从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选择“传统观点”。因此，我赋予“传统理解”的特性注定要受到反驳。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给“马克思确实说过的东西”一个权威的解釋，而是为了捕获一套为许多——或许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享的理论直觉。对传统理解的这种解释将作为评估这些方法各种研究计划的结果对这些传统期望和意外提供相符合的情况——的标准。反过来，意外发现的概要将为探讨借助此项研究可能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某些方向打下基础。

这些问题将在本书中我们已研究的阶级分析中的五个广泛

的命题中加以探讨：(1)阶级结构内的“位置”概念化的问题；(2)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易变性和转变；(3)个人生活和阶级结构的交叉点；(4)阶级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影响；(5)阶级与其他压迫形式，特别是性别之间的关系。

### 17.1 阶级结构中“位置”的概念化

与任何其他问题不同的是，这项研究围绕的是如何给某人在阶级结构中“定位”的定义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要通过探讨阶级对个人生活和意识的影响把与阶级分析的微观和宏观层次联系起来，那么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的解决是必不可少的。它酷似某个阶级关系结构产生出一系列为个人所占据的“空位置”。为进行微观阶级分析，我们必须既要考虑如何界定这些空位置，又要考虑对与这些位置相联系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 传统的理解

传统马克思主义仅在最高抽象层次上发展了阶级结构系统的概念化。阶级关系中的“空位置”界定为特定生产方式中的社会财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导致了对两个基本阶级位置的严格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工人。这里还可以加上源于各种各样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位置，特别是简单商品生产中是小资产阶级，以及某时某地的各种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阶级位置。在许多具体的分析中也顺便参考了其他阶级位置，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新中产阶级，但没有把这些阶级位置给予坚实的概念地位。

在传统的解释里，个人通过与生产资料的直接关系而与这

些空位置相连：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并在资本家公司中工作；小资产阶级是使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因此，每一个阶级位置都存在于一个，并且仅仅是一个阶级之中。当然个人在其生活过程中可能改变其阶级，但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上，他们都处于具体阶级之中。

### 最初的重建

本书详细说明的框架试图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概念。首先，空位置的构图通过阶级关系中对立位置概念的发展得以改变。我没有仅在抽象的生产方式层次上界定阶级位置，而是力求发展一种对职业是如何与剥削过程相联系的更加具体的、多角度的理解。我特别认为除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外，职业与剥削过程的联系是由它们与生产(权力)中的控制关系以及与对专门知识和技能的控制关系所造就的。这导致了我们在整个书中所使用的更加复杂的位置构图。在这个新的概念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不只是一个没有很好地符合“资本家”和“工人”类别的多余的位置类别。相反，阶级结构中中产阶级位置是那些以对立的方式与剥削和统治过程相联系的位置。因此，阶级结构中的“空位置”在没有必要存在于一个，并且仅仅是一个阶级之中。

其次，间接的阶级位置概念修正了传统的阶级位置观点。试图把个人归于一个阶级位置的中心观点是为了把阐明个人可能拥有的生活经历和物质利益的性质解释清楚。“处在”某一阶级位置意味着你做某些事情而且某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生活经历)，也意味着你在追求你的物质福利过程中所面临着某些策略

性选择(阶级利益)。包含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职业是个人与这些利益和经历相联系的方式之一,但不是惟一的方式。家庭提供了另一套使人们与阶级结构得以联系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在不同家庭成员拥有不同阶级特征的职业家庭中特别突出。这些家庭中的个人拥有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这两种与阶级关系的联系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相同的。这就把一个新的复杂层次引入了对阶级的微观分析,这一层次与阶级和性别的相互作用特别相关。

### 经验性验证

对概念的经验性“检验”是一项棘手的工程。的确,有些社会科学传统把概念仅仅当做语言习惯,因而认为证明一个特殊概念化过程可能是错的是毫无意义的。至多可以认为一个给定的概念或多或少比其他概念有用。然而另一个观点则主张,至少有些概念应被视为试图说明世界上存在着独立于我们的理论的真正的机制。对于这类“现实主义概念”来说,在错误说明有关因果属性的某些关键特点的意义上某一定义可以是不正确的。<sup>6</sup>

本书提出的阶级概念是一个现实主义概念,而不完全是一个任意的约定俗成。因此评估此概念的适当方式是考察假设的阶级界定机制应该产生的种种影响。如果既定的概念化过程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影响应该遵循某些预期模式。当然关于这些期望的反常事件无须使这一概念无效,因为这类预测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各种混杂的机制存在(包括我们称之为“量度问题”的特殊类型的混杂机制)。然而,正如在更为直接的假设检验中的一样,这些意外发现提出了潜在诱导重建的点。



从某个方面讲，本书几乎所有结果都和评估提议中的阶级结构概念化的充分性问题有关，尽管本研究几乎没有针对这个概念的对手而对其进行“检验”。然而，一些结果仍与构成本书的概念化基础的理论逻辑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首先，在关于阶级意识的分析中，个人对阶级问题态度中的跨阶级位置变化大致符合源于三维阶级结构矩阵的期望。特别是在瑞典和美国，个人可能持有认同资本家或认同工人阶级态度的程度因矩阵的三个维度呈单调变化。当然这没有最终证明这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阶级位置概念的适当方式，但它赋予了这一研究以可靠性。

第二种特定的方式更为复杂。本研究的结果支持所提出的阶级再概念化。在关于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各种分析中，已经证明，发生在特定阶级位置间的渗透性事件（流动、友谊、跨阶级婚姻）的概率不仅仅是我们所研究的跨三个阶级边界——财产边界、权力边界和技能边界的累积渗透影响。例如，处于工人阶级位置的人与处在资产阶级位置的人之间的友谊概率不仅仅是跨财产边界和跨权力边界的友谊的概率的总和。如果这三个边界的影响具有严格累加性，那么这表明把这些维度合并成为一个“阶级结构”只是一个为了概念上的方便。如果把这一阶级结构分解为更加“原始的”维度并把它们视为个别的、独立的职业特性，我们并不会有什么损失。阶级渗透性模式中这些维度之间的稳定的相互作用支持了这样一个主张：即这三个维度应被视为一个概念定型结构——“阶级结构”——的维度，而仅仅是单独的职业特性。

第三，间接阶级位置概念的可信性在对双收入家庭中已婚女性的阶级身份的分析中得到了证明。至少在瑞典，这种女性的阶级身份既由她们自己的职业阶级又由她们丈夫的职业阶

级来决定。虽然在此分析中存在复杂情况，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关于阶级意识的讨论中加以回顾，这些结果通常还是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个人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应根据把他们的生活与阶级位置联系起来的多种方式加以概念化。

### 意外的发现

本书多数经验研究的结果与所提议的阶级结构再概念化是一致的。然而，存在两组特定的有些不规则的结果的存在提出了有关对立阶级位置的概念问题。这两组结果都涉及阶级结构矩阵的权力与技能维度间的关系，其一是在关于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中，另一个是关于在阶级意识的调查中。我们将在后文考察阶级渗透性和阶级意识的一般结果时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些结果。这里，我只关注这些结果是如何对对立阶级位置的概念化产生影响的。

第一，在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中，对于我们研究的每一类渗透性来说，权力边界总是比技能边界(在有些分析中绝不是明显的不易渗透)具有大得多的渗透性，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架框之中，权力比技能或专门知识更为紧密地与资本主义基本阶级分裂、资本—劳动力关系相联系。因此，与技能边界相比较的权力边界相对高的渗透性与我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一致。在重建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中，权力构成雇员之间阶级结构的一个维度而不只是“分层”的一个方面甚或只是角色的差异。

第二，在日本，与相当尖锐的专家与非专家之间在每一个权力等级的层次上的观念分裂比较，跨越管理权力层次的极端微弱观念差异也与那些对立阶级位置概念的含义发生矛盾。由

于我们用做阶级意识的指示器的那些项目集中围绕的是资本—劳动力冲突。如果情况是管理权力限制了与资产阶级相连的对立位置的基础，那么在这一维度上的观念差异在一个像日本这样完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微弱就令人感到惊讶了。而技能分裂比权力分裂如此显著得多就特别令人感到意外了。

### 进一步理论重建的可能

这两个反常的结果可能只是量度问题的结果。很明显，在态度问题上，日本的结果易产生各种测量误差。但量度问题同样可能破坏渗透性结果。即使我们试图把管理边界的渗透性限定在把真正管理者（不只是监督者）与权力等级之外的雇员相联系的事件上，在几项分析中我们也不可能严格区分管理者和监督者。此外，甚至“管理者”类别也包括靠近权力结构底部的人们。在整个书中我们把小公司管理者与跨国公司管理者混合一类，这个事实也可能混淆这些分析。一个拥有地方零售店或麦当劳连锁店的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管理者与工人交朋友是一种情况，面对于IBM总部的一个管理者（更不用说一个总裁）来说有这些联系则是另一种情况。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把管理者限制在对主要的组织资源和政策制定拥有决定权的人们身上而且区分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和小公司生产，这些结果会有很大差异。

然而，如果这些反常结果证明是强有力的，那么它们可能表明，“对立的阶级位置”概念的确融合了根植于具备渐进分层维度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中的某个相关的阶级概念。这对于技能维度最明显，技能维度似乎有一个自然的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东西的渐进逻辑。权力在本质上是与职业相关的一个特性，然

而它在阶级分析中的位置最好根据阶级中的阶层而不是一特殊类型的阶级位置来理解。这种推理方法表明了从阶级关系中对立位置观念向一个相当极端的概念转移：权力和技能会被看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界定的雇员阶级内渐进阶层的基础。就阶级概念本身仍与剥削问题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紧密联系而言，这样一个阶级分析仍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一分析将不再尝试在具体、微观层次的分析中对雇员之间有差异的阶级位置进行说明。如果这一概念的移动被接受，那么独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将主要在更加抽象的阶级分析层次上充实分析，而更像一个社会分层的渐进概念的东西将充实具体的分析层次。

我不相信这些有关管理者的特殊的结果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需要这类概念的转变。对于本书中大多数分析来说，我们按权力和技能维度勾画的雇员之间的分界线，看来具有类似阶级的效果，而且阶级关系中对立位置的概念出色地提供一个理解这些结果的解释性框架。总之，本书中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对立阶级位置概念的富有成效。因此，虽然概念框架没有在理论上或在经验上达到广泛的一致层次，对此我最初开始研究中产阶级问题时我已期望过，但反常是如此强烈以致诱发了一个新的概念变形。

## 17.2 阶级结构及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

### 传统理解

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跨时间和地点的观点围绕着三个一般命题：

1. 资本主义不同阶级的人口分布应主要依赖于“生产力”（技术和技术知识）的发展水平。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阶级位置分布来说应该尤其正确。既然我们的样本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可以预测，它们的阶级分布不应该有很大差异。

2. 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布随着时间的一般变化趋势是工人阶级的扩大。有两个主要理由解释这一期望：第一，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阶级位置受到来自大资本主义公司的竞争而逐渐削弱，这就扩大了受雇的有酬劳动力的比例；第二，为了追求资本主义利润的最大化，生产的合理化和技术进步倾向于产生“劳动力贬值”——在技能、自主和权力方面雇员的减少，导致工资劳动者之中无产阶级化劳动力的相对扩大。<sup>7</sup>

3. 由于这两个命题，我们期望工人阶级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阶级。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方式来描述阶级的概念，都会拒绝接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主要“中产阶级社会”的形象。<sup>8</sup>

## 验 证

这些传统理解的一些方面得到本书第一编的数据的支持。在我们考察的所有六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仍然是阶级结构中惟一最大的位置，并且当非技术监督者和技术工人合并到工人阶级位置时，在我们所考察的每个国家中，“扩大的工人阶级”占了劳动力的明显多数(55%~60%)，占雇员的绝大多数(大致75%)。很可能的情况是，按照收入的分配和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中用以界定“中产阶级”的特有方式——相当多数的

人属于中产阶级。但根据与生产过程和剥削的关系，多数劳动力或者属于工人阶级或者属于那些与工人阶级联系最为紧密地对立的阶级位置。也如预期的那样，在我们所考察的六个国家之中，至少在雇员中，阶级分布的变化相对来说不大：扩大了工人阶级构成了所有这些国家中的雇员约3/4，而最有特权的中产阶级部分（扩大了的专家管理者位置）构成了雇员的约1/9。

### 意外的发现

在有关阶级结构的结果中，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意外发现。第一，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至少在美国，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正在减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减少正加速发生。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相对规模的下降完全归于劳动力部门构成中的变化（即拥有最小的工人比例的部门成为拥有最大工人比例的部门），到了20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规模在所有主要部门中都在下降。另一方面，专家和专家管理者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总的在扩大。第二，在美国还显示出，小资产阶级规模的长期和持续的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结束，而且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自我雇佣规模几乎得到了稳定的增长。类似的自我雇佣规模的增长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自我雇佣的劳动力的比例可能要比20年前扩大了50%。20世纪80年代，自我雇佣的这种扩展发生在多数经济部门中。此外，在1980年和1990年之间，由于部门的变化，出现了小雇主——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扩张，这表明自我雇佣的扩大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工资劳动的隐形问题。

## 理论重建

这些倾向表明，虽然工人阶级没有消失，但仍存在阶级位置扩张的明显证据，这些扩张了的阶级位置在各个方面——自主、权力和获得剩余价值，甚至获得资本——都处于相对“有利”情况。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化逐渐加深的论点受到了质疑。<sup>9</sup>

根据这些结果，有两个反思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转变的策略。第一个反应没有触动无产阶级化的基本理论，但却验明了对经验分析情况的错误说明。例如，这些倾向可能是特定民族—国家之中阶级结构变迁分析中受到限制的产物。人们很久就已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表明理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转变的适当分析单位应是世界而不是具体公司、国家甚至区域。例如，可能的情况是，美国的世界范围的公司中的工人阶级雇员的比例可能增加了，但工人阶级的雇佣已经转移到美国边界之外。这样，尽管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加速无产阶级化的特点，但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有这种特点。

第二个反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更为基本的要素提出了质疑。正如各类“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引人注目的新生产力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发展趋势。在这点上，各类专家和管理者的阶级位置的信息技术的含义尤其重要。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来讲，人口比例的减少是必要的，而且在仍受雇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人们中，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人口将占据负责、专业和自主的位置。这暗示了工人阶级和纯粹监督雇员规模的普遍下降，“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以及专家和真正

管理者的扩大。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时期而不是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永久重构。一旦这些新技术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适合地位，那么一个系统的降低技能水平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可能再度支配阶级分布中的变化。但这些新的生产力也可能稳定地产生出一个区别于早期工业技术的阶级结构。

### 17.3 个人生活和阶级结构

#### 传统理解

马克思主义从未建立起关于个人生活与阶级结构交叉方式的系统理论，因而不存在一套有关代际流动、友谊形成和家庭构成的阶级模式的强有力的期望。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没有从逻辑上排除两种阶级结构的可能性。这两种阶级结构既带有相似位置分布，又带有十分不同的跨位置的个人生活轨迹。

然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精神表明，在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应包含在特定阶级位置中。马克思主义特别对阶级边界渗透性提出了三个一般性命题：

1. 财产边界的相对不可渗透性。对立的物质利益和与阶级位置相关联的不同的生活经历形式应使跨越资本主义基本阶级分界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界线——的友谊、婚姻和流动相对不易发生。这些事件肯定应比跨越阶级结构的权力和技能维度的类似事件更普遍。在本书第二编所建立的术语中，阶级结构中财产边界应比技能或权力边界更不易渗透到流动、友谊和家庭中去的。

2. 权力边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的一个比较微弱的期望是权力边界渗透性应比技能边界渗透性小。就管理



权力所产生的阶级对立与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分裂的联系比与技能或专门知识的联系更为紧密而言，跨越权力边界要比跨越技能边界应成为亲密社会互动的更大障碍。

3. 资本主义社会渗透性变化。假定一个阶级边界不易渗透性的程度是基于围绕那个边界而产生的对立物质利益，那么一个阶级结构资本主义化程度越纯，其财产边界越不易渗透，既绝对又相对于其他阶级边界而言。

## 验 证

在第二编中我们有关阶级边界渗透性调查的核心结果与第一和第三个期望非常一致。特别是，财产边界通常要比权力或技能边界更不易渗透到代际流动、友谊形成和跨阶级婚姻中。同样，正如所预期的那样，特别对于代际流动而言，北美的财产边界通常比斯基的纳维亚国家的财产边界更不易渗透。美国与瑞典的比较尤其引人注目：瑞典的跨财产边界代际流动或友谊的机会相当于美国的2倍多。在资本主义最受限制因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使得行动者的物质利益的产生最大差异的地方，跨财产边界的代际流动和友谊纽带的障碍似乎也最大。

## 意外的发现

在我们的关于阶级边界渗透性的分析中，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非常恰当地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直觉。首先，尽管财产边界是我们所探讨的三个阶级边界中最不易渗透的，然而它几乎不能视为高度不可渗透性。大致说来，如果边界是完全可渗透的，那么可以预测，跨财产边界的流动、友谊和跨阶级婚姻的

发生率约为25%~30%。此外，在第四章对美国小资产阶级比较广泛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所有工人中一半以上都说他们有意有朝一日做自我雇佣者，而且超过60%的工人通过以前的职业、阶级出身、第二职业、配偶或亲密的个人友谊，与小资产阶级有某种类型的个人联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跨越财产边界的程度要比由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象所显示的程度要大。

第二，正如在关于对立阶级位置概念中的反常情况的讨论中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权力边界在所有四国中都证明是非常容易渗透到我们所探讨的所有三个社会过程中的。记得为了这些分析，我们尽量相对严格地界定了权力边界的渗透性——除流动分析外，它包含真正管理者(不只是监督者)与非管理雇员之间的联系。用了这个定义，对于许多结果来说，权力边界几乎不构成障碍。另外，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包含关于个人生活如何与工作中权力关系交叉的强有力预测，考虑到把生产中的支配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渗透程度至少与某些马克思主义命题相矛盾。

第三，跨阶级家庭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要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更为常见。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双收入家庭约1/3的家庭里丈夫和妻子处于不同的阶级位置。这在理论上特别重要，因为家庭是共有物质利益的消费单位。因此，跨阶级家庭的存在意味着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将是不同的。

### 理论重建

社会流动在当代社会中是一个稳定化的过程，这在社会学

中特别是在韦伯主义传统中是一个古老的命题。通常认为，一个严格约束个人生活的阶级结构最终要比一个具有相对高水平流动性的阶级结构更加脆弱。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大都被忽视。人们对跨阶级位置不平等的程度和对导致了不平等的剥削实践所倾注的关心，要多于对那些阶级结构中的个人生活组织方式的关心更多。

我们所探讨的阶级边界渗透性模式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结果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持久性可能不只是由于它为其人口中相当的比例提供了增长和富裕的能力，而且由于阶级结构中跨越明显的分界线的个人生活和相互作用程度。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次要的阶级分界线的渗透性来说——阶级边界是由权力和技能构成——但对于基本阶级分界线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的分析中没有一项是考察联系工人阶级与大资本家的更不用说“统治阶级”的生活事件可能性的。然而，工人与小雇主之间的个人联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稀有事件。

阶级边界的这种渗透性对阶级身份和行动者利益有潜在的重要影响。就身份是由个人生活经历轨迹所决定而言，跨阶级经历的相对频繁将有望使阶级身份变得模糊。更为重要的是，只要阶级边界在代际流动(一个我们没有探讨的问题)和家庭纽带方面具有可渗透性，阶级利益就将不再狭隘地局限于个人阶级位置上。阶级利益限制了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选择。这些选择因以下情况而显得十分不同：单个家庭包含处于不同阶级位置的成员，或者个人有理由期望他们将来的阶级位置可能不同于他们目前阶级位置。阶级分析需要结合这些有关生活与结构相互交织的事实。

## 17.4 阶级结构的影响：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 传统理解

意识的形式——至少那些与阶级有密切关系的意识方面——深深地受到阶级结构决定生活经历和物质利益的方式的影响。虽然政治和文化过程可能会影响到这种意识发展成为有条理的观念表达的程度以及这种意识与集体组织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程度，然而，阶级结构本身应该产生出阶级位置与行动者的主观性之间强烈的和系统的关系。虽然马克思主义没有把政治上有意识的、集体组织的阶级斗争预测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它的确预测出在个人主观性层次上，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形式之间应有一个系统的关系。

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的总体观点表明了五个有关我们正在探讨的经验问题的一般命题：

1. 生产点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阶级对人们的主观性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阶级位置所产生的生活标准（“消费领域”），而是通过在生产本身中所产生的经历和利益。因此，在直接阶级位置与间接阶级位置之间存在距离的情况下，直接阶级对阶级意识的影响应是更为有力的影响。

2. 两极化命题。在涉及阶级利益的意识方面，阶级结构应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观念上的两极分化。

3. 多方面剥削命题。在雇员中，工人阶级意识的程度应随着某人的位置呈单调变化。这个人的位置处在非财产拥有者阶级位置的二维矩阵中。即使人们不认同有关对立

阶级位置概念的所有细节，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会预测，一个阶级位置在技能或权力维度上越是无产阶级化，处于那个阶级位置上的人越可能有认同工人阶级的意识。

4. 宏观调和命题。虽然阶级位置在任何地方都应系统地与阶级意识性相连，但这种联系在微观层次上的程度将根据工人阶级形成的程度在各国有不同的表现。

5. 阶级形成命题。在两极化命题和多方面剥削命题中所主张的一般模式内，区分阶级形成之间的具体分界线将因一系列历史偶然过程，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政治传统而在国与国之间有所不同。

## 验 证

部分排除了有关生产点命题的一些结果之后(参见下文),在我们的各种分析之中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符合这些假设。尽管我们仅有关于相对较小资本家雇主的资料,但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三个国家中,资本家和工人对阶级问题的态度在观念上是两极分化的。在雇员中,工人和专家管理者也呈两极化,而非专家管理者和非管理专家的观念位置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中间。而且,正如宏观调和命题中所显示的那样,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各个方面间的微观层次的关系强度的确因国家不同而有别。特别是,这种关系在瑞典一直都非常强,那里的工人阶级的构成在政治上和观念上很强大。然而这种关系在美国则较为一般,而在日本则非常弱。最后,正如阶级形成命题所显示的那样,在那些一般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具体的意识形态联盟在我们考察的三个国家中是很不相同的。至少对于瑞典和美国来说,能够根据两国在历史轨迹和政治阶级斗

争的组织传统方面的分歧合理地解释这些差异。

### 意外的发现：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有关家庭阶级构成对阶级认同影响的研究结果与生产点命题部分地相矛盾。对于男性来说，这一命题在美国和瑞典得到证实：在阶级身份形成过程中，个人自身职业的阶级特征要比其所生活的家庭的阶级构成起着更加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对于女性来说，间接阶级位置(即通过她们的配偶的职业与阶级结构的联系)要比这种位置对男性来说重要得多。在瑞典，对于双收入家庭中的妻子来说，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对她们拥有一个工人阶级身份的可能性具有大致相同的影响；在美国，对于双收入家庭中的妻子来说，直接阶级位置在除了间接阶级位置影响几乎对阶级身份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至少在对双收入家庭中已婚女性阶级身份的研究中，阶级主观性的这个方面至少受到来自间接阶级位置和来自她们所在生产体系中的直接位置的相同影响，这与生产点命题相矛盾。

### 意外的发现：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虽然我们所观察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模式大致与命题2~5相符，但在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关系的强度中，跨国变化的程度要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直觉所显示的要大。特别是，日本的情况落在了可变范围之外，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会预测到。虽然在日本，阶级位置在统计学上是阶级意识的重要的预测器，但它却在日本的态度测量中解释了一个非常有限的量变(约5%)——在美国变化中大约一半可由阶级来解释，而

瑞典这一数字则小于 $1/3$ 。甚至当一系列其他与阶级相关的经历和条件加到方程中时，日本数据中可以被解释的变化与其他两国相比仍然非常小。

日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形成模式也与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预测不一致。虽然多方面剥削命题中所主张的阶级与阶级意识间的基本单向关系大致对日本有效，但沿权力维度的意识变化与美国或瑞典相比则非常小。很明显，在日本沿技能维度的分界线(特别在专家和技术雇员之间)对意识的影响要比沿管理权力维度的分界线对意识的影响的程度深得多。正如已观察到的那样，如果统治(以及由此的管理权力)比技术更紧密地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关系相联系，那么马克思主义通常会预测跨越技能和专门知识类别比跨越管理等级的层次在认同工人阶级意识方面的变化应不会更加激烈。瑞典和美国符合这一预测，而日本则不符合。

### 理论重建：直接的和间接的阶级位置

在对阶级身份的研究中，瑞典和美国已婚女性的结果表明，在形成阶级意识方面，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相比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阶级形成的性质。其中阶级经历被诱导并转换成为主观性。在瑞典，作为劳工运动和其在生产中力量结合的结果，“阶级”是在生产点本身点上共同形成的。在美国，阶级在生产点上是高度紊乱和分散的，作为一个集体类别，它的形成主要表现在消费领域，特别是在生活标准和居住邻里的特征方面。当政客们谈论“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时，他们的意思是“中等收入的税收减免”。这样，瑞典和美国阶级建构的场所之间的这个差异说明了两国在阶级身份形成中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因果特征

的差异。因此生产点命题没有错，它只是具体说明不充分。在阶级成为生产中集体组织这个意义上，生产本身中所产生的阶级经历和利益对阶级身份的影响要比消费领域中经历和利益对阶级身份的影响强烈得多；当阶级形成在生产中仍高度紊乱时，消费领域将在形成阶级主观性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sup>10</sup>

### 理论重建：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

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的主要结果来自日本。这些结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点不同。正如在其他情况中那样，日本令人意外的结果只是量度问题的产物，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在这项研究中所使用的调查工具是在一个一般的西欧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并经过检验的。虽然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在诸如美国和瑞典的国家之间在措辞问题的意思的可比性方面，还存在潜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尽力在选项与问题措辞中把这类问题减少到最小程度。日本的研究组不属于那个过程的一个部分，无论如何，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异可能会损坏任何产生真正可比性问题的尝试。因而，用一个更为合适的调查工具可能会证明，日本与美国和瑞典之间差异并不如此之大。

假定这些结果不只是反映了量度问题，那么这些结果与日本社会的传统形象是一致的。日本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对他们的公司具有较高层次的忠诚，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按照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意识的理解，这表明，阶级关系的具体组织环境对个人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之间微观联系的影响要大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通常所显示的那样。资本主义可能具有剥削和统治过程的全球性特征，但公



司能以显著弱化这些关系的主观影响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因而这些组织环境可能不仅影响到工人的阶级经历和阶级利益转变成集体行动的程度，而且影响到那些经历和利益被转变成身份和信念的方式。

## 17.5 阶级和其他压迫形式：阶级和性别

### 传统理解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关于阶级与其他压迫形式间关系的某种讨论，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才对这种关系给予了理论上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讨论传统上强调了两个有点矛盾的主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表述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破坏所有传统的和约定的压迫形式。而这些压迫形式充当了妨碍市场扩张的角色。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构成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而阻碍了完全商品化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发挥。马克思——与许多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一道——认为资本主义的长远趋势是消灭这些障碍。

另一方面，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市场对归因性压迫的破坏性影响，而强调种族和性别压迫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发生作用的方式，并且这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继续保留甚至得到强化。<sup>11</sup>这样，就提出了种种可能起作用的影响：种族主义分割了工人阶级因而保持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稳定；种族压迫促进了对特定工人类别的超级剥削；性别压迫通过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服务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性别压迫保证了社会生活的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严格分离，从而强化了消费者中心主义文化以及其他支持资本主义的观念形式。

这类功能主义解释不是必然暗示不存在任何对性别和种族压迫的自主因果机制,而且他们肯定没有从逻辑上暗示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进行斗争的最佳方式仅仅是与阶级压迫做斗争。特定形式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存在能由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有利的影响来在功能上进行解释,这些压迫形式的最终消灭可能需要直接对它们进行集中的斗争,而不管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功能如何,最终的消灭是可能实现的。<sup>12</sup>然而,这类论据的确暗示了对阶级的一个主要解释,而且表明无论种族和性别机制会具有什么自主性,其自主性都受到阶级体系中功能规则的限制。

更近期的讨论倾向于拒绝这类功能主义论点,更强调非阶级压迫形式的自主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仍在总体上期望阶级和非阶级压迫形式将倾向于相互强化。这就产生了有关阶级和其他压迫形式相互联系的两个一般命题:

1. 非阶级压迫转变为阶级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期望,明显受到非阶级机制压迫的社会群体倾向于特别受到阶级关系内的剥削。这不是因为非阶级压迫影响了群体获得对阶级来说重要的资源,就是因为非阶级关系本身中直接的歧视性机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可以预测,非阶级压迫将转变为阶级压迫,从而女性和种族上受压迫群体在工人阶级中应大量表现出来,而在大多数特权阶级位置中则应表现甚少。

2. 阶级压迫转变为非阶级压迫。“压迫”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虽然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可能是剥削性的,但资本主义关系所引发的不平等程度在各种资本主义制度中会很不相同。同样,种族和性别压迫也很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促使形成这种非阶级压迫强度变化的

因素之一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和利益。非阶级压迫将更加激烈以至于：一方面剥削阶级能够利用非阶级压迫促进他们的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能够阻止可能有效地挑起那些非阶级压迫形式的民众运动。这并没暗示非阶级压迫是由剥削阶级创造的。但它的确暗示了剥削阶级在使这类压迫永久化方面有着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有能力作用于这些利益。因此，关于非阶级压迫的阶级分析通常会预测，在任何给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资本主义中阶级关系越是富于压迫性和剥削性，那些其他压迫形式也将越倾向于具备更大的压迫性。<sup>13</sup>

## 验 证

我们对阶级和性别分布的各种探讨的结果大致与第一个命题的期望相符。特别是，在我们考察的每个国家中，女性劳动力普遍比男性劳动力更加无产阶级化。一般说来，大约50%~60%的女性劳动力处于工人阶级之中，相比之下男性则为35%~45%。同样，在我们的关于性别与权力分析中，在权力方面明显的性别不平等表现在我们所考察的所有国家中。在权力上的这种性别差距非常强烈，它存在于对权力的种种不同度量中以及存在于包括作为控制项的一系列广泛的个人、职业和公司特征的方程中。我们对种族和阶级的简要探讨也表明，黑人无产阶级化程度要比白人明显得多，并且女性黑人——受到种族和性别两种形式的压迫——在所有种族和性别类别中是最无产阶级化的。这些结果与这样一个总体期望相一致：即由非阶级压迫形式所导致的不平等将同样反映在阶级不平等上。

## 意外的发现

两个结果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和性别交互作用的一般期望不一致。在权力的性别差距中这些国家的排序结果也许更引人注目。阶级剥削强化非阶级压迫的命题会导致这样一个预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权力方面的性别差距应最小。无论怎样度量，美国的阶级不平等要比瑞典和挪威的大得多，然而美国在工作场所权力方面的性别差距要比那些社会民主国家的小得多。这些结果直接与性别的最大不平等存在于阶级最不平等的地方的第二个命题中的期望相对立。

有关家务工作的研究结果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期望不一致。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明确解释跨家庭劳动力性别的分工，但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会期望家庭的阶级构成至少对男性所做家务的数量有些影响，特别是在那些女性相对其丈夫处于更为有优势和有权力的阶级位置的双收入家庭中，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还会预测男性会在家中做更多的家务，尤其是在与男性相对其妻子处于更为有利的阶级位置的家庭。瑞典和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不管家庭的阶级构成怎样，丈夫几乎不做家务。

## 理论重建

关于权力和家务劳动的结果强化了标准的女权主义命题：性别关系完全独立于阶级关系。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一命题，但是在经验上阶级与性别不平等相互之间紧密关联的期望仍然存在。虽然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具体问题范围相当有限，

但它们显示出这两种压迫形式能完全相互独立地发生变化。

这并没有暗示为女性解放所做的斗争没有遇到现有阶级关系所导致的障碍。例如，对质优、价廉的儿童保育的要求可能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民主国家增加税收困难的约束；同工同酬可能受到要求资格证书——一个阶级关系技能 / 专家维度的重要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阻碍；完全排除性别的权力等级可能会遭到公司组织的竞争压迫力的破坏。然而，阶级和性别关系的独立变化的程度支持了这个总体主张：与阶级不平等进行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获得成功的机会要比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愿意承认的可能要大。

# 注 释

## 第一章

1.就像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那样，不用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阶级分析所暗含的决定论的程度问题上存在许多争论。有些人争辩道，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经济决定论者；另外一些人争辩道，他捍卫着一种以人的能动作用为依据的特殊形式的经济、阶级决定论。不论哪种情况，不管其分析是否是决定论的，阶级分析在马克思那儿是解释跨时代历史轨道原因的核心。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严肃的、解释理论的最精深和复杂的论说，见G.A.科恩(1978)。有关本书论点的一些重要的澄清和修正的内容，见科恩(1988)。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一般评论和它的重建的展望，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2)。

2.我是通过英国哲学家G.A.科恩1986年8月在英国电视上所做的演讲而得知里尔·阿贝纳的这些情节，并用它作为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3.考虑到那个特定的时代流行思想，艾尔·卡帕所暗示的西木对于性别统治的含义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西木对于工人的含义毕竟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讨论中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这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是十分熟悉的。而关于男性统治的女性主义评论，人们则不大熟悉。

4.在这里“物质利益”只是简单地表示人们以他们的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的利益，可理解为劳作、消费和闲暇的综合物。因而物质利益不是最大化消费本身的利益，而是在劳累、消费和闲暇之间的权衡中获得利益。我在这儿所讨论的物质利益还排除了纯粹的地位物品——这种物品的价值只严格存在于仅仅少数一些人对它们的喜好中。如果资本家的利益不只是简单地获得高的物质生活标准，而要比其他人有更高的生活标准的目的是拥有更高的地位，那么即使西木向人们提供任何想象得到的奢侈品，他们还要反对西木。我还要从“物质利益”中排除诸如为其自身目的而去统治的欲望这类东西。这种物质利益仅仅只是以某人自己的生活标准所衡量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见赖特(1989: 280~288)。

5.家庭主妇可被认为是一种在低于维持生活水平上提供“免费”物品的准西木(因为工人的家庭不能在没有家庭主妇的劳务的情况下而存在)。

6. 在由多哥帕湖居民和P.U.的经理所提供的对西木的影响的分析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多哥帕湖的居民宣称“但是有了西木,再没有一个人会再去工作了”,而经理宣称“再没有人需要努力工作了”。经理理解问题是对劳动成果的榨取——剥削——不仅仅是让人们“工作”。多哥帕湖人只说明了劳动市场上的效应,而经理说明的是劳动过程的效应。用社会学的话来说,就是多哥帕湖人提供了韦伯式的分析,而经理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7. 这些偏好序列还假设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具有同样的特征。如果存在着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或者技术工人,那么偏好序列将会复杂得多。比如说,高技术工人在没有西木的情况下从非技术工人所生产供应的廉价商品中获得的收益要比因有了西木而改善生活水准所得的收益要多。

8. 这并不意味着剥削程度是利润水平的惟一决定因素,或者说利润只是独自“产生”于剥削。所有的主张所要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是获利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9. 当然这并不表示,资本家作为个人没有支持西木以及类似西木的社会政策的热情。毕竟恩格斯就是一个富有的资本家和马克思及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但资本家支持西木或社会主义是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对立的。

10. 一个排除在生产性资源之外的例子是才能上的不平等分配,虽然它不是以强力为支撑,但它仍是剥削的基础。人们可能会把“强制的”排除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才能(因为没有才能的人被强制性禁止占有有才能的人来做他的奴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运行中,相关的排除根本上并不是靠强制来保证的。

11. “对劳动果实的占有”这种表述是指占有那些劳动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像劳动价值论所宣称的那样,这些产品的价值是完全由劳动努力决定的。在此全部的主张就是剩余被占有了——超过把所有的生产投入重新生产出来所需部分的剩余。——并且这些剩余是通过劳动努力而生产出来的,剩余的合适尺度是劳动时间。有关对劳动果实占有的这种理解方式的讨论,见科恩(1988: 209-238)。

12. 存在具备条件(1)和(2)但不具备(3)的情况。比如,有时在称为“纳贡的生产模式”中,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的国家机构通过税收(贡品)从农民那占有了剩余,而它丝毫不用直接和生产发生关系。这种情况中毫无疑问农民是被剥削了,但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却不是一个羽翼丰满的“阶级”,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力量不是由他们生产关系内的地位所决定的。也许,人们可以通过把国家精英直接占有农民产品看做农民被“排除”在生产性资源(因为剩余本身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之外的一种形式,而把条件(2)的含义扩展一点。但是所涉及的核心机制并不集中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上,而是国家对暴力的直接控制上,因此国家精英从标准意义上看不是一个“阶级”。

13. 这并不否认在一些特定情况中,殖民者从本土美洲人的知识中获得益处,而仅仅是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把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们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是

一个高代价且麻烦的过程。

14. 关于为把资本主义占有看做是剥削的观点提供了基础的激进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的富有洞见的讨论，见科恩(1988: 第11章)。

15. 回想一下“剩余”是社会产品(用物质或其他方式——如价值或价格——来衡量)减去产品中需要支付的(1)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成本和(2)生产中消耗掉的劳动力的生产成本的价值。生产中成本的第一部分较之于第二部分较少出现概念性的困难。

16. 只要他们不仅仅是剪息票者，资本家的消费也应排除在剩余之外。资本家也可能工作——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因而他们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应列为一种“生产的成本”。

17. 之所以赋予他们相同的遗传上的禀赋是要排除工人获得技能的所有障碍，这样，与人们之间的技能相联系的工资的不同仅仅只是获取和保持技能的真实成本不同的作用结果。如果某一技能的取得要求某种特殊的禀赋，而这些禀赋又是稀缺的，那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18. 用这种方式来定义“基本的生活需要”时，生产率的提高和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会把所有工人真实的工资水平提升到高于纯粹生物需要的程度。因此，非现实定义的“剩余”，在纯粹的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假定下，高于历史上获得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的成本的剩余。

19. 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中会出现相似的问题。在生产的一些投入是垄断产品的情况下，投入的经验价格将会高于这些投入处于完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的价格。这种价格含有的“垄断租金”也能成为讨论中的投入品卖方占有剩余的一种方式。因而在交换关系中的经验价格可构成资本家以及具有特权的那些工资收入者占有和分配剩余的一种机制。

20. 如果屋主以家庭劳务方式把空屋子售出，那么这时住房财产权有可能成为阶级关系的根据。但是，仅房屋所有权和无家可归这一事实本身不构成一种剥削的形式，因而也就不是一种阶级分类。只有当这种财产权转化为行动者之间占有劳动的权利对比关系时，它才是剥削的。

21. 就像罗蒙尔(1982)讨论的那样，一些小生产者通过市场上的不平等交换有可能成为被剥削者，甚至是剥削者。比如，一个使用高资本密集型生产资料进行工作的小生产者可能通过交换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果实。

22. 更精确点说，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在一个无生产者家庭(以共同消费单元来定义)中，至少有一些成员必须向雇主出卖劳动力。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这意味着男性的“争取面包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女性的“家庭主妇”呆在家里。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中，一般是家庭所有成年人都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23. 关于对阶级结构过分抽象的两极化概念的局限性的进一步讨论，见赖特(1989a: 271-278)。



24. 在细化阶级结构概念中存在的另一些问题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加以讨论。阶级结构中国家雇员的定位问题在第十五章中加以讨论。关于阶级定位的现代维度的问题,即一些工作是在跨越阶级界限的职业中组织进行的这个事实——将在第五章及第六章中加以讨论。

25. 这里的概念讨论和我早期的《阶级》(赖特, 1985)一书中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在许多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在那本书中我论证道,之所以把权力和技术认为是阶级结构的维度,其理论基础是对组织化了的资产(即权力)和技术资产的控制是区分割裂不同形式的根据。由于我在随后的论文(赖特 1989a: 第8章)中所详尽阐述的理由,这看起来不再是一种区分“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的满意的方法了。虽然在此出现的阐述和早期的分析策略缺乏对称,但是我相信它在概念上更具有说服力。

26. 在早期作品中我讨论到,由于经理占有了剩余,因此他们应被看做是剥削者。这种提法是经理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性活动也对剩余做出了贡献,因而他们的剩余收入就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占有他们在生产中做出贡献的一部分剩余的一种资格。因此,许多经理并不是“剥削者”,他们只是比其他雇员较少被剥削而已。由于这种模糊性,因此,最好只把经理看做是在剥削过程方面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他们能够以高工资的形式占有部分剩余。

27. 经理收入中这一租金成分已为“效率工资”理论所认识。这个理论认为市场出清的工资是低于以雇主目标这种观点来衡量的最优工资水平的。由于劳动合同实施中存在的困难,为了让雇员能依他们的意愿行事,雇主不得不向员工支付比竞争均衡理论所预计的更高的工资。虽然这种机制有可能导致让所有雇员都获得一些小金额的“雇佣租金”,但是这对于那些占据着要求负责、勤奋地执行任务的战略性工作岗位的雇员而言,尤其突出。主流经济学关于效率工资的讨论,见艾克罗夫和悦兰(1986)。有关把效率工资理论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的从工人那里“榨取”劳动努力的论说的讨论,见鲍尔斯和金蒂斯(1990)。

28. 如果个人取得证书不存在任何障碍,那证书就不构成一特别形式的技术供给的限制。存在多种这类障碍:培训项目的位置数量的限制;信用市场上获取贷款以获得这些培训的限制;“文化资本”(包括举止方式、口音、外貌等等)和“社会资本”(诸如获取网络和信息这些事情)分配的不平等;当然,还有遗传禀赋上的不平等。

29. 宣称这几类人不直接参加生产,足以简单明了地用于失业者、退休人员和孩子。但用于家庭主妇,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很明显家庭主妇在家里工作并生产出东西。这已引起一些理论家(如德尔菲, 1984)的辩论,认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应被看成是在家庭生产模式中进行的家庭劳动,在这种模式中家庭主妇占据着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位置——家庭工人。其他人也曾认为家庭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辅助部分。甚至还有辩论认为(弗雷埃德、雷斯尼克和沃尔夫, 1994)家庭生产是封建生产的一种特定形式,在这当中,这些家庭主妇被她们的丈夫以封建的方式剥削,

因为丈夫直接从他们妻子那“占有”使用价值。这些观点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试图把一个家庭中的性别和亲属关系看做仿佛是一种阶级关系。这种把阶级和性别混为一谈的做法既削弱了阶级也削弱了性别的解释的特殊性,并且我相信这不会提高我们的能力以解释我们正在讨论的过程。在任何情况中由于这本书的分析是限于领薪的劳动力中的人们,我们将不把这些问题作为重点对象。

30. 虽然他没有明白详尽地用剥削和经济压迫理论来阐述“底层阶级”这个词,但是这里所提出的定义与威廉·朱利士·威尔逊(1982, 1987)在他关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联系的分析中这个词的用法更具结构一致性。威尔逊辩论道,随着种族平等的法律障碍的消失以及在黑人当中阶级区别的增长,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主要的决定结构不再是种族本身,而是阶级。更为具体地说,他认为,城市底层阶级的人数有着实质增长,这些人没有可售的技术并且与劳动大军有着十分微弱的联系,住在正在瓦解的与美国的主流生活和制度相分离的中心城市里。

31. 把现代城市底层阶级排除在人力资本及其他工作资源之外与把本土美国人从土地上驱逐出去相提并论,这也许存在可争议的地方。后者,在为了获得讨论中的资源上有着零和特征,并为了执行这种排除,使用了大量强制,而在教育、技术甚至是好工作的情况中,所讨论的资源是一固定量并且通过强制不让一些人获得,这点并不明显。因而,在获取这些资源的实际的不平等事实上并非是那些以其他人的代价而使某一特定集团受惠的强制执行排除的情况。下层阶级的苦难仍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问题,但是它不能算作一类似于本土美国人遭遇的非剥削性压迫的例子。

32. 看到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元素在阶级分析中发生结合不应感到惊讶。毕竟,韦伯的阶级分析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遗产,它是他那个时代普遍的理性论述的一部分。尽管韦伯不断地使他自已远离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然而,特别是因为他具有他那个时代尤为明显的经济决定主义的倾向,所以当韦伯谈论阶级时所用的论调颇有点马克思主义的调子。

33. 有关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之间的比较的讨论,请见,诸如帕金(1979),博里斯(1987),吉登斯(1973),赖特(1979: 第1章)。

34. 关于“分层的”和“理性的”阶级概念之间的对比首先是由奥索斯基(1963)引入到社会学的。有关分层的阶级概念更为广泛的讨论见赖特(1979: 第1章)。

35. 为了简单起见,把这闲眼—消费选择线画成一直线关系。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直线的斜率便代表着一个线性工资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一方面由于延长这类事,另一方面由于非全日制工作的低于标准的工资的存在,这种关系将不是一线性关系。图中资本家阶级的曲线斜率被画成几乎和中产阶级的一样。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所有的资本家而不只是那些有着高度企业家创新才能的资本家,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先验地假定他们每小时的投入工资(即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是从劳动时间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他们的财产中生产的)将比中产阶级(技术雇员和经理)的高。不管何种情况,对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资本家曲线主要的一点是它不和X轴相交。

36. 在此所作的生产机会和剥削之间的概念区分的辩论是和约翰·罗尔蒙(1985)的辩论相对立的,他坚持认为剥削只能是严格地用来谈论人们所拥有的(资产)对人们取得的(收入)的影响的不公正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剥削的问题塞到生活机会的问题中,因而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之间的区别。对劳动努力的压榨这个概念从他对剥削的分析中消失了。

37. 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封建主义描写成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中,地主通过运用一般称作“经济外强制”的东西直接从农奴那占有有剩余。这种强制既可以采取强制农民用每周的部分时间在地主的土地上工作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强行征收农民生产的部分产品的形式。一种可供选择的特征是认为在封建主义中地主和农奴是农奴这一劳动力的共同所有者。这赋予地主对农奴劳动能力的财产权。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奴隶制,只是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奴隶丧失了对他或她自己劳动力的全部财产权。这种对农奴劳动力的共同所有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就是把农奴系在土地上并阻止农奴逃到城市中。这种逃跑只是偷窃的一种形式:逃跑的农奴,像逃跑的奴隶一样,从地主那偷走了财产,那么,使用经济外强制只是强制执行这些财产权的一种方式,这与使用经济外强制防止工人接管工厂并无两样。有关封建主义的这种理解方式的进一步的讨论,见赖特(1985: 77~78)。

38. 有关解释首位性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2)。

## 第二章

1.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把比较阶级分析项目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俄罗斯、韩国、中国台湾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因为一直到本书的大部分分析都完成了之后才获得它们的项目数据。其他4个国家——德国、芬兰、新西兰和丹麦——之所以被排除在本书分析之外,既是由于数据某些部分在可比性上存在各种问题,也是由于问卷的一些重要部分被遗漏了。关于最后一个国家——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出现在本书一个章节中(第十章)。我没有把澳大利亚列入目前这一章的理由是因为我无法确信数据在总的阶级分布方面的可靠性。尤为特别的是,澳大利亚样本中经理(不只是监督者,而且还有决策经理)的比例几乎是项目中任一其他国家的两倍。这一极高的经理密度与澳大利亚其他有限的调查数据不一致。因此,我没有把澳大利亚的数据放在这章关于一般阶级分布的讨论中。

2. 据劳伦斯·米歇尔和大卫·弗兰克(1991: 162)所言,1988年,根据收入分配而定义的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的47.8%是来自于资产的收入。对紧接着的4%的最富有的家庭而言,这数字降到23.2%。1989年,0.5%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每户的平均资产超过800万美元,紧接着的0.5%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每户的平均资产超过250万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严格以金融资产来定义的富有的资产阶级,

即个人生活实质上依靠资本性财产收入——也许不到人口的2%~3%。

3.有关日本的数字不仅是我们的研究样本的产物。根据日本政府官方统计,1986年,19%的劳动力是自己经营的(即雇主和小资产阶级的混合),相比较来说,其他任何国家这一比例不到13%。

4.日本和其他5国的对比,其精确度可能会受到日本样本的两个特征的影响。第一,日本的样本局限于东京及其近郊,因而把农业部门大量排除在外。由于自我雇佣程度一般在农业部门中比在其他经济部门中要高得多,这表明日本小资产阶级的整体规模要比我们估计的稍高些。据日本劳动官方统计,日本农业部门的自我雇佣比例是93.5%,占全国雇佣劳动力的8.3%。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对非农业部门里自我雇佣比例的估计(31%),这将使日本整个自我雇佣比例上升到36.5%。第二,由于未加解释的原因,在日本的调查中国家雇员的样本不足。据官方调查数据(劳动统计年鉴,1986),1986年超过9%的日本劳动力为国家雇佣,而在日本的样本中这个数字只有4.9%。由于自我雇佣全都出现在私有部门,这个样本偏见将对日本和其他国家间小资产阶级规模的不同产生夸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样本中缺乏农业部门和对国有部门雇员的低估——也许或多或少相互抵消了些。如图2.1所示,即使在私人非农部门中,在样本中小资产阶级比例也比其他国家高二到三倍。

5.还值得强调的是,在加拿大,农业中的自我雇佣者绝大多数是小生产者。这与美国相比差别特别显著:在美国,农业自雇者中的60%是小雇主,而加拿大只有7%。

6.在对瑞典和美国进行的部门构成对阶级结构差异的影响的正式检验中发现,大部分差异源于部门内两国阶级分布上的差异,而不是部门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同。见赖特(1985: 213-216)。

7.在戈登(1994)的报告中,美国和瑞典在“从事经营管理任务的职业”的百分比上的差别要大得多。根据他的估计,经理或管理者与办公室人员、服务业人员和生产工人的比率,美国要比瑞典多5倍。然而戈登是严格以职业分类的方式而不是以直接衡量所行使的权力这种方式来界定他的分类的。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许多权力中的差异是在那些正式命名为“经理”的工作之外产生的。第二,许多工作从职业内容方面看是很不同的。比如,该怎样从职业这个角度看待一个是管理者当中的一员的工程师?在美国,在对工作进行职业分类时,一般是管理功能这个特征优先于其他的职业特征,然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专业和技术功能优先于管理功能。

8.这种估计使用了第三章中所描述的变化分担分解技术。关于瑞典和美国之间阶级结构差别的这些分解的完整描述,见赖特(1985: 217)。

9.“经理”这个词既用来指一种职业,也用来指在权力等级制度中的权力关系中的一种结构地位。在此我们指的是那些身居经理类职位并执行管理或监督权力的雇员的百分比。即便是在美国,也有将近15%的人,他们的职业被算作“经理”但看来却不具有任何监督权和决策权。

10. 关于这种妥协的逻辑和其稳定性条件的进一步探讨, 见普热沃斯基(1985)。

11. 这种解释与戈登(1994)在他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间差异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他称之为“监督密度”的东西非常相似。根据有关工作保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收入保障的国家监督水平的回归方程, 戈登(1994: 379)总结道: “工人有相对较高的收入和工作安全以及相对协调的讨价还价能力的经济很少依赖于把监督作为促进劳动努力的机制。”

12. 关于受访者配偶的阶级的数据所包含的有关权力方面的信息要少得多, 因此我们无法对这些配偶作有关经理和监督者间的区分。在操作家庭—阶级分类时所采用的把经理—监督者这一混合类别从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们当中区分出来的标准, 要比操作在个人的工作—阶级分类时所用的标准要弱些。为了使个人的工作—阶级分布和家庭—阶级分布具有操作可比性, 在表2.3中我们对工作—阶级和家庭—阶级操作采用了同样的标准。

13. 在家庭—阶级框架中, 男子和妇女间在阶级分布上的所有差别都来自于未婚者在阶级分布上的两性间的差别。

14. 如果把不挣工资的工人作为“自我雇佣者”来处理, 那么日本劳务省的数据证实了下面的事实, 即在日本妇女自我雇佣率比男子高(31.7%比20.4%)。如果我们把自我雇佣者类别局限于那些法律上界定为自我雇佣的人, 那么在官方统计里男子的比例是17.7%, 而妇女的比例是12.3%。

15. 还应注意的是, 日本小规模样本可能意味着关于日本女资本家的这个数字仅仅只是取样波动的结果。

16.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就是这些结果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在获取特权阶级位置方面种族和性别差异之间的对比, 因为许多白人妇女可能通过她们的丈夫间接获得特权阶级位置(她们的直接阶级位置不是一相对的特权阶级, 但是她们的“间接”阶级位置可以是一相对特权阶级)。

17. 在OECD的报告中, 没有用来表明每一个国家是如何看待合作经营的自我雇佣者这个问题的文件。在日本的情况中, 日本劳务省的数字(它排除了合作经营这种情况)是和OECD的数字一致的, 因而表明OECD的数字也排除了日本的合作的自我雇佣者。然而, 这可能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情形。

18. 当然把文化上的意思转化成正式等价的项目上存在的问题并非国家之间调查研究所独有。一特定国家的不同阶级中的人们, 他们教育程度和个人经历不同, 他们对特定问题的理解也是方式不一的。即使通过最严格的事先检验也不可能消除哪怕是普通意义上的不同类别的受访者间这种理解的潜在差异。

19.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1991年的调查回答)确实使用了国际劳动组织的国际职业编码目录(ISCO编码), 但是即使使用了统一的编码分类仍难以确保那些把问卷中国家特殊的职业头衔和种类转化为这些共同类别的实践是有着严格的可比性的。比如, 在英国, 当一工作种类既含有专门人才的内容(如工程师)又含有管理的内容(如

管理着工程部门的经理)时,习惯是运用专门职业的编码,而在美国习惯上好像是用一种合适的经理类编码,这时便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情况。

### 第三章

1.并非所有这些讨论都明确谈论“阶级结构”。于是我便把一些谈论职业结构或相关类别的讨论转译成阶级分析这个术语。

2.这里所说的过程与基塔格娃(1995)把变化率分解为不同成分的探讨十分相似。关于这个探讨的其他运用见布朗宁和辛格尔曼(1975),格南纳瑟卡伦(1966),胡夫(1967),帕尔默和米勒(1949),佩洛夫等(1960)。有关使用数字例子的这个方法的展示见赖特和辛格尔曼(1982: 202-205)。

3.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分析不涉及一定时间中的工作、工资、安全等方面的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考察“相对剩余人口”或“底层阶级”——那些不属于有酬劳动力的人——的问题。虽然这两组问题都与阶级结构转变有密切联系,但是由于数据所限,它们不属于本章数据分析的范围。

4.由于四舍五入,这个变化率并不完全与从表3.3分布中测得的比率相一致。

5.对小资产阶级和雇主这两个类别,这些结果并不像预测的那样,但是对这两个阶级位置的预测在马克思主义和后工业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争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后工业理论的理论中它们更少成为理论关注的中心。

6.表3.4的部门和阶级变化是建立在完整的1970~1990年38个部门的变量以及1960~1970年的37个部门的变量基础上的。这些具体部门便汇聚在这6个标题之下。

7.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衡量方法中无论哪种歪曲,它都是对简单地使用职业头衔本身作为界定“阶级”的根据的一个改进,因为这样一个程序完全忽略了职业内部的阶级不同质的问题。

### 第四章

1.一个不完全的例外是约翰·戈德西尔帕关于分层和社会流动性的著作(戈德西尔帕,1980;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93)。戈德西尔帕在他以职业基础的阶级等制中为把几类自我雇佣从挣工资劳动者中区分出来作了一番论证。然而,他把某些有特权的雇员——高级专门人才和经理——与大财产拥有者混起来了,一起归为单一的阶级。

2.近期有关自我雇佣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下面这些:

鲍德罗特、埃斯塔博雷特和梅勒摩特(1974)；比彻霍费尔和艾略特(1978, 1981, 1985), 贝克尔(1984)；伯杰(1981)；本简霍德(1985)；布雷格尔(1963)；柯勒和伯洛斯(1986)；戴尔(1986)；戴利(1982)；费恩(1980)；林德(1983)；梅耶(1977)；雷(1975)；范·里格摩特(1981)；威斯(1984)。另外，还有一些涉及一般自我雇佣的关于美国 and 欧洲的历史方面的研究(如，不是专注于某些特殊职业)：克罗斯克(1978)，加格尔(1932)；吉雷特利(1974)；豪帕特(1985)；菲利普斯(1962)；沃科夫(1978)；温克勒(1972)。

3. 维持生计的生产这个概念不局限于生产者直接消费他(她)的产品这些情况，而且包括这种产品不经过交换媒介而由生产者的家庭或社团来消费的情况。为其家庭准备一顿晚餐是维持生计生产的一个例子。

4. 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是否应把简单商品生产看做一个概念上等价于马克思生产模式分类中的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恰当“模式”方面存有争议。我将使用较少技术性的表述“生产形式”来避开这个问题。

5. 的确像约翰·罗蒙尔(1982: 第二章)曾指出的那样，许多小资产者经过市场上的不平等交换，甚至受资本家剥削。

6. 在本章，当我想指的是那种不雇佣挣工资的劳动者的自我雇佣者时，我将使用“纯粹的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而没有修饰语的表达就包括小雇主。

7. 经常有人提出关于失业和自我雇佣率之间关系的论断，但却几乎没有人从经验上进行检验。雷(1975)证明美国战后失业和自我雇佣之间是一种反周期的关系。斯坦梅特兹(1983: 46, 85)曾在有关法国19世纪80年代间经济危机的研究中证明失业是伴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增多和大的制造业和商业机构数目的减少而出现的。这表现反周期的自我雇佣反应的确是失业的宏观层面上的反应。

8. 所有的时间序列模型都涉及归纳的最小二乘回归。回归运用最大概率的Rho估计法来对自相关误差进行矫正。用来估计Rho的方法是由比曲和麦金农(1978)开发的并且可以从TSP(时间序列分析软件)软件中获得。

9. 在取平方时用 $t-20$ 而不是 $t$ 的原因是，在模型2中减去这个常数会使得 $t$ 值最大。这反映出图4.1的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最低值。当然，从 $t$ 中减去一个常数并不影响模型(1)中时间的系数或模型(2)中时间二次项系数。

10. 结果见斯坦梅特兹和赖特(1989: 1011~1013)。

11. 表4.6方式惟一不严格成立的分析是对农业自我雇佣的分析，比起其他非农部门，看来农业的失业效应要小得多，而且在统计上失业和时间相互作用项也不明显(见斯坦梅特兹和赖特1989: 1013)。这可能反映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农业自我雇佣的创始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成为失业者转变为自我雇佣的农场主这种失业反应的明显障碍。

12. 就像在第三章那样，所有的变化分担分析都是在就业劳动力而不是全部劳动力的分布上进行的，因为要界定失业部分劳动力的部门分布存在一定疑难。

13.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表4.8中的结果和前一章表3.4中的结果之间有一差别。在第三章,我们把小资产阶级和小雇主区分开了;本章把这两个阶级位置合并到更广的“自我雇佣”这一类别中了。因此,表4.8的结果是表3.4这两类结果的加权平均。于是,20世纪80年代,小资产阶级有一个正的阶级变化成分4.58,而小雇主有一负的阶级变化成分-8.17。把这两个阶级位置合并成一个自我雇佣类别时,便得出了表4.8中负的阶级变化-0.94。

14. 应该注意的是,表4.9中的部门变化是根据32部门分类法而不是更大的6部门分类测算出的。然后把更分散的变化分担测算值汇集成这6大类别。

15. 这种重新划分的缺点包括免除了雇主交纳大部分利益和社会安全税的义务。

16. 对本章分析中的数据和更详细得多的讨论见斯坦梅特兹和赖特(1989)。

17. 许多小企业和农场经营方式是一种“家庭”企业的经营方式。在这类情况中,没有多少理由把家庭的一个成员——典型的是丈夫——说成是“自我雇佣者”,而把其他人——典型的是妻子和成年的孩子——说成是“无酬家庭工人”。虽然这些标识反映了文化传统和两性关系,但是这两类人的阶级位置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当我用“自我雇佣者”或“小资产阶级”时,除非明确声明,它是包括无酬家庭工人在内的。当我要指的是除无酬家庭工人之外的自我雇佣者时,我使用“正式的自我雇佣者”这种表达。

18. 自我雇佣者合作的一些优点见阿尔斯顿(1978)的讨论。

19. 这些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出版的《每月劳动评论》中的文章(贝克尔,1984;费恩1980;雷,1975)。

20. 这个调整过程的详细讨论,见赖特和马丁(1989)。

21. 詹金斯(1985: 63)。1910年的统计资料首次根据社会阶级结构对职业进行区分(康克,1979: 25)。

22. 玛戈·康克是一个历史学家,曾写过大量有关统计局方面的文章,在一次私人交流中表示有可能发生过这种误划。

23. 1950年的数据是根据P10-13-BRWT的权重经过了加权的;1940年的数据没有经过加权,因为只用了那些来自自我加权样本中的人。

## 第五章

1. 有关阶级对兴趣、经历和能力的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赖特(1989a: 278-295)。这个问题在本文第十三章中也将得到讨论。

2. “边界”这个词用在国家边界中既有字面意义也有比喻意义,因为边界通过公民法律得到合法实施,代表民族国家的地域疆界。一般来说,“边界”可以视为社会结构内的位置——个体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之间定性分界线。



3.如果我们能够对第二章中讨论的所有12个阶级位置进行操作,位置的渗透性将由66个边界跨越事件构成。

4.哈拉比和威克里姆(1993)主张,阶级分析项目中所使用的阶级结构概念应分解为三个“原始的”维度,并且理论格式塔式的阶级“结构”不会使我们获得任何东西。对哈拉比和威克里姆的论点的批判,参见赖特(1993)。

5.在我们的样本里,不超过4%的雇主和小资产者是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医生、牙医、律师、会计师)。

6.为了查看这个决定是否在友谊纽带案例中威胁到我们分析的力度,我们把这四个国家的数据融合到一个单独的矩阵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专业知识维度上对雇主和小资产者做出完全的区分。这种区分并没有改善这些模型的拟合优度,因而我们有理由对把这些类别作为非专家对待而不会严重伤害我们的结论这一点是有信心的。

7.创建与工人变量并列的其他特定阶级的相互作用项是可能的。例如,人们可以创建一个资本家变量,这个变量能够区分资本家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所有渗透性事件。然而,由于所需自由的程度,不可能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涵括三个附加的边界渗透性项,工人相互作用项以及其他特定阶级相互作用项。既然工人相互作用是特定理论兴趣所在,那么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将只考察工人相互作用。

8.如果所有阶级内事件同等可能,那么我们本可以创造一个简单变量,这个变量在对角线上的所有单元里的值为1,否则为0。然而以前有关职业流动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不很合理的假设(霍林谢德,1949;劳曼,1966;维布鲁格,1977)。

9.这个问题在关于友谊的章节里将得到更加详细的讨论。

10.在模型(2)中,QI矩阵的设计与其他模型相比稍有差异,因为模型(2)里的准自变量,使得对工人变量里的所有6个系数做出估量成为不可能。这种估计从数学意义上讲这样一个变量是多余的,因为在准独立矩阵中它是其他工人系数和工人对角线单元的一个线性结合。由于我们对工人|工人对角线单元系数没有特别的兴趣,而且由于我们想让模型(2)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位置之间的每个边界都有一个明确的系数,所以,我们在模型(2)里面使用了一个修正过的准独立变量。在这个模型中,工人|工人对角线单元(图5.2中原始QI变量的第7类)被指定的值为0,从而被并入所有非对角线单元。这对模型(2)的拟合优度以及对此模型中附加项的值并无影响。它对工人变量系数的相对大小也没有影响,从而对工人阶级与其他阶层位置之间边界渗透性排列也没有影响,但是它的确能使得对系数的讨论更加直接。

11.这是从初等对数数学中得出来,即比值的对数等于分子的对数与分母的对数之差: $\text{Log}(X/Y)=\text{Log}X-\text{log}Y$ 。在我们所讨论的事例中,令 $X$ ="财产=1"的矩阵单元中的事件的频数; $Y$ ="财产=0"的矩阵单元中事件的频数。 $N$ =矩阵中事例的总数。因此,处在财产=1的单元中概率是 $X/N$ ,而不在此单元中的概率为 $1-X/N$ 或等于 $Y/N$ 。这样,处在财产=1的单元中的机会是 $(X/N) \div (Y/N)=X/Y$ 。这不过是对数线

性模中财产变量系数的反对数。

## 第六章

1.公平对待与公平分享之间的比较,作为表示规范性问题特征的一种方法,源自于赖恩(1981)。这类问题是关于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

2.记得第五章讨论过将技能边界渗透性定义为一个把专业职业人员与非技术职业人员(不只是非专业职业人员)联系起来的事件,而将财产边界渗透性定义为联结雇主和雇员(不仅仅是自我雇佣者和雇员)的一个事件。这样,技能边界和财产边界以一个相对约束的方式得以界定。

3.据此,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布迪厄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这些方式把争论集中于这样一个经验性问题,即核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在建构这些社会的全部阶级结构中是如何保留下来的。

4.作为特例,参见蔡斯(1975),丹顿和费舍曼(1983),戈德西尔帕和佩恩(1986),马歇尔(1988,第四章)等;波托卡雷罗(1983a, 1983b),鲁斯(1985,第四章),蒂锐和特里斯(1974)在大多数这类研究中,对数线性模型用于检测有关男性和女性流动中总体相似性和差异的假设,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模型中的特定系数(作为一个特例,参见海斯[1990])。对塑造女性的相对的流动模式关注的缺乏,能通过以下事实显示出来,即在一个关于女性流动的专题著作(阿博特和莱恩,1990a)中没有一个参与者承担这个工作。这部分反映出研究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流动模式的一个实质上的偏好(阿博特和莱恩,1990b,22)。

5.只要体力劳动/非体力劳动划分被认为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虚假”流动这一特殊问题仍会发生,这一观点在戈德西尔帕的早期著作中就已出现(例如,戈德西尔帕和波托卡·雷罗,1979)。在我们的阶级分类中,所有处于半技术和非技术蓝或白领职业中的非监督工作岗位的个人都被视为工人阶级,因此从蓝领出身到办事员归属的移动将不视为“流动”。当时,戈德西尔帕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与阶级项目的叙述中(例如,戈德西尔帕和佩恩,1986)争辩说,非监督性的和非技术白领工作可能会更加精确地被视为工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6.“个人—阶级”位置被定义为有酬劳动力中妇女的职业的阶级,或者是我们所使用的她的直接阶级位置。“家庭—阶级”位置是根据已婚妇女的职业阶级(即她的相关的阶级位置)和未婚妇女或者丈夫在劳动力之外的已婚妇女自己的职业来界定的。

7.这一节和6.4节是马克·韦斯特恩为以前发表的论文而写的(韦斯特恩和赖特,1994),本章就是以那篇论文为基础的。

8.我们把这一讨论限定在分析出身与归属之间的联系的经验性工作上。这种

联系发现于一个代际流动矩阵中。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没有间接关联。

9. 尽管核心模型中的“等级制度”或“社会距离”参数引出了垂直流动的某个观念,但作为虚拟变量,它们不会使任何有关阶级间度量间距的信息具体化。在局部组织中,垂直流动可当做阶级间“层次”数量的非连续(即渐近)函数,而不是类别间度量距离的连续函数(霍特和霍瑟,1991)。

10. 霍特和霍瑟(1991)认为,戈德西尔帕的阶级类别在关于职业声望、教育和收入水平方面具有内在异质性,而且埃里克逊和戈德西尔帕(1987a, 1987b, 1993)所依据的综合分类排除了显示不同的流动率的类别,因而产生出易引起误解的关系模式。当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被迫把我们的一些类别放进更具有差异性的类别,因而对我们的经验分析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反驳。然而,我们的理论模型试图保留类别之中高度的概念同质性,在实施资料分析过程中,我们还尽可能地试图维持其间的差异。

11. 韦斯特恩和赖特(1994: 626~627)的著作附录中展示出了对数线性分析所根据的出身—归属流动表格的初始频数。

12. 当国家—工人相互影响被加入模型(4)时,拟合优度也没有明显改进。

13. 北美名义变量没有主要影响,因为它完全被附加的国家项所解释。我们没有把一个权力—NA(北美名义变量)项包括在内,因为权力系数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一样。

14. 这里使用了双尾检验,是因为我们一直考虑着两个有关专家知识和财产边界排序的可供选择的假设(马克思主义假设和文化资本主义假设)。如我们根据排除了农民的检验,意味着证实以前的结果来对这些模型进行单尾检验,那么显著水平当然是 $P < 0.03$ 。不管怎样,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显著水平0.05与0.06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

15. 关于婚姻市场和流动的讨论参见蔡斯(1975);戈德西尔帕和佩恩(1986),蒂锐和特里斯(1974)。

16. 对于女性直接阶级来说,跨国财产系数中同样存在某种差异(美国明显为负数,其他则不是),但跨国差异本身并不显著,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用女性的家庭阶级位置代替已婚女性的直接阶级时,它都不存在了。

## 第七章

1. 在关于样本规模的不同具体说明下系数稍有不同,因为数据所报告的朋友的平均数量因国家不同而有些差异。这意味着在产生系数方面不同国家资料的相对权重在这两种分析中将稍有不同。

2. 参见本章方法附录在分析友谊纽带中对样本规模问题的讨论。

3. 这一点也适用于这样一个观点，即“阶级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其影响不能被还原为组成其维度的独立的累加影响。

4. 可以争论的是工人|小资产者边界的相对渗透性在历史上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平民主义，这常常包含着工人与小资产所有者之间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盟，例如美国19世纪晚期的情况。

5. 如果我们从模型(4)中删去 $QI \times C$ 项而且把它直接与模型(1)作比较，那么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没有任何改进。然而，模型(3)本身对模型(1)在适度方面是一个明显的改进，这表明存在着明显的 $QI \times C$ 相互作用。虽然阶级边界渗透性在国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可阶级内友谊的可能性在国家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

6. 考虑到国家内分析的目的是检验早期的结果是否在一个国家内被证实，单尾检验，虽然有争议，但是适当的。

7. 对于估测多因果过程中不同原因的相对偶然潜能这一问题的一般哲学讨论，参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2)。

8. 在对有10个以上雇员的雇主的独立分析中(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发现这些雇主与雇员交上朋友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有较少雇员的雇主。

9. 此外，在他们自己的分析脉络中，霍兰德和雷哈特认为：“如果男孩女孩都超过了允许的选择，那么儿童群体中像性别分裂之类的总结构特性将不会受固定选择误差的影响……”(第103页)。我们的阶级边界渗透性分析与其说类似于对社会测量项的精致分析，还不如说类似于如性别分裂那样的结构特性分析。

10. 如果把问卷限定在3个最密切的朋友上，那么友谊中的非相互性尤其可能。设想如下假设情境：

① 所有管理者都有6个朋友，其中3个他们认为是真正亲密的友谊，而另3个则次之。

② 所有工人也有6个朋友，其中有3个他们认为是真正亲密的友谊，而另3个则次之。

③ 管理者和工人所指的3个最亲密的朋友都是管理者。在这一构造中，数据将存在极端不对称的，因为工人受访者将报告说他们的朋友中100%是管理者，而管理者受访者将报告说他们的朋友中没有工人。

## 第八章

1. 与本章所报告的最接近的一项研究是霍特(1982)对于双收入家庭之中丈夫与妻子的职业地位关系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严格说来关注的是职业地位而不是阶级。近期有些关于跨阶级家庭方面的文献，但这些研究大多数只是记录了丈夫与妻子处

在不同阶级职业中的家庭的比例，还没有人对家庭的阶级成分做精细的模型。这个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参见麦克雷(1986)。

2. 非双收入家庭包括由单一成人管理的家庭、无劳动力家庭以及单一劳动力家庭。

3. 在系数模式中跨国名义差异的惟一情况是，在美国技能和权力系数没有明显差别，而在其他三国则有差别。然而美国与其他三国的这种差别本身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4. 由于样本的不同，直接比较跨越三种现象的这些系数规模是有问题的。对于流动性来说，样本只限于男性；对于婚姻，样本限定在双收入家庭中男性和女性；而对于友谊来说，样本包括劳动力中所有成年男女。

5. 这一程序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能利用这程序对对角线单元做出估计——管理者妻子/管理者丈夫单元以及监督者妻子/监督者丈夫单元。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仅仅假定在综合的管理者—监督者配偶类别之中管理者与监督者的受访者的比率，与处于独立的监督者和管理者类别的比率是一样的。

## 第九章

1. 认为在一个多原因系统中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更重要”的看法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意思，很难讲清楚。欲了解关于因果第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3：第七章)。

2.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种功能主义的解释中并不表示上层建筑是“副现象的”——仅仅反映了本身没有任何结果的基础。说X在功能上阐释了Y也就是说Y对X有重要影响。如果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确能从功能上解释国家形式，那么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对再现阶级结构有重要影响。如果国家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没有什么功能主义阐释了。

3. 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强烈黑格尔传统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确实试图解释一切现象。例如谢尔顿和艾格尔(1993：36)写道：“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阶级的理论，也是包括女人在内一切事物的理论。”虽然我不认为对如此全权理论项目的抱负有应该遭到完全排斥，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实现这一雄心过程中并不成功，而这样做的前景也不那么有希望。

4. 与“限定性”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照的是“包含性”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上层建筑就是基础以外的其他一切东西。科恩证明包含性历史唯物主义十分不可信。可能没有真正严肃系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曾在事实上坚持这个观点。

5. 这些讨论没必要使用明确的功能阐释语言。例如，加德纳(1975：52)讨论家务劳动时用的是它所起的“变化但基本的作用”。她提出：“为什么家务劳动得以维

持?”她的回答是：“资本主义通过工人们依靠工资系统而从封建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资本主义并未通过商品生产完全满足工人的所有消费要求，而使家务劳动的保持承担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维持的重要作用。”以上这段话说明对维持无偿家务劳动（以及与这种劳动相联系的性别关系）的解释要从资本主义劳动力本身所起的作用中去找。这种情况下，“作用”一词包含着功能主义的解释。

6.关于从历史唯物主义到社会学唯物主义转变的讨论，见赖特、列威思和索博(1992：第五章)。

7.如果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奴隶，那么这就是真的，而在加达·勒那所引用的历史事例中似乎并无这种情况。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87)的画《一个女仆的故事》所反映的那个极糟的社会就类似于阶级性别合为单一关系的社会。

8.关于家庭工资的解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见巴雷特，1984；哈特曼，1979；汉弗里斯，1977；刘易斯，1985)。布雷内尔和雷梅斯认为家庭工资符合了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利益，与她们的观点相对应，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庭工资应首先被视为男人对女人的胜利，反映了男人使女人留在她们的位置上的策略性利益。只要是男性的性别利益形成了对家庭工资斗争的基础，那么这也就是性别关系影响阶级结构方式的又一例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旦家庭工资作为具体阶级关系的特征而得到确定，它就会成为限制性别关系转换的重要物质条件。

9.把互补的因果关系概念化也是可能的：阶级作为一种把人们分类于“性别地位”的机制。一开始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古怪的主张，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性别类别是两分的，两极分化的，并且与性分类——男性和女性——是同型的。这种印象反映了大多数人(包括多数社会学家)把性别分类跟性分类混为一谈的趋势，尽管他们正式承认性别是一个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类别。然而，一旦我们从性别关系的生物性特点中脱离开来，那么显然男性和女性会有许多不同的性别位置，而且，阶级会影响人们在这些关系中最终占据的位置。

## 第十章

1.有些女权主义者反对把全职家庭主妇的阶级位置同她们丈夫的阶级等同。这些批评认为，家庭中支配的社会关系也应被视为一种“阶级关系”。这些批评者的基本依据之一是把家庭内的生产看成一种不同的生产模式，有时也可称为“家庭内生产模式”。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生产模式由支配和从属的性别关系来系统地建构的。因此，在家庭生产模式中，家庭劳动力(家庭主妇)相对于非劳动力(男性“一家之长”)，处于被剥削和被支配的阶级位置。这就有效地把家庭主妇置于跟她们的丈夫不同的阶级之中。这样，一个工人阶级丈夫的妻子就不处于工人阶级本身之中，而是处于可称之为“无产阶级家庭劳动阶级”之中。见克里斯汀·德尔夫

(1984: 38-39)是这种观点最著名的辩护者之一。

2. 这一观点支持了韦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关于赚钱过程的概念化无论是被认为是简单的市场竞争结果还是被认为是剥削的结果,收入都是赚来的钱。在戈德西尔帕看来,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来自于生产的家庭收入为这笔收入的全家消费者带来共同的利益。

3. 安妮米特·索伦森和萨拉·麦克兰纳罕(1987)引用了一些研究,表明家庭经常并不把成员的收入集中起来:爱德华(1982)、泰勒-古拜(1985)和帕尔(1983)。也可见阿玛泰·森(1984),她提供的数据表明当家庭处于贫困时,食物分配中常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又说明家庭不应被视为无差别物质利益的同质的单位。

4. 关于离婚对妇女收入的影响的讨论。参见邓肯和霍夫曼(1985),以及麦克兰纳罕,索伦森和沃森(1986)。邓肯和霍夫曼估计,一般的离婚会造成妻子实际收入下降30%,而丈夫的收入实际上毫无变化。

5. 支持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决定了她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观点的研究包括胡德(1983)、布卢姆斯汀和施瓦兹(1984)、卡弗曼(1985)、索伦森和麦克兰纳罕(1987)。在第十一章中有关家务劳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瑞典,妻子的工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预示了丈夫做家务劳动的程度,而在美国则不是这样。

6. 科斯特洛(1991)在她对保险业雇员中工会动员工的分析文章里引用了一些这类例子。家庭里阶级形成的这些差异确实是这些家庭里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同确实存在,并对理解她所研究的处于困境的动员来说是很重要的。

7. 在统计这些数据时,美国和瑞典调查问题措词稍有不同。在美国,受访者被要求估计他们配偶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对瑞典的受访者则要求回答,他们配偶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否“低于25%”、“大约25%”,“大约50%”、“大约75%”、“还是高于75%”。美国人对妻子收入的估计接近于安妮米特·索伦森和萨拉·麦克兰纳罕(1987)所报告的数字。据她们估计,1980年,22%双收入白人夫妇和33%双收入非白人夫妇中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0%或更多。需要注意的是,这代表了从1950年以来在双收入家庭中里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下降。1950年,在36%白人夫妇和35%非白人夫妇中,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0%或更多。因此,虽然已婚妇女中参加工作的人数的确大规模上升了,并且对家庭收入不做任何贡献的妻子越来越少(从1950年68%下降到1980年30%),然而在美国,处于劳动力之中的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实际上却增加了。

8. 把人与资源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这种提法,意味着这种关系同时把人与其他人相互联系起来。物质关系可以决定劳动过程中农夫和土地的联系,但是,决定了农夫与土地联系的社会财产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他与市场中作为农产品买主、信贷者、竞争者的其他人联系起来。传统马克思主义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对阶级所做的定义等同于根据生产资料拥有者与非拥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对阶级所做的定义。

9. 正是因为与国家的关系能够构成一种重要的机制, 通过这个机制, 个人与生产资源得以相互联系, 所以菲利普·范·帕里吉斯(1986)认为“福利资本主义”是与纯粹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生产模式”, 而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在他看来, 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和规定性的方面构成了更广泛定义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基本变形, 因为它导致了非财产的所有者和不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

10. 这种例子并不完全是设想。可以设想一下在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有这样两个社区, 其中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挣工资劳动活动, 一个从事自我雇佣的农业生产活动, 从事这两种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相同, 但是这些相同的比例与完全不同的家庭无产阶级化的模式相对应。

11. 按戈德西尔帕的分析逻辑, 这种情况下, 家庭的阶级位置开始有一种混合特点, 把配偶双方的工作阶级合在了一起。但是, 家庭中所有成员会继续保持着同样的阶级位置。

12. 在实际方程中, 丈夫和妻子的工作阶级都可由一系列虚拟变量而不是单一变量来度量。

13. 这些假设中的所有系数都代表了方程中的工人阶级虚拟变量。

14. 在对数回归中, 自变量的系数是几率的对数。见第五章附录中有关的扼要讨论。

15. 需要点评一下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美国和瑞典的同类小资产者家庭中(即夫妻双方都从事小资产阶级工作), 有相当高比例的男性在主观上认同工人阶级。实际上, 在美国, 这比同类工人阶级家庭中男性认同的比例要高得多(62.5% 比 39%)。因为涉及人数较少, 我们不对这种类别进行严格的经验探讨。但我怀疑, 小资产阶级男性高认同工人阶级这一现象反映了传统人民党的“工人阶级”一词作为劳动人民的意思(与“寄生阶级”——银行家, 投机家等——相对而言)。

16. 我不能解释, 为什么嫁给工人阶级男人的妇女工人阶级的认同程度(约 50%)要高于工人阶级男人本身(低于 40%)。

17. 通过对照检查, 只包括受访者阶级或受访者配偶阶级的模型中“度量偏差”的减少, 和包括受访者和配偶两个阶级位置在内的模型可以对瑞典和美国男女的直接和间接阶级位置的相对解释力进行全面的检验。在瑞典, 当受访者的阶级加到配偶阶级中时, 对于丈夫而言度量偏差减少为 38.7, 而当配偶阶级加入被调查者阶级中时, 度量偏差缩小仅为 8.2。另一方面, 对瑞典妇女而言, 这两种影响程度几乎是同样的: 当配偶阶级加入时是 30.8, 当受访者阶级加入时是 22.3。所有这些拟合优度方面的增长都具备统计学意义。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 当妻子的阶级加入含有丈夫阶级的模型中时, 美国的模型中都不会有什么改进。

18.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模型中, 由于各种控制变量, 两个国家中间接阶级对男性的影响也大体相当(并不明显区别于零)。



19. 约翰娜·布雷内尔(1989)在对我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结构概念的一篇批评文章里已经明确提出这种说法。这种观点也构成了梅尔文·科恩(1969)关于阶级对认知复杂性影响的调查, 迈克尔·布劳沃伊(1985)关于阶级和劳动过程的分析, 以及E.P. 汤普森(1968)对作为生活经验的阶级概念。

2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方程中, 瑞典妇女直接阶级的工人阶级虚拟变量的系数比美国男人的相应虚拟变量的系数要大得多。

21. 我试过各种互动模型, 以为经济贡献变量也许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有积极影响, 但是这些互动没有一个有意义。当然, 妻子的收入贡献方面缺少有意义的系数仅仅是对这个概念不恰当测量的结果。或者也有可能, 就是这个概念是经济依赖程度的弱指标: 依赖可能是, 如果她需要, 就能够反现实地获得东西的一个作用, 而不是她实际所得到的。然而, 对这一结果更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 它们与期望中的依赖解释相左。

22. 对比由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连接起来的X和Y, 很类似于区别两种成分悬浮的一种液体和两种成分结合形成混合物的另一种液体。在前一例中, X和Y彼此有独立作用, 产生影响; 在后一个例子中, 他们构成由内部关系形成的一个完整模型, 他们的影响部分地来自于这些内部关系的运作。

## 第十一章

1. 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家庭主妇无偿家务劳动之间函数关系的讨论在70年代被称为“家务劳动大争论”。阶级功能主义的基本看法是: (1) 无偿家务劳动有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作用; (2) 既然资本家能给付更低的工资, 这便起到了提高资本家剥削率的作用; (3) 因此, 资本家间接地剥削家庭主妇; (4) 对妇女从属位置的基本解释——或者至少是对从属位置再生产的解释——依赖于充分体现资本主义功能的这种家庭的生产方式。关于这些讨论的回顾, 见莫利纽克斯(1979)。对这项讨论有突出贡献的是加德纳(1975)、瑟康姆伯(1973)、哈特曼(1981)和巴雷特(1980)。

2. 对这一问题非常令人信服的说明, 见布雷内尔和雷梅斯(1984)。

3.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这种矛盾的可能性在海地·哈特曼(1979a)的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不愉快的结合》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4. 关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性观点的例子, 见考万(1983)和斯特拉瑟(1982)。

5. 对根据职业界定的阶级类别和家务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的有限研究, 可见帕尔(1984: 270-272)、伯克(1985)、普雷瑟和肯(1983)和卡弗曼(1985)。

6. 这种论述的例子可见布卢姆斯汀和施瓦兹(1984)、胡德(1983)的论述。贝克尔(1981)也认为, 由于男女工资上的差异, 妇女会专门从事家务劳动, 但他未看到,

工资上的差异影响了家务劳动是因为工资不同也就意味着家庭里的权力不同。相反地,考虑到男性闲暇时间对家庭整体经济福利更有价值,他简单地把这视为劳动时间的合理分配。

7.很少有跨国比较家务劳动的研究,即使有这样的研究,也没有说到阶级问题。其他关于家务劳动的比较分析见罗宾逊、安德烈延科夫和帕楚谢夫(1988)和斯则莱(1966a, 1966b)、斯则莱等(1972)的论述。

8.关于瑞典家庭政策的讨论,见摩恩(1989:24~28)和鲁吉(1984)的论著。

9.以下研究的确报告过男性所做家务劳动的比例:普雷克(1985; 30~31):20.3%,如果看孩子也包括在内的话,则超过30%;伯克(1985:66):27%;沃尔克和伍兹(1976):21.6%,看孩子算在内的话为20.7%;罗宾逊(1977:63):17.5%,看孩子算在内为20.7%;梅斯纳等(1975),看孩子算在内为20.7%。

10.这跟哈斯(1981)的发现一致,她发现,瑞典家庭比美国家庭在家务劳动分工上有更平等的性别关系。

11.由于技术原因,在分析家务劳动时选择使用Tobit回归而不是OLS回归是因为因变量中有大量零值。研究方法附录说明了这项技术上的原理。

12.如果用OLS回归而不用Tobit回归的话,这些估计基本一致。

13.当然,瑞典妻子比丈夫更有可能去做兼职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劳动性别分工的质化方面的一个结果。瑞典的政策更方便兼职工作和更灵活的职业结构(通过父母假和其他措施),所以,政策本身并没有挑战劳动性别分工本身,但它们确实减少了家庭工作领域内工作上的性别不平等。

14.由于研究方法附录里提到的原因,妻子对丈夫所做家务的比例的报告可能比丈夫自己的说法更准确。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般不讨论男性被调查者的单独结果。本章末研究方法附录里对这些结果都有说明。

15.解释这些结果时要从技术上注意:表11.4的方程是以Tobit回归(而不是OLS回归)为基础的,所以这些方程中的系数跟表11.3各单元之间的平均值差别略有出入。

16.根据男性受访者提供的数据,这种家庭里的男人认为他们做了平均大约14%的家务,这远远低于相对家庭中女性受访者的说法。但是,案例数量相当少。

17.表11.6中的年龄系数和表11.5更为复杂的多,变量方程中的年龄系数可能更多反映了一个年龄组—文化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周期过程,因为即使方程里加入儿童出现在家庭中这一因素,年龄的影响依旧很大。

18.其他研究对家务劳动分工中相对收入的影响报告了相当不一致的结果。在任何研究中,相对收入不是丈夫所做家务的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在某些研究里它会起一定作用(如,法卡斯1976;休伯尔和斯皮策,1983)。对这些研究的评论,见卡弗曼(1985)。

19.最近的有关妇女有偿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见凯勒博

格和罗森菲尔德(1990)。

20. 必须记住, 在有关丈夫所做家务的方程中, 妻子工作时间并不是一个自变量。因为丈夫的观念对分配给妻子的有偿工作的时间有影响, 所以不可能直接比较男性和女性方程里的观念系数。

21. 可能有人会认为阶级通过它对妻子有偿工作时间的影响而包含在丈夫所做家务这个问题中。正如我们在表 11.5 时所讨论的那样, 工作时间量是双收入家庭里丈夫对家务劳动的相对贡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但是, 这个变量本身与家庭阶级构成仅有很微弱的联系。在美国双收入雇员家庭里, 不同家庭一阶级位置中妻子有偿劳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 37 至 43 小时, 在瑞典是 29 至 32 小时。

22. 大多数研究还表明, 至少在双收入家庭里, 丈夫通常在所有形式的“工作”上——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所花的时间总量一般比较少。沃尔克(1970)发现双收入家庭里, 每周至少有偿工作 15 小时的妻子花在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上的时间, 平均每周是 70 小时, 而丈夫所花的时间是 63 小时。在后来的研究中, 沃尔克和伍兹(1976)发现双收入家庭里, 妻子每天有偿和无偿劳动的时间总共是 10.1 小时, 而丈夫是 7.9 小时。罗宾逊(1977)报告说, 双收入家庭里的丈夫每天工作 6.9 小时, 而妻子是 9.3 小时。梅斯纳等人(1975)也报告过相似的结果, 他们计算出双收入家庭里丈夫每天工作总时间是 7.7 小时, 而妻子是 9.0 小时。普雷克(1985)是对双收入家庭里夫妻工作时间的差异程度提出怀疑的为数不多的分析家之一。他分析了两个调查的数据, 一个调查发现妻子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的总时间只比丈夫多一点(每天多 0.2 小时), 另一个调查发现妻子工作时间(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之和)确实比丈夫多(每天多 2.2 小时)。这两个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中“工作”的构成不同定义, 尤其是把所有看孩子的时间认为是工作、还是“游戏”这一点上更有差异。

23. 使用了时间安排日记簿方法的研究有: 伯克(1979, 1985), 伯克和伯克(1979), 杰尔肯和高乌(1983), 梅斯纳等(1975), 摩根等(1971), 普雷克(1985), 罗宾逊(1977), 罗宾逊、安德烈延科和帕楚谢夫(1988), 斯则莱等(1972)。

24. 日常家务劳动加权的根据来自于罗宾逊(1977: 148 ~ 149)和梅斯纳等(1975: 432)的研究结果, 看孩子加权的根据见梅斯纳等(1975: 432)。

25. 因为不是所有报告的受访者及其配偶的百分比加起来都是 100, 我刚开始就按比例平衡所报告的各部分。接着, 对男性受访者, 我使用受访者对自己分担的家务的比例数据, 对女性受访者, 我使用她们认为其配偶所做家务的比例数据。当量表中某些成分数据不足, 我相应地调整了加权, 并且计算出有数据下(至少有两项关于家务劳动的数据)的全部家务劳动贡献。

26. 妻子进入劳动力大军中就业时, 丈夫做家务的绝对时间量并无差别, 这一结果见梅斯纳等(1975), 沃尔克(1970); 并且沃尔克和伍兹(1976)。而罗宾逊(1977)、伯克(1985)和普雷克(1985)等报告每天增加 4 至 6 分钟。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就业

时,她们所做的家务量减少了,这一结果见:罗宾逊(1977)每天减少3.5小时;沃尔克和伍兹(1976)每天减少3.3小时;沃尔克(1970)妻子每周工作小于15小时每天减少1小时,妻子每周工作15至19小时每天减少2小时,妻子每周工作超过30小时每天减少3小时;普雷克(1985)每天减少3小时;万纳克(1974)每天减少4小时。

27.如果女人因做家务的时间少了,她们家务劳动的强度变得更大了,这样,家务劳动分工中的平等就只是一种幻想。如果实际工作量不仅由时间单位也由加权了强度的时间单位来度量,那么实际工作量方面的差异就会一直保持、甚至增加。我所知道的研究中没有哪一个讨论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试着实际调查它了。

28.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探讨家务劳动贡献报告中的偏差程度。伯克和雪(1980)曾详细研究了丈夫报告的形式和妻子报告的形式之间的差异,但她未试图确定哪一种估计偏差更少。伯克(1985:77)注意到,在她研究的每一项家务劳动中,“妻子认为丈夫所做家务的数量都比丈夫自以为的要低”。但是她并未断定哪种说法更准确:“在谁做了什么和做了多长时间这些问题上,花时间去考虑谁的观点代表了‘正确的’说法,似乎没什么用处。”(伯克,1985:55)

## 第十二章

1.关于为什么权力提高与收入增加相联系,有多种可能的解释:等级地位也许与职业经验和人力资本的其他形式的增加相联系,这样,不同权力等级之间收入差异就可以部分地反映不同级别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差异;监督和管理职位附加的责任和压力,可以要求附加经济补偿来刺激人们做这种工作;收入差异的需要是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一部分,以保证管理人员能勤奋履行管理职责。使用收入差距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已经理论化为有效工资理论(艾克罗夫和悦兰,1986),竞争交换中的雇佣租金(鲍尔斯和金蒂斯,1990),以及剥削结构里的忠诚租金(赖特,1985)。

2.20世纪80年代末,在瑞典,女性的小时工资大致是男性的91%,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只有约65%(国家公平工资委员会)。

3.见上文11.2节。

4.以本书所用的阶级分析比较方案的数据为基础,57.1%的美国人相对于74.1%的瑞典人(多多少少或完全)同意下列说法:“在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职位上,理想上女人和男人应该一样多。”关于瑞典和美国性别观念上差异的讨论,见巴克斯特和肯(1994)。

5.本章选择这组国家,主要是由于可以得到关于工作场所权力的严格可比较的微观数据,而不是因为理论背景的原因。然而,政治和文化上的大量差异可以为研究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权力性别差距提供优越的经验背景。

6. 这种方法类似于种族歧视研究中常用的策略（伯克、霍雷恩和托尔伯特，1978；费舍曼和霍瑟，1978），或是收入中的性别歧视研究中常用的方法（特雷曼和鲁斯，1993；罗森菲尔德和凯勒博格，1990）。

7. 例如，假设当工作部门和职业资历被包括进多变量方程里时，预测权力的性别系数是零。这就表明，同一工作部门里和同等职业资历的男女都有拥有权力的同等可能性。因此，权力的总体性别差异可以令人信服地归于下列事实，即女性关注几乎没有经理职位的部门，而且她们的平均职业资历也比男性的浅。但是，性别歧视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她们关注这些部门和为什么她们的资历浅。

8. 沃尔夫和弗利格斯顿（1979a）控制了教育、经验和任期；贾菲（1989）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婚姻状况、儿童、工作经验、种族、年龄和三个数字代码职业的性别构成；雷斯金和鲁斯（1992）预计经理最终决策的领域数量，控制了教育、公司任期、工作时间、自我雇佣状况、组织规模、管理水平、监督权力、女性在职位和人口普查中的经理职位中所占比例。

9. 当然，如果企业需要每周做一定时间的管理工作，那么原则上它就会雇佣两个兼职经理而不是一个全职经理。在大多数工作环境下，这有可能使组织效率降低，因为在许多兼职雇员中工作责任和决策的协调会十分复杂。

10. 这里缺了一项重要变量——全部工作经验。这个变量在样本里的大多数国家内都无法得到。但是，我们包括了现在工作的职业期限、年龄和就业中断情况，这几项合在一起又与全部工作经验高度相关，所以缺了这个变量不可能严重影响结果。

11. 需要指出，这里对权力的定义与一个人所从事的正式“职位”有很大不同。当权力直接按人们对工作的影响力来度量时，许多低级白领职业中的人也可能会有大量的权力。只有少数在工作中拥有高层权力的人才能被冠以“经理”这一职业头衔（按我们的标准，不是所有在工作中称为“经理”的人都有权力）。

12. 例如，见参议院劳动和人际关系委员会之下的就业和生产率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女性和工作场所：玻璃天花板”，1991年10月23日；美国劳动部：“玻璃天花板处理动议”，1991年；威斯康星州政府处理玻璃天花板动议的特别工作组，1993年；美国联邦“1991年玻璃天花板法案”。大众媒体中有关玻璃天花板的讨论，见加兰（1991）。

13. 凯特雷斯特（1990），美国劳动部（1991）和斯坎杜拉（1992）都用过相似定义。

14. 有时“玻璃天花板”表述看上去仅仅指明了管理等级中出现的歧视而没能具体指明在公司更高地位上不断增加的歧视。但是，这种用法跟隐喻所表示的形象并不一致，而无论何种情况，提到玻璃天花板的大多数评论家都指的是位于等级顶端的女性所面临的更复杂的障碍。

15. 按照费尔曼（1990）的研究，顶尖公司里4012名最高收入经理中女性不到

0.5%，而《财富》杂志500家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中，女性和少数民族占不到5%。

16. 这个假设的例子大致与一些可得到的公司级数据相对应。“马歇尔等对阿尔法贝塔”案中涉及食品连锁业中各级管理层中性别分布的情况（雷斯金和佩达威克，1994:89），49.9%的食品部雇员是女性，16.8%的食品部门副经理是女性，7.6%的食品部门经理是女性，3.1%的商店经理是女性。男性较之女性，成为副经理而不是雇员的相对机会大体是5:1，成为部门经理而不是副经理的相对机会是2.4:1，成为商店经理而不是部门经理的相对机会是2.5:1。虽然在这个公司里的各个等级上女性升迁都受到了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在底层比在高层还要大。

17. 研究等级中的性别差距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正式的两级样本选择模型，其中我们同时计算出一个人是否处于权力等级中和如果他处在等级中，那么他有多少权力。这使我们能够纠正对后一方程的系数的估计，这些系数是用来计算方程中变量对选择的影响。但是，最近的关于研究方法讨论（曼斯基，1989；施托尔岑贝格和雷勒斯，1990）指出，这种模型很受质疑，对它们推导出的系数的“纠正”可以轻易地随着它们的减少而增加估计的偏差。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把关于玻璃天花板的分析限制在权力差距的单一方程里，这个方程只适用于已经在权力等级中的人。

18. 在分析权力总量量表时，我们采用累积对数回归。解释见研究方法附录。

19. 如果  $X = \log(Y) - \log(Z)$ ，那么  $X$  的反对数就是  $Y \div Z$ 。在上面对数方程中， $B_1 = \log(\text{女性拥有权力的机会}) - \log(\text{男性拥有权力的机会})$ 。 $B_1$  的反对数 = (女性拥有权力的机会)  $\div$  (男性拥有权力的机会)，这是一个几率。见第五章研究方法附录里对机会和几率的讨论。

20. 国家差异的显著测试只用在权力度的综合量度上。对预测约束权力和正式位置的模型的性别系数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的测试，实际上与综合权力两分的结果是一样的。总之，预测决策变量的性别系数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更小一些。

21. 我们直接量度所估计的日本权力性别差距的规模甚至比布林顿（1988:31）用管理层职位作标准所估计的9:1比例还要大。

22. 表12.4的结果来自于同一方程，也就是说，对所有国家，方程都含有同样的变量。当我们对每一国家使用包含所有可得变量的非统一方程来估计结果时，结果实际上还是完全一样的。

23. 如果构成因素解释了所有性别差距，那么表12.4的模型2里性别差距——1减去指数性别系数——将会是0。在美国的结果中，总权力量度中的性别差距在不加控制的模型（表12.3）里是0.46。表12.5加入控制的模型中的性别差距是0.36。这些系数的差异——0.10——是模型1中性别差距0.46的27%。

24. 这些模型不能用于日本和联合王国，因为没有这两国内家务劳动分工的数据。没有这个变量的简单模型里的互动项对这两个国家没有意义。

25. 方程3中, 当女性×孩子互动项下降时, 加拿大女性×已婚系数是-1.20, 标准误差0.48。其他国家里这种互动项都没有意义。但是, 如果 $X_i$ 构成项(而不是自我选择变量)也被排除在外, 那么挪威的女性×已婚互动也会有意义。这个互动的系数表明已婚妇女比起已婚男人, 拥有权力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这并不是说在拥有权力方面已婚妇女的可能性比单身妇女更低。已经证明, 在已婚妇女和单身女人之间, 拥有权力的可能性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意义的已婚×女性互动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已婚男人比单身男人, 拥有权力的可能性明显要高。当年龄作为构成控制变量加入模型(3)时, 在挪威, 已婚×女性互动项的系数大幅下降, 并且失去统计上的意义。

26. 虽然这些结果在加拿大支持了自我选择假设, 在挪威支持的程度要小一些, 但是, 应该注意的是, 在加拿大和挪威, 家务劳动不平等和女性的工作场所权力这二者之间的负相关能部分地反映拥有权力对家务劳动的因果影响, 而不是家务劳动对获得权力可能性的影响。管理层和监督层女性平均所做家务较少是因为她们工作的需要, 这样一来, 她们家庭里的家务劳动性别分配就会更加平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 那么表12.5里性别和丈夫所做家务的积极互动不能表明自我选择。

27. 关于这个分析要说明两点: 第一, 日本样本里没有女性处于中层经理或更高职位, 所以我们在日本样本上评估这个因变量的方程。第二, 在表12.3和12.4的讨论中已经指出, 决策变量比起我们用的其他变量, 似乎是实际权力的一个软弱指标。所以, 我们在分析玻璃天花板假说时没有用这个因变量。

28. 在分析决策因变量时(未显示), 联合王国和挪威的性别差距, 在加入结构控制变量的模型里也失去了统计意义。

29. 当样本限制在权力等级的人们时, 总体性别差距的双变量方程(这里未列出)中的性别系数在美国也失去了统计学意义。

30. 因为这些分析里样本规模小, 所以不可能分别检验美国系数和其他每个国家系数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比较美国和除日本外的其他国家(日本被去掉是因为它的标准误差太大)处于等级中人们的有限样本, 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模型1中, 美国的约束系数比其他国家联合的平均值小0.43( $P < 0.08$ ), 美国在正式等级里处于中级经理或更高职位的系数比其他国家小了0.54( $P < 0.02$ )。对模型(2)的结果来说, 系数的差异程度实际一样, 但标准误差增加了, 所以显著水平下降到了 $P < 0.13$ 。

31. 对那些已经身处权力等级的人来说, 在联合王国女性成为中级经理的机会比男性少了66%, 而在澳大利亚, 女性的机会比男性少42%, 与此对比, 在联合王国, 女性进入权力等级的机会只比男性少44%, 而在澳大利亚, 女性的机会比男性少35%。

32. 但是, 度量正式等级中位置的项, 确实在一方为高级和上层经理和一方为中级经理之间作了区分, 尽管个案数目如此之小以至于在大多数国家里我们不能有效估计这个权力等级层中的性别差距。尽管如此, 以高级/上层经理为因变量的相

同基本模式还是出现了：同在等级之中的条件下，在美国，上层或高级经理中的性别差距大约是0.25，而在其他国家里，这一数字在0.47至0.67之间。

33.表12.7收入差距的数字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完全可比。在某些国家里，这一数字是小时收入差距，而另一些国家里，则是月收入或年收入。但是，如果所有国家都用小时收入，那么这些国家的排列顺序不可能有重大的改变。

34.布劳和弗伯尔(1990)用七种职业分类来计算差距的标准指数。查尔斯用六种职业分类来计算她所谓的“性别隔离的比率指数”。

35.布林顿和恩格(1991)说明了日本的总体职业性别隔离程度比美国低，因为日本比起美国，低地位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程度较低，但高地位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程度又比较高。她们提出另一种度量方法，即通过职业威信给指数加权。这个加权能极大地增加日本的差距指数，并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的这一指数，结果就是(加入职业威信后的)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在日本比在美国要高。这样一套职业性别隔离的度量在我们分析中的其他国家不存在，但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相对近似，这些加入威信的调整看上去不可能导致差距指数像日本那样有大的变动。

36.当排序以那些在正式等级变量里拥有管理或监督职位的人为基础时，权力排列顺序多少与性别差距排列顺序不同。特别是日本，它处在性别——权力差距排序的底层，但却处在管理职位或监督职位劳动力比例的排序的中间。但是，因为监督者类别很可能包括只有名义权力的人，所以出于本研究的目的，更加限制的定义则更为恰当。还要注意，当其他两个我们检验过的权力维度——决策权和约束权——被用作拥有权力人口比例的排序的基础时，排序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性别差距的排序。如果我们把正式等级变量作为权力位置的量度，把约束权和决策权变量作为权力功能或责任的量度，那么很明显，区分各个国家的关键“稀有资源”是职位的可得性，而不仅仅是责任的可得性。

37.这一栏讨论美国、不列颠、瑞典、荷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女权运动。

## 第十三章

1.有一些阶级结构，在这些结构中，组成此结构的关系中的“位置”为一整个家族所占据。这将无条件地改变微观/中观/宏观的等级体系，但它不会改变等级体系作为本身由关系所构成的单位间一系列被套入关系中的逻辑，无论如何就目前的目的而言，没有必要增加这一复杂情况。

2.根据个人意愿为他人的福利做出牺牲的阶级团结概念已为乔恩·埃尔斯特(1985)所详细阐述。

3.一个关于统治阶级形成的非正式网络的研究的说明性例子，参见威廉·G·多姆霍夫(1971)。



4. 这种对阶级形成概念的利用表达了一种相对于我早期论述的轻微变化, 见赖特(1978: 97~108), 在那里我限制性地把阶级形成定义为阶级内部社会关系的形成。因此, 阶级联盟没有作为一类阶级形成而包括进去。

5. 本节与下一节的部分内容是从我的早期著作《阶级》中改编而来的(赖特1985: 243~251)。

6.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这绝不是理解阶级意识的仅有方式。尤其是, 卢卡奇(1971[1922])似乎把“阶级意识”分类归因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工人阶级, 而不是组成该阶级的有经验的个人。关于此观点的讨论参见赖特(1985: 242)。

7. 可以进入意识并不意味着个人能够清楚地用词汇向他人表达这些意识要素。虽然交流能力是与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交流信念和拥有信念是不同的。

8. 我在一本早期著作中(赖特1985: 246)把阶级意识仅同信念的相关阶级影响的观念做了区别。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为它允许各种与阶级关系无内在联系信念被考虑进阶级意识的各个方面。

9. 阶级意识的这三个方面大致相当于格兰·西博恩依照对问题的回答所做的三个“思想观念的质问模式”之间的三重区别。要回答的三个问题是: 存在什么? 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好的?

10. 在许多讨论中, 阶级认同被视为阶级意识的核心。因此, 阶级意识变得几乎相当于阶级成员资格的意识。虽然我认为阶级认同的确非常重要, 但它并非排斥相关阶级的意识方面。因为强烈的阶级认同会导致行动的方式将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行动方向的知觉和个人关于不同选择结果的推测。

11. 参见赖特(1989a: 280~288)对一个观念的广泛讨论, 即讨论“共同阶级利益”所指的是对提高物质利益的一套共同的战略权衡和两难处境。

12. 意识形成的黑箱暗含的学习理论与西博恩的观点十分相似。西博恩认为, “意识形态的质问”是根据与不同社会地位相关的断定和批准, 个人经验的支配和限定模式的结果。它也与布迪厄(1985)的观点相近。布迪厄认为, 日常生活经验构成了产生共同条件作用的一系列共同的条件。尽管布迪厄更关心主观性无意识方面的形成倾向, 而不是意识本身。布迪厄的阶级习惯概念包括来自这类共同条件作用/经验的对行动者的广泛的无意识主观性的影响。阶级习惯定义为以特定方式行动的一套共同的安排, 这些方式是由植根于一个阶级构成的一套共同的条件作用(主观形成的经验)形成的。

13. 声称特定种类的阶级形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并不是宣称, 造就像这样一个阶级形成尝试从不会发生, 而仅仅是说, 这种企图成功的概率低, 并且, 如果它们成功了, 也是因为极大的偶发性条件, 它们长期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14. 在早期著作中(赖特1985), 我曾认为, 阶级形成(而不是阶级构成)对阶级斗争施加基本的限制, 而阶级结构仅仅从这些限制中选择特定斗争形式。我证明了, 没有特定的阶级形成, 特定的阶级斗争不会发生, 并因此, 阶级形成应视为

是对阶级斗争施加基本限制的东西。现在对我而言似乎更合理的是，因为阶级结构决定引发阶级斗争的基本对抗的利益，所以，阶级结构应被看做是决定对阶级斗争的根本的可能性限制的东西。总之，如我在其他诸多地方所表明的（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2：第7章），宣称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施以基本限制，同时，阶级形成从这些限制内选择斗争方式，并不是声称阶级结构在理解阶级斗争中有关变化方面更重要。

15. 关于微观还原主义方案的评估和批判，见赖特、列威恩和索博（1992：第六章）。

16. 一个对阶级斗争的微观基础的有益讨论，具体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讨论，见埃爾斯特（1985：344页以下）。埃爾斯特把工会内团结一致的出现，描写成从囚徒困境到确信游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条件利他主义解释了关于成员分担牺牲和共同斗争的核心偏爱的规则。

17. 当然，相互作用的术语在技术上是对称的，并且可以说 $B_3$ 指明了对不同阶级位置而言，阶级形成的宏观影响变化的范围。就是说，工人阶级有力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对不同阶级位置的人们有不同的影响，而且，处于某个工人阶级位置的影响根据阶级被有力地紧密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发挥不同的作用。

## 第十四章

1. 本节主要引自早期的讨论（赖特1985：252-253）。

2. 对作为测量阶级意识的方式的态度批判源自于为比较阶级分析项目英国研究组的一个成员，参见马歇尔（1983）。

3. 在问卷中包括一系列开放性态度问题来处理贫困和犯罪的解释和解决方法。我们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开放性问题同一套类似的封闭性选择问题结合起来。据我所知，任何国家都没有发表过一项系统使用开放性问题的研究项目。

4. 先前出版的关于瑞典和美国的研究（赖特、豪和乔1989），是本章的起源。在分析中还包括第六个条款：

“在因工资和工作条件而进行的长期罢工中，你希望看到发生哪种结局：

- (a) 工人多数要求得到了满足；
- (b) 工人一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和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
- (c) 工人仅少数几个要求得到了满足；
- (d) 工人没有任何要求得到满足而回去工作。”

即使这个条款揭示了瑞典和美国间非常重要的差别，但在现在的三国比较中必须把它去掉，因为在日本的调查中，措词表达法被不无意地改变了。不是询问“你希望看到哪种结局发生”，日本的问题读作“你认为哪种结局最可能发生”。当我们

观察到,日本受访者回答(c)的比其他任何一国的比例大得多时,我们注意到,在日本调查问题的措词有些不恰当。无论如何,去掉这个条款,对美国 and 瑞典的结果无任何实质性影响。

5.在访谈中“不知道”不是一个明确的回答类型,但如果受访者这样回答了,访问者就指出来。

6.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和瑞典这个问题在文化上无可比较的含义,因为在瑞典,回答的分布与调查中的其他问题如此无联系。在其他所有的阶级冲突条款方面,瑞典工人都比美国工人持更坚定的赞成工人的立场,而在这个条款上却不是。

7.在这些比较中使用的问卷在一系列十分激烈和详细的讨论中得到了改进。这些讨论包括了美国和瑞典的研究者(在其他中间)。从调查中去掉许多条款或修改它们的字词,这是因为文化含义的等价问题。可惜的是,那时日本的研究项目还不存在,并因此,在最初的问卷设计中根本没包括日本的研究问题条款。所以,它们被迫接受没有校正的问题,这也许意味着,在日本调查中比在其他两个国家有更大的文化滑动(Slippage)。

8.在美国和瑞典,工人阶级位置实际上同技术非管理雇员位置是难以区分的;在日本是同小资产阶级难以区分的。

9.在美国,专家经理位置的值是-2.62,资本家位置是-2.17。在0.05显著水平上这些值没有显著差别。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称的“资本家”一般是非常小的资本家雇主,由于资本家和小雇主之间的分界点仅是十个雇员。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样本中的资本家同专家经理一样赞成资本主义。

10.这个描述仅有一个小的限制条件,即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差别。不过,这无损于假设的实质要点。

11.尺度中阶级位置之间最大可能的差别是20分,但,因为任何社会类型中内部意识形态的异质性,某个类型在尺度上的平均值从不会达到这个理论上的极限。所以8分的差别就是很大的了。

12.因为在这些阶级位置方面的案例数量少,这个差别的显著性水平(0.06)正好落在显著性常规阈值0.05下面。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联盟之间的绝对界限长度(1.66),实际上比中产阶级联盟和工人阶级联盟之间的距离(1.43)大。

13.中产阶级联盟更大的意识形态异质性不是一个用于限定意识形态阶级联盟的分析策略的产物。在方法上,没有什么东西会在中产阶级联盟内产生与其他联盟相比更大的异质性。的确,在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盟比中产阶级联盟更异质。

14.这两个类型结合起来的加权平均数,在美国是-2.4,在瑞典是-2.59。在统计学意义上,这个差别并不是多么显著(t值是0.21),而在这两个国家工人阶级联盟之间平均数上的差别在0.001水平上。

15.这些类型中的两类,技术经理和专家监督者,落入到资本家阶级意识形态

部分的“边缘区”，但包括在这个联盟内，因为与中产阶级联盟核心区中最近的阶级位置（非管理专家）相比，它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值更接近资产阶级部分核心区中最近的阶级位置（非技术管理人员）。这对美国资产阶级联盟内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数值的范围与其他两个联盟相比起到了作用。美国资产阶级的数值范围从技术经理的-0.68到专家经理的-2.62（中产阶级联盟在尺度上的值的范围刚刚超过1分，工人阶级联盟的不到半分）。

16. 显著性水平如下：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联盟， $p=0.03$ ；中产阶级联盟对工人阶级联盟， $p=0.008$ 。

17. 因为日本的样本基本是城市的样本，实际上在日本小资产阶级中没有农民，所以这些态度并没有反映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

18.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人阶级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工人的直接物质利益也依靠他们工作所在的公司利益。在同样情况下，公司的利润强大时比衰弱时工人经济状况较好。然而，因为通常较低水平的工作保障和工人中职业梯层有限，还因为工人的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短期交换，人们可以期望，公司里的经理和专家的直接利益比工人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关系更密切。

19. 如果从这些数字中排除掉专家经理，与美国的数字1.52比较，瑞典是1.89。

20. 在美国中产阶级联盟中参加工会的人们80%处于技术监督者位置。更进一步看这些人，65.5%是教师或技术工匠，比较而言，没参加工会的技术监督者仅24.6%是教师或技术工匠。根据他们的阶级位置的总体结构特征，最好把这些人归为技术工人，而不是其他技术监督者。总之，像表14.2表明的那样，参加工会的技术监督者在意识形态上与参加工会的技术工人根本没有不同，相反，没参加工会的技术监督者同没参加工会的技术工人具有实质上的不同。

21. 仅有的一个例外是在非技术经理中，这里的差别仅仅约2分。

22. 这些结果的另一个特征值得注意：虽有些次要的例外，阶级位置和反对资本主义意识之间单调不变的关系既为瑞典参加工会，也为没参加工会的雇员所持有。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位置中工会成员如此之少以致我们不能评估其单调性。

23. 要做到这些，需要一个历史比较框架，我们可以在其中追溯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和工会组织方面长期的变化。在一个这类概念的资料集中，我们将测量自瑞典工会组织迅速扩张时期之前以来的美国和瑞典工会成员和非成员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用说，这类资料并不存在。

24. 对作为体现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高度合作关系的日本公司的讨论，参见多尔（1987）、沃格（1979）和OECD（1977）。

25.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日本劳工关系制度的由来的讨论，参见戈登（1985）、藤田若生（1973）。

26. “随机变化”，我是指诸如访谈中的疏忽之类事情和对条款中特定的措词以纯粹特性风格的回答所影响的回答。当然，在经验上把一个变量中“可解释的”和

“不可解释的”差异辨别开是不可能的，但记住这两者之间的比率本身在调查研究中跨不同种类变量的变化，是重要的。

27.“扩大的”工人阶级由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监督者组成。中产阶级是由所有各类管理人员和专家加上技术监督者组成。

28.就扩大的工人阶级里无产阶级化程度方面的种族差异来说，家庭构成将倾向于强化个人阶级位置的影响，而对性别差异而言，家庭构成会倾向于抵消这些影响。

29.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压迫完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方式；像性别不平等一样，种族不平等是由不能还原成阶级的一系列特殊机制的复制品。然而，种族隶属的特殊形式是人们从种族上的被压迫群体到特定的被剥削阶级位置的分配。

30.参见沃森(1990)一篇关于持肯定回答的倾向性的相关方法论的著作的评论和这个研究项目中美国资料里“持肯定回答偏向性”问题的一次具体讨论。

31.这个分析的一个早期版本(赖特;豪和乔,1989)采用了一个同估计置信区间的有点不同的策略。对矩阵中的每个单元,我们只询问是否与距它最近的极化单元显著不同。如果不是,那么它就被看做是那个意识形态联盟的一个伙伴。这个划分矩阵的方式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使阶级形成边界的描述图像,对样本规模来说太敏感。足够大的样本会使小的差异“显著”,以致没有两个单元在同一个联盟。因而,这个策略把一个特定的描述结果里的置信水平的问题同做描述本身的任务混淆在一起。在现在的这个程序里,对阶级形成的描述图像是由样本规模单独造成的,仅仅根据评估一个特定的单元距三个检验值有多近的距离,有一个大的样本,我们对这一描述图不是因为偶然性而形成的信心会更大,但图本身并不受样本规模的影响。

## 第十五章

1.在其他分析议程中有几项研究,对国家和私有部门雇员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了比较。特别是,某些关于“新阶级”的经验研究(例如,布林特1984;拉德1979,伍斯诺和施鲁姆,1983)包括对国家雇佣或职业的“政府隶属”(用伍斯诺和施卢姆的词)的态度相关事物的某些边际分析。然而,这些研究没有系统地探讨新阶级之外的国家雇员和私有部门雇员之间的差异,甚至新阶级中关于国家雇佣差异的讨论也很粗略。少数的几个直接对国家/私有部门主题的比较有着十分狭窄的经验焦点,并且通常用的是非常有限的样本(例如,贝内特和奥热霍夫斯基1983;格雷姆里奇和鲁宾费尔德1980;雷尼、特劳特和布兰特1986;以及雷纳曼做的定性访谈研究1987)。我发现远没有系统地探索国家和私有部门中的雇员间一系列的态度差异的研究,并且也根本没有探索阶级和国家雇佣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更不用说

跨国考察这些问题的研究了。

2. 我将使用颇为模糊的术语“国家精英”来表示国家机构中的高层管理者。使用这一术语，我并不是站在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论立场上：即这些精英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一部分，或阶级关系之外的一个精英集团。这类问题在本章被括在括号内，因为我们的经验焦点完全在国家和私有部门中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上。

3. 使用功能语言描述国家的特性和活动困难重重。这里我没有建议存在任何自动平衡机制，保证这些具体的国家机构将有效地执行这些功能。所说的一切都是（除了它们所做的其他事情）这些机构通常在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方面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4. 这些机构是后资本主义的，因为所讨论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沿着的是一个明显的非商品化的、非资本主义的逻辑。生产不是为了交换和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直接满足需要。这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由基本的政治争执过程决定，而不是通过市场决定。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类生产为资本主义机构所高度限制。并因此，称之为一个刚萌芽的国家生产方式，而不是伴随资本主义的一个充分发展的方式是合适的。然而，被资本主义逻辑所限制并不是等同有一个相同的资本主义逻辑，因此，以国家为中心在政治上调整的生产可以看做是后资本主义的。关于这些论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赖特（1994，第6章）。尽管不是一致的，霍夫（1985）还是区别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之间的一个类似的差异。然而，这一差异同路易斯·奥瑟尔斯（1971）在其著名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所做出的区分十分不同。在奥瑟尔斯的分析中，“国家的镇压机器”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完全被描绘成服务于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的功能。

5. 由国家机器执行的这两个“功能”——上层建筑的功能（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和生产性功能（生产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另一个常见的功能差异不一致。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在关于讨论国家时讨论这个区别：合法（化）功能和累积功能（例如，奥菲1984；奥康纳1973）。一些生产功能不能满足任何特定的这类累积需要——例如，公共领域的娱乐设施；在“合法（化）功能”的标题下的许多国家实践可能涉及国家进行的使用价值的大量生产。这是用于不同的分析目的的横截功能描述。

6. 有各种因果机制可以把功能角色同意识形态方向联系起来。该机制可以是一种吸收新成员的机制：只有那些思想意识与上层建筑机构的使命相符的人才会允许进入这些机构或在进入后留下来。或者该机制可能植根于单纯的物质利益：行动者的物质利益依赖一个机构充分完成它的功能职责的程度，思想意识方向倾向于调节这种物质利益。根据两者中的一个，人们可以预测在政治上层建筑中和国家服务中的国家管理者和专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

7. 在这个环境中的选择可以通过多种具体的机制进行。可以由雇佣当局在进

入这些机构的关口时根据招收标准直接进行挑选。或者,如果有些人其思想意识方向与所要求的相不一致,又设法被雇佣,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职业被那些机构中的高标准所阻拦。不过,即使这种审查机制是愚钝的或漫不经心的,但自愿的自我选择依然能够实现个人思想意识的方向和制度上的根本利益之间的一致。

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政治上层建筑里国家雇员的比例在美国比在瑞典大得多,但在国家政治上层建筑里雇佣总劳动力的比例在这两个国家十分相似。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瑞典非常庞大的整体国家雇佣主要是非商品化的国家服务的扩张的结果。

9.为了与第十四章里对整体劳动力的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应该注意的是,在瑞典,资本家阶级和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之间在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存在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在美国,则没有显著差异。在国家主义态度方面这两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和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之间都没有不同。因而,美国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比瑞典的同类靠近资本家阶级。

10.在瑞典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差异的实际程度在政治部门比在国家服务部门大,但是,因为样本规模比较小,所以政治部门内的阶级差异仅仅勉强地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11.正像在方法附录中所说明的,做出的所有这些比较用的都是这里说明的简单的相加尺度和含有较复杂的 LISREL 因素的尺度。在仅有的一个例子中,这些尺度在分析部门内的阶级差异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美国国家服务部门内,虽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相加的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显著不同(如表 15.4 所示),但在赞成工会因素(由反对资本主义相加尺度中使用的条款产生的两个 LISREL 因素之一)尺度上都没有显著不同。此外,我们所探讨的不同分析策略在其产生的部门内的阶级差异的结果中不存在任何差异。

12.美国与瑞典相比,国家政治部门的中产阶级持有相对较高程度的“进步的”态度(尤其是就反对资本主义尺度而言)似乎部分地是美国国家保护服务部门监督者的态度的结果。那些监督者按平均值看他们持有相当赞成工会反对资本主义态度(正如通过我们的问题所测量的那样)。根据阶级分类学,这些个人归为技术监督者(边缘技术财产和边缘组织财产),并因此,被归于“中产阶级”。当然,成员数相当小,所以不可能单独对这些受访者进行系统的分析。

13.有两个例子,用较复杂的 LISREL 测量策略(见方法附录)测量结果与使用简单加和意识尺度所测结果不同,说明如下:(1)在瑞典,国家服务部门工人在反对统合资本主义因素上的平均分低于私有部门工人。而在加和尺度中,这两类工人没有显著不同;(2)在美国,国家服务部门工人在反对公司资本主义因素上的值明显比私有部门的工人高,而在加和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这两类工人也没有不同。不过,基本观察依然认为,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跨这些部门的同质程度上瑞典比美国更高。

14.就像工人阶级的结果一样,使用 LISREL 因素(见方法附录)的结果与使用简单的相加尺度的结果之间存在某些细小的差异:(1)在美国,政治上层建筑的中产阶级在相加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中的值比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高,但是在赞成工会主义 LISREL 因素上与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没有不同;(2)在整个相加反对资本主义尺度上的值,瑞典国家服务部门的中产阶级比政治上层建筑的中产阶级高,但在赞成工会的 LISREL 因素上却不是。不过,这些矛盾并不影响总的图像。

15.收入是用受访者从其工作中所得个人工资的原始记录来测量的。教育在美国是以受教育年限测量的,在瑞典是以教育水平(一个六层次水平顺序尺度)来测量的。

16.当工会成员身份作为一个组成控制变量包括进多变量方程时,一些,而不是全部,阶级内部门的差异就缩小了。不过,即使工会成员身份包括进来,以上报告的结果的基本实质性结论——美国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跨部门分裂,而瑞典不分裂,和瑞典的中产阶级在国家部门内分裂,而美国却不分裂——依然为数据所支持。

17.正像已经常常注意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政治条件在这两个国家非常不同。与瑞典不同,美国从未有过一个成功的阶级范围的工人阶级政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工会组织的一套法律很不令人满意,社会民主政治倾向较弱,工人阶级内部的地域和社会分野较大,等等,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化程度大大低于瑞典工会,而在工会出现的地方,它常常有助于增加工人阶级内的分野而不是缓和它们。另外,美国福利制度的不发达,意味着个人福利的许多来源与特定的雇佣场所有关而不是由国家统一规定。这又造成了国家部门的工人中间的利益区别。

18.尽管这个问题不直接要求国家干预增加教育和工作机会,但我设想,大多数相信增加教育和工作机会会大大减少犯罪的人们会支持国家进行这种干预。

19.在证实因素分析中,反资本主义条款被分为两类因素:支持工会因素(条款2;第十四章的方法附录中的表中和上述罢工结果的条款)和反公司资本因素(第十四章条款1、4和5)。条款3跨两个国家的表现很不一致,因此,从产生 LISREL 的尺度中把它去掉了。所以,在因素分析的数据处理中,我们研究了三个不同的尺度:支持国家主义、支持工会主义和反公司资本主义。关于 LISREL 分析的技术详情的讨论参见怀特、豪和乔(1989)。

20.总之,我们所称的政治上层建筑部门与路易斯·奥瑟尔(1971)所指的镇压的国家机器,以及他所指的服务分支部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一致。在克劳斯·奥弗(1984)研究国家的框架中,国家服务部分由那些社会服务部门组成,这些服务部分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而非商品化。



## 第十六章

1. 其他例子包括波兰特拉斯(1975)、卡彻迪(1977)、科恩(1978)的著作。

2. 例如, 奥瑟斯尔(1971)把个人看做为角色所需要的或多或少自动体现主要主观特征的角色的“承担者”, 那些角色在功能上所需要的主观特征。依附结构位置的客观条件被看做如此强大和普遍, 以至于它们实质上对那些位置上的行动者施加了一组主观特性。在另一个极端, 拉克劳和摩夫(1985)认为谈论客观局限和决定因素是没有意义的; 主观特性完全通过文化和讨论锻造。利益缺乏任何“客观”基础: 处在阶级内的个人行动首先由他们过去在文化上构造的经验的轨迹所解释, 而不是通过未来由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可能性来解释。

3. 就这个背景中的“经验”来说, 我不是指未经现有的解释和意义调解的“原始经验”, 而是指已经并入到主观性的经验。

4. 基于学习和选择分析之间的区别出自于鲍尔斯和金蒂斯(1986)的具有洞察力的分析。

5. 主观阶级认同也许是社会学家研究最多的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关于阶级认同的问题综合讨论, 见玛·杰克曼和罗·杰克曼(1983)。关于阶级认同的早期古典研究是由森特斯做出的(1949)。

6. 主观利益指有意识的行动的目标。沿袭埃爾斯特(1985:855)用法, 我们说“有意识的行动”是指对未来状况预期提供了对行动本身的一部分行动的解释。

7. 用一个非常不同的成语, 皮埃尔·布迪厄试图发展一个可以看做是试图把阶级的结构和程序方面结合起来的阶级位置和阶级习惯的理论(见布迪厄, 1985)。这里我们要求的探讨在两个主要方面与布迪厄的不同: 第一, 布迪厄把解释的重点放在阶级习惯的概念上, 而我把解释的首要放在阶级的结构概念上。第二, 布迪厄的阶级概念是根据以利益为基础的群体总的社会构造而构建的; 根本没有关于那些利益的必要内容, 肯定没有把“阶级”利益局限在物质剥削上。我对阶级的使用沿袭了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认为具体阶级是与剥削和物质利益一致的概念。关于布迪厄著作的这些方面的讨论, 参见布鲁贝克(1985)。

8. 像前面几章一样, 在这些分析中所有的雇员中的对立阶级位置合并成一个单独的“中产阶级”位置。所以, 我们将用四个阶级类型对出身和当前工作位置进行分析: 资本家、小资者、中产阶级和工人。因为有关可得到的阶级出身资料的限制, 我用一组比我们在前面的某些分析中稍微简单些的标准限定阶级类型。中产阶级具体地限定为任何这样的人: (a)他的工作正式地包括在管理/监督的等级内或者(b)包括在专业的、管理的或者技术的职业里。标准(a)不如我在前面大部分分析中限定权力的标准精细。阶级出身变量通过关于那个“在你成长过程中对你的家庭提

供资金支持最多的人”的工作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操作。这些问题没有被限制在受访者的具体年龄上,而是限制在受访者成长时期户主的典型工作。实际的标准与受访者自己的阶级位置的标准一样。

9.这种逻辑的好的范例包括邓肯(1966)、诺克(1973)和杰克曼(1972)的研究。关于流动的影响的许多研究,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的研究,没有始终如一地区别出身和归宿对利益成果的相加影响与交互影响。因此,例如,流动的个人有介于乎较低和较高地位的不流动个人的思想意识之间的思想意识的观察用于指明流动性的重要(例如,汤普森1971),而事实上,如果出身和归宿仅以相加的方式影响思想意识,这就是人们企盼的结果。见诺克(1973),对相加和交互影响模型的不同逻辑的一次清楚的讲解。

10.这不是一个多元共线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逻辑构成的问题。假定你创立了一个四个类型的种族性别交互类型。在数学上,把这个类型包括进一个性别或种族的回归方程(以三个虚拟变量的方式)是没有意义的。轨迹模型中的类型就像种族性别交互类型中的分类。

11.原则上,人们想知道关于阶级方面个人认同的两件事:第一,相对其他可能的认同——民族、国家、宗教、地区、性别等等,阶级认同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或显著;第二,个人认同哪个阶级。人们可能说他们处在工人阶级里,但阶级认同对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显著;他们对作为天主教徒、爱尔兰人、足球迷或男性的认同比他们对作为工人的认同更重要。所以,认同形成的全面分析不得不满足于显著性问题,就与满足于阶级内容的问题一样。我们用的变量仅能微弱地应付这个显著性的问题。

12.在第十四和第十五章测量阶级意识的条款中,三条是专门关于阶级利益感知的:第一,条款1(“公司以牺牲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而有益于所有者”)和2(14.1节中)(“罢工期间,法律应该禁止资方雇佣工人以取代罢工者”),再加上第十五章方法附录谈论的关于罢工后果的条款。每个条款的编码1代表支持工人阶级利益的回答(强烈同意或稍微同意李克特尺度中的条款和对罢工结果问题回答类型1),-1代表支持资本主义的回答,0代表中立阶级的回答(李克特尺度的条款中的不知道和第三个变量的类型2)。这些条款加起来构成一个测量尺度,其中+3=纯粹支持工人阶级利益意识和-3=纯粹反对工人阶级利益意识。在作为本章基础的先前出版的著作中(赖特和申光银[译音],1988),构成的第二个测量尺度,涉及第十五章使用的一个6个条款的一因素分析。这里报告的实质性结果没有受到这个更复杂变量的使用的影响。

## 第十七章

1. 在这一环境中“证实”并不意味着“明确证明”一个理论主张，而是为那一主张“明显地增加可信性”。证实一个理论主张总是相对于对立主张而言，而且总是有条件地服从于进一步研究，不是建立绝对“真理”的过程。

2. 标准的用辞不是“在对立假设之间作出裁判”而是“拒斥无效假设”。然而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利用证据为产生于相对于其他理论的某一个理论的一套期望添加可信性。

3. 有关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的重建逻辑问题的系统讨论，参见迈克尔·布劳沃伊(1990, 1993)。

4. 这里所展现的社会理论的观点，通过面临经验挑战中理论重建方式看到了知识的进步。另一种观点则把理论视为完全由“数据”来检验的，而且当数据与理论预测发生矛盾时便说明是虚妄。如果每当数据与理论发生矛盾，社会科学家就否决理论，那么我们将不会留下任何指导我们作研究的理论了。

5. 作为记录，有些计划开始于直接探讨马克思主义对某个问题的阶级分析的分支，但最后都转变成对两种期望作出裁判，以回应社会学杂志的裁判员的批评，他们抱怨说我没严格“检验”对立假设。

6. 这里所提出的总体观点是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应视为包含有种种不同类型的概念：有些纯粹是习惯；有些只是日常语言常识性类别；其他则是系统设计的理想类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是试图根据世界运行的现实机制为给定的概念界定标准的现实主义概念。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总体讨论，参见赖特(1985: 1-3)。

7. 马克思引证了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额外趋势：在资本主义成熟以后，不断增加的生产的资本强度倾向于不断地特别是从工业生产中取代工人。这些工人中有些成为了“劳动力贮备大军”(失业者)中的一部分，有些成为了过剩人口(被边缘化的底层阶级)的一部分。产业工人阶级雇佣的这种减少也间接地由于“中产阶级”雇佣机会的扩大，特别是在国家部门内，尽管马克思本身对这一点并不明确。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倾向肯定使得陈述更加复杂，但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普通的观点是，工人阶级，或许包括劳动力贮备大军，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大。

8. 马克思主义内有些理论思潮由于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定义而描述了一个非常有别于这一标准观点的情景。例如，尼科斯·波兰特扎斯(1975)把工人阶级限定在生产性的、体力的、非监督的劳动力上，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赖特, 1976, 23)，结果工人阶级不到美国劳动力的20%。多数当代马克思主义讨论采纳了少得多的限

制性措辞来定义工人阶级的阶级概念。

9. 这些观察与这个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低工资的服务职业的相对增加以及高工资工厂职位的减少。实际上工人阶级内无产阶级化可能逐渐加深，而作为劳动力整体的无产阶级化程度逐渐减弱。这些结果也没有探讨所谓“底层阶级”——这部分人口经济上受到压迫，却被排除在了资本主义剥削之外——的扩大问题。肯定合理的解释是，劳动力中工人阶级的相对下降的衍生结果之一是“相对过剩人口”的扩大，这部分人口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找不到位置。

10. 这不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生产之中阶级的集体组织逻辑上区别于变化的模式。这些变化因个人的身份和意识而不同。

11. 关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功能主义分析把这些关系以及维持这些关系的观念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沿用科恩(1978)的分析，上层建筑由所有那些非经济现象所构成：(a)对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有影响的现象，(b)由于它们再生产出了经济基础而形成了它们所处形式的现象。第一个标准确立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功能性描述；第二个则确立了功能性解释。

12. 即使人们接受了一个对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强有力的阶级功能主义解释，这仍不意味着这类压迫的消灭以资本主义的消灭为先决条件。资本主义能从功能上解释种族歧视(例如，由于种族歧视分化了工人阶级而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因而发生了种族歧视)，然而种族歧视原则上能在资本主义内被消除，结果是资本主义或者找到种族歧视的功能性替代，或者只是资本主义功能发挥不太充分。除非功能性解释也包括这样一个论点：即不存在功能方面的其他选择而且给定的功能性安排对于所讨论的制度的真正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功能解释不会阻止对独立的性别和种族因果机制的说明。

13. “在任何给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的说明，传达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身将产生腐蚀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压力的观点。因此，统治阶级利用种族和性别压迫来破坏被统治阶级的组织，并通过其他方式再产生资本主义，这总是受到那些压迫形式被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腐蚀的程度的限制。

## 参考文献

- Abbott, Pamela and Geoff Payne (eds.). 1990a. *The Social Mobility of Women: Beyond Male Mobility Models*. London: Falmer Press.
- 1990b. "Women's Social Mobility: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Reconsidered." Pp. 12-24 in Geoff Payne and Pamela Abbot (eds.) *The Social Mobility of Women: Beyond Male Mobility Models*. London: Falmer Press.
- Acker, J. 1973.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4: 936-945.
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 *Gender and Society* 4: 139-158.
- Agresti, Alan. 1984. *Analysis of Ordinal Categorical Data*. New York: Wiley.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 Akerloff, G. A. and J. L. Yellen (eds.). 1986. *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ston, Roland. 1978. "How to Incorporate Yourself and Make it Pay," *Black Enterprise* 8, 9: 37-38, 57.
-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LB.
- Atwood, Margaret. 1987. *The Handmaid's Tal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Barrett, Michele. 1980.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London: Verso.
1984.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A Reply to Brenner and Ramas," *New Left Review* 146: 123-128.
- Baudelot, Christian, Roger Establet and Jacques Malemort. 1974. *La Petite Bourgeoisie en France*. Paris: Maspero.
- Baxter, Janeen and Emily Kane. 1994. "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Inequality and Gender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Norway and Swede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Beach, Charles and James McKinnon. 1978. "A Maximum Likelihood Procedure for Regression with Correlated Errors," *Econometrica* 46: 51-58.
- Bechhofer, Frank and B. Elliott. 1978. "The Voice of Small Busi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Sociological Review* 26: 57-88.
- Bechhofer, Frank and B. Elliott (eds.), 1981.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London: Macmillan.

- Bechhofer, Frank and B. Elliott. 1985.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Late Capit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181-207.
- Beck, E. M., Patrick M. Horan and Charles M. Tolbert II. 1978. "Stratification in a Dual Economy: A Sectoral Model of Earnings Deter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704-720.
- Becker, Eugene H. 1984. "Self-employed Workers: An Update to 1983," *Monthly Labor Review* 107: 7.
- Becker, Gary S.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ennett, J. T. and W. P. Orzechowski. 1983. "The Voting Behavior of Bureaucrat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Public Choice* 41.
- Berk, Sarah. 1979.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Husbands' Household Day." In K. W. Feinstein (ed.) *Working Women and Famili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5. *The Gender Factory: The Apportionment of Work in American Households*. New York: Plenum Press.
- Berk, Sarah and R. A. Berk. 1979. *Labor and Leisure at Hom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Household Day*. Beverly Hills: Sage.
- Berk, Sarah, and A. Shih. "Contribution to Household Labor: Comparing Wives' and Husbands' Reports," in S. Berk (ed.) *Women and Household Labor*. Beverly Hills: Sage.
- Berger, Suzanne. 1981. "The Uses of the Traditional Sector in Italy: Why Declining Classes Survive." Pp. 71-89 in Frank Bechhofer and B. Elliott (eds.) *The Petite Bourgeoisi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Uneasy Stratum*. London: Macmillan.
- Bergman, Barbara. 1986. *The Economic Emergence of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rtaux, Daniel. 1977. *Destins personnels et structure de clas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ielby, William T. and James N. Baron. 1986. "Men and Women at Work: Sex Segreg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759-799.
- Blau, Francine D. and Marianne A. Ferber. 1990. "Women's Work, Women's Liv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Chapter No. 3447. Cambridge.
- Blau, Peter M. 1988. "Structures of Social Positions and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Pp. 43-59 in J. H. Turner (ed.) *Theory Building in Sociology: Assessing Theoretical Cumul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luestone, Barry and Bennet Harrison. 1982.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Blumstein, Philip and Pepper Schwartz. 1984. *American Couples, Money, Work and Sex*. New York: Pocket Books.
- Bögenhold, Dieter. 1985. *Die Selbstständigen. Zur Soziologie dezentraler Produktion*. Frankfurt/Main: Campu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5.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Theory and Society* 14: 723-744.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17.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 London: Sage.
- Bowles, Samuel and Herb Gintis. 1986.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Contested Exchange: New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18, 2: 165-222.
- Bowles, Samuel, David M.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 1990. *After the Wasteland: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New York: M. E. Sharpe.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reen, Richard. 1987. "Sources of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Mobility Regimes: English, French and Swedish Data Reanalysed," *Sociology* 21: 75-90.
- Breen, Richard and Christopher Whelan. 1985. "Vertical Mobility and Class Inheritance in the British Is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175-192.
- Bregger, John E. 1963. "Self-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8-62," *Monthly Labor Review* (January): 37-43.
- Brenner, Johanna. 1989. "Work Rel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Wright, Becker, et. al (1989), 184-190.
- Brenner, Johanna and Maria Ramas. 1984. "Rethinking Women's Oppression," *New Left Review* 144: 33-71.
- Brint, Steven. 1984. "'New-Class' and Cumulative Trend Explanations of the Liberal Political Attitudes of Professiona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1: 31-71.
- Brinton, Mary C. 1988. "The Social-Institutional Bases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Japan as an Illustrative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2 (September): 300-334.
- Brinton, Mary and Hang-Yue Ngo. 1991. "Occupational Sex-Segreg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rowning, Harley L. and Joachim Singleman. 1978.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Labor Force: The interaction of Industry and Occupation," *Politics &*

- Society* 8, 3-4: 481-509.
- Brubaker, Rogers.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 6 (November): 745-775.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0. "Marxism as Science: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6: 775-793.
1992. *The Radiant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Ethnography Unbou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and Erik Olin Wright. 1990. "Coercion and Consent in Contested Exchange," *Politics & Society*, June, reprinted in Wright (1994), chapter 4.
- Burris, Val. 1987. "The Neo-Marxist Synthesis of Marx and Weber on Class," in N. Wiley (ed.) *The Marx-Weber Debate*.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Burt, Ronald. 1983. *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 Network of Market Constraints and Directorate T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app, Al. 1992. *Li'l Abner*, vol. 14: 1948.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 Carchedi, G. 1977.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atalyst. 1990. *Wo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Results of a Catalyst survey*.
-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1940.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 [Machine-readable Datafile] / Prepared by the Bureau of the Census. Washington, DC: The Bureau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 1983.
1950.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 [Machine-readable Datafile] / Prepared by the Bureau of the Census. Washington, DC: The Bureau [Producer and Distributor], 1983.
- Centers, Richard. 1949.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lmers, Norma. 1989.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The Peripheral Workfor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ant, David and Mark Western. 1991. "The Analysis of Mobility Regimes: Implementation Using SAS Procedures and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256-286.
- Charles, Maria. 1992.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August): 483-502.
- Charles, Nicola. 1990. "Women and class - a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Sociological Review* 38: 43-89.
- Chase, Ivan D. 1975. "A Comparison of Men's and Women'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483-505.



-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nk, Margo. 1979.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 A History of Occupation Statistics*.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 Costello, C. 1991. *We're Worth It: Women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surance Workplace*.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overman, Shelley. 1985.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 1: 81-97.
- Cowan, Ruth Schwartz.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s: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Crossick, Geoffrey. 1978. *An Artisan Elite in Victorian Society. Kentish London 1840-1880*. London: Croom Helm.
- Curran, James and Roger Burrows. 1986. "The Sociology of Petit Capitalism: A Trend Report," *Sociology* 20, 2: 265-279.
- Currie, Elliott and Jerome H. Skolnick. 1983. *America's Problems: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 Curtis, J. 1963.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Urban Community," *Social Forces* 42: 68-77.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ahrendorf, Ralf, P. Fedoseyev, U. Himmelstrand, R. Richta, Y. Singh, A. Touraine, K. Tsurami. 1977.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Social Aspe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Dale, Angela. 1986. "Social Class and the Self-Employed," *Sociology* 20, 3: 430-434.
- Daly, Patricia. 1982. "Unpaid Family Workers: Long-term Decline Continues," *Monthly Labor Review* (October): 3-5.
- Delphy, Christine. 1984.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 Diprete, Thomas A. and T. Whitman Soule. 1988. "Gender and Promotion in Segmented Ladder Syst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February): 26-40.
- Dohse, Knuth, Ulrich Jurgens and Thomas Malsch. 1985. "From 'Fordism' to 'Toyot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Japa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Politics & Society* 14, 2: 115-146.
- Domhoff, G. William. 1971. *The Higher Circl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ore, Ronal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G. J. and S. D. Hoffman. 1985.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Demography* 22, 4: 485-497.
- Duncan, Otis Dudley. 1966.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 Mobility." In N. J. Smelser and S. M. Lipset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cago: Aldine.
- Dunton, Nancy and David L. Featherman. 1983.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Marriage and Through Careers: Achievement Over the Life Course." Pp. 285-320 in Janet T. Spence (ed.) *Achievement and Achievement Motives: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Edwards, Meredith. 1982. "Financial Arrangements Made by Husbands and Wives: Findings of a Surve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18: 320-338.
-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s, Frederick. 1968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Reprinted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455-593.
- Erikson, Robert. 1984. "Social Class of Men, Women and Families," *Sociology* 18: 500-514.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85. "Are American Rates of Social Mobility Exceptionally High? New Evidence on an Old Issu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22.
- 1987a. "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Part I: A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FJH hypothe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54-77.
- 1987b. "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Part II: The Model of Core Social Fluidity Applie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 145-166.
1993. *The Constant Flu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ne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415-441.
1982.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34.
1983.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and the Convergence Thesi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303-343.
- Esping-Anderson, Go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on, Gosta, Roger Friedland and Erik Olin Wright. 1976. "Modes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Kapitalistate* 4.
- Eurostat. 1980 and 1985.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OECD.
- Fain, T. Scott. 1980. "Self-employed Americans: Their Number Has Increased," *Monthly Labor Review* (November): 3-8.
- Farkas, George. 1976. "Education, Wage Rat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8: 473-483.

- Featherman, David and Robert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Frank L. Jones and Robert M. Hauser. 1975. "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 329-360.
- Feld, Scott L. 1981. "The Focussed Organization of Social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015-1035.
- Fenstermaker, Deborah. 1985. "Changes in Estimation Procedure in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eginning in January 1985,"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January).
- Fierman, Jaclyn. 1990. "Why Women Still Don't Hit the Top," *Fortune* 122, 3: 40.
- Folbre, Nancy. 1994. *Who Pays for the Kids? Gender and the Structures of Constraint*. New York: Routledge.
- Fraad, Harriet, 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1994.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Class,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Household*. London: Pluto Press.
- Fraser, Nancy. 1993. "After the Family Wage: What Do Women Want in Social Welfa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Froebel, Folker, Jurgen Heinrichs and Otton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chs, Victor R. *The Service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Fujita, Wakao. 1973. "Labor Disputes," in Kazuo Okochi, Bernard Karsh and Solomon B. Levine (eds.)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Japan: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System*.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 Gaillie, Duncan. *In Search of the New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Ganzeboom, Harry, Ruud Luijckx and Donald Treiman.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3-84 i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VIII, edited by Arne L. Kalleberg. Greenwich: JAI Press.
- Ganzeboom, Harry, Donald Treiman and Wout Ultee. 1991.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77-302.
- Gardiner, Jean. 1975. "Women's Domestic Labour." *New Left Review* 89 (January-February): 47-58. Reprinted in Z.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Garland, Susan. 1991. "Throwing Stones at the Glass Ceiling," *Business Week*,

- August 19: 29.
- Geerken, M. and W. R. Gove. 1983. *At Home and at Work: The Family' Allocation of Labor*. Beverly Hills: Sage.
- Geiger, Theodor. 1932.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Enke Verlag.
- Gellately, Robert. 1974.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spair. Shopkeepers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14*. London.
- Germany,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72. *Bevölkerung und Wirtschaft 1872-1972*. Stuttgart.
- Gerth, Hans and C. W. Mills. 1958.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insberg, Norman. 1992. *Divisions of Welfa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London: Sage.
- Glenn, Evelyn Nakano.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Work," *Signs* 18, 11: 1-43.
- Gnanaskaran, K. S. 1966. "Inter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Changes in Manpower, United States, 1950-1960." Analytical and Technical Report No. 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 Goldberg, Gertrude Schaffner and Eleanor Kreman (eds.). 1990.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nly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 Goldthorpe, John.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 465-488.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the Replies," *Sociology* 18: 491-499.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t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 Goldthorpe, John H. and Clive Payne. 1986. "On the Class Mobility of Wome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Recent British Data," *Sociology* 20: 531-555.
- Goodman, Leo A. 1979. "Simpl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Association in Cross-Classifications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4: 537-552.
1984.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Having Ordered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Gordon, Andrew. 1985. *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Heavy Industry, 1853-1955*.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Gordon, David M. 1994. "Bosses of Different Stripes: A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 (May).
- Gorz, Andre. 1967. *Strategy for Labor*. Boston: Beacon Press.
- Gouldner, Alvin.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Gramlich, Edward M. and Daniel L. Rubinfeld. 1980. *Public Employment, Voting and Spending Tast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nn Arbor, MI: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Grandjean, Burke D. 1981. "History and Career in a Bureaucratic Labor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1057-1092.
-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Grusky, D. B. and R.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19-38.
- Haas, Linda. 1981. "Domestic Role Sharing in Swed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November): 955-967.
- Halaby, Charles. 1979. "Job Specific Sex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Reward Attainment: Wage Discrimination vs. Rank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58: 108-127.
- Halaby, Charles and Michael Sobel. 1979. "Mobility Effects in the Work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2: 385-416.
- Halaby, Charles and David Weakliem. 1993. "Ownership and Authority in the Earnings Fun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1 (February): 16-30.
- Hartmann, Heidi. 1979a.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apital & Class* 8: 1-33.
- 1979b.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Pp. 206-247 in Zillah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R Press.
1981. "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 *Signs* 3: 311-394.
1987.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Gender: A Case Study of Promotion." Pp. 59-92 in Clair Brown and Joseph A. Pechman (eds.) *Gender in the Workpla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aupt, Heinz-Gerhard. 1985. *Die Radikale Mitte. Lebensweise und Politik von Handwerkerkern und Kleinhändlern in Deutschland seit 1848*. Munich: DTV.
- Hauser, R.M. 1981.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Cross-Classifications of Mobility, Kinship, and Friendship," *IHS Journal* 5: 1-51.
1984. "Vertical Class Mobility i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7: 87-110.
- Hauser, Robert M. and David B. Grusky. 1988.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s, Relative Mobility Chanc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hifts in Occupational Distrib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723-741.
- Hayes, Bernadette. 1990.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Employed and Non-employed Women: The Australian Cas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26: 368-388.
- Heath, A. and N. Brittain. 1984. "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 A Reply to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4: 475-490.
- Hill, Martha. 1980. "Authority at Work: How Men and Women Differ." Pp. 107-146 in Greg J. Duncan and James Morgan, *Five Thousand American Families*, vol. 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irschhorn, Larry. 1984.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Cambridge: MIT Press.
- Hoff, Jens. 1985. "The Concept of Class and Public Employees," *Acta Sociologica* 28: 3.
- Hoffman, Walther G. 1965.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Springer Verlag.
- Holland, Paul W. and Samuel Leinhardt. 1973. "The Structural Implications of Measurement Error in Sociometry,"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3: 85-111.
- Hollingshead, August B. 1949. *Emlstown's Youth*. New York: John Wiley.
- Hood, Jane C. 1983. *Becoming a Two-job Family*. New York: Praeger.
- Hout, Michael. 1983. *Mobility Tables*.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Status, Autonomy and Training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1379-1409.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358-1400.
1989. *Following in Father's Footsteps: Social Mobility in Ire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ut, Michael and Robert M. Hauser. 1991. "Symmetry and Hierarchy in Social Mobility: A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ASMIN Model of Class Mobility." CDE Working Paper 92-5, 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Hout, Michael and John A. Jackson. 1986.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114-137.
- Howe, Carolyn. 1987.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Form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Huber, Joan and G. Spitze. 1983. *Sex Stratification: Children, Housework and Job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uckfeldt, R. R. 1983. "Social Contexts, Social Networks, and Urban Neighbor-

- hoods: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Friendship Choi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651-669.
- Huff, D. L. and L. A. Sperr. 1967. "Measures for Determining Differential Growth of Marke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 391-395.
- Humphries, Jane. 1977.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Famil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 3: pp. 241-258.
- Ichiyo, Muto. 1986. "Class Struggle in Postwar Japan." In G. McCormack and Y. Sugimoto (eds.)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Japan*. London: M. E. Sharpe.
- Institute for Lab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82. *What's Wrong with the US Econom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1992. *The 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51st ed.
- Ishida, Hiroshi, John H. Goldthorpe and Robert Erikson. 1991.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Postwar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954-992.
- Jackman, Mary. 1972.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ly Mobile in Italy: A Re-Examina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April): 213-222.
- Jackman, Mary R. and Robert W. Jackman. 1983.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ckson, R. M. 1977.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Friendship Choice." In C. S. Fischer, R. M. Jackson, C. A. Stueve, K. Gerson (eds.)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 Jacobs, Jerry A. 1989. *Revolving Doors. Sex Segregation and Women's Caree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Women's Entry into Management. Trends in Earnings, Authority and Values Among Salaried Manager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282-301.
- Jaffee, David. 1989. "Gender Inequality in Workplace Autonomy and Authorit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0, 2. (June): 375-390.
- Jefferson, Thomas. 1786. [1984] *Writing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iking Press.
- Jenkins, Robert M. 1988. *Procedural History of the 194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Jenson, Jane, Elizabeth Hagen and Cellaigh Reddy (eds.). 1988. *Femin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Paradoxes and Promises*. Oxford: Polity.
- Jones, Frank L. and Peter Davis. 1986. *Models of Society: Class, Gender and Stratificat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ydney: Croom Helm.
- 1988a. "Class Structuration and Patterns of Social Closur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ociology* 22: 271-291.
- 1988b. "Closure and Fluidity in the Class Structure,"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24: 226-247.
- Joppke, Christian. 1986.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ass Formation and

- Class Struggle: on the Social Theory of Pierre Bourdieu,"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53-78.
- Kalleberg, Ahnne and Rachael Rosenfeld. 1990. "Work in the Family and in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May): 331-346.
- Kamata, Satoshi. 1982. *Japan in the Passing Lane*. New York: Pantheon.
- Kanter, Rosabeth Moss.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tzenstein, Mary Fainsod. 1987. "Comparing the Feminist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Mary Fainsod Katzenstein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 *The Women's Mov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itagawa, E. 1955. "Components of a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0: 1168-1174.
- Knoke, David. 1973.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Preferences of 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1448-1468.
- Kohn, M. 1969. *Class and Conformity*. Holmwood: The Dorsey Press.
- Kurz, Karin and Walter Muller. 1987. "Class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417-442.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 Ladd, Everett. Jr. 1979. "Pursuing the New Class: Social Theory and Survey Data." Pp. 101-122 in Bruce Briggs (ed.) *The New Clas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 Laumann, Edward O. 1966. *Prestige and Association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Lerner, Gerda. 1986.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uifsrud, Hakon and Alison Woodward. 1987. "Women at Class Crossroads: Repudiating Conventional Theories of Family Class," *Sociology* 21: 393-412.
- Lewis, Jane. 1985. "The Debate on Sex and Class," *New Left Review* 149: 108-120.
- Lincoln, Abraham. 1907 [1865]. *Life an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Centenary Edition*, Marion Mills Miller (ed.). New York: Current Literature.
- Linder, Marc. 1983. "Self-Employment as a Cyclical Escape from Un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Work: Peripheral Workers* 2: 261-274.
- Lipset, S. M. and H. Zetterberg.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p. 11-75 in Seymour M. Lipset and Reinhardt H. Bendix (eds.)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ukacs, George. 1971 [1922].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IT Press.
- Maddala, G. S. 1983.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etr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llet, Serge. 1963. *La nouvelle class ouvriere*. Paris: Seuil.
- Manski, Charles F. 1989. "Anatomy of the Selection Problem,"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4, 3 (Summer): 343-360.
- Mare, Robert D. 1986. "Further Evidence on Sibship Size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03-412.
- Marsh, A., P. Heady and J. Matheson. 1981. *Labour Mobi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London: HMSO.
- Marshall, Gordon. 1983. "Some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Politics & Society* 12, 3: .263-302.
- Marshall, Gordon, David Rose, Howard Newby and Carolyn Vogler. 1988.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 Mayer, Nonna. 1977. "Une filière de mobilité ouvrière: l'accès à la petite entreprise artisanale et commercia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8: 25-45.
- McGuire, Gail M. and Barbara Reskin. 1993. "Authority Hierarchies at Work: The Impacts of Race and Sex," *Gender and Society* 7, 4: 487-506.
- McLanahan, Sara, Annemette Sorensen and Dorothy Watson.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Poverty, 1950-80," unpublished paper.
- McRae, Susan. 1986. *Cross-Class Families: a Study of Wives' Occupational Superior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eissner, M., E. W. Humphreys, S. M. Meis and W. J. Sheu. 1975. "No Exit for Wives: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ousehold Demand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2: 424-439.
- Milkman, Ruth. 1987. *Gender at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ishel, Lawrence and David Frankel. 1991.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New York.
- Moen, Phyllis. 1989. *Working Parents: Transformations in Gender Role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Swede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olyneux, Maxine. 1979. "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 *New Left Review* 116: 3-27.
- Morgan, J. M., I. A. Sirageldin, and N. Baerwaldt. 1971. *Productive Americans*. 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Morrison, Ann M., R. P. White, E. Van Velsor, and the Center for Creative Leadership. 1987.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 Morrison, Ann M. and Mary Ann Von Glinow. 1990.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Manage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200-208.
- Nahemow, L. and M. P. Lawton. 1975. "Similarity and Propinquity in Friendship 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205-213.

- Nash, June. 1983. "The Impact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n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Labor Force." In June Nash and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eds.)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ash, June and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eds.) 1983.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ational Committee on Pay Equity. *Closing the Wage Gap: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ttee on Pay Equity.
- O'Connor, James.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OECD. 1977.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Some Implications of Japanese Experience*. Paris: OECD.
- Offe, Claus. 1974.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C. von Beyme (ed.) *Germ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I. Russel Sage.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 Ollman, Bertell. 1986. "How to Study Class Consciousness," chapt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August.
- Ossowski, Stanislaw. 1963.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ahl, Jan. 1983. "The Allocation of Money and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within Marriage," *Sociological Review* 31: 313-335.
- Pahl, R. E. 1984. *Divisions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G. and A. Miller. 1949.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Trends in National Employment*. Industrial Research Department.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Parkin, Frank. 1974. "Strategies of Social Closure in Class Formation." In Frank Parkin (ed.) *The Social Analysis of the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yne, Geoff and Pamela Abbott (eds.). 1990. *The Social Mobility of Women: Beyond Male Mobility Models*. London: Falmer Press.
- Perloff, H., E. S. Dunn Jr., E. E. Lampard and R. F. Muth. 1960. *Regions,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Philips, Joseph D. 1962. "The Self-Emplo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Bulletin* 59, 91: 1-100.
- Pindyck, Robert S. and Daniel L. Rubinfeld. 1981.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Economic Forecasts*. New York: McGraw-Hill.
- Piore, Michael and Charles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 Pleck, Joseph. 1985. *Working Wives/Working Husbands*. Beverly Hills: Sage.
- Portocarero, Lucienne. 1983a.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Sociological Review* 31: 56-82.

- 1983b. "Social Fluidity in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6: 127-139.
- Poulantzas, Nicos.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Presser, Harriet B. and Virginia S. Cain. 1983. "Shift Work Among Dual-Earner Couples with Children," *Science* 219: 876-879.
-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John Sprague. 1985.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ublic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3. Book 1.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 Rainey, Hal, Carol Traut and Barrie Blunt. 1986. "Reward Expectancies and Other Work-Related Attitudes i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A Review and Extension,"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8, 3: 50-72.
- Ray, Robert N. 1975. "A Report on Self-employed Americans in 1973," *Monthly Labor Review* (January): 49-54.
- Reich, Robert.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 Reinerman, Craig. 1987. *American States of Mind: Political Beliefs and Behavior Among Private and Public Work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skin, Barbara 1984. (ed.) *Sex Segregation in the Workplace: Trends, Explanations, Remed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Reskin, Barbara. 1988. "Bringing Men Back In: Sex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Devaluation of Women's Work," *Gender and Society* 2, 1: 58-81.
- Reskin, Barbara and Heidi Hartmann. 1986. *Women's Work, Men's Work: Sex Segregation on the Job*.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Reskin, Barbara and Lrene Padavic. 1994. *Women and Men at Work*.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Reskin, Barbara and Catherine Roos. 1992. "Jobs, Authority and Earnings Among Managers: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Sex," *Work and Occupations* 19, 4 (November): 342-365.
- Resnick, S. and R. Wolfe. 1988. *Knowledge and Cl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hta, Radovan and a Research Team. 1968.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zechoslovakia: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 Robinson, J. P. 1977. *How Americans Used Time in 1965*. New York: Praeger.
- Robinson, John, Vladimir G. Andreyenkov and Vasily D. Patrushev. 1988. *The Rhythm of Everyday Life: How Soviet and American Citizens Use Tim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Robinson, R. and J. Kelley. 1979. "Class as Conceived by Marx and Dahrendorf,"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209-234.

-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hould Marxists be Interested in Exploitat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 30-65. Reprinted in John E.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ogers, Joel. 1990. "Divide and Conquer: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American Labor Laws," *Wisconsin Law Review* 1, 1: 1-147.
- Roos, Patricia. 1981. "Sex Stratification in the Workplace: Male-female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Returns to Occup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0: 195-224.
1985. *Gender and Wor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senbaum, James E. 1984. *Career Mobility in a Corporate Hierarch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osenfeld, Rachel A. and Anne L. Kalleberg. 1990.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Gender Gap in Inc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69-106.
- Ruggie, M. 1984. *The State and Working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itain and Swe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Gender, Work and Social Progress: Some Consequences of Interest Aggregation in Sweden." In Jane Jenson, Elizabeth Hagen and Cellaigh Reddy (eds.) *Femin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Paradoxes and Promises*. Oxford: Polity.
- Ryan, William. 1981. *Eq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 Scandura, Terri I. 1992.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in the 1990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Washington, DC.
- Secombe, Walley. 1974.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3 (January-February): 3-24.
- Seeman, Melvin. 1977. "Some Real and Imaginary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bility: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4: 757-782.
- Sen, Amartya. 1984. "Family and Food: Sex Bias in Poverty." In Amartya Sen,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Blackwell, 1984.
- Shelton, Beth and Ben Agger. 1993. "Shotgun Wedding, Unhappy Marriage, No-Fault Divorce? Rethinking the Feminism-Marxism Relationship." Pp. 25-42 in Paul England (ed.) *Theory on Gender / Feminism on Theor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Singelmann, Joachim. 1978. *From Agriculture to Servic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Sorensen, Annemette and Sara McLanahan. 1987. "Married Women's Economic Dependency, 194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3: 659-687.

- Sorokin, Pitirim A. 1929.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Harper.
- Spaeth, J. L. 1985. "Job Power and Earning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603-617.
- Stanworth, Michelle.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159-170.
- Steinmetz, George. 1983. *Economic Crisis and Collective Action: Working-Class Protest Against Unemployment in Paris During the 1880s*. M.S.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Steinmetz, George and Erik Olin Wright. 1989.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5 (March) 973-1018.
- Stephens, John. 1979.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Stier, Haya and David Grusky. 1990. "An Overlapping Persistence Model of Career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736-756.
- Stolzenberg, Ross M. and Daniel A. Relles. 1990. "Theory Testing in a World of Constrained Research Desig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8, 4 (May): 395-415.
- Strasser, Susan. 1982. *Never Done: A History of American Housework*. New York: Pantheon.
- Strober, Myra and Carolyn L. Arnold. 1987. "The Dynamic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mong Bank Tellers." Pp. 107-148 in Clair Brown and Joseph A. Pechman (eds.) *Gender in the Workplac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zalai, Alexander. 1966a. "The Multi-national Comparative Time Budget Research Project: A Venture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operation,"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0: 1-30.
- 1966b. "Trends in Comparative Time Budget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 3-8.
- Szalai, Alexander, P. E. Converse, P. Feldheim, E.K. Scheuch and P. F. Stone (eds.) 1972. *The Use of Time: Daily Activities of Urban and Suburban Populations in Twelve Countries*. The Hague: Mouton.
- Szelenyi, Ivan and William Martin. 1985. *New Class Theory and Beyond*. Unpublished book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 Szymanski, Albert. 1983. *Class Structu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 Taylor-Gooby, Peter. 1985. "Personal Consumption and Gender," *Sociology* 19: 273-284.
- Therborn, Göran. 1982. *The Power of Ideology and the Ideology of Power*. London: Verso.
-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Thompson, Kenneth H. 1971.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A Re-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April): 223-235.
- Touraine, Alain. 1971.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Toutain, J.-C. 1963.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In *Histoire quantitativ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vol. III, in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e*. Paris: ISEA.
- Treiman, Donald and Heidi Hartmann. 1981. *Women, Work and Wag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Treiman, Donald and Patricia Roos. 1983. "Sex and Earnings in Industrial Socie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612-650.
- Tsuda, Masumi. 1973.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at the Industrial Plant Level." In K. Okochi, B. Karsh and S. B. Levine (eds.)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Japan: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Relations System*.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Tyree, Andrea and Judith Treas. 1974. "The Occupational and Marital Mobility of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293-302.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40. *Instructions to Enumerators.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1940*. Washington: Bureau of the Census.
- Van Parijs, P. 1986. "A Revolution in Class Theory," *Politics & Society*. Reprinted in Wright et al. (1989), 213-242.
- Van Regemorter, Denise. 1981. "Evolution du nombre et du revenu des commerçants et des artisans de 1953 à 1977," *Cahiers économiques de Bruxelles* 89.
- Vanek, J. 1974. "Time Spent in Housework," *Scientific American* 231: 116-120.
- Verbrugge, L. M. 1977. "The Structure of Adult Friendship Choices," *Social Forces* 56: 576-597.
1979. "Multiplexity in Adult Friendships," *Social Forces* 57: 1286-1309.
- Vogel, Ezra F. 1979. *Japan as No. 1: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lko v, Shulamit. 1978. *The Rise of Popular Antimodernism in Germany. The Urban Master Artisans, 1873-189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Kathryn. 1970. "Time Used by Husbands for Household Work," *Family Economics Review* 4: 8-11.
- Walker, Kathryn, and Margaret Woods. 1976. *Time Use: A Measure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
- Warren, Bill. 1978.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Watson, Dorothy. 1990. "Dimensions of Class: the Impact of Interests, Workplace Experiences and Network Ties on Class Consciousness in Four Western Democraci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Weiss, Linda. 1984. "The Italian State and Small Business," *Archives Eur-*

- opéennes de Sociologie* 25: 214–241.
- Westergaard, John and Henrietta Resler. 1975. *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Brita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Western, Mark and Erik Olin Wright. 1994. "Th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orway and Swed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4: 606–629.
- Wilson, Franklin D., Marta Tienda and Lawrence Wu. 1992. "Racial Equa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Still an Elusive Goal?" Discussion chapter no. 968–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2.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1972.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 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Cologne: Kiepenhauer & Witsch.
- Wolf, Wendy C. and Neil D. Fligstein. 1979a. "Sex and Authority in the Workplace: The Causes of Sexual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April): 235–252.
- 1979b. "Sexual Stratification: Differences in Power in the Work Setting," *Social Forces* 58, 1 (September): 94–107.
- Wong, Raymond Sin-Kwok. 1990. "Understand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560–573.
1992. "Vertical and Non-Vertical Effects in Class Mobility: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396–410.
- Wright, Erik Olin. 1976. "Class Boundari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New Left Review* 98 (July–August): 3–41.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6.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erged Multi-Nation File: United States Survey, 1980, Sweden Survey, 1980, Norway Survey, 1982, Canada Survey, 1983, Finland Survey, 1981* [Machine-Readable Data Fil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Erik Olin Wright. ICPSR e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Producer], 1986, Madison, WI: Distributor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or], 1986. Ann Arbor, MI.
- 1989a.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Pp. 269–348 in Wright, et al. (1989).
- 1989b. "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35–66.
- 1989c. *Comparative Project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RDF]. Madison, WI: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producer].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

- butor].
- 1989d. "The Comparative Project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n Overview," *Acta Sociologica* 32, 1: 3-22.
1993. "Typologies, Scales and Class Analysis: A Comment on Halaby and Weakli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1 (February): 31-34.
1994.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lin and Bill Martin. 1987.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 (July).
- Wright, Erik Olin and Kwang-Yeong Shin. 1988. "Temporality and Class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Class Trajec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ical Theory* (Spring).
- Wright, Erik Olin and Joachim Singelmann. 1982. "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Michael Burawoy and Theda Skocpol (eds.) *Marxist Inquiries,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 Wright, Erik Olin, Carolyn Howe and Donmoon Cho. 1989.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Formation." In Melvin Kohn (ed.), *Comparative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Sage ASA Presidential Volume.
- Wright, Erik Olin, Andrew Levine and Elliott Sober. 1992.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k Olin, Cynthia Costello, David Hachen and Joey Sprague. 1982.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December).
- Wright, Erik Olin, Uwe Becker, Johanna Brenner, Michael Burawoy, Val Burris, Guglielmo Carchedi, Gordon Marshall, Peter Meiksins, David Rose, Arthur Stinchcombe, Phillippe Van Parijs. 1989.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 Wuthnow, Robert and Wesley Schrum. 1983. "Knowledge Workers as a New Class," *Work and Occupations* 10, 4: 471-487.
- Xie, Yue. 1992. "The Log-Multiplicative Layer Effect Model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380-395.
- Yamaguchi, Kazuo. 1987. "Models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Toward Parsimony and Sub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482-494.
- Yearbook of Labor Statistics. 1986. Japan: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Minister's Secretariat, Ministry of Labor.
- Zaretsky, Eli. 1976.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 人名对照表

## A

阿博特, 帕梅拉 Abbott, Pamela  
阿尔斯顿, 罗兰 Alston, Roland  
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 Atwood,  
Margaret  
埃尔斯特, 乔恩 Elster, Jon  
埃里克逊, 罗伯特 Erikson, Robert  
埃斯平-安德森, 戈斯塔 Esping-  
Anderson, Gosta  
埃斯塔博雷特, 罗杰 Establet, Roger  
艾格尔, 本 Agger, Ben  
艾格雷蒂, 艾伦 Agresti, Alan  
艾克, 琼 Acker, Joan  
艾克罗夫, G. A Akerloff, G. A.  
艾略特, B. Elliot, B.  
爱德华兹, 梅雷迪斯 Edwards,  
Meredith,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 Emerson,  
Ralph Waldo  
安德烈延科夫, 弗拉基米尔 Andreyen-  
kov, Vladimir  
奥弗, 克劳斯 Offe, Claus  
奥康纳, 詹姆斯 O' Connor, James  
奥热霍夫斯基, W.P. Orzechowski,  
W.P.  
奥瑟尔, 路易斯 Althusser, Louis

奥索斯基, 斯坦尼斯瓦夫 Ossowski,  
Stanislaw

## B

巴克斯特, 贾宁 Baxter, Janeen  
巴雷特, 米歇尔 Barrett, Michele  
巴伦, 詹姆斯 Baron, James  
鲍德罗特, 克里斯汀 Baudelot,  
Christian  
鲍尔斯, 塞缪尔 Bowles, Samuel  
贝尔, 丹尼尔 Bell, Daniel  
贝克, E. M Beck, E. M.  
贝克尔, 加里 Becker, Gary  
贝内特, J. T Bennet, J. T.  
本简霍德, 黛尔特尔 Bgenhold,  
Dieter  
比彻霍费尔, 弗兰克 Bechhofer,  
Frank  
比尔必, 威廉 Bielby, William  
比曲, 查尔斯 Beach, Charles  
波兰特扎斯, 尼科斯 Poulantzas,  
Nicos  
波托卡雷罗, 卢西尔内 Portocarero,  
Lucienne  
伯格曼, 巴巴拉 Bergman, Barbara  
伯杰, 苏珊娜 Berger, Suzanne

伯克, R. A. Berk, R. A.  
 伯克, 萨拉 Berk, Sarah  
 伯洛斯, 罗杰 Burrows, Roger  
 伯陶克斯, 丹尼尔 Bertaux, Daniel  
 伯特, 罗纳德 Burt, Ronald  
 博里斯, 瓦尔 Burris, Val  
 布迪厄, 皮埃尔 Bourdieu, Pierre  
 布兰特, 巴里 Blunt, Barrie  
 布朗宁 Browning  
 布劳, 彼得 Blau, Peter  
 布劳, 弗兰森 Blau, Francine  
 布劳沃伊, 迈克尔 Burawoy, Michael  
 布雷格尔, 约翰 Bregger, John  
 布雷内尔, 约翰娜 Brenner, Johanna  
 布雷维尔曼, 哈里 Braverman,  
 Harry  
 布里特恩, N. Brittain, N.  
 布林, 理查德 Breen, Richard  
 布林顿, 玛丽 Brinton, Mary  
 布林特, 史蒂文 Brint, Steven  
 布卢姆斯汀, 菲利普 Blumstein, Philip  
 布卢斯顿, 巴里 Bluestone, Barry  
 布鲁贝克尔, 罗杰斯 Brubaker,  
 Rogers

## C

查尔斯, 玛丽亚 Charles, Maria,  
 蔡斯, 伊凡 Chase, Ivan

## D

达伦多夫, 拉尔夫 Dahrendorf, Ralf  
 戴尔, 安格拉 Dale, Angela  
 戴利, 帕特里夏 Daly, Patricia  
 戴维斯, 彼得 Davis, Peter  
 丹顿, 南希 Dunton, Nancy  
 德尔菲, 克里斯汀 Delphy, Christine

邓肯, 奥蒂斯·达德利 Duncan, Otis  
 Dudley  
 迪普雷特, 托马斯 Diprete, Thomas  
 蒂锐, 安德雷 Tyree, Andrea  
 多尔, 罗纳德 Dore, Ronald  
 多姆霍夫, 威廉 Domhoff, William  
 多斯, 努丝 Dohse, Knuth

## E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ederick

## F

法卡斯, 乔治 Farkas, George  
 范·里格摩特, 丹尼斯 Van Rege-  
 mortar, Denise  
 范·帕里吉斯, 菲利普 Van Parijs,  
 Philippe  
 菲利普斯, 约瑟夫 Philips, Joseph  
 费恩, T. 司各特 Fain, T. Scott  
 费尔曼, 贾克琳 Fierman, Jaclyn  
 费尔南德斯-凯利, 帕特里夏 Fernan-  
 dez-Kelly, Patricia  
 费尔特, 司各特 Feld, Scott  
 费舍曼, 大卫 Featherman, David  
 弗伯尔, 玛丽安娜 Ferber, Marianne  
 弗兰克尔, 大卫 Frankel, David  
 弗雷埃德, 哈丽特 Fraad, Harriet  
 弗雷泽, 南希 Fraser, Nancy  
 弗利格斯顿, 尼尔 Fligstein, Neil  
 弗罗贝尔, 弗尔克 Froebel, Folker  
 富曲斯, 维克托 Fuchs, Victor

## G

冈泽布姆, 哈里 Ganzeboom, Harry  
 高乌, W.R. Gove, W.R.

戈德堡, 格特鲁德·沙夫纳 Goldberg,  
Gertrude Schaffner

戈德西尔帕, 约翰 Goldthorpe, John

戈登, 安德鲁 Gordon, Andrew,

戈登, 大卫 Gordon, David

格兰得简, 伯克 Grandjean, Burke

格兰诺卫特, 马克 Granovetter, Mark

格雷姆里奇, 爱德华 Gramlich,

Edward

格鲁司吉, 大卫 Grusky, David,

格伦, 伊夫林·南卡诺 Glenn, Evelyn

Nakano

格南纳瑟卡伦, K. S. Gnanasekaran,

K. S.

古德曼, 利奥 Goodman, Leo

## H

哈克费尔德特, R.R. Huckfeldt,  
R. R.

哈拉比, 查尔斯 Halaby, Charles

哈里森, 贝内特 Harrison, Bennet

哈斯, 琳达 Haas, Linda

哈特曼, 海地 Hartman, Heidi

海斯, 伯纳黛特 Hayes, Bernadette

汉弗里斯, 简 Humphries, Jane

豪, 卡罗琳 Howe, Carolyn

豪帕特, 亨兹-杰哈德 Haupt,

Heinz-Gerhard

豪特, 迈克尔 Hout, Michael

赫迪, P. Heady, P.

赫斯, A. Heath, A.

胡德, 简 Hood, Jane

胡夫, D. L. Huff, D. L.

惠兰, 克里斯托弗 Whelan Christo-  
pher

霍夫, 詹斯 Hoff, Jens

霍夫曼, 沃尔特 Hoffman, Walter

霍兰德, 保罗 Holland, Paul

霍雷恩, 帕特里克 Horan, Patrick

霍林谢德, 奥古斯特 Hollingshead,  
August

霍瑟, 罗伯特 Hauser, Robert

## J

基塔格娃, E. Kitagawa, E.

吉登斯, 安东尼 Giddens, Anthony

吉雷特利, 罗伯特 Gellately, Robert

加德纳, 简 Gardiner, Jean

加格尔, 西奥多 Geiger, Theodor

加兰, 苏珊 Garland, Susan

贾菲, 大卫 Jaffe, David

杰克肯, M. Geerken, M.

杰斐逊, 托马斯 Jefferson, Thomas

杰克曼, 罗伯特 Jackman, Robert

杰克曼, 玛丽 Jackman, Mary

杰克逊, R.M. Jackson, R.M.

杰克逊, 约翰 Jackson, John

杰斯, 汉斯 Gerh, Hans

津田益美 Tsuda, Masumi

金蒂斯, 赫伯特 Gintis, Herbers

金斯博格, 诺曼 Ginsburg, Norman

詹金斯, 罗伯特 Jenkins, Robert

## K

卡岑施泰因, 玛丽·芬索德 Katzen-  
stein, Mary Fainsod,

卡彻迪, 古列尔莫 Carchedi, Gug-  
lielmo

卡弗曼, 谢莉 Coverman, Shelley

卡帕, 艾尔 Capp, Al

凯勒博格, 阿尔纳 Kalleberg, Ahrne

凯利, J. Kelley, J.

康克, 玛戈 Conk, Margo  
 考万, 露丝·施瓦兹 Cowan, Ruth  
 Schwartz  
 柯蒂斯, J. Curtis, J.  
 柯勒, 詹姆斯 Curran, James  
 柯里, 艾略特 Currie, Elliott  
 科恩, G.A. Cohen, G.A  
 科恩, M. Kohn, M.  
 科斯特洛, 辛西娅 Costello, Cynthia  
 克雷曼, 伊利诺 Kremen, Eleanor  
 克罗西克, 杰弗里 Crossick, Geoffrey  
 肯, 艾米丽 Kane, Emily  
 肯特, 弗吉尼亚 Cain, Virginia  
 肯特, 罗塞贝斯·莫斯 Kanter  
 Rosabeth Moss  
 库尔兹, 卡里恩 Kurz, Karin

## L

拉德, 埃夫雷特, Jr. Ladd, Everett,  
 Jr.  
 拉克劳, 欧内斯托 Laclau, Ernesto  
 莱克托斯, 伊姆雷 Lakatos, Imre  
 赖恩, 威廉 Ryan, William  
 赖特, 埃里克·奥林 Wright, Erik  
 Olin  
 劳顿, M. Lawton, M.  
 劳曼, 爱德华 Lauman, Edward,  
 勒那, 加达 Lerner, Gerda  
 雷, 罗伯特 Ray, Robert  
 雷哈特, 塞缪尔 Leinhardt, Samuel  
 雷勒斯, 丹尼尔 Relles, Daniel  
 雷梅斯, 玛丽亚 Ramas, Maria  
 雷纳曼, 克雷格 Reinerman, Graig  
 雷尼, 哈尔 Rainey, Hal  
 雷斯金, 巴巴拉 Reskin, Barbara  
 雷斯勒, 亨利塔 Resler, Henrietta

雷斯尼克, 斯蒂芬 Resnick, Stephen  
 里根, 罗纳德 Reagan, Ronald  
 里赫塔, 雷多旺 Richta, Radovan  
 里奇, 罗伯特 Reich, Robert  
 镰田觉 Kamata, Satoshi  
 列威恩, 安德鲁 Levine, Andrew  
 林德, 马克 Linder, Marc  
 林肯, 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刘易斯, 简 Lewis, Jane  
 留久克斯, 卢德 Luijckx, Ruud  
 卢卡奇, 乔治 Lukacs, George  
 鲁宾费尔德, 丹尼尔 Rubinfeld  
 Daniel  
 鲁吉, 玛丽 Ruggie, Mary  
 鲁斯, 凯瑟琳 Roos, Catherine  
 鲁斯, 帕特丽夏 Roos, Patricia  
 罗宾逊, J.P. Robinson, J.P.  
 罗宾逊, R. Robinson, R.  
 罗宾逊, 约翰 Robinson, John  
 罗尔蒙, 约翰 Roemer, John  
 罗尔斯, 约翰 Rawls, John  
 罗杰斯, 乔尔 Rogers, Joel  
 罗森鲍姆, 詹姆斯 Rosenbaum,  
 James  
 罗森菲尔德, 雷彻尔 Rosenfeld,  
 Rachael  
 罗斯, 大卫 Rose, David

## M

马丁, 威廉 Martin, William  
 马尔施, 托马斯 Malsch, Thomas,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马勒, 沃尔特 Munller, Walter  
 马瑟逊, J. Matheson, J.  
 马什, A. Marsh, A.  
 马歇尔, 戈登 Marshall, Gordon,

迈达拉, G.S. Maddala, G.S.  
 麦金农, 詹姆斯 McKinnon, James  
 麦克吉尔, 盖尔 McGuire, Gail  
 麦克兰纳罕, 萨拉 McLanahan,  
 Sara  
 麦克雷, 苏姗 McRae, Susan  
 曼斯基, 查尔斯 Manski, Charles,  
 梅尔, 罗伯特 Mare, Robert  
 梅勒摩特, 雅克 Malemort, Jacques  
 梅斯纳, M. Meissner, M.  
 梅耶, 诺娜 Mayer, Nonna  
 米尔斯, C. 赖特 Mills, C. Wright  
 米勒, A. Miller, A.  
 米歇尔, 劳伦斯 Mishel, Lawrence  
 摩恩, 菲丽斯 Moen, Phyllis  
 摩夫, 尚塔 Mouffe, Chantal  
 摩根, J. M. Morgan, J. M.  
 莫里森, 安 Morrison, Ann  
 莫利纽克斯, 梅西恩 Molyneux,  
 Maxine

## N

内厄矛, L. Nahemow, L.  
 纳什, 简 Nash, June  
 纽拜, 霍华德 Newby, Howard  
 诺克, 大卫 Knoke, David

## P

帕楚谢夫, 威西利 Patrushev,  
 Vasily  
 帕尔默, G. Palmer, G.  
 帕金, 弗兰克 Parkin, Frank  
 帕拉, 简 Pahl, Jan  
 帕瑟森, 简-克劳德 Passerson,  
 Jean-Claude  
 帕森斯, 塔尔科特 Parsons, Tal-

cott  
 佩达威克, 雷纳 Padavic, Lrene  
 佩恩, 杰夫 Payne, Geoff  
 佩恩, 克莱夫 Payne, Clive  
 菲利普斯, 约瑟夫 Philips, Joseph  
 佩龙, 卢卡 Perrone, Luca  
 佩洛夫, H. Perloff, H.  
 皮奥里, 迈克尔 Piore, Michael  
 普雷克, 约瑟夫 Pleck, Joseph  
 普雷瑟, 哈丽特 Presser, Harriet  
 普热沃斯基, 亚当 Przeworski, Adam

## Q

乔, 唐莫 Cho, Donmoom  
 乔尔蒙斯, 诺玛 Chalmers, Norma  
 乔帕克, 克里斯蒂安 Joppke, Chris-  
 tian  
 琼斯, 弗兰克 Jones, Frank

## S

萨贝尔, 查尔斯 Sabel, Charles  
 瑟康姆伯, 沃尔利 Secombe, Walley  
 森, 阿玛泰 Sen, Amartya  
 森特斯, 理查德 Centers, Richard  
 山口和雄 Yamaguehi, Kazuo  
 申光银 Shin, Kwang-Yeong  
 施鲁姆, 韦斯利 Schrum, Wesley  
 施托尔岑贝格, 罗斯 Stolzenberg,  
 Ross  
 施瓦兹, 佩珀 Schwartz, Pepper  
 石田博 Ishida, Hiroshi  
 斯特拉瑟, 苏姗 Strasser, Susan  
 斯蒂尔, 海斯 Stier, Hays  
 斯蒂芬斯, 约翰 Stephens, John  
 斯卡杜拉, 特里 Scandura, Terri  
 斯科尔尼克, 杰罗姆 Skolnick,

Jerome  
 斯佩思, J. L. Spaethe, J. L.  
 斯皮策, G. Spitze, G.  
 斯普雷格, 乔伊 Sprague, Joey  
 斯坦梅特兹, 乔治 Steinmetz, George  
 斯坦沃思, 米歇尔 Stanworth,

Michelle

斯则莱, 亚历山大 Szalai, Alexander  
 索博, 艾略特 Sober, Elliott  
 索尔, T. 惠特曼 Soule, T. Whitman  
 索伦森, 安妮米特 Sorensen,

Annemette

索罗金, 皮特里 Sorokin, Pitrim

## T

泰勒-古拜, 彼得 Taylor-Gooby,  
 Peter

汤普森, E. P. Thompson, E. P.  
 特劳特, 卡罗尔 Traut, Carol  
 特雷曼, 唐纳德 Treiman, Donald  
 特里斯, 朱迪斯 Treas, Judith  
 藤田若生 Fujita, Wakao

图雷恩, 阿兰 Touraine, Alain  
 托尔伯特二世, 查尔斯 Tolbert,  
 Charles, II

托泰恩, J. C. Toutain, J.C.

## W

万纳克, J. Vanek, J.  
 威尔逊, 威廉·朱莉斯 Wilson,  
 William Julius  
 威克里姆, 大卫 Weakliem, David  
 威斯, 琳达 Weiss, Linda  
 威斯科普夫, 托马斯 Weisskopf,  
 Thomas  
 韦伯, 马克斯 Weber, Max

韦斯特恩, 马克 Western, Mark  
 韦斯特加德, 约翰 Westergaard, John  
 维布鲁格, L.M. Verbrugge, L.M.  
 温克勒, 海因里希·奥格斯特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沃恩, 雷蒙德·辛-沃克 Wong,  
 Raymond Sin-Kwok

沃尔夫, R. Wolfe, R.

沃尔夫, 理查德 Wolff, Richard

沃尔夫, 温迪 Wolf, Wendy

沃尔科夫, 苏拉米特 Volkov,  
 Shulamit

沃尔克, 凯瑟林 Walker, Kathryn

沃格, 伊兹拉 Vogel, Ezra

沃格勒, 卡罗里恩 Vogler, Carolyn

沃伦, 比尔 Warren, Bill

沃森, 多萝西 Watson, Dorothy

乌尔梯, 沃特 Ultee, Wout

吴, 杭月 Ngo, Hang-Yue

伍斯诺, 罗伯特 Wuthnow, Robert

伍兹, 玛格丽特 Woods, Margaret

## X

西博恩, 格兰 Therborn, Gran

希尔, 玛莎 Hill, Martha

希曼斯基, 阿尔伯特 Szymanski,  
 Albert

谢, 月 Xie, Yue

谢尔顿, 贝斯 Shelton, Beth

辛格尔曼, 乔奇姆 Singelman, Joachim

休伯尔, 琼 Huber, Joan

雪, A. Shih, A.

## Y

雅各布斯, 杰丽 Jacobs, Jerry

悦兰, J.L. Yellen, J. L.

---

**Z**

扎列茨基, 伊利 Zaretsky, Eli  
朱更斯, 尤里奇 Jurgens, Ulrich





# 主题对照表

## A

澳大利亚, 性别和权力 Australia, gender and authority in

## B

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

本土美国人 Native Americans

边界(社会的) boundary (social)

变化分担分析 shift-share analysis

剥削 exploitation

定义 definition of

概念中的道德问题 moral issues in concept of  
和阶级 and class

和流动性 and mobility

相对于压迫 vs. oppression

部门, 经济的 sectors, economic

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对阶级结构的影响 effects on class structure

对自我雇佣的影响 effects on self-employment

## C

才能 talent

财产关系/权力 property relations/rights

操作化问题 operationalization problems

成就与归因 achievement vs. ascription

重建理论 reconstructing theory

和经验证据的问题 and problems of empirical evidence

抽象/具体 abstract/concrete

## D

等级结构中正式位置变量, 界定的 formal position in hierarchy variable,  
defined

底层阶级 underclass

对数线性分析 log-linear analysis

## F

反常事物和理论建构 anomalies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反对资本主义态度 anticapitalist attitudes

方法方面的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非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

非无产阶级化 deproletarianization

参见“无产阶级化” see proletarianization

非洲南部 South Africa

分级阶级概念 gradational class concepts

封建主义 feudalism

服务阶级 service class

妇女 women

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economic dependency on men

阶级分布 class distributions

劳动力参与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又见“性别”、“性别”和“阶级” see also gender, gender and class

妇女权力 women's rights

妇女运动 women's movement

## G

概念 concepts

概念的裁定 conceptual adjudication

理论中的地位 status in theories

现实主义概念 realist concept

工人阶级(工人) working class (workers)

定义 definition of

公司规模和 firm size and

规模 size of

- 和国家 and the state
-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s
-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 跨工作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permeability across working-class boundary
- 利益 interests of
- 马克思主义对变迁的期望 Marxist expectations for change,
- 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理论的观点 Marxist vs. post-industrial views of
- 瑞典, 规模 Sweden, size
- 下降 decline of
- 性别和 gender and
- 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 link to petty bourgeoisie
- 种族和 race and
- 作为一个“普遍阶级” as a “universal class”
- 公司规模 firm size
- 雇主 employer
- 参见“资本家” see capitalists
- 管理者, 经理 managers
- 参见“权力”、“专家管理者”和“监督者” see also authority, expert managers, supervisors
-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 阶级结构中概念的地位 conceptual status within class structures
- 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理论预期 Marxist vs. post-industrial theory expectations
- 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处理 Marxist vs. Weberian treatments of
- 渗透性分析 permeability analysis
- 在国家中 in the state
- 在跨阶级家庭中 in cross-class families
- 在美国长时间的变化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US
- 在瑞典与美国的比较中 in Sweden compared to US
- 作为职业类型 as occupational category
- 国家 state
- 参见“政府雇佣” see also state employment
-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 政府服务业 state services
- 政治上层建筑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 国家雇佣 state employment
- 概念地位 conceptual status of
- 关于意识的假设 hypotheses about consciousness
- 国家雇员的利益 interests of state employees
- 国家中意识的阶级差异 class difference in consciousness within  
tate
- 和私有部门工作阶级 and private sector working class
- 和私有部门中产阶级 and private sector middle class
- 阶级分布 class distributions and
- 性别分布 gender distributions
- 国家主义 statism
- 见“赞成国家主义态度” see prostatist attitudes
- 过剩人口 surplus population

## H

- 合法性 legitimation
- 宏观分析 macro-analysis
- 阶级分析 in class analysis
- 意义 meaning of
- 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 后工业社会理论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ory
- 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implications for Marxism of
- 和自我雇佣 and self-employment
- 婚姻市场 marriage market

## J

- 基础/上层建筑 base/superstructure
-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 also se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技能 skills
- 参见“专家,劳动退化命题” see also experts, degradation of labor thesis
- 测量问题 measurement problems
- 和底层阶级 and the underclass
- 技能边界渗透性 permeability of skill boundary
- 所得 acquisition of
- 技术 technology
- 对自我雇佣的影响 impact on self-employment

- 和阶级结构的转变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structures
- 加拿大 Canada
- 权威和性别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 渗透性 permeability
-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ie in
- 家庭 family,
- 参见“跨阶级家庭”、调和阶级位置” see also cross-class family  
mediated class locations
- 分析单位问题 unit of analysis problem
- 和自我雇佣 and self-employment
- “家庭阶级”和流动性 ”family class” and mobility
- 妻子的收入分布 wife's income contribution to
- 家庭工资 family wage
- 家庭劳动辩论 domestic labor debate
- 参见“家务劳动” see also housework
- 家庭主妇 housewives
- 作为一个阶级位置 as a class location
- 家务 housework
- 测量 measures of
- 测量中的偏差 biases in measures of
- 和工厂里的权力 and authority in workplace
- 和教育 and education
- 假设关于 hypotheses concerning
- 阶级分布 class distributions of
- 男性回答 male responses
- 性别分布 gender distribution of
- 监督人 supervisors
- 参见“权力,管理者” see also authority, managers
- 长时间的变化 changes over time
- 和性别 and gender
- 渗透性 permeability
- 兼职工作 part-time work
- 简单商品生产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 间接阶级位置 mediated class locations
- 定义 definition of
- 概念的证实 confirmations of concept of

- 关于……研究的经验策略 empirical strategy for study of  
和传统马克思主义 and traditional Marxism  
和阶级认同 and class identity  
和流动性分析 and mobility analysis  
和性别 and gender  
有关研究中的经验惊奇 empirical surprises in study of
- 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  
定义 definition of
- 阶级分析 class analysis  
定义 definition of  
宏观模型 macro-model  
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within  
结构与程序探讨方法 structural vs. processual approaches to  
微观模型 micro-model  
韦伯主义传统 Weberian tradition  
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比较 Weberian and Marxist tradi-  
tions compared  
作为某个自变量学科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discipline
- 《阶级分析项目》 Class Analysis Project
- 阶级分析的过程探讨 processual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和阶级认同 and class identity  
暂时性内 temporality within
- 阶级分析的结构探讨 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和利益 and interests  
时间性 temporality within
- 阶级分析中的个人经历 biography in class analysis  
参见“阶级轨迹” also see class trajectory
- 阶级关系中的对立位置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  
定义 definition of  
反常 anomalies  
和国家 and the state  
阶级意识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进一步重建 further reconstructions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relation to traditional Marxist views  
最初重建的证实 confirmations of initial reconstructions  
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重建 as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Marxism

- 阶级轨迹 class trajectory  
测量 measurement of  
与“流动性影响”的关系 relation to “mobility effects”
- 阶级和性别 class and gender  
见“性别和阶级” see gender and class
- 阶级结构 class structure  
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s  
概念 concept of  
戈德西尔帕的概念 Goldthorpe's concept of  
关于……影响的宏观模型 macro-model of effects of  
和边界的渗透性 and permeability of boundaries  
核心阶级分析模型中的地位 status within core class analysis model  
和性别关系 and gender relations  
劳动力的分布 distributions of the labor force into  
两极化的概念 polarized conception of  
马克思主义: 重建 Marxism: reconstructions  
马克思主义: 传统的观点 Marxism: traditional views  
马克思主义: 传统观点成分的证实 Marxism: confirmation of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views  
马克思主义: 反常 Marxism: anomalies  
全球化的影响 globalization's impact on  
生产力的发展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性别分布 gender distributions  
种族分布 race distributions  
转变: 部门变迁 transformations: sectoral changes  
转变: 假设 transformations: hypotheses  
转变: 美国模式 transformations: US patterns  
作为相对于“部分之和”的“格式塔”概念 as a “gestalt” concept  
vs. “sum of parts”
- 阶级经验 class experience  
见“经验” see experience
- 阶级利益 class interests  
见“利益” see interests
- 阶级联盟 class alliances
- 阶级能量 class capacity
- 阶级认同 class identity

- 见“认同” see identity
- 阶级实践 class practices
- 阶级首要性 class primacy
- 阶级妥协 class compromise
- 阶级位置 class location
- 参见“阶级结构, 阶级关系中的对立位置”、“间接阶级位置” see also  
class structure,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mediated class locations
-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traditional 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 分析问题的单位 unit of analysis problem
- 和阶级意识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家庭的 of families
- 在国家与私有部门中 in state vs. private sectors
- 作为分类机制的性别 gender as sorting mechanism into
- 作为“空位置” as “empty places”
- 作为一个微观层次概念 as a micro-level concept
- 作为中介联系的性别 gender as mediated linkage to
-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 测量 measurement of
- 定义 definition of
- 对主观性的影响 effects on subjectivity
- 多样性 varieties of
- 国家雇佣和 state employment and
- 和家庭 and families
- 经验结果 empirical results
- 日本 Japan
- 研究的经验议程 empirical agenda for study of
- 意识形态联盟和 ideological coalitions and
- 在美国 in the United States
- 在瑞典 in Sweden
-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 测量 measurement of
-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验证 confirmations of traditional Marxist views
- 传统马克思主义期望 traditional Marxist expectations
- 定义 definition of
- 多变量模型 multivariant models
- 反常结果 anomalous results



- 轨迹和 trajectory and  
和阶级位置 and class location  
假设 hypotheses  
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阶级和性别相互作用 class and gender interactions on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日本 Japan  
研究的经验策略 empirical strategy for study of  
暂时结构 temporal structure of  
种族和 race and  
经理 managers, 见“管理者”  
经历 experience  
    概念 concept of  
    和认同 and identity  
    和习性 and habitus  
    和主观性 and subjectivity  
    阶级边界渗透性和 class-boundary permeability and  
    阶级位置和 class location and  
    与利益相对比 contrast to interests  
    暂时特性 temporal properties of  
韦伯主义的处理 Weberian treatment of  
局限(决定的形式) limitation(form of determination)  
决策权力变量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variable  
    定义 definition of

## K

- 跨阶级家庭 cross-class family  
    边界渗透性跨国家的变化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boundary  
        permeability within  
测量 measurement of  
分布 ditributions  
戈德西尔帕的观点 Goldthorpe's views  
工人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permeability of working-class boundarg within  
和阶级认同 and clas identity  
和流动 and mobility  
假设: 渗透性 hypotheses: permeability

假设: 调和阶级位置 hypotheses: mediated class locations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y within  
 阶级认同 and class identity  
 在……之中的男权 male power within

## L

劳动价值论 labor theory of value  
 劳动力 labor power  
 劳动力市场 labor markets  
 劳动退化命题 degradation of labor thesis  
 劳动运动 labor movement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离异 divorce  
 理性行动者模型 rational actor model  
 力量 power  
     和管理者 and managers  
     和技能 and skills,  
 历史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利益 interests  
     定义 definition of  
     和剥削 and exploitation  
     和对立位置 and contradictory locations  
     和家庭 and families  
     和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and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和阶级位置 and class location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s  
     和阶级意识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和经验 and experience  
     和西木 and the shmoo  
     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 in Weberian and Marxist  
         class analysis  
     性别利益 gender interests  
     在国家中 within the state  
 联合王国, 性别和权力 United Kingdom, gender and authority in  
 联盟 coalitions

- 见“阶级联合” see class alliances
- 流动性 mobility
- 边界的相对渗透性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boundaries
- 布局模型 topological models
- 垂直流动 vertical mobility
- FJH 假设 FJH hypothesis
- 戈德西尔帕的模型, 与……的关系 Goldthorpe's models, relation to
- 工人阶级边界渗透性 working-class boundary permeability
- 假设 hypotheses
- 跨国变化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 流动性影响与轨迹影响 mobility effects vs. trajectory effects
- 名义问题 normative issues
- 农民 farmers
- 韦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注 Weberian vs. Marxist concerns
- 性别和 gender and
- 职业流动研究 occupational mobility research

## M

- 妈咪路线 Mommy track
-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 和阶级边界渗透性 and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 和女权主义 and feminism
- 相对于后工业理论 vs. post-industrial theory
- 相对于韦伯主义阶级分析 vs. Weberian class analysis
- 小资产阶级, 倾向的观点 petty bourgeoisie, views towards
- 有关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 traditional views on class analysis
- 美国 United States
- 国家雇员的意识 state employee's consciousness in
- 家庭阶级 family class in
-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in
-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in
- 权力和性别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 权力, 与瑞典比较 authority, compared to Sweden
- 渗透性分析 permeability analyses
-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ie

- 与瑞典比较的阶级经验 class experiences within compared to Sweden
- 在阶级分布上的变化 changes in class distributions
- 在自我雇佣上的变化 changes in self-employment
- 丈夫的家务劳动 husband's housework in
- 美籍非裔人 African-Americans

## N

- 年金收入者 rentier
- 农民 farmers
- 参见“农业” see agriculture
- 农业 agriculture
- 和流动性 and mobility
- 奴隶制度 slavery
- 努力 effort
- 和技能 and skills
- 和剩余价值 and surplus
- 挪威 Norway
- 权力和性别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 渗透性 permeability
- 女权主义 feminism

## P

- 平民主义 populism

## Q

-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对无产阶级化的影响 impact on proletarianization
- 权威 authority
- 测量和测量问题 measures and measurement problems
- 达伦多夫的观点 Dahrendorf's view on
- 反常调查研究发现 anomalous findings
- 戈德西尔帕的处理 Goldthorpe's treatment of
-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 和性别 and gender

跨阶级家庭 cross-class families  
 流动渗透性 mobility permeability  
 美国和瑞典的分布 distribution in US and Sweden  
 友谊渗透性 friendship permeability  
 忠诚租金和 loyalty rent and

## R

认同 identity  
 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定义 definition of  
 对利益意识的影响 effects on interest consciousness  
 轨迹和 trajectory and  
 显著 salience of

日本 Japan  
 反常的意识结果 anomalous consciousness results for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in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in  
 权力边界 authority boundary, muted in  
 权力和性别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ie in  
 性别模式 gender patterns in  
 资料中的测量问题 measurement problems in data for

瑞典 Sweden  
 妇女运动 women's movement in  
 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  
 国家雇员的意识 state employee's consciousness in  
 家庭阶级 family class within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in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in  
 权力与性别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racy in  
 渗透性分析 permeability analyses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  
 与美国相比较的阶级经验 class experiences within compared to US  
 与美国相比较的权力 authority compared to US  
 丈夫的家务劳动 husband's housework in

## S

- 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 社会福利 social welfare
- 社会关系、抽象概念 social relations, abstract concept of
- 社会阶层 strata
- 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racy  
     和渗透性 and permeability  
     和性别 and gender
-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 社会主义 socialism
- 生产力 forces of production  
     参见“技术” see technology
- 生存 subsistence
- 生活方式 life-style
- 生活机会 life chances
- 生活经验 lived experience  
     见“经验” see experience
- 渗透性 permeability  
     参见“跨阶级家”、“友谊”、“流动性” see also crossclass families/friendships  
     mobility  
     定义 definition of  
     各种各样 varieties of  
     和跨阶级家庭 and cross-class families  
     和友谊 and friendships  
     静态的与动态的 static vs. dynamic  
     流动性 mobility  
     马克思主义: 传统预期 Marxism: 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马克思主义: 反常现象 Marxism: anomalies  
     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视角 Marxist vs. Weberian perspectives
- 模型 models  
     三种形式的比较 three forms compared  
     渗透性事件矩阵 permeability event matrices  
     维度渗透性变量 dimensional permeability variables  
     位置渗透性变量 locational permeability variable

位置相对于维度的渗透性 locational vs. dimensional permeability  
 剩余 surplus  
 失业 unemployment  
 测量 measurement of  
 对我自雇佣的影响 effects on self-employment  
 时间性 temporality  
 手艺 crafts  
 税收 taxation

## T

特权 privilege  
 统治 domination

## W

微观分析 micro-analysis  
 意义 meaning of  
 在阶级分析中 in class analysis  
 韦伯主义传统 Weberian tradition  
 韦伯主义的处理 Weberian treatment of  
 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anization  
 和全球化 and globalization  
 马克思主义:传统期望 Marxism:traditional expectations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预期不符的证据 Marxism: evidence against tradi-  
 tional expectations  
 无偿家庭劳动 unpaid family labor

## X

西木 shmoo  
 习惯 habitus  
 闲暇 leisure  
 象征性资本 symbolic capital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ie  
 参见“自我雇佣” see also self-employment  
 定义 definition of  
 工人边界的渗透性 permeability of boundary with workers

- 规模 size of  
阶级联盟 class coalitions with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of  
马克思主义预期 Marxist predictions for  
日本 Japan  
随着时间的变迁 change over time  
性别和 gender and  
种族和 race and  
效率工资 efficiency wage  
性别 gender  
和管理者 and managers  
和家庭中的权利 and power within family  
和权力 and authority  
家务劳动分布 housework distribution by  
阶级分布 class distributions by  
阶级流动 and class mobility  
日本 Japan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收入差距 earnings gap  
特殊性 specificity of  
统治/歧视 domination/discrimination  
自主性 autonomy of  
性别和阶级 gender and class  
恩格斯的观点 Engels' views on  
分布 distributions  
概念问题 conceptual issues  
和阶级意识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和马克思主义: 重建 and Marxism: reconstructions  
和马克思主义: 传统理论 and Marxism: traditional theses  
和马克思主义: 传统理论的证实 and Marxism: confirmations of  
traditional theses  
和马克思主义: 反常的结果 and Marxism: anomalous results  
相互作用的方式 forms of interaction of  
之间的因果相互影响 causal interactions between  
性别和权力 gender and authority  
玻璃天花板 glass ceiling



成分的影响 compositional effects  
 分析策略 analytical strategy  
 跨国变化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权力中净的性别差距 net gender gap in authority  
 权力中总的性别差距 gross gender gap in authority  
 自我选择 self-selection  
 性别歧视主义 sexism  
 性别思想意识 gender ideology  
 选择(决定因素的形式) selection (form of determination)  
 学生 students

## Y

压迫, 定义 oppression, definition of  
 以动因为中心的阶级分析 agent-centered class analysis  
 以关系为中心的探讨 relation-centered approach  
 意识 consciousness  
   见“阶级意识” see class consciousness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友谊 friendships  
   边界的相对性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boundaries to  
   测量 measurement of  
   工人阶级边界渗透性 working-class boundary permeability  
 假设 hypotheses  
   跨国变化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社会学探讨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to  
   以往研究 prior research on  
 约束权变量 sanctioning authority variable

## Z

赞成中央集权的态度 prostatist attitudes  
 照看儿童 childcare  
   孩子 children  
 正义 justice  
 直接阶级位置 direct class location  
 职业的性别隔离 occupational sex-segregation  
 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 参见“对立的位置” see also contradictory location  
 和国家 and the state  
 和阶级认同 and class identity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和阶级意识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和种族 and race  
 马克思的观点 Marx's views on  
 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传统中 in Marxist and Weberian traditions  
 作为工人阶级内的阶层 as atrata within the working class
- 种族 race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and Marxist theory  
 阶级分布和 class distributions and  
 阶级意识和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 专家 experts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阶级边界的渗透性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y  
 量度问题 measurement issues  
 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理论的有关期望 Marxist vs. post-industrial theories expectation, about  
 膨胀 expansion of
- 专家管理者, 专家经理 expert managers  
 分布 distributions  
 和阶级形成 and class formation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of  
 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后工业理论有关期望 Marxist vs. post-industrial theories expectations about  
 膨胀 expansion of
- 转变 transformation(form of determination)
- 资本家 capitalists  
 财富 wealth of  
 定义 definition of  
 规模 size of  
 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of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of  
 统治(权力) and domination(power)  
 小资产阶级: 差别 petty bourgeoisie: distinction between  
 性别分布 gender distribution of

- 与工人敌对的利益 antagonistic interests with workers  
种族分布 race distribution of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低层阶级 underclass in  
    动力 dynamics of  
    和剥削 and exploitation  
    和父权制 and patriarchy  
    阶级两极化 polarized classes within  
    阶级模型 class model within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涉及(资本主义的)流动性 mobility involving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 “bourgeois social science”  
资格证书 credentials  
自我雇佣 self-employment  
    部门变化对自我雇佣的影响 sectoral changes effects on self-employment  
    参见“小资产阶级” see also petty bourgeoisie  
    测量 measurement of  
    概念 concept of  
    和合作 and incorporation  
    杰斐逊的观点 Jefferson's views on  
    里根的观点 Reagan's views on  
    林肯的观点 Lincoln's views on  
    随着时间的变迁 change over time  
    态度倾向 attitudes towards  
    与……相联 ties to  
    准自我雇佣 pseudo-self-employment  
    作为一个理想 as an ideal  
    时间序列分析 time-series analysis of  
自我选择 self-selection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自在阶级/自为阶级 class in-itself/for itself  
自治权(职业中) autonomy (in work)  
租金 rent  
    雇佣租金 employment rent  
    技能租金 skill rent  
    忠诚租金 loyalty rent